

陈独秀文章选编

陈独秀文章选编

(下)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封面设计：马少展

陈独秀文章选编

CHEN DUXIU WENZHANG XUANBIAN

(下)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顺义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21印张 529,000字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9,000

书号 3002·249 定价 3.45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我们对于造谣中伤者之答辩(一九二五年一月七日)	1
列宁与中国——列宁逝世周年纪念告中国民众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5
我们应如何对付善后会议(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8
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工人的力量(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	11
大家应该开始懂得善后会议的价值了!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四日)	13
一封给章行严的信(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四日)	15
愚弄国民的国民会议条例(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18
被压迫者的自由与赤化(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20
国民党究竟应当和谁合作?(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22
共产和普选果足以亡国么?(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22
你们早已背叛了民党呵!(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23
只要脸厚什么事都好干!(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23
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对付中国国民运动之总策略 (一九二五年三月七日)	24
精神文明 东方文化 段祺瑞(一九二五年三月七日)	27
崇信外国(一九二五年三月七日)	27
军阀与国民会议(一九二五年三月七日)	28
陈炯明与辛亥革命俱乐部(一九二五年三月七日)	28
悼孙中山先生I(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29
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31
社会党与政府官吏(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31

疲帝得志是何意义?(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32
“过激”之第三个解释(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32
护党呢还是叛党?(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33
工人运动与各国在华工业(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33
评中山先生死后之各方面(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34
统一与分立(一九二五年四月五日)	37
反段与降段(一九二五年四月五日)	39
帝国主义下的难民与苏俄(一九二五年四月五日)	39
好个不使劳动界反抗资本家的劳工!(一九二五年四月五日)	40
亡国的上海(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九日)	41
列宁主义与中国民族运动(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43
卖国(一九二五年五月十日)	49
你们当真外抗强权吗?(一九二五年五月十日)	49
今年“五一”的感想(一九二五年五月十日)	50
《圣经》与鸦片(一九二五年五月十日)	50
反共产与军阀(一九二五年五月十日)	51
过激主义与被压迫者(一九二五年五月十日)	51
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一九二五年五月十日)	52
卖国贼与国民党右派(一九二五年五月十日)	52
段祺瑞解散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意义(一九二五年五月十日)	53
“反唐”与国民革命(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54
上海大屠杀与中国民族自由运动(一九二五年六月六日)	56
日本纱厂工潮中之观察(一九二五年六月六日)	59
此次斗争的性质和我们应取的方法(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日)	61
我们如何应付此次运动的新局面(一九二五年七月二日)	64
广州战争之意义(一九二五年七月十六日)	66
我们认识江亢虎了(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	68
《醒狮》与《诚言》(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	68
孙宝琦与《醒狮》(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	69

此次运动中之帝国主义与军阀(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五日)·····	70
军阀及资产阶级在上海民众运动中之影响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八日)·····	72
我们如何继续反帝国主义的争斗?(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74
罢工与法律(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78
本报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一九二五年九月七日)·····	79
给戴季陶的一封信(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一日)·····	85
加伦将军的分身法(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一日)·····	96
戴季陶与反共产派运动(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一日)·····	96
可怜的段政府(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一日)·····	97
奉军在北京之治外法权(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一日)·····	97
我们对于关税问题的意见(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98
“赤化”与“过激”(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102
康有为与奉系军阀(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102
康有为、章士钊、戴季陶(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103
段执政的《甲寅》(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103
资产阶级的民生主义(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104
奉军之大义灭亲(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104
帝国主义者不可无走狗(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105
帝国主义者为什么帮助反动军阀(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105
今年双十节中之广州政府(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二日)·····	106
反奉运动与法统问题(一九二五年十月三十日)·····	112
戴季陶之道不孤矣(一九二五年十月三十日)·····	114
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一九二五年十月三十日)·····	115
又是一个共产军!(一九二五年十月三十日)·····	115
十月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	116
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120
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日)·····	124
中国军阀之左、右派(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日)·····	127

工贼替安福派说话(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日)	128
预防赤化的国民党右派(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日)	128
以赤化为仇敌的奉天商会(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日)	129
《时事新报》太赤色了!(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日)	129
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130
反赤运动与中国民族运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	134
孙文主义的信徒呢,还是冯自由主义的信徒?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143
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	144
国民党右派之过去、现在及将来(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	146
这就是戴季陶所谓“仁爱”之言(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	149
国民党右派之光荣(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	150
帝国主义者悬出重赏了(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	150
广州事变之研究(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	151
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156
绅士们请看北京血案的司法调查!(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160
你们代表谁?(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161
一个不行动的党(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161
全民政治与全民革命(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162
反赤 苛政(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163
《独立报》对谁独立?(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163
国民军与北方政局(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164
国民党右派大会(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167
第二次和第三次劳动大会之间的中国劳动运动 (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	173
捷足射利的上海(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	177
唐生智也赤了吗?(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	178
讨赤大元帅(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	178
各国公使为什么均有喜色(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	179

国民外交原来如此！（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	180
这是以党治国吗？（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	180
可怜的租界华人立宪运动（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	181
白俄不是外力吗？（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	181
最近政局之观察（一九二六年五月八日）	182
我们要认清敌与友（一九二六年五月八日）	184
向赤或向反赤之路标（一九二六年五月八日）	187
奉军胜利之教训（一九二六年五月八日）	187
南方形势与国民党（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188
宪法与贿选（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190
英国大罢工与东方民族运动（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193
不怪外人都是中国人自己不好（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196
外交界是以平等的好感对谁？（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196
直奉冲突之迫近与各方应取的态度（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197
孙传芳最近的主张（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199
过激主义也是国粹了！（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204
民党败类中之先知先觉（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204
师生合作与学生会！（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205
李景林张宗昌之共产（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205
合肥段公与总统曹公（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206
吴佩孚已是事实上的大总统（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206
孙宝琦语妙天下（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207
你们还要反赤吗？（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207
孙中山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是不是国家主义？ （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208
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日）	214
打破“民族的巴士的狱”（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日）	220
对于上海五卅纪念运动之感想（一九二六年六月一日）	223
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一九二六年六月四日）	226

红枪会与中国的农民暴动(一九二六年六月十六日)	233
威林顿眼中的华人价值(一九二六年六月十六日)	236
请看反赤军阀之卫国救民!(一九二六年六月十六日)	236
奉直对峙的混沌政局(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237
好个经济上的提携?(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240
平民的中日亲善(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240
“友谊的态度来交涉”之结果!(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241
工人活命问题(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241
革命的上海(一九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242
国民党右派与赵恒惕(一九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245
刘芦隐与张君勱(一九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245
国民党右派与陈炯明(一九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246
雷殷犯了什么罪?(一九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246
美术家再往何处遁?(一九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247
左排赤党右讨军阀(一九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247
崇拜曾左罗江的国家主义者(一九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248
国家主义的政纲(一九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248
可以靠外力替我们革命吗?(一九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249
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九二六年六月七日)	250
赤化过激都是国粹(一九二六年七月七日)	253
帝国主义者最近在上海之暴行(一九二六年七月十四日)	254
答张人杰 符琇 黄世见 冥飞(关于北伐问题)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三日)	257
✓ 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261
人民之军队!?(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266
好一个有弊而却公道的治外法权!(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266
张宗昌的亲口供状(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267
国家主义者那里去了?(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268
……政还诸……民(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268

丑哉和平运动!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269
帝国主义者对待中国人之态度(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	270
我们现在怎样争斗?(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二日)·····	272
孙传芳章炳麟的双簧(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二日)·····	275
妙哉孙传芳的三爱主义!(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二日)·····	275
好一个有节操的章炳麟!(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二日)·····	276
好个中国和平之奥秘!(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二日)·····	277
研究系主张社会革命!?(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二日)·····	278
“反国民革命者”的民权呼声(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二日)·····	279
以党治国与军事专政(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二日)·····	280
请看治外法权所产生之公道!(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二日)·····	280
反赤派听者!(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二日)·····	281
对于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希望(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九日)·····	282
北京黑化了!(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九日)·····	285
高叫拥护国旗的是些什么人?(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九日)·····	285
避开革命的新方法(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九日)·····	286
丁文江与爱国行动(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九日)·····	287
国家主义者曾琦与万县惨案(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九日)·····	287
那里有中华民国?(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九日)·····	288
对于国民军再起的希望(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	289
军阀口中的赤化与苏俄(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	294
到底是谁没收人民财产?(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	295
孙中山的北伐还是段祺瑞的北伐?(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	296
以招商九轮报效孙传芳的是谁?(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	296
原来抗张吴就是乱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	297
爱国的顾内阁(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	297
十月革命与东方(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298
研究系官运不亨通(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301
国家主义派有了极阔的首领!(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301

国家主义者对国民党党旗及北伐(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302
又是一个为孙传芳保江山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303
革命与武力(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304
到底是谁强夺他人的财产妻女为已有?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308
自治呢还是由军阀保境安民?(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308
丁文江竟比军警还要反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309
国家主义者眼中的赤化!(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309
国家主义派眼中的爱国军队及其五色旗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310
青天白日旗是共产党的吗?(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311
孙传芳败后之东南(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	312
怪哉没有资本家不要资本主义的资本制度社会!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	316
各国承认国民政府问题(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	317
谁杀了谁?(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七日)·····	322
张天师破产了!(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七日)·····	329
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中之中国革命运动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330
英国帝国主义最近对中国进攻政策(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335
谁践踏了谁?——斥麦克唐纳尔(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339
呜呼稳健分子!(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343
国民党的敌人是谁?(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343
张宗昌的三不知(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344
放屁狗的《甲寅》(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344
革命与民众(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345
无耻的九省联合会(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349
稳健之孙文主义!(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350
英国雇用的奸细国民外交协会(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350

“二七”纪念日敬告铁路工友(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	351
赤的运动与中国外交(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	353
讲容忍的国家主义者(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	356
曾琦与麦克唐纳尔(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	356
国家主义者眼中的国家和政府之分(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	357
国家主义者的国家与中华民国(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	357
究竟是谁无祖国?(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	358
令人肉麻的国家主义者!(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	359
怎见得我们不要国家?(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	360
梁启超也佩服英人之忍耐!(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	360
好高明的稳健派!(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	361
谁对谁的宽大政策?(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	361
北洋军阀“安”的成绩!(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	362
英国不是帝国主义?(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	362
无产阶级与民族运动(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	363
张作霖宣言之解剖(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	366
是谁愿与北方军阀妥协?(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	369
中立呢还是共管?(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	370
奉天居然想勾结蒋介石!(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	370
青天白日旗下反青天白日旗的分子(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	371
中英人之见解不同如此!(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	371
日本的如意算盘(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	372
稳健分子悔祸投诚的机会到了!(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372
共产党造谣惑众!(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373
不受抬举的唐生智!(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373
宣讲呢,还是拍影戏?(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374
果然是共产党的梦吃与造谣吗?(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375
外看强权内储国贼(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376
三民主义信徒的双包案(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376

答符琇(军事行动与民众运动)(一九二七年三月二日)·····	377
答王纯礼(革命军与工农群众及革命党)(一九二七年三月二日)·····	377
我们目前的奋斗(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	378
国民党党内纠纷与中国革命(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	381
西山会议派连资产阶级还不如!(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	385
党皇帝(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	385
西山会议派打倒了吗?(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	386
反革命当然攻击革命(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	386
西山会议派连安福派还不如!(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	387
投机商人——国民党主席——蒋介石的左右 (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	387
蒋介石能和张作霖政见相同吗?(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	388
苏俄何尝有什么“党化教育”!(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	389
工友为什么只反对联军不反对党军?(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	390
孙中山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中之悲愤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	391
溥泉溥泉,你到底是一个什么人?(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	394
军阀为什么怕纠葛?(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	395
津汉情形的确不同(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	395
个人的军事独裁之榜样!(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	396
全部党军都能够接受张作霖吴佩孚的提议吗?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	396
于中国实际政治有经验者是谁?(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	397
我即党与朕即国家(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	397
日本人诬蔑中国革命领袖一至于此!(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	398
评蒋介石三月七日之演讲(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	399
答蒋希曾(救党运动)(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	404
曾琦与薛大可(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	405
毕庶澄和西山会议派就这样纪念中山!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	405
西山会议派和英帝国主义同样的纪念中山!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	406
我们冤枉了西山会议派!(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	406
帝国主义者眼中之蒋介石(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	407
中国国民革命的武器是些什么?(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	407
与帝国主义军阀妥协想推翻国民党的是谁?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	408
戴天仇愿意出卖工人吗?(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	408
答沈滨祈、朱近赤(国民革命之归趋)(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	409
谁敢再想做中国之爹亚士?(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	412
英国帝国主义不怕蒋介石了吗?(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	413
稳健派原来如此!(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	413
青天白日旗下之上海新闻界!(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	414
张作霖已说出南北妥协的条件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	414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关于政局的公开的信	
(一九二七年六月四日)	415
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一日)	418
湖南政变与讨蒋(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日)	424
中国国民党的危险及其出路(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	429
请加入张作霖的党去罢!(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	433
可怜的山西各界代表!(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	433
阎锡山的国民党……的国民党?(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	434
张胡子真笨!(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	434
急求南北妥协的是北张还是南蒋?(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	435
纯正三民主义信徒的奉宁晋联盟(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	435
究竟什么是真正工农?(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	436
不进则退(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437
汪精卫的出路在那里?(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437

斯文扫地民众爬上来(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438
马寅初又来出博士的丑(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439
滑稽的禁令(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439
蒋介石的进步真快呀!(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440
阎锡山冯玉祥仍然是赤!(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440
张作霖的共和与国民党的国民革命(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441
国民党也可以为帝国主义镇压革命了!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441
国民党也想求得帝国主义的信任了!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442
国民党也要“外崇国信”了!(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443
张作霖的遗嘱(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443
国民党清党的效果(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444
所谓无政府党本来就是这样!(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444
速成的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445
资产阶级的民生主义(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445
孙中山无常识处(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446
不甚赞助捕房的法官之下场!(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446
汪精卫是第五代反共者(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447
好一个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447
一切反革命联合起来!(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448
“杀尽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448
黄埔失败第一个重大原因(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	449
团结三民主义信徒之结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	449
军阀政客是那些人?(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	450
还是吴稚晖说老实话!(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450
反共清党与收回租界(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451
华官委托捕房越界捕人(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451
为新军阀造机会(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452

蒋介石是向国中求婚吧！（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452
国民党仍难团结吗？（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453
反共清党后的忠实党员（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453
双包案的清党运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454
枪决大批共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454
替代（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455
汪精卫行为不当（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455
有趣煞的总理纪念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456
作壁上观的北伐（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456
国民党眼中的革命成功（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457
以国民党党员为限（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457
横逆变成了神圣（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458
我真是害了你们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458
国民党中的端、庄、刚毅（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459
盛哉党化！（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460
辽皇帝与党皇帝（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460
改组与纠正（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461
党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461
好大胆的胡适之、褚辅成！（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	462
资产阶级独裁的上海市参事会（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	462
主义的流弊（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	463
反共清党后的两个印象（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	463
数典忘祖（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	464
驳马克思不是容易的事呀！（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	464
郭先生和自己开玩笑（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	465
移步换形的骗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	465
反共而不流入资本主义？（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	466
“杀其人而用其法”（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	466
夸大狂（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	467

同志之标准(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	467
世界太左了!(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	468
中国人的晦气!(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	469
汪精卫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	469
不同(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	470
“第五层序”的革命(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470
反共产的国民革命(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471
下层轰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471
少一个皇帝(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472
共贼汪精卫(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472
反共的共产国际(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473
我们发见了国奉之不同了(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473
请看国民党的民族主义!(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474
李宗仁骂自己(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474
国民党死亡之正式讣告(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475
之洞主义(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475
国民党投降了研究系(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476
杀人的国民党(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476
小人党(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477
吃人的血腥的道德文化(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477
究竟是谁惨杀?(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478
研究系称心了罢!(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478
共产党是抢劫的吗?(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479
叶开鑫与汪精卫(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479
反共先生的下场(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480
真正国民党(一九二八年一月二日)·····	480
如此这般的反共清党(一九二八年一月二日)·····	481
白崇禧口中的清党大功(一九二八年一月二日)·····	481
分治合作与联省自治(一九二八年一月二日)·····	482

孙中山瞎了眼睛(一九二八年一月二日)·····	482
容安与共信(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六日)·····	483
金箍棒(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六日)·····	483
蒋介石也是共产党(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六日)·····	484
武汉又多一个冤鬼!(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六日)·····	484
国民党根本不要民众(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六日)·····	485
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六日)·····	485
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是救国救民的呀!(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六日)·····	486
可怜的胡汉民!(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六日)·····	486
忠实同志又多一个!(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六日)·····	487
蒋介石也谈什么土地问题(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六日)·····	488
吴稚晖识主(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六日)·····	489
逼钱与打战(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日)·····	489
杀穷人(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日)·····	490
两件肉麻的事(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日)·····	490
国民党是一种什么党?(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日)·····	491
国民党的劳动立法(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日)·····	491
冯玉祥眼中的共产党与国民党(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日)·····	492
险象丛生的国民党(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日)·····	492
请看中国的阶级与争斗!(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日)·····	493
大元帅不是好做的呀!(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日)·····	493
反革命的阶级(一九二八年二月六日)·····	494
铲共还是铲蒋?(一九二八年二月六日)·····	494
拜金主义能救中国的穷吗?(一九二八年二月六日)·····	495
殖民地驯服的奴隶(一九二八年二月六日)·····	496
第三国际之野心?(一九二八年二月六日)·····	496
呵,原来你们是革心党!(一九二八年二月六日)·····	497
太好了!(一九二八年二月六日)·····	497
三民主义者的阶级观(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三日)·····	498

三民主义者的交友与模楷(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三日)	499
乱党(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三日)	500
即是(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日)	500
忠实同志乎叛逆乎?(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日)	501
是谁从中播弄呢?(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日)	501
国民党的理论与方法(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日)	502
谁是中国的国民革命者?(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日)	503
无赖与有赖(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日)	504
“党人可杀”(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日)	505
上海工统会的饭碗快打破了(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506
国民党人腐化的亲供(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507
谁说国民党不要民众?(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507
致胡适(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日)	508
辩诉状(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	510
上诉状(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五日)	516
中国的一日(一九三六年九月)	522
致申报馆编辑部的信(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523
孔子与中国(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	524
从第一双十到第廿六双十(一九三七年十月二日)	535
抗日战争之意义——在武昌华中大学讲演 (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	537
目前对日抗战的种种问题——答《抗战》周刊记者问 (一九三七年十月九日)	542
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及怎样得到胜利——在汉口青年会讲演 (一九三七年十月)	545
辛亥革命之回顾与前瞻(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	551
实庵自传(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552
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564
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565

怎样才能发动民众——在武汉大学讲演(一九三七年十一月)·····	568
打倒消极先生(一九三七年十二月)·····	572
“言和即为汉奸!”(一九三七年十二月)·····	574
多谢敌人的飞机大炮(一九三七年十二月)·····	577
抗战中应有的纲领(一九三七年冬)·····	578
《我对于抗战的意见》一书的自序(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八日)·····	580
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一九三八年三月)·····	581
从国际形势观察中国抗战前途(一九三八年四月)·····	584
抗战中的党派问题(一九三八年四月)·····	590
各党派应如何巩固团结?——答《抗战行动旬报》征集抗战集体 意见问题之一(一九三八年四月)·····	592
抗战与建国(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594
“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五日)·····	597
我们断然有救(一九三八年六月五日)·····	599
国民党究竟决心采用那一种政治经济制度?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日)·····	601
抗战一年(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	603
抗战中川军之责任——在中央广播电台讲演 (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四日)·····	606
民族野心(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六日)·····	608
论游击队(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612
说老实话(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614
资本主义在中国——在重庆民生公司讲演(一九三八年七月)·····	616
敬告侨胞——为暹罗《华侨日报》作(一九三八年八月一日)·····	619
你们当真反对资本主义吗?(一九三八年八月二日)·····	621
我们为什么而战?(一九三八年八月八日)·····	623
“八一三”(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五日)·····	626
告日本社会主义者(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628
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632

我们为什么反对法西斯特（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	637
蔡子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四日）·····	640
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一九四二年二月十日）·····	643
附录：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	751

我们对于造谣中伤者之答辩

(一九二五年一月七日)

大家意见不同，甚至于利害不同，据理争辩或据事攻击都是可以的，造谣中伤是不可以的。但是世界上往往有一种人为了某种政治的作用或自觉的不自觉的由于阶级的利害关系，急于要攻击他们的敌人，而一时又寻不着敌人错处，于是遂不得不出于造谣中伤之一法。

现在有一班人对于我们大肆其造谣中伤的手段，也是出于上述的心理。攻击我们底人们，若能指出我们实在的错误，我们是应该感谢的；或者是指出疑似的错误，我们也应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答复他们。可是他们现在所攻击我们的纯粹是造谣中伤，而且出乎情理之外的造谣中伤，令我们不得不对于他们造谣中伤之原因与心理加以解释。

他们的谣言有重要两点：

(一)说我们得了俄罗斯的巨款。这个谣言远在二三年前，造谣的人，本是旅沪湖南劳工会分子王光辉、谌小岑辈和几个所谓无政府派，王、谌二君虽然不承认曾造此谣言，而无政府派的宋仙却有一封致郑州工人的信可以作证。我前年在上海被法捕房逮捕时，华探杨某曾于年前向我的朋友董、白二君示意要敲竹杠，就是因为听了他们的谣言，穷人无钱被敲，我当时只得挺身就捕。同时，他们并在《四民日报》(复辟党和无政府党合办的报)上，大造其谣言，说我假借工人名义向俄罗斯骗钱。最近又有国民党右派分子马素，在上海南方大学演说，也公然攻击我们，大意是说我们为了俄国的金钱才相信主义。我们现在的答辩是：第一，我们是第三国

蘇的支部，向来未和苏俄发生直接关系；第二，第三国际本部自己的用费全靠五六十国的支部供给，断不能够有巨款津贴到很小的中国支部；第三，无论是苏俄或是第三国际，主持的人不但不是瞎子、聋子、痴子，其综窍名实，并非糊涂的官僚之类，而且常有代表在中国，中国党人决没有事前借名骗钱，事后脱卸责任的可能；第四，我们在国内国外所代募的京汉工人抚恤款均交由救济委员会支配，比由该会付原捐款人以收条，所有收支详数，该会不久必有一个负责的报告；第五，我们若不是为自己的信仰所驱使，若是为金钱所驱使，在中国现在的社会，可以弄钱的道路很多，并不须十分不要脸的去骗，舍此不图，而却要假借全世界资本主义社会所压迫所厌恶的主义去骗素称纪律严肃的第三国际或苏俄的钱，未免南辕北辙了；第六，或谓苏俄为外交上的鼓吹收买我们，大家须知道苏俄若取以金钱帮助外交的政策，只需购买外交当局及大的新闻已足，收买我们无权无位的党人有何用处，并且苏俄对华外交，是遵守列宁“对被压迫的民族只与不取”的政策，他们拿种种权利与特权挟一个空洞的承认，实用不着我们为了帮助鼓吹，至于我们主张蒙古民族独立自主，乃是对于弱小民族的同情，不是为了俄国，西藏、青海等处的小民族若有独立自主的要求，我们也一样与以同情。

(二)说我们勾结吴佩孚陷害工人。从前章炳麟说黄花岗之役，是黄兴勾结张鸣岐，受了数十万贿金，送革命党人至广东，以便一网打尽。天下事无独有偶，现在又有人自由造谣说曹、吴惨杀京汉工人，在汉口逮捕工人，都是中国共产党陷害的。我们的答辩是：第一，试问我们为什么要陷害工人？第二，京汉惨杀案中我们的施洋同志也在其内，汉口被捕人中我们的刘芬、许白豪同志也在其内，而且株连到北京同志张国焘数人，岂有我们自己陷害自己之理？第三，我们反对吴佩孚，远在直奉战争后，到了京汉工人“二七”惨剧及汉口党案发生，我们攻击曹锟、吴佩孚，比中国任何人都厉害，别的不说，单在本报上就可以随便寻出这类材料，试问有没有

这样勾结吴佩孚的可能？第四，现在保定狱中的京汉工人都出来了，请问当日罢工情形，是由于工人因开会受压迫而动了公愤，或是由于我们煽动陷害？若说我们帮助工人组织工会和援助罢工的工人是陷害工人，我们便没有答辩的必要了。

这两个谣言若是真的，我们便应该枪毙，岂但是区区名誉问题！因为他们所造谣言这样不近情理，我们向来以为没有和他们辩论的必要；可是现在有些国民党右派分子及上海一两家反动派的日报，利用这些出乎情理之外的谣言，来做帝国主义者在华报纸攻击我们底应声虫，因此我们不得不答辩一下。

各资本帝国主义者，无论欧洲、美洲或在亚洲，本来都是利用许多工具，造出许多谣言，中伤他们的敌人——共产主义者。他们在中国的政策当然也是这样。不过在中国，他们不但要造谣中伤共产主义者，并且还要造谣攻击国民主义者，因为国民主义者在中国有了势力，也是他们的不利，国内一班反动分子，遂于有意或无意中做了他们的工具。造谣中伤我们底人们，即或自己不肯承认是有意做帝国主义者之工具，然而在事实上，他们已经无意的做了帝国主义者之工具了，因为他们造谣攻击我们，帝国主义者是要举起双手赞成的。

并且造谣中伤我们的人们，还有几种特别心理：（一）他们以为攻击共产党，必能博得帝国主义者、军阀及资本家各方面的同情，于他们在社会上活动大有利益，至少也可以免得过激嫌疑遇着压迫，他们在天津欢迎孙中山时散传单攻击我们，虽然一时疑被外国巡捕误会捉去，随即讯明他们是反对共产党的人而释放了，这便是一个证明。（二）他们以为骗钱在中国社会是最足以动人猜疑的事，陷害工人是工人阶级所痛恨的事，这两种谣言一传布，我们在工人中在一般民众中便不能活动了。（三）他们以为我们伏在各种黑暗势力压迫之下，任他们如何自由造谣中伤我们，我们也不能够象他们时常公开的拿延请大律师向资本帝国主义的法庭控告来威吓攻击他们底人。

至于他们所以要造谣中伤我们之各别原因，我们也要指明出来。马素这等人，全身都装满了大美国的空气，一回到中国来，眼见孙中山及国民党居然冒了赤化嫌疑反对帝国主义，主张废止不平等条约，他自然要气得发昏，自然要借着中伤我们的谣言来骂着出怨气。反革命的无政府派，他们无论在欧美或中国，都是帮着帝国主义者、军阀、官僚等反对共产主义者，造谣中伤共产主义者即是公开的向黑暗势力告密，张德惠造谣攻击我们，是因为他侵吞京汉工人抚恤费数百元受我们责问之反响。郭寄生、王光辉是要欢迎官僚的国际劳工局代表亨利老爷的，他们造谣中伤我们，更是他们的义务。

最近看见郭寄生、王光辉在上海报上登给我们的启事，没有资本家给我们钱登告白打官司，现在我们只好顺便这里答复几句；他们启事中所指何事，我们不大明白，实在无从答复；惟他们劝我们洗心，我们以为我们若自问没有和杀害黄庞的赵恒惕、宾步程妥协及为南洋烟草公司利用这等对不起工人阶级的事实，便心安理得，另外用不着洗心！

原载《向导》第98期

署名：独秀

列宁与中国

——列宁逝世周年纪念日告中国民众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有许多中国人及其他各国许多人，尤其是在十月革命后的二三年间，以为这个布尔什维克首领列宁，不知是什么一个极恶穷凶的怪物。其实这完全是幻想。列宁的外表，象一个很朴素的教授，又象一个很活泼的工人，他的内心贮藏了对于全世界被压迫者的同情热泪，他不但同情于被压迫的工人农民阶级，指导全世界的阶级争斗，他并且同情于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指导全世界的民族争斗。释迦佛说：要普度此世界众生于他世界；列宁说：要为此世界人类中被压迫者脱离被压迫地位于此世界而奋斗。我们若要指证释迦佛所说他世界在何处及超度了多少众生到那里，便未免太滑稽了；而由列宁奋斗所解放之被压迫的工人农民阶级和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已经分明在此世界中令我们看见了，如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工人、农民之解放及苏联境内小民族之解放与夫近在远东民族革命运动之勃兴。

欧洲人对于远在亚洲东方的中国，或视为不可知的秘密国，或视为一大群未开化民族所聚居的地方，一任其传教师、外交官、远征的军队与商人明欺暗算，而漠然无动于衷。独有同情于全世界被压迫者的列宁，他对于远在数万里外的中国近代重大事变及在这些事变中所受欧洲各国的欺凌，无不注意到，无不严峻的批难到，他并不宽恕他本国（俄罗斯）政府欺凌中国人之罪恶。

自从义和团事件起，列宁即表示深厚的同情于中国人，攻击他本国政府非常严厉。当时他曾在《火星报》上说：“俄罗斯与中国战

争(即指义和团战争)已告结束,为这次战争调动了许多军队……对于那班暴动的中国人,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武装的中国人,加以剿灭、弹击,无量数的妇女儿童都被惨杀,其苦何堪!至若农村居民商店之被蹂躏抢劫的状况,更是不用说了。……今日欧洲资本家贪欲的利爪又伸入中国了,且现在力求满足私欲的俄罗斯亦转入这个漩涡之中,并已割据中国的旅顺口,由俄兵保护,在满洲公然建筑铁路;同时欧洲各国政府,相继而起,大家都热心来做抢劫中国的事,冲动了他们‘瓜分中国’的观念,由是将中国的土地,或占据或租借,事实上就等于欧洲各国政府(俄罗斯居其首位)已开始瓜分中国;可是他们瓜分中国不是用一种公开的形式,而是和暗中偷窃人家坟墓中的死人一样。假若被偷的死人稍有反抗的表示,他们就如猛兽一般,烧毁其村庄,驱逐于海洋,或将赤手空拳的居民和其妻子,枪杀刀杀,毫不加以姑息……如现在报纸(指俄国报纸)又鼓吹兴兵反对中国,加上中国人是‘野蛮黄种’、‘仇视文明’的罪名。……那班无耻的新闻记者,屈服于政府及金钱目的之前,故意无中生有,造谣惑众,鼓励民众轻视中国。”

列宁对于中国的辛亥革命,也表示满腔同情,当时他曾在《真理报》上说:“四万万落后的亚洲人得到自由了,对于政治生活已经有觉悟了。可以说,地球上全人口四分之一已经由沉睡转到光明、活动、奋斗的路上了。此事对于文明的欧洲是不发生关系的,甚至法国至今还未正式承认中华民国。欧洲这种冷淡的态度,用甚么可以去解释呢?原来在西方各处都受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之统治,这资产阶级四分之三已经腐朽,对于任何一个野心家,只要争得反对工人之严厉方法及一个卢布有五个戈比的利息,都愿把自己所有的文化卖去。这个资产阶级把中国只不过看成一块肥肉,这肥肉自从被俄国亲热的拥抱一下之后,现在也许要被日本、英国、法国等撕碎了罢!”

列宁对于列强扶助袁世凯造成中国的反动政局,也曾在《真理报》上攻击过:“欧洲资产阶级居然拥护亚洲的黑暗势力。……掠夺

中国，帮助德谟克拉西之仇人，中国自由之仇人。……中国的新外债（是指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是反抗中国德谟克拉西的，因为欧洲帮助袁世凯，他原来是预备实行军事专政的一个人。欧洲为甚么帮助他？就是因为可以分点利润。中国借了二万五千万卢布的债……假使中国人民不承认这笔债呢？那时先进的欧洲就要大声疾呼甚么‘文明’、‘秩序’及‘祖国’了！那时就要装着大炮，与野心家黑暗势力的好友袁世凯联合去压迫这‘落后亚洲’的共和国了！”

在列宁这些说话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何等人物，可以看出他对于中国及中国民众之同情是何等诚挚；同时，也可以看出中国本国的反动军阀勾结外国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压迫中国民众破坏中国德谟克拉西运动是何等严酷；同时，又应该看出中国民众之好友，只有反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之无产阶级，那些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都是中国反动军阀之好友，也就是中国民众之敌人。

现在全世界人类对垒的形式是：

（甲）压迫者——各国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及反动的军阀

（乙）被压迫者——各压迫国之无产阶级及各被压迫国之民众

被压迫的中国民众呵！我们若真要纪念列宁，永远纪念列宁，只有接受列宁遗训——联合全世界被压迫者，向全世界压迫者作战，为脱离被压迫的地位而战！

原载《向导》第99期

署名：独秀

我们应如何对付善后会议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我们反对善后会议，并不是因为这个名称和预备会议不同，乃是因为他是军阀官僚包办的会议，没有人民的代表出席说话，——这个反对的理由是不错的，然而仅说是反对军阀官僚包办的善后会议，还觉的太简单了。我们不但反对善后会议在形式上是军阀官僚的会议，我们必须在实质上反对段祺瑞所要的这种军阀官僚会议所包含之危险性。

段祺瑞所要的善后会议，至少也有下列三个危险：(一)段氏赶速在国民会议之前，利用他的善后会议团结军阀势力，以抵抗国民；他所要的善后会议如果成功，军阀在中央及地方的势力必完全恢复，他们压迫国民运动，必然日见露骨。(二)段氏要利用善后会议，结合直系等失意的军阀，以巩固他自己的地位，和他派军阀——奉军及冯、孙、胡等——对抗；此种新的结合和新的对抗，是军阀间将来大战争之种子，亦即帝国主义者借口内战干涉中国内政之种子。(三)段氏要利用他的善后会议产生正式政府，选举他为正式执政或总统，此种正式政府如果实现，势必为国内战争之导火线，因其非新的代表民意机关所产生，又没有旧的法律(约法)根据，纯粹由军民长官拥戴，岂非明白给别派军阀以兵争政的榜样？

段氏所要的这种善后会议，即军阀官僚包办的会议，人民是应该始终反对的；并且这善后会议将近实现了，要免除其危险性，人民站在会议外消极的反对还是不够，更应该有力的向段政府要求修改善后会议条例，要求选举代表参加此会议，在会内积极的反对，反对此会议有权议决国家根本大法，反对此会议有权选举正式

政府，反对此会议议决一切有利于军阀的议案，尤其要揭破各派军阀间分赃或暗斗的黑幕。

人民参加此会议，要取左列的态度：

(一)为反对段氏所要的善后会议而参加，不是为赞助段氏所要的善后会议而参加；

(二)应该要求由各省人民团体集合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得派多数代表(当超过各省军民长官代表人数以上)参加，变更段氏所要的善后会议为人民所要的善后会议，不可仅由半官僚的法团派少数代表参加，成为段氏所要的善后会议之装饰品；

(三)各省人民团体，不但应该为其参加此会议之代表准备有力的后援，并且应该严厉的督促其代表在此会议中确能为人民利益奋斗，而不与军阀官僚妥协。

全国人民呵！段氏所要的善后会议将近实现了，这会议所含的危险性谁也知道，全靠人民在此会议内会议外的奋斗力增多一分，这会议对于国家人民的危险性才能够减少一分，此外别无他法。

应该为人民利益奋斗的国民党领袖们呵！你们固然应该站在人民方面，反对段祺瑞所要的善后会议；你们也应该要求段祺瑞修改善后会议条例，许人民代表列席；你们自己有列席善后会议资格的，更应该出席。你们应该利用出席善后会议的机会发表自己的政纲，应该利用出席善后会议机会揭破帝国主义的列强及军阀派损害中国国家生命及人民利益之事实，揭破军阀间列强间暗斗或分赃的黑幕。如果段祺瑞竟不许有人民的代表出席善后会议，你们更应该出席此会议，免得军阀官僚包办此会议；你们不应该很高洁的不参加军阀官僚的会议，站在外面消极的反对，你们应该积极的参加此会议，在会议内反对军阀官僚，揭破他们的黑幕。“真金不怕火来烧”，为了拯救国家的生命，为了拥护人民的利益，就跳到火坑粪坑里都是应该的，你们若以为国民党参加军阀官僚会议是一件羞辱的事，那么中山北上便根本错了。一个革命党总应该积极的奋

斗,不应该消极的洁身自爱,洁身自爱之里面包含着避免和军阀派
争斗的懦弱心理呵!

原载《向导》第100期

署名:独秀

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工人的力量

(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

半封建半资本制度的中国，他的社会势力，三种并存：第一是军阀的势力，因为他挟有全国的武装与政权；第二是资产阶级的势力，因为他挟有全国的经济权及组织宣传机关；第三是工人阶级的势力，因为他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他是富于集合力及决战力者，他是天然的农民之同盟者。军阀不待说是被革命的阶级，资产阶级中包含着“反革命”、“非革命”、“倾向革命”三种分子，只有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在全人类阶级根性上看起来，工人阶级是最富于革命性的；在中国社会现状上看起来，中国工人备受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国内军阀、资本家三层压迫，也只有革命是唯一的出路。工人中虽然有少数领袖分子被官僚资本家利用，做了“工贼”，而决不至因此减少了工人阶级之革命性，因为工人群众的思想与行动终究是革命的，不是妥协的。

中国工人阶级是一个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这件事不仅是抽象的理论，已经由种种事实证明了。例如民国十一年香港的罢工海员，受英国帝国主义者种种压迫，终以不妥协的奋斗得到胜利。又如民国十二年“二七”惨剧，分明是因京汉铁路工人不妥协的奋斗而失败了。又如民国十三年广州沙面罢工及镇压商团反革命，都因为是工人群众不妥协的奋斗和防止广州政府妥协的政策，才得着胜利。

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是：压迫中国人民阻碍中国人民发展的帝国主义者与军阀，非革命是不能使他们屈服的；资产阶级当中，有些是帮忙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反革命者，有些是非革命的中

立分子,有些是偶然倾向革命而易于妥协者;不妥协的革命者只有工人阶级;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若没有工人阶级有力的参加奋斗,决没有得到胜利的可能。

这一不妥协的工人阶级,不仅在决战的心理上是不妥协的革命者,并且在客观上也富有能够革命的力量。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沿江沿海之运输权在他们的手里,国内军阀的兵队及军用品运输权也在他们的手里,大的工商都市、大的矿区、生产机关、交通机关也都在他们手里,他们起来革命,足以使全社会震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必须他们起来参加才足以制敌人的死命;中国国民革命之敌人——帝国主义者、军阀及其走狗,所以严厉的压迫并造谣中伤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也就是这个缘故。

原载《向导》第101期

署名:独秀

大家应该开始懂得善后会议的价值了！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四日)

段祺瑞拿数十万元民脂民膏，召集一个军阀官僚的善后会议来替他捧场面，可算是中国军阀之最后豪举了！这个会议只能为段祺瑞捧捧场面，更进一步，段祺瑞可以借此结合几个失意的小军阀，巩固他的地位，再进一步，他便要借此会议为卖国机关，至于说借此会议可以谋中国的和平统一，本来是欺人之谈。大家如果不相信，现在善后会议已开幕十多天了，请看他在这十多天内经过的事实是怎样：

- (一)国民党对段执政邀请省议会议长、教育会、农会、商会会长为专门委员认为未容纳孙中山之主张，发表宣言不加入善后会议。
- (二)上海总商会电段执政：善后会议各省代表均应列席，非到有三分二以上人数，不能开会。
- (三)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电段执政：善后会议须有各省国民会议促成会等人民团体之代表占出席代表三分二以上，方有讨论国事之权，望延期以待人民代表到京始开议。
- (四)段执政据善后会议意见书通电各省：会期内各方军事行动完全停止，如有争执，应提善后会议解决。然而广东、广西同时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河南胡、憨两军之争，川、滇、湘、黔各军进攻湖北的酝酿，都并未因段电而停止。
- (五)西南各省代表到上海者数十人，均认善后会议无解决国是之可能，拟不北上，先谋西南团结，由唐少川、章太炎从

中主持一切。

(六)《民国日报》七日北京电：金佛案与无线电台案，均决提交善后会议。

在(一)(二)(三)项事实，可以看出舆论对于善后会议之态度。在(四)(五)两项事实，已表示善后会议完全破产，实更证明以善后会议解决时局纠纷之绝对的不可能；有人以为人民代表会议的议决案没有实施的希望，现在请问代表实力派的善后会议议决案又能够在何处实施？在第(六)项事实看来，执政政府将要做出曹锟政府所不敢做的罪恶。

我们反对善后会议，是否神经过敏，是否有意捣乱，善后会议自身的成绩会替我们说明。希望凡是非安心为段大军阀捧场的人，只需每日留意善后会议经过的事实，便自然懂得他的价值。不但善后会议如此，即是国民会议，人民若不能努力争得多数真正人民代表有出席权，听段政府钦定一个限制真正人民代表的组织法，则将来的价值，也必然不比善后会议高得几何！

原载《向导》第102期

署名：独秀

一封给章行严的信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四日)

行严先生：

顷见上海报载：北京司法部训令京外各机关，凡查获宣传共产党员，依刑律内乱罪从严办理；如有政党为护符者，亦一律依法办理，仰即严秘检查等语。

老朋友！你所长的司法部如果真有这道训令，便实在令人不解了！这道训令词中有三点最不可解：第一，共产党本是代表工人阶级及贫农利益的政党，何以说他以政党为护符？第二，法律只能制裁刑律条文上的犯罪行为，岂有一宣传某种学说某派党义即构成罪名之理？第三，司法部并非立法机关，何能以一纸部令决定宣传共产党为内乱罪？

这道训令若出自军事机关或腐败官僚之手，我们毫不以为怪，乃出自应该尊重法律的司法部，并且是精通法理富有世界知识的行严先生所长的司法部，这便要令人骇怪了！

人们以为今日托足权门的章行严，已非昔日讲学论政的章行严，他已无违背军阀意旨之可能，我们和他还有什么道理可讲？但我仍不敢这样轻蔑行严先生，兹谨向先生有所陈述。

共产党本质，并非凶恶不法象三K党等秘密结社之类。其在英国、法国、德国，都是公开的政党，都有集会、出版、讲演及竞争选举之自由，先生都亲眼见过；先生若不过于轻鄙本国人，若不能绝对否认中国也有工农阶级之存在，便不能说中国不应有共产党。至于农业国不应有政党之说，无论是非，先生在论坛上尽可有此主张，而未便利用官权禁止政党，更不能独禁共产党。我们的党——中

因共产党——在中国已存在了五年，其根本职任是拥护工人、贫农的利益，其目前的政治主张是“推翻压迫中国民族的帝国主义，推翻扰害全国人民的军阀政治，建设真正独立的民主的国家”，其言为天下人之所欲言，其行为天下人之所当行，别无阴谋异行有损害于国家人民而足以构成内乱罪者。与其说中国共产党有内乱罪，不如说不依法律不由民意以武力夺政扰民窃号自娱实犯内乱罪之武人已遍中国。若说共产党所根本主张的政制和中华民国现行的政制不同，因此得比附到内乱罪，这种话若出于别人之口，已失刑法只以裁制行为之原则，况出于极力赞助段执政以“革命”行为破坏中华民国现行根本法（民国约法）的行严先生之口，更是“只许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了。若行严先生及其他权门宠儿，向人民板起成则为王的面孔，以为权力在手，即是法律与正义之化身，只许他以法律正义绳人，不许人以法律正义绳他，这种不可一世的逼人气焰，在袁世凯时代，在第一次安福执政时代，在曹党得意时代，行严先生都亲身领教过，现在宁肯蹈此覆辙？

上海《申报》北京电，更指司法部此项训令与反对善后会议有针锋处，此电更有伤先生的名誉了！古人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先生即欲依附权门，以私人名义为善后会议辩论已足，似不必滥用官权，以“依刑律内乱罪从严办理”防止异己者之口。反对军阀官僚的善后会议，乃天下之公言，非共产党人之私意，国民党已公然宣言反对善后会议且不论，即如先生同一政学系之好友李印泉，又如先生所兄事之太炎，都公然反对善后会议，并反对段祺瑞自称执政，先生亦将指印泉、太炎为共产党人，“依刑律内乱罪从严办理”么？吾料段氏逆取不能顺守，武力专政之演进，势必日甚一日，天下健者不只一段氏，更不只一行严先生，先生竟能以“宣传共产党员”六字，诬尽天下人而杜塞其口么？先生竟想象军阀官僚的势力能够长治久安的统一中国么？中国在他们统一之下能够得着进行么？

我记得先生是一个深知政本的人，是一个反对好同恶异的人，

我还记得先生是曾说有志研究马克思学说的人，并且俄德共产党人曾传说旅欧中国人中有一个倾向共产主义的章行严先生，所以我还不象一般人那样轻蔑先生，希望先生对于我以上的陈述有一个公开的答复。先生的答覆登在京、沪任何报上我们都可以看见。

原载《向导》第102期

署名：独秀

愚弄国民的国民会议条例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安福政府所拟的国民会议条例草案，我们已经拜读过了。据这个草案，安福政府愚弄国民的心事已和盘托出，其最重要而又最显明的有两点：(一)以议宪限制国民会议的职权，(二)以教育、性别、宗教限制人民的选举权及被选举权。

民主国主权在民，国民会议应有权决定国家一切问题，他的权限，应该比国会更要扩大。现在的国民会议条例开口即规定“国民代表会议以议决中华民国宪法及关于宪法施行之附则为其职权”，连以前国会享有的宪法起草权都剥夺了，至如关于国家生命的政治、外交、军政、财政问题，更一概不许过问。安福党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国民代表只能前来恭听政府钦定的宪法，举手通过，通过了钦定宪法便滚蛋！这个条例将来经段祺瑞批准公布时，此点若不修改他便是对于国民谋叛！

至于组织方面，这个条例草案之愚弄国民，也足令国民十分明白他们的心事。他们明明以“普通选举制”欺骗国民，而该草案竟以“凡中华民国男子年满廿五岁以上”，“于本国日用通行之文字不能解说并写作者”，“当兵役巡警者”，限制国民之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又以“僧道及其他宗教师停止被选举权”。女子不是国民么？工人、农民是全国人的衣食父母，其数量又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他们大半不能解说并写作本国日用通行之文字，现在一概被摒在国民以外。兵役、巡警、僧道及其他宗教师都是国民一份子，有何理由可以剥夺其选举权或被选举权？世界上何处有这样以性别、教育、职业、宗教限制选举的普通选举制？

此外，京兆只四人，各省区每道只三人，大学区、商业区、实业区均只一人至二人，人数已经比国会议员犹少；又加以教育的限制，又加以实业区乃包含从业人、工人、股东或合伙出资人都在内，则不啻明白规定：凡是工人都没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照这样选举的结果，则诚如吴稚晖先生所说：“选区每区三人，安福系、国民党各半，青海、蒙、藏以曹汝霖之类充数，大学区让了国民党、研究系，商业区则有虞和德与天津、北京商会出马，实业区则周学熙、张謇等各代表三万人，这叫做国民会议，使二者蒙福，这叫做臭不可当，国民会议的名词又算永远抛入毛厕。”

军阀派本来不会有召集真正国民会议的念头，要想真正国民会议实现，只有国民自己努力，逼得军阀政府非召集不可才行。

国民呵！国民会议条例就快公布了，你们还是要有一个真正的国民会议呢，还是任军阀政府召集一个愚弄国民的国民会议？

国民起来罢！政治上没有两种利害相反的势力可以并存，军阀派站在统治地位，那里会有真正的国民会议出现？国民会议我们是应该要的，不过在国民会议运动中，至迟在此运动失败时，应该有一个根本的觉悟：怎样才能够达到真正国民会议之目的。

原载《向导》第103期

署名：独秀

被压迫者的自由与赤化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最近法国《晨报》鼓吹英、法、日、美应联合压迫中国，恢复国内秩序，以免苏联在亚洲势力膨胀，否则莫思科从中援助之亚洲民族自由运动将发展到中国。

前天的《大陆报》也说：“中国现在步步趋向赤俄的怀抱里去了。比如此次外人纱厂大罢工风潮，在要求增加工资以外，另具一种赤化的意味。”

这两段议论，一方面是表示帝国主义者自供其横暴，一方面是说明苏联的赤化运动是被压迫民族之福音。

苏联援助亚洲之土耳其与阿富汗的民族运动，这是事实；土耳其与阿富汗民族都因此得了相当的自由，这也是事实；亚洲民族自由运动发展，大不利于英、法、日、美各帝国主义的国家，这更是事实；可是英、法、日、美帝国主义者恐怕苏联援助之亚洲民族自由运动将发展到中国，于他们不利，便要联合压迫中国，这是何等横暴！明白的中国人呵！帝国主义者自己已经公然说出要联合压迫我们的民族自由运动，这不是我们的敌人是什么？在相反的方面，援助我们的民族自由运动之苏联，他不是我们的朋友是什么？因此，为了我们的民族自由，我们应该欢迎苏联，欢迎赤化呵！

上海四万纱厂工人，因为不堪日本资本家虐待而同盟罢工，此次罢工是含有阶级的反抗和民族的反抗两个意义。四万工人共通的要求是：

(一)不准打人

(二)照章发给工资，不得延期，不得无故克扣

- (三)发还储蓄金
- (四)加工资十分之一
- (五)罢工期间工资照发
- (六)不得无故开除工人
- (七)释放被捕工人

不过如此而已。而《大陆报》竟说“在要求加资以外另具一种赤化的意味”，请问以上七项要求中，那一项是赤化？或者他以为自(二)至(七)都是普通的劳动条件及罢工要求，唯有第一项“不准打人”，含有民族自由运动的主义，这便是赤化。

如果民族自由运动是赤化，如果不准打人也是赤化，那么欧美各国都早已赤化了，怎禁得我们中国人不想望赤化呢？

帝国主义者的意思我们知道了。他们是说：你们中国人已是亡国奴，必须你们自己否认民族自由，必须你们受日本人的打一声不响，才免得赤化嫌疑。

如此我们应该认识被压迫者的自由与赤化了！

原载《向导》第103期

署名：独秀

国民党究竟应当和谁合作？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我们主张国民党可以加入善后会议，是应该为了和国民合作来反对军阀而加入，非是为了和军阀合作来反对国民而加入。然而据本月十七日上海《新闻报》的北京通信：“孙科曾对党员言，谓奉总理之命，望同志尊重孙、段、张合作之前言，出席善后会议，以竟全功云云。”这样的加入善后会议，我们实不敢赞同。

原载《向导》第103期

署名：实庵

共产和普选果足以亡国么？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前几天国民党中反动分子居然发起了一个什么“反共产救亡会”，同时，日本的国粹党（即法西斯派）也发出一个“亡国普选法案反对宣言”，由此说来，不但共产足以亡国，连普选也足以亡国，不但俄国要亡，连英国早就该亡了！

原载《向导》第103期

署名：实庵

你们早已背叛了民党呵！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大捧袁世凯的章炳麟，为袁世凯当侦探的冯自由，为莫荣新造火药打粤军的马君武，这班人本来早已背叛民党而去了，现在乘着中山病危，忽然发表宣言脱离国民党，要恢复旧有的同盟会，署名这宣言的人虽然都是同盟会会员，却遗漏了四个重要人物：一个是孙毓筠，一个是胡瑛，一个是刘揆一，一个是陈炯明，——若再加入这四位老同志，那更是脚色齐备了！

原载《向导》第103期

署名：实庵

只要脸厚什么事都好干！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北京城里，有个什么各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于本月九日宴请国民党要人，这班国民党要人当中，居然有刘揆一、冯自由这两位。冯自由曾因做袁世凯侦探，和吴稚晖在上海会审公堂打过一场官事，刘揆一曾因热心做袁世凯的农商总长，不惜登报脱离民党，这两位听了“国民党要人”这个称呼，未免要面红耳赤罢！并且该促成会出席作陪者为该会执行委员万兆芝老爷，这件事也令人难解。这位万老爷在曹锟时代那种得意的状态，北京人都忘了吗？他现在为什么也要加入各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他用何界名义加入的呢？

原载《向导》第103期

署名：实庵

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对付 中国国民运动之总策略

(一九二五年三月七日)

此时中国国民对于帝国主义的列强之侵略，虽然还没有有力的反抗，然而大多数人民甚至于一部分小军阀，由身受列强经济的政治的压迫之实际经验，已渐渐觉悟到自己民族处在被压迫的地位，并且渐渐由觉悟而不平而发生了国民运动。帝国主义的列强对于最近的中国国民运动，表面上虽然还是轻蔑的态度，而心中实已感觉不安了。

人民对于国内军阀，更是反对的声浪遍于全国，军阀们虽然以为有枪在手，人民无如我何，而对于国民运动的声浪终觉危险，至少也要恐怕敌派军阀利用这种声浪不利于己；因此，军阀对于国民的呼号，表面上虽然还是倨傲态度，而心中实已感觉不安了。

帝国主义的列强及其工具(军阀)既已对于中国的国民运动感觉不安，他们对付的策略是怎样呢？

国民党发布了国民运动的政纲，帝国主义者及直、奉、皖三派军阀都高声大叫“赤化”、“过激化”。

国民党在汉口组织党部，直系军阀便以“过激”、“共产”名义逮捕刘芬诸人。

孙中山宣言及各省国民会议促成会都通电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东交民巷及京、津、沪、港各西文报都说是“过激”思潮。

摄政内阁取消了清室优待条件，又表示不平等条约应该修改，帝国主义者便轰传北京“赤化”了。

中国人民欢迎苏联放弃在华权利，帝国主义者便宣传中国人

民倾向“赤俄”了。

广东沙面因取缔华人入境苛例而罢工，英法人说是布尔什维克运动。

上海日本纱厂中国工人受厂主虐待而罢工，西文报说是有“赤化”意味。

奉天军事会议，因京、津舆论反对段政府，遂有人主张令驻京、津军队捕拿共产党。

段祺瑞亲在阁议席上提议恢复清室优待条件和查禁过激派。

段政府的司法部因为有人反对善后会议，遂通令取缔共产运动。

以上便是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军阀)对付中国国民运动的总策略。

他们知道公然直接压迫国民运动不是巧妙的策略；他们知道“赤化”、“过激”、“布尔什维克”、“共产”最足以吓倒中国人；他们并且知道中国国民运动中最尽力的分子是工人和急进的知识阶级，而这班人又最容易被人指为“赤化”、“过激”、“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因为他们不是财主或官僚；因此，凡是中国一个国民运动发生，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便拿出“赤化”、“过激”、“布尔什维克”、“共产党”这些符咒来镇压住。他所要镇压的实际上是国民运动，而表面上却以镇压“赤化”、“过激”、“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等名义出之，这是何等巧妙的策略！他们拿这个策略来镇压中国国民运动，一方面可以妨碍急进分子的活动，一方面可以恐吓和平分子使之离开急进派，使国民运动的势力分裂。这个巧妙的策略，无知的军阀派还未必想得出，不用说帝国主义者可以教给他们。帝国主义者为了要避开公然直接压迫中国国民运动，不但将这个巧妙的策略教给军阀做他们的工具，并要教给买办阶级做他们的工具。帝国主义者军阀及买办阶级，又要各自雇佣一班国民党右派及工贼或冒充工会运动者做工具，拿“赤化”、“过激”、“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等符咒，来破坏国民运动及工人运动。

真正国民运动者呵！你们要认清敌人——帝国主义者、军阀、买办阶级、国民党右派、工贼、冒充工会运动者——的策略，不要畏避他们符咒，中他们的奸计呀！

原载《向导》第105期

署名：独秀

精神文明 东方文化 段祺瑞

(一九二五年三月七日)

大文学家徐志摩运动了段大军阀一封信，去到欧洲还接活佛太戈尔再临中国，徐先生果能达到目的，届时必有一番盛况，我等何幸竟躬逢这精神文明、东方文化、军阀政治的盛世！

原载《向导》第105期

署名：实庵

崇信外国

(一九二五年三月七日)

庚子赔款据约无用金的明文，付法赔款仍用纸佛郎并于国信无伤，现在段执政打算承认金佛郎案，真是“崇信外国”，不是“外崇国信”！

原载《向导》第105期

署名：实庵

军阀与国民会议

(一九二五年三月七日)

段祺瑞说：“国民会议，国民程度尚谈不到。”又说：“国民会议议决，能否强制军阀遵从，尚属疑问。”我们第一要问段祺瑞：既然是这样，你马电主张召集国民会议是何用意？第二要问段祺瑞：你自己是否军阀？

原载《向导》第105期

署名：实庵

陈炯明与辛亥革命俱乐部

(一九二五年三月七日)

我前几天说章炳麟等恢复同盟会，尚缺少陈炯明、孙毓筠、刘揆一、胡瑛这一班老同志，现在见了章炳麟、唐绍仪、马君武、居正、白逾恒、刘白等发起辛亥同志俱乐部，才知道不但不缺少陈炯明，并且他还是这个组织的后台老板。不过陈炯明的代表刘白能垫出开办费二千元，孙、刘、胡等现时却无此力量了。

原载《向导》第105期

署名：实庵

悼孙中山先生！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为国家为民族刻苦奋斗四十年如一日的孙中山先生，一旦他逝世的噩耗传来，全中国的民众应如何悲痛呵！

全中国的民众呵！我们没有了中山先生了！我们失了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是我们极大的损失，惟正因我们有了这极大的损失，我们更应该加紧奋斗，因为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必然跟着中山先生之死向民众加紧进攻。

我们更应该知道，革命的领袖中山先生虽然死了，革命的国民党是不会死的，我们相信伟大的集合体指导革命，比伟大的个人指导革命更有力量。我们警告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且勿因中山先生之死而存幸灾乐祸的心理！

我们没有了中山先生了！我们的心情虽然万分悲痛，我们的意志却不丝毫阻丧，全中国的革命分子，应该因中山先生之死，加速的集合到中山先生创造的国民党，团结成伟大的集合体，来继续中山先生革命事业。

我们相信国民党中所有革命分子，必然因中山先生之死更加团结一致，更加遵守中山先生之遗嘱共同奋力前进，今后的国民党必仍然为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所统一，必仍然为整个的党，彼军阀官僚辈所预料的“中山死国民党必分裂”，真是妄想。

即或有一部分反革命的右派分子在中山先生死后脱离国民党，这只算是国民党内淘汰了一部分反革命的党员，决不是党的分裂，因为这班分子的行为，久已违背了孙中山主义，久已不能算是国民党党员了。而且这种淘汰党员的现象，在国民党中不乏先例，

如袁世凯时代,章炳麟、刘揆一、刘师培、孙毓筠、胡瑛、李燮和等都背党而依附袁世凯,难道这也是国民党分裂吗?又如李根源等脱离国民党而另组什么政学会,吴景濂等脱离国民党而另组什么民宪党与益友社,这些反革命的分子脱离出去后,革命的国民党不仍然是整个的统一的吗?他们脱离出去,不但无损于国民党之统一,而且这班反革命的分子脱离一次,国民党的数量质量均进步一次,在社会上的声望便增高一次。

原载《向导》第106期

署名:独秀

一朝天子一朝臣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前年直系盛时,国会议员多亲到保定,向曹锟拜寿,会议为之停顿;今当奉系盛时,善后会议代表多亲到奉天,向张作霖拜寿,会议亦为之停顿,真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但不知其中有无贰臣?

原载《向导》第106期

署名: 实庵

社会党与政府官吏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梁鸿志答政府对善后会议用函不用咨之质问,说:“执政以会员多半系政府任命官吏”,他这句话并未说错,而社会党首领江亢虎却以梁氏失辞,大起非难。社会党尤其是所谓中国社会党,本来和政府官吏就是半斤等于八两,江先生何幸高攀列席那些老爷大人的会议,已算面子十足,又何苦不安分而撒娇?有人说,并非江先生撒娇,这就是宣传社会主义哩。

原载《向导》第106期

署名: 实庵

废帝得志是何意义？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清废帝向杨以德说：“他日如得志决不忘卿。”其实他应该说：他日如得志第一决不忘段祺瑞，因为段祺瑞若不令监视的军警撤去，他如何能逃走，他日又如何能得志呢？

原载《向导》第106期

署名：实庵

“过激”之第三个解释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过激”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马联甲说：“教育已经是过激了，平民教育更是过激。”这是“过激”之第一个解释。东交民巷里某国公使说：“废除不平等条约是过激思潮。”这是“过激”之第二个解释。现在又有了第三个解释，上海有一个某律师的翻释，听见某纱厂工人说了一声资本家，他便说：“你说他们是资本家，那么你便是劳动家，你便是过激派了！”

原载《向导》第106期

署名：实庵

护党呢还是叛党？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反动的国民党右派口称护党，实际上已经叛党了。他们如果不服我这句话，试问他们于自己党的组织以外，公然另行组织国民党同志会，公然另立章程，公然推举一向反对国民党、反对孙中山的唐绍仪为理事，更公然推举一向反对国民党、反对孙中山，近且约同陈炯明派兵进攻广东的唐继尧为理事，这样究竟是护党还是叛党？

原载《向导》第106期

署名：实庵

工人运动与各国在华工业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日本某报说：“曾被吴佩孚解散之工会，均渐次复活，而其运动之急进，大有一日千里之势，故英、美、法、日等国，对于此种现象，多怀恐怖之念，咸认此风一盛，则各国在华工业，将受绝大影响。”如此看来，我们还是任凭帝国主义者勾结国内军阀压迫工潮、保护各国在华工业好呢？还是起来助长工人运动好？

原载《向导》第106期

署名：实庵

评中山先生死后之各方面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中山先生之死，不但是中国一大事，并且是世界上一大事，各方面对其死后之态度，却值得我们的注意与批评。

(一)帝国主义者之态度。伦敦《泰晤士报》称为光明之失败；巴黎各晚报，均称美孙之爱国，惟惜其晚年倾向布尔色维克主义；日本的报纸说：“以段氏为中心之和平统一，成功与否，胥视其能否与占多数于国民党之稳健派相提携为断。”中山先生主张国民会议预备会，而段祺瑞硬召集善后会议，中山先生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段祺瑞则宣言“外崇国信”，英国帝国主义者称为光明之失败，是表示他们快慰的心理！我们不愿把布尔色维克这名词加在中山先生身上，乃是因为孙中山主义和布尔色维克主义显然不同，并非以为中山先生倾向布尔色维克主义便是罪恶，也不以为不倾向布尔色维克主义便减少了中山先生在历史上的价值，而法国帝国主义者却是因为中山先生反对帝国主义及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便说他倾向布尔色维克主义，这本是一切帝国主义者中伤中国民族运动的宣传，他以前宣传“黄祸”是同样的手段。日本帝国主义者指教他的工具段祺瑞，和国民党之稳健派提携，统一中国，这是中山先生死后国民党中之真正中山主义的信徒所应注意的。

(二)安福军阀之态度。中山先生死的那天，姚震对日本东方通信社记者说：“孙氏现死，彼国民党者，鉴于由来之经过，即终不免于分裂，然国民党中之稳健派，此时有与吾人握手提携之充分可能矣。现在善后会议，国民党系中除汪兆铭等三人外，皆有列席之状态。按国民党有为之士，当孙氏在世之时，因从孙氏之意思命令，

不得就现政府任命之官职，若欲就官职，则为背孙氏之命，因此之故，遂与现政府发生疏隔；然自今以后，余知此种障碍已除，而可进于圆滑之关系矣。惟国民党中之抱共产主义者一派，与现政府之至大方针究不相容，故将来欲望接近，实为一至难之事。”中山先生死后的第五日，段催杨庶堪就职，姚震对杨说：“中山已死可不受拘束。”在中山先生未死前三日，段祺瑞也对电通社记者说：“予与孙先生所统率之国民党，自应努力相为连络，国民党果以真正之直道而行，予无不愿提携从事，但如向共产各说之邪道而趋，则本人宿所反对也。”在他们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们想利用国民党中之稳健派来分裂国民党，正和他们的后台老板日本帝国主义者是一鼻孔出气。他们所谓共产各说之邪道，大约连反对优待清室，改总统制为委员制，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都包含在内；他们所谓国民党中之抱共产主义者一派，大约连汪精卫、李石曾、吴稚晖、徐季龙都包含在内。他们知道只有这班抱共产主义者一派不能和他们相容，共产派到应该多谢他们有知人之明，所难堪者只是他们所称的稳健派，平日高声反对共产派，以护党自称，现在揭开黑幕，当真以中山先生活在世上是他们与安福派握手提携的障碍吗？好了！此时障碍已除了！可不受拘束了！

（三）研究系之态度。在全世界哀悼称美声中，独研究系机关新闻——《时事新报》，对中山先生加以毁谤与诬蔑。他以为中山先生现在是形骸之死，精神久已死了，他说中山先生之精神，一死于孙、黄分裂，再死于孙、陈分裂。其实正得其反，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正因一再和妥协的黄兴派分裂和反动的陈炯明分裂而格外显示出来。譬如梁任公和反动的康有为分裂，算是任公的精神早已死了吗？至于诬蔑中山先生“恃墨西哥共产宣传费以维持生活”，这种态度，不单是《时事新报》之耻辱，简直是全新闻界之耻辱！中山先生受过墨西哥共产宣传费的证据在那里？中山先生宣传共产的证据又在那里？中山先生在过去是中华民国之创造者，在现在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之领袖，全世界的共产党人称赞他援助他，并不

是因为他或希望他宣传共产，乃是因为他努力做那象研究系一类人所不愿做而为中国人所急需的民族自由争斗。研究系的先生们，常以受墨西哥共产宣传费诋毁共产党人，今又以此诬及国民党领袖，墨西哥共产宣传费真多，已遍赠中国人，惟未赠及研究系。《时事新报》又说：“革命时代有血气有思想之孙文也，知爱国知保种之孙文也，可惜此孙文自二次革命后已死去矣”。他们现在始如此说，其实他们忘了当年《民报》与《新民丛报》之争，他们诬毁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至何程度！

原载《向导》第107期

署名：独秀

统一与分立

(一九二五年四月五日)

关于联省自治这个问题,我们曾讨论过多次,现在文武联治派又在那里活动起来,兹再总述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如左。

(一)中国的政权实际上已经各省的大小军阀分裂了,已去完全分立不远了;因此对外的政治要求,对内的经济要求,都急需一个民族的民主的统一国家。

(二)联邦与分立不同,仍无妨于国家之统一,然亦非语言相同的本部所需要,至少也非今日所需要。

(三)强大军阀所主张的武力统一,是兼并不是统一;弱小军阀所主张的联省自治,是割据是分立不是联邦。

(四)我们反对吴佩孚、张作霖的武力统一与段祺瑞的阴谋统一;同时,也反对唐继尧、赵恒惕、陈炯明等的联省自治。

(五)统一政府若属于有利于帝国主义的反动派,帝国主义者必赞成统一反对分立,如英、美、法、日帝国主义者自来只承认北京政府是中国统一政府,借口尊重中国统一,阻挠广东革命政府管理关税、盐政,统一政府若不利于帝国主义者,他们必阴助反动派的分立运动,如法国煽动德国莱因分立,英国援助波斯南部分立。

(六)我们反对帝国主义者所援助的统一,同时也反对帝国主义者所教唆的分立。

(七)我们对于西藏及蒙古,分立或联邦都赞成,因为他们和本部都是语言、风俗绝对不同的民族。

(八)我们承认中国本部各省区目前急需有一个由民众的革命力量造成之民族的民主的统一政府,大军阀的统一运动和小军阀

的联治运动，乃是整卖中国或零卖中国于帝国主义者的运动。

(九)我们不相信军阀的统一或联治可以停止内乱，如直皖、奉直及直与反直之战争，湖南援鄂，云南攻川、攻桂之战争；可以停止内乱的只有由民众的革命力量所造成之民族的民主的统一政府。

(十)我们承认广东政府或其他倾向民主的革命政府，他们之脱离北京政府，只是妨碍军阀的伪统一，决不是破坏国家的统一；因为他们的根本政策，是国家的不是地方的，不但不赞成各省分立的苟安政策，并且不赞成南北分立的苟且政策，他们是要依全国民众的革命力量，造成民族的民主的统一国家。只有这样才是真统一。反之军阀的伪统一和联省自治的运动，结果都要延长内乱破坏统一。

原载《向导》第109期

署名：独秀

反段与降段

(一九二五年四月五日)

反帝国主义与不反对帝国主义,帮助农工运动与压迫农工运动,联俄与仇俄,这三件事本是国民党左右派重要争点;现在应该加上一个反段与降段了。

原载《向导》第109期

署名:实庵

帝国主义下的难民与苏俄

(一九二五年四月五日)

中山先生致苏联之遗书上说:“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不知素以“赤色帝国主义”毁谤苏俄的国民党右派分子邓家彦等,读了中山先生这个遗言作何感想!

原载《向导》第109期

署名:实庵

好个不使劳动界反抗 资本家的劳工！

(一九二五年四月五日)

一个什么劳动反共产同盟会，竟有呈请上海县公署备案的趣事，呈文上公然说出“顾全资本利息”、“不使劳动界反抗资本家”、“钧署予以相当提携坚劳工信仰之心”、“遇有宣传出版及印刷品预先呈案察核而后发表”、“请暂予存案备查以观后效”等话。他们与其说是反共产同盟会，不如老实改名资本家官僚的走狗同盟会！

原载《向导》第109期

署名：实庵

亡国的上海！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九日)

上海公共租界外国的工部局向纳税外人年会所提议的印刷律案，又已因法定人数不足而搁置了，反对印刷律的中国人，断不因此案已搁置而遂停止反对的运动。第一我们要知道：工部局已数次提出此案，今年搁置了，明年必然又要提出，他们是非达目的不止的；第二我们更要知道：我们所要反对的，乃是工部局及纳税外人年会根本上都没有订定此律之权，不是此律好歹的问题，也不是洋泾浜章程何条何项能附此律与否的问题。

外人来到中国做买卖，照理应该受中国的法律管理，中国人到他们国里也是这样。然而事实上竟不是这样，这些帝国主义的国家，硬要他们国里人来到中国仍旧由他们的领事照他们的法律管理，不受中国的法律中国的官厅管理，这就是所谓领事裁判权；把这权规定在条约上，这就是所谓不平等条约。

他们来到中国，不受中国的法律中国的官厅管理还不算，现在反拿他们的领事他们的法律来管理中国人，象这样反客为主的事，岂但不平而已么！

他们外国人不受中国的法律及官厅管理，还说是根据不平等条约中的领事裁判权，他们自从民国以来居然霸占上海会审公堂裁判中国人，这是根据不平等条约中何种权呢？他们现在又要自定一种印刷律来钳制中国人言论出版的自由，这又是根据不平等条约中何种权呢？

上海的资产阶级，近来对于租界的外国政府及本国军阀政府，都有不满的表示；然而他们的表示未免过于软弱无用了，因为他们

只是在外人及军阀统治之下要求改良，不想根本推翻外人及军阀的统治权，这原是资产阶级软弱妥协的根性。中国的平民应该有进一步的运动。

上海市民反对印刷附律协会的宣言上说得好：“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我们平民应该主张：上海的中国人不受外国的工部局管理，不受会审公堂的外国领事裁判，取消租界代以民选的上海市政府，以完成“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

“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而事实上现在却是外国人的上海，外国的工部局管理着上海的行政，外国的领事管理着上海的司法，纳税外人会议管理着上海的立法，上海公共租界，便是英、美、日本共管中国之模型。

上海分明是一个亡国的上海了，我们不应该因印刷附律案搁置而遂停止反对的运动，我们正应该把反对印刷附律运动，当做“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运动之开始！

原载《向导》第111期

署名：独秀

列宁主义与中国民族运动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列宁主义自然就是马克思主义,然而马克思主义到了列宁,则更明瞭确定了,周密了,也扩大了。其更明瞭、确定、周密、扩大之点,最重要的便是资本制度与共产制度间之无产阶级独裁制及反帝国主义的国际民族运动这两个理论。后者尤于中国目前的民族革命有关,我们应该略知列宁对于民族问题的意见。列宁对于民族问题的意见和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对于民族问题的意见,完全不同。

列宁的意见

- (一)全世界一切有色无色人种的。
- (二)行动上帮助民族解放运动。
- (三)由被压迫者革命而分立,而自建国家。
- (四)被压迫的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问题。
- (五)联合被压迫的民族运动和被压迫的阶级运动——推翻国际帝国主义。
- (六)各民族间在政治上应该是自由分立的,在经济上应该是协作而统一的。

改良派的意见

- (一)欧美白人种的。
- (二)口头上的民族平等。
- (三)由压迫者恩赐民族自治——在宗主国统治下的自治。
- (四)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之各国内的局部问题。
- (五)利用民族联合或排斥异族的名义巩固帝国主义。

(六)各民族间在政治上应该是统一的，在经济上应该是分离而竞争的。

据上表看来，世界上一切被压迫的殖民地及被压迫的国家(即半殖民地)，他们的民族运动，只有依照列宁这样伟大的周到的意见而行，才能够彻底的解决，才能够得着真正自由，这是一件最明白无疑的事。改良派所谓民族问题，乃是宗主国应该采用何项政策欺骗殖民地的民族，使之永久服事宗主国而不思反叛，以维持各帝国主义的宗主国永久对于殖民地政治上的统一经济上的剥削。他们所谓民族问题和民族解放运动，本是正相反背的一件事。改良派不但不赞成殖民地的民族解放，并且公然宣传：落后的民族，只有在宗主国统治之下，才有和平的幸福与进步。照他们的意见，各帝国主义的国家，对于殖民地政治的压迫和经济的剥削，都是不可少的高厚天恩。所以改良派的第二国际党，对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始终不表同情，而且公然承认各帝国主义的国家有统治其殖民地的权利，公然以帝国主义的国家所剥削殖民地之余沥，煽动国内一部分工人贵族，使之维持构成本国帝国主义势力的大来源——剥削殖民地，使之拥护祖国之胜利，反对本国的殖民地之民族运动及工人运动，因此更进而使之拥护本国资产阶级之政权，这是改良派的第二国际党不可宽恕的最大罪恶，这就是第三国际党指他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之真实事证，这也就是革命派的第三国际党和改良派的第二国际党根本不同之一重要点。

第二国际党所谓国际，乃以欧美白人种为限，其余有色人种，都是天赋给他们的被统治者被剥削者资格，不在国际之列。第三国际党所谓国际，不但绝对没有人种的限制，其主要目的，乃是联合全世界所有被压迫的无产阶级与所有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对于全世界之统治与剥削，跻全人类于真正平等自由之地位，这就是国际的无产阶级运动，同时也是国际的民族运动；第三国际党这个理想，这个运动，就是伟大的列宁主义之结晶。

欧战后，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饱受了威尔逊所谓“民族自决”、“人种平等”的欺骗，中国人也在内，在华盛顿会议，太平洋被压迫的民族又受了哈定一次欺骗，中国人也在内；我们因为这些欺骗的教训，应该明白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第二国际党的势力统治下的世界，决没有解决民族问题之可能；要民族解放成功，是必须依照第三国际党所指示，亦即列宁主义所指示，联合世界被压迫的阶级与被压迫的民族，共同打破帝国主义束缚全世界被压迫者的锁链。

现在的中国民族运动，是不是以推翻帝国主义为对象呢？大部分是的，然却有三个危险的倾向：

第一是大商买办阶级 他们现在虽未曾公然反对民族运动，然而他们始终和侵入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有共同的利益，他们将来即进化到工业资产阶级，也是卖国的资产阶级，不是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因为他们一向在帝国主义势力支配下发展他们的经济力之关系，尽有在美国人“中美提携和平进步”或日本人“大亚细亚主义”等口号之下，与帝国主义者勾结的可能；他们这种勾结帝国主义所发展的工业，将用“输入外资”的名义卖尽国民经济的命脉及国家主权。这是中国民族运动第一个大患。

第二是不脱封建思想的知识阶级 如国民党一部分右派分子及青年党等，他们口中也说赞成民族运动，但是他们所谓民族运动的观念，完全立脚在国家主义上面，他们所谓民族运动的对象，是笼统的外族，不是帝国主义者。自资本帝国主义征服了全世界，全世界的经济关系成了整个的，因此全世界的革命运动也成了整个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革命，是一个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之两方面。在此世界经济成了整个的时代，已经没有一个封建时代闭关孤立的国家，便不能有一个封建时代闭关孤立的国家主义；在此世界革命运动成了整个的时代，也已经没有一个孤立无援的民族，便不会有一个原始的笼统的民族排外运动。中国民族是全世界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者之一，中国民族运动也是全世界

反抗资本帝国主义之一，所以此时我们的民族运动，已经不是封建时代一个闭关的单纯的民族运动，而是一个国际的民族运动，而是和全世界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及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共同起来推翻资本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因为若不将资本帝国主义束缚全世界被统治被剥削者的锁链全部毁坏，他在世界上存在一天，任何被统治被剥削的无产阶级及弱小民族都不会得着自由。因此，我们应该懂得立脚在国家主义上面而不以资本帝国主义为对象的民族运动，乃是资本主义前的民族运动，换句话说，就是封建时代闭关的民族运动。不脱封建时代思想的民族主义者，即资本主义前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不了解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形式的帝国主义和被他剥削的弱小民族之间的关系，他们不懂得现代的民族运动特性和封建时代的民族运动不同，他们认不清弱小民族之敌人是谁，更认不清弱小民族的友人是谁；因此，他们自以为是民族主义者，实际上他们竟放过了民族运动之敌人，且会和民族运动的敌人妥协，而受敌人的教唆仇视民族运动之友人，如德意志民族党，一面和英、法、美帝国主义者妥协承认道威斯计划，一面极力仇视反帝国主义的苏俄，便是一个显例。中国不脱封建时代思想的知识阶级也是如此。他们当中，或极力主张民族运动（如青年党），或自以为是民族主义者（如国民党右派），然而他们都不赞成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竟不看见剥削压迫中国民族无所不至的帝国主义者，他们竟不觉得他们自己及自己的民族践踏在帝国主义者脚下，反而攻击同情于中国民族运动的苏俄是“赤色帝国主义”；且竟附和官僚的研究系，对于反帝国主义的国际民族运动者，加以“亲俄”、“卖国”的罪名，实际上做了帝国主义者宣传的工具。这是中国民族运动第二个大患。

第三是工贼 在中国的民族运动中，工人阶级参加的力量，已经使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国内军阀与大商买办阶级——感觉得有利用工贼来破坏工人阶级团结力的必要。这班工贼有些是工人贵族，有些是冒充工会运动者即招牌工会之职员；他们不反对

帝国主义者，他们不反对军阀官僚，他们不反对买办阶级，他们的唯一目的是破坏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共产党，分裂工人阶级的团结力，帝国主义者、军阀、官僚、买办阶级要利用他们就正在这一点。帝国主义者用以阻碍中国民族奋起的第一个工具是军阀官僚，第二个工具是买办阶级，这班工贼便是第三个工具。这班工贼不但勾结军阀官僚及买办阶级(交通系)是公开的，他们勾结帝国主义者也是公开的，他们已和帝国主义的走狗第二国际党公开的发生关系。第二国际党为什么要和他们发生关系呢？不用说是为了要利用他们破坏中国民族运动中重要的力量——工人阶级的团结力，破坏第三国际党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在中国发展。这是中国民族运动第三个大患。

中国的民族运动，此时虽然有日渐发展的趋势；但是上述的三种力量若同时也日渐发展起来，至少也会减少中国民族运动成功的速度，和第二国际党的思想行动减少世界革命成功的速度一样。因此，我们敢说：在中国民族运动的现代，我们实有了解列宁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的必要。孙中山先生，他是了解这种必要的一个，他临终时致苏联遗书如左：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

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孙逸仙。”

原载《新青年》(季刊)第1号

署名：陈独秀

卖 国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日)

我们主张蒙古、西藏人应有民族自决的权利，一班有帝国主义臭的人便将卖国二字加在我们身上；现在青岛日本纱厂中国工人罢工了，日本的劳动总同盟居然汇款五千元，接济这些罢工的中国工人，有帝国主义臭的人又应该大喊日本工人卖国了！还有一班日本共产党人极力援助朝鲜独立运动，在有帝国主义臭的人们看来，这班日本共产党人更是双料十足的卖国贼了！

原载《向导》第114期

署名：实庵

你们当真外抗强权吗？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日)

现时世界上唯一的强权就是帝国主义，有一班人一方面主张外抗强权，一方面却不主张反对帝国主义，这已经是滑稽极了。这姑且不论，可是你们既然主张外抗强权，实际上也要起来抗一抗才对；然而眼前强权践踏着上海的同胞，最重要的如日本纱厂虐待中国工人，如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提议印刷律及越界筑路等事，你们竟没有丝毫行动或言论的反抗，你们当真外抗强权吗？你们欺骗谁来！

原载《向导》第114期

署名：实庵

今年“五一”的感想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日)

今年“五一”运动，除苏俄外，各国均被军警干涉。在中国，北京江亢虎老爷拟在公园演说，尚且被警厅禁止了，而广州的五一节，竟有二十万人游行；在上海租界华界都禁止开会演说，只有苏俄领事馆大开其五一纪念会。在这些事实上，我们应该发生什么感想？

原载《向导》第114期

署名：实庵

《圣经》与鸦片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日)

英政府致书国际联盟，谓一九二三至二四年，印度布夏出口鸦片值英金六十六万四千镑，次年增至一百二十四万六千镑。英国内外圣经会常年报告载：上年发行之《圣经》，超过一百万册以上，在中国售去者约百分之四十。我们应该竭诚感谢英人之厚赐：《圣经》与鸦片！

原载《向导》第114期

署名：实庵

反共产与军阀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日)

现在上海反对共产党的报纸以盛称直系两次战功、八省地盘的《时事新报》为第一；同时，有一个什么上海反共产男女同盟会代表孙宗昉赴京请愿，执政府对他颇愿成全。于此可以看出反共产与军阀间的关系了！

原载《向导》第114期

署名：实庵

过激主义与被压迫者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日)

路透电说：巴黎中国国民党人士，近于追悼孙文时，发激烈演说，宣传过激主义，欧洲报纸多谓华人好过激主义。华人何以好过激主义，他们应该有个解答。我们的解答是：过激主义本是结合一切被压迫者反抗一切压迫者，可怜我们被帝国主义及军阀层层压迫的华人，怎禁得不好过激主义？

原载《向导》第114期

署名：实庵

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日)

印度自治党首领达斯氏,近在該党大会演说,竟反对革命,竟说出“在大英帝国之内印度可达到自治目的”的话,这足以证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的确是民族革命之障碍。

原载《向导》第114期

署名: 实庵

卖国贼与国民党右派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日)

段祺瑞所派临时参议院参政三十人中,我们应该注意三个人:一个是“五四”运动的对象卖国贼陆宗輿,其余两个是国民党右派彭养光、凌毅。

原载《向导》第114期

署名: 实庵

段祺瑞解散国民会议 促成会的意义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日)

段政府的警察厅，居然把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及促成会联合总会、北京各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国民会议协进会、国民会议后援会一齐解散了，并禁止私行开会，这是什么意义呢？这是段祺瑞明白的告诉人民：公开的国民会议运动的时机未到，你们还是去做革命的军事运动罢！

原载《向导》第114期

署名：实庵

“反唐”与国民革命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商团事件以来，广州将要发生第二次有价值的革命战争，乃是意中之事。

这战争便是反唐战争。反唐战争何以算得是革命战争而且是有价值的革命战争？这是因为反唐战争表面上虽不过反对唐继尧，而实质上乃是破灭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阴谋，并且是破灭国民党右派勾结唐继尧破坏革命政府的阴谋。

日本帝国主义者虽然力助他的傀儡张作霖与段祺瑞占住了中国的中央政治机关，然而北方有个国民军，南方有个国民党的广东政府，他必须去了这两个障碍物，才能达到支配全中国的目的。日本对付国民军的政策，自然不外居中调停段、张间冲突，使之合力向国民军节节进攻；他对付广东政府的政策，却不是帮助陈炯明、林虎——因陈、林是直系——而是利用唐继尧及国民党右派向广东政府进攻。

云南地瘠民贫，唐继尧拥有多兵不能向川、黔发展，忽得日本意外之后援，自然不惜抛弃其联治假面，遣兵进窥桂、粤。

国民党右派已和左派有不能两立之势，他们一面北依段、张，摧残左派分子在北方之活动，一面南联唐继尧，以图覆灭左派在南方的根据地——广东革命政府。

杨希闵、刘震寰（都是国民党右派军人）在香港和唐继尧代表、段政府代表及其他国民党右派重要分子共谋倾覆广东革命政府，已经是公开的事实。他们的目的如果进行，一方面是国民党右派完全取得左派在南方的根据地，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一手挟住

段、张，一手挟住唐继尧来支配中国，来由日本统一中国南北。

帝国主义者对于半殖民地，本立在间接的统治地位，所以必须采用当地一种势力（军阀或地主买办阶级）做工具。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采用的工具，北方便是段、张，南方便是唐继尧国民党右派又是这两个工具的工具。所以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反唐和反段、张有同样的重要，都是摆在全中国革命分子面前的紧要工作。所以我们应该把广东将要发生的反唐战争——反对唐继尧及其羽党杨希闵、刘震寰的战争，当作革命战争，无论成败，都是商团事件后第二次有价值的战争。因为商团事件是镇压买办地主阶级勾结英国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反唐战争是镇压军阀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反革命。

唐继尧电粤港商会，以反共产为号召，这并不是是一件偶然的事；英、美、日本帝国主义者，军阀段祺瑞、张作霖、陈炯明等，买办阶级陈廉伯等，国民党右派冯自由、马素等，都异口同声的反共产，反赤化。所以“凡是反共产反赤化的人必然勾结帝国主义者与军阀”，已经成了一个公式。

原载《向导》第116期

署名：独秀

上海大屠杀与中国民族自由运动

(一九二五年六月六日)

前年临城事件，土匪掳去几个外国商人，外国人对中国政府闹得天翻地覆，惩凶赔款、罢免地方长官以谢罪外，还要要求直接管理中国铁路；现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大马路行凶，五月三十日，六月一日、二日、三日，连日枪杀中国学生、工人、商人及其他市民数十名，伤者数百，中国人将向外国政府要求什么呢？

被土匪掳去的外国商人即令是无罪的，而要求工作的工人，游行演讲的学生，过路观看的行人，都是没有武装的市民，有何罪状应该枪毙呢？

即令上海是英美领土，行政官厅公然下命令，向无罪状无武装的市民开枪轰击，在法律上道德上都是犯罪行为；况且租界毕竟还是中国领土，外人来此通商，根据何项条约，有何权利，可以任意开枪杀伤中国市民？大约英、美、日本等帝国主义者的意思是说：中国人是上帝赐给英、美、法、日等国剥削与践踏的，如有不受剥削与践踏者，便违背了神意，便是过激党，便犯了罪，便应该枪毙。或者他们以为此次大马路的屠杀，也和在欧洲屠杀犹太人、在美洲屠杀黑人一样，即令在人类的法律观点上说不过去，而在道德上是合神意的；因为除了神意以外，他们找不出可以任意屠杀中国人的理由。

可是不懂得这样扶强抑弱的神意的中国人，我们亲眼看见同胞的热血染遍了大英大马路，我们已经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英、美、日本帝国主义者！

此次上海大马路的屠杀所给与我们的教训是：

(一)一切帝国主义者对于我们的剥削与践踏是一致的，英国

固然是始终压迫中国的死敌，而附和日本人的什么大亚细亚主义，鼓吹什么美国是中国人之好友等等，都是中国民族运动中之奸细。

(二)一切帝国主义者所加于我们的剥削践踏，都一一活现于商人、学生、工人及一般市民的眼前，决不是什么过激派所捏造的海外奇谈；商人、学生、工人一切市民大群众实因为受不了帝国主义的剥削与践踏，把持海关，在中国遍设工厂，不许禁止棉花出口，不许中国增收纸烟捐，封禁全国学生总会，以军火给军阀战争，动辄拘捕惩罚中国新闻记者，越界筑路，提出印刷律，增加码头捐，枪杀请求工作的工人，拘捕爱国演讲的学生，枪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学生、工人及其他市民，一步加紧一步，逼着中国人不得不起来反抗，决不是由于什么过激派的煽动。此次上海学生与商人之奋起，都明明白白是自动的参加民族运动，若说是由于过激派之煽动，那便未免过于诬蔑学生、商人，并且过于恭维过激派了。

(三)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人之剥削践踏，和德、俄、奥等非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和平通商，这些事实已证明“反对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自由运动”，是同一意义的两个名词。此次大屠杀更使我们的确认清了英、美、日本帝国主义者是中国的敌人。

(四)各帝国主义的国家，因欧战损失过巨，须长期的加紧剥削弱小民族以弥补，中国即是他们所要剥削者重要部分之一，他们向中国剥削日益加紧，他们恐怕中国人民觉悟反抗的心理亦日益加甚；年来中国民族自由运动勃兴，帝国主义者张皇失措，一面利用中国军阀政府抑制人民，一面以“过激”、“赤化”等名词恐吓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不敢团结起来反抗他们，不敢做自由运动。可是他们这种恐吓手段，在此次大屠杀中，完全失了效力；因为不管过激不过激，赤化不赤化，帝国主义者枪杀了数十无辜的中国人是真的。我们今后永远不要上帝国主义的当，被“过激”、“赤化”等名词吓散了中国的民族自由运动。我们应有决心，如果使我们能达到民族自由之目的，便过激、赤化也无妨；如果不能使我们脱离被剥削被

践踏的境遇，什么文化、秩序、博爱、亲善、和平、人道，都是废话！

(五)在此次屠杀中的我们认清了中国的工人与学生，是民族运动中最勇敢的战士，我们并可以知道各国的工人、学生必能对此次中国民族被外国强盗——帝国主义者屠杀表示同情。因此，我们的运动，是应该立脚在中国民族自由的意义上，反抗剥削践踏我们的外国帝国主义者；不应该立脚反动的国家主义上，笼统的排斥一切外国及外国人。

我们在此次屠杀中，受了极大的痛苦，而痛苦中所得的教训，很可以使我们的民族自由运动，向正确的路线上发展。

上海是一切帝国主义者势力集中地，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即民族自由运动，亦应以上海为中心；不过同时我们也知道民族自由运动是一个全国运动，全国的学生、工人、商人，都应该同时起来向一切帝国主义者进攻，使这个运动的中心——上海的学生、工人、商人更坚决的前进，尤其要监察大商阶级中途和帝国主义者妥协！

我们最终目的，自然推翻全世界一切帝国主义，目前在此次运动中最低限度的要求应该是：

(一)惩办凶手赔偿损失

(二)撤换驻上海英、美、日本领事

(三)取消各国领事裁判权

(四)收回全国租界

(五)撤退驻在中国境内的外国陆海军，禁止外国陆海军在中国境内自由登岸

我们要知道：民族自由运动是一个长期的争斗，我们须有普遍的持续力，不可得了一部分胜利便停止前进，即此次完全失败亦不可因此沮丧！

原载《向导》第117期

署名：独秀

日本纱厂工潮中之观察

(一九二五年六月六日)

凡是一个较大的工潮，在社会上在历史上都有重大的意义，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人和厂主争斗问题，至于中国工人和日本厂主间的争斗，其意义尤其复杂。

此次上海及青岛日本的纱厂和中国工人的冲突，我们不应该把他看成一个很简单的劳资争斗，我们应该推求这次争斗之经济的政治的背景，明白了这些背景，才懂得此次工潮意义之复杂与重大。

此次工潮之经济的背景是日本纱业向中国纱业及中国工人进攻。世界纱业状况本在衰落时期，比英、美资本幼稚的日本照情理不能进展；然而日本资本家，一面正因纱业状况不佳，极力要维持资本的利盆，渡过这衰落时期；一面却又想此时期扩大他的企业，独占中国之纱业；因此遂不得不向在他们纱厂的中国工人加倍榨取（如增进工作能率，改用女工、养成工等）与压迫（如打骂、罚金等），以达其保守而且进攻两个目的。日本人欲平安无事的施行其榨取与压迫，工人不至反抗，则首先须破坏工人的团体——工会。中国工人受不了这样的加倍榨取与压迫，上海、青岛的工潮遂因此连续而起。

政治的背景，在全部局势说起来，整个的国际帝国主义，正在向整个的中国民族运动进攻，压迫中国工人是他们整个的进攻之一部分，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他们的进攻也最严厉。这种最重要，中国人现在还不认识，外国帝国主义者是认识的；所以日本某报曾说：“曾被吴佩孚解散之工会，均渐次复活，而其运动之急进，大有一日千里之势，故英、美、法、日等国，对

于此种现象，多怀恐怖之念，咸认此风一盛，则各国在华工业，将受绝大影响。”单就日本说起来，直系倒后，日本挟有段、张这两个鹰犬的势力支配中国政治，制服中国人民，因此日本对于中国民族运动之进攻，比其他帝国主义的国家更加紧出力，中国人对于他的种种加紧进攻，自然也特别感觉，上海、青岛的工潮遂因此连续而起。

各方面对于此次工潮的态度是怎样呢？英、美帝国主义者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虽然有冲突，而压迫中国民族运动他们是一致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帮着日本工厂拘捕中国工人，拘捕同情于工人的学生，枪杀同情于工人的学生与市民，他们来到中国通商，他们居然在中国的地方——上海，有在法律以外任意枪杀中国人的特权。在此次上海惨杀中，我们应该认识一切帝国主义者压迫中国民族是一致的，从前单独仇视日本，是错误的。

亲日卖国的安福政府，他当然有替日本镇压中国人排日运动的义务，上海警察署曾对工人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本不应摧残同胞，但怎奈日本领事压迫及长官命令何！……”山东张宗昌所统的奉军，更是听日本人命令，解散了纱厂工会，杀伤了工人数十名，驱逐工人领袖数十名出境，还囚送工人领袖六人到济南要枪毙。在此次青岛惨杀中，我们应该认识国内军阀的确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有，张作霖的军队即是替日本屠杀青岛工人的刽子手！

全国的报纸，除青岛《公民报》外，不曾替被杀的工人说半句话。顾正红被杀时，上海各报馆听了工部局的命令，连许多事实都不敢登载。即至现在大马路两次惨杀，上海各报仍是没有一点热烈的批评，连国民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也是这样，回想临城劫车时，全国报纸那样如丧考妣的号叫责骂，真令人认识中国新闻界的人格了！

只有可尊敬的学生，为了工人，为了同学，前仆后起的以热血和帝国主义者奋斗；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在中国民族运动中，那些社会成分是最急进的最勇敢的先锋。

原载《向导》第117期 署名：独秀

此次争斗的性质和我们 应采取的方法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日)

五月卅日上海大马路之屠杀，曲在英捕横暴而不由于学生、市民之暴动，已由本月十一日会审公堂第三次研讯被捕者所宣布的判词完全证明了。

此次屠杀之最近直接原因，乃由于上海的学生、市民对于日本纱厂枪杀中国工人而抗议，为租界英捕所屠杀。

同时，日本派遣军舰在青岛强迫中国军警，使其屠杀中国工人八名，伤者十余。

上海、青岛同时的大屠杀，激起全中国各阶级各党派的国民公愤，罢工、罢市、罢课、集会示威，遍于全国。在这全国国民公愤中虽然有和平急进之分，而愤恨外人戮辱同胞，并且忆起历来的不平待遇，却已成了全国共同的心理，虽军阀、银行家亦为此心理所征服。

苏俄政府及人民对于此次屠杀事件及中国国民奋起，极表同情。代表全世界革命工人的第三国际，已起来号召全世界工人援助中国工人及中国民族运动。英国的工人及自由主义的学者，已起来向他们的本国政府抗议此次上海屠杀事件。

英、日、法、美、意的海军在上海登岸驻扎，占领学校，搜查行人。英、日、法、美、意的公使团始终坚持上海西捕开枪杀人是应该的。

汉口英领事召各国海军登陆，英国义勇队枪杀中国工人、市民八人，伤四十余。

段政府下令各省保护外侨。萧耀南、赵恒惕均令军警严阻学生

游行演讲，并宣布戒严，以“就地正法”、“格杀勿论”威吓市民。

依据上列各项事实，便可看出此次争斗的性质和我们应采取的方法了。

英捕英兵在上海、汉口杀人，不过是此次争斗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凶暴现象，此种现象之真正根由乃由一切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民族觉醒与反抗之示威。因此我们应该明白：此次争斗若仅以惩凶赔偿了事是错误的；因为杀人之罪不仅在英兵与英捕，而在帝国主义的国家之高压政策，如工部局历来横暴及此次海陆军警示威，都是国家行为而非私人行为。第二应该明白：此次争斗若主张缩小战线对英、日或专对英国是错误的；因为罪魁祸首虽然是帝国主义之王的英国，而派兵遣舰向中国人示威，并坚称上海西捕开枪无罪，日、美、法、意也和英国一样，尤其日本在上海、青岛直接或间接杀了中国工人是此次争斗之起因。第三应该明白：此次争斗若主张法律解决是错误的，因为法律只能制裁私人的犯罪行为而不能制裁国家的横暴与民族间的冲突。第四应该明白：此次争斗若看做一个地方的问题，上海人只管上海，青岛人只管青岛，汉口人只管汉口，妄想住在各个租界的中国人得着一点市民权利便可永弭未来的冲突，这也是错误的；因为一切帝国主义者是根据一切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全民族加以剥削与凌辱，即此次屠杀也不但上海，青岛、汉口都同时流血，这种根本问题，不但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并且不是一个国家问题，是要唤起国际的同情才能够解决的。第五应该明白：此次争斗若依靠现政府交涉解决是错误的；因为历来的卖国政府对外悬案山积，从未能得着相当的解决，现在对于各处同时并起的大屠杀案，并不向外人严重交涉，专知保护外人，反以严加峻法压抑本国人民的爱国运动，他们向来只是代表外国向本国人民交涉，不曾代表人民向外国交涉，现在上海的外交当局蔡、曾、许那一个不是这样的态度？！

我们若是明白了这些错误，便应该懂得此次争斗的性质，乃是全中国人民为民族的生存与自由反抗一切帝国主义之争斗，决不

是那一个地方那一部分人，对某一事件某一国家之争斗；换言之，此次争斗应该是整个的不是局部的。争斗的方法，不可依赖法律，亦不可依赖现政府，只有依赖国民自己的团结力。

因此，我们主张：中国国民应该运用自己的团结力，立即在上海召集全国工商学兵代表大会，议决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严责政府宣布执行。倘政府不肯执行此议决，立起国内战争，建设一个国民革命政府。新政府第一个宣告，即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第二个宣告，即是那一国承认废约的宣告，并派代表来华商订相互平等的新约，便许那一国通商，否则请他们将一切商品运到别国去贩卖。

我们这个提议，是立脚在全民族的生存与自由之意义上面，不是立脚在某一阶级某一党派的利益上面，希望全国人民不存成见，予以公正的考虑与讨论！

原载《向导》第118期

署名：独秀

我们如何应付此次运动的新局面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日)

上海交涉破裂是我们的失败么？当然不是的。反之，上海交涉破裂，或竟至帝国主义者对于总商会十三条要求一一允许了，国人以为目的已达，停止一切运动，那才真是我们的失败。

主张上海开市是总商会的罪恶么？也不是的。民族自由是要经过长期的争斗，决非罢市可以达到目的；总商会的罪恶不在主张开市，而在始而离开民众团结（不加入工商学联合会），继而背叛民众利益（删改工商学联合会所提条件），完全表现出在民族争斗中妥协的大资产阶级之阶级性。

上海交涉移京是局部的变化，大资产阶级及其附庸（高等华人）之妥协更是当然的事，这都不是我们的失败，只有工人、学生、中小商人不能继续团结前进才是我们的失败。

上海的工商学联合会尚继续工作，六月廿五、卅两日，全国部还有盛大的示威行动，香港、沙面运动之进行比上海更加猛烈，这些事实都可以证明工人、学生、中小商人都并未随着大资产阶级妥协，使我们失望。

在敌人方面，法、美帝国主义者虽取和缓态度，而英、日仍然联合向我进攻，尤其是英国还在广州继续屠杀。英、日帝国主义者直接屠杀我们还不称心，更寻得一个有力的工具！大胆无耻的胡匪张作霖替他们做屠杀中国人的刽子手！张作霖的军队在奉天在天津在山东在上海到处压迫民众爱国运动，汇丰大借款喧传于伦敦，张学良在上海与英总领事之密谈，这些事实都是说明英、日帝国主义者需要张作霖替他们在此次风潮中做什么，及张作霖已经替他们

做了些什么。自从段祺瑞提议修改不平等条约，更使英国感觉着利用他以前不愿利用的张作霖之必要；同时张作霖的政敌冯玉祥却明白的表示站在爱国的民众方面，张作霖更要倒行逆施了。这乃是此次反帝运动最近发展的新局面。

我们民众对于此新局面如何应付呢？

第一，要扩大工商学兵农联合会或雪耻会遍于全国，成为群众的行动机关，执行各地排货、罢工、废约、反抗媚外的军阀奸商及教徒等反帝的实际运动。

第二，急须在北京或上海组织全国工农学商兵联合大会，以为指导全国运动的中央机关。

第三，急须武装学生、工人、商人、农民，到处组织农民自卫团，以抵抗军阀之压迫。

第四，扩张反对帝国主义的国民军于全中国。以扑灭张作霖、萧耀南等媚外残民的军阀势力。

第五，坚持继续排货及罢工运动，非达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不已。

原载《向导》第120期

署名：独秀

广州战争之意义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六日)

此次广州讨平杨刘之战争，社会上有三种误解：第一个误解说是共产党反对非共产党之战争；第二个误解说是胡汉民和杨希闵争夺地盘之战争；第三个误解说是粤军排斥客军之战争。由此三个误解遂发生一个共同的错误见解，即是：五卅惨变起广州政府即应停止内争一致对外。

在广州的共产党人诚然反对杨刘，并且努力援助国民党政府讨平杨刘；但他们反对杨刘并非因为杨刘不是共产党或不相信共产主义，乃是因为杨刘勾结香港政府及反革命的唐继尧陈廉伯马素等背叛国民党政府。广州政府完全是国民党政府，不但不是共产党政府，并且不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联立政府，——共产党只以在野党的资格，在某种事件上号召民众援助国民党政府，或在某种事件上号召民众监督国民党政府，并未曾直接负政治上的责任。大家明白了这种事实，便不会有第一个误解。

据我们所知道的，开战之前几天，胡汉民汪精卫都还没有讨伐杨刘的决心，坚决主战的是谭延闿与廖仲恺，因此我们便可以明白第二个误解也非事实了。

至于第三个误解之非事实，更属明显；因为参加讨伐杨刘的，不但有谭延闿所统率的湘军和蒋介石所统率的教导团，并且还有朱培德所统率的滇军，这绝对说不上是什么排斥客军的话。

根据以上的事实，我们应该知道此次广州讨平杨刘之战：一不是什么共产党反对非共产党，二不是什么胡杨争地盘，三不是什么粤军排斥客军，乃是国民党政府讨伐通敌的叛将杨希闵刘震寰等。

唐继尧借重日本势力，谋攫两广，杨刘均为唐军内应，这是杨

刘之罪一；在香港勾结帝国主义的英国及其走狗陈廉伯马素，谋倒广州国民党政府，这是杨刘之罪二；杨刘有这二罪——国民党政府乃加以讨伐。因此，此次讨伐战争之意义，可以说：一方面是直接驱除反革命的军阀盘据广东，一方面是间接反抗帝国主义的英日势力侵入广东。

国民党政府若从一致对外的誓说，不用兵对内讨平杨刘，则现在广州市民仍在杨刘的反动势力压迫之下，日受香港政府命令箝制人民爱国运动；不独香港工人无广州后援不能罢工，而且枪杀广州游行示威的市民，并不须英人亲自动手杨刘的军队即可效劳。此次广州政府所没收英国帮助杨刘的大批枪弹，即是杨刘将以阻止广州市民爱国运动的利器。并且若杨刘叛军得了胜利，迎来滇唐占据广州，即是英日势力占据了广州，则南方的爱国运动不是根本消灭，便是大受屠杀，那能够象现在让香港沙面罢工工人及爱国学生在广州存在与活动，更那有什么青年军人参加运动的事？杨刘军事势力了结，国民党政府才能够支配广州，广州才能够变成了与上海同样是中国反帝国主义的两个重镇。所以广州讨平杨刘之对内战争，在此次五卅运动上即反抗英日帝国主义的压迫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拿一致对外的理由来非难广州政府讨伐杨刘，简直是胡说！

不错，当外人压迫我们之时，在理论上，我们一致对外是必要的，是应该的；这时不去对外，反以武力对内扩张自己的势力与地盘，当然是万分混账；但事实上“一致对外”乃是一个幻想，听你“一致对外”这口号叫得如何高如何响，尽有人不但不愿一致对外，并且要勾结外人一致对内，如杨希闵张作霖之所为；我们若是对于这类人主张停止内争一致对外，便是有意或无意放过在内的敌人。在内的敌人和在内的敌人倒是一致的，在此次争斗中，我们若不能否认有在内的敌人，什么“停止内争一致对外”便是帝国主义奸细的宣传。

原载《向导》第121期 署名：独秀

我们认识江亢虎了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

我们以前只知道江亢虎自称是社会党首领，还不晓的他究竟是什么一种人，现在看见他求见宣统皇帝的信中自称：“寒家三世仕宦，五人科甲，先祖韵涛公曾侍南齐，不佞少时亦供京职，……曾痛论兴汉灭满十二大不可，驰书民军，几以身殉。”我们现在认识他了，认识他乃是一位“颇念旧恩”、“尚不忘本”的复辟党！

原载《向导》第123期

署名：实

《醒狮》与《诚言》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

英国帝国主义者废了许多气力，印了许多《诚言》，意图在中国民众中毁坏苏俄的信用，实际上只惹起一些反感，因为他们的方法太笨，他们若用《醒狮周报》替他们宣传，定然有效得多，并且《醒狮》攻击苏俄诬蔑苏俄，比《诚言》还要起劲十倍，可惜英国人太忽略了。

原载《向导》第123期

署名：实

孙宝琦与《醒狮》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

孙宝琦对美国记者说：“中国人之所以亲俄者，则亦因年来国人感受种种不平等之待遇，久已疾首痛心，俄人独能开风气之先，首先解放我国之束缚，抛弃种种不平等之利益，以与列强对我之束缚压迫者两两相比，弥觉俄人可亲，而列强可畏，自属人情之常。”由《醒狮》记者看来，孙宝琦这段话真是亲俄卖国，而由孙宝琦看来，《醒狮周报》的见解，或者是人情之变。

原载《向导》第123期

署名：实

此次运动中之帝国主义与军阀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五日)

英国是帝国主义之王，此次中国五卅事变起，美、法、日本帝国主义者，都想乘机挟制英国一下，且因此买弄中国人心。法国在东欧、在小亚细亚，和英国的利益简直不能并立，所以首先不和在上海的英国人一致行动，并且对中国民族运动表示相当的同情；自英国保守党执政，道威斯计划受了打击，英美间遂现了裂痕，加之在华商业竞争，美国一部分舆论表示对华和缓态度，并主张有条件的取消领事裁判权；即至五卅事变造因之日本，亦以单独调解的声浪恫吓英国——五卅事变后一个月，英国都在此孤立的状态中。

外交手腕最敏捷的英国帝国主义者，一面捏造“报告未到”、“华人排外”、“列强一致”等话搪塞国会之质问，一面力与法、美、日本谈判，以英、日续盟威吓美国，乃成英、美、日三国联合对华之新局面。英、法利害冲突过甚，不易调协；无条件的与英国一致，固法人所不愿；为拉拢法国一致对华，而在东欧或小亚细亚向法人让步，也非英人所乐为。这就是华盛顿会议所产生的四国协同对华政策现在不易实现的缘故。

英、美、日三国联合对华之局成，在政府外交上或增加多少困难，而在国民运动上却有很好的影响，因为“单独对英”及“美国人是朋友”这两个口号，都可以使中国国民运动自相分裂。现在英、美、日本联合在一起，懦弱的资产阶级撇开日、美之心理虽然仍旧存在着，而事实上日、美却不许他们撇开，所谓“单独对英”明明白白成了一种幻想的单相思。在这样情势之下，至少也可以使中国国民运动之分裂不至过分的发展。

此时英国的政策是：(一)联合日、美一致对华以免孤立；(二)主张司法调查，延宕时间，以待中国国民疲惫，再图有利的结果；(三)勾结中国反动的军阀，扑灭中国国民运动；(四)以关税会议诱惑中国军阀政府，准备在此会议，由要求清理外债进而共管财政，向中国进攻。日本仍旧采用他的传统政策，即是追随英国，取一致行动，获得在华和英国不甚冲突的利益。美国虽不全然赞成英国的政策，然而为维持一切帝国主义在华之威严及实施门户洞开政策，他是终须与列强取一致行动的。

这时的国内军阀又是怎样呢？奉张是现在第一有力的军阀，也就是第一反动的军阀；他的对内政策是急须打破国民军，以免妨碍他的势力在中部自由发展，他的对外政策是公然压迫在他的势力下(从奉天到上海)的国民运动，结欢英、日以取得援助。国民军和奉张更在相反的地位，他们在张家口在河南都同情于国民运动；惟其因反奉而联络直系若一过相当程度，不但立刻失去社会地位，并将失去政治地位。直系尚有举足轻重之力，无论其联奉或联国民军都以直系重兴为目的，此时他们联奉之计划已归失败，同时，张宗昌与杭州间，开封与武昌间，已有不断的联络。直系和奉张本是反动相等的军阀，只因他们在政治上失了优势，压迫国民运动还不敢象奉军那样横行无忌。段派虽无实力，然占在中央政府地位，其举动在政治上亦颇有意义；他的反动性也不减于奉、直，此时因与奉张利害冲突，其实力又不足制奉遂不得不别开生面，向国民运动及国民军表示敷衍态度。

依以上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国民运动中眼前的死敌，在外的是英、日帝国主义者，在内的是奉天军阀，他们又正勾结一气。此外如美国的经济侵略及和平愚弄和直系重兴这两个危险，国民运动中若采用过当的利用政策，都会为了眼前争斗遗下未来的祸根！

原载《向导》第124期

署名：独秀

军阀及资产阶级在上海民众 运动中之影响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八日)

驻在上海小沙渡的奉军兵士对工人说：“大帅派咱们南来时，说是到上海打洋人，早知道是叫咱们打本国人，咱们真不应该来。”这几句话把奉天军阀对于上海民众运动的态度形容尽致了。张作霖父子为什么要骗兵士说是到上海打洋人？这是不但派兵到上海占地盘和垄断私运鸦片报效不便说出，在民气激昂之初期，也不便明说来替外国人压服本国人，所以只得顺口说是到上海打洋人！

奉军进驻上海到底打了洋人没有？不用说是没有。其实上海市民并不曾主张他们来打洋人，不过张学良、邢士廉对英、日人那样亲密恭顺，对本国人这样的压迫凌辱，相形之下，未免难堪。说他们对本国人压迫凌辱，奉军未必承认，他们还口口声声说保护爱国运动，不过为地方治安计须制止越轨行动罢了。可是邢士廉一到上海便宣布戒严，爱国的民众集会一概禁止，连提倡国货的游行都不许；工商学联合会派人上街演讲，马上便遭封闭；海员工会及洋务工会也同时因惩治破坏罢工者而遭封闭；接着电车工会也遭压迫；小沙渡是罢工最初发动地，奉军特别驻军该处监视，连少数工人集会都不许；禁止学生会检查英、日货——这就是奉军在上海保护爱国运动的事实。京戏《逍遥津》中曹操拔剑威吓献帝，杀死伏后及二皇子，犹口口声声自称“忠良”、“忠心保国”，奉军保护爱国运动，又何以异是？

奉军这样的保护爱国运动，连他们的兵士也看穿了，所以说“叫咱们打本国人。”

奉军这样举动，和上海资产阶级的态度也有关系。上海是奉军初到之客地，和直隶、山东是他们已占据的地盘不同，所以他们

在上海的举动，至少也要顾及上流社会的意见。

上海的资产阶级，还不象汉口、天津的商会那样反动向军阀告密，也还没有勾结所谓工团联合会的那班工贼来破坏工人团体；可是他们那妥协犹豫的态度，已足够使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乘虚而入了。自始总商会对于罢市即甚犹豫，罢市后，又不肯和民众集中的团体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合作，随后又在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所提十七条件外，别自提出十三条，这些举动便使帝国主义者及军阀看出上海的民众势力发现显然的分裂。开市时，总商会也取了独断的态度，和工商学联合会不能一致；开市后，总商会是并没有履行“抵制英日货物”及“援助停业工人”的宣言。当总商会提出十三条件时，加入总商会的四十九个工商业团体登报声明一致拥护总商会所提条件，意在抑制工商学联合会之急进的主张，可是总商会的十三条件也未得结果，这四十九个工商业团体并不出来拥护，却想压迫工人总复工，好让大老板们照旧安稳发财。商联合会虽然比总商会高明一点，而自从奉军戒严以后，对于急进的工学界，现出恐怖而鄙恶的态度，甚至于动辄要退出工商学联合委员会，这便使帝国主义者及军阀看出上海民众势力有了第二次分裂。民众势力有了这两次分裂，敌人焉有不乘机加紧进攻的道理？

上海商界富厚，为全国之冠，而他们对于罢工工人救济费，只经收外埠捐款，而本埠总商会及商总联合会自己却都一毛不拔，并且不努力设法去募捐，只忙着求日厂单独解决，以减少救济费，这种苟且不负责任的态度，已足够使帝国主义者看轻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象是一种滑稽剧了。

五卅事变初起之时，帝国主义者着实吃了一惊，假使民众势力不分裂，全上海工、商、学界一致团结努力前进，假使军阀不摧残爱国运动，民众有集会、演讲、游行示威之自由，则影响到全国运动之发展和北京交涉之进行，必和今天沉滞的状况不同，这是我们应该认识的呵！

原载《向导》第125期 署名：独秀

我们如何继续反帝国主义的争斗？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一)

上海工人两个半月的罢工运动，香港、沙面两个月的总同盟罢工，其他如南京、青岛、河南、北京各局部的罢工，在此次反对英、日帝国主义运动中，已表示极伟大的力量。经过这一时期，对于以后的发展途径，我们应当有个明确的答案，以为民众争斗之指针；并应该有详密的策略，以决定如何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如何反抗国内军阀政治上经济上的破坏及压迫，而力争解放中国之革命的道路。

(二)

对于这些问题要有正确的答案，便必须：一、能正确的应用无产阶级两月以来联合城市劳动者及小商人而争斗的经验；二、能正确的明瞭敌人方面——帝国主义者及军阀——的内部冲突而利用之。

自从上海工人总罢工以来，学生、手工业者、小商人，甚至于大资产阶级都起来奋斗，始则在上海，随后更在其他各地形成了民族运动的联合战线，大致以改造租界制度，取消领事裁判权，收回会审公堂，撤退各国驻华海陆军，改良工人待遇，惩治凶手，赔偿死伤损失为共同的政纲。上海之外，首先有力的响应的便是沙面和香港宣布总同盟罢工，接着后援会、雪耻会等组织遍于全中国南北各地。这两个月全国民众运动奋起的结果，我们已经看见工人阶级所得的胜利——群众的工会组织，不但在上海是如此，其他各埠，

尤其是沿铁路一带的大都市也是如此。中国的工人阶级第一次得着这样伟大的政治上组织上的训练,增高了自己的地位,成了民族解放运动中极重大的动力。因此,除了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和寄生的小资产阶级如工头、工贼等之外,全国一般民众,都对于上海、香港的罢工运动表示同情,并予以物质的援助。

(三)

中国工人阶级能够得着这种胜利,是因为自己勇敢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并且和其他被压迫的民众联合。

工人阶级在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不但要拥护自己的利益,并且对于小资产阶级及农民,都要明瞭他们的利益,考察他们情形,竭力引导他们到反帝国主义的斗争里去,随着工人阶级前进,不使他们中途退却,这斗争才能继续下去。

工人罢工运动所得的胜利还不止此,他在现时中国的情状里,一天一天的集中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并且使政府及军人中还没有象张作霖那样完全站到帝国主义那边去的,也不得不自相联合起来,应付帝国主义之压迫。同时,工人群众力争民族自由运动,更使张作霖的奉系军阀,暴露他们那反对国民而做帝国主义走狗的真面目,如邢士廉之于上海,张宗昌之于山东,李景林之于天津。

(四)

英、日帝国主义者竭力设法扑灭上海、香港的罢工,他们知道这两处罢工停止是全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一大打击。他们也知道中国排货运动是他们的大损失,所以竭力运用下列政策,使中国民族运动根本摇动。一、他们以炮舰威吓广州——香港、沙面罢工的策源地;二、传播谣言,使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隔离;三、勾结奉系军阀,压迫上海、青岛、天津的罢工运动和上海禁止学生检查英、日货,这是他们最毒的政策。美国帝国主义者要想利用反英、日的运动,而发展他在中国的利益,可是因为怕中国民众过于开展,他的

政策客观上仍旧是帮助英、日，形式上维持帝国主义者在华联合战线。惟我们也应当知道英、日与美国内部的冲突是必然存在的，我们可以利用美国对华政策，使他对于中国解放之形式上的问题比其他帝国主义者容易让步。

(五)

上海、香港罢工都已在两个月以上，以中国地域之辽阔，交通之阻隔，政治之分裂，中部、北部各省的工人没有能及时响应，汉口、青岛、天津的罢工，都被军阀高压政策所破坏。这种情形，一方面表现这些省分的工人和一般民众主观上的愤激不平，还在一天一天的增长，一方面表现这些省分的罢工运动，在客观上一时不能为有力的发展。北部、中部的罢工既然一时不能发展，上海、香港的罢工，便有孤立难以久持的危险，特别是上海罢工群众受政治上经济上双层压迫，比香港罢工群众所遭的环境尤坏。

在上海有一部分先进工人，他们看见落后的罢工工人，因政治上经济上的压迫，开始恐慌，想以武装暴动来救此危机，这种意见是不对的。武装暴动，乃是群众奋起之最高潮，并且应该是有全盘计划的庄严工作，不应该在群众恐慌之时，拿武装暴动当做一种浪漫的“拚命”办法，想借此泄愤，或拿他来代替现时困难的争斗。现在是群众的政治宣传及组织工作时期，是准备武装反抗时期，还不是直接武装暴动的时期。

(六)

根据以上的事实，我们便可以答复今后的发展途径是怎样及今后继续反帝国主义争斗的策略是怎样。

为防御上海、香港罢工孤立的危险起见，为保存工人阶级的组织及已得的胜利起见，应改变上海、香港罢工的政策，以经济要求及地方性质的政治要求为最低条件；至于全国性质的根本要求，工人方面应该提议委托南北政府合组织一委员会来解决。工人群众

应该纠合全国的力量，努力督促这委员会，不准他对外让步，使他不能不拥护民众的要求。

上海、香港的罢工，从全国性质的民族争斗，变成经济的争斗和地方的性质的民族争斗之后，工人阶级的奋斗却进了一个新的途径：不但对外争斗，而且对内争斗；不但和资本帝国主义争斗，而且和反动的军阀争斗；不但为民族争斗，而且为民权争斗。本来反帝国主义争斗的过程，不能和力争民权自由的争斗分开；民族的建立正在反帝国主义争斗的过程中（如五卅事变初起对上海官厅及北京政府对人民之让步）；而反帝国主义的争斗，没有平民的革命政权，不但不能得着胜利（如段政府之交涉成绩），并且连争斗的力量都不容易集中（如奉系军阀摧残天津、山东、上海的民族运动）。为扩大上海、香港罢工运动的新途径，增加总争斗中的民权运动的成分，一直到平民的革命政权之实现，工人并联合一般平民起来反对摧残民族运动的奉天军阀是必要的，甚至于联合同情于民族运动的军人反抗奉天军阀都是可以的。因为此时国内军阀中，第一个公然做英、日帝国主义者走狗的，第一个以武力破坏民族运动的，第一个蹂躏人民集会、结社、出版、言论自由权的，就是奉天军阀。打倒奉天军阀乃是去掉国内反帝国主义争斗之最大障碍，乃是我们继续反帝国主义争斗所必取的途径。

全国性质的根本要求，自然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其他阶级的群众，如果还存着用和平方法可以达到修改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心想，我们也不反对他们去尝试一下，尝试失败了，他们才会走上革命的道路。

所以今后我们的总口号应该是“武装平民”，“打倒奉天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平民的革命统一政府”。

原载《向导》第126期

署名：独秀

罢工与法律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当五卅事变发生，上海工人对于要求条件，提出“承认工人罢工自由”时，有些人以为工人要罢工便罢工，为什么要求有罢工自由？

现在北京警厅已经正式布告答复这个疑问了。布告上说：“按刑律第二百二十四条之规定，从事同一业务之工人同盟罢工者，首谋处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罚金；其聚众为强暴胁迫或将为者，依骚扰罪第一百六十七条之例处断。同律第二百二十一条之规定，以文书、图画、演说或他法公然煽惑他人犯罪者，依左例处断云云。”原来工人没有罢工之自由，罢工在法律上是犯罪行为，工人安得不要求这个法律上的自由。

原载《向导》第126期

署名：实

本报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

(一九二五年九月七日)

本报(《向导》)自民国十一年九月创刊以来,到现在刚刚三个周年。这三年中,中国政治经过了不少的变动,本报的革命政策之主张如何应付这些政治的变动,现在需要一个有系统的历史的叙述,以贡读者。

本报创刊正当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一方面反动的奉天军阀虽然失败了,另一方面直系军阀有代兴之势,尤其是曹党阴谋夺政,黎元洪的政府又昏庸无力支持,因此,我们在本报未刊行以前,在发表的对于时局主张中,即已喊出“继续民主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三个口号,所以本报刊行之始,一切政治主张都根据在这三个口号之上;发刊宣言上,(一)指出须推倒为国内和平与统一障碍的军阀之理由,(二)指出须反抗为中国自由与独立障碍的国际帝国主义之理由;进行的方法是援助民主革命的国民党继续民主革命;更具体些是主张集合各阶级觉悟的大群众,组织国民军,以国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解除国内外的一切压迫,建设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同时根据这个革命的政策之理论,反对当时一切非革命的理论,如“法统说”、“制宪说”、“武力统一说”、“联省自治说”、“整理财政澄清选举说”等。在此时我们总的政治口号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的。第一、“民主革命”这一口号,乃在我们未刊行本报前提出的,这口号一方面是继续着辛亥革命的观念而来,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军阀无论皖、奉或直,无一不是武力专政的魔王,让他们统治中国,民主政治是丝毫没有希望的;随后,我们以为真的民主政治固然是我们所需要,然而民主革命这个口号,

未免偏于纯资产阶级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决没有欧洲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革命之可能，所以在本报第二期《造国论》上，便改用“国民革命”来代替“民主革命”这个口号，这一个口号，不但近来经国民党采用，成了全国普遍的口号，并且实际上适合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各阶级联合革命的需要。第二、“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两个口号，是我们分析并归纳中国一切乱源而定出的，始终是我们一切政策之骨干；然而最初喊出这两个口号的时候，我们的声势非常之孤，研究系的报上，笑我们扛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两块招牌，尤其“打倒帝国主义”这一个口号，民众多不了解，甚至有人说是海外奇谈；但后来革命的工人和学生首先采用了，国民党中一部分革命派也采用了，到现在，一部分进步的教授和商人也采用了，甚至于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和一班工贼，他们向民众攻击共产党，有时不得不自称他们也反对帝国主义，因为他们恐怕若不如此说，民众会马上看出他们是帝国主义者的走狗；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本报所号召的“打倒帝国主义”这一口号已经深入民众了。

从第一次直奉战争到次年（民国十二年）“二七”京汉屠杀事件，这半年间，直系军阀的反动日甚一日，在北京中央政府，在各省直系军人及其附属品——政客之横暴，惹起各地进步分子，不断的反抗，至“二七”京汉屠杀案发生，直系军阀之反动已达最高度，正式与民众宣战。此时本报的主张是：统一国民运动的势力，打倒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这在统一的国民运动中，（一）须排斥外国帝国主义的势力，以绝军阀后援；（二）武装平民；（三）须主张民主统一，反对北洋正统的武力统一；（四）须集合各团体，在国民革命中心地方，开一国民代表大会，以议定一切战略；（五）须各派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要有一个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六）须认定劳动阶级是国民运动中的重要部分，知识阶级、工商阶级都应竭力赞助工人阶级的组织及运动，与之平等的结合。在这一反对直系军阀时期，本报为鼓动积极的民族革命运动，遂不得不反对当时

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和孙中山的直、奉、皖、西南四派提携和平统一之主张。

从“二七”屠杀到去年(民国十三年)第二次直奉战争,这一年半间,是直系军阀全盛时代,中间经过黎元洪出走和曹锟贿选两次变故,中央政局现出向所未有的腐败与紊乱,各帝国主义者乘此局面,自临城案起,四方八面的向中国进攻;同时,中俄协定适在此时期成立,苏俄自动的放弃了种种特权,相形之下,愈加使中国民众看出帝国主义者对华政策之残暴无理,此为现在“五卅”运动的重大动因之一。

黎元洪出走离“二七”屠杀只四个月,工人阶级尚未能恢复集中其势力,出来向直系军阀作战,拥黎的政学会,想联合安福、交通等系成为反曹同盟,他们共同的政策是运动国会议员南下,然而他们各自的目的不同,政学会想国会南下拥黎,安福、交通意在拥段再出,同床异梦,他们的反曹同盟计划自然有始无终。当时上海总商会也表示反对直系,尤其是反对曹锟,其所组织的民治委员会,因与民众隔离及内部冲突,随即无形消灭。此时我们反对那已经投降直系军阀背叛国民的国会议员们,有南下解决国事的权能,更不信政学、安福等政蠹拥黎拥段能得民众的同情。我们乃向国民党提议,要他在上海号召全国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的国民会议,来取决国事。我们知道国民会议这个运动即令一时不能实现,亦须继续不断的宣传,于武装暴动外,给民众一个撇开军阀、官僚、议员、政客,自己出来解决国事的一条和平道路,实际上是集中民众势力行向革命的道路。黎元洪出走后四个月,曹锟于双十节贿选登台,登台后立即承认临城案全部要求,以为各国公使觐见的交换条件,帝国主义者知道曹锟的贿选为中国舆论所不容,非假外力不能自存,于是乘机敲诈,无所不至。此时民众深恶曹锟与曹锟损害于民众利益的,还不在贿选之道德的法律的问题,乃是媚外卖国的实际问题。此时本报的主张,于“打倒国贼曹锟”之外,还要同时努力做:

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承认苏俄；

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扩大国民党。

其结果，乃发生国民党改组及反帝国主义同盟、废约同盟、反基督教同盟等组织和宣传运动。这两件事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开始之显著的表现，惹引了帝国主义者十分注意。适于此时，因广州政府向税务司索取关余事，帝国主义者大派军船到广州示威，广州的工人阶级及革命学生异常愤激，主张收回海关，而各地资产阶级因关余和内债基金有关，反同情于把持中国海关的帝国主义者。本报当时即向资产阶级指出帝国主义者，根据不平等条约，侵犯中国主权的五件具体事实：（一）把持海关；（二）领事裁判；（三）驻扎海陆军；（四）外币直接使用；（五）强迫租借领土。五项之中，尤以把持海关收税权，能够制中国工业发展的死命，中国的资产阶级应该加入工人、学生的收回海关运动。

去年十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军失败，中国政治上生了一大变化，即是：（一）民权民族运动之勃兴（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组织几遍全国，每个促成会都有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的要求）；（二）工人阶级之再起；（三）倾向国民革命的国民军之发现。直军失败，不过是这些变化之导火线，不是真正原因，其原因已潜伏在直系全盛之时，即是：（一）列强进攻和中俄协定，给民众以剧烈的刺激；（二）胶济路罢工胜利，全国铁路总工会秘密组织，上海电车工人要求成立工会，湘潭锰矿运工罢工，在直系全盛之后半期，在国民党改组之后，在民族运动刚要开始之时，中国工人阶级已渐渐恢复其反攻的力量；（三）国民党改组和反帝、废约、收回教育权之宣传，引起北方一部分军阀之民族的感情。这些原因，适逢直系失败，一派强大军阀势力统一而高压的局面一破，社会上各种潜伏的意志，遂乘时表现出来，而形成各种运动。本报应付此次政变的策略是：一方面告诉民众，不可妄想此次战争中，依赖任何一派胜利的军阀可以解救中国；一方面指明各省督军的和平会议有使军阀势力分而复合之危险；——只有召集全国人民团体的国民会议，才是解决中国政

治问题的道路。同时，国民党也主张由北京政府召集九种团体的国民会议。可是安福的段政府，并不但段政府，任何军阀政府，没有真正的人民武装，那会让真正国民的会议出现！民族运动和工人运动都起来了，民众的意志既然不能由国民会议的形式表现出来，遂郁积半年，一发而为“五卅”运动之怒潮。

我们这一次号召国民会议所得的效果，和黎元洪出走时大不相同，全国各地的国民会议促成会，都有群众的组织和要求的内容，在各种要求中，大半都首列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民族运动，已经有开始的基础了。然而盲目的帝国主义者仍旧几乎日日向中国进攻（见本报《外患日志》）。尤其是在上海：自工部局私刑打伤乐志华案起，紧接着美国轮船船主枪杀中国水手十六人；领事团要求推广上海租界；工部局自由越界筑路；工部局提议增加码头捐取缔印刷律及交易所注册；工部局派武装巡捕，为英商越界拆毁宜乐里房屋，驱逐房客，击伤二人，并拘捕房客联合会代表；领事团硬派智利驻沪领事有裁判权；美国人在华界组织三k党；工部局副捕头踢死工人叶乾章；哈尔滨路捕房西捕无故击伤某店伙；西人无故殴伤天寿里黄姓佣妇张月英；工部局搜查上海大学，逮捕《民国日报》记者，焚毁书籍；工部局因登载日本纱厂工人泣告书，控告《民国日报》、《商报》、《中华新报》，处以罚金之罪；日本纱厂无故枪杀工人顾正洪——积这些怨愤，“五卅”事变因此遂在上海发生。在这个运动的开始，有一部分英、美留学生，有意的或无意的说：大马路血案是西捕杀了人的法律问题，不必牵扯到对外的政治问题，本报乃大声疾呼，告诉民众，此次反抗屠杀案，乃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决不是什么个人间的法律问题；并向民众解释屠杀案所给与我们的教训：（一）不分英、美与日、法，一切帝国主义者践踏中国人是一致的；（二）帝国主义者践踏中国人是事实，不是共产党人捏造的；（三）认清了帝国主义的英、美、法、日等国，和非帝国主义的俄、德、奥等国之不同；（四）懂得了我们的民族自由运动不可被“过激”、“赤化”这些头衔吓退；认清了只有工人、学生是

此次运动中的勇士，各国的工人、学生都对于中国人表示同情，因此，我们的运动应该反抗践踏中国民众的帝国主义者，不是拿国家主义来排斥一切外国及外国人。本报当即主张：在上海召集全国工商学兵代表大会，议决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严责政府宣布；倘政府不肯执行此议决，立起国内战争，建设国民革命政府。随后全国民族运动的怒潮，因资产阶级之妥协和奉系军阀之高压，大多打击而陷于停顿状态；本报鉴于现状，遂主张改变此种民族争斗的新途径是：（一）改变上海、香港罢工政策，以经济要求及地方性质的政治要求为最低条件；（二）委托南北政府合组一外交委员会，来解决全国性质的对外根本问题；（三）开始国内战争，合全国的力量，打倒英、日帝国主义的走狗——奉天军阀。

我们相信今后中国民族运动之更大的发展，须在打倒奉天军阀及中国工农阶级的组织得到更大的发展自由之后。

原载《向导》第128期

署名：独秀

给戴季陶的一封信

(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一日)

季陶先生：

自国民党改组以后，排除共产派的运动，不曾一日停止过。这个运动的最初期代表人物，要算谢惠生先生和冯自由先生，其次便是马素和邓家彦两位先生；最近便轮到你季陶先生了。我现在把你列在他们一起，你必定不服，并且我也承认你的知识和行为都非他们可比；不过你关于排除共产派的根本理论和批评共产派的态度，实与他们无甚出入。单在这一点，就可以把你列在他们一起。邵元冲先生称你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这部书所说的道理，至今没有人说过，没有人这样明明白白地说他个透辟无遗，这完全不是事实。你所持排除共产派的根本理论和批评共产派的态度，你若细细检查冯自由等从前印行的《护党报》及一些攻击共产党的小册子，你便知道不是你的新发明，他们早已都说过了。同是一样的理论与态度，出于别人便是捣乱，出于著书能文的戴季陶先生，便说是“他在政治的负责地位所应该发表的”，世界上似乎无此道理吧！

戴季陶先生！你所写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那本小册中，错误的见解非常之多，如叙述中国民族文化之消失，如三民主义的帝国主义观等，现在且不讨论这些，只就你所持排除共产派的根本理论及批评共产派的态度，简单的和你谈谈。

在理论方面：

你及你们的根本错误，乃是只看见民族争斗的需要而不看见阶级争斗的需要。这句话我或者不曾说错，因为前几天你和我面谈时，也承认我们争辩的中心就是阶级争斗这一问

题。现在你在这本小册中也说：“看明白我们非得到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便甚么问题都无从说起。”“大家如果不把中国国家和民族的真实的需要认清楚，单是一时的盲进，……”“我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国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你们这种简单的思想浅薄的观察，真是荀子批评墨子的话“只见其齐不见其歧”，也就是所谓“读历史只读一段讲道理只讲一半”了。我们乃是唯物史观论者，决不是空想家，因此我们不但不否认中国民族争斗的需要，而且深感这个需要异常迫切，并且在事实上可以证明我们在民族争斗中的努力，不见得比你所谓单纯的国民党党员更少（你说我们“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这才真是害了空想病。”照你这几句话，确实你还不知道唯物史观是怎么一回事，便信口批评。信口批评，乃是政客攻击敌党的态度，而为真实的学术界所不许呵！）；可是若因为要完成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便抹杀阶级争斗的需要，以为这是“一味的盲进”，那便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种错误观念，不但抹杀了阶级的利益，并且使民族争斗之进行要受极大的损失。诚然，不只戴季陶先生你一人，我知道有许多人，都以为民族争斗最好是各阶级联合的争斗，若同时不停止阶级争斗，这种矛盾政策，岂不要破坏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么？在形式逻辑上看起来，民族争斗和阶级争斗同时并行，乃是一个矛盾的现象；但在事实逻辑（即辩证逻辑）上看起来，世间一切真理，都包含在变动不居的矛盾事实之中，不但事实是真理，矛盾的事实更是真理。中山先生说：“解决社会问题，要用事实做基础，不能专用学理的推论做方法。”这话真正不错。我们不但不能否认中国现社会已经有比前代更剧烈的阶级争斗这个事实，也并不能否认中国民族争斗中需要发展阶级争斗这个矛盾的事实。你开口闭口说我们空想，不顾事实，不认清国家和民族的真实需要，我现在正要和你谈谈事实和真实需要，绝不谈什么空的理论，看看到底谁是空想，谁是不顾事实。

你说“我们非得到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便甚么问题都无从说起。”这几句话是对的。可是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乃是用什么力量才可以达到我们国家自由民族平等之目的，若是不能解答这个实际问题，单是怀着得到国家自由民族平等的空想，便是只有目的而无方法，只望结果而不知造因了。我们究竟用什么力量才可以达到国家自由民族平等呢？这一问题，乃是国民革命各种问题中第一个重要的实际问题。用国民的力量吗？用全民的力量吗？这种笼统话，在讨论实际问题时，当然不应该说，当然只能说用国民中一大部分革命的民众之力量。在中国那些部分民众的力量是革命的呢？年来革命运动的各种事实已经答复了这个问题：在广东沙面、商团、东江杨刘诸役，工农阶级的民众是革命的呢？还是大商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在此次五卅运动中，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的而牺牲的，是上海、香港、广州、汉口、青岛、天津、南京的工人呢？还是这些地方的商人？汉口、天津、青岛商会向军阀告密，破坏爱国运动，各省商会破坏排货运动，在民族运动上又是甚么意义？以上这些事实已明白告诉我们：在民族争斗中实有阶级争斗之必要。这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命脉，大半操诸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之手，国内军阀又从而破坏之，在国民革命未有相当的成功以前，只有因缘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而生存的大商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民族的资产阶级在客观上很难发展。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决不会有欧洲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实现出来（这是辛亥革命未能完成之大原因）。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之成功，当以工农群众的力量之发展与集中为正比例；而工农群众的力量，又只有由其切身利益而从事阶级的组织与争斗，才能够发展与集中。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主张停止阶级争斗，便是破坏民族争斗之主要的力量。因此，我们便应该认识，阶级争斗即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也是必要的，不可把他和社会革命、劳农专政、实行共产并为

一谈。再者，在国民革命运动中我们若不承认有他民族援助的必要，我们便应该看清他民族中究竟是何阶级真能援助我们；在此次五卅运动中，德国、俄国、英国、法国、日本的无产阶级及共产党是如何不约而同的对我们表示热烈的同情，德、法等国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是如何不约而同的诬蔑我们讥笑我们。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民族运动和阶级运动之天然的密切关系。这一点中山先生看得最清楚，所以他坚决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党员可以跨国民党及和世界无产阶级的政党接近。

在你们或者要说，你们也不否认工农群众在国民革命中的力量，并且主张要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才能使他们为国民革命而奋斗；可是只宜立在国民最大多数幸福的见地上拥护工农的利益，不能立在阶级争斗的见地上面。其实你们若当真在行动上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便自然要形成阶级争斗；若只是把拥护工农利益这个口号写在论文上党纲上，当作一种不兑现的支票不去实行，那么自然不会有赞成阶级争斗的嫌疑，而同时却也不能够得到工农群众的了解。这是因为群众只有为具体的切身利益争斗而信仰某一政党，是不会为抽象的主义而信仰的。

或者你们又可以说，你们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不一定取争斗的形式，而可以仁爱之心感动资产阶级使之尊重工农群众的利益。这简直是欺骗工农群众的鬼话！厂主以仁爱之心待工人，地主以仁爱之心待佃农，这是百年难遇的传奇材料，一个实际争斗的政党，如何采用这样幻想的策略？“仁爱之心”这件东西，如果能够解决世界上实际利害上的冲突问题，那么，便可拿他感动清室让权于汉人；也可以拿他感动北洋军阀尊重民权；也可以拿他感动帝国主义者解放弱小民族，由他们自动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如此仁爱之道大行，一切被压迫者之革命争斗都用不着，都等是“一味的盲进”了。这种

话若出诸欺骗群众的牧师之口，则丝毫不足为奇；既是一个革命党员，即便万分不应该抄袭他们这种谬论！

或者你们又可以说，国民党应该代表各阶级的利益而争斗，如何能够只代表工农阶级的利益，而不顾资产阶级的利益呢？不错国民党不是一阶级的党，当然要代表各阶级的利益；可是国民党是应该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向外国帝国主义争斗，如收回关税主权等，而不应该代表资产阶级向穷苦的工农群众争斗呵！在对外谋民族解放对内谋政治自由这些运动上，固然是全国民的需要，尤其直接是资产阶级的需要；中国资产阶级为了这些需要，不但应该赞助国民党，并且不得不赞成各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运动，如果他们不是反革命的头办阶级。

你们或者又可以说，在革命运动中固然不能免阶级争斗的事实，即或者至有阶级争斗的需要；然而在国民党的理论组织上，如果阶级争斗说在国民党中盛行起来，如何能使国民党的理想统一组织强固呢？你所谓“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谅必也是此义。解答此义，可分数层：第一、国民党的政治理想，似乎不应该离开革命运动中社会的事实需要。前几天你也曾对我说，你决非反对阶级争斗这个事实，因为立在国民党地位乃不便主张之，若立在共产党地位，自然也要主张阶级争斗。其实政党的政治理想与政策应该建立在社会的事实需要之上，而社会的事实需要决没有建立在政党的理想与政策之上的道理；阶级争斗若果是一种社会的事实需要，国民党亦应主张之，若非社会的事实需要，即共产党亦不应主张之。第二、凡是一个社团之形成，必有他的理想共同点，就是他的利害共同点，为之维系，你所认共信，也不外此物。国民党的共信，只有对外谋民族解放，对内谋政治自由，换句话说，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三民主义若仅仅是一抽象名词，也可以做国民党的共信，倘加以具体的解释，便不

能成为公信，因为具体的解释三民主义，不能免阶级的共同见地；无产阶级的阶级争斗说若不能做国民党的公信，资产阶级的劳资调协说也不能做国民党的公信，因为国民党不是一阶级的党。第三、中国国民党既非一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那么，于公信（即共同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共同点）之外，便应该有别信（即各别阶级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各别点）存在。若以为这别信存在有害于党的理想统一与组织巩固，主张全党只许有一个公信，不许有别信存在，这分明是想把全党中各阶级的分子成为某一阶级化。可是这个野心的企图，在现时的中国国民党中，颇难实现，因为在他的组成分子之数量上质量上，都没有那一阶级的群众能够站在绝对主体地位，使党中他阶级的分子自然与之同化。你慨叹邓家彦等右派“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其实不是他们个人本性难移，乃是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阶级性难移呵！无产阶级的分子之本性难移也是一样。此外只有改造党的组织分子，由多阶级的而为一阶级的之一法；你或者现在已有此企图，一面斥右派为反革命为腐败分子公然主张淘汰他们，一面斥共产派是寄生政策，是不能完全信仰三民主义的异端，提议学从前奥匈国的组织，质之即是党外的合作，使中国国民党有自己的组织理论和策略，都完全自成统系。所谓自成统系，不用说是一面向右排斥反革命，一面向左排斥共产派。在右派（代表官僚及地主买办阶级）与共产派（代表工农阶级）之间，左右开刀，中峰特起，自然是立在民族的资产阶级地位。你所号召的单纯的国民党，至少也是促现在各阶级混合的党改变到资产阶级一阶级的党的过程。你如果真有这个企图，在理论上我们当然不必反对，因为政党随着阶级分化而演进，本应该是这样；在阶级壮大而分化剧烈的国家，不但资产阶级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政党截然分开，即资产阶级中，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和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还要分开，大资产阶级中，又分工

业、商业、农业、银行资本等各派的政党。然而在事实上，我们以为你这个企图，现在或者还失之稍早。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最初往往都只发生象中国国民党这样多阶级的政党，这种特殊现象，正由社会阶级分化之背景使然，因为政党是社会阶级之反映，不是个人的理想可以造成的。中国近代之阶级分化，同盟会自始即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内地学生、华侨商人）、无产阶级（华侨工人）及游民无产阶级（秘密会党）和官僚买办阶级（保皇、进步、研究这一派人）对抗；其次便是同盟会改为国民党后，加入了许多代表官僚、地主、买办阶级的分子，随后这些分子，又三次脱离国民党而与国民党对抗！前二次是因为国民党的首领要贯彻三民主义的革命，脱离出去政学会一派和联省自治一派，最后一次是因为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派之加入，他们又脱离出去一大批，即是所谓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他们三次脱离后，国民党中代表官僚、地主、买办阶级的分子，现在差不多快肃清了；所剩下的中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子，是不是也要分化呢？我们以为这种分化，现在还稍早一点。一是因为无产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还没象和官僚、地主、买办阶级之间的冲突那样利害；一是因为散漫的中小资产阶级，要想集中起来，形成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组成一个代表他单一阶级的政党（你所号召的单纯的国民党），谅必肯承认是代表单一阶级的党，你并且还主张这单纯的国民党仍须容纳工农民众，拥护他们的利益，在形式上似乎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其实某一政党之属某一阶级，是以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为标准，不能严格的以组成分子为标准。你所号召的单纯的国民党，所谓完全自成统系的理论，是以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为中心，一面排斥官僚买办阶级派之反革命，一面排斥无产阶级派之阶级争斗说，代以劳资调协说，以仁爱说欺骗工农群众，使他们安心尽那无权利的义务，为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牺牲，这显然是各国民族的资产阶级政党之共同

的理论，并不是你季陶先生所特创的。世界在这个理论下的政党很多，他们每每号称国民党，其实都只是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党，因为实际上他是代表自己单一阶级利益的，谁也不能相信这是目前可能的事实，你只要看现在的资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所表现的态度就明白了。这里有一个根本原因：民族的资产阶级之形成，是以本国的工业发展为主要条件；本国的工业发展，又以停止内乱、关税自主为主要条件；这岂是目前可能的事？你觉得向右固不好，向左也不好，可惜中间没有多大地方容你立足；凡是一个代表阶级的党，必须有根本阶级的民众做立足基础，全靠他阶级分子来同化，是不行的；目前还没有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如何能够组成一个代表他单一阶级的政党？事实上不可能而勉强使他分化，其结果，所谓单纯的国民党，其质量上或者比较现在单纯，组织上也比现在方便，可是在数量上，在行动上，都比现在要大大减色，这岂不是目前的革命运动中革命势力统一之一大损失？

你若细细考虑以上这些事实，便不会感觉到排除共产派是中国国民党内目前的紧要问题。

在态度方面：

你及你们的根本错误，乃是以为共产派加入国民党，不是促进国民党而是阴谋破坏国民党。你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那本小册中，在理论上事实上，指摘我们的话很多，此处不便具谈，只择你指摘我们阴谋破坏的部分，加以负责的答辩。

(一)你说我们：“只借中国国民党的躯壳，发展自己组织”，你又说我们：“只尽量在中国国民党当中扩张C.P.或C.Y.的组织，并且尽力的使非C.P.非C.Y.的党员，失却训练工作的余地”。我不知你这些话从何说起？在理论上，C.P.和C.Y.之发展，须以有阶级觉悟并真能实际参加阶级斗争的分子为合格，决不是随便在国民党党员中可以扩张的；如果象你所

说,未必能够破坏国民党,实际却是破坏C.P.和C.Y.。在事实上,据我所知,年来由国民党员加入C.P.的很少很少,比较C.P.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百分之二,比较由C.P.介绍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千分之五,究竟是国民党帮助C.P.发展,还是C.P.帮助国民党发展呢?至于说到我们尽力的使非C.P.非C.Y.的党员,失却训练工作的余地,你未曾举出事实,我们不知你何所指;我们只不懂得,我们有何权力能够使非C.P.非C.Y.的国民党员得着失却训练的工作的余地?

(二)你说我们:“这一次在选举中所用的手段,所取的态度,很象要想一举便把非C.P.的排干净。”在理论上,一党中各派选举竞争,不一定是坏现象,大家对于选举冷淡,反不是好现象。在事实上,我们因为改组工作忙迫,于国民党代表大会及省党部选举运动,都无暇特别注意,或者有点抱歉。至于说想一举把非C.P.的排干净,在事实上这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吗?请你就近查看苏、浙两省当选的分子是怎样!

(三)你说我们:“只单纯的利用国民党政治的保护力和经济的维持力,扩张自己的生命。”除广东以外,我们不知这国民党在何处有政治的保护力?如果说在帝国主义者反动军阀势力之下,国民党不至和C.P.同受压迫,并且对于C.P.还有政治的保护力,恐怕这不是国民党名誉的事!至于说经济的维持力,我们更不懂解了,我现在负责向社会声明:中国共产党各级党部向来不曾和中国国民党发生过经济的关系!

(四)你说我们:用“纵横家的手腕”,“挑拨,想使蒋介石同志和许汝为同志冲突,……他们从中扩张势力。”提起这件事,使我十分沉痛!当时蒋、许两先生的意见冲突,已有长久的事实,并且其冲突还要发展到他们两人以外;我们以为这种冲突会使广州政府根本摇动,这实是中国革命运动一极大损失,因此想你能尽力调解这种冲突。这种内部冲突,实是革命政府一个生死关头,你实有能够调解的资格,却不披发纓冠而往

救，很悠游的坐在上海著书，已经不是革命家的态度了。不但如此，我向你报告这种冲突的危机，你闭着眼睛硬否认事实！你不悟掩蔽事实是无用的，反说是我们想挑拨蒋、许冲突，于中取利。此时中国只有仅少可用做革命的军事势力，因此，我们即对于由北方军阀势力蜕化出来的国民军，尚且不愿其内部有冲突事发生，何况是国民党的军队。如果有人挑拨许、蒋冲突，这不仅是损害国民党，简直是破坏中国的革命势力，简直是为英国和张作霖工作，简直是反革命的行为，你说他是纵横家的手腕，还未免太过客气了！至于我们一些不肯掩蔽事实的公开批评，你都看做是挑拨离间，这是由于你们以为我们加入国民党是阴谋破坏国民党之根本观念所致。

(五)你说我们：“绝对不许单纯的国民党员加入工人运动。如果在工人运动的同僚当中，发现出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员，便不惜运用种种的手段去诬蔑他，破坏他，务必要使这一个人不能立足而后已。这一件事的证据已经发现得不少了。”这些不少的证据，你不曾举出一个来，我们视为憾事！若是指在北方的张德惠、杨德甫、湛小岑和上海工团联合会一班人，还是不举出来的好，免得所谓单纯的国民党员在工人群众中丧失信用。可是我们绝对没有权力不许这班人加入工人运动，你应该知道香港和广州的工会领袖大多数都是单纯的国民党员。

此外我还有两件事要忠告你：

(一)当年康梁辈反对同盟会的革命说，大呼革命共和足以召瓜分亡国的话来吓人；现在你反对阶级争斗说，也大呼“使国民吃不必要的痛苦，负无所得的牺牲，那就真可怜极了”，“把青年的思想化成僵石”，“不能不替中国悲伤”等话来吓人，真可以不必。康、梁辈以为君主立宪尽可达到政治改造之目的，主张共和革命者，何尝不是使国民吃不必要的痛苦，负无所得的牺牲呢？

(二)邵元冲先生说：“一个团体必须有一种传统惯例或习惯，存在于团体成员的意识中……新团体员的加入，第一要紧是承认传统惯例和习惯。”这几句话或者道着了国民党改组后内部纠纷之真正原因。改组以前，国民党的传统惯例和习惯究竟怎么？然而你又深叹旧党员们“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似乎你对于党的旧有惯例和习惯，也怀着多少反叛思想。戴季陶先生！我也知道必有许多人要利用你的著作，做反动宣传。你不应当只恨他们利用你的著作，你须仔细想想你这个著作为甚么能够为反动派利用，对于这一点，你须深加省惕！

十四年八月卅日

原载《向导》第129、130期

署名：独秀

加伦将军的分身法

(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一日)

上海《新闻报》电传：广东“民政俄人鲍罗庭签字，军政加伦将军签字。”其实加伦将军早已回到北京，现在在广东签字的，是他用分身法呢，还是用扶乩的方法？

原载《向导》第129期

署名：实

戴季陶与反共产派运动

(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一日)

北京国民党俱乐部开会，议决通电粤、桂将领，一致讨伐广东共产政府，并联合同志发行反共产出版物。最好这些反共产的出版物，都请戴季陶去主持，因为戴季陶近来的思想都和该俱乐部前月卅一日发出的通电根本相同。

原载《向导》第129期

署名：实

可怜的段政府

(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一日)

段政府因为奉军在天津查获了几批国民军购来的外械，发令通告各省区此后禁止购买外国军械，此命令应该再加上一句：“但东三省不在此禁令之内。”如此更可以买奉天军阀的欢心，可怜的段政府！

原载《向导》第129期

署名：实

奉军在北京之治外法权

(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一日)

奉军驻京机关，因北京《民报》误载张作霖逝世消息，既将该报发封了，并直接逮捕该报经理陈友仁，押送天津奉军之法课，听说还要解到奉天去。北京自有司法及负地方责任的军警机关，奉军何以能够撇开这些机关，自己封报馆捕记者，捕人后还要解出北京？即令奉军在北京享有治外法权，可以自行拿人治罪，也不必由北京解到天津或奉天！这种举动，未免使段政府的面子太难堪了！但这乃是军阀的惯例，从前曹军逮捕长辛店工人，也是不解北京而送到保定府；不过长辛店毕竟还不北京城内！

原载《向导》第129期

署名：实

我们对于关税问题的意见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现在的中国关税问题，已经不是一简单问题；不但在中国民族之经济的解放是第一重要关键，中国人民应该力争关税自主，帝国主义者间及军阀间，都会因此次中国关税问题，惹起极大冲突。

英国帝国主义者，对付五卅怒潮的政策，一眼看定中国军阀政府只要有钱便肯卖国，故五卅运动一开始，他便提议和五卅事件毫不相关的关税会议，以饵中国军阀政府，使之抑制中国人民的民族运动，他这政策现在果然收效了。关税会议如果真能平息五卅怒潮，关税会议如果只能有二五加税的结果，则英国所得已多，所损失的进口加税，以他的精制品，比日本的粗制品所损失的犹少。

然而帝国主义的日本，为什么也赞成关税会议呢？日本有大宗粗制的日用品输入中国，因增加进口固小有损失，但是他能在关税会议攫取中国总税务司的地位，则所得甚大，保证西原借款的利益，犹在其次。对华贸易额，日本已驾英国而上，居于第一位，在法律上已有取得中国总税务司之口实；在政治上又有安福政府的暗助，他看出奉张会竟至袒英，遂乘国民党与国民军有单独对英的主张，设法接近他们，利用他们，尤其要利用冯军，以威吓奉张，因此或者能遂其野心。不过总税务司一致用日本人，便是支配中国财政的特权从英国手里，转移到日本手里，这件事英国帝国主义者又何能忍？

美国帝国主义者，又何以赞成关税会议呢？美国对华贸易额本不甚巨，受中国进口加税的影响尚小，却正可因缘关税会议，发挥其华盛顿会议之最得意的主张——门户洞开，机会均等。关于

总税务司问题，美国必助英而抗日。

法国帝国主义者，对华贸易更不及美国，所以也赞成中国关税会议，藉此保证其金佛郎案所得利益。英、法两个帝国主义者冲突甚烈，关于中国总税务司问题，法国会左袒日本。

以上是帝国主义者之间在中国关税会议中的利害冲突。

在国内军阀方面，无耻的奉张，对于各地五卅运动，始终是用高压政策，把参加五卅运动的主要团体看做眼中钉，时刻想拔去而后快心；可是到了由五卅运动所唤醒帝国主义者久已忘了的关税会议，他却当仁不让，想垄断未来的二五加税，使梁士诒组阁，做他的外府。安福政府，对于日本想攫取中国总税务司，固然是一桩好买卖，就是二五加税，他们不到山穷水尽，也未必肯睁着眼让奉张拿去，段、张闻也许为此问题，由暗斗而至明争。恐怕民众运动拆散了他们二五加税的好梦而取高压政策，这是段、张同样的心事。以前段政府因为藉外交以固位的政策，对于民众运动，取敷衍态度，现在不但修改不平等条约已抛到九霄云外，而且深恐爱国人民坚持关税自主，触怒了外人，破坏他快到手的财喜，——二五加税，因此拿出本来面目，公然禁止罢工，干涉集会结社，查禁共产党，封闭报馆，封闭上海的一切工会并拿办其领袖，以取悦于外人了！攫得二五加税者非张即段，当然于冯无与，所以冯主张关税自主，不主张在现制之下要求加税；可是他近来颇接近日本，将来关于总税务司问题，他是否能够贯彻关税自主的主张而不袒，还是一个疑问。

以上是军阀们对于关税会议的利害冲突。

我们中国人民，尤其是五卅以来参加民族运动的民众，对于此次关税会议，应采取如何态度呢？会议是定要开的了，我们不必根本反对这个会议，我们要在这个会议废止现行的协定关税制，中国的海关，应归中国国家自主，我们反对继续现行制度，在现制度之下要求加税。在现制之下要求加税，即使不以废厘为条件，进口加二·五，每年不过二千万元左右，而加至一二·五，也不过七千万元左

右,以岁收二千万元或七千万元,出卖国家主权及国民经济发展之命脉,军阀政府固优为之,人民决不甘如此!

我们所谓关税自主,具体说起来,乃指税则自主与管理自主二事。税则能自主,然后进口税何项应加重(如奢侈品),何项应减少(如机器及教育用品),出口税何项免税(如丝、茶及工业制品),何项应重税或竟至禁止出口(如谷物及棉花等工业原料),才能够照实际需要,随时自由增减,以保护本国工商业之发展,这就叫做保护关税政策。管理能自主,然后税务司不论任用本国人或外国人,一切用人行政支配税款,才能由中国自由处置。现在中国的海关,税则不自主,无论进口或出口,都须得外人同意,不但不能自由加税,并自由减税或免税也不能;管理不自主,全国税务司等高级职员千余人中,竟至无一华人,总税务司则须任用对华贸易最优越国之人,大权外移,驯至中国政府不能够支配税务司,税务司倒可以支配中国政府;不但海关税收不存中国银行,并且拒绝中国钞票。这样不自主的海关,在名义上虽然是中国海关,实际上,简直是外国帝国主义者管理中国财政,保护外国工商业和阻碍中国工商业发展的总机关。

因此,海关自主与否,的确是中国民族之经济的解放第一重要关键,倘舍此不图,只想在不自主的现行关税制之下增加关税,则保护关税政策不行,国民经济便无自由发展之望,即所加之税,无论加至若干,也是用整理外债及政费名义,归到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国内军阀手中,于中国国民毫无利益可言;不但无利益,而且进口税一加,物价因之高涨,常言道“羊毛出在羊身上”,所增税额,仍要辗转归消费者中国国民担负。五卅以来,中国国民流了多量热血,倘若连一部分经济解放的关税自主都不得着,结果反要国民拿出血汗来增加帝国主义者军阀的收入,如此,五卅运动,不算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成了为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增加收入的运动了,试问我们怎能甘心!

现在关税会议快开了,凡是中国人,都应该奋起力争关税自

主,反对在现行关税制度之下要求加税,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等一切人民团体,都应该立即表示一致的态度;对于在此次关税会议不承认中国关税自主的国家,加以罢工排货的长期抵制;对于只图加税不力争关税自主的中国政府,立即请他下野。

中国如果真有爱国的军人,他能拿起枪来讨伐卖国军阀,则这种战争,才不是军阀间的地盘战争,才比什么直皖战争、直奉战争、国(国民军)奉战争都有价值,因为他是爱国与卖国之战争,不是为了一派军阀的个人私利。

我们也要忠告全国商会,你们须要坚持现在的态度,并须联合全国各阶级的民众,力争关税自主到底,不可因为容你们在内债方面分得点脏便中途妥协;更不可持单独对英的谬论,附和安福政府为日本人争得总税务司地位!

我们说要废除领事裁判权,帝国主义说要调查司法;我们说要关税自主,帝国主义者又说要调查什么?除不平等条约外,帝国主义者直无丝毫理由可以拒绝中国关税自主的要求。若以担保外债及庚子赔款为词,也是无理取闹,即令我们不否认外债及庚子赔款,关税自主仍与外债及赔款之担保无伤,因为用做担保的只是海关收入,并不是海关主权——税则制定权及管理权。

裁撤厘金,固然是全国人民急迫的要求,但绝对不可拿做关税自主及加税的条件;因为关税应该自主,厘税本来自主,裁厘应该是自动的,关税自主及加税应该无条件的。

我们所要求的关税自主,不但是无条件的,尤其应该马上实行,不加限期,有条件有限期的关税自主,便是帝国主义者一个骗局。在限期未到以前,他们当然不须实行,不妨仅以口惠和缓中国人民的空气,即将来限期到时,他们又可藉口中国未曾履行某项条件,搁置前议,华盛顿会议关于中国关税会议之执行延宕至今,便是一个榜样,这也是关税自主运动中,我们应该注意的一要点!

原载《向导》第131期

署名:独秀

“赤化”与“过激”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每个爱国运动发生，帝国主义者便大喊是：“赤化”、“过激”。现在江西方小军阀逮捕焚烧英货的学生后，复派人检查各学校有无“赤化”形迹，仿佛爱国运动只有赤化的先生们才肯去做的，如此，赤化！赤化！你真可宝贵了！

原载《向导》第131期

署名：实

康有为与奉系军阀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康有为是一个著名的复辟犯，不但是既往，现在还是继续活动。他于本月六日由青岛到济南，公然下榻督办署，公然到东鲁中学讲演，马上还要到奉天去，这尚成何世界！奉天军阀一面压迫爱国工人学生，一面欢迎复辟犯，这又是何种世界！上海人只知道攻击江亢虎，未免有点欺弱吧！

原载《向导》第131期

署名：实

康有为、章士钊、戴季陶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戊戌前后的康有为，未尝不是一个新奇的怪物，随后那样开倒车。爱国学社的章士钊，何尝不反对康有为；即《甲寅》月刊时代的章士钊，又何尝不是论坛健将；现在也跟着康有为开倒车。《民权报》时代的戴季陶，何尝不大骂章士钊；《星期评论》的戴季陶，更是大谈其社会主义及工人运动；我盼望他将来不至跟着章士钊开倒车！

原载《向导》第131期

署名：实

段执政的《甲寅》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自《甲寅》周报出版，许多人责备章士钊过于开倒车，胡适之竟说“老章又反叛了”，滑稽的吴老头儿更至登报报告“友丧”。其实大家都错怪了章士钊，因为《甲寅》周报乃是段祺瑞的机关报，并不是章士钊的机关报，只看该报登载许多肉麻的话恭维段执政便知道。又有人说：《甲寅》周报记者孤桐，不是章士钊吗？这我更为章士钊辩护了，办理《甲寅》周报的股款，都被章士钊送到交易所了，现在不恭维段祺瑞，这周报那来的经费出版，而且教育总长的位置又如何保得住？

原载《向导》第131期

署名：实

资产阶级的民生主义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呈请戒严司令部,出示禁止罢工,“以维实业而保穷‘民生’计”。这些仁爱的资本家,想必是受了戴季陶的感化,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

原载《向导》第131期

署名:实

奉军之大义灭亲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上海戒严司令部封禁各工会的布告,是说因为“总工会以及不合法之各工会仍复有阻止工人上工”,又一布告说“甚至以暴力胁迫,提议条件,无理要求,……现值上工期内,竟有此等败类阻挠上工,试问是诚何心……所有阻挠上工之不良分子以及地棍流氓,应候查明拿办”。照他们军阀的意思,自五州来,这班中国的败类不良分子以及地棍流氓,鼓动工人罢工,已经使大英国、大日本国损失不小,现在应该无条件的上工了,提条件便是无理要求呵!大英国、大日本听到这个消息,必然又要笑着称赞奉军到底能办事,在天津在山东在上海,都能为了外人的利益,“大义灭亲”!这回若无奉军出力帮忙,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爱国运动,真是没有办法!

原载《向导》第131期

署名:实

帝国主义者不可无走狗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在天津在山东在上海,帝国主义者利用他们的走狗,压迫罢工运动,都收了效果;可是据上海《新闻报》香港电:除某国(指英国)外,驻粤各领事联合请求罢工委员会,取消对外罢工,恢复商业。为什么他们不用在上海的办法,要求广州军警封闭罢工委员会,反而向那“败类不良分子以及地棍流氓”所组织的罢工委员会去请求呢?帝国主义者必然说:这是因为我们选用的走狗杨希闵、魏邦平都失败逃走了!

原载《向导》第131期

署名:实

帝国主义者为什么帮助反动军阀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上海《新闻报》香港电:港商因汕头已为陈军占领,工人纠察队尽逃,故连日纷纷运货赴汕。这就是英国帝国主义者,不断的帮助陈炯明、杨希闵、魏邦平等反动军阀的唯一原因,也就是商人阶级疾视爱国运动的机关之唯一原因。

原载《向导》第131期

署名:实

今年双十节中之广州政府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二日)

现在的广州政府是继续辛亥以来的革命政府，现在的北京政府是继续前清以来的军阀官僚政府（即袁世凯亦称北京是一大臭虫窟）。这种历史的事实，是无人能够否认的。北京政府及其所统辖的各省虽然挂着一块民国招牌，实际上，一切制度、人物、思想、习惯，仍然是光宣时代的故物，一切民国成立的基本条件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仍然丝毫没有，连双十国庆的集会游行都被禁止，这是什么民国？这还有什么双十纪念之可言？

反之，革命的广州政府究竟是怎样呢？我们批评广州政府，应该把他分为两个时期：在讨伐杨、刘以前为一时期，讨伐杨、刘以后为一时期。在前一时期，广州政府建设在西南小军阀及买办阶级的势力之上，因此苛税杂捐、拉夫开赌，闹得一塌糊涂，实在不成个民国的形像；然而政府领袖们确是有革命意志的，他们眼见政府不能实行党义确是痛心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在广州政府之下是有相当自由的，所以我们自始即不能不承认广州政府比起北京政府来确是继续辛亥以来的革命政府。在后一时期，即讨伐杨、刘后的广州政府，乃建设在革命的民众与革命的军队之上，更完完全全的是一个革命政府了。这革命政府中可敬的领袖们，一秉中山先生不妥协的革命精神，对内毅然决然的废除苛税杂捐、拉夫开赌这些秕政，毅然决然的谋军政财政之统一，更毅然决然的驱逐那些寄生于秕政、阻挠军财统一的军事领袖，而毫不顾忌；对外则领导革命的民众，不计成败利钝的与香港政府作战，成了此次五卅运动中为民族利益最后力斗之孤军。如何拥护此为革命而力斗的孤军，使

他不至为英国帝国主义者及国内一切反革命的势力所破灭，这是今年双十纪念运动中全国革命的民众所应第一注意的事，因为双十节所纪念的是革命的势力之胜利，不是反革命的势力之胜利。

广州政府现称国民政府，我们可以承认他确能名副其实，他此时虽然未曾统一全国，而他的工作，都实实在在在那里代表中国民族的利益和英国帝国主义奋斗，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反动的军阀奋斗；这班国民政府的领袖，即是国民党的领袖，他们这种英勇奋斗，才真能把中山先生生平不妥协的革命主义完全表现出来了。只有这班英勇奋斗的领袖们才真是中山主义的信徒；若口称是中山主义的信徒，实际上还徘徊依违于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之间，那便是中山主义的叛徒；中山主义的信徒与叛徒，只有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才能够分别出来，别的著书立说都是欺人之谈。

民国六七年，京沪间的官僚甚至于国民党党员，对于中山先生有一个很流行的批评道：“孙中山是一个有革命癖的人，无论到何时他总要革命，恐怕他的儿子孙科做了总统，他还是要革命咧。”他们以为这几句话是讥诮孙中山的，殊不知这几句话却真能将中山先生可尊敬的全人格表现出来了。中山先生是世界上最忠实于革命事业的一个人，只要赞成他革命，虽巨恶如徐树铮、梁士诒，他也肯与之周旋，若不忠于革命，虽多年共患难的同志如黄兴、陈炯明，他也不惜与之决裂，若孙科为总统而不忠于民国，他当然起来革命。中山先生一生唯革命是志，从来不以爱憎亲疏易其志，在怕革命的东方民族中，他的确是杰出的人物，在国内一切主义不同的革命派都钦佩中山先生，也就在这一点。现在广州政府的领袖们，只计是非不顾利害的英勇奋斗，无论成败，中山有知，必定是含笑称赞的。十二年四月间，余正在大元帅府和中山先生谈话时，有人匆匆来报，大元帅府会计主任，为刘镇寰索饷不遂拘去，中山先生大怒，立召蒋介石参谋长，即谓须严惩此等不法军人，宁可失败而离开广东，也不可不和他们一斗，言时声色俱厉，其实当时所谓孙大元帅、蒋参谋长都是赤手空拳，此事终于隐忍过去。现在蒋介石先

生手创了有力的党军，用这包打军阀绝不扰民的党军，不顾成败利钝的肃清了那些拉夫开赌、苛税苛捐、各霸一方。历年扰害广东人民的滇、桂、粤各派小军阀，以图广东军政财政之统一，这不但为国为党建了惊人的勋劳，并且为死的中山先生出了多年力不从心的怨气。中山先生及他手创的中国国民党，倘若没有这几个月国民政府一面肃清内部恶势力，一面反抗外部恶势力的坚决举动，几乎使人民怀疑到什么三民主义，什么革命事业，都不过是欺骗人民的鬼话了！

现在和广州国民政府为敌的内外恶势力是些什么呢？国内恶势力出头来破坏国民政府的，为主的自然是陈炯明、林虎、洪兆麟、叶举、魏邦平、邓本殷这班括广东地皮还没有括够的小军阀。这班小军阀的势力，曾为革命的党军所击破，为什么现在又能结合起来向国民政府进攻？一是因为许崇智妥协姑息政策所留下的祸根；二是因为他们新近得了英国帝国主义者、北洋军阀、香港买办阶级各方面的援助。香港政府公开的送三百万子弹到汕头；港商资助陈炯明百多万现金，内中有一部分也是英人拿出来的；段政府帮助陈军三十万元，又派遣海筹、永绩两舰助战；福建派张毅的军队到潮州助战也是公开的；江西和湖南也正在准备援助陈军向粤进攻。陈炯明等除了得到上述各方面的实力帮助以外，还有国民党中反动派的声援，谢持、石青阳等勾结熊克武，密谋在广州响应陈军；北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公开的和陈炯明、杨希闵合作，该俱乐部所挥霍的就是段祺瑞所给杨希闵的招待费三万元，他们更打算广东外交代表团到京时，开会欢迎林森、邹鲁等代表，劝其通电联陈反蒋；廖案一大批罪犯，更是奔走上海、香港间密谋勾结广州残余的反动军队，候在党军出征东江时，起来叛变。陈炯明等小军阀、香港买办阶级及国民党中的反动派，他们攻击国民政府之共同口号就是“反共产”，和以前唐继尧勾结杨、刘在广州谋叛的口号一样；其实广州国民政府里，可以说没有一个共产党党员，更未曾并且未打算采行一点共产政策（反动派军队所衔恨的国民政府政策，如军政财政统

一及废除苛税杂捐、禁止拉夫赌博等，难道都是共产政策吗?)。

他们所谓共产，便是指革命，“反共产便是反革命”，这就是他们的逻辑，他们的罪状，真是不打自供了。国民党中又有一班新的右派分子，口头上自称是中山主义的信徒，实际上对于真能为中山主义在广州奋斗的左派，不但心憎腹诽，并且公然致函蒋介石阻其急进，又请张静江函劝蒋介石离开广东；他们这种举动，实际上也算帮了陈炯明的忙，虽然他们在口头上不赞成陈炯明与反动派。

国外的恶势力，不用说主要的就是英国帝国主义者，抑制中国民族运动与抑制代表中国民族运动的国民党，以期长久保持他们的在华特权，这本是一切帝国主义者的对华政策，尤其是英国的香港政府对于广东的政策。广东迫近香港，恰好近几年来广东的政权又落在代表中国民族运动的国民党人手中，真所谓“冤家狭路分外眼明”，因此香港政府不断的利用陈炯明，利用商团，利用杨刘，阴谋破坏广州政府。可是他的阴谋都着着失败了，尤其是杨刘失败后，英人失了一切破坏国民党政府的工具，同时香港沙面大罢工的工人得以广州为根据地，又以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得以坚持，使香港英人眼见每天损失四百万元，而不能使用在上海利用奉军压迫罢工的方法，英人正在无可如何，适逢粤军中的反动派领袖，反抗国民政府废除苛税杂捐，禁止拉夫开赌，统一军政，统一财政等政策，香港英人遂乘机利用之以成刺廖案；幸而国民政府有肃清内奸的决心，不姑息的逮捕诸反动领袖，解散诸反动军队，是时香港英人老羞成怒，遂至鼓吹直接以武力攻取广东，美其名曰为中国谋统一，究因国际形势不容英人能够这样横行，其计又不得逞，于是决心再以实力援助陈炯明、魏邦平、邓本殷等，以成现在东南两路夹攻广州国民政府的局面；全国的反动派——北洋军阀，香港大商买办阶级，陈炯明、林虎、魏邦平等小军阀，国民党的反动派，遂在此局面之下，形成了中国反革命的大联合，一齐拿着“反共产”、“反苏俄”的旗帜，向广州国民政府进攻，为英国帝国主义效劳！据本月八日路透社香港电说：“港督今日在立法议会提出预算时演说，谓

渠信广东有智识之人，必不能再容外方及他省营利之徒施行暴政，大约本年底来年初可望恢复秩序。……今在本地募债，未必成功，而此时请助于伦敦市场，据所接英国消息观之，亦属不利，盖投资者以为香港状况不佳，非有极优之条件必多迟疑也。故非俟过激党破坏香港之企图已遭失败，不宜募债云云。”在这小小一段演说中，我们可以看出几点：（一）他所谓过激派（英人眼中的过激派，一切爱国运动者都包含在内，国民党的左派领袖如汪精卫、蒋介石等，更不用说了。）破坏香港之企图，所加于香港英人经济的打击，实在万分明显，所以他不得不运用阴谋，利用中国一切反革命的势力，推倒广东革命的势力；（二）他明白供认他曾经教唆广东有智识之人（当然是陈炯明）排斥外省人，排斥客军；（三）他已经很有把握的计算他所利用各方面的势力，在本年底来年初可以占领广州；（四）香港的经济状况，已无法得到伦敦的救助，只有俟反共产反苏俄的广东有智识之人占领广州，使过激党破坏香港之企图遭了失败，才有救星；（五）革命派及反革命派在广东之成败，关系香港英国帝国主义者之利害，是非常明显的了。

这样在内外之恶势力四面八方的进攻之下，广州国民政府也会失败，如果失败了，失败的不只是广州国民政府，实在是全中国民族运动中最重要的一命脉。成功的是谁？不用说是陈炯明及国民党的反动派，尤其是香港英国帝国主义者。这就是全中国革命的民众在今年双十纪念中所以不应忽视这一件大事的原故，更不可把这件大事看做广东的局部问题！

又有人以为广州国民政府联俄拒英，不免以狼易虎，失了民族运动的意义。象这种错误的观念，实是中国民族运动一大危机。第一我们应该明白：所谓民族运动，其意义是要求民族的自由与独立，不受他民族之政治的压迫与经济的剥削，决不是一民族的闭关主义，并且在这一民族运动中，要得到他民族同情的援助，才格外容易成功。第二我们应该明白：此时世界上各民族能够以实力援中国民族运动的，还只有苏俄，若印度、若土耳其、若朝鲜、若加哇

等被压迫的民族及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还只有精神的援助。第三我们应该明白：在理论上，援助被压迫的民族，是苏俄立国之信条，他若不以实力援助中国民族运动，便是言行不符；在事实上，苏俄也刚从西欧经济的剥削中解放出来，现时也还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四面进攻中，他正需要和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如印度、加哇等）及被压迫的国家（如中国、德国、土耳其等）结成联合战线，抵抗帝国主义之进攻，他援助中国，即是援助他自己，不但中国的民族运动不应避讳苏俄的援助，并且到了民族革命成功，还应该更进一步和苏俄缔结同盟，共同防御帝国主义之进攻。第四我们应该明白：在实际事例上，苏俄实行其立国信条，援助了土耳其的民族运动，援助了波斯的民族运动，援助了阿富汗的民族运动，都是无条件的同情援助，他对于土耳其、波斯、阿富汗不曾有过压迫和剥削的事实发生；即对于中国的中俄协定，苏俄自动的放弃了那帝国主义者经过五卅大流血还不肯放弃的许多权利，他所得的是什么？苏俄实是援助了广州国民政府，而都是无条件的，也丝毫没有什么压迫或剥削的事实发生过，若说聘用苏俄军官改造海陆军便是授权于外人，那便是把苏俄看做帝国主义的国家一样，不能够接受他军事的援助了。“赤色帝国主义”这一名词，是欧洲帝国主义者造出来离间一切被压迫的民族与国家，和苏俄联结的方法，现在中国有些反革命分子，也跟着学舌，真是“国家将亡必有妖孽”！

帝国主义者好比是些强盗，苏俄好比是和我们守望相助的邻人，若把邻人也看做强盗，拒绝他们的援助，这正是强盗们暗中称快的事。象陈炯明等及国民党的反动派，更是要竖起大旗来帮强盗攻打邻人，所以他们竟会把“联俄”算做广州国民政府的一桩罪状。

原载《向导》第133期

署名：独秀

反奉运动与法统问题

(一九二五年十月三十日)

我们为什么反奉？这是因为奉系已成为国内最有势力的军阀，他对内可以造成一派军阀势力统一中国的局面，使军阀政治格外演进，他对外可以成为帝国主义者最有力的最信託的工具，使民族运动格外遇着摧残；所以我们反奉之目的是在对外的到民族的自由，对内的到政治的自由，这本来非常简单而明瞭。

一个简单明瞭的反奉问题，现在却含着一些复杂性质，这是因为反奉运动中潜伏了直系复兴的危险。

不用说，直系是一派反动的军阀，他不但以前是反动的，现在仍旧是反动的，他的反动性并不减于奉系，然而他现在支配政局的力量却非奉系可比，他在反奉运动中的力量，比起民众及国民党国民军来，他只是百分之几。在这全国反奉运动中，虽只百分之几的力量，我们自然也应该一律欢迎，若在反奉运动中攻反奉之直，客观上便是助奉了。同时我们也要明白告诉直系，人民虽不念旧，而现在只是为对外的到民族的自由、对内的到政治的自由而反奉，决不能为曹、吴复仇——直系复兴而反奉。所以章太炎还知道说：“吴佩孚出山讨奉，目的须纯在国家，方可得国民同情，若涉报复或争地盘，则不可预知。”

为曹、吴复仇直系复兴而举兵反奉，当然是直系真实的心理，由这种心理而表现出来的政策，就是所谓维持法统。在吴佩孚、孙传芳通电中虽然未曾涉及法统问题，章太炎致岳维峻电中虽然明言此时不议及此问题，而事实上直系终须用法统这个假面，做他们复仇复兴之工具。他们所谓法统有二解：军人派所谓法统是指曹錕

的宪法，政客派所谓法统是指民国约法。维持前一个法统，便是所谓护宪，也便是拥护曹锟；民众对于贿选的余怒犹未全息，直系若拿出护宪拥曹的旗帜，直是为奉方宣传，直是自杀政策，直系中稍稍有点头脑的人当不出此。维持后一个法统，便是拥护约法，即是讨段；段祺瑞、章士钊诡称革命破坏约法，自然是可笑的很；但是约法本身的好坏且不论，此时民众迫切的要求是：关税自主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对外的民族自由，和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等对内的政治自由，决不是什么一纸空文的约法可以使民众满足的。况且缘约法法统而发生的问题，便是恢复旧国会，这种千夫所指的旧国会，即令没有选举吴佩孚为大总统的预定计划，即令除去贿选分子，也不能得国民之信任了。现在救济这个法律之穷的出路，惟有倒奉后，在事实上占据北京政府者，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解决一切国家根本问题。所谓国家根本问题，正是现在民众迫切要求的对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关税自主，对内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因为这才是中华民国真实存在之基础，写在纸上的宪法还在其次。

什么法统问题，决非民众的迫切需要，不过是直系拿来作面具，来遮掩他们为曹、吴复仇直系复兴而举兵反奉的隐衷罢了。

所以为反奉而战，虽直系我们也可以不因既往而阻挠他们现在的行动；他们若终于为法统而战（实际上是为直系正统而战），民众反奉胜利之后，继以反直，这也是意中的事。

原载《向导》第134期

署名：独秀

戴季陶之道不孤矣

(一九二五年十月三十日)

张作霖的爪牙张宗昌在国庆日演说：“我中华立国四千年来，莫不以道德为根基，山东系圣贤桑梓之地，尤为注重，而近年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二字，几致沦亡，其弊端约有五项：（中略）三则我国学生，自沾染新文化后，日趋日下，近来各校添设讲经，实所以挽已倒之狂澜；四则近日之工潮，若赤俄传来之共产等语，贻害人民，良非浅鲜，非严加取缔不可。……”赵恒惕的走狗荆嗣佑在长沙报上发表组织国民党的谈话说：“我们有一重要的话，要普告国民大众，就是我们要以中国的人力，中国的方法，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要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志，正人伦，明天道。我所谓中国方法，就是指王道而言，王道之纲要有三：一曰黎民不饥不寒养生送死无憾；二曰谨庠序之教；三曰申之以孝悌之义。”想用旧的道德文化救国之戴季陶，想把中山先生从被人轻侮的革命党方面拉到被人尊敬的圣贤方面来继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的道统之戴季陶，他听了张、荆二位的议论，定会眉开眼笑的说一声“吾道不孤矣”！

原载《向导》第134期

署名：实

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一九二五年十月三十日)

近年来每一运动发生,反动派便说是共产党主持的,以至段祺瑞、张作霖都发严令光顾到中国共产党,李景林、张宗昌告诫人民勿信共产党的告示,更是贴遍了直隶、山东全省的城镇乡,为共产党登了一个大规模的广告,并且一般痛恨李景林、张宗昌苛税的乡民,反疑心共产党或者不错。浙军一到上海便首先注意共产党,吴佩孚一到汉口便对路透社记者说:“彼殊反对共产党与过激党,若辈皆害国之徒,渠拟以坚决手段对付之。”我们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有何等力量能够使军阀们这样惊心动魄!

原载《向导》第134期

署名:实

又是一个共产军!

(一九二五年十月三十日)

杨宇霆在天津对东方社记者说:“万一不幸而有国民军一致对抗奉军之事,是则共产军与反共产之战争,正期待日本以下列国之同情与援助云云。”说国民党的军队是共产军,已经是离奇了,现在又说国民军是共产军,岂非奇之又奇?树起反共产的旗帜以求得帝国主义之援助,这是全中国南北大小军阀一致的策略呵!

原载《向导》第134期

署名:实

十月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

受了帝国主义侵略八十余年的中国，为什么欧战后渐渐才有了有意识的民族运动？这是因为：（一）在客观上，一方面中国的工业乘欧洲大战机会一时有了相当的发展；一方面大战后帝国主义者因弥补战中的损失，加紧向中国等经济落后的民族剥削进攻，促起了反抗。（二）在主观上，苏俄十月革命触动了中国青年学生及工人革命的情绪，并且立下了全世界各被压迫的国家及各弱小民族共同反抗帝国主义之大本营。

苏俄十月革命之内容是：（一）城市工人打倒资产阶级而得了自由；（二）乡村农民打倒地主阶级而得了自由；（三）俄国境内的小民族打倒俄皇及资产阶级的统治而得了自由；（四）全俄人民脱离西欧帝国主义的羁绊而得了自由。前二者是阶级运动，后二者是民族运动，合起来便是整个的世界革命之开端。这两种革命运动，在苏俄同时并行，不但没有妨害，而且正因为工农阶级奋起得了政权，对外拒绝与帝国主义的协约国合作，对内取消前俄帝国主义的政策，即强迫民族同化于大俄罗斯的政策，因此民族运动才得到彻底的解决，否则若照当时资产阶级的克伦斯基政府政策，至今全俄人民仍旧屈服在帝国主义的协约国羁绊之下，俄国境内诸小民族仍旧屈服在资本主义的大俄罗斯政府威权之下，这是毫无疑义的。

工农解放民族解放这种双管齐下的苏俄十月革命，他自身的成功并影响到世界革命，后者更胜过前者。盖自十月革命后，多年不能解决的俄国境内诸小民族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苏俄更进

而援助近东、远东诸弱小民族与被压迫的国家(如中国、土耳其、波斯、埃及、阿富汗等),建立了全世界被压迫者共同反抗压迫者——国际帝国主义之大本营;这些事实已足证明苏俄十月革命,在民族解放运动上比在工农解放运动上更为成功。

按道理讲起来,现在全世界凡是被压迫的阶级以及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都应该联合起来在这世界革命的大本营援助之下,共同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大家才有出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当然没有例外,也应该顺着这个世界革命的大潮进行;可是还有许多不了解世界大势的人们,竟不是这样想法。在一班深受了英美帝国主义教育毒的博士们,不但不承认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根本大患,并且不承认世界上真有什么帝国主义,仿佛是共产党人捏造的名词,因此,中国也自然没有民族解放运动之必要。这班人我们不必去论他。又有一班人很明白中国有民族解放运动之必要,并且明白非打倒帝国主义中国民族无由解放;可是他们以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只好完全依赖自己的力量,不必联络苏俄,因为联俄有三个危险:(一)是联俄中国便要实行共产了;(二)是联俄中国便要被俄国侵略甚至于被俄国占领了;(三)是联俄则帝国主义者更要严厉的对付中国了。他们因为怀疑联俄有这三个危险,遂至甘心退出全世界被压迫者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使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处于独立地位,这正是帝国主义者之所愿,而是中国之不幸呵!他们所怀疑的三个危险,现在略为解释如左。

第一、苏俄许多主要人物固然是共产主义者,苏俄实际政治固然也有若干小小部份采行了共产主义的政策;然而决没有不问青红皂白,随意推行于任何国家的道理,因为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宗教,决不能不待其国内自然发生而可以从外国宣传出来的。至于苏俄援助各弱小民族及被压迫的国家,这和共产运动更完全是没有连带关系的两件事。苏俄所援助的波斯与阿富汗,都还是专制君主的国家,难道也是共产运动吗?苏俄又曾援助蒙古,难道游牧的外蒙也能实行共产制度吗?苏俄确实援助广州政府,然而除了

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陈炯明等造谣以外，广东可曾采行一点共产制度呢？

第二、旧俄罗斯本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苏俄若要侵略中国，自然是继续旧俄政策，和其他帝国主义者作同样的行动，取同样的态度，他为什么对土耳其对波斯对阿富汗对中国，都放弃了旧俄所得一切特权，使一切帝国主义者异常恐怖呢？苏俄如果也是一个帝国主义者，便自然要站在帝国主义者那一边，决没有站在被压迫的民族这一边做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运动的道理。所谓赤色帝国主义这一名词，乃帝国主义者捏造出来离间被压迫民族和苏俄的结合，如果苏俄真是赤色帝国主义，我们便不必怕赤化了，帝国主义者也不必恐怖我们赤化了。在经济上说起来，苏俄方在刻意消灭资本主义，那里还有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可能，因为帝国主义乃是资本主义发展之最高形式；在政治上说起来，联合被压迫民族共同打倒帝国主义乃苏俄立国之方针，“对被压迫的民族只予不取”，乃列宁之遗训，他们对土耳其对波斯对阿富汗等，都不曾违背此遗训，岂有单要侵略中国之理。

第三、中国自来不曾联俄，帝国主义者对付我们不算不严厉了，反之土耳其、波斯、阿富汗，正因其民族运动得着苏俄援助而发展，帝国主义者遂有所顾忌而让步；即以中国近事而论，帝国主义者虽然大叫五卅运动是赤化，然而他们正因为中国有了赤化的五卅运动，终不得不于关税会议有相当的让步，尤其是他们对于联俄赤化的广东，五个月以上的总同盟罢工，几乎使香港变为荒岛，广东政府竟不许经过香港军商船进口，日船违令进口，政府军枪杀日本船员二名，日领只得一面向政府道歉，一面请求抚恤死者每人二千元，英、日帝国主义者竟未能以一枪一弹害广东。这是因为：（一）帝国主义者间的冲突甚烈，已没有向我们联合进攻之可能；（二）一切被压迫的民族与国家之民族革命，都有乘机奋起之势，帝国主义者已没有以武力消灭此革命大潮之可能；（三）各帝国主义的国家内，随时都有阶级革命爆发之可能，帝国主义者若以武力压

迫苏俄及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必为工人阶级所反对，尤其是运输工人足以制其军事运输之死命。并此诸因，我们可以看出帝国主义者严厉的以武力对付中国政策已不适用，他们今后的政策乃是：（一）以金钱军器收买中国军阀，替他们破坏中国民族运动；（二）教唆中国的反革命派，大喊其赤色帝国主义和反共产，以破坏中、俄联合；（三）以小恩小惠收买中国商人及英、美博士们，使他们协同军阀官僚阻挠工人、农民、学生运动之发展。我们敌人不但在国外并且在国内，他们都根本不要中国有民族解放运动，并不是因为联俄，帝国主义者才要严厉对付中国。

我们若明白上述三个联俄的危险都非事实，同时便自然明白全世界被压迫者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必要；并且同时便自然明白所谓“反苏俄”是破坏国外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之口号，所谓“反共产”是破坏国内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之口号。因为国外反帝国主义最烈的便是苏俄，国内反帝国主义最烈的便是共产党。

原载《向导》第135期

署名：独秀

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资本主义已发展到最后阶段，临了末运，所以现在全世界之资产阶级都站在被革命的地位而反动了。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原则上，他被压迫在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两重势力之下，应该有革命的要求；然而在实际上，他已是全世界反动的资产阶级之一部分，他所有应有的革命要求，很容易被他阶级的反动性消灭下去。

五卅运动起时，我们绝不死守成见，我们颇幻想在此次全国民族运动奋起大潮中，中国资产阶级或不能不相当的与一切革命的民众合作了。可是在事实上，中国资产阶级对于此次民族运动的态度，使我们的幻想终于是一个幻想，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不革命”这一公例，居然又在中国民族运动中证实了。

在全国的工人、学生流血奋斗正热烈中，而全国商人竟一致反对排货，天津、汉口、青岛的商会竟反对工人、学生之爱国运动，向军阀告密。上海资产阶级的九家大报，竟丝毫不肯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尤其是《时报》竟为工部局删改上海市民大会的电报，新申两报竟为工部局登载“诫言”。资产阶级的学者名流，即所谓高等华人梁启超、丁文江等，竟宣言要“友谊的磋商”与“双方谅解”，竟公然说：此次惨剧发生的责任究竟谁属，现犹不能断定，中外当局应先从事调查，真相明白然后始可言解决，现在之罢工、罢市、罢课的紧张局面，首先应设法使之和缓（宣言大意如此）。

上海是帝国主义者在华势力集中的地方，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最发达的地方，五卅事变恰恰发生上海；因此，上海资产阶级对于此事变之态度，可以说是代表全中国资产阶级之态度。他的态

度可分为四个时期略略述之：(甲)罢市之初为第一时期；(乙)从罢市到开市为第二时期；(丙)从开市到总工会被封为第三时期；(丁)从总工会被封到现在为第四时期。

五卅运动一开始，上海资产阶级即带反动倾向，其表现之事实是：一、经学生、工人群众胁迫而哀求，总商会始肯宣布罢市；二、当时一般群众的呼声是反对外国人惨杀同胞，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等，而商会在全市商店门窗所揭罢市要求，只是取消码头捐；三、罢市后总工会、学生会提议组织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以为全市运动指挥总机关，各马路商联总会赞成加入合作，而总商会则坚不肯加入；四、自六月一日罢市起至十日五卅委员会成立止，这十天当中，总商会都站在调人地位。在此时期中，上海资产阶级之妥协性及鄙弃民众的心理，已充分表现出来了。

在这时期中，资产阶级所表现的最反动事实，即是不顾民众的要求单独向帝国主义者提出条件问题。因为商联总会之牵制，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所提出的十七条件，已为民众所不满，而总商会则更蔑视民众的意见，迎合军阀政府委员的意旨，别自单独提出十三条，这十三条中，竟将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出的“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及“取消领事裁判权”这十二、十三两条完全撤销了，第六条优待工人当中，他们把“工人有组织工会罢工之自由”这一句也去掉了。他们这样的妥协，颇受了帝国主义者的嘉奖，当时《大陆报》说：“总商会的人是老成持重的，他们都是上海的大商家、大银行家，有体面负责任的人，他们是决不急进的”。他们的十三条并未为六国委员团所容纳，上海谈判决裂，总商会不但不坚决的作更进一步的示威反抗，反而并不和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协商而单独议决开市。

开市之宣言，本来说还要抵制英、日货物及援助停业工人，然而实际事实上是怎样呢？开市后，所谓抵制英、日货，不但是一句空话，而且因为学生会严厉的检查英、日货，和总商会及商联总会起了不断的纠纷与冲突，尤其是总商会以检查五卅以前存货之名为

推销英、日货开方便之门，和学生冲突甚烈。所谓援助停业工人，总商会和商联总会始终只是经收全国各处捐款，他们自己原来是一毛不拔的，开市后他们一致鼓吹单独对英，尤其是总商会更是勾串奉军戒严司令及交涉员压迫总工会令日厂罢工工人几等于无条件的上工；日厂上了工，工部局停止供给各厂电力，总商会不努力抵抗工部局，而又勾串军阀官僚压迫总工会令工部局电气处工人上工；总商会又主张码头工人上工两星期，专为中国商人运出存储英、日堆栈的货物，议定在此项存货物价三千余万元中提捐百分之一，约三十余万元，作为五万余码头工人一个月的救济费，此办法由总商会议定，此业务由总商会管理，其结果三千余万元的货物如期运尽，而缴纳的捐款只有三万余元，总商会简直不负责任，码头工人因此遂即不能继续罢工了。大部分罢工工人既已上工，总商会遂进而勾串奉军戒严司令部封闭总工会。总工会既已被封，所有英厂罢工工人，遂被迫而陆续上工了；至此，资产阶级所谓抵制英、日货，所谓援助停业工人，所谓单独对英，都成了公然的骗局！在此第三时期中，资产阶级已经是不掩饰的反动起来了。

奉军司令部的人说：封闭总工会是事前得了总商会同意的。虞和德对工人代表会的人说：你们代表会就是总工会的变相，断然不能存在，你们若能承认李征五去主持，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公开的存在。霍守华对人说：总工会不应该和总商会冲突，老实说，总工会被封的时候，总商会若肯出来说几句话，司令部是不能不顾忌的。照上述之种种说话，英、日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感激上海总商会的盛意了！总商会不但要和总工会过不去，近来并且指挥他的武装队（保卫团）和他的爪牙（警察厅长江政卿）帮同军阀摧残所有的工会及工人学校，查禁学生或工人的集会。在此第四期中，资产阶级的反动更有一个特点，就是中小商人的商联总会，以前和总商会是对抗的，比总商会是急进的，现在事事依附总商会，不敢自作主张了。他们跟着总商会反对学生、工人，跟着总商会不参加一切民众运动，秉承总商会的意旨，公然宣告没有恢复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之必

要。最可笑的是：学生会邀请商联总会共同发起各团体代表大会，主张关税自主，他们竟会说出“关税已经自主不须开会”的梦话来！

中国资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态度既是如此，那么，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要靠那些阶级的力量才能成功呢？在民族运动中，是否应该反对阶级争斗呢？这些问题，我们希望戴季陶主义者及国家主义者有一个忠实的解答。

原载《向导》第136期

署名：独秀

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日）

我们要明白国民党中的左、右派是什么，这不但是国民党之重要问题，并且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之重要问题。我们若是把国民党看做整个的而无左、右派的分别，便无由判定国民党是革命的，不是革命的了；我们若是懂得国民党中有左、右派之区别，左派是革命的，右派不是革命的，然后拥护国民党的人才不至受人指摘，非难国民党的人才不至一概抹杀。

有些人不相信国民党有什么左、右派之分别，可是在事实上，国民党左、右派之分化，及历来右派另自形成组织，都非常明显。最初是孙、黄分裂，右派由政事研究会变为政学会；其次便是孙、陈分裂，右派变为联治派；再其次便是去年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后，右派变为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最近从中山先生死后到现在，又渐渐形成戴季陶一派；每逢分化一次，党内之阶级的背景都更明显一次，在思想上左、右派的旗帜都更鲜明一次。戴季陶派，或者可以说是国民党右派在思想上最后完成了；同时，左派的思想亦因之明瞭而正确了。

有人以为共产党是国民党左派，这是非常之大的错误。加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的行动上，固然站在左派的政策上面；然而共产党是共产党，国民党是国民党，国民党自有他自己的左派，如何能以共产党做国民党的左派呢？国民党左派的思想与政策，无论如何左倾、如何急进，终究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就现有的事实而论，国民党左派的领袖，如汪精卫、蒋介石、胡汉民、谭延闿、程潜、于右任、徐谦、吴稚晖、李石曾、顾孟余、丁惟汾、王励斋等

一班人，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党员。

国民党的左、右派之分别究竟是些什么呢？在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前后，可以说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政治的是左派，不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政治的是右派；信仰三民主义的是左派，不信仰三民主义的是右派；现在的左右派，都不是这样简单的分别了。以前不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不信仰三民主义的右派，已公然反革命，而实际上脱离了国民党了；现在新的右派，虽然口头上也说主张反帝国主义与军阀，并且高高的挂起信仰三民主义的招牌以自重，可是实际上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理想与策略，他们如何实行三民主义之方法，都完全与左派不同。

在理想上：左派之反对帝国主义，乃根本反对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这一制度之本身为压迫全世界弱小民族及劳动平民扰乱人类和平的怪物，右派之反对帝国主义，并不是根本反对帝国主义这一制度，乃只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同时他们并企图中国民族也发展到帝国主义；左派之反对军阀，其目的是在去掉军阀政治，代以民主政治，右派之反对军阀，其目的是在去掉军阀政治，代以仁爱的保育政治，即古代所谓仁政现代所谓贤人政治。在策略上：左派懂得要实现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国民革命，国外有联合苏俄国内有联合工农阶级及共产党之必要；右派则反对联俄，反对共产党，反对工农阶级之阶级利益的争斗而失其同情，所以右派虽然口里也说要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口里也说要国民革命，然而实际上只能口里说说，而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国民革命之实际工作，一步也不能动手去做。他们口中所说的“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所说的“国民革命”，都和不能兑现的支票一般。他们的专门工作只是反对苏俄，反对共产党，反对阶级争斗这三件大事，除此只有吃饭睡觉，至多只能闲暇无事时做几句孙文主义三民主义的颂圣文。他们虽然挂着革命党的招牌，可是不曾为革命流一滴血，不曾为革命坐一次牢监，并且不曾为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举行过一次示威运动散过一次传单；他们不但自己不去做这些革命工作，并且还极

力向广东、上海、北京正在革命战线上拚命的左派加以不断的攻击，袖着手不革命的，还算是右派的好分子。

右派所谓“真正三民主义”，所谓“三民主义的信徒”，也只是一块骗人的招牌，他们并不曾想过如何才能够实行三民主义。他们极力排斥国外最反对帝国主义的苏俄，极力排斥国内最反对帝国主义的共产党，极力排斥反帝国主义最有力的工人、农民之阶级斗争，试问他们还有什么方法实行民族主义？他们轻视占全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工人、农民之阶级的利益，试问他们所要实行的是什么一种民权主义？他们反对阶级斗争，试问在资产阶级斗争之下，有何方法可得保证农工平民之民权？倘若不让工农阶级由阶级斗争而形成他们的势力，足以挟制资产阶级，使他们不得不承认节制资本与大产业国有，足以挟制地主阶级，使他们不得不承认平均地权，试问国民革命政府另有何种力量可以实行民生主义？不实行的三民主义，岂不是骗人的招牌？左派知道三民主义不是一个宗教，单单信仰主义是不够的，单单信仰主义，只是一个主义者，一个信徒，不是革命家；左派知道单单宣传三民主义，而不能指陈其实行政策，也便是胡适之所讥消的“名词运动”；左派为了要实行三民主义，便不得不采用“联俄”、“与共产党合作”、“不反对阶级斗争”这些实际需要的政策。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国民党中现在的左、右派之分别，已经不是口头上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与否或信仰三民主义与否之问题，乃是在实际行动的政策上是否真能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是否真能实行三民主义之问题。

左派是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派。

右派是口头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口头信仰三民主义，而不想实行的非革命派。

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必须赞助国民党的左派而反对其右派。

原载《向导》第137期 署名：独秀

中国军阀之左、右派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日)

十一月卅日东方社电：“张作霖现已开始运动，将以李景林、张宗昌为干部，与旧直系之吴佩孚、孙传芳相提携，结成联盟；此项运动之主要目的，即为对抗冯玉祥、岳维峻、郭松龄左倾派（即过激派）军阀起见，组织右倾派之大同团体，以期于全国政治上出现一大纵断线。”在我们看起来，冯、岳、郭的政治态度实在都过于和缓，而至于油滑，说他们是过激派，直是冤枉苦了。至于说他们是现在中国军阀中的左倾派（各种社会或集团，都有左右倾分化之可能，这里所谓左倾，并不是什么过激、赤化的意义），把张作霖、李景林、张宗昌等奉系，吴佩孚、孙传芳等直系，都列在中国军阀的右派，这却是很正确的事实。这些右派军阀之间的冲突非常厉害，如果他们真能组织大同团体，乃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付中国政局的如意算盘之成功呵！

原载《向导》第138期

署名：实

工贼替安福派说话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日)

北京市民直接惩罚安福诸孽,国人称快,独有著名的工贼张德惠,假託长辛店工人名义,替安福派说话;他说:“民众表示首宜遵守纪律,否则有意破坏群众运动之真精神,若有放火及其他无意识动作,决非真正民意。”照他这样说,所谓真正民意,所谓守纪律有意识的群众运动,不知是怎样?想必是以规规矩矩的开会、游街、请愿为限。那么,历史上一切民众的暴乱武装革命,都一概可以不守纪律、无意识、非真正民意等话抹杀之了。如果是这样,不但此次北京市民运动非民意,即以前五四运动赵家楼之火,也是学生的罪恶了,这样的话,正是安福老爷们所愿听的呵!

原载《向导》第138期 署名:实

预防赤化的国民党右派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日)

国民政府解散了一些反动军队,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许多人说他赤化了;冯玉祥锐意练兵,预备和奉张打仗,主张救国、关税自主、平民政治,又有人说他赤化了;郭松龄倒戈反奉,主张实行民治、优待劳工、普及教育、整理金融、便交通、尽地利六事,也有人说他赤化了。原来赤化不过如此!然而据本月六日上海各报所载东南通信社消息,国民党右派却正打算在上海设立执行委员会“预防赤化”咧。

原载《向导》第138期 署名:实

以赤化为仇敌的奉天商会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日)

郭松龄仅仅说了一声“优遇劳工”，张作霖便通电攻击他赤化，奉天全省商会联合会也跟着通电说：“查改革劳动待遇，即俄国赤化之倡言。……世界各国皆视之如洪水猛兽……就我商民，誓当同心仰戴张上将军保境安民之盛德，以赤化为仇敌。”原来赤化反赤化就是如此，不知预防赤化的国民党右派，对于仰戴张上将军盛德的奉天商会此电作何感想？

原载《向导》第138期

署名：实

《时事新报》太赤色了！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日)

据《时事新报》记者说：“俄国革命已八周了，然而这种伟大的革命，早已被列宁党丢在毛厕里了；而今的俄国，依然是一个全智全能的资本主义的国家；……欧美各帝国主义者，似乎很怕苏俄，因为他主张共产（其实何尝是甚么共产）主义，然而在事实上，各帝国主义者均和苏俄联盟了，最反动的意大利，不是很先就和苏俄交好了么？……我们预料他将来还有更大的变化，还要有富于社会主义性的革命党起来引导俄国的农工去推翻列宁党政府。”如此说来，中国若联俄，并无什么赤化可怕，倒是这位《时事新报》记者比所谓列宁党更赤得可怕了，哈哈！

原载《向导》第138期 署名：实

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一个党内分左、右派，往往是不可免的事。但是左、右乃比较之词，并不是绝对的，所以一个党里如果有了更左的一派，则以前的左派会比较的成了右派；或者右派脱离出了，以前的左派中右倾分子，也会形成新的右派。

中国国民党早已有过左、右派分化及分裂的历史，我们已常常说过自去年正月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后，党内阶级的分化，随着中国社会运动之阶级分化，日渐明显；中山先生死后，党内代表官僚买办阶级的右派，正式另立组织；北京的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及上海的辛亥同志俱乐部。前者投降段政府，谋在北方发展势力；后者结合唐继尧、赵恒惕、陈炯明等，谋在西南发展势力；这两个俱乐部对于段政府之态度虽不一致，而反对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左派，并且勾结帝国主义的英国破坏广州国民政府，则是一致的。这班代表官僚买办阶级的右派，已公然反动，他们虽然还以国民党自居，并且以纯正的国民党自居，可是我们只能当他们是社会上的一种反动派，不能当他们是国民党右派了，因为一个党中的左、右派，虽然有政策的左、右倾及行动缓急之不同，而根本目的必然相同，譬如国民党，即令是右派，其根本目的亦不能离开国民革命，国民党以前的右派既然勾结帝国主义与军阀来破坏国民政府，已明明不但离开而是背叛了国民革命，已经事实上脱离了国民党，还算得什么国民党右派呢？右派毕竟还是以国民革命为目的之国民党啊！

这班代表官僚买办阶级的右派已经脱离了国民党，那国民党中有没有新的右派呢？有的。自五卅运动的高潮，表现出无产阶

级是国民革命中最伟大的社会势力，同时也就加速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形成的过程。这种现象直接的反映到国民党和小资产阶级，他们便竭力的想确定他们自己的政治思想，并且要想在组织上巩固起来。在具体事实所表现的就是：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上海各马路商联合会极力和反动的总商会结合起来，反对工人及学生，又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国民党党员，勾结以前的右派即反动派，假借三民主义的招牌，提出阶级妥协的口号，来反对阶级争斗，反对共产党，并反对国民党左派，甚至于反对国民政府。一个党，总不免有比较右倾的一部分，只要他不右倾而至于反动，还算是右派而非反动派，我们对于这种右派，并不必特别反对；可是现在国民革命的新右派，一开始即带有反动的倾向，这都凡是忠于中国革命的人都不得不向他们加以不客气的警告。这一新右派在理论上并且在组织上(孙文主义学会)形成起来，一天比一天明显，他们虽然竭力自别于代表官僚买办的反动派即以前的右派，其实他们当中仍然包含着不少以前的右派分子，并且在事实上他们既然反对阶级争斗，反对苏俄，反对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左派，并且反对国民政府，客观上便实实在在的帮助了反革命和帝国主义者(如谢持、居正、周颂西、孙镜亚等)。

季陶先生对我说：他们并不反对阶级争斗，只是在国民党的立场不便鼓吹阶级争斗；然而事实上近几天的《民国日报》上反对阶级争斗之论调都非常之高。

他们暂为顾全中山先生遗嘱计，尚未公然反对苏俄，然而他们在取消共产派党籍宣言上，说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借以维持苏俄”；又说“扫除任何属性的帝国主义”，所谓任何属性，不用说所谓“赤色帝国主义”也包含在内。

他们反对共产党更不用说了。他们说共产党只要民族主义，对于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都唾弃而且加以攻击；其实共产党不但努力民权运动(集会、结社、出版、言论自由之要求)，并且他的民生运动(工农解放)比任何党派的政纲都彻底。他们说共产党是反对国

民革命的反革命；其实不幸此时各处国民革命的工作几乎是共产党在包办。

他们说共产党借国民党机关宣传共产党的主义，其实共产党有他自己的各种机关报各种印刷品，宣传他们的主义与政策，从来不曾借国民党机关宣传共产主义，而且在事实上又何能够在国民党机关宣传共产主义？中山先生、季陶先生都曾经说过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而共产党人都不曾作此惊人之谈！他们口里虽说不信口雌黄地诬蔑共产党，其实他们公然著书通电（例如最近广东孙文主义学会的通电及孙镜亚告国民党同志书等），捏造共产党阴谋破坏国民党的种种无稽之谈，诬蔑得共产党人简直阴贼险狠不成人境；最近为广大问题，不但说共产党早已开除的陈公博是共产党人，并且硬指顾梦渔先生也是共产党人，借以证明共产党夺取广大的阴谋。他们口中虽说承认共产党和他们是政见略有不同的党（孙镜亚都说是：“貌为同舟，实类敌国”呵！），可以联合起来，共同作战；其实在北京在上海在广州，无论民族运动、民权运动、民生运动，他们都表示不和共产党合作，并且他们自己也不独作；他们虽然宣言反段，然而在上海的反段市民大会，他们竟不肯参加，在北京的反段国民大会，他们虽然参加了，而他们的首领邹鲁，都硬逼鹿钟麟下令压迫国民大会，说这次国民大会是赤化运动。

自讨伐杨、刘以来，左派领袖汪精卫、蒋介石等在国民政府所做的工作，至少我们也应该说功多于过；然而右派对于他们的攻击，竟无所不用其极，不惜罗致许多罪名，假造许多谣言，仿佛汪精卫等真是罪大恶极之徒（见他们致各级党部电，十二月八日上海《民国日报》论文，孙镜亚致汪精卫书等）。他们不但这样攻击汪精卫，并且在西山开会议决开除汪精卫党籍，不许他任国民政府职务；他们这样的举动，简直是有意动摇国民政府，为陈炯明、杨希闵、刘震寰、梁鸿楷、魏邦平、张国楨、熊克武等复仇。邹鲁等在西山开会，表面上虽然是反对共产党，实际上另有破坏国民政府的阴谋，季陶先生未曾出席西山会议，正因为发见了他们这种反革命的

阴谋。

他们说共产党惯以反革命反动等罪名加诸异己者，可是按照上述的事实，他们应自问和冯自由、邓家彦、马素相去几何？即客气一百二十分，也不能不说是反动的倾向罢！

他们这反动倾向的根本，是不识中国的国民革命乃整个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他们口中虽然不赞成国家主义，其实他们的根本思想和国家主义者一样，同是误认中国国民革命乃整个一国家的孤独运动，不认识虽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国外也有友军，国内尽有敌人；因此，他们遂至对外反对苏俄，对内反对阶级斗争，反对主张阶级斗争的共产党；因为左派联合苏俄及共产党，他们遂至反对左派；因为国民政府中最主要的分子是左派，他们遂致反对国民政府；他们的反对倾向就是这样相因而至的。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固然应该和国民党左派结亲密的联盟，无论在党内或党外；即右派，亦应与之在每个行动上联合作战；至于反动派，则在于联合战线外了，因为他们已经背叛了国民革命，站在敌人那边了。此时新右派之反动倾向，也非常严重，这倾向若继续发展下去，便和以前的右派即反动派毕竟是一家眷属，则所谓“新右派”这一名词便应该取消了。

原载《向导》第139期

署名：独秀

反赤运动与中国民族运动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

- (一)赤是什么? (二)各国反赤的是谁? (三)中国反赤的是谁?
(四)他们在中国所反的赤是什么? (五)反赤运动因何在中国民族运动高潮中发生? (六)反赤运动影响到中国民族运动是怎样?

在中国民族运动的高潮中,突起所谓反赤运动,其意义与影响如何,凡是关心中国民族运动的人,都应该加意研究这一问题。

这问题劈头所要研究的就是什么是赤。此时所谓赤化、所谓反赤这些名词,在社会上很流行,几乎演剧上广告上都要用做材料以惹人注意;可是究竟什么是赤,大半还不甚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不过无意识的随声附和,或有意识的拿做攻击敌人之武器罢了。赤之名起于苏俄十月革命,以赤色为旗帜,创立赤卫军以保障俄罗斯无产阶级及农民对于资产阶级、地主及西欧帝国主义争斗之胜利,赤之内容如此,其后世人称十月革命为赤色革命称苏俄为赤俄以此。

其次,我们要知道的,各国中主张反赤的是那种人。各国中主张反赤的,只有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与政党这班少数人,不但工农大群众是表同情于赤俄的,即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如英国的萧伯纳、罗素等,他们的根本思想虽不是赤的(他们若在中国,孙传芳当然要觉得赤得应该杀头,罗素屡屡发同情于中国民族运动的言论,指斥英国,中国的国家主义派也当然要加上他一个新式卖国贼的头衔。),然而绝对不主张反赤,并且有时感觉得帝国主义的国家之过分横暴,宁表同情于赤俄。

再其次,我们便须检查中国主张反赤的是那种人。此时中国主张反赤的有两种人:一是军阀中之反动派,如奉系之张作霖、李

景林、张宗昌，直系之吴佩孚、孙传芳，粤系之陈炯明、魏邦平等；一是知识者及政客中之反动派，如国家主义派、研究系、安福派、中和党及老国民党分子章太炎、冯自由、马素等。张作霖和日本之关系，是人人所知道的；在五卅运动中，从奉天到上海，奉系军阀整个的替英、日帝国主义者扑灭中国的爱国运动，这也是人人所知道的；李景林、张宗昌在直隶、山东当官胡子，吴佩孚讨贼通电中很骂得痛切；吴佩孚至今还要拥护曹锟的宪法，他此次联奉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一手作合，英国助他一万五千枝快枪，如果不被孙传芳中途夺去，马上便会到手，最近还派代表到日本勾结俄国白党土匪谢米诺夫，招集俄白党五万人南下攻打国民军；受上海领事团面谕暗杀刘华的孙传芳，他的反动程度也不让吴佩孚；陈炯明、魏邦平受香港政府的庇护帮助而扰乱广东，乃是很明显的事实；国家主义派的首领自称师承墨索里尼，他们《醒狮》报和帝国主义者最近在上海所办的《独立报》，有明显的关系，把他们列在反动派当不冤枉；研究系中为许多人头脑并不甚反动，然而他们的行动，从前清到现在，却都站在反动派方面，最近仍然力助吴佩孚，他们的大将马不停蹄奔走奉天、杭州、南京、长沙、衡州，为吴佩孚效力；亲日卖国的安福派，不用我们再说了；还在秘密酝酿中的中和党，他的创始者是尤烈（致公堂即三合会的首领）和徐绍楨父子，孙传芳攻南京时，他们曾想召集一些失职军人与帮匪组织中华救国军，做奉军袭取上海之内应，嗣即随着张宗昌战败而失败了，这个党，和老国民党的反动派陈炯明派及什么反赤大联盟，几乎是一个东西，若再加上国家主义派，有产生一个貌似的中国法西斯特党之可能，这个党的反动性，较之研究系、安福派，还要后来居上；章太炎始终是个反革命的东西，辛亥革命时指斥孙、黄为小丑，首先通电主张统治中国非袁项城不可的就是他；冯自由以南京临时政府的稽勋局长投降袁世凯当侦探，因此曾在上海会审公堂控告吴稚晖先生；马素曾为杨希闵、刘震寰乞援于香港政府攻打广东，近又上书吴佩孚请讨冯玉祥。原来中国主张反赤的就是这班先生们，并且这班先生们的背

后，大半都有帝国主义者发踪指使，所以稳健的资产阶级及国民党右派大部分还未加入他们这个运动。

再其次，我们便要研究他们所反的赤是些什么人是些什么事。他们所反的赤如左：

苏俄

中国共产党

国民党及广东国民政府

冯玉祥及国民军

郭松龄

贾内阁

上海总商会会长虞和德

我们把这些分子列在一个表上，可谓不伦不类极滑稽之至了，然而他们都一概被指为赤化，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这些分子当中实有一共同点，即他们或是有反帝国主义之决心，或是他们现时的举动在客观上是于帝国主义者不利的，所以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一概加以赤化之名。

赤俄的内政，似乎用不着别国人反对，中国人反对赤俄，当然是反对赤俄对于中国之关系；一、在中俄外交关系上说起来，各帝国主义的国家，在中国把持海关，驻扎海陆军，据有租界及租借地，施行领事裁判权，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有没有反对赤俄之必要？蒙古问题中俄协定已明白规定了，我们自己无暇把中蒙的关系弄好，难道承认赤俄有将蒙古交给中国之权利吗？中东路诚然还在中俄共管的状态中，诚然我们不应该主张永远用这样办法，可是现在要责赤俄把中东路管理权完全归还中国，我们有何方法可以保证该路不至由张作霖转入日本或其他帝国主义者之手？二、在赤俄援助中国革命运动的关系上说起来，赤俄援助中国革命，诚然是事实；但现在所援助的决不是社会革命而是民族革命。一年前法国《晨报》即极力鼓吹“英、法、日、美应联合压迫中国，恢复国内秩序，以免赤俄在亚洲势力膨涨，否则莫斯科从中援助之亚洲民族自由运

动将发展到中国”。这便是赤俄援助中国革命之正确的说明。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一支部，向来不曾和苏俄发生过直接关系，他和苏俄的共产党同属于共产国际，他们根本的政治理想固然是同的，但是因为政治的经济的环境之不同，而革命之步骤便也不同，所以中国共产党目前的政纲与行动，乃是要完成中国民族革命的要求，即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军阀——到底。

中国国民党，在过去的历史上，在现在的政纲上，都是一个民族革命的党，这是人人所知道的。国民党的右派不用说了，即他的左派，在理想上在行动上，都只是一个民族革命者，实无所谓赤。左派执政的广东国民政府，他所努力而有点成绩的只是两件事：一是对外援助民众抵抗帝国主义的香港政府之压迫，一是对内解散了许多不法军队，统一了全广东的军政财政，免除了一些苛捐杂税，禁止了赌，给了人民一点生命、财产、集会、结社之自由，这都是赤化吗？

说冯玉祥及国民军赤化了，那更是冤枉。冯玉祥所统率的国民军第一军，的确是很有纪律的军队，全中国现有的军队，算是冯玉祥及蒋介石所统率的军队最有纪律不扰害人民，若说这两种军队是赤化军，我们敢代表全国人民欢迎这赤化军，并哀求全国军队都变成这样的赤化军。冯玉祥根本的政治理想，只是封建时代的旧套“勤俭爱民”四个大字，他治军甚严，对于部下任何级军官，决不容许他们违反他这个政治理想；他并且要把他的理想推行到全国，无论何派，凡是违反或超过他这个政治理想的，他都很难与之合作，与其说他主张赤化，不如说他主张冯玉祥化。然而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为什么加冯玉祥以赤化之名呢？正是因为他和反冯玉祥化而做帝国主义走狗的张作霖、吴佩孚作对，及他多少接受了孙中山反帝国主义的主张这两个缘故。

郭松龄倒戈时的通电，不过主张实行民治，优待劳工，整顿金融，兴办矿山，便利交通这几件事，并且还主张严防激党，照道理实在说不上什么赤化；然而张作霖、杨宇霆及奉天商会竟异口同声指

賈郭松齡赤化了。可是郭軍倒戈攻奉，幾乎使日本帝國主義者失去有力的工具，這便是郭松齡應得之罪。

說賈內閣是赤化內閣，那更是可憐了。賈內閣開罪於帝國主義者的，只是通過討吳令這一件事；賈閣閣員有赤化嫌疑的，只是王正廷、易培基二人，王氏本是一個耶教徒而兼新官僚，只因為他經手成立了中俄協定的草案，又主張不平等條約應該修改，便犯了滔天大罪——赤化。易氏不過是一個比較進步的教育家，只因為他反對親日賣國的段祺瑞，也犯了赤化的罪。

至於說虞和德也赤化了，那益發滑稽之至。上海的工賊曾散發傳單說虞和德是共產黨黨員，現在穆藕初也指責虞和德赤化了；可是虞氏雖未赤化，他却主張關稅自主，又主張設立海關公庫，並且胆敢批評上海紗廠待遇工人不好，開罪安格聯、穆藕初一班人，也算是咎由自取。

綜觀以上事實，我們可以看出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在中國所反的赤，其人除蘇俄及共產黨外，實無所謂赤，其事除實際參加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或有參加民族運動的嫌疑外，亦無所謂赤。不過帝國主義的走狗可以說聯合被壓迫民族以反對帝國主義，本是赤俄的外交政策，因此中國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即是赤化運動。如果是這樣，赤化運動就是民族運動，反赤運動也就是反民族運動了。

再其次，我們應該知道反赤運動因何在中國民族運動高潮中發生。我們既然認識反赤運動就是反民族運動，我們便已經知道為什麼反赤運動是當然隨着中國民族運動高潮而發生的了。根據上面所述法國《晨報》的說話，帝國主義在一年前已經決定了以反赤運動撲滅中國民族運動的計劃。五卅運動起，帝國主義者知道中國的民族運動已經不是單純的炮艦政策所可撲滅的了，勢必動用宣傳力量；可是宣傳的方法又不便直接反對中國民族運動，於是乃用反赤口號來破壞中國民族運動，從倫敦到上海，從北京使團到各地的東西各報，一致宣傳五卅運動是赤俄煽動的，是中國赤黨主持

的；可是他们东西文的宣传品，不能使中国民众普遍的了解，于是他们乃雇用一些中国人，在上海印发《诚言》报，每期数十万份，广布于市民，一面为帝国主义的工部局辩护，一面攻击赤俄与中国共产党；可是那时中国民族运动潮犹在高涨中，并且民众都知道《诚言》报是帝国主义的工部局直接发出的，不但不发生效力，而且代印《诚言》的商务印书馆和转载《诚言》的新、申两报，都受了民众的惩罚，于是帝国主义改变其对中国民族运动的政策，一面以退让的态度欺骗中国的资产阶级使之妥协，一面向各方面收买中国人，使牠们自己出来做反赤宣传。帝国主义者这两个政策，给中国民族运动很大的打击，其效力竟在炮舰政策以上。五卅运动因为资产阶级妥协及反赤宣传这两个打击，运动的高潮遂渐渐低落下去；帝国主义者遂乘此高潮低落的时候，转向中国民族运动开始反攻。其反攻的策略，现在已经可以看出来的计有四个步骤：第一步是嗾使他们的走狗奉、直两系军阀，以反赤的口号封闭全国的爱国机关，禁止全国的爱国运动；第二步是嗾使他们的走狗扩大反赤宣传之范围，由攻击苏俄及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扩大到攻击国民军冯玉祥、郭松龄以至贾内阁、虞会长等，凡稍有一点参加民族运动嫌疑的人，都加以赤化之名；第三步是帝国主义者亲自公开的向中国进攻，在北方以武力援助张作霖、李景林、张宗昌、吴佩孚、靳云鹗，向有赤化嫌疑的郭松龄及冯玉祥等国民军进攻，在南方则命令英籍税务司借故封锁广东海口，在上海则逮捕五卅运动中的工人首领刘华交孙传芳枪杀了，并且在租界内禁止中国商民使用“五卅”这个名词；第四步是由反赤的宣传，更进一步到反赤的组织，将由这些组织，来根本肃清所谓赤化势力即一切参加中国民族运动的势力。他们这项组织，计有两种，一是国际的，一是中国的。国际的组织，据三月十三日的《时事新报》转载上海《字林西报》说：“本埠各国人士，组织一护宪会，以抵制过激主义，十二日下午五点四十五分，在夏令配克影戏院开第一次英语大会，演说者有霍华德、琼斯斐德等，同时并在日本人俱乐部开日语大会，在法国总会开法语大会。按护

宪会系一国际团体，其总部设于上海，于中国各大都会均设分会，四月间将在上海开全中国大会，香港、广州、汕头、天津、汉口等处，均将派代表出席，其目的在使公众咸知过激主义之危险，计加入此会者已有十五国，上海总委员会之组织，系每国各推代表二人，内分十股云。各国帝国主义者若说过激主义于他们自身有危险，那诚然是事实；他们若说恐怕过激于中国人有危险，忙着出来做反赤的组织宣传活动，那便未免爱护中国人太多了，我们哀求他们少欺压点中国就算是深仁厚泽了，到不必这样过分的爱护中国人！各国帝国主义者特于三月十二日开第一次护宪大会，和他们所指为赤化的孙中山先生周年纪念会对峙，这也是他们很有意义的示威运动。中国的组织，就是所谓反赤大联盟。这个大联盟的总机关在上海法租界铭德里一号，他的领袖，据我们所知道的就是章太炎、尤烈、徐绍桢、魏邦平、冯自由、居正这班人，除魏邦平外都是所谓老民党，他们的目标就是反对苏俄、中国共产党、南方的国民政府、北方的冯玉祥及国民军。此外还有一个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成立在反赤大联盟之前，在中国可算是反赤团体之前辈。他们所反对的目标，完全和反赤大联盟一样，他们以为危害中国国家的只有苏俄、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及国民军，而不是帝国主义者及张、吴等反动军阀，自五卅运动以来，他们对于每次反英、反日、反奉、反吴的民众运动，一概不肯参加，只孤独的在他们的机关报《醒狮》上，大声疾呼的向反帝国主义的苏俄、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国民军进攻，为帝国主义者出了不少的气。好了，他们现在却不孤独了，他们有了姊妹团体反赤大联盟了，他们的《醒狮报》，和帝国主义者最近在上海所办的《中国报》及《独立报》，也算是姊妹报。

他们这些反赤的组织和宣传经费是从何处来的呢？二月廿日的上海《字林西报》伦敦通信告诉我们说：“已由英伦国家银行汇英金六十万镑到上海汇丰银行，作为反对中国民族运动及苏俄宣传之费用。”在中国民族运动的高潮中，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享特殊而且不法的权利已有开始动摇的征象，如果真能由此区区英金

六十万镑，扑灭了最不利于帝国主义的所谓赤化运动即中国民族运动，使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之利益与威权，得以重新巩固起来，岂不是本小而利大么！？

最后，我们应该研究反赤运动影响到中国民族运动是怎样了。现时中国的政治争斗，已经分成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和反民族运动的反赤运动两大联合战线的营垒了，孰胜孰败，乃是中国盛衰存亡紧急关头！反赤运动实际上就是反民族运动，然而他们表面上不但不说反对民族运动，并且还要说赤化足以亡国，反赤正是救国。可是他们所反的赤，依据他们反赤之对象，当然不是指赤俄的社会革命运动，并且事实上中国也还没有这个运动，正不必无的放矢；他们所指的赤，只是指民族运动中反帝国主义这一口号，因为联合一切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是赤俄喊出来的。五卅运动初起时，上海总商会的领袖对上海总工会的代表说：“外间已经喧传你们赤化了，你们的宣传品上万不可再说什么打倒帝国主义呀！”国家主义派也向来不主张打倒帝国主义，因为这是赤党的口号。仅此两件事已经可以充分说明：在中国所谓赤化乃指反帝国主义运动，所谓反赤就是反对这个运动。反帝国主义运动是赤不是赤，我们不须研究，所须研究的乃是反帝国主义在中国民族自由运动中有何意义。在经济上，在政治上，中国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外受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内受帝国主义工具——国内军阀的扰乱，不打倒帝国主义，试问中国民族如何能够得着自由？现在国民党右派中有人说：“我们民族主义者所谓打倒帝国主义，乃指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势力而言，至于打倒全世界的帝国主义，乃是赤党世界革命的主张，和我们是不同的。”这种见解非常糊涂。在理论上，现代立国于世界，政治上经济上都没有离开国际关系闭关自守之可能；在事实上，俄罗斯与土耳其，都已经打倒了帝国主义在他们国内的势力，然而各帝国主义的国家仍然包围着俄罗斯与土耳其，想乘机夺去他们的自由；所以被压迫的民族，非到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完全倾覆，是不可停止反帝国主义运动而高枕无忧的。

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如果反帝国主义运动是赤化,这种赤化,在民族自由运动上是最有意义的;如此,反赤运动不是破坏民族运动是什么?如此,究竟是赤化运动足以亡国呢,还是反赤运动足以亡国?这都是理论问题,再就事实上说起来:究竟是反赤的军阀政客可以救中国呢,还是他们所指为赤化的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国民军可以救中国?现在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的奉、直军阀结成了联合战线想来宰制中国,他们若能得到胜利,中国的民族自由运动将是怎样?我们环顾国外,能实力援助中国民族运动的,除赤俄外还有谁?我们环顾国内,能实力为民族自由奋斗而反抗帝国主义者及奉、直军阀这一联合战线的,除了被指为赤化的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国民军之外还有谁?若依反赤运动扑灭了共产党、国民党、国民军的势力,胜利的不是帝国主义者及奉、直军阀又是谁?他们的胜利,不是中国民族运动的失败又是什么?

因此,我们可以得着一个结论:中国反赤运动和中国民族运动之消长,是要成反比例的,这是关心中国民族运动者所不可忽视的一重要问题。

原载《向导》第146期

署名:独秀

孙文主义的信徒呢，还是 冯自由主义的信徒？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国民党右派常常说，我们并不象反动派根本反对共产党，我们只是反对他们的分子留在国民党内。可是在事实上，南京和湖北的中山先生周年纪念会开会时，右派党员却大声疾呼打倒共产党，并指令警察逮捕共产党人，警察从中调节，他们还责问警察说：“我们替你们捉共产党，你们自己为什么不动手！”请问所谓纯粹的国民党党员，所谓孙文主义的信徒，是不是应该如此：

原载《向导》第147期

署名：实

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 与广州事变

（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

此次反奉战争之失败，其根本原因固然是帝国主义者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之力助奉、直军阀，而中国革命势力不统一也是一个很大原因。中国的反动军队如奉张，如直吴，如李景林，如张宗昌，都在日本帝国主义指导强迫之下统一起来，向国民军进攻；而在反奉方面，国民军与广州国民政府至少在军事方面未能联合作战，国民军内部，一、二、三军又未能切实合作，甚至于长江方面反吴的军事势力也未能联合一致，如此反奉战争安得不失败。

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及国内反动的军阀——还很强大，今后所有中国的革命势力非统一起来，不但不能得着胜利，并且各部分都很难存在。可是不幸最近广州的事变恰恰和这个“革命势力统一政策”相反！

国民党内的一般右派及国民党外的一般右派，一向号召反俄反赤反共，这是实行帝国主义者分离中国革命势力的根本政策；广州事变之根本原因，仍旧是这个政策之应用。他们宣传此次事变是由于共产党阴谋推倒蒋介石，改建工农政府。我们现在可以回答他们：第一、照全中国的政治环境，共产党若不是一个疯子的党，当然不会就要在广州建设工农政府；第二、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第三、汪精卫、谭延闿、朱培德、李济琛、程潜都不是疯子，共产党如果忽然发疯想建设工农政府，单单推倒蒋介石是不够的。共产党的政策，恰恰和右派所宣传的相

反,不但主张广东革命的势力不可分裂,并且希望全中国的革命势力都要统一,不然无对敌作战之可能。在此时中国政治、军事的环境,谁破坏革命势力统一,谁便是反革命!我们的政策是统一,右派的政策是分裂,他们在广东想分裂革命势力,同时在北京在上海想分裂学生会。右派说共产党有倒蒋阴谋,然而事实上,两星期前上海右派最高党部某领袖,即预言广州将有大的政变,试问这是谁的阴谋?这阴谋若继续发展下去,广东的革命势力,必然由分裂而全部倾覆,胜利的只有香港帝国主义者(此时香港及上海的英文各报对广州现在的事变已经表示异常高兴),右派所得恐怕很少,甚至一点也得不到,试想当年进步党是如何拼命为袁世凯反对国民党,袁世凯胜利后,进步党所得着的是些什么?

我们鉴于北方国民军之失败及南方广州事变,凡是中国的革命分子,应该一齐高声喊出“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口号,扑灭分裂革命势力的一切阴谋!

原载《向导》第148期

署名:独秀

国民党右派之过去、现在及将来

(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

中国历史所需要的国民党，乃是适合于世界革命大潮中中国民族革命要求之整个的革命党，不但非革命的普通政党不合这个要求，即革命的国民党中央夹杂一派游移的右倾分子，亦是中国革命进行之极大的障碍。

中国国民党之前身——中国革命同盟会，他的政纲，他的行动，都是一个革命的组织；辛亥革命后改称国民党时，遂丧失其革命性，其唯一原因，乃是当时的资产阶级开始厌弃革命，遂反映到国民党中央，发生了背叛革命的右派，他们的声势非常之大，几乎使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左派失掉领袖的地位。这时国民党的总理，名义上虽然是孙中山，实际上乃是右派领袖宋教仁；中山先生看见这班右派，在组织上已附和官僚派“革命军起革命党销”的口号，在政纲上已抛弃三民主义的要求，便发愤不过问党务，几乎不把国民党当作他自己的党。袁世凯得势，革命完全失败，中山先生乃决心排除那些右派，另组中华革命党；及袁氏死，广州南方政府再成立，复称中国国民党。

从中华革命党到中国国民党，这期间的全党党员，在形式上都服从中山先生而听其指挥。其后因欧战中中国工业发展及俄国革命的影响，中国民族运动潮流不但高涨起来，而且新加入了工业无产阶级的生力军，使中国民族运动增加了新的意义：不但反对国内军阀，而且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而且反对为帝国主义作走狗的奸商买办阶级，向帝国主义妥协的资产阶级，主张要贯彻民族解放的完全目的，革命到底。这一民族运动的新趋势遂反映到国民党中央，使

国民党分为彻底革命和背叛革命之左右两派。这次右派声势之大，较过去宋教仁所领导的右派有过之无不及，其与左派之冲突决裂也更剧烈，其所表现之阶级的背景也更明显。此次右派分子中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是一致的，所以右派也不是整个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一九二四年正月）前后，冯自由为首的右派乃是代表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及奸商买办阶级利益的；第二次全国大会（一九二六年正月）前后，戴季陶为首的右派乃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前一个右派，他们不但口头上不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而且事实上勾结香港政府及段祺瑞，援助陈炯明、杨希闵、刘震寰、魏邦平，以反对共产党为名，攻打广州国民政府，又请求吴佩孚出兵讨伐赤化的国民军，又纠合所有的反动分子组织反赤大联合，目的在藉用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力量，扑灭他们的仇敌——全中国各种革命的势力；这班人已成为中国民族运动中之反革命派，不应称为国民党右派，因为国民党无论左派右派，都不能公然背叛革命的三民主义。后一个右派，即新右派，他们不但要反对军阀，并且要反对帝国主义，可是他们以为左派联俄联共政策和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冲突，而要加以修正，这是他们和左派不同的地方；不过他们对于联俄联共政策只要求加以修正，并不主张根本上反俄反共，这是他们和反革命派不同的地方；他们这种中间的态度，有时是革命的，有时在客观上是帮助了反革命，有意的或无意的背叛了革命。他们这种态度与思想，如果在一切实际行动上果然坚守得住，也还有一半令人可敬；可是在事实上，这一新右派只算是少数人一种理想，还未能形成独立的一派，因为他们大部分人在组织上在行动上，并未能坚守他们的态度与思想和前一个右派即反革命派分开，虽然他们的领袖屡次表示不赞成左派同时也不赞成反革命派。现在我们可以略举新右派和反革命派未能分开的几件事实：第一、在组织上，他们的领袖季陶、孙科、伍朝枢虽然加入了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山东、江西、广州、徐州的右派党员及北京的一部分右派虽然和左派在一个组织；而西山会议及由此会议产生的上海中央总部，

以至现在他们所召集的第二次大会，都是和反革命派合作的，在重庆、安庆、芜湖、南京、上海等市及江苏、浙江两省，他们都联合反革命派，另立和左派分离的组织。在行动上，这一新右派之发端，谁也知道是利用戴季陶的理论来号召的，照常情应该奉戴季陶为指导者，然而一开幕他们即勾结反革命派毒打戴季陶，捆绑戴季陶，幽囚戴季陶，使之狼狈南归，不敢出席西山会议，并至今不愿参加他们的工作，只这一件事，已经充分说明戴季陶等少数人所理想的新右派并未形成事实，大部分还是反革命派因利乘便在当中冒名作祟，所以现在这一新右派的领袖，不但戴季陶睡在湖州潜园叹气，即叶楚傖、邵元仲也不得不取了消极态度；有全国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也是他们由戴季陶理论的暗示而发生，实际上他们并不研究孙文主义，各地的孙文主义学会，都被反革命派占据了当做反对苏俄、反对共产党、反对左派之工具；居正参加上海的反赤大联合，覃振派人联络赵恒惕谋倒长沙的左派党部，南京及武汉的右派党员们，都在中山先生周年纪念会狂呼打共产党，并指令警察捕拿共产党，象这些行动，更是出乎右派领袖们屡次所宣布的态度与思想之外，完全是反革命。

因此，我们所以敢说现在所谓新右派，还非常模糊幼稚，还未能离开反革命派而独立自成一派。将来或者竟能自成一派，或者一部分变成左派一部分老实回到反革命派，此时虽不可知，而和反革命派混合的现状，大概是不能持久的。如果他们自成一派，而且很有力量，无论和左派在同一个组织与否，都是中国民族革命之障碍；因为他们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以革命始以妥协终是他的阶级性，不独中国如此，凡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大资产阶级都是如此。中国民族革命所需要的国民党，以富有这个阶级性的成分越少越好。

原载《向导》第148期

署名：独秀

这就是戴季陶所谓“仁爱”之言

(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

重庆国民党右派，在孙中山先生周年纪念会，散布一个小小传单如左：

“孙中山先生弥留时之遗言：

和平！！奋斗！！救中国！！

和平！是望于帝国主义和军阀们的。

奋斗！是望于世界弱小民族和国民的。

救中国！是希望军阀自动与人民协同来打破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同胞们！！军阀们！！速起！速起！”

如果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们的仁爱性不至为阶级差别所消灭象戴季陶所想象，则右派先生们的希望，便别有方法可以达到，何必一定要革命呢？

原载《向导》第148期

署名：实

国民党右派之光荣

(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

在帝国主义者统治下的上海租界，任何小小政治集会都不自由，何况是国民党的会议。可是国民党右派的所谓第二次全国大会，公然大吹大擂的在上海法租界召集开会了，未受帝国主义者丝毫压迫，这是何等光荣！

原载《向导》第148期

署名：实

帝国主义者悬出重赏了

(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

上海《新闻报》北京电：“二十五日使团会议，辛丑签约各国列席，讨论中国时局，以为目下中国各当局如能完全合作，成立一巩固政府，限制赤化，则关会即可结束，以满华人希望，届时中央政府不患无钱办理善后各事。”这些说话的意义就是：帝国主义的使团，忧虑他们的走狗奉张、直吴以及段祺瑞、李景林、张宗昌辈之间的利益冲突很厉害，特悬重赏，迫张、吴等完全合作，好巩固为帝国主义的御用政府，为他们限制有害于帝国主义之所谓赤化。

原载《向导》第148期

署名：实

广州事变之研究

(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

三月廿日广州事变之真相，我们现在虽然还未能详知其巨细颠末，而大致已经明白了；此事关系中国革命运动影响颇大，值得我们加以研究。研究之方法，不应该从拿自己的主观做出发点，而是应该综合各项消息，依据事实证明那些消息是可靠的，那些消息显然是谣言，然后所得的结论方近于正确。

(一)关于广州事变之最可靠的消息

A 蒋介石之呈文

“为呈报事，本月十八日酉刻，忽有海军局所辖中山兵舰，驶抵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向教育长邓演达声称，系奉校长命令调遣该舰特来守候等语。其时本校长因公在省，得此项报告，深以为异，因事前并无调遣该舰之命令，中间亦无传达之误，而该舰露械升火，亘一昼夜，停泊校前，及十九日晚又深夜开回省城，无故升火达旦；中正防其扰乱政府之举，为党国计，不得不施行迅速之处置，一面令派海军学校副校长欧阳格暂行权理舰队事宜，并将该代理局长李之龙扣留严讯，一面派出军队于广州附近紧急戒严，以防不测，幸赖政府声威，尚称安堵。惟此事起于仓卒，其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但深夜之际，稍纵即逝，临机处决实非得已，应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而肃纪律。谨将此次事变经过及自请处分之缘由，呈请察核。谨呈军事委员会。 蒋中正。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B 国民政府之布告

“此次政府据报，以海军局代理局长欧阳琳，无故离职，舰队骤无统率，致中山舰发生不守纪律举动，政府为防患未然起见，特先将各嫌疑人拿办，现已处置妥当，一切如常，特此布告，俾各界明了真相，幸勿误听谣传，自贻纷扰。”

C 国民政府饬送俄人时蒋介石代表邓演达之演词

“国民党国民政府与苏俄本属最好同志，今日诸位归国，某等敬代表国民党国民政府及汪蒋两位先生，今后本党本政府之联俄亲俄政策，非特未有丝毫变更，当视前益加亲善及进步。”

D 国民党宣言

“依据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之策略奋斗，尤尊重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决案，对共产党加入本党份子，丝毫不存歧视，对离间破坏者决严厉对待。”

E 依文诺夫思基等对本报(《向导》)记者之谈话

“广州二十日事变，黄埔军队于短时间包围罢工会及东山俄人住宅，逮捕李之龙及其他五十余人，都是事实；但也只有这些事实，周恩来邓中夏并未逮捕，均尚在广州，更无杀人之事。蒋介石表示他此次举动只是防止有叛乱之事发生，他本人并不反俄反共，他军中确有些反共份子，且云他并未发出包围俄人住宅及罢工会之命令。此时蒋氏似已了解共产派确未有谋危政府及蒋氏个人之计划，风波已归平静；惟孙文主义学会一派挑拨离间的举动仍未停止，随时都会有事故发生，这真是中国革命之不幸。”

(二)各种显然不实的谣言

依据上述可靠消息，沪报所传“共产派反汪蒋。”“拘俄人多名。”“共产派谋倒蒋，推翻国民政府，改建工农政府。”“李之龙以组织工人政府相号召。”“汪已被软禁。”“蒋拘获罢工领袖及黄埔军官学校俄教练员数人，闻蒋决计悉逐广州俄人及共产党，汪精卫已离广州。”“李之龙已枪决。”“在罢工会搜获俄人接济共派大批枪械。”这些显然不实的谣言，似乎不必再加辩正了。依文诺夫思基等十余

人乃俄国共产党派来中国调查政治及经济现状的，并非粤政府顾问，在粤适逢事变，他们于二十四日离粤回国，决没有各报所传什么被粤政府押解出境的事。蒋介石君上军事委员会的呈文，明明说：“事前未及报告”，可见上海《新闻报》所载“蒋介石……乃往见汪精卫，告以共产党之计划与举动，决用严厉手段处分共派，汪甚惊讶，颇主郑重，蒋不允，汪喟然，蒋曰，今日下午二时在造币厂开会，今时已至，请公偕往，汪本抱恙，至是不能不同去，少俟谭组安、朱培德、吴铁城……古湘芹等均到，蒋即报告共派异动事实，及处分共派办法，谓征求各位同意，各人面面相觑，不敢发言，良久，谭组安始期期言曰，政府及公待共派已仁至义尽，而共派竟有此项异动，介公如此对待，诚不为过，但亲俄政策为先总理所决定，恐如此对待，有碍中俄邦交，故某以为宜分两层办理，最好不要牵涉俄人，蒋大声曰，此次若不如此处分，恐国民政府及国民革命各军，广东地盘，已非国民党所能有矣。众见蒋主持坚决，亦遂不持异议，故此会议结果，完全照蒋提议通过，蒋回后即发命令严密进行。”这一段通信完全是谣言了。《申报》通信说国民政府欢送依文诺夫思基等，赴席者有中央党部代表林祖涵、甘乃光等……及政治部主任陈公博，而同时又说甘乃光、陈公博（甘、陈都非共派）被捕，其显自矛盾如此。各报多载海军局长斯米诺夫被捕或说他同陈公博、谭平山逃匿香港，其实斯米诺夫早已离职归国，斯米诺夫离粤，由欧阳琳代理局长，此事各报早有纪载。谭平山也早因事往北京，陈公博更不用说现还在国民政府任职。这类显然不实的谣言，竟充满了近十天的上海各报，使人不能不佩服国民党右派对于宣传工作之努力，只可惜用在这等地方。

（三）事变之主动者究竟是谁？

因此，我们所得关于广州事变之消息，可以说一大部分是谣言，一小部分是事实。制造这些事实和谣言的是谁？我们敢说是在广州以孙文主义学会为中心的国民党右派。

《申报》通信说：“此次之事件，系为国民党中之右派反赤运动。”

又说：“‘据外间传说，谓二十日之反赤举动，系左派侦知共产党曾接俄人大批军械，此项军械，曾由俄舰运至崖门，由中山舰接载，运至省城东堤东园内之罢工委员会储藏，当日搜查东园时，计搜出俄械步枪一万三千杆，子弹卅万发（《申报》记者原按：此系谣言确否未知），另由列宁舰载来俄官员六人，系担任发难时之指挥。’孙文主义学会份子既发见共产派之秘密，因预为戒备，嗣又查知共产派分子计划，其大本营在东园罢工委员会内，……约期发难，推倒现国民政府，而建设劳工政府。……迨俄械已得手，李则定于二十日派中山舰攻黄埔，詎事前为孙文主义学会中人侦知，遂于二十早先派兵来广州……”

《时事新报》通信说：“据最可靠消息，政变系孙文主义学会主动，拘捕党代表，包围罢工会，皆该会军人所为。”

《民国日报》通信说：“中山舰事件：悉由孙文主义学会同志豫为戒备，学会同志查知反动派计划……”

上海孙文主义学会持志分会致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同志书云：“诸君学养有素，大义凛然，爱党爱国，不遗余力，兹竟能助介石先生，于短时间蹴平叛党祸国之分子。”

《商报》通信说：“据孙文主义学会方面报告，共产党攫取政权之内容，乃和盘托出，蒋氏以形势急迫，……立即召集会议，决定策略……”

又说：“蒋受孙文主义学会派包围，被胁迫而下逮捕共党之令。”

东方通信社香港电说：“二十日对于共产党之非常手段，乃蒋介石部下之孙文主义学会派拥蒋氏而施行者。”

美国联合通信社说：“蒋介石藉伍朝枢等诸名人助力，在广州变制成功。”

依以上所述，此次事变，无论是功是罪，都不能不归于孙文主义学会为中心的国民党右派了。

（四）事变之中心问题

此次事变之中心问题，当然是因为中山舰开赴黄埔惹起了蒋介石之疑惧。

使李之龙调舰到黄埔的人又是谁呢？右派说这是共产党倒蒋倒国民政府的阴谋；然而共产党一向很推重蒋介石，“巩固国民政府”，他们在国民军失败后更提高这一口号，现在决无理由忽然倒行逆施起来。

李之龙方被共产党处以留党察看的处分，中山舰案初起，共产党颇疑心是李之龙受反动派运动所为，今竟指为共产党倒蒋阴谋，岂非世间不可思议之事！

李之龙既定计倒蒋，当不须有蒋令而行，蒋亦当然无此命令，此命令必为诱李调舰者所伪造无疑。且李之龙果已调舰倒蒋，何以还有暇在家高卧，这又是一件不可思议之事。

中山舰调动是此次事变之中心问题，此事如查得水落石出，或是共派的阴谋，或是他们倾陷共派的阴谋，也是彻底解决此事变之中心问题。

（五）结论

凡是中国人，都有拥护广州现在国民政府之义务，此次广州事变客观上实有使国民政府倾覆之可能，因此，事变之主动者，无论出于共派倒蒋之阴谋或出于右派倒共之阴谋，都应该受国民及国民政府严重的惩治，任何人任何党派都不应加以偏袒；这是我们的结论。

原载《向导》第148期

署名：致中

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

(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在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军阀的民族运动中，究竟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我们必须有明瞭正确的解释，方能认清我们的真正敌人，不至为敌所欺。譬如捕贼，必须首先要认清谁是贼，方不至为贼人也喊捉贼之呼声所欺，误认助我捉贼的邻人也是贼，甚至于怀疑到自家人，真正的贼反乘此逃脱了。

误解帝国主义而最可笑的，莫如以为帝国主义的国家就是有帝王的国家。其实现在帝国主义的国家若英吉利若日本，固然是都有帝王，若法兰西若美国，则都是所谓民主国家。其次则以为帝国主义的国家就是侵略别国的强大国家，这个见解也不完全正确，因为现时帝国主义的国家若荷兰，若比利时，并不强大。侵略别国固然是帝国主义的特性，可是古代罗马及西汉时代的中国，虽然都是侵略别国的国家，然而这种开疆辟土之封建的帝国主义，和现代资本帝国主义不同。又有人以为帝国主义乃由国家主义扩大而成，可称之为“大国家主义”。这个见解，在帝国主义发展之形式上是对的，却未能明瞭正确的指出帝国主义的性质。

现代所谓帝国主义乃指资本帝国主义，其存在须有下列二个特性：(一)凡是帝国主义的国家，无论大小强弱，必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二)凡是帝国主义的国家，其国内资本主义必然发展到财政资本主义向国外掠夺压迫殖民地及半殖民地。

依据帝国主义这两个特性，我们便可以判断苏俄究竟是不是帝国主义的国家了。国际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为抵制苏俄联合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这一政策，遂效贼人也大喊捉贼

的故智，造出“赤色帝国主义”这个名词，以图离间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苏俄间的联合。其实“赤色帝国主义”这一名词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苏俄之所以赤，乃因为十月革命是工农阶级推翻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的革命，一切资本帝国主义者正因此而仇视他；如果他现在也变成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那还何赤之有？如果他仍旧是赤的，那便绝对不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而正是帝国主义之仇敌了。

一般人对于军阀解释之错误，更是普遍的。错误之主要原因，是军人和军阀不分，把一切担任军职的军人都当做军阀；因此，遂说张作霖、吴佩孚是军阀，冯玉祥、蒋介石也是军阀。我们反对的是军阀不是任何军人，尤其不应该反对敌视军阀的军人。我们反对军阀，同时又反对敌视军阀的军人，并且反对一切军人，连拿起武器反对军阀的自己也在内，如果是这样，非做到赤手空拳来反对军阀无办法，这岂不是一场笑话！因此，我们要打倒军阀，首先要认识军阀是什么，不可把一切军人都当做军阀，一律反对。军阀的特性有二：（一）凡军阀必然勾结外国帝国主义者，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者已占住了中国最重要的财政机关、交通机关，中国的军阀必尽力勾结帝国主义者，保护其在中国利益，始能得其援助，始能使其拥护军阀的政权，并且军阀不能独在国内找出尽量扩充军备之饷械的供给，也不得不仰求于帝国主义者，同时帝国主义者侵略半殖民地，亦不得不利用旧统治阶级做工具；（二）凡军阀必然摧残民众的自由，这是因为军阀的利益和民众的利益冲突（最重要的如苛捐杂税），非摧残民众的自由，便不能维持其统治权，同时帝国主义者的利益和被压迫国内民众的利益冲突（最重要的如把持海关、工业品竞争、利用贱价劳动等），军阀非摧残民众自由，不能得帝国主义者的欢心。这两个军阀的特性，乃是半殖民地旧统治阶级的特性，不但现在的军阀如此，清室若存在至今，也必然是如此。王恒君在《军阀问题之研究》一文中（见三月三日的上海《商报》），把军阀的性质看做与周代诸侯、唐代藩镇相同，这是非常错误，这是因为他不懂

得现代半殖民地旧统治阶级的特性和古代封建诸侯的特性不同之故。他因为不懂得现代半殖民地旧统治阶级的特性，遂至以据土、练兵、自由行动这三件事为军阀的特性，凡行此三者都是军阀，因此遂产出蒋介石、孙中山都是军阀这种荒谬的结论。一切民主主义革命者社会主义革命者，无一不须据土、练兵、自由行动，若以此三者为军阀特性，则全世界古今中外所有革命者无一不是军阀，我们不解王君何以竟有此种妙想！

又如蒋介石辞去一切军职之虞电，也是不懂得半殖民地军阀的特性是什么，遂至请求开除一切军职以免步军阀之后尘，这和一般见解军人和军阀不分是同样的错误。国民党及国民政府，自然绝不可有军阀，但不可无担任军职之军人，蒋君的责任，是不在自己变成军阀并努力使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没有军阀发生，自己个人消极的辞去军职，这是不对的。若以身任军职便是军阀，若以此生不受军职便不是军阀；那么，此时国民党中有许多身任军职的人，国民政府中更有许多人担任军职，则国民党岂不是个军阀党，国民政府岂不是个军阀政府？若国民党中军人党员，国民政府中担任军职的军人，都效法蒋君因不甘为军阀而辞去军职，并守此生不复受军职之信誓，试问广东将变成何种局面，国民党又将有何人担任革命的军事工作？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中，军事行动的工作是要居很重要地位。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国内军阀，都是武装的，民众没有武装，如何能够得着革命的胜利？革命的民众除武装自己以外，所有国内的军事势力，凡是不曾勾结帝国主义及摧残民众自由的部分，都应该计算在民族革命的力量之内，并且要将民众的力量影响他们，使他们实际参加革命运动，而不可笼统的看做军阀加以破坏。凡是这种军事势力和军阀的军事势力冲突之时，民众应该起来积极的援助前者，破坏后者，断不可把他们的战争当做军阀间自己的冲突，而袖着手站在旁观地位。这种军事政策在我们半殖民地革命运动中，非常重要，是每个实际政治家，每个真正革命者，都

不应该忽视的。

• • •

我们半殖民地的中国人，对于认清为害于半殖民地之帝国主义与军阀的特性是什么，当然是必要的。认清了他们的特性，然后再联合国外非帝国主义的国家与国内非军阀的军事势力，向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作战，这才是我们民族自由运动之唯一的出路。若不认清他们的特性，误以为凡外国都是帝国主义者，凡军人都是军阀，遂至说苏俄和英、美、法、日同是帝国主义者，蒋介石、冯玉祥（依据军阀的两个特性，不但蒋介石绝对不是军阀，即冯玉祥目前也还不能说是军阀）和张作霖、吴佩孚同是军阀，一概加以反对，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若照这样不分是非皂白的糊涂乱打一阵，其结果只有打着自己，而打不倒敌人，这正是帝国主义者及军阀所乐意的事，我们这种错误观念一天不改正，中国革命是一天没有希望的呵！

原载《向导》第149期

署名：独秀

绅士们请看北京血案的司法调查！

(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中国的绅士们相信所谓司法调查，仿佛是一种迷信。五卅事件，他们本主张用司法调查来解决，可是调查过了仍然没有解决。到了北京血案发生，他们仍旧摆出绅士的态度，仿佛以为血案之是非真相未明（或者他们还不知道是段祺瑞杀了学生或是学生杀了段祺瑞），仍旧主张司法调查，似乎案情调查清楚，是非大明，他们自有办法；可是现在已经司法调查明白了。据京师地方检察厅致陆军部的信上说：“计共验死尸四十三具，生伤四十五名，函称负伤而未受验者七十三人。……内左四区巡长王文绍供称，……在卫队开枪以前，学生仅喊口号，没有别的动作；保安队副分队长郎葆贤供称，学生都拿着旗子传单，没有别的东西，凶器及放火的东西，都没有看见，……卫队放了两次枪，大约放了有一千多子弹，……开枪时刻均在群众奔逃之际，……距国务院大门颇远，……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当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击，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条之重大嫌疑。……”照这样看起来，段执政的皇皇命令所谓“由徐谦以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名义散布传单，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系军警。”都明明是捏造谣言，反而段执政的卫队犯了杀人的罪是实，我们要问问绅士们，你们现在怎样说？又怎样办？

原载《向导》第149期

署名：实

你们代表谁？

(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凡是一个称为代表的，必以有他所代表的人为条件，不然便是冒充代表，或是自称代表。国民党右派在各地还没有什么党部之组织，现在居然在上海召集所谓全国代表大会，东指一个姓张的代表江苏，西指一个姓王的代表四川，南指一个姓李的代表广东，北指一个姓赵的代表直隶，这班未曾经过党员选举的代表，请问是代表谁？

原载《向导》第149期

署名：实

一个不行动的党

(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北京血案发生，全国震怒，上海学生会派人到所谓国家主义的青年党那里，请他们参加市民反段大会，他们回答说：“我们只是宣传，不去行动，我们不象共产党瞎闹。”象这样一个不行动的党，似乎用不着别人再去批评他了！

原载《向导》第149期

署名：实

全民政治与全民革命

(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往往抬全民政治与全民革命的金字招牌来反对阶级斗争说，我们不知道他们所谓“全民”是怎样解释。若说是抽象的指为全民利益而革命，建设全民利益的政治，则和我们民族解放国民革命之意义相类。若说是具体的指由全民出来革命，由全民管理政治；那么，我们便要问：卖国贼、军阀、官僚及一切作奸犯科的人，是否也包含在全民之内？若除开这一大批人，还算得什么全民？

原载《向导》第149期

署名：实

反赤 苛政

(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中国军阀中宣传反赤最力的莫如李景林、张宗昌，而搜括人民最惨的也莫如他两人，这明明是告诉人民：可见反赤原来如此，可见赤不是如此。

原载《向导》第149期

署名：实

《独立报》对谁独立？

(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上海的《独立报》，满纸都是反对苏俄，反对共产党，却不曾反对过帝国主义与军阀；并且盛称张作霖、吴佩孚、李景林、张宗昌辈是爱国者。

他们所谓独立，想必不是拥护中国民族利益对外独立的意思，而是拥护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利益，对中国人民宣告独立！

原载《向导》第149期

署名：实

国民军与北方政局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国民军(专指冯玉祥所统率的国民一军,下同)关系北方政局之重大,这是人人所感觉得到的。国民军在军事上之成败及其政治主张之良否,关系北方政局甚至于关系全中国政治之隆污都很重大,这也应该是懂得实际政治的人所不能否认的。

中国最固定的军阀只有奉、直、皖三系,其他都还未完全形成军阀。国民军乃是由直系军阀中蜕化出来的一部分较进步较接近民众的军事势力,而在今日以前也还未曾形成军阀。何以称他是较进步的军事势力?这是因为国民军比奉、直、皖及其他北方任何军队都有训练,有纪律,不扰害人民;无论李景林如何宣传国民军共产赤化,而天津市民都亲身感受得奉军或国民军孰为可怕。何以称他是较接近民众的军事势力?这是因为国民军无论在张家口,在北京,在天津,都相当的尊重人民之自由,和奉、直、皖等军阀对待人民之态度显然不同。何以说国民军未曾形成军阀?这是因为他不象奉、直、皖各系军阀和英、日帝国主义结了深固的关系,也不象他们那样压迫民众运动。

在奉、直、皖三系军阀循环统治的中国,帝国主义利用这班军阀做工具,无忌惮的剥削中国民众,压迫中国民众,现今在军阀中居然蜕化出一部分较进步较接近民众而不接近帝国主义的军事势力,使军阀势力之自身显露出最后崩溃的征兆,使帝国主义者发生恐怖的心理,国民军这种在客观上的破坏作用,在中国政治进化史上是很有意义的。

可是这种较接近民众的军事势力,也只能认他是较接近民众

的军事势力，而不能认为民众的军事势力。这种较接近民众的军事势力，不但在实力上还很幼稚，在政治观念上更是幼稚模糊而且动摇，若没有民众的鞭策与援助迫之左倾，时时都有向右和帝国主义及军阀妥协甚至退回老家之可能。

反奉战争之初起，国民军即感觉自己一派之实力不足以敌奉、直二派，广州国民政府之势力尚未即能达到北方，于是遂采取了向右联段政策，置北京市民驱逐段祺瑞建设人民政府之要求而不顾；及郭松龄败亡，日奉、吴联合成，四方反赤声起，差不多是全世界反动势力联合向国民军进攻，国民军更感孤危，遂致冯玉祥下野，更向右一步，采取了联吴政策，改造贾内阁，容纳吴派颜惠庆、卢信等入阁；及至天津撤兵，奉、直军仍向北京进攻，逼得国民军一直向右，采取了逐段释曹迎吴的政策（此次国民军逐段，虽然在客观上是民众所赞成的；而在国民军的主观上，是为曹吴的要求而逐段，不是为民众的要求而逐段，所以他此次逐段是右倾政策不是左倾）。释曹已经不妥，何况更公然布告大称其“总统曹公”！幸而吴佩孚拒绝与国民军合作，国民军不得不退出北京，否则他如果更进一步拥护贿选的总统复位，拥护贿选的议员复职，那末，不但不是接近民众的，而且是背叛民众的，他的政治生命也就从此寿终正寝了！因为全国民众对于贿选的总统与贿选的议员，始终是深恶痛绝的。

国民军孤立无援的受国外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军阀之联合进攻，他退出天津，又退出北京，这都不算失败；他因为避免失败，采取日益右倾的政策，丧失民众的同情，这才真是失败！

国民军退回了南口以北，其经济上虽然很难支持，在实力上仍大部分保存着，他若不再向右完全投降吴佩孚，在北方仍旧是帝国主义及军阀之未来的隐患。在北京方面，段祺瑞毫无实力，当然不能在“军党政治”时代保持政权，此时争夺北京中央政权的只是奉、直两党。奉党在北京已占绝对优势，这不但表现奉、直两党的势力失了均衡，同时就是在他们背后英、日两帝国主义的势力失了均

衡，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奉党这种破坏均势的得意举动，便是带来第四次奉、直冲突之种子；可是在国民军未完全消灭或未同奉、直某一方切实合作以前，帝国主义者是要努力使奉、直两党在北京暂时合作的。日本虽然使其工具在北京占优势，而亦不敢完全排除直党，英国虽未能使其工具拿到北京，他也有方法使奉党不得不和直党暂时合作，所以国民军一退出北京，上海《字林报》北京电即说：“有数国公使均以为张、吴若非如旧结合，俾产生新政府，能履行义务订立约章，则不与承认。”

张、吴结合之新政府所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法统问题。法统有两个：一是宪法，一是约法。吴佩孚若坚持拥护宪法，不得不因而拥护制宪的贿选国会和布宪的贿选总统，则必为其第二次失败之张本。拥护约法吗？在法律的根据上，已无法解决由约法相因而至的国会问题。若认贿选议员为无罪，则有何理由废弃他们所议决公布的宪法？若认贿选议员为有罪，则大多数除名，国会如何能开会？若召集新国会，则除躬自违法外，试问由何人依据何法解散旧国会？现时全国民众所要的是能代表各阶级各职业各人民团体的国民会议，而不是代表军阀官僚的国会；在事实上，也只有召集国民会议一法，才可救国会问题的法律之穷。可是国民会议之实现，只有广州国民政府或国民军得了胜利才有可能，也才有意义。国民军如果将来能够恢复在北方的势力，他对于此问题，是向左站在民众方面，宁可与军阀决裂，而不能不坚持自己独立的政策，主张国民会议呢；还是仍旧向右站在附属军阀的地位，主张护法？这是全国民众将来对于国民军之最后试题。

原载《向导》第150期

署名：独秀

国民党右派大会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一个党内发生左右倾的争论或派别，这本是各国政党中恒有之事，用不着大惊小怪。中国国民党本早已有了左右倾的事实，而许多老党员抵死不肯承认，以为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不过是中国共产党故意造出这个名词以图离间国民党的，至少也是由于共产党之神经过敏；及至现在右派公然有了和左派不同的理论不同的组织，仍然要说：“他们（指共产党）一方面尽量的宣传左右派别，使国民党分子自相歧视（此之所谓左右是以和共产派的主张同异而区别）。”只许自己做，不许别人说，真是一件怪事！

至于左右派之分别究竟是什么，右派之内容究竟是怎样，我们都曾经讨论过，或者他们以为这都是我们的推论或误会，不足为据；现在右派的上海大会，已将他们的理论具体的负责任的在大会宣言上公表出来，我们把他们的宣言和国民党第一次大会所通过的孙总理提出之宣言，对照一读，便能够明白；所谓左右派，真是我们“以和共产派的主张同异而区别”，还是他们（右派）的主张，和孙总理生前亲身领导的国民党所决定的主张实有不同。明白了这些，便知道国民党中实有左右派的事实存在，并不是由于共产党故意造谣或神经过敏；而且可以知道年来国民党内的纠纷，不尽是因为右派排斥共产派，而实有左右派因主张不同而冲突的事实存在。

孙总理所决定的联合苏俄及容纳共产分子这两大革命政策，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到第二次全国大会，都未曾变更或加以修正。右派的西山会议，即以变更联俄联共这两大政策为目的；由西山会议而产生的此次上海大会，也是同样的目的。此次大会宣言

上关于联俄之主张，表面上虽然说：“吾人于此，绝不贸然将苏俄列于其他帝国主义之林，一反联俄政策。”同时，实际上历数苏俄对中国侵占领土，把持中东路，侵略外蒙，指勒庚子赔款等罪，和张作霖及其他反革命派对于苏俄之宣传论调，完全一致，事实如果是这样，其结论安得不“一反联俄政策”？且在事实上，他们的重要分子如孙镜亚、何世楨，竟在反苏大联合之化身所谓国民外交协会担任文书主任、宣传主任之职，如此而还非一反联俄政策，什么才是一反联俄政策？他们根本不了解苏俄，遂因而不瞭解以苏俄共产党为一重要成分的第三国际。第三国际是各国共产主义的党派结合，即戴季陶所谓横断国际；国际联盟是各资本主义的国家结合，即戴季陶所谓纵断国际；他两个的性质真所谓风马牛不相及，和第三国际对抗的是第二国际不是国际联盟。然而右派的宣言上，竟说：“国际联盟与第三国际，此世人所视为两不相下之对抗壁垒。在吾人视之，则确有程度之相差，吾人若代表弱小民族视此两个国际，则便无所短长，盖皆基于战胜民族之组织也。”他们称第三国际与国际联盟为两不相下之对抗壁垒，大概是不曾看清季陶的文章。他们视此两个国际无所短长，都是战胜民族之组织，这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曾知道第三国际是一个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的组织，而不是一个民族的组织，更不是一个什么战胜民族之组织，战胜民族中之英、法、美、日、意、比等国的共产党固然在第三国际，战败民族中之奥、匈、土等国的共产党也在第三国际，被压迫民族中之印度、埃及、爪哇、朝鲜、中国的共产党也在第三国际；他们更不曾知道第三国际是遵守列宁“扶助被压迫阶级”、“扶助被压迫民族”这两大革命遗教而奋斗的，在另一方面，国际联盟完全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所把持的压迫弱小民族之总机关。在事实上，第三国际所号召的“不侵犯中国(Hands off china)”，在欧洲各国尤其是在苏俄已成了很广大的群众运动，在另一方面，中国历年来在外交上对于国际联盟的呼吁，得着过什么应声？他们(国民党右派)不知道这些有所短长的事实，因此不能瞭解孙总理联俄联共的政策之真实意义，因以在实际

上取了反俄反共的态度，他们口头上说绝不一反联俄政策，不过藉此掩饰他们显然违反孙总理的政策之痕迹罢了。他们对于共产党之态度也是这样。此次宣言上，一面说：“吾人常认为友军两不相注”，“或有分则相求之可能”；一面：中国共产党“中饱五卅惨案捐款至四十七万之多”，“甚至起反动于本党之政治策源地”（按此句殆指三月二十日广州事变）。他们所指责的这两件事如果是事实，则中国共产党的罪恶，更加于研究系、政学会、安福部之上，人人得而诛之，国民党为什么还当认为友军，还有什么和他相求？民国元二年间，国民、进步两党，在报上相互造谣攻击，已经不是正当的态度，况且在一个党正式负责的宣言上，任意造谣诬蔑他所自认的友军，这是何等太不自重！至于广州事变，其中心问题之中山舰调动阴谋，现已水落石出，究竟是谁起反动于国民党之政治策源地——广州？他们的宣言上，又说共产党“广设济难会为猎资及宣传其主义之工具”。按“济难会”本是不分党派的社会团体，其经费出入照例是公开的，任何党派都不应据为宣传其主义之机关；照右派宣言上那样说法，是不是公开的向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告密，破坏这一个救济政治牺牲者的社会团体？

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所解释之三民主义的内容，可以说是国民党的根本政纲；并且这宣言是孙总理向大会提出的，当然不能说是汪精卫所伪造，更不能说是共产党的主张，所以当时右派的首领冯自由，不但反对共产派，并且反对孙总理。可是此次右派大会宣言的内容，显然和第一次大会宣言相抵触，其要点如左：

（一）在民族主义方面，第一次大会宣言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第一方面，国民党之民族主义，其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吾人欲证实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则当……。第二方面，……辛亥以后……中国之政府乃为专制余孽之军阀所盘据，中国旧日之帝国主义，死灰不免复燃，于是国内诸民族，因以有机陞不安之象，遂使少数民族，视国民党之主

张亦非诚意。……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而此次右派的大会宣言则说：“而民族间之生存竞争，至今犹为不可避免之事实，由生存竞争而形成的两个壁垒：其一为战胜民族，其一为被征服民族；……是以本党之民族主义，主张融合此人类四分之一人口以与战胜民族抗。”他们（右派）把人类分为战胜民族与战败民族两个壁垒，而不把他分为帝国主义者与被压迫者两个壁垒，又指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是主张与战胜民族抗，而不说是与帝国主义抗，这和第一次大会宣言所解释的民族主义之第一方面显然不同。土耳其对于协约国是战败者，对于希腊是战胜者，他究竟是战败民族呢，还是战胜民族？右派的民族主义若不是反对帝国主义而是反对战胜民族，若丢开主义而以战胜战败定反对或同情之标准，则反对英、法、日、美，同时也要反对苏俄，或者也要反对土耳其，甚至中华民国若对帝国主义者战胜了，也应在反对之列，更进而应用到国内问题，固应反对战胜的奉、直军阀而同情于战败的国民军，同时也应反对战胜的国民政府而同情于战败的陈、林、刘、杨了。我们希望中华民国永远不变为帝国主义者则可，若希望中华民国永远不变为战胜民族则似乎不可。丢开主义，不问是非，专与战胜民族抗，我们真不懂得国民党右派这种特别的民族主义是什么一种逻辑？我们固甚希望蒙古将来能为中华民国联邦之一，然亦必须军阀政府推翻全国的国民政府成立，始有资格始有余暇和蒙古民族商谈此一问题；而此次右派宣言上，竟将“叛国”、“僭窃”等征号加诸蒙古政府，视蒙古民族的独立宣言与宪法如无物，这是明明违反了国民党第一次大会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自决权之宣言。

（二）在民权主义方面，第一次大会宣言说：“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民国之民权，……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借以破坏民国。群言之，则凡真心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

等自由及权利。”而此次右派宣言极力号召全民政治，显然与第一次大会宣言所解释的民权主义相违。

(三)在民生主义方面，第一次大会宣言说：“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的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而此次右派大会宣言，竟轻轻的将这两个口号去掉了，“平均地权”是中国国民党最初期同盟会时代的党纲，宋教仁改同盟会为国民党时，新党纲上，轻轻的把“注重民生”代替了“民生主义与平均地权”；不幸的平均地权这一口号，现在又第二次被右派抛弃了！第一次大会宣言说：“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己而奋斗也。而此次右派大会宣言忽说：“今不患农人之无知，而患地主之不悟，地主若觉悟……则农人之困苦当立即减轻以至于无所困苦，俾农人于团结组织之中，不致发生阶级斗争之惨祸。”又说：“直接使工人得较善生活者雇主，而间接使工人得较善生活者社会，盖此种担负，实社会消费者所共任，此社会上大多数之经济利益所以常相调和也。”两相对照起来，前者是主张为农夫、工人之解放反对特殊阶级而奋斗，实质上是不反对阶级斗争；后者则是希望地主觉悟以免除农人之困苦，希望雇主施恩使工人得较美生活，实质上是主张阶级调和，是反对阶级斗争，且明言“阶级斗争之说，至易破坏国民革命，吾人为统一国民革命阵线之故，势必截断其主张。”（季陶先生闻此言否？）

国民党右派，不但有了和左派分离的组织，现在又有了和左派不同的政治主张（这个不同，是右派大会宣言的主张和孙总理所领导的左派主张不同，而不是和共产党主张不同。）有了这些不能否认的事实，所谓国民党左右派，大概不是共产党造谣离间或神经过敏了罢！如果右派能够仍旧接受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而取消他们的此次大会宣言；如果能够取消他们自己的各级党部，而回到广州中央党部统辖之下；我们甘心承认造谣离间或神经过敏之罪。

可是事实上我们已不能奢望右派向左回到广州中央，只得谒

臧奉劝他们不要再向右跑到反革命派那边！因为右派中有些较右的分子，已经和反革命派章太炎、黄大伟、邓家彦、徐绍楨、童理璋等所组织的什么国民外交协会合作；这个国民外交协会，和陈炯明派章太炎黄大伟马育航等所主持英政府及张作霖所资助之反赤大联合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团体。蒙他们不弃认我们为友军，现在敢以友军资格，希望他们和我们在相同的口号“反抗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工作上合作；并敢以友军资格，奉劝你们勿跑到反革命派那边，宁可使我们受神经过敏之咎，不可使我们不幸而高中！

原载《向导》第150期

署名：独秀

第二次和第三次劳动大会之间的中国劳动运动

(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

中国之有劳动运动，其历史还很短，中国的工业犹未发展，工人的数量在全国人口比例上还很很小，可是中国劳动运动的特色，一开始便是政治的和革命的，这是因为中国自身是半殖民地，他的幼稚工业没有别的殖民地供他剥削，以养成劳工贵族，以造成改良运动。并且中国的产业大部分在外国帝国主义或国内军阀管辖之下（如轮船、铁路、纱厂、香烟厂、矿山等），所以中国劳动运动之对象，大部分便是帝国主义与军阀政府，同时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与军阀政府，就是中国民族革命的对象，因此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府，就成了民族运动和劳动运动之共同的政纲，而且这两个运动也只有共同力求实现这政纲，才有出路。

第一次和第二次劳动大会之间的中国劳动运动，其主要的是反对军阀之“二七运动”；第二次和第三次劳动大会之间的主要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之“五卅运动”。这两个运动虽然都失败了，但后者却有伟大的成绩与影响。

在五卅运动前，已经有了国民党改组，国民军发生，铁路总工会成立，胶济路罢工，上海及青岛纱厂罢工，这些事实；第二次劳动大会开会时，已到了中国民族运动和劳动运动爆发的焦点，大会一闭幕，震惊世界的五卅运动便发生了。

五卅运动固然是各阶级联合的民族斗争，然而实际上和帝国主义直接抗争的，乃是上海、香港、汉口、九江、南京、青岛、天津、焦作等处的罢工工人，其他各界人士不过是工人阶级之声援罢了。真

能使帝国主义在华权利发生根本动摇的，也只有这些罢工。

五卅运动虽然因为英、日帝国主义利用奉军的高压而失败了，然而他在民族运动上在劳动运动上的成绩与影响，我们是不能忽略的。

香港的大罢工，在香港及广州的工会统一运动上收了很大效果，此次罢工固然有赖于国民政府之胜利始克实现，同时这次罢工也巩固了国民政府，使国民政府在对外抵抗香港政府势力上，在对内镇压反动势力上，都得着有力的援助。

上海的大罢工，唤醒了全国的民族觉悟，尤其在上海本地，资产阶级至今犹继续他们和平的民族平等运动，如关税自主，设立关税公库，收回会审公堂，工部局增加华董，公园开放，修改洋泾浜章程等。在工人阶级自身的力量上，五卅以前只有极少数散漫组织或空招牌的工会，五卅以后虽然未能继续维持当时二十万罢工工人大群众的组织，而全上海三十六万余产业工人中，已经有约四分之一的工人有了群众的组织，最重要的是纱厂工会（五万余人）、印刷工会（五千余人）、海员工会（二千余人）、码头工会（二千余人），都在他们的总机关上海总工会领导之下，公开的或半公开的进行工作。五卅政治罢工失败，又接之以经济罢工，当时几乎全上海无一工厂没有经济的罢工，即五卅运动中未举行政治罢工的，此时也举行了经济罢工。即在最近数月，此次经济罢工犹未停止，略如左表：

（自一月一日起至四月一日止）

产 业	次 数	参加人数	罢工期时间
纱 厂	一四	一二·八〇〇	五五七·二五〇
邮 务		六〇〇	（未罢成）
金 银 业	一	四〇〇	二四·〇〇〇
商务印书馆	一	四〇〇	四〇〇
麻 袋	一	一·五〇〇	四·五〇〇
袜 厂	一	七〇〇	
共 计	一八	一六·四〇〇	五八六·一五〇

“有了组织便要罢工”，这是上海工人的特性，这因为上海的物价不断的增高，而工资不增，便等於不断的减少工资；尤其是码头工人，他们的工资并且比去年平均减少了一半以上，这困苦不堪的五万苦力，是眼前上海劳动运动一个最紧急的问题。

除了香港、上海，从青岛到济南沿胶济路一带，也是一个中国革命的工人区域。这里的十余万纱厂、路矿、市政工人，在五卅前后可悲可敬的争斗与流血，比任何地方都剧烈；无论经过若何惨的失败，都没有反动的变相发生。他们现在虽在张宗昌铁蹄蹂躏之下，犹念念不忘阶级的组织与政治的争斗；他们的组织，他们的理想，虽然还很幼稚，而他们的本质，我们敢说是全中国工人中最英雄的部分。

沿京奉路即唐山与天津，是北方唯一的工业区，在国民军失败之前，天津已有五万纱厂及城市工人组织起来，并有了他们的公开的天津总工会；唐山除原有路工外，六万矿工亦已开始组织。国民军退后，天津、唐山都入了奉军的范围，工会绝对不能公开，在发展上受了很大的打击。

北京本是一个没有烟囱的地方，然而五卅运动后，也居然有了数千工人组织起来的北京总工会，并且热烈的参加政治争斗，在群众的示威运动中，几乎代替了“五四”以来的学生地位。现在奉军入京，他未免也要受点挫折。

北方的铁路工人运动，本居全国工人运动中首要地位。可是“二七”的伤痕犹未全愈，十余万路工，有组织的尚不及三分之一，现在京奉、胶济二路及津浦路之大部分，又都在奉军高压之下，京汉路工又与旧敌吴佩孚重逢，眼前在组织上在行动上，都有很严重的障碍。

汉口本是中国工业中心之一，在“二七”前，工会运动本甚发达，其后因“二七”以来的政治压迫，农民因灾失业、劳力过剩及工贼活动这三个原因，所以在五卅运动中，汉口工人未能和上海、香港工人携手并进；即五卅后，工会运动仍然没有若何发展。

湖南的矿工运动虽然有两处新的发展，而两处旧的组织——水口山与安源却都破坏了（安源虽在江西省境内，而在工人运动的历史关系上，则属于湖南）；一万多人的安源矿工组织，为日本帝国主义者假手于中国公司所破坏，并且公司为日本资本压迫而濒于破产，在山工作的工人已减少一半以上。长沙的城市工人，大部分都有了组织，且能够参加地方的政治争斗。

依过去一年的经验，尤其是五卅运动中的经验，我们对于中国的劳动运动，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

（一）我们固然不能夸大的说中国工人已是现时中国革命之唯一的势力，但却不能不承认他是一种重要的可靠的力量。

（二）中国的劳动运动之胜败，和中国民族运动之胜败，是在相互影响之下进行的。

（三）在民族运动得到相当胜利的地方，不但工会，即革命的组织亦能相当的存在；反之在反动的军阀势力之下，任何工人的组织都不能存在，虽改良派的工会亦不能发生。

（四）崩溃中的中国军阀势力，断难长期巩固其统一政权，民族运动和劳动运动这两种势力结合起来，随时随地都有冲破军阀势力之可能。

（五）中国工人不但要扩大及巩固自己阶级的联合战线，且急需工农联合之成立，并且要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甚至大资产阶级成立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联合战线，如此才能够得工人阶级在政治争斗上和经济争斗上的初步胜利。

原载《向导》第151期

署名：独秀

捷足射利的上海

(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

上海为中国第一大市,好象美国的纽约;上海的上下三等流氓工于捷足射利,也和纽约相象。新戏馆可射利,大舞台、新舞台、新新舞台、更新舞台、大新舞台等遂络绎出现。游戏场可射利,楼外楼、天外天、绣云天、新世界、大世界、小世界、神仙世界等遂络绎出现。电影可射利,神州影片公司、新大陆影片公司、明星影片公司、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长城画片公司、国光影片公司、朗华影片公司、大明影片公司、好友影片公司、开心影片公司、新人影片公司、非非影片公司等遂络绎出现。自《字林西报》登载英国国家银行汇英金六十万镑到东方做反赤宣传的费用,反赤大联合、国民制赤会、国民外交协会、反赤同盟会等遂络绎出现。

原载《向导》第151期

署名: 实

唐生智也赤了吗？

（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

吴佩孚讨冯，分明是报复倒戈之仇，然而他不说是复仇，说是讨赤。现在吴佩孚又利用叶开鑫向湖南扩张地盘，也说是讨赤，并指唐生智已宣言共产。从前陈炯明派屡次说广州政府将于某月某日宣布共产，现在叶开鑫又说唐生智已宣言共产，何中国赤之多而共产又到处能够这样任意宣布！

原载《向导》第151期

署名：实

讨赤大元帅

（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

从前还有些人不知道“赤”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现在见各报京电：“某方推曹锟为讨赤大元帅，张作霖、吴佩孚副之”，才知道所谓“赤”就是不利于曹锟、张作霖、吴佩孚，而为他们所要讨的一件东西。

原载《向导》第151期

署名：实

各国公使为什么均有喜色

(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

日本电通社说：“查家墩联军总司令部开秘密会议，议决俟颜惠庆内阁复活时，即向赤俄政府要求召还加拉罕。”又说：“张作霖要求俄大使加拉罕退出北京，态度非常强硬，加屈伏，拟日内出京，各国公使均有喜色。”同时，《新闻报》北京电：“撤换加拉罕事，俟新政府成立，即将提议，商请苏俄，自动更调，届时日本将首先改派大使，为使团领袖。”帮助张作霖的日使芳泽推翻了帮助国民军的俄使加拉罕，帝国主义的各国公使当然均有喜色，反赤的先生们自然也有喜色；但若因此中俄绝交推翻了中俄协定，中国国民是否也均有喜色？

原载《向导》第151期

署名：实

国民外交原来如此！

（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

顾维钧命杨春绿在上海办一个什么“国民外交协会”，其目的有三：一是为英国人宣传反赤，以抵制迫在目前的五卅纪念运动；二是为吴佩孚做联英反赤机关；三是为顾维钧自己再入外交部之后援会。所谓国民外交原来如此！

原载《向导》第151期

署名：实

这是以党治国吗？

（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

广州国民党党政府之下的公安局，居然派员检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机关报——《民国日报》等，这是以党治国呢，还是以警察治党？

原载《向导》第151期

署名：实

可怜的租界华人立宪运动

(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

上海商民主张修改洋泾浜章程,这种和平的立宪运动,在革命派看起来,已经是对大英帝国主义者十分妥协了;然而帝国主义的使团,对于此次洋泾浜章程修改运动,认为华人心理已趋极端,想必他们以为租界华人必须照旧俯首帖耳受帝国主义的统治才不是极端!不过他们还未说修改洋泾浜章程是过激运动,已经算是客气了。

原载《向导》第151期

署名:实

白俄不是外力吗?

(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

赤俄帮助一点中国革命运动,便有人起来大喊拒绝外力;现在奉军攻取北京,首先派白俄骑兵四百余人,从安定门入城,任意拘役行人铺户,为之牧马操作(见四月二十五日上海《新闻报》北京通信),何以大家一声不响?

原载《向导》第151期

署名:实

最近政局之观察

(一九二六年五月八日)

国民军退出北京后，唯一重要的政象就是奉、吴发生暗潮。此暗潮之特点，就是护法、护宪之争执及助长此争执之关系奉、吴两方实际利害的内阁问题。奉张知道护宪必复颜阁必复旧国会，颜属吴派，旧国会大部分贿选议员都不啻是曹、吴家之养卒，这些都于奉不利，他又知道曹宪与贿选国会大不理于众口，乐得在此方面与吴一争。吴亦知道他在北方之军事实力远不及奉张，非从政治上进攻，非藉护宪以恢复颜阁与旧国会，无由分得北京若干政权，因为北京的精华——京师警察厅及崇文门税关，都已落于奉派之手。内阁问题，此时尚非阁员分配之争，而是内阁总理属于直派或奉派之争，此争仍将取决于护法或护宪。若护宪，当然要恢复直派之颜阁，奉张所争则在财、交两部；若护法，则奉张及其背后之主人——日本帝国主义者，必不甘心放弃政府领袖地位之权利，此时直吴及其背后之主人——英国帝国主义者，为顾维钧所预定之外交坐位，亦决不至为他人所夺。

在北方军事上，直吴远逊于奉张，然直吴多政客奔走人材，即在民间的政治空气上，奉张更不及直吴，且国民军尚近在京北，随时有联直之可能，此亦迫得奉张不得不对直吴让步之隐情。因此，直、奉军阀及其背后英、日帝国主义者实际利害之冲突虽终不能免，然以政治的环境，又不利于即时决裂，于是他们不得不别谋暂时弥缝之一策，以和缓其急冲。

其策为何，即继续军事行动，分讨南北二赤，使奉、吴势力得分途发展，不至两力汇集于北方，随时皆可发生冲突。此策见之实行

者，就是直鲁联军向南口进发及吴佩孚进攻湖南。吴之进攻湖南，不用说其目的地乃是广州。此策实行将来的效果又是怎样呢？

奉、吴若真能分向南北发展，虽不能完全免除他们在北方之冲突，当能和缓其目前冲突之危机。奉军若得阎锡山之助，国民军又不能于最短时间消灭阎军，则诚难以一军敌热河、南口、大同三面之进攻；国民军消灭，奉张对直吴态度当更强硬，同时若直吴向南亦得相当发展，则奉、直关系，自必重入危机。吴佩孚向南图粤，在地利上当然没有一直由湖南进兵广州之可能，势必由湖南、江西、福建及广东内部（陈炯明、魏邦平之余孽）四面包围，再加以香港方面之封锁及示威，才能收效。不过唐生智若不降吴，湖南方面即能牵制吴佩孚一大部分兵力；江西方面，方本仁虽然尚未表示反吴，而其遗留在江西之旧部如唐、蒋、二杨，实不易为吴佩孚驱为攻湘攻粤之用；闽周本只能自保，非至吴军进入广东，彼未必肯出兵；孙传芳时虑吴佩孚勾结苏、皖、浙各军将领向之倒戈，其自身地位且日在危险状态中，更不会为吴攻粤；袁、杨都意在据川，那能为吴远征；河南之红枪会及豫军已开始豫人治豫运动，且为吴佩孚之后患；以这样的环境，只要广州国民政府对于内外各方面的政策应付得宜，则吴佩孚向南发展之希望本是很少。吴佩孚若不能向南发展，势必至一面忍气联奉以自固，一面勾结夏超、陈仪、陈调元、王普等推倒孙传芳，收苏、浙、皖三省于自己势力之下，以统一长江，以备与奉张一战。广州国民政府在此期间若有充分准备，甚至国民军尚能在北方保存若干实力，奉、直战争再开时，中国政局又必有一次新的大变动。

原载《向导》第152期

署名：独秀

我们要认清敌与友

(一九二六年五月八日)

在中国国家的利益上观察中俄协定，无论何人都不能否认是于中国有利的。英、美、法、日等国，不但不肯允许我们收回租界，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在租界增加几个华董都很不容易实现，要和纳税外人有平等参政权，那就更难了；可是依中俄协定苏俄把所有的租界、租借地都放弃了。英、美、法、日等国，不但不肯放弃领事裁判权，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至今不能收回比领事裁判权更不法的会审公堂；可是依中俄协定，苏俄已经把领事裁判权放弃了。英、美、法、日等国，把持中国的海关，以协定税制制我工商业之死命，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经过五卅惨案和全国商会关税自主之要求，其结果关税会议，仍旧是在协定制下增加二五，自主不过是一句空话；可是依中俄协定，苏俄已放弃协定关税制而改用相互平等的原则了。英、美、法、日等国，根据一切不平等条约欺压中国，尤其是根据辛丑条约，驻兵京、津、沽等处，东交民巷简直是国中之国；可是依中俄协定，苏俄已放弃以前一切不平等条约，并已实行退出辛丑条约国，不在中国境内驻兵，连保卫北京大使馆的兵都没有。

苏俄并不象德、奥是欧战中之战败国，他对中国放弃了各帝国主义不肯放弃的租界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京津沽等处驻兵这些侵犯中国国权压服中国之工具，除了他以平等的友谊对待中国外，试问还有什么别的理由？

各帝国主义者看见苏俄悍然退出辛丑条约国，对中国放弃了这些权利，使他们相形见绌，还恐怕因此引起中国人对他们发生怨愤；如此，他们恨苏俄，攻击苏俄，本是情理之常。若中国人也因此

恨苏俄，攻击苏俄，那便出乎情理之外了！难道我们中国人真是日本人嘉纳治五郎所讥诮的“只服强权不服公理的民族”吗？

杜洛斯基曾在五卅被害之工人与学生追悼大会上说：“中国的房子属于中国人，要进去须先敲门，主人有权利放朋友进去而驱逐他所认为敌人的出来。”

日本帝国主义者帮助张作霖打败了郭松龄，又帮他夺取了大沽口与天津，英国帝国主义者帮助吴佩孚打败了河南；于是吴佩孚、张作霖遂带了英日的势力到了北京，于是张作霖、吴佩孚遂出来要求苏俄撤回办理中俄协定之加大使。这便是张作霖、吴佩孚放进他们的朋友英、日帝国主义者，驱逐他们的敌人苏俄。他们认英、日为朋友，所以要亲英派的颜惠庆、顾维钧出来组织政府担任外交；他们认苏俄为敌人，所以连办理中俄协定的王正廷都算是赤化党，而加以排斥。这原来是中国军阀的意见，他们这种意见，当然不能够代表中国的主人——大多数民众——之意见。大多数民众之意见，也是认保有租界领判权、协定关税、京津沽沪汉驻兵及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英、日帝国主义者为朋友而要放他们进来，也是认放弃这些权利的苏俄为敌人而要驱逐他出去吗？当然不是这样，不但张作霖、吴佩孚不能代表中国大多数民众之意见，即一般反赤的政客、流氓也不能代表中国大多数民众之意见。中国大多数民众之意见，固然有一部分人对于赤化不无怀疑，而对于帝国主义者保有租界、租借地（如旅顺、大连、威海卫等）、领判权、协定关税、京津沽沪汉驻兵及一切不平等条约，却是一致愤恨；对于苏俄放弃这些权利的中俄协定，断不至因为赤化之故而加以拒绝。此时中国民众尤其是上海民众所奔走运动的，是租界华董、收回会审公堂、反对越界筑路捕人、关税自主、设立关税公库、修改洋泾浜章程这些问题；这些问题运动之对象，都是反赤的英、美、法、日等国，而不是赤俄，因为中国民众所要收回的这些权利，赤俄都已经根本放弃了。中国民众正在向反赤的帝国主义者要求收回这些权利；同时，张作霖、吴佩孚便主张驱逐办理中俄协定放弃这些权利的赤俄大使；不

但中国的军阀的意见和民众不同，并且是针锋相对。

不过中国民众现时的态度还是不够，因为民众对于张作霖、吴佩孚的反俄政策若不加以纠正，——足以破坏中俄协定；足以使各国的民众怀疑中国人对于外国放弃在华权利是欢迎还是反对；足以使别国不敢效法苏俄退出辛丑条约的关系，以为一退出辛丑条约，不能驻兵北京保卫使馆，便要受中国人的侮辱。

中国的主人即大多数民众，应该更进一步明白表示其意见和军阀不同，应该简单明瞭的告诉一切外国人：凡是来敲我们门的，无论强弱赤白，只要声明放弃租界、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京津沪汉等处驻兵及一切不平等条约，概认为朋友请进来，否则一概认为敌人请出去。如此才能够一洗“只服强权不服公理的民族”之耻辱；我们不从头脑中把这个耻辱洗净，别的一切国耻是不会洗去的啊！

原载《向导》第152期

署名：独秀

向赤或向反赤之路标

(一九二六年五月八日)

我们对于赤化有所怀疑吗？我们应该赞成反赤吗？现在事实先生告诉我们说：赤俄已经把租界、领判权、协定关税、驻兵中国及一切不平等条约都放弃了，倒是反赤的英、美、日、法等，不肯放弃这些不法的特权；称为赤化的国民党党军，无论在省城在东江都秋毫无犯，倒是反赤的陈炯明军在闽粤边焚杀不堪；称为赤化的冯玉祥军，无论在张家口在北京在天津都“秩序井然，一尘不染”，倒是反赤的奉直鲁联军“颇有奸淫抢劫之事”；这些事实就是指示我们向赤或向反赤之路标。

原载《向导》第152期 署名：实

奉军胜利之教训

(一九二六年五月八日)

你们常说：奉、直和国民军战争是军阀的战争，谁胜谁败都和人民无关。可是国民军开到北京、天津退出北京、天津，从未惊扰人民，奉联军一到天津、北京，军用票便吓破了商民的胆，一直闹到“妇孺逃徙十室九空”，他们的胜败，果和人民无关吗？你们又主张学生只应读书求学，不应与闻政治，可是现在奉军一入京，各校都停课了，教员大部分逃走了，女学生更惊骇的几乎连逃走都来不及，政治如此，请问如何读书求学？此次奉军胜利之教训，能否稍稍改变你们的旧观念呢？

原载《向导》第152期 署名：实

南方形势与国民党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吴佩孚不能以武力在北方夺取完全政权，遂转而向南方发展。他向南发展之步骤，第一步是以实力援助湖南所有的反唐军队，驱逐唐生智出湖南，把湖南放在他的势力支配之下；第二步便是联合湘、鄂、川、滇、黔、豫、赣、闽八省军队围攻两广。他的目的是否可以完全达到呢？

他的第一步目的已经达到一半，恐怕终久只能一半，因为唐生智的军队并未受损失，何况还有两广的援助，并且郴永地势易守而难攻，吴佩孚欲得全湖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的第二步办法正在开始进行，他叫袁祖铭把四川让给杨森，一面杨森得到四川便可出兵攻粤，一面袁祖铭回黔联唐，便可联合滇、黔军队攻粤，他这种如意算盘，至少一半是幻想；河南方面，只有寇英杰原有的三旅现已扩充为三师可以作战，但须留守河南，其余收编的豫毅等军都毫无战斗力，并且豫军尚有勾结红枪会反吴的趋势；江西方面，方本仁旧部和鄂军对抗的暗潮，还未完全消灭；福建因与孙传芳的关系，能否出兵攻粤，也尚成问题；此时吴佩孚真可用作攻粤的，只有湖北全省军队及河南、湖南、江西一部分军队，云南唐继尧也有乘机攻粤之可能，其中最热心作战的，要算马济之对广西，陈林旧部谢文炳、刘志陆之对广东。不过吴佩孚以八省兵力攻取两广的计划虽然有点幻想，而指挥湖北、湖南、河南、江西这四省兵力并且利用唐继尧向粤围攻，这是可能的，因此南方的形势，此时十分严重！

国民政府所在的两广，不但是南方的革命根据地，而且是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根据地，全国的革命民众应该出其全力，拥护这

根据地。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适于此时在广州召集全体会议，在此次会议之重大的职任，即是为国民政府决定各种方略，以抗此次吴佩孚之进攻。因为此次吴佩孚向粤进攻，是有大的计划，我们不可过于轻敌。他此次进攻之胜败，是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之生死关头，所以在此次国民党之中央全体委员会议中，这是唯一的重要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之方略，不但是要两广迅速出兵援湘，并且对邻省若江西若福建，都要有适当的策略，并且对北方的国民军，河南、湖北、四川以及山东、江苏间的军事政治变化，都应充分注意，尤其要果决迅速的肃清广东内部反动的右派势力，使他们不至乘广东出兵后发生阴谋。因为由三月二十日事变，我们不能不承认广东内部尚有反动的右派势力之存在。

反动的右派，在广东因环境的关系，貌为拥护国民政府，貌为和北京、上海的右派不合作；实际上，他们不但反对共产党，并且在军队中禁止阅看汪精卫、蒋介石的演说词，他们在党军始终要团结自己一致的势力。

反动的右派现在在上海及其他各处宣传说：此次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会议，共同的是要重新讨论联俄联共政策的问题。我们敢说这完全是谣言。修正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政策，是右派自西山会议到上海大会一贯的主张，广州中央的中央委员最大多数是革命左倾的分子，那会和西山会议以来被国民政府命令称为“叛徒”的右派走到一条路上去？

况且，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正在和吴佩孚势力进攻决斗之生死关头，惟有加紧结合全国革命的势力，以当大敌，凡是一个中山主义的革命党员，岂有反而对中山先生联俄联共的革命政策怀疑而要重新讨论之理！

原载《向导》第153期

署名：独秀

宪法与贿选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反对贿选案，始终是全国普遍的舆论。中国社会的公是公非只有这一点了，我们万分不应该连这一点都要把他毁去，毁去这个，比毁去任何法律，损失都大！

舆论反对贿选，当然对于一买一卖的贿选总统和贿选国会议员，同样反对。舆论既然反对贿选的国会议员，他们是猪仔，怎能够承认猪仔们有代表人民制定宪法之权。

舆论现在反对护宪，其理由很简单明白，就是：根本反对贿选，根本反对贿选的猪仔议员所制定的宪法；并不是因为宪法的内容好或不好，也不单是因为宪法为曹锟所宣布说他是曹宪，更不是为张作霖或黎元洪而反对护宪，至于不是受了赤党的煽动，那更不用说了。

舆论反对护宪，固然是因为贿选之故；直系护宪，也正是想使贿选议员所制定的宪法有效，依宪法贿选的总统也有效，贿选的总统虽辞职，贿选总统任命的颜阁仍然有效，如此则贿选一案遂无形宣告无罪了。直系这种想头，直是本末倒置，他们若无充足理由宣告没有贿选这件事或认贿选为无罪，则无论如何依法定程序而选举的总统，无论如何依法定程序而制定的宪法，都是国民所不能承认的呵！最近吴佩孚致电张作霖申述护宪的五个理由，便是根本不懂得这个道理。

该电所举第一个理由是宪法根据约法而产生，故护约即当护宪。他忘记了当时宪法产生情形，除了根据约法而外，还有贿选一段事实；他更忘记了制定约法者是革命政府的临时参议院，制定宪

法者是贿选议员的宪法会议。

他第二个理由是说：“宪法经宪法会议依法定程序自行制定，自行宣布，议录事实俱在，众目昭彰，……大总统并无宣布宪法之权，强谓宪法为曹宪，与事实不合，于法理尤谬。”不错，十三年宪法是经宪法会议依法定程序自行制定的，可惜这班宪法会议议员所犯贿选的罪，也是“事实俱在众目昭彰”！从前袁世凯想做皇帝不成，仍想保全总统地位，遂宣传说，谋复帝制的是袁世凯个人，不是袁总统，不可并为一谈；现在直系想保全他们的贿选总统不成，仍想保全他们的贿选议员所制定之宪法，遂宣传说：贿选是贿选，宪法是宪法，不可并为一谈，殊不知袁世凯总统即当时谋叛民国的袁世凯，他如何能够继续为民国之元首；制定宪法的国会议员即当时贿选总统的国会议员，他们如何能够代表人民制定国家根本大法！

该电所举第三个理由是说：“约法上只有临时大总统，而宪法上之大总统选举法，系民国二年十月四日所宣布，袁世凯由约法上临时总统被选为正式大总统，适用此法，黎、冯、曹选出，亦均由此法，实无约、宪之分。”他忘记了袁、黎、冯、曹虽同是依据二年之大总统选举法所选出，而却有贿选与非贿选之分；他又忘记了二年之总统选举法和十三年全部宪法之制定者，亦有贿选议员与非贿选议员之分。

该电所举第四个理由是说：“黎、曹去位系政治问题，非法律问题，皆不复位，故不违法，现只宜恢复段氏所毁之法，确系为法而非为人。”一般舆论固然反对段氏，并且有一部人反对段氏毁法，不过反对段氏毁法的人，除直系及其贿选议员外，大都是指约法而不是指宪法，因为宪法乃贿选议员所制定，段氏毁之，舆论不但不反对，并且称快。现在直系要恢复段氏所毁之宪法，为人固丑，为法又何尝不丑！

他所举第五个理由是说：“大总统已缺位，自应依据民国二年十月四日宣布大总统选举法之第五条，即今宪法之第七十六条，以

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务。”第一、我们不能承认民国十三年之贿选宪法和民国二年之大总统选举法有何等效力；第二、我们不能因为贿选宪法一部分含有民国二年之大总统选举法，遂承认其全部有效；第三、我们不能承认贿选总统有效，无论他是依据贿选宪法或二年之大总统选举法所产生的，同时也不能承认贿选总统所任命的国务总理摄政资格，无论是依据贿选宪法之第七十六，或是依据二年大总统选举法之第五条。

总之：直系军人及政客，若不顾忌舆论而惟武力是逞，那就罢了；若向人民高谈法律，人民便坚决的回答道：我们根本主张贿选的国会议员所制宪所举总统及贿选总统所任命之国务总理，一切无效！至于宪法会议及大总统选举会之出席法定人数足不足，还是第二问。

原载《向导》第153期

署名：独秀

英国大罢工与东方民族运动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前世纪之末本世纪之初，世界资本制度已发达到最高形式——统一世界之财政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因此，全世界的经济成了整个的，全世界政治也随之成了整个的；因此，全世界的统治者压迫者——资本帝国主义——成了整个的，全世界被统治者被压迫者——工农阶级及弱小民族——对于统治者压迫者之反抗，也成了整个的；因此，全世界的解放运动也应该是整个的，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和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工农解放运动，都是整个的世界解放运动之一部分而有相互的密切影响，决不是国家主义者所想像各国关起门来独力革命可以得到成功的。国家主义者关门革命的方法，犯了时代错误的毛病，他们忘记了现在已经是二十世纪之第廿六年，已经由国际资本帝国主义造成的革命对象是整个的世界革命时代，而已经不是十八世纪各国各自对于本国统治阶级革命的时代了。

这还是理论一方面，事实上的证据又是怎样呢？去年的五卅运动，在国家主义者看来，这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似乎和欧美及日本的解放运动无关了；然而事实先生告诉我们：欧、美、日本各国的工人及其政党，都对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五卅运动，曾予以精神上的物质上的援助。五卅运动所反抗的对象，为首的是英、日两国，而英、日两国的工人竟援助中国人的五卅运动，在国家主义者的理论，未免要责备英、日两国工人太不爱国了。

现在英国的大罢工，在国家主义者看来，这是英国的阶级解放运动，似乎也和中国无关，更和中国知识阶级无关；然而中国的国

民党及学生会都奋起援助。上海学联会致英国工党电说：“贵国此次总罢工，予资本主义以莫大打击，本会谨以十二万分之诚意，表示无限同情。敝国今日正处于各资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之下，而尤以贵国所加于我者为剧，苦痛之余，切盼贵国各工友一致奋起，到底不懈，与吾东方弱小民族共同携手，而人类真正和平亦得早以实现。”此电中“苦痛之余”四字，是表示被压迫的中国学生之泪和被压迫的英国工人之泪汇合在一处了！

全国学生总会通告全国学生说：“英国工潮奋发，全世界工人均起而予以同情及实力援助；吾等被压迫国家之中国人，亦未便漠视，因为各帝国主义国家内之工人运动，影响于东方民族运动者甚大，尤其是英国工人，例如去年五卅运动，各国对中国民族表示同情的，只有工党；其后英国拟以武力侵犯广东，也因为运输工人反对而止。今后英国运输工人若不为英政府任对华出兵之运输工作，英人将永无输送军队欺压中国之可能，吾等为自己的民族生存计，势不得不起而努力，与此时英国罢工的矿工及一切运输工人以声援。”远离英国数万里之中国学生，若没有自己民族要求之冲动，若不认识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工人运动之共同的敌人是资本主义，他们为什么要援助英国的罢工工人！

国民党右派的理论，一向只主张联合世界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未曾主张联合世界被压迫的工人阶级；然而现在对英国工党领袖迈朗氏也说：“如外国之被压迫阶级如英国工党，善意的帮助中国，自当乐受。”这句话的意义，是事实逼迫着他们不能不认识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的而不是国家的了。

国家主义者或者又要说：照国家主义的理论及策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即中国对外国之独立运动，应该是国家的，应该由中国人自己自力来干，用不着联合什么世界弱小民族和被压迫阶级；把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阶级联成反帝国主义之整个的世界革命，这乃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及策略，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应该是国家主义的运动，用不着赤化的理论与策略。

不错,把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看做整个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诚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理论与策略,并且目前在中国之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运动,也只是这一理论与策略的运动,不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根本上决不是什么劫富济贫的均富主义,并且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都不曾幻想中国马上就能够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制度。不过我们要睁开眼睛看看全世界的实际状况和中国的实际状况,我们若真心要做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是应该采用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与策略,联合全世界被压迫阶级与被压迫民族来共同革命呢?还是应该采用国家主义的理论与策略,关起门来独力革命?

若采用国家主义的理论与策略,去年各国工人援助中国的五卅运动,今年中国工人、学生援助英国的大罢工,都是多事了!

原载《向导》第153期

署名:独秀

不怪外人都是中国人自己不好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虞洽卿说：“查上海之有租界，本无不平待遇，自前清上海道屡次放弃，以致不平等之办法，逐渐发现，……自有租界以来，前四十年中外极为融洽，后四十年则以中国官民之放弃，不平之状渐显。”照虞会长的意思，上海租界以至于全中国所受列强不平待遇，都是中国人自己不对，不是帝国主义者有意欺压我们。诚然，诚然，总商会不首先向外人妥协，五卅运动何至失败的那样快；戒严司令部不杀刘华，工部局怎好直接杀他。诚然是中国官民自己不好呵！

原载《向导》第153期

署名：实

外交界是以平等的好感对谁？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优待酋长，利用酋长压服平民，这本是一切帝国主义者制驭殖民地的老法子。孙传芳此次到上海，租界外人稍稍优待他，他便很得意的说：“所快慰者，不在乎酬酢联欢，乃在乎外交界方面一洗昔日轻视华人之积习，能以平等的好感对我。”殊不知帝国主义者优待孙传芳，以平等的(?)好感对孙传芳，正是利用孙传芳帮助他们轻视华人，帮助他们以不平等的恶感对中国平民呵！华界军警帮同租界一致严禁“五一”、“五四”、“五九”、“五卅”的集会示威运动，这便是孙传芳对于外交界以平等好感待他的报答！

原载《向导》第153期 署名：实

直奉冲突之迫近与各方 应取的态度

(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自吴佩孚通电护法讨赤到国民军退出北京，这四个月间是英、日、吴、张合作支配北方向中国民众进攻时期。自国民军退出吴、张势力进了北京，因为互争政权，吴、张间及其背后之英、日间便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日益发展，到现在已由暗斗而进于明争。他们的暗斗明争，表面上虽然是护宪与反护宪，实际上乃是内阁与总统之争。

依据宪法恢复颜阁，已为张作霖所不悦；此次阁员分配，除奉派一个半员外（内郑陆张），几乎是清一色的直系内阁，此为奉张所不能容忍，因此有电京反对颜氏摄政之说；张学良、张宗昌遂于十二日相继出京，石老娘胡同办公处完全结束。内阁问题即或能以易人及重新分配而消弭争端，恢复国会选举总统之争即代之而起。贿选国会议员，直系占大多数，事前直方对于总统选举问题若无对奉屈服之协定，奉方岂甘心屈服于直方承认国会之恢复？张作霖即碍于前此协定而不便公然反对颜阁与国会，其消极抵制亦足使颜阁及国会均不能实际存在，如此酝酿日久，又加安福派之活动，英、日、张、吴的联合战线终必破裂。

此联合战线破裂时，民众对之应取何态度呢？民众对英、日、吴、张，始终是一致反对，同时也注意他们的联合战线之破裂，是有益于民众的一个事实；民众因不必援助何方，即对于拥护贿选国会之直吴，比对奉张更加反对，对于盘据中国腹地为害中国更是国家的而非地方的之英、吴，比对日、张更加反对。

国民政府及国民军,对于吴、张冲突,将取何种行动呢?不用说国民政府对吴、张两派军阀是一致反对的,又是其北伐的军事行动,一开始便与直吴触接,不倒吴莫由讨张,况且眼前进攻湖南同时又正在准备援助马济进攻广西的,是直吴不是奉张:“先讨吴后讨张”,这是国民政府不易的军略。国民军若联直攻奉,则所得的除热河外将一无所有,所失的是为直吴利用,助其恢复全国唾弃的贿选国会,断送国民军的政治生命,因此国民军也只有和国民政府取一致的态度,采同样的军略,才能得民众的同情,才能由山西一直向南发展和国民政府北伐讨吴的军事势力相连接。

以上只是国民政府及国民军反军阀战争的目前一部分军事工作,这一部分工作如果成功,其意义就是为中国革命的军事势力立下一个比现在稳固的基础,可是全国的民众,尤其是受奉系军阀蹂躏最甚的直隶、山东、奉天民众,应同时奋起反抗当地的军阀,引导所有倾向革命的军事势力,使此次战争成为普遍全国的反军阀战争,一直到摧毁一切军阀的政权,建立革命的人民政府。

原载《向导》第154期

署名:独秀

孙传芳最近的主张

(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孙传芳平日的态度，仿佛是注重实行，不屑多说空话，即是不肯发表主张；可是最近他却也发表主张了，且正式的发表主张了，他所发表的主张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三件：(一)是江日两通电；(二)是五日在总商会关于淞沪商埠市政之演说；(三)是六日在交涉署招待外宾之演说。

江日两个通电，一是主张颜惠庆摄阁，一是声明保境息民政策。孙氏向来表示护法而不护宪法，现在江电说：“依曹公通电恢复十三年十月之颜惠庆摄政内阁”，则分明是拥护宪法了。孙氏主张何以有此变化？不用说是反对奉天和迎合吴佩孚两个动机凑合而成的。因为反对奉天，遂不惜牺牲自己的主张而附和吴佩孚，如此，——他还是从前不发表主张的态度好。孙氏向抱江、浙、皖、赣、闽五省门罗主义，现在保境息民的江电又说：“窃愿划境以自安；数月以来，迭电声明：人不犯我，我绝不犯人，皆本息事宁人之旨，为保境息民之故，……如贪婪窃发，挟我藩篱，隳我农桑，扰我商贾，亦惟有率我五省之师旅以遏制之而已。”这电为何方面而发，对山东奉军，对吴佩孚，对广州国民政府，或兼对上述各方面，我们都不必深究这些；我们所要质问孙传芳的是：唐生智并未曾犯江西，而江西竟出兵攻湖南，这是否划境自安，是否息事宁人，是否保境安民？或者有人特别原谅孙传芳，以为他在名义上虽是五省联军总司令，而事实上无权过问江西之事；如果是这样，将来国民政府北伐军开到江西的时候，则孙氏便应该免开尊口，说什么“率我五省之师旅以遏制之”这一派的官话了！又孙氏在总商会演说也说：“前日

广东代表至鄙人处接洽，鄙人告以南征北伐均属无益，鄙人敢担保五省以内，决不愿举兵南侵。”可是事实上江西确已举兵帮助吴佩孚南征了，孙氏的担保怎么样？并且孙氏又能够担保，福建不受吴佩孚命令举兵攻粤吗？在实际上孙氏既然不能支配五省，便不应轻于开口，说什么担保五省以内怎样怎样像煞有介事的话。如此，他还是从前不发表主张的态度好。

孙传芳对于上海市政的主张，我们可以在他的演说中指出几个要点。他说：“想在上海设一个机关，把地方的行政集中在一处。”又说：“为大上海做一个牢固的根基，当局的人一定要有政治上的实力，换言之，按现在的情形，非官厅先来试办不可。”又说：“对于地方人士的首领，我们不能不征求他们的意见，不能不使他们知道商埠督办公署的内容，所以设一个参议会，代表各区的人民。”又说：“暂时以淞沪警察厅所管辖的区域，加上浦东淞沪警察厅第三区第一分区与第四分区中间原属上海县管辖的地方，为淞沪商埠的区域。”又说：“模范市的市民，是要预备将来做一等国的国民的，不是容易当的，是要出钱买来的。单就南市闸北两处讲，一百万块钱一年，是万不能够用的。……所以商埠督办公署成立以后，原来有市政的地方，旧税要积极的整顿，旧税以外，还要筹办捐税，原来没有市政的地方，得照闸北南市的办法，一律纳税。”这就是他对于上海市政之具体的主张，其余若筑路卫生，改良市政，收回租界的预备，以至所谓“真正的自治邦”“理想的大上海”，我们只好看做菩萨庙的签，灵验与否，不须留意。在这些具体主张中，我们可以看出的几个要点是：（一）淞沪商埠的区域，是北至吴淞，南至龙华，东包浦东，西画沪西，除了中间的租界，都在他管辖之下；（二）交涉署道尹署警厅虽仍属省行政而非商埠公署之直辖机关，但同时两署厅的长官都兼任商埠公署处长，事实上已将所有地方的行政权都集中在商埠公署，已渐渐形成一个半独立的上海市政府了；（三）在这半独立的上海政府之下，据他说：闸北、浦东、吴淞、沪西四区

的市政，暂时官办民督，南市一区则民办官督，总而言之，都“非官厅先来试办不可”；(四)所谓参议会，只是地方人士首领对于商埠公署顾问的机关；(五)就是要整顿旧税，筹办新税。

就这几个要点看来，如果他真心欢迎人民批评，我们便不妨批评一下。我们现在的批评，并不是故意拿高调来反对孙传芳或丁文江，乃是批评他的主张是否如他所说：“实际上是参酌目前的政局，上海的情形，比较的最可实行的一种办法。”第一，他把大上海的根基，不建筑在市民的权力上面，而建筑在当局者政治上的实力上面，主张非官办不可；殊不知参酌目前的政局，所谓政治上的实力，能保三五年甚至三五个月不发生变动吗？市民的权力，现在固然还很弱，而他的寿命却比官厅政治上的实力长得多；想拿这种短命的实力来为大上海做一个牢固的根基，这根基实在太不牢固了！第二，公共租界工部局之岁入，其主要税收，在一九二三年已超过五百万两（内计：地税一·五〇五·〇〇〇两，市政捐三·一四二·〇〇〇两，码头捐四二七·〇〇〇两）；上海市闸北、南市、吴淞、浦东、沪西五区，比公共租界，地面至少要大四倍，人口至少要多一倍半，而岁入只有其十分之一；其所以如此，乃因为上海租界是外国资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输出原料输入制品之最大市场，亦即他们掠夺四万万中国人之中心枢纽。所以上海租界有如此物力，直接上虽是租界居民所负担，其实间接上乃是帝国主义者掠去全中国四万万人血汗之余沥所造成；这种掠夺者与被掠夺者的关系若不改变，照现在上海的情形，而想在租界以外的上海市，诛求和租界同样的税收，办理和租界同样的市政，并由此法而收回租界，这岂非和封神榜西游记是同等的幻想！第三，即让一万步，承认他是最可实行的一种办法；可是他一面要整顿旧税筹备新税，一面只主张非官办不可，而不肯赏给纳税人一点参政权，这种最可实行的办法，将来实行起来，不无小小困难罢！最近纸烟捐的风潮，就是一例。在这半独立的上海市政府之下，不说普选的市民议会了，就是现有之少数绅士的市议会，他也似乎不屑齿及，他所要的

参议会，只有地方人士首领能够参加；闸北、南市、吴淞、浦东、沪西纳税出捐的人，小商人工人占最大多数，那地方人士首领是些什么人，又能够代表什么人的意见呢？我们并不否认市民纳税义务，可是，“不得参政权不纳税”，不能说这是赤化过激的口号罢！并且现在租界上的外国政府连纳税华人的参政权都不肯承认；同时，本国的上海市政府也是这样对待市民，大约中外官厅的贵人们，都一致觉得中国人是“只应纳税不能参政”的贱民！

孙氏在交涉署招待外宾所说的话，有一部分是我们所懂得的，有一部分是我们所不能够懂得的。他说：“我更可以老实的对诸君说，我们中国人（他忘记了刘华也是中国人！）自然不能忘记租界是中国的领土。”他说：“推广租界，始终不能得到中国人的同意，我并且敢说，将来永远不会得到中国人的同意。”他说：“外国人保护是要保护的，但是一切的市税，到今不曾担任分文，这种情形，是公道的吗？是可以长久的吗？”这些说话，我们都懂得。我们所不懂得，是他说：“凡有条约上外国人的权利，我们在条约没有废除以前，当然要尊重的。”这便是段祺瑞“外崇国信”的主张！他说：“以友谊的态度来交涉，希望在最短期时间以内，想法子把多年的悬案，逐一解决了。诸君不要误会了我的意思，我们设商埠督办公署，不但不是来反对外国人的，而且是要尽量的同外国人合作。……商埠督办公署成立了以后，也要尽力来想法子，用坦白的手段，友谊的态度，来同诸君切实的磋商。”孙氏大概忘了中国官厅以友谊的（或者还是奴谊的）态度对外交涉，已经八十余年，并非梁启超丁文江等在五卅运动中之一新发明；并且外国人都早已知道以友谊的态度尽量的与外人合作来对付中国人民，本是中国官之特长，似乎不用孙氏再向外国人郑重声明了。况且外人也一向是以友谊的态度与中国合作，例如他们替我们掌管海关盐税，替我们驻兵京、津、沽、沪、汉，替我们司法裁判，尤其是上海的会审公堂，是中外官厅模范的友谊合作！他说：“近许多年来，租界里面的人口，逐日的增加，于

是外国人方面有扩充租界的提议，由外国人方面看起来，这种要求，原可以说有相当的理由的。……公共租界的当局，却用越界筑路的办法，来解决人满为患的问题了。”他竟这样承认外人扩充租界和越界筑路是为了解决人满问题，而不是帝国主义者侵略的野心，这和戴季陶承认帝国主义是“人口的增加，使各国人民感觉土地缺乏，为安置增加的人口，便非扩张领土不可”的见地，是一样了。关于此问题之复杂的理论，此地不必多说，现在且举出几个事实问题，答覆他们的见地：近代帝国主义的法兰西，人口日渐减少，俄皇治下之西伯利亚一向地旷人稀，为什么他们也要扩充领土？上海法租界居民并不多，法新租界是因何理由扩充的？公共租界居民之密并无过于香港；静安寺路戈登路爱文义路中外居民住宅尚多系平房，并不像伦敦纽约有无数层楼大厦，况且华界近年已有不少外人的住宅与工厂，当真有越界筑路和扩充租界以解决人满问题之必要吗？他们在上海把持会审公堂，难道也是因为解决人满为患的问题吗？总之，你们若说帝国主义的势力太强大，无论他们如何不说道理，此时我们都反抗不了，这话到算老实爽快；若强词曲说的附和他们，从没有道理之中说出道理来，这就大可不必！

原载《向导》第154期

署名：独秀

过激主义也是国粹了！

(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国粹派往往说西洋一切思想科学制度，都是中国数千年前已有的故物；现在孙传芳也说：“现在社会有什么过激主义和工会，其实这名词已发现三千年前了，秦、汉时匈奴及最近七十年前之洪、杨，均是过激行动。”如此说来，过激主义也是国粹了！

原载《向导》第154期

署名：实

民党败类中之先知先觉

(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有人见马素致电吴佩孚、张作霖等，竟说出：“赤祸蔓延，国脉不绝如缕，反赤军声罪致讨，不期年而歼除国贼，清绥北都，斯固忠勇善战所致，然亦人心归往，正气犹存。”这样肉麻的话，觉得他真是民党之败类。我以为所有民党分子，非革命即反革命，很少有中立之余地；他们当中所有的反赤分子（内分反俄反共及反对联俄联共两派），即令他现在还骂马素是反革命，可是迟早是要和马素走上一条道路的，马素可算是这班败类中之先知先觉。谓余不信，请看将来！

原载《向导》第154期

署名：实

师生合作与学生会！

(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上海各大学同志会会长郭任远博士说：“本埠十余个大学的教职员和学生，有鉴于此，最近有上海各大学同志会之组织，目的纯为提倡师生合作，共谋救国，……关于国家民族的事，不但是学生要做，就是教职员也要做。”郭先生这几句说话很对；不过我们希望他们在救国行动上实行师生合作，并且教职员还应该领着学生向前进，切不可借口师生合作，破坏学生自己独立的组织，以便拉着学生向后转！

原载《向导》第154期 署名：实

李景林张宗昌之共产

(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共产党所主张的共产，乃指社会经济组织上化私为公的生产和分配制度而言，决不是什么个人强夺他人财产以肥私的勾当。若说强夺他人财产以肥私就是共产，那么李景林、张宗昌已经实行了直隶、山东人的产，他们在山东、天津、北京的反赤运动，就是共产运动，最近山东官厅布告全省商民人等说：“案查过激党徒，倡言共产，祸等于洪水猛兽，害中于世道人心”，也就是骂李景林、张宗昌他们自己！

原载《向导》第154期 署名：实

合肥段公与总统曹公

(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吴佩孚因为要拿研究系二百万元，不得不用梁启超所起草的讨贼通电称“合肥段公”；鹿钟麟因为要联直，不得不于逐段布告中称“总统曹公”，同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过吴以“合肥段公”四字卖得二百万元，鹿拿“总统曹公”四字，一文也未卖着，这并未是段、曹价值之高低，乃由于吴、鹿二人交易手段之优劣。

原载《向导》第154期

署名：实

吴佩孚已是事实上的大总统

(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颜闳已经自己宣告成立了，可是一切重要问题都要电吴佩孚请示办法，交通总长还要亲到汉口向吴佩孚请训，如此吴佩孚已是事实上的大总统了。

原载《向导》第154期

署名：实

孙宝琦语妙天下

(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京师临时治安会闭会时，孙宝琦说：“以本会之组合言，为委员制之会议机关，类似过激派委员制，现在吴、张两上将军，方揭禁讨赤，而我辈有此不伦不类之委员机关，为政治上之活动，前途殊多未便之处，故应行解散。”上海《新闻报》称孙宝琦语妙天下，诚然诚然！

原载《向导》第154期

署名：实

你们还要反赤吗？

(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上海《新闻报》北京通信说，孙宝琦在临时治安会闭会时说：“不过四郊各团体及个人来函报告颠沛流离惨状，不可言喻，携老扶幼，俱出躲避，尤无栖止，此实为可悲之至，应设法救济云云。”言时声泪俱下。王士珍、赵尔巽等皆为掩泣不止。一时场内默然。孙后续言：“四郊之居民，难道说非中国之人民，而必遭此酷劫！”《新闻报》记者复加以批评说：“将骄兵悍，肆行无忌，吾人就各方披露之文电以观察之，觉京外人民，呼吁无门，逃死无所，蹂躏之苦，殆有不可胜言者。”这都是反赤运动的好结果，不禁令人回想“赤贼”盘据北京时是何等安宁！

原载《向导》第154期 署名：实

孙中山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 是不是国家主义？

(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有许多人，尤其是国家主义派，说中山先生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他的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就是国家主义。不错，中山先生的一生是爱他的祖国——中国，为他的祖国——中国奋斗的，他是极力劝中国同胞要恢复民族主义来救国的，他是极力指责现在提倡世界大同主义未免过早的；然而因此便说中山先生是一个国家主义者，那就未免对于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的理论之研究过于浅薄了。

孙中山先生是不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他的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是不是立脚在国家主义上面，这一问题，关于中国民族运动，尤其是关于国民党的政治宣传，有重大的影响；这也就是国民党中及国民运动中左右派之根本争点，应该有一个明白确定的解答。

要解答这一问题，第一须分析历史上各时代民族运动的特性，第二须检查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的理论属于那一时代的特性。

因各时代的经济关系日渐复杂，民族运动在历史上乃有三个时代不同的特性：(一)宗法社会时代之封建贵族的民族运动；(二)军国社会时代之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三)帝国主义时代之殖民地的民族运动。

宗法社会时代的民族运动，即是资本主义国家主义前的民族运动；这时代的民族运动之特性，富于血统及宗教的色彩，实际上乃是由于民族的封建贵族争夺疆土，因为宗法社会的经济生活完全是农业的，如日耳曼人对于蒙古民族西侵之反抗，中国汉人对于

契丹、女真、蒙古、满洲之反抗，回民对于十字军之战争，回、维等族对于汉人之争斗，皆属此类。

军国社会时代的民族运动，即是资本主义前半期的民族运动；这时代的民族运动之特性，乃是十八世纪新兴的资产阶级运动，此期运动已渐渐脱离前时代血统及宗教的色彩，而落脚在国家主义上面，因为这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已不限于农业，已需要商业的发展更进的工业的发展，已非宗法社会制度血统、宗教等所能支配，并且在经济的需要上，已有了血统不同或宗教不同之民族所合成的国家；这些民族中的资产阶级，正需要一个军国制度的国家机关，即超越民族血统及宗教信仰之上的国家权力，以供其资本主义发展之用。这种国家主义的民族运动，亦即民族的国家主义运动，由日耳曼、意大利渐渐蔓延到全欧洲，民族运动渐渐成了国家主义的工具；由日耳曼、意大利之成功，渐渐由自卫的国家主义变成侵略的国家主义——资本帝国主义。这些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即国家主义者，对外则利用“民族统一”的口号，扩张本国的领土与主权（如俄国之大斯拉夫主义，德国之大日耳曼主义，日本之大亚细亚主义等），对内则利用“民族同化”的口号，征服境内的少数民族（如俄国之大俄罗斯主义，土耳其之大土耳其主义，中国之大中华主义，外蒙之大蒙古主义等），复利用“民族生存”及“保卫祖国”等口号，欺骗国内的无产阶级为资产阶级的国家牺牲。在这时代，不但民族运动是国家主义之工具，并且国家主义也就是资产阶级之工具。

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运动，即是现代资本主义末期的民族运动；这时代的民族运动之特性，乃是二十世纪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及被压迫国家之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联合反抗他们的压迫者——资本帝国主义，不象前时代的民族运动是单纯的资产阶级运动。因为资本帝国主义有国际性，反抗他们之民族运动也不得不含有国际性，和前时代民族运动之对象及作战策略遂至不同，这也是此时代民族运动和前时代民族运动特性不同之一。若埃及之独立运动，

若土耳其之国民革命，若印度之不合作运动及农民暴动，若加哇工农之反抗荷兰，若菲律宾之独立要求，若摩洛哥及叙利亚之反抗法国，若里夫民族之反抗西班牙与法兰西，若波斯、亚喇伯及阿富汗之反英运动，若高丽、安南之独立运动，若中国之国民革命运动，这些运动是紧接着苏俄十月革命兴盛起来的，都有无产阶级的力量参加运动，使这些运动渐渐减少了前时代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色彩，而增加了新的色彩——反资本帝国主义之世界革命的色彩。国家主义派说这些运动都是国家主义的运动，这显然犯了时代错误的毛病，这是因为他们不曾懂得此时代的民族运动之特性和前时代完全不同。前时代的民族运动是：纯资产阶级的，没有国际性的，造成资本帝国主义的；此时代的民族运动是：各阶级联合的，含有国际性的，反资本帝国主义的。

我们既已看清了历史上民族运动之三时代各有不同的特性，更进而检查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的理论是属于那一时代的特性，便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了。

中山先生在他的《民族主义讲演》上说：

“但民族和国家是有一定界限的，我们要把他来分别清楚，有甚么方法呢？最适当的方法，是民族和国家根本上是用甚么力造成的。简单的分别，民族是由于天然力造成的，国家是用武力造成的。……所以一个团体，由于王道自然力结合而成的是民族，由于霸道人为力结合而成的便是国家，这便是国家和民族的分别。

“但自俄国新变动发生之后，就我个人观察已往的大势，逆料将来的潮流，国际间大战是免不了的；但是那种战争，不是起于不同种之间，是起于同种之间：白种与白种分开来战，黄种同黄种分开来战。那种战争是阶级战争，是被压迫者和横暴者的战争，是公理和强权的战争。

“将来的趋势，一定是无论那一个民族或那一个国家，只要被压迫或委曲的，必联合一致，去抵抗强权。……今日德国

是欧洲受压迫的国家，亚洲除日本以外，所有的弱小民族，都是被强暴的压制，受种种痛苦，他们同病相怜，将来一定联合起来，去抵抗强暴的国家，那些被压迫的国家联合、一定去和那些强暴的国家拚命一战。

“现在欧洲列强正用帝国主义和经济力量来压迫中国。……弄到中国各地都变成了列强的殖民地。……故此后世界人类，要分为两方面去决斗：一方面是十二万万五千万人，一方面是二万万五千万人。第二方面的人数虽然很少，但是他们占了世界上顶强盛的地位，他们的政治力和经济力都很大，总是用这两种力量去侵略弱小的民族。……但是天不从人愿，忽然生出了斯拉夫民族的一万万五千万人，去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列强所以诋毁列宁的原因，是因为他说世界多数的民族十二万万五千万人，为少数的民族二万万五千万人所压迫。列宁不但说出这种话，并且还提倡被压迫的民族去自决，为世界上被压迫的人打不平。列强之所以攻击列宁，是要消灭人类的先知先觉，为他们自己求安全，但是现在人类都觉悟了，知道列强所造的谣言都是假的，所以再不被他们欺骗，这就是世界民族的政治思想进步到光明地位的情况。“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如果中国不能够担负这个责任，那末中国强盛了，对于世界便有大害没有大利。中国对于世界究竟要负甚么责任呢？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灭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去灭人国家，也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们的覆辙。”

在以上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理论之几个要点：第一、他把民族和国家分得很清楚，他又一向是赞成王道而反对霸道的；因此，我们应该知道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根本不同。第二、他观察未来的国际战争，是十二万万五千万被压迫者联合起来对二万万五千万横暴者的战争，是超越种族和国

家之多数弱小民族反对少数民族帝国主义的战争；中山先生这种代表“世界民族的政治思想”，显是国际的，决不是国家的。第三、他明白中国是帝国主义之殖民地，他并且力说这殖民地之我们不但要反抗帝国主义以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自己不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否则中国强盛了对于世界便有大害；中山先生这种民族主义的理论，明明是属于现代殖民地国际民族运动之特性，而不是属于十八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国家主义的民族运动之特性。我们明白了这些要点，便不能诬中山先生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也不能说他的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就是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是十八世纪欧洲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之产物，是资本帝国主义之前身及其工具，若在现代殖民地反资本帝国主义的国际民族运动时代提倡国家主义，不仅有时代的错误，并且有药不对症使病加剧的危险。第一、我们要懂得国家是什么。清朝皇帝常说：“我国家二百年深仁厚泽”，如此清室就是国家；袁世凯曾印布一个小册子叫做“国贼孙黄”，如此反对袁世凯就是反对国家；段祺瑞、吴佩孚都自以为“北洋正统武力统一”是救国政策，如此北洋派就是国家；最近奉军亦称反奉的民众有害于国家，如此奉天军阀就是国家；法王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打破那些朕的国家，取得了那些国家的统治权，便造成了那些资产阶级的国家。这都是他们的僭窃吗？不是的。国家这一个抽象名词，本来就是一切统治阶级的所有物，谁取得统治权，谁便有权拿国家这一名义做统治全国人民之工具；国家权就是统治权，国家的利益就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如此，则所谓国家主义也就是“统治阶级主义”。第二、我们要懂得国家主义是什么？欧洲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推翻封建阶级夺得统治权后，都已变成反动的势力，所谓国家主义，正是这班反动势力（尤其是法西斯派）用做对外扩张资产阶级的统治权，对内压迫平民或欺骗平民为资产阶级牺牲之工具，即资本帝国主义之工具。第三、我们要懂得国家主义若应用在殖民地是怎样？殖民地不会有强大的资产阶级，便不会有纯资产

阶级的民族革命运动，他的民族运动必须有无产阶级参加合作才会成功；殖民地民族运动之对象不仅是近邻某一民族；因此，若应用纯资产阶级性的非国际性的国家主义在殖民地做民族运动，则对内失去无产阶级参加的力量，对外失去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联合作战的力量。

中国是一个被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所压迫的国家，我们决不向帝国主义者讲什么世界大同主义，我们自然急于要救中国爱中国，然而我们不是什么国家主义者。无产阶级本来无祖国，然而他们在救祖国的实际工作上，比任何阶级都出力；在普法战争之巴黎围城中，法国的资产阶级已经投降了，只有无产阶级尚力奋其最后决死战；俄国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的政策是要仍旧和协约国妥协的，只有无产阶级急起没收了欧美各帝国主义在俄权利，使俄国脱离了外国的羁绊而完全独立；德国的资产阶级一致接受英、美、法帝国主义者奴隶德国之道威斯计划，只有德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始终反对；这些法国、俄国、德国为祖国奋斗的无产阶级，都不曾向帝国主义者讲什么世界大同主义，然而他们决不是什么国家主义者。孙中山先生一生爱他的祖国，一生为他的祖国奋斗，然而他也决不是一个国家主义者。

纯资产阶级性的非国际性的国家主义，是前时代欧洲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口号，这一口号，已属过去的而且是反动的了，在现代各阶级联合的含有国际性的殖民地民族运动中，他已经是分散此运动在内外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之障碍物，凡是一个忠于民族革命运动的人，都应该起来埋葬这一过去的反动的障碍物——国家主义！

原载《新青年》(季刊)第4号

署名：陈独秀

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

(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日)

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者，都以为中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应该由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做，不应该接受外力即苏俄的援助；他们的理论仿佛是一民族的独立解放运动中若夹杂了外力，便失了独立性，所谓独立便名不称实了。

他们这种形式的逻辑，这种关门革命的方法，表面上好像是他们的民族主义更高调些，他们的独立运动更彻底些；可是实际上，若是用他们这样独立的方法，想达到独立之目的，真算是缘木求鱼！他们不是民族主义而是闭关主义，他们不是独立运动而是孤立运动。照他们的方法，关起门来做中国一民族的独立运动，拒绝全世界的同情援助，使中国一民族完全站在孤立无助的地位，此诚为我们的敌人——国际帝国主义之所喜，而陷中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于更孤危更险阻的困境中。

法国《巴黎晨报》曾说：“英、法、日、美应联合压迫中国，恢复国内秩序，以免赤俄在亚洲势力澎涨，否则莫斯科从中援助之亚洲民族自由运动将发展到中国。”可见帝国主义者压迫中国的计划有国际的联合，而中国的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者，却反对中国民族运动有国际的援助；又可见帝国主义者早已虑到外力援助中国民族自由运动对于他们的危险，而中国的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者，却正是专门拚命反对中国民族运动接受莫斯科的援助。这真巧极了，帝国主义者应该如何感谢他们（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者）！

他们以为接受外力援助有损独立精神，他们忘记了美国独立战争中接受了不少的法国援助；他们更忘记了现代国际帝国主义

所造成之整个的世界革命状况，和前代各国各自革命状况更大不相同。

现代资本制度已发达到最高形式——统一世界之财政资本主义，即国际帝国主义，因此，全世界的经济成了整个的，全世界政治也直接或间接在这整个的经济影响支配之下成了整个的；因此，全世界的统治者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成了整个的，全世界被统治者被压迫者（工农阶级及弱小民族）对于统治者压迫者之反抗，也汇合起来成了整个的世界革命。各处弱小民族及被压迫国家的解放运动和各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工农阶级解放运动，都是这整个的世界革命运动之一部分，而有相互的密切关系；因为现在已经是是二十世纪之第二十六年，已经是对于资本主义造成的革命对象——统治全世界的国际帝国主义革命时代，而不是十八世纪各国各自对于本国统治阶级革命的时代了。

在此整个的世界革命时代，任何国家的革命运动，任何属性的革命运动——阶级的或民族的，都不是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者所想象之一国家一民族关起门来独立革命可以得到成功的。

这还是理论一方面，现在再说事实。俄国十月革命总算是最成功的了，然而革命的军事終了后仍然要对小资产阶级让步，仍然要受帝国主义不断的威吓。英国屡欲用兵力压迫苏俄，都因为英国工人反对及各殖民地革命运动之兴起而作罢；最近洛迦诺会议中进攻苏俄之密谋方定，而英国大罢工突起，势不得不暂时停顿。土耳其民族革命之成功，不用说是因为有苏俄很大的援助。土耳其的民族革命总算成功了，基玛尔居然趾高气扬的杀戮共产党了，并且想离开苏俄了；殊不知英法两帝国主义还未倒，他们仍旧向土耳其夹攻，尤其是最近英国抢夺莫塞尔，于是基玛尔再回向苏俄。中国及波斯在俄皇时代所失各种权利，若不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如何能够收回？去年中国五卅运动初起，英、法、德、美各国的资产阶级的政党及其政府，一致宣传中国五卅运动是义和团一类的排外运动，嗣因英、法、德、美、俄、日本的工人及其政党纷起援

助,才不便这样宣传。中国的五卅运动,因为有各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工人同情援助,使各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提出他们久已忘记了的关税会议来敷衍中国人;并且英国帝国主义者因为恐怕中国五卅运动引起印度人的觉悟,也拿出一点小小让步和缓印度资产阶级的感情。现今弥漫全世界之民族独立运动,如欧洲之墨西哥、皮沙拉比亚、布哥维那、西里西亚、克洛西亚等,如亚洲之波斯、阿拉伯、叙利亚、土耳其、阿富汗、爪哇、中国、印度、高丽等,如非洲之摩洛哥、埃及、阿尔及利亚等,莫不有苏俄之后援。最近摩洛哥中悲壮震动全球的里夫民族之失败,《巴黎晨报》说:“阿白杜尔克林之降,可使俄、德不复抱法国必败于摩洛哥之梦想,法国虽死一百七十万人,然终能一再表示其自卫之能力,阿白杜尔克林固可依恃法国之恩慈,但宽恕非忘却前事之解,阿氏与布尔希维克及日耳曼之接洽,法人不能忘也。”小小的里夫民族,为数不及一百万,军队只六万五千,前曾击破西班牙十万大兵,继又和法国苦战一年有余,今虽不幸失败,其所加于法国之损失如此之大,此固由于摩洛哥人勇敢善战,而俄、德、法各国共产党人援助之力亦不小,《巴黎晨报》只说法国不能忘阿氏与俄、德之接洽,却不肯说出阿氏更与他自己国中“不爱国”的法国共产党接洽也。

依据这些事实,现代整个的世界革命运动中各部分相互关系之密切,已非常明显。

现在,我们再研究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前途和世界革命之关系是怎样。

中国是英、美、法、日、义、比等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掠夺的市场,而不是那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所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第一个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而不仅仅是那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第二个对象是国内军阀,因为他们是帝国主义者用做掠夺中国利益压制中国民众之工具。所以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必须是由集中民众的组织,民众取得武装,解除军阀的武装,一直到和帝国主义者武装冲突之胜利,才能够达到民族解放的目的。

中国现有的直、奉两系军阀，只要有一系存在，都是民众的大敌，都是束缚民族解放运动之万钧锁链；国内军阀比起英、美、法、日任何一个帝国主义的力量来，却只是九牛之一毛，何况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那更是大莫与京。所以，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不但高等华人之友谊的磋商和资产阶级之和平要求，等于痴人说梦，即令有困苦的革命争斗，这种争斗，若不得到苏俄及全世界无产阶级有力的援助，使这争斗能成为长期的一直到和各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汇合起来，完成整个的世界革命，也是不会完全成功的。

那么，或者有人以为反正中国的民族解放，非到世界革命实现不会成功，待到世界革命实现了，国际帝国主义覆灭了，中国问题也自然解决了，现在中国民族便无须努力做这不必要的革命争斗。这种见解非常之错。

不但在主观上，世界革命是世界各民族中革命民众之共同义务，任何革命民众，都不能取这种机会主义的可耻态度；并且在客观上，被压迫国家弱小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和各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二者汇合起来，才能根本推翻国际帝国主义，才能成就整个的世界革命，譬如一车之两轮，缺一不可。我们若坐待世界革命机会之到来，而自己不努力于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争斗，使帝国主义者得集其全力以镇压其本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则我们所坐待之机会，或至永远不会到来。所以，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固然不应如国家主义者所主张，关起门来独立革命；也不应如机会主义者主张我们自己不必努力，只坐待世界革命之到来。在实际的历史现象上，全世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高潮，也是和各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高潮，在相互影响中平流并进。中国是国际帝国主义所共同征服的国家，自然不能幻想马上就会有和帝国主义者武装冲突的胜利之可能；但我们在这世界革命高潮中之可能的责任，是不断的努力，不断的争斗，不断的摇动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不断的和帝国主义者争夺中国现有的武装——

尚未为帝国主义者所有的武装如冯玉祥、唐生智等军队，甚至于已为帝国主义者所有的武装如直、奉两系军队——不断的扩张民众的武装，如民团、商团、红枪会、农民自卫团、工人自卫团、工人纠察队、学生军等；经过这样的长期努力与争斗，才能够解除军阀的武装，才有联合别的被压迫国家如苏俄等和帝国主义者武装冲突之可能。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摇动一分，他们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潮即高涨一分；中国民众的武装及接近民众的武装扩张一分，军阀的势力即削弱一分，亦即中国民众和帝国主义武装冲突之期接近一分；如此长期争斗之结果，再和各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汇合起来，才能够根本推翻统治全世界的国际帝国主义，才能够实现世界革命，才能够使中国民族得到完全的解放。

在政治上，中国是国际帝国主义共同征服的国家，在经济上，中国是国际帝国主义共同掠夺的市场，不根本推翻统治全世界的国际帝国主义，中国民族不会有完全解放之可能；因此，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之背景及其必然的途径，可称为一切民族解放和世界革命关系之模范的说明。

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者关门革命的方法，固然不合实际；有些国民党左派，自以为赞成世界革命表示特别急进，其实这并不算什么特别急进。中国民族革命，只是整个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赞成世界革命的人无有不赞成中国民族革命，尽力中国民族革命的人也应该尽力世界革命；尽力世界革命即是尽力中国民族革命，这两件事是很难分开的，因为这两个革命的对象只是一个：统治全世界的国际帝国主义。

中国的民族革命者，不但要尽力世界革命，并且要努力研究世界革命的现状及其趋势；换句话说，就是：不但要懂得本国的真实状况即其历史发展到了甚么阶段，并且要懂得世界的真实状况即其历史发展到了甚么阶段，更要懂得本国和所处的世界之革命的关系是什么一种形势。懂得了这些，然后所定革命的策略及行动，才适合实际，才不至于落后或空想。

现在已经不是闭关时代了,世界各部分的革命运动,因为相互影响之关系日渐密切,已成为整个的不能分开了,凡是一个民族革命者,头脑中若没有一个世界革命形势之具体的图画,并且时常检查这图画中是否有错误而加以改正,则口中虽说赞成世界革命,实际上仍旧是关门革命。

一九二六·五·三〇

原载《新青年》(季刊)第5号

署名:陈独秀

打破“民族的巴士的狱”

(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日)

法国赫里欧氏有言：“目下一般专务私利之投机者，已造成一种资本的巴士的狱，朘削法国政治界之心脏，而政府与之狼狈为奸，报界亦复同一腐败，一般报纸尚自称崇信共和主义，但实则已为资本家之奴隶。”

现在我倒可以说：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已在中国造成一种“民族的巴士的狱”，朘削中国人之心脏，而中国军阀与之狼狈为奸，教育界、商界中所谓高等华人亦复同一腐败，一般高等华人尚自以为崇信民族主义，但实则已为帝国主义者之奴隶。

五卅运动，就是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之开幕，就是要打破八十年来这“民族的巴士的狱”。

从前代表法王威权的巴士的狱，摧折了无数革命志士无罪平民，“打破巴士的狱”为法国革命之开幕，至今传为美谈，垂为纪念。现在资本帝国主义在西方造成之无形的资本巴士的狱，朘削了无数平民膏血，并牢笼了报界、学者一辈精神的奴隶，为之歌功颂德；在东方造成之无形的民族巴士的狱，朘削了全中国人的无量膏血，并禁锢了高等华人的民族精神不能发展或不敢发展。

我们现在如果真心纪念五卅运动，便应该继续此一运动，而完成其工作——彻底打破这民族的巴士的狱，把中国民族从这狱中解放出来！

我们要打破此狱，不用说首先要毁灭此狱之墙壁——资本侵略制度，驱除为资本帝国主义者看守此狱之狱卒——军阀官僚；一般鼓吹反赤的失意政客及所谓老民党，也在狱卒的伙伴助手之列。

尤其重要的是打破狱中人之精神上的镣锁，使之愿意牺牲一切，死里逃生的打出此狱。

最不幸的是狱中人尤其是狱中的所谓高等华人，因精神上的长期镣锁，已麻木其感觉性，自以为身在狱外；并且习于狱中生活，已与狱吏（帝国主义者）、狱卒（军阀官僚）取了友谊的合作态度，反指斥主张打破此狱之人是捣乱，是唱高调，是多事，是惹祸，是破坏和平秩序，是别有用心，是过激赤化。取这样态度的高等华人，乃是打破此民族的巴士的狱之重要阻碍物。

在此次上海各界筹备五卅纪念的联席会议席上，教育界代表有人主张学生不加入此次运动，更不主张各界共同发表宣言，这分明是表示民族解放运动对于他们没有什么需要。商界某首领忽然说到什么“军阀帮助帝国主义而共产党也帮助赤色帝国主义的苏俄”这类话，似乎这两方面都应该反对，可惜他们一向只勇于反对共产党与赤俄，而怯于反对军阀与帝国主义者。他们甚至于因为军阀与帝国主义者的威吓，怕犯了纪念五卅运动的嫌疑，主张把五卅烈士墓奠基礼改在二十九日举行。更可惜他们竟忘记了扣用火车妨害商业者，是军阀而不是共产党；以苛税杂捐、强用军用票等形式没收商民财产者，也是反赤的军阀而不是赤的共产党；把持中国海关、抑制中国工商业发展者，是帝国主义而不是赤俄；他们向之哀求交还会审公堂及租界增加华董而不得者，也是帝国主义而不是赤俄；他们更忘记了应该全中国人永世惨痛不忘的五卅事件，在日本纱厂，在南京路上，在宁波会馆前，流中国人血的，也是帝国主义者而不是赤俄！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者也主张中国民族独立，可是他们都以为中国民族独立运动，只应以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干，不应接受外力即赤俄的援助，甚至于马素拿外国帝国主义的钱办的《独立报》也这样说；他们尤其反对赤俄以军械接济国民政府及国民军。大概他们觉得中国人所受帝国主义及军阀的践踏并不甚厉害，尽可从容以自力解放，不需急急求助于邻人；他们更或以为只有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应该有武装，该死的中国人民，理应

赤手空拳的让帝国主义普及军阀恣意屠杀，不但民众不应该寻求武装来反抗，即接近民众的国民政府及国民军，也应该由帝国主义者及军阀来铲除、赤俄不应该接济军械使他们存在，以为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之患。国民党右派口中虽说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同时却用反对赤俄与共产党以相消，并且大登其广告直指什么什么人是共产党员，公开的向帝国主义者军阀告密。报界宁开罪于民众，而不开罪于帝国主义与军阀，封锁民众运动的消息，乃是常事。

这班人的思想主张，其阻碍民族的巴士的狱之打破，也不在所谓高等华人之下，也因为帝国主义者给他们以精神上的镣锁、禁锢了他们的自由思想，使他们不甚感觉狱中痛苦，不急于求解放，不需要邻人之助，甚至于不认识邻人与仇敌。

所以我们如果要纪念五卅运动，如果要继续五卅运动，必须打破帝国主义者所加于我们精神上的镣锁，一致起来打破八十年来这“民族的巴士的狱”，使中国民族完全解放，才算完成了五卅运动的工作！如此，则将来中国的“五卅运动”，方能和法国的“打破巴士的狱”成为同样光荣而严肃的纪念——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之胜利的纪念！

原载《向导》第155期

署名：独秀

对于上海五卅纪念运动之感想

(一九二六年六月一日)

五卅周年纪念运动的意义，一面是纪念去年今日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民众之大屠杀，一面是纪念去年今日中国民众对于帝国主义者大屠杀及其历来侵略高压政策之反抗运动。他们的大屠杀，我们固然应该纪念以志不忘；我们的反抗运动，我们更应该纪念！尤其应该有纪念运动，应该以五卅运动的精神，以五卅运动的方法，继续此伟大的反抗运动，一直达到五卅运动之目的，这才算完成了五卅纪念的意义。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不但要纪念敌人的屠杀，并且要纪念我们的反抗；不但要纪念我们的反抗，并且要继续我们的反抗；不但要有五卅纪念，并且要有五卅纪念运动。若只是有纪念而无运动，即纪念十年乃至百年千年，我们的纪念尽管纪念，他们的屠杀、侵略、高压仍是屠杀、侵略、高压，这样滑稽的纪念，只是增加五卅运动中已死者的悲伤与未死者的耻辱！

今年五卅纪念中，是不是有运动？毕竟有了一点运动。全国的运动是怎样，现在还未能详细知道，且说一说上海的五卅纪念运动。

上海是五卅运动发难地，若只有纪念而无运动，那更是可耻了，幸而还有了一点小小运动，勉强可以遮羞！五月二十九日之五卅烈士公墓奠基礼，参加的有工、学、商一千余团体，代表有五千余人，散会后整队游行，沿街高呼口号，分发传单。卅日工、学、商一致罢工、罢课、罢市。上午参加市民纪念大会的，有一千余团体，计五六万人，为近数月来未有之盛会，散会后亦分队游行，沿路高呼口号，分发传单。下午参加大马路一带演讲队的工人、学生约三千余

入，商店伙友们多自动的出来参加，一时群众占领了大马路，阻止电车开行，毁坏了好些电车。这一点为上海市民遮羞的小小运动，总算照我们预期的做到了。

在这一小小运动中，我们的感想是：（一）一班大学教授及商会领袖们，他们向帝国主义者所哀求的，一点也没有赏脸，因此在五卅周年纪念若一点不表示，则未免难堪，而一有表示，又恐怕上过激派的大当，一见工、学界要参加五卅纪念运动，他们便异常惊慌，恍如大祸临头，所以硬要把烈士公墓奠基礼改在二十九日举行。其实，我们固然不肯完全采用尾巴主义，跟着和平的民众后面跑，同时我们也不肯一意孤行，吓破了大教授和大老板们贵重的胆，未免罪过，我们在事前的计划，曾如吴稚晖先生所言斟酌尽善，丝毫不肯冒昧；至于一切无意义的破坏，更理不应有，所谓到处放火，自然是侦探造谣。现在廿九、卅的运动，业已如商总联合会会长邬志豪所言“平安度过”，在一般和平的新闻记者与商界领袖们，如庆更生，大出意外，固然要大大称赞此次运动“有精神又有秩序”，而在一班热烈的民族主义者，或者却要骂“过激派太不过激！”（二）大学教授和商界领袖，都主张不参加群众示威运动，教职员、学生只在校内开会纪念，做“静默”、茹素、敲哀钟这类把戏，商界则只商总联合会全体议董在宁波会馆开追悼会，各店伙友在店“默思”，不准出门；他们采取了这样分离群众的办法，这样滑稽的消极纪念——“静默”与“默思”，因此市民大会中学生比工人少，商人比学生更少，使有超过十万群众可能的市民纪念大会，变成了五六万人的大会。（三）商界领袖们，忘记了去年今日发令屠杀我们同胞的仇人是谁，竟仰面向工部局请领执照，以便佩带起来，向群众劝导！（四）学生固然不能都听从教授的主张，即商人群众也很热烈的出来参加群众的示威及演讲，并不一概听从他们领袖的命令，闭门默思。（五）国民党右派竟不参加公共体育场之群众的市民纪念大会，而和一些招牌工会及反动派，另在斜桥徽宁会馆开追悼会，孙中山主义学会竟和新社会民主党、反赤联合会，混在一起！（六）总商会不但

不参加运动,并且他们的领袖,竟在此时亲到五卅运动所反对的主要仇敌日本去参观,大开其宴会,大讲其亲善! (七)一向只敢反对苏俄的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素以“外抗强权”自命,在此次全上海市民对强权表示反抗运动中,他们到哪里去了?

我为什么要细说这些感想,因为要指出各阶级民众的弱点,希望大家痛改以前的观念与态度,无论过激派、和平派都是自家人,不是仇敌,我们的仇敌乃是帝国主义者与军阀,我们要认清仇敌与自家人,为反对仇敌,自家人应该合作,万万不可与仇敌合作来反对自家人;更希望大家今后一致起来巩固我们民族运动的联合战线,继续五卅运动的精神和方法一致向帝国主义持久作战,以期达到五卅运动之目的,我们中国人才有生路!

六月一日

原载《向导》第156期

署名:独秀

给蒋介石的一封信

(一九二六年六月四日)

介石先生：

现在我看见一种印刷物，题名《校长宴会全体党代表训话对中山舰案有关系的经过之事实》，内中所载，倘都和先生所口说的一样，没有什么印刷上的错误，则我们在对于中国革命的责任上，不得不向先生及一般社会有几句声明的说话。并且在声明的说话之前，还要总声明一句：我们的声明只关于中国共产党方面，别方面的事一概不管。

在这个印刷物上，有两个要义：前一段是先生声述关于三月二十日事变之苦衷，后一段是先生改正国民党内共产分子态度之意见。

在前一段中，先生再三说：“我要讲也不能讲。”“因为这种内容太离奇太复杂了，万万所意想不到的事情，都在这革命史上表现出来。”“我因为全部经过的事情，决不能统统讲出来，且不忍讲的。”“还有很多说不出的痛苦，还是不能任意的说明，要请各位原谅。”“今天还有我不忍说的话，我只有我个人知道。”先生这些不忍说出的事，若和中国共产党无关，我们自然没有要求先生说出的权利；如果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事，请尽管痛痛快快的说出，丝毫也不必掩藏。因为先生说出后，若证明是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则社会自有公评，共产党决不应该是一个文过护短的党；若证明是党员个人的错误，这个人便应该受两党的惩戒。在革命的责任上是应该如此的。

先生说：“当三月二十日事情未出以前，就有一派人想诬陷我，

并且想拆散本校，……但这不过是局部的一二个人的阴谋，……我自汕头回到广州以后，就有一种倒蒋运动。”——想诬陷你想拆散军校的一派人是谁，有阴谋的一二人是谁，运动倒蒋者又是谁，先生都未明言，我们当然不能冒认；不过三月二十日事变后，第一军中实际撤退了许多共产分子及有共产分子嫌疑的党代表及军官，因此上海各报都一致说三月二十日事变是中国共产党阴谋倒蒋改建工农政府之反响；现在先生对全体代表训话中，虽未明说中国共产党有倒蒋阴谋，而全篇从头到尾，却充满了指责共产党同志的字句，使听者读者都很容易推论到中国共产党实此次事变之阴谋者；这是很自然的事。建设工农政府自然不是一件很坏的事，可是现在就主张实行起来，便是大错；倒蒋必以蒋确有不可挽回的不断的反革命行动为前提，而事实上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如此而欲倒蒋，且正当英、日、吴、张反动势力大联合，攻破北方国民军之时，复在广州阴谋倒蒋，这是何等助长反动势力，这是何等反革命！介石先生！如果中国共产党是这样一个反革命的党，你就应该起来打倒它，为世界革命去掉一个反革命的团体；如果是共产党同志中那一个人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你就应该枪毙他，丝毫用不着客气。不过我知道我们的党并且相信我们党中个人，都没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当李之龙因中山舰案被捕消息传到此间时，我们因为李最近曾受留党察看的处分，以为他已加入反动派了，后来见报载中山舰案乃是李之龙受命于共产党的倒蒋阴谋，我们更觉得离奇，最后接恩来来信才知道李之龙是上了反动派的圈套。）凭空受这反革命的栽诬，这是我们不能够再守沉默的了！

先生所举各种阴谋之第一个事实是：“有人对各军官长说是共产分子在第一军内虽然不多，但是这些分子，一个可以当十个用的，并且有团结的，可以随时制服其他一切的，还有人在演讲之中，说是‘土耳其革命完成之后，才杀共产党，难道中国革命没有成功，就要杀共产党么？’这些话统统引起一般军官恐怖与自卫的心思，

所以对于党代表全部的不安和怀疑了，所以他们军官有要求共产党分子全部退出的事实，并且由他自卫心而起监视的举动。”这个事实，不能证明共产党有倒蒋阴谋，而是证明孙文主义学会的军官有排除共产党分子之意志。何以见得呢？对各军官说共产党分子如何如何，当然不象共产党自己的口气，说土耳其杀共产党这段话，我未曾听见共产党人说过，只传闻孙文主义学会中人向汪精卫先生攻击共产党分子时，精卫先生说过这样话，其实否尚不可知，即令精卫先生有这段话，只足以证明孙会中人是何等反对共产党分子，而绝对不能证明共产党分子拟如何倒蒋；并且精卫先生是说要杀共产党，不是说要杀孙会中人，照情理只有共产党分子听了精卫先生这话而恐怖不安，为什么反是孙会的军官听了这些话引起恐怖与自卫的心思，并要监视共产党分子全部退出呢？并且先生还说，“如果当时我校长不在的时候，当天的情形一定是更加剧烈，也未可知的。”这话诚然，如果先生当时不在广州，孙会中人会当真大杀共产党；而且我们还听说若不是先生切力阻止，欧阳格、吴铁城辈还要彻底干下去，这些事实正足证明精卫先生即令有那样的话，却非神经过敏，更不是有意“激动风潮”。先生要知道当时右派正在上海召集全国大会，和广东孙会互相策应，声势赫赫，三月二十日，他们已得意扬言广州即有大变发生，先生试想他们要做什么？

先生所举各种阴谋之第二个事实是：“现在广东统统有六军，广西两军，广东是一二三四五六各军，照次序排下去，广西自然是第七八军了，但是第七军的名称，偏偏搁起来，留在后面不发表，暗示我的部下，先要他叛离了我，推倒了我，然后拿第二师第二十师编成第七军，即以第七军军长来报酬我部下反叛的代价。”无论何人有这样的主张我们都以为要不得。不过只有国民政府尤其是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才有权决定这种军队的编制与名称，政府委员及军委中都没有中国共产党分子，无论此事内幕如何，当然和我们无关。有一件事或者和此事有点关系，我现在索性老实告诉先生，当第二师长王懋功免职时，我们以为右派又有什么反动发生，所以政

府有此处置，但报载内情甚复杂，我们便函询广州同志，他们的回信说：“王懋功被逐后，右派颇不满，孙会则乘机大造其谣言，说王懋功是C.P.，此次蒋之处置王氏，就是对C.P.示威，其实不然，王氏并未加入C.P.，而且一向是著名的反共派。闻王氏之被逐是因为不奉命令或吞款，或二者都有。”

先生所举各种阴谋之第三个事实是：“至于在学校里面，政训主任教官高语罕，……彰明较著说我们团体里有一个段祺瑞，要打倒北方段祺瑞，就先要打倒这里的段祺瑞。”我们早已闻有此说，曾函询广东的同志，他们回信说：“语罕同志初回国，要好心太急切，期望国民党尤其期望黄埔军校也太急切，因此语罕态度都不免急切一点，至于‘打倒我们的段祺瑞’之说，绝对没有，乃翻译之误，语罕已在报上声明过，当不至因此发生误会。”语罕来此，我亦当面诘责过，他亦力辩无此事，我曾告诉他，如果无此事，你应详细向介石先生说明，以免误会。语罕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他一向很老成，当不至有这样荒谬的见解，望先生再详细调查一下。如果语罕真这样说，不但对不起先生个人，并且是中国革命军事工作中理论的错误（详见《向导》第一百四十九期我做的《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是我们应该纠正的。

先生所举各种阴谋之第四个事实是：“万不料我提出北伐问题，竟至根本推翻。”关于这一问题，我和某几个同志有不同的意见，他们当然也不是根本反对北伐，他们是主张广东目前要积聚北伐的实力，不可轻于冒险尝试；我以为要乘吴佩孚势力尚未稳固时，加以打击，否则他将南伐，广东便没有积聚实力之可能，为此我曾有四电一函给先生及精卫先生，最近还有一函给先生详陈此计；两方对于北伐主张，只有缓进急进之分，对广东及先生都无恶意，也似乎说不到根本推翻。

总之：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一切工作中都太过负责任（中山先生在世时，曾说：“谢英伯这班人太不负责任，谭平山又太负责任了。”这真是知言！），使忌之者得乘机挑拨离间，竟至使先生不相信我

们,不相信“仅仅外面造出来的空气就能够成功这样的圈套”,这是我们十分抱歉的事。至于说我们有反革命的阴谋,即倒蒋阴谋,则我们不能承认。中国革命的力量还是很弱,我们敌人的力量却非常之大,我们的革命工作,好象撑破船于大海巨浪之中,急求友助还来不及,岂有自毁桅舵之理!我们对冯玉祥尚且要爱护,何况蒋介石!即右派中之比较进步分子,只要他们不赞成以区区一万一千万元出卖革命的根据地——广东于英国,我们都不拒绝和他们合作,何况蒋介石!

先生在后一段中说:“大家晓得国民党是以三民主义来做基础的。”又说:“国民党的领袖,只有总理一个人,不能够认有二个领袖。”这两句话没有人能够反对,凡是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不能反对。在原则上,我们不能反对党中有个领袖,且必须有个领袖;可是在中国国民党自孙总理去世后,不但无名义上的总理,也并未产出能够使全党公认之事实上的领袖,因此国民党的唯一领袖仍旧是孙总理,即使将来能有名义上的总理工作上的领袖,而理论上的领袖精神上的领袖,仍旧是中山先生,这是毫无疑义的事,我不懂得先生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我不相信国民党中任何人(共产分子当然在内)承认国民党有孙总理同样的两个领袖,非是不应该如此,而实是无人配如此。若说国民党中共产分子有污蔑总理人格抹杀总理历史的事,这问题很容易解决,便是不再委屈他做国民党员,国民党中的共产分子,并不是不受制裁的黄带子。国民党往往因共产分子个人的错误,便发生两党合作的革命政策根本问题,这真是一个极大危险的习惯。中山先生在世时不许党员讨论这政策的根本问题,就是反对这习惯;今后纠正这个习惯,是要将分子制裁和党的合作政策这两个问题,严格的分开。譬如国民党中有些人发行许多印刷物,污蔑抹杀得共产党简直不成话说,然而共产党从未因此发生和国民党合作的政策问题。

中国国民党和别国的国民党不同,因为它有具体的三民主义的历史与特性,任何党员(共产分子当然在内)都要信仰三民主义,

都要为三民主义工作，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事。不过先生说：“凡是一个团体里面，有两个主义，这个团体一定不会成功的。”这完全是季陶先生的理论，我实在不敢苟同。我反对季陶的意见，已详见给季陶的一封信中，或者先生无暇一阅此信，现在我再略述我和季陶不同的意见。我并不反对季陶主张一个党要有“共信”，三民主义就是国民党的“共信”，然国民党究竟是各阶级合作的党，而不是单纯一阶级的党，所以“共信”之外，也应该容认有各阶级的“别信”，也就是各阶级共同需要所构成的共同主义之外，还有各阶级各别需要所构成的各别主义之存在。譬如工人加入国民党，于信仰三民主义外，不必禁止他兼信共产主义；工商业家加入国民党，于信仰三民主义外，亦不必禁止他兼信资本主义；又如吴稚晖、李石曾加入国民党，于信仰三民主义外，亦不必禁止他兼信无政府主义。凡属国民党党员，只要他信仰三民主义为三民主义工作，便够了；若一定禁止他不兼信别种主义，若一定于共信之外不许有别信，若一定在一个团体里面不许有两个主义，似乎是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

至于先生说：“拿国民党三民主义来做招牌，暗地里来做共产主义的工作。”这是右派历来攻击国民党中共产分子的话，我们听得十分耳熟了；在第二次大会时，先生曾说共产分子都为三民主义工作，为什么现在又这样说，我不明白这句话是指那种事实？我不知道现在的中国，有多少纯是共产主义的工作？我更不知道共产分子曾拿国民党三民主义招牌做过些什么共产主义的工作？难道是指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中所做的工会、农会的运动吗？国民党三民主义的政纲，也说要帮助工人、农民发展组织，共产分子是在国民党工人部、农民部之下，公开的做这些工作，并非暗地里做共产主义工作。难道是指共产分子于三民主义工作外，复到共产党党部的集会及兼做发展共产党的工作吗？国民党既许共产分子跨党，并未曾主张一加入国民党应脱离共产党，如何能一见他兼为共产党服务，便指责他是暗地里做共产主义的工作呢？除这两样之外，还有什么？并且先生自己也说：“共产分子尽管信仰共产主义。”又说：“我

认为实行三民主义就是实行共产主义。”又说：“所以我说反共产主义就是反三民主义的口号。”如此说来，两主义并不冲突，他们兼做点共产主义的工作，也算做了三民主义的工作，说不上什么招牌的话，实际上，在广东的共产分子，大半是拿共产主义招牌，做了些三民主义的工作！

不尽欲言，诸希赐教！

六月四日

原载《向导》第157期

署名：独秀

红枪会与中国的农民暴动

(一九二六年六月十六日)

中国是一个大的农业国，我们或者说农民暴动是中国历史之骨干。远者如陈涉犁耨而叹，如赤眉、黄巾、黄巢等役，如闻献之乱，都是官逼农变；近者如洪杨、义和团及红枪会这三件事，更是很明显的农民暴动。

无论士大夫怎样诅咒农民暴动，而由陈涉一直到红枪会这二千年一贯的农民暴动历史，是无入能够否认的。

任何民族中封建社会时代的农民，他们的思想都不免有顽固迷信的色彩；他们的行动往往遍于破坏而不免于野蛮，这本是落后的农民原始暴动之本色。士大夫固然有理由诅咒他们的思想与行动，然而没有理由诅咒他们对于统治阶级之反抗暴动。因为中国最大部分生产者都是农民，同时却是被统治被压迫的阶级；压迫农民的不但是统治阶级（从前的朝廷现在的军阀）及其官吏，士大夫表面上好象是站在统治阶级与农民之间，而实际上是接近城市政权，附属于统治阶级，也要压迫农民的；所以分利的统治阶级之暴政一到了某种程度，生产的被统治阶级即起而反抗暴动，即农民对于政府官吏及士大夫之反抗暴动。这本是中国历史的惯例。

现在的红枪会运动，就是这历史的惯例之一。有广大农民群众的红枪会，已普遍了河南、山东全省和直隶之南部安徽、江苏、江西之北部，黑枪会、黄枪会、白枪会都是他的姊妹团体。河南、山东的军阀，把他们当做土匪，整千整万一连几数十个村庄的屠杀，然而他们实是武装自卫的农民，而不是土匪。他们的大多数不但不是土匪，而且仇视土匪，因此土匪时常勾引官兵来屠杀他们。

红枪会的政纲是：反抗军阀，反抗贪官污吏，反抗苛税杂捐，反抗土匪。他们的思想顽固迷信，和前代农民一样，他们的反抗暴动之性质，也和前代农民一样。他们当中也许杂有少数土匪，而大部分是农民，且许多是小有土地的农民。他们的首领也有腐化为军阀利用之可能，而群众是要反抗军阀苛税到底的。

《新闻报》五月二十五日开封通信说：“豫东杞县、通许一带之红枪会，自经李鸿章用大炮轰击后，村庄被焚者已百里内无人烟，人民死者数以万计。……通许知事至乡间，合集绅民劝导，绅民质问知事曰，‘不教我们信红枪会极易，只要先教地方不见土匪，不再派苛税，不再派恶军队骚扰，完粮纳税一律收用纸洋。’知事语塞，狼狈而遁；会众中之妇孺争以瓦砾追击知事之轿。知事回报后，寇（英杰）知不可以理喻，遂电李速剿，而大祸作矣。”

人民要求地方不见土匪、不派苛税、军队不骚扰、官厅收用自己所发行的纸币，便是不可以理喻，便应该用大炮轰击，便应该焚杀得百里内无人烟，我们要问诅咒农民暴动的士大夫，这是什么理由？

士大夫或者以为农民暴动扩大起来，会造成洪杨时代恐怖的局面。他们这个远虑是有理由的。洪杨时代农民革命的一段历史，被士大夫宣传得十分恐怖；可是实际上究竟怎样呢？此事且不暇博征，姑举最近一点材料，作为参考。

本月六日上海美国侨民团到松江瞻拜华尔将军之墓（美人华尔于一八六二年九月二十一日率长胜军助清军与洪杨军战死于松江），福开森演说中有言：“是时居华之美名士前同文馆总教授丁韪良博士，曾再上书于美检察长库兴，力言承认南京革军政府之必要。英牧师杨格非、莫维廉、艾约瑟等，皆以革军功成，将为中国莫大之利；杨格非于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十八日书中有云：‘彼较之皇党，实有数百年之进步。’……驻沪英麦领事，于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上英首相报告书中，亦谓革军领区内，‘人民皆安居乐业’，而皇党辖境，则‘贼盗横行’。……当时革军所宣传之宗旨，一八六〇

年九月十一日大陆记录中记其简要如左：

- (一)治理中国者应为中国人，非满人；
- (二)专制政府之闭关政策，应即废除，俾中国亦为国际中之一份子；
- (三)应采用外国之美术品及制造品；
- (四)应与外国定友善之国交，中国物产亦应与外国交易，以辟富源；
- (五)采用外国工商业上之新发明。”

依据这些材料，洪杨之太平军，未必象当时倾向皇党的士大夫所宣传的那样令人恐怖。况且现在离洪杨时代又有六十余年，中国农民已不无多少之进步，现在比那时又有了革命的政党与军队，倘与农民力量结合起来，当然可以减少前代农民暴动中顽固迷信野蛮破坏的成分。

总之，在北洋军阀统治蹂躏下之北方十余省农民，想他们不反抗和暴动，这是客观上不可能的事；任其自然暴动好呢，还是引导他们在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旗帜之下好，这是中国目前一个紧要问题。士大夫盲目诅咒农民暴动，是一件无效的事。

原载《向导》第158期

署名：独秀

威林顿眼中的华人价值

(一九二六年六月十六日)

英国因五卅运动的影响，特派威林顿爵士拿庚子赔款来收买高等华人，以和缓反英空气；此事外报已公开的说过，许多高等华人，还装着未听见，高唱与外人合作。现在威林顿氏在北京英美协会演说，公然说：“此次来华，备受各界优待，余囊中携有一万万元巨资，故华人皆愿与英人合作。”稍有廉耻的中国人闻此言作何感想？

原载《向导》第158期 署名：实

请看反赤军阀之卫国救民！

(一九二六年六月十六日)

直隶省商会联合会最近通人说：“各路车辆尽为军队所扣留，弃置无用，不令开行；由是所有商货，或堆积站旁，或遗弃中路，总其损失，难以量计。商民坐视亏折，已属不貲，加以军队所在，纪律毫无。……又复军队复杂，号令难一，甲站贿通，乙站横阻，层层敲剥，种种留难，扰害情形，实难言喻，路局莫敢谁何。……养兵本所以卫国，兴师率皆曰救民，综观以上种种扰害实情，以此卫国，国何不亡，以此救民，民无噍类！”这些现象，本是军阀统治之下，尤其是反赤军阀统治之下，所必不能免的。一般商人仍希望军阀维持和平，并且希望军阀反赤好维持和平，现在这种希望怎样？

原载《向导》第158期 署名：实

奉直对峙的混沌政局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民国十五年之政治史，只是皖、奉、直三个军阀党循环胜败起伏之历史。现在皖党倒了，或者是永远倒了，即令再起，也不过是奉党的附庸，决不能够恢复从前一个独立的军阀党之势力了。此时乃是奉、直两军阀党对峙的局面，前者的靠山是日本，后者的奥援是英国。

奉党首领张作霖，虽然承日本意旨想控制北京政局；然而内因旧派吴俊升之迫令联吴，外因国民党尚存在，遂不得不与吴佩孚表示合作。直党首领吴佩孚，虽然想依据奉、直宿约，独揽关内政权，恢复十三年奉、直战前局面，再进而以武力统一中国；然而内因靳云鹏、田维勤、孙传芳之新结合，外因国民军尚存在，又加以英国之劝告，也不得不暂时求助于奉张。在这种利害冲突，实际不能合作而又不能不表示合作的状态中，亦即不能合作又不能决裂的状态中，遂形成了奉、直对峙的混沌政局。

护宪问题，颜阁问题，总统问题，阁员分配问题，直隶地盘问题，将来二五关税及大借款分配问题，不但现在的天津代表会议没有解决，即将来任何会议，都不能解决；只有奉、直再战才能够解决。然而奉、直两方都有内外种种牵制，一时却没有因无法解决而再战之可能！因此，奉、直对峙的混沌政局，或有相当时期的继续，以至于相持日久，一方面因内部的或外部的变化而自溃，他方面得着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形成一个较明瞭的新局面。

在现时对峙的混沌政局中，两方虽有种种利害不同的冲突，而都有两个共同目的：一是消灭国民军，一是获得二五关税及大借

款以救济财政的恐慌。后者较前者尤为急迫，然二五关税及大借款，都必须内阁成立才有办法，而内阁问题，又必须护宪问题与阁员分配问题有了解决才能成立，因此这一目的，一时还不易达到。消灭国民军更非易事，国民一军，至少还有八万乃至十万战斗力极强的军队，有持久坚守之可能；奉军利在国、直互斗，而自己不愿多牺牲实力，吴俊升虽愿牺牲而无多实力，吴佩孚更愿牺牲而实力也有限，靳、田军和孙传芳之新结合虽失败，一变而积极的为吴牺牲，当然是个问题，李景林、王怀庆收编之二三万国民二军，时时都有反戈之可能，张宗昌当然要自保山东，不暇他求，魏益三至今还徘徊观望于国民一军与吴佩孚之间，阎锡山兵虽多而无战斗力，在这样状态之下，吴佩孚将用何种力量可以消灭国民军？

再由相反的方面观察，在北直隶一隅之地，聚集这多饷源无着的饥军，人人都须自寻出路，时时都可发生异动；在河南全部，充满了红枪会及豫军独立的运动；在湖南，粤桂军北伐日有发展；这三方面有一显著的成功，即令国民军不冲出，都足陷吴佩孚于更困难的境遇，倘四方面同时发展，吴佩孚只有退走天津。

吴佩孚失败了，现时奉、直对峙的混沌政局，才能解决，否则他自身决不能解决，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期望的由奉张控制北京政局是不可能的，因为奉张一时不便和直吴开战；至于英国帝国主义者所期望的由奉、直两党组织联立政府，使军阀政权得到一个稳定而巩固时期，以便做他们宰制中国更有力的工具，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吴、张实际不能合作。

吴佩孚如果失败了，恐怕也和段祺瑞一样是最后的失败；此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必然力助奉张，或更用段，以与国民军及国民政府对抗，英国或与日本合作，或另寻出路。此时国民军及国民政府对奉党军阀及帝国主义之争斗，必更加复杂而剧烈，或至另外形成一种争斗形式，都不可知。所可知者，一方面，此时民众运动必然得着较大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中国军阀党又淘汰了一个，只剩下一个奉张，这是一定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于中国人民有利的，所以

人民应该努力促成此种变化。

可是现时一般商人及新闻记者，还未看见这种变化之可能性及其有利于人民，反而希望吴、张诚意合作，好形成一个苟安的局面。可惜他们至今还不懂得军阀间永远没有诚意合作之可能，希望军阀间的和平，完全是梦想，即现时奉、直对峙的混沌政局，已经是非常之苟安的苟安局面，而且不能持久，再进一步的苟安更是不可能的。可惜他们更不懂得军阀间果然诚意合作，则军阀政权较今日更为集中巩固，他们压迫剥削人民也较今日更加规模扩大，他们借款卖国助帝国主义者宰制中国人民也必然较今日更加肆无忌惮。只有军阀间因自相冲突而崩溃，或由人民及接近人民的军队之努力使军阀崩溃，人民才有生路；只有军阀崩溃，在接近人民的军事势力统治之下，强用军票，官绑票，毁坏交通，妨害商业，勒派公债，卖国借款，苛税，扰民等等，象此时反赤军所加于商民的苦痛，才能够免除，号为南北二赤的国民政府、国民军统治下的现状就是一个榜样。无论在反赤军阀对峙的混沌政局之下或反赤军阀诚意合作的政局之下，商民这些苦痛，都是必然不可免的事；所以商民希望军阀诚意合作巩固他们的政权；便等于希望埋葬自己的坟墓更加挖深，希望杀自己的刀更加磨快！

原载《向导》第159期

署名：独秀

好个经济上的提携？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政治上无忌惮的压迫，这是任何中国人都知道的；同时日本人所恐慌的，乃是中国人经济抵制之一法，所以他们对赴日华商参观团提议经济上的提携，而主张撇开政治问题，这就是说，以后你们中国人对于日本政治上的压迫勿用经济抵制来报复！好个经济上的提携！老实说就是“不排日货”。

原载《向导》第159期

署名：实

平民的中日亲善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虞洽卿说：“鄙人此行，深觉日本人民及中等资本家均已有彻底觉悟，知中日亲善之必要，至尚未能完全明瞭者，则日本政府与大资本家。”我们不是国家主义的排外者，中日平民的亲善，本应十二分欢迎；可是帝国主义的日本政府与大资产阶级不倒，中日亲善终是一个欺骗政策不会实现的。我们所反对的正是帝国主义的日本政府与大资产阶级，而不是日本平民；我们只应对日本平民讲中日亲善，不应对帝国主义的日本政府与大资产阶级讲中日亲善。因为对帝国主义者讲亲善，直是“与虎谋皮”！

原载《向导》第159期 署名：实

“友谊的态度来交涉”之结果！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北四川路的电车路，是上海租界工部局越界筑路之最著者，他们越界筑路筑到何处，警察权便随着越界行使到何处，这是何等不法的横暴行为，即依据不平等条约试问何约何条有此等横暴不法的特权之规定！最近上海警察厅派巡警到北四川路站岗，工部局赫然震怒，十六日领袖领事克银汉，淞沪商埠总办丁文江，交涉员许沅会商之结果，十七日遂将北四川路岗警撤退了，这就是孙传芳、丁文江所称“友谊的态度来交涉”之结果！

原载《向导》第159期 署名：实

工人活命问题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近来上海米价贵至每担十七元五角有奇，还有将涨到二十元以上的消息，其他日用必需品势不得不随之日见昂贵，工人每月工资平均不过十二三元，教他们如何养家活命？为活命而要求加资而罢工，总算不得什么过激罢！有一班人以为工人因生活艰难要求加资，固属情理之常，而疲敝的工商业实受不起罢工加资的损失，殊不知穷苦工人除向厂主要求加资外，别无生路可寻，而厂主则可向外国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争斗，以救中国工商业之疲敝，不当专向穷苦的工人身上括取。括尽工人膏血，也抵不了所受帝国主义侵略及军阀之扰害之损失万分之一呵！

原载《向导》第159期 署名：实

革命的上海

(一九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人口超过二百万的上海，为全国工商业之中心。革命运动之客观的条件，他在全中国各大都市中是第一具足的了。所缺乏的是主观上的革命思想与意志。上海市民缺乏革命思想与意志之故，第一原因是由于帝国主义之资本势力，已经使上海市民“洋奴化”了数十年，尤其是上层阶级，如买办、洋货商、工部局海关职员、基督教青年会，以至于英美留学生出身之大学教授及教会大学之学生等；他们的民族观念，差不多被外国金钱势力毁灭完了；即至下层平民，都免不了崇拜洋人势力和买办地位的心理，不过他们比上层阶级的人们和外人较少直接利害关系，因此他们的原始排外观念，有时还能够在外人过分的欺压中表现出来。上海纯粹是个商场，从前除教会的奴隶教育外，很少本国的学校、自己的文化（所谓自己的文化，是指中国人自己建立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美术、文学的教育而言，不是指什么东方文化与国粹。）这乃是上海市民缺乏革命思想之第二原因。

欧战中，中国工商业得了一点发展的机会，于是上海在买办和洋货商以外，新生了一些纱业家、丝业家、航业家及国货商，和外国资本有了一些小小冲突；同时，德国、俄国的革命，使全中国人的心理起了一个大变化，上海市民自然也非例外，一时革新的潮流弥漫了全中国。革新的青年集中了上海，更集中到文化运动与平民运动。因此，上海市民，在客观上在主观上，都生了剧烈的变化，因此，自“五四”运动到“五卅”运动，上海市民遂由洋奴化，渐渐行向革命化了。

现时上海市民之革命化的现象是怎样呢？二十多万产业工人不但站起来要求生活改善和阶级的组织（工会），并且大规模的参加政治斗争。有很大数量的手工业工人和商业职工，也渐渐起来做经济的罢工，组织职工会，加入国民党，且不满意于国民党中的右派，他们参加五卅周年纪念运动，其热烈并不在产业工人和学生之下。学生大部分是革命的，虽然有少数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从中消极的怠工或积极的捣乱，终以学生群众倾向革命，他们尚无法破坏学生的战斗总机关——上海学生联合会。中小商人因外国帝国主义、本国的苛税杂捐及大商企业这三种压迫，也渐渐倾向革命；如不满意于总商会的妥协态度，反对北京军阀政府牺牲关会与五卅案交涉借款卖国，反对北京军阀政府以烟捐向英美烟公司抵借巨款，反对卷烟税，反对军阀破坏闸北自治，反对宅地税，反对省政府停止土布免税，反对闽库增设烟酒令卡，反对省政府增加米捐，反对房捐带征保卫团经费等，都充满了怨愤不平的呼声。至于反对中外官厅护庇烟土，反对增加房租，要求抑平米价，更成了一般平民普遍的运动。最近浦东塘桥乡，竟因巡警征收门牌费，惹起了数千人的暴动。

以上各阶级的民众，即是上海市最大多数的民众，都已经脱离洋奴化，而有了政治的觉悟了。

大商阶级是怎样呢？他们的大部分还留在买办阶级的领域，代表他们的是上海总商会。上海总商会和代表上海教育界贵族的江苏省教育会，是上海市两个反动势力的总机关。大商阶级中，近来虽然有了少数反对派倾向，如虞和德、霍守华等，然而他们当中的不同，只是多数派乃纯粹买办阶级性，无条件的和帝国主义及军阀合作，少数派稍带一点民族资产阶级色彩，须有条件的和帝国主义及军阀合作。他们对于工人运动也有不同的态度，多数派绝对仇视工人运动，少数派想拿一点改良政策利用工人，以爱国名义为他们对帝国主义要求利益而牺牲，并且主张工人不必有自己的组织。此次总商会选举，多数派得了完全胜利，他们今后和帝国主义

者比虞和德时代更要亲密的合作。

大商阶级,在上海民众中虽是少数,而实力却颇雄厚,可以做帝国主义及军阀有力的工具,因为他们掌握着财政金融机关和舆论机关,并且有武装队(保卫团)。因此,在上海市民的民族运动中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即是:或者由革命的工人阶级领导此运动,一直行向革命,以至完成全中国的民族解放;或者由妥协的大商阶级势力影响一切民众,渐渐回复到从前“洋奴化”的上海。

凡是一个革命家,固然不应因抱悲观而至于看不清革命的环境,然亦不应过于乐观而至忽视革命环境中每个危险,更不应由乐观而至于夸自大欺,陷于超过实际可能之推测。大商阶级之妥协,有意的或无意的背叛民众出卖民族利益,这是革命的上海之最大暗礁,在民族运动之长期争斗中,此暗礁时时都会发生危险。

上海是全中国工商业之中心,亦即一切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之中心,同时更是中国中部长江流域精华所萃聚,亦即英国帝国主义者势力范围之根据地;从前太平革命势力一达上海,英国即举全力与之决死斗,今后中国对于帝国主义的争斗,在上海也须比任何地方有更长期的争斗。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失败,乃是他们在中国之最后失败;中国民族在上海的胜利,也是我们对帝国主义之最后胜利。在这困难的长期争斗中,妥协的大商阶级势力有更多更大发展之机会,可是我们也并非幻想能够马上一举而获得最后胜利,不妨得寸思尺的逐渐获得胜利,逐渐革命化,逐渐摇动帝国主义者在华势力之基础;惟必力避大商阶级之危险的暗礁,即“中外合作”之幻想,方不至由现在革命的上海,行向从前洋奴化的上海!

孙传芳、丁文江要的是“大上海”,我们要的是“革命的上海”,因为洋奴化的上海越大越糟。

原载《向导》第160期

署名:独秀

国民党右派与赵恒惕

(一九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上海《新闻报》二十二日长沙电：“国民党部已启封，二十一日又升旗，覃振随赵回湘，右派国民党部亦重整旗鼓。”这一短电使我们有二个感想：一是国民党中真有右派这一个事实，已是社会所公认的了；二是右派国民党竟和吴佩孚的爪牙赵恒惕合作了！

原载《向导》第160期

署名：实

刘芦隐与张君勱

(一九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据大华通讯社消息：“上海工业委员会，鉴于近来上海工潮，起伏无常，特函邀热心工业人士张君勱……刘芦隐……等，订于本月二十五日假座福州路中央西菜社讨论消弭工潮方法。”这或者是右派国民党和其多年敌党研究系，共同进攻工人的联合战线之初幕。这些民党和研究系的老爷们，他们讨论消弭工潮时大吃其西菜，他们忘记了工人连饭也没得吃啊！

原载《向导》第160期

署名：实

国民党右派与陈炯明

(一九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国民政府讨伐陈炯明，得了东江农民不少的帮助，农民在战争中牺牲了五百多人；现在国民党右派却在中央委员会议席上攻击农会是土匪，陈炯明闻之当大称快！

原载《向导》第160期
署名：实

雷殷犯了什么罪？

(一九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雷殷实说不上什么赤，只有他曾出席过北京的反帝国主义大同盟，或者算是大逆不道。反赤军进北京后，雷殷在他的学校中曾做许多反赤的表示，然而终以赤的嫌疑被反赤军逮捕了！雷殷究竟是赤或反赤呢？此时中国的社会运动已分成赤和反赤两大营垒，很少有雷殷辈徘徊两全之余地了！

原载《向导》第160期
署名：实

美术家再往何处遁？

(一九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中国自古就有一班人，一方面不肯同流合污，一方面又不肯奋斗，于是逃禅或隐遁是他们的出路。现在生活艰难，连逃禅隐遁都非易事，于是这班人便想逃遁于科学美术，以为如此一遁，强权当无如我何了。不料强权仍找着了他们！上海县知事禁止美术专门学校不良科学(人体模特儿)，孙传芳斥刘海粟校长：“不顾清议罔识礼教”。且看大美术家刘海粟再往何处遁？

原载《向导》第160期

署名：实

左排赤党右讨军阀

(一九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醜獅》周报中一面说：“既在奉直两系军阀共同解决冯玉祥军队，造成北方黑暗的政局。”一面又说：“只有希望全中国爱国民众，创造实力，武装起来，左排赤党右讨军阀。”他们所指的赤党，国民政府及冯玉祥军队，当然都包含在内，大约他们还嫌奉直两系军阀解决冯玉祥军队不彻底，他们更要彻底解决国民政府及张家口的冯军，肃清南北二赤，造成全国黑暗的政局，才算痛快！

原载《向导》第160期

署名：实

崇拜曾左罗江的国家主义者

(一九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从前听说曾琦、左舜生自比曾左，我以为是别人轻薄他们的话，他们何至如此下流！不料曾琦现在竟用曾国藩家书给学生做国文教科书，他又说：“予则深信罗泽南、江忠源之遗风，必犹有存而未泯者，湘士多才，幸共勉之！”（见《醒狮》第八七号），他们真是这样崇拜背叛民族的满清奴才，他们便有勾结现在的戈登、华尔破灭中国民族革命之可能，他们还谈什么民族主义、国家主义！

原载《向导》第160期

署名：实

国家主义的政纲

(一九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反赤派首领章炳麟尝电请吴、张讨平南北二赤，北赤是冯玉祥，南赤就是蒋介石。现在反赤派的小卒李璫卿（李是醒狮派，该派曾加入反赤大联合，曾琦在反赤大联合开会时，发言之多，不亚于章炳麟。），却来劝南赤蒋介石“一刀两断用武力铲除共产党人”（见《醒狮》八七号），可见他们的计划是：用南赤铲除共产党人，再用军阀铲除南北二赤，把中国所有革命势力铲除净尽，好让英、日、吴、张长治久安的宰割中国。这就是他们国家主义的政纲！

原载《向导》第160期

署名：实

可以靠外力替我们革命吗？

（一九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我们以为中国民族运动绝对拒绝外力援助，是个错误；然而想靠外力直接出头替我们打仗，那更是个错误。因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究竟要我们自己负起责任来干，外人援助我们则可，外人代替我们来干则不可。可是醒狮派一面反对苏俄援助中国革命，一面又说：苏俄“海军无实力，航空不见佳，陆军不可靠，我们要想靠苏俄去打英、美、法、意、日五大强国，真是梦想！”如果苏俄有实力，我们便可以靠他替我们去打仗么？他们真是两个错误同时并犯了！张溥泉责备苏俄不肯出兵由蒙古攻打北京是无诚意援助中国革命，这和醒狮派是同样的错误。

原载《向导》第160期

署名：实

论国民政府之北伐

(一九二六年六月七日)

北伐的意义，是南方的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而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在此时北伐声中，我们若不懂得这个意义，便会发生许多错误的观念及行动。

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是各阶级革命的民众起来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自求解放；全民族经济解放，尤其是解除一般农工平民迫切的困苦。北伐只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还谈不上是和帝国主义者直接的武装冲突。这种军事行动，对于推翻军阀确是一种重要方法，然亦仅仅是一种重要方法，而不是唯一无二的方法；在军阀统治之下的民众，若误认北伐是推翻军阀解放人民之唯一无二的希望，遂至坐待北伐军之到来，自己不努力进行革命工作，这便是大错。这便和前代人民仰望吊民伐罪的王师是一样，完全失了近代革命的意义。再论到北伐军之本身，必须他真是革命的势力向外发展，然后北伐才算是革命的军事行动；若其中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至于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因北伐而剥夺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牺牲了革命之目的，连吊民伐罪的意义都没有了。

现在广州国民政府之北伐是怎样呢？在这一点，他自然还不是直接的和帝国主义者武装冲突。在第二点，广东以外的各省人民，确有坐待北伐军到来之幻想。在第三点，我们敢肯定的说，现在国民政府之北伐还不是由于革命力量澎涨而向外发展，乃是因为吴佩孚进攻湖南，国民政府不得不出兵援湖南以自卫。在第四点，国

民政府之北伐战费，应该发行军事公债，向绅富筹募，如果因北伐而预征钱粮和抽收赌捐，向农工平民搜刮，不但当年中山先生不曾因北伐搜刮平民，即现时唐生智在湘南，军费并不比广东宽裕，他只发行殷实公债，而未向农民诛求，国民政府对农民政策总不应该比唐生智不如。国民二军之溃败，对农民政策之失策乃是最重要的原因；近来国民政府对农民的态度，已经使农民怀疑，若再因北伐战费而预征钱粮和抽收赌捐，若更进而剥夺广东革命的民众从护法政府以来所获得的些少自由，反而给予反革命的买办、土豪、贪官、奸商以充分的自由，则我们在野党应该向政府严重劝告，必须北伐与民众利益双方兼顾，如此才能巩固国民政府。

在上述情形之下，所谓革命军事行动的北伐，现在尚未成问题；因为在国民政府内部的政治状况上，在整个的国民政府之实力上，在国民政府所属军队之战斗力及革命的意识上，都可以看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怎样的防御吴佩孚之南伐，防御反赤军势力之扰害广东，防御广东内部买办、土豪、官僚、右派响应反赤。

帝国主义者早已下定了吴、张分途讨灭南北二赤的计划，如此英吴、日张分据南北，才能和缓他们当中的冲突；现在英吴对日张在北方既不能不大大让步，则吴佩孚南下进攻广东，无论对国民军作战胜败，都必得张作霖之援助而实行。吴佩孚一回汉口，必以全力取湖南，再由湖南进攻广西，届时动摇不定的小军阀如赣邓、闽周，都必然决定态度，奉吴令一致向广东进攻；不但如此，还有香港帝国主义者封锁于外，陈林、魏邦平旧部，勾结土匪、土豪、官僚、买办，扰乱于内；如果竟至如此，国民政府能否支持下去，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并不是我们神经过敏，这样危险的局势，实已迫在目前，丝毫不容我们忽视。

所以现时国民政府的职任，已经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战争”，广东民众的口号，也已经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战争”，全国民众的口号，也已经不是响应北伐而是“拥护革命根据地广东”！

将陷于四面围攻的国民政府，他的领袖们，应该和衷共济，尤其要尊重人民的自由与权利（革命军正为此和军阀战争，也就是革命军和军阀不同之一点）。使人民心悦诚服的和国民政府合作，以战胜此困难，使此困难不但不能覆灭国民政府，转而能够锻炼国民政府领袖及其军队和一切民众的革命意志与战斗力，然后再汇合全国民众革命的势力，进而北伐，才能够以革命的北伐力量完成国民革命。

原载《向导》第161期

署名：陈独秀

赤化过激都是国粹

(一九二六年七月七日)

孙传芳前曾说：“现在社会有什么过激主义和工会，其实这名词已发现三千年前了。”现在吴佩孚在怀仁堂宴会又说：“赤化之源，为皇帝时之蚩尤，以蚩赤同音，蚩尤即赤化之祖。”好一个国学大家吴佩孚以高邮派考古方法，发明了赤化即蚩尤的后裔，如此赤化也算是国粹，而与新名词所谓红党无涉了。直系军阀不但有两次战功，八省地盘，新近又加了一次战功，发明了两个国粹，他们真是文武全才！

原载《向导》第161期
署名：实

帝国主义者最近在上海之暴行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四日)

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民族，除了经济的政治的侵略之外，还有一种侮辱的强暴行为，也使中国人十分不能忍受。别地方的事，从前的事，且都不论，那最大暴行五卅惨案如“五卅凶手供状”中美国人所自述者也都都不论，现在只就最近在上海所发生的几件事看来，件件都是使每个中国人发指皆裂，只要他不是毫无心肝的洋奴：

第一件事，是六月廿三日上午四时，公共租界工部局电气处炉子间夜班工人闻宝章，因工作疲乏出而饮茶，事为西监工斯考毕(Scapie)撞见，当即在背后怒掌其颊，并痛击其背，该工人惊惶之余，且避且退，比及梯畔，适被追及，复又拳足交加，卒至重跌于高及四丈余之梯下棚格中(即储煤之坑)；斯氏见其已不能伸动，乃令俄工拽之以出，用自来水激射历四小时之久，始稍苏醒。当时有日班工人徐梅元、沈兰东、王阿阳三名目击出而作证，以鸣不平。詎知厂长非特不归咎于斯考毕氏，反谓该工人等之言俱属诬枉，且指责该班头目孙恒足谓其不能管理工人，当场一并开除。按斯考毕平日对待工人稍有不合即施毒毆，被毆者莫不负伤垂毙，如闻宝章前已被毆过一次卧床十三日，即可证明。第以势力薄弱之工人从不与较，怎奈让者愈让，而彼之残酷手段，屡施无忌。近更益逞其凶暴野蛮之行为，竟置工人之性命于不顾，以致演成此次之惨剧。全厂工人因此大愤，群起向厂方提出左列之要求：

- (一)开除凶手斯考毕；
- (二)抚恤被伤者医药费；

- (三)恢复四证人工作；
- (四)以后不准英人毒打工人；
- (五)以后不准借故开除工人。

全上海各报无一家敢登载此事，连关于此事的广告都一律拒绝登载。上海总工会拟于二十七日在该会会所召集各团体代表大会，讨论此事，帝国主义者便命令中国官厅将总工会封闭了！此事不但表示帝国主义者之暴行，而中国官厅仰承外人意旨漠视民命，及中国新闻界之怯懦畏事，均足令外国人笑，令中国人愤！

第二件事，是荷属南洋巴达维亚华侨温庆贤，于去年回国，近由上海会审公廨于六月二十一日，从南京将其提到上海，并且荷兰总领事还要引渡归彼审理。查温庆贤生长中国，父母均是中国人，虽在巴达维亚经商多年，而并未入荷籍，去年回国系用中国护照，回国后也未曾在荷兰领署注册，即现在上海荷领因受巴达维亚荷官之托，使会审公廨出票移提，票内亦注明系拘捕中国人民温庆贤，因被告若非中国人，便不属公廨管辖。因此，此案当然归公廨审问，断无引渡于荷官之理。荷属华侨受荷官虐待，真是苦不尽言，现在更进一步来到中国领土之内拘捕中国人了！横暴的荷领事，竟要在中国境内拘捕中国人！糊涂的公廨中国会审官，竟不向荷领抗议引渡审理中国人民！

第三件事，是熊希龄之被捕。湖南华昌矿务公司董事熊希龄，曾经辞去一切董事名义，并登报声明过；公司闭歇后，尚欠美国工程师怀德薪金若干，现在熊氏来到上海，公廨中美国会审官派克思，竟据怀德之请求发出拘票，于六月二十八日下午四时，将熊氏在赴拒毒会欢迎会途中拘至公廨，要求熊氏交出保证金三十万两。熊氏被迫登车时，当由丁文江告西探：今日拒毒会开会欢迎，有事可待会后商量，该西探坚称立须逮捕，丁文江等遂陪熊氏同往公廨，直至晚九时，始由江海关监督以一万两保证金保出。公廨受理此案及出票拘捕手续，不用说理由都不充足，分明是美国会审官滥用职权，有意为他们的工程师来侮辱中国绅士一下。绅士尚如此被

侮辱，中国平民又当如何？丁文江是华界最高行政长官，对此案不立刻依据职权向美国领事提出严重抗议，竟取“友谊的磋商”之故智，忘了自己的身分，陪熊氏同到公廨，形同被捕，以取侮辱。被此侮辱的不是丁文江个人，而是淞沪商埠总办呵！

第四件事，是沪商协会于本月一日在岭南楼菜馆开筹备会议，正将开会时，西捕蜂拥而入，一面喊问你们在此做什么？有多少广东人？一面大挥拳棍打人，将会打散了。各报纪载此事，只说“派捕禁止”，而不敢说被捕打散。租界禁止华人集会已经是横暴了，正经商人集会竟被西捕打散，这乃是第一次！并闻捕房此次加于沪商协会之暴行，乃由于新改选的总商会中人所唆使，因为他们疑心协会是粤商霍守华主动，所以西捕问有多少广东人。

在此小小四件事中，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是如何横暴侮辱，中国代表买办阶级的总商会是如何卖国自残同类，官僚是如何昏聩误国，新闻界是如何畏怯不能代表舆论，都一一充分的表现出来了！

原载《向导》第162期

署名：独秀

答张人杰符琇黄世见冥飞

（关于北伐问题）*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三日）

张人杰符琇黄世见冥飞诸先生：

诸先生对于鄙人前作《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有所辩难，以抱病久未奉答，歉仄之至。诸先生意见大致略同，所以现在一并奉答；病后体弱，恕不能详。在答复诸先生示教之先，谨将鄙人前文要旨略重述一下。第一个要旨是警告国民政府统治以外的民众，第二个要旨是警告国民政府的当局。警告民众的是：不可专门依赖国民政府北伐得到解放，各地民众应该自己努力做推倒军阀统治的运动，至少也要摇动当地军阀的统治地位；各地民众若不自起奋斗，专门坐待北伐军之到来，便是极大的错误。警告国民政府的又有二义：一是不可把北伐看得太神圣了，因为他是神圣事业，遂不惜牺牲民众利益，民众若自愿为北伐而牺牲利益，那是可以的，若政府当局拿神圣北伐的大帽子来压住民众，硬要牺牲他们利益，这便大大的失了北伐之真实的意义了（至于北伐名义不妥当如本报读者于枫冷先生所云，还不是重要问题）；二是不可主观的把此次北伐看得太夸张太奢望了，现时民众的组织势力上，在国民党指挥政治、军事之党的权威上，在国民政府所属军事的内容及实力上，这些客观的状况看起来，此次北伐始终只能是防御战争，是防御反赤的北方军阀势力希图消灭南方革命势力的战争，真正完成国民革命的革命战争，还要待今后有充分准备的，第二次北伐、第三或第四次北伐，不看清客观上的实际情形，专凭主观妄自夸大，或希望速成徼幸图功，这决不是意志坚强的革命党人所应取的态度，而且

* 标题为本书编者加。

会愤事。这些实际情形，这些革命北伐的意义，在革命的责任上，我们不得不公开的普遍的告诉全国民众及一切革命派的同志，免致误入迷途，决非对于一二人“函电相绳”可以济事的（象诸先生都不了解，竟来函辩难，恐怕除诸先生之外，不甚了解的还有多人，即此更足证明非公开的普遍的讨论不可了。），更不是什么“翘此以为报章快心之谈”，因为民众的力量还未充实，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本身又还有许多缺点，使国民革命一时不能急切成功，正是我们痛心的事，不应该是我们快心的事！

你们说：“出师北伐，廓清军阀，虽非国民革命之全部工作，实为国民革命之唯一先著也，凡在革命旗帜之下，同抱打倒帝国主义目的者，对此惟一先著，应无异议，足下更何忍加以攻击乎。”我前文曾说过：“北伐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在此等军事行动之先，应该以充分的民众宣传与组织为先著，现在你们仍旧以出师北伐为国民革命之唯一先著，你们这种军事行动万能的老观念仍然丝毫未改，怎不令人失望！军阀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抱打倒帝国主义目的者，当然主张要打倒军阀；但我们对于出师北伐是否国民革命之唯一先著，对于怎样出师北伐，和你们都有不同的意见，你们一闻不同的意见便以为是攻击，你们这样不受善言的老脾气也仍然丝毫未改，更是令人失望！

你们说：“北伐军之性质程度及平日之训练，当为足下所素知，尊著乃对於北伐军出师，糊涂闪烁加以投机权位之恶名，使民众而尽闻足下之言，且以足下之言为可信，其影响所及，足下曾一计之乎？”你们当知：现在所有的北伐军之性质程度及训练，是不是同等的，是否含有投机权位分子，即训练最好之党军现在是怎样，你们倘不要求我详细指陈，我姑且不必多说。你们又当知：民众只认识事实，当看北伐军的实施政策为向背，任何人空口说好话都是无用的，并且我们固然应该引导民众赞助北伐军，然而一概蒙蔽民众欺骗民众，每个革命党人都不应如此。

你们说：“至于因北伐而筹款，为此间不得已之办法，足下固诏

此次出师为防御之战者，则寇盗在门，岂容偃息，塞井夷灶，尚非苛政。政府以不忍人之心，筹不得已之款，兢兢业业，未尝稍弛，足下如能来此一游，必知真相。乃据远道传闻，遽施攻击，且施攻击于北伐中与贼相持之时，实此间同志所惶惑不解者。”既然出兵，自必要筹款；然不筹之于殷富，不筹之于官吏中饱，而摊派公债预征钱粮及于小商贫农，且有恢复赌捐之议，好一个不得已之办法，这都是远道传闻吗？并且你们自己公然说：“因增筹战费而及于平民是事实上的要求”，又说：“广东农民困苦，负担太重，这是革命过程中不能避免的事实。”既然是事实，又何以说是远道传闻呢？总之，你们的责任是在力求与贼不同，并不是于北伐中与贼相持之时力拒任何忠告！

你们说：“尊著中对于国民政府的政治实力及国民革命军革命一概加以否认，且因此否认此次出师之为革命，尤近于臆断。”在一般意义上，不但现在的国民政府和现在的出师北伐是革命的，就是以前杨、刘讨伐沈鸿英讨伐商团，在客观上都是革命的；有许多人以为此次北伐的内容虽然有些缺点，而北伐军所占的地方，总比吴佩孚要好些，这个事实，除了帝国主义及军阀，无人能够否认。然而我们以为这样观察批评国民政府及其北伐军，与其说是恭维，不如说是轻蔑；因为凡是尊重国民政府的人，应该要求他有高度的革命性。事实是怎样呢？中山先生拥护农工利益联俄联共，此革命政策，都几乎推翻了，现时还在推翻的运动中，北伐总司令部成立后，国民政府几乎是无形取消了，北伐期中限制人民自由的什么条例几乎颁布出来了，什么“因增筹战费而及于平民是事实上的要求”，什么“农民困苦负担太重这是革命过程中不能避免的事实”，竟成了政府党人口中革命的理论，这样来革命，其结果怎样呢？

你们不相信“一种军事行动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军全部意义”，又不相信“这种军事行动对于推翻军阀不是唯一无二的方法”，这两层上文已经答过，兹不重赘。

我说：“北伐的意义是南方的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讨伐北洋军阀

的一种军事行动”，这是泛论北伐这一名词之本身的定义；我又说：“再论到北伐军本身，必须它真是革命的势力向外发展，然后北伐才算是革命的军事行动”，这是特论北伐军这一行动必须合乎北伐的定义；这并无所谓冲突处，难道这样浅显的文义你们都看不懂吗？

你们又不相信“近来国民政府对农民态度已经使农民怀疑”之说，广东之五华、中山、花县，广西之东兰、平南、怀集等处农民，被驻军县官蹂躏的事，你们知道吗？中央党部中，国民政府中，都有人大喊农民协会是土匪，你们不听见吗？这样怎令农民不怀疑！

你们要问北伐时期成熟的标准吗？在内须有坚固的民众基础，在外须有和敌人对抗的实力，民众的暴动已经非有充分的准备不可，何况国民政府的北伐是有一定领土的政府正式出兵？

你们以为我说讨伐军阀还不是直接和帝国主义者武装冲突，这是我没有把帝国主义与军阀关系弄清楚；我们知识浅陋，一向不曾把军阀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弄清楚，只知道国民党右派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还不懂得军阀也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承教至为感谢！

你们既然承认北伐将领有打避疫针的必要，却又提议用别种方法。用别种什么方法呢？或者是讳疾忌医，不肯打针，还是去烧香打醮罢！

你们不以我说：“必须北伐与民众利益双方兼顾”的话为然，而主张“革命政府下的人民应该尽一点义务”、“因增筹战费而及于平民是事实上的要求”，既然如此，便不必责我“乃据远道传闻”了！

你们断定在军阀统治下的民众不能起来造成革命的势力，又感觉得“稍一动作即遭通缉捕杀的祸患”，如此诚然是危险呀，大家坐等着候北伐军打来罢！

你们对于我这个答复，如果还有不满意的地方，尚望再赐教言，我们是不拒绝异议的。

独秀 九月十三日

原载《向导》第171期

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民国十五年，几乎年年有战争，大家厌恶战争，希望和平，这是当然的事。可是战争决不是仅仅由厌恶而可去的，和平也决不是仅仅由希望而可来的，必须经过几次有主义有社会目的之战争，来去掉那无主义无社会目的之战争的源泉，然后战争可止而和平可期，否则终于混战而已。

现在的战争，是不是有主义有社会目的之战争呢？我们可以坚决的肯定他是有主义有社会目的之战争。自从吴佩孚出兵讨赤护宪到国民政府北伐，这八个月以来的战争，不但国民政府、国民军方面有主义有社会目的，就是奉、直军方面在客观上也有他们的主义他们的社会目的，和以前个人的一党一系的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确是不同。

这八个月以来的战争，在表面上固然也可以说是赤与反赤之战争，但更科学些即更实际些观察起来，乃是中国半封建势力与民主势力之战争。不但两方直接战争者其性质如此，即关系两方之社会势力，亦显然分成两大营寨如左表：

半封建派(反赤的)：

奉直军阀
官僚
洋行买办
大学教授
地主土豪
交通系

民主派(赤的)：

国民党及国民政府
国民军
农民
工人
学生
有政治觉悟的工商业家

安福系	中小商人
研究系	共产党
联治派	共产主义青年团
国家主义派	语丝派创造派等文学家
复辟派及新社会民主党	
老民党	
各种宗教徒	

这两派的营寨旗帜都很鲜明，其争斗亦日趋剧烈，很少有中立之余地；只有研究系一派，还常常装出中立的态度，最近他们的张君勱，于吴淞政治大学开学日演说：“目下时局，不论谁胜谁败，吾人殊无过问之必要。”其实，他们一向站在清室、袁世凯、段祺瑞、曹吴那边，拚命和民主派作对，吴佩孚、齐燮元之盛时，他们却大过问而特过问，张君勱曾亲身出力拥护曹宪，丁文江也做了孙家的官，他们的大将蒋方震，从去年为吴、孙奔走，一直到现在不曾停蹄。他们的机关报说：“吴之力不足自救，东南以力分又不足以剪灭当前之大敌，虽有强援焉，而不可以为吾用，……若其不幸而有所挫败，……”（见九月二十日《时事新报》时论）；曰“吾”曰“不幸”，这分明是站在吴、孙那边说话。他们的机关报又说：“我并不相信，什么国民革命，而且我更不能承认国民革命可以完成。”（见九月二十一日《时事新报》时论，这篇论文起首却说：“现在国民革命正举行之时，我们若是发国民革命没有成功的可能的话，即不是受了帝国主义的唆使，亦是反革命者的鬼蜮。”这几句自相矛盾的话，分明是痛骂他们自己。）

国民革命包含着民族革命民主革命两个意义，也就是打倒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半封建势力这两个意义。他们既不相信有什么国民革命，更不能承认国民革命可以完成，那么他们主张怎样呢？难道他们主张向前社会革命，当然不会，当然他们是主张向后仍旧由帝国主义扶助中国的半封建势力统治中国。因此，我们把研究系也列在半封建派之内，总不至于不符事实罢！

现在分明是半封建和民主这两派势力的战争，所以能够肯定他是有主义有社会目的之战争，而不是无主义的个人的或一党一系的目的之战争。因为此次战争若仍旧是奉、直军阀的胜利，不用说中国仍旧脱不了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半封建势力之统治；胜利若归诸国民政府、国民军，至少我们能够渐渐走上对外民族独立对内建设民主政治的道路，再至少我们总可以大大的发展走上这条道路的运动。一切半封建势力，都是中国民族走上这条道路的障碍物，这些障碍物不搬开，中国永世不会有进步，所以我们坚决的毫不游移的现在要为这个目的而争斗，即一切民主派为实现民主政治对于半封建势力之争斗；这个争斗也就是此次八个月以来国民军、国民政府对奉、直战争之社会目的。

这个争斗在中国是一定需要的，本来不成问题，虽研究系的人也不便公然否认；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个争斗中，有没有向左超过民主主义的倾向和向右不及民主主义的倾向。

在前一问题，大半是不懂得共产党革命理论与政策的人之怀疑，或是有意造谣。最近研究系的机关报（九月二十一日《时事新报》时论）说国民革命成功必然发生两个问题：（一）信仰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党，将与国民党左派争政权；（二）赤俄必定帮助列宁党战胜国民党左派，将中国设为他的赤塔共和国来主持中国的一切事业。研究系这班人，一向是替帝国主义军阀信口造谣来攻击中国共产党和苏俄的，现在眼见吴佩孚被北伐军打败，气昏了，更要失神的无端狂吠了！列宁党应该信奉列宁主义，主张彻底的民族自治，反对强大民族压制弱小民族，本是列宁主义要素之一，中国共产党若希图中国归苏俄统治，这简直是卖国党，而不是什么列宁党了。至于国民革命成功，共产党便要与国民党左派争政权，这也是不会有的事。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他们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最懂得历史各时代之革命的理论及政策的；他们懂得中国的历史和经

济状况，现在还是国民革命时代，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时代，现在不但资产阶级需要民主政治，即无产阶级亦需要民主政治，或者比资产阶级需要民主政治更为迫切；因此，我们敢说：在国民革命的争斗中，中国共产党是不会有向左超过民主主义的倾向的，或者有时比国民党左派分子一时浪漫的说话还右一点也难说。我们还敢说：即国民革命成功后之建设时期，也必然是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还不是工农政府；在那时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之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要发展起来，也只有到那时，真正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不过那时的中国资本主义，已经过国民革命的洗礼，已经是民族的民主的资本主义，他的发展影响到全民族的经济生活，和研究系这类人所要的资本主义——“不要民族革命，不要民主革命，不经过国民革命的洗礼，只由半封建势力下之军阀官僚买办，结托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道威斯式的资本主义。”——相差甚大。

在后一问题，前表所列民主派的各社会成分，民主化的程度虽不齐全，而根本上都是站在民主的战线上和半封建势力争斗的。我们为稳固充实民主战线起见，不得不向正站在民主主义旗下和军阀血战的国民政府与国民军，要求他们更高度的民主主义化：第一，他们应该在思想上抛弃仁爱、爱民、保民、救民这类论调；仁爱、爱民、保民、救民，这都是封建时代圣君贤相的所谓仁政，真正民主主义者，应该走到人民中去，引导人民自己奋斗，不应该高居人民之上、来爱他们保他们救他们；第二，他们应该在行动上抛弃封建时代军事专政的万恶制度，他们政权所及之地，务须使该地方政治尽可能的民主化；而且在事实上，贪官污吏是中国政治之致命伤，只有政治民主化可望救济，军事专政正是贪官污吏藏身之所。第三，他们政权所及之地，应该和农民合作，惩治贪官污吏、劣绅、地主、土豪，而不应放任贪官污吏及驻军勾结劣绅、地主、土豪，蹂

躏农民；因为农民是国民革命中主要的广大民众，劣绅、地主、土豪乃是半封建势力之真实基础。只有他们自身这样更高度的民主化，才能肃清民主派内部的封建余毒，才能稳固充实民主的战线，才能保证民主派的胜利。

研究系这班人，在表面上或不敢公然反对民主政治，实际是反对的。他们否认国民革命可以成功，否认国民会议可以召集，否认商会、农会、工会、教育会、学生会可以代表人民，一切都否认干净了，不看见他们于这些消极的否认之外，有什么积极的主张。他们积极的主张，不用说就是照旧由半封建的军阀统治中国，更好是由有两次战功、八省地盘的直系统治中国，最好是袁世凯复活来统治中国，好用他们来组织所谓“第一流内阁”。我们现在为打倒半封建势力而争斗，为实现民主政治而争斗，不但要用枪炮和半封建的军阀争斗，还要用笔舌和反民主主义的研究系这类政客争斗！

原载《向导》第172期

署名：独秀

人民之军队!?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中国此时实需要有“人民之军队”，然而这不是一件容易成功的事。孙传芳对张一麐说：“余之军队为人民之军队，当受人民指挥，故一切行止当以人民之意旨为依归。”我不知他此话从何说起！代表人民意旨之各团体各报馆，一致要求孙传芳保境安民，反对他参加五省以外的战事，然而他悍然不顾，纷遣大兵，以援助吴佩孚名义，由江西、福建向国民政府军示威，并秘密与国民政府军谈判，以武汉让给他与否为和战条件。动员令早已下了，前敌已在开火时，还说什么“受人民指挥，以人民之意旨为依归”这一派鬼话，这是欺谁？

原载《向导》第172期 署名：实

好一个有弊而却公道的治外法权！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近在上海美国人招待会说：“治外法权乃一种苟且之计，但此时实属必要之物，明知其弊，而实不能去之，……因此权一去，公道被危。”平心而论，治外法权在中国人自然恶其有弊，在外国人自然觉得是必要之物而且公道，倘一旦这种“公道”被危，英国领事便不能在青岛护庇杀害德国人的凶犯，日本领事也不能在上海护庇打死陈阿堂的凶犯了。这种公道在帝国主义者欺凌中国人的作用上诚属必要之物，可恨赤俄竟不感觉其必要，竟在中国把这种“公道”抛弃不要，所以有些人痛恨苏俄起来反赤！

原载《向导》第172期 署名：实

张宗昌的亲口供状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张宗昌对济南各界代表说：“并闻党军实行共产共妻主义，不论公私房地，执行没收，各地稍有财产者，党军概强迫勒捐，或将全部财产，全数没收，归公之产，作三三四三股分派，以三成充党费，三成充战费，其余四成则入私囊，沿线所掳之妇女，悉遭奸淫，惨不忍闻；又其出兵之际，即印就中央银行钞票二万万张，强迫地方行使；现湖南至汉口一带，均强迫行使此项纸币，贻害人民，凡此种种惨无人道之罪恶，罄竹难书。”张宗昌这一篇谈话，若将其中“党军”改为“奉联军”，“中央银行钞票”改为“军用票”，湖南至汉口一带改为济南至张家口一带，再加枪杀新闻记者一项，便是张宗昌的亲口供状。

原载《向导》第172期

署名：实

国家主义者那里去了？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万县最大屠杀事件出来以后，全国悲愤，无论新旧党派，都一致奔走号召，反对英帝国主义之横暴，独有一向自称外抗强权的国家主义者，不知道那里去了？国家主义者的首领多半是四川人，现在强权屠杀到他们的家乡了，他们再不出来抗一抗，他们的血也未免太冷了！

原载《向导》第172期

署名：实

……政还诸……民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孙传芳致蒋介石电，主张湘政还诸湘民，我想蒋介石一定复电赞成，并且声明湘政已经还诸湘民（湘民当然不是以赵恒惕为限），还要劝孙传芳也将苏政还诸苏民，皖政还诸皖民，赣政还诸赣民，闽政还诸闽民，这样的结果，孙传芳、陈调元、邓如琢、周荫人都一齐滚蛋，岂不和平大吉！

原载《向导》第172期

署名：实

丑哉和平运动!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和平是人人所希望的,真正的和平运动更是不应该反对的;可是奉直联军急攻国民军之时,吴佩孚对湘、粤大张挞伐之时,都无人出来运动和平,独当北伐军急攻武汉之时,南北巨绅都应时而出,主张和平,仿佛和平运动也算是北洋军阀一种武器,危急时也用得着。孙传芳只想保境安民时,上海和平运动之声大起,孙传芳想进兵攻取湘、鄂时,上海和平运动便沈寂,现在孙传芳军事失利,上海和平声浪又高起来了。月薪千元之孙传芳的高等顾问蒋伯器出来号召和平,几扎蹩脚绅商跟着他跑腿,这种和平运动,岂不丑哉!张一麀君老矣,何苦也出来跟着献丑!?

原载《向导》第172期

署名:实

帝国主义者对待中国人之态度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

帝国主义者对待中国人之态度，历来是把中国人当做未开化的蛮族看待，动辄开炮轰击，以快其意，以遂其欲求，以为无论有理无理先打死他们几个再说，他们最怕的是大炮，大炮打死了他们，我们便有了理了，他们的酋长也就屈服了。帝国主义者，对待中国人这样的态度，简直与对待非洲和南洋各处未开化的蛮人生番一样，对待半开化民族都不至如此。

自鸦片战争到万县屠杀，英国这种炮舰政策，便是一切帝国主义者对待中国人之代表态度。

万县屠杀之起因，是由于最近英轮在川江一连任意撞沉了中国官船七只，淹死的军官、兵士前后共计七十七人，杨森派兵一队向英轮交涉，反被英轮缴械，杨森遂将英轮二只扣留。英国帝国主义者是怎样办法呢？他是不曾和杨森交涉，而马上采用炮舰政策，开炮轰击万县城。其结果怎样呢？英国人自己的机关报《字林报》说：“维勤号专击华军之炮及沿江兵士，考克却非号则以大炮轰城。……第一弹即将其司令部完全击毁，闻共发弹三十九枚，或云五十六枚，全城起火，……城中火光烛天，终夜不熄。……万县民兵共死五千，……该城大部分已破坏。”这是何等无理由的大屠杀！

即依据帝国主义者所视为神圣不许侵犯的不平等条约，试问何约何条，载明英国兵舰在非宣战时亦得有任意开炮轰击中国军民之特权呢？英国人这样横暴不法的炮舰政策，不是对待蛮族生番的态度是什么？

路透社九月二十八日伦敦电：“保守党洛克问在华英国兵力足

以充分保护英人利益否？首相答称，刻已在途之接应兵力，计飞机、运送舰一艘及驱逐舰九艘，连同现已在华之兵力，可视为舰队力量充足。”由此可见英国人对华炮舰政策，现在仍是有进无已。

同时，英国人在上海号召的什么“自由保障会”，在各报上大登其启事说：“本会专事联合各国人民反对第三国际之学理及共产政策之宣传，增进各国各阶级之合作心，维护原有良好之教化思想言论之自由。”他们正在宣传这些德意，万县大屠杀，却好把他们这些德意证实了；考克却非号准对着万县市民所发的大炮炮弹五十六枚，才真是自由之保障哩！难道杨森及万县市民也和第三国际学理共产政策有什么关系么？

英国帝国主义者既然始终以炮舰政策对待我们“未开化”的中国人，我们未开化的人，只有自己尽可能的力量，用“未开化”的手段回答他们，切勿希望什么政府交涉可以解决这样的血腥问题；因为无论北京政府或四川政府，都是在英国奴才、直隶军阀势力支配之下啊！

原载《向导》第173、4期

署名：独秀

我们现在怎样争斗？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二日)

醉梦他自己以武力统一中国的吴佩孚，已由武汉而败退到郑州，只落得奉张击掌称快和孙传芳乘机出头。现时在吴佩孚名义之下的部队，虽号称尚有十万，然不独战斗力薄弱，而且各自欲觅得地盘，不能为吴佩孚反攻武汉而战了。其中由国民二军由靖国军改编的部分，还要乘机倒吴，吴佩孚的势力是要根本消灭的了。

继起的孙传芳是否能以成功，全看他在鄂、赣边界和北伐军战争之胜败和奉军是否乘机南下夺取苏、皖。

奉军尤其是张宗昌军，急欲以援吴名义扩张地盘，以安插其有功将领；然为吴佩孚、孙传芳阳求援助阴拒其派兵南下所阻，现时只得且用全力经营直、鲁及热、察二特区，将来再观变而动。

孙传芳若在鄂、赣得到胜利，则奉据北方，孙占长江，国民政府仅保有南方，直系军阀势力倒了一个吴佩孚，又起来一个孙传芳，中国政治将更陷入混沌局面。孙传芳军若在鄂、赣失败，则直系势力全灭（靳云鹗在河南，四面受敌，非依奉必依国，即表面上勉强存在，亦不能自成一派独立的军阀势力），奉鲁军迟早必南窥苏、皖，这时便会形成国、奉南北对峙的局面。

如果到了国、奉南北对峙的局面，中国的政局，将由混沌而转入活泼，或者由军事争斗暂时转入政治争斗；然而是否真能如陶孟和先生所希望“由战争到政治”呢？当然还不能。要真能由战争到政治，至少必待奉军退出关外。因为军阀势力未消灭，在民主派统一政权代替军阀的军事专政以前，国内战争是不会停止的。

因此，我们要真能由战争到政治，要真能得到和平，便应该懂

得现在及最近的将来要怎样争斗了，怎样为到政治到和平而争斗：

第一步是要消灭孙传芳势力；

第二步是要消灭奉张势力。

这两个军阀势力是目前中国半封建势力之代表，消灭了他们，才能够停止内战，才能够由战争到政治，才能够得到和平，才能够走上民主政治的路，才能够使中国历史由半封建时代进化到资本主义时代。全国革命的民众及接近民众的军队，应该一致向着这个目标前进！

广东、湖南、湖北这些省分的民众，应该努力拥护国民政府的政权，努力助北伐军击破孙传芳侵入湖北、江西的军队。东南各省民众，应该尽可能的力量驱走孙传芳的驻防军，为实现地方自治政府而争斗，至少农民、商民不应该再以纳税出捐形式帮助孙传芳做扩张地盘的军饷了；知识界、言论界不应该再以中立态度助长孙传芳的野心，更应该起来揭破奉、直军阀以讨赤来欺骗人民的假面具。尤其是东三省的民众，应该尽可能的力量阻止奉军南下援助吴佩孚与孙传芳，更进而在军事上在财政上，摇动奉系军阀统治的基础，一直到武装响应国民政府和国民军讨奉战争。西北各省民众，应该与国民军合作，肃清吴佩孚在陕、甘的残余势力，更进而援助国民军向奉军反攻。

国民政府眼前的紧急争斗，自然是击退孙传芳之进攻，非此不能保持此次北伐已得的胜利。同时，对孙传芳战争一有结果，国民政府对于所统治的省分尤其是广东，即须尽可能的力图民主政治之建设，力助民众的组织力和武装战斗力之发展，尽力来肃清境内的半封建势力，如贪官污吏、劣绅、地主、土豪、工贼等，如此才能充实南方民主派的实力，继续北伐，完成民主革命的争斗。

国民军欲图向奉军反攻，必先尽力与民众尤其是农民合作，以巩固其在陕、甘的政权。特别是对于西北各省回民，须有适当的政策，不损碍其政治上经济上的生存权利，以引导他们参加全国的民主革命争斗，至少也要使他们不妨害此争斗。

现时中国的政治争斗，是民主主义胜利呢，还是半封建的军阀胜利，这要看我们是怎样争斗和争斗的努力至何程度了。现在确是中国历史之一重大时期！

原载《向导》第175期

署名：独秀

孙传芳章炳麟的双簧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二日)

章炳麟劝孙传芳讨蒋的支电，不但高叫“迫切陈词，为国呼吁，为民请命”，并且责备孙传芳不应“宴安江左，偷引岁时”。其实这道将近一千字的电报，乃是孙传芳特别拿出一千块大龙洋，叫章炳麟如此这般的。这岂不是他俩在那里唱演双簧吗？

原载《向导》第175期

署名：实

妙哉孙传芳的三爱主义！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二日)

孙传芳看见孙中山有三民主义，他也发明了一个三爱主义来抵制：一、爱国，二、爱民，三、爱敌。我以为孙传芳对于他自己发明的主义，都曾一一实行，却不是空谈，他爱他的五省孙国，他又爱他的子民傅筱庵，他尤其爱中华民族的敌人英、日帝国主义者，曾为英、日帝国主义者秘密枪杀了刘华。

原载《向导》第175期

署名：实

好一个有节操的章炳麟！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二日)

章炳麟今夏在苏州什么平坦学社讲学说：“文学当重气节，明末清初顾亭林先生之文学，为后世所推崇，亦以其气节耳，后人文章诚能及之，而节操品概，往往不逮远甚。即如古人扬雄、韩愈，其文章虽好，而一则崇拜王莽，为当时帝王所雇用，志气消沉，一则重视富贵利禄，乞怜求援，廉耻丧失，气节皆不高超也。”我想听了他这段话的人，不浑身肉麻，便误以为是他自己痛责自己。以一个同盟会会员，首先向张之洞乞怜求援，乞怜不成，又派何震（刘申叔之妻）到端方处运动投降，首先通电话统治中国非项城不可，称孙、黄为小丑，章炳麟的气节安在？王莽比袁世凯总算略识诗书，而且扬雄在王莽朝，也并未曾象章炳麟荣任筹边使大摆勋章那样出丑；韩愈固然上书宰相不忘利禄，然而当时的宰相，也还不象现在的什么镇威孚威这样作恶，韩愈更未曾象章炳麟为区区一千元替孙传芳摇旗呐喊，且称孙传芳为神武这样的“廉耻丧失”！

原载《向导》第175期

署名：实

好个中国和平之奥秘！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二日)

教会办的《时兆月报》上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这段话非常智慧，乃由伟大的上帝所说。中国和平之奥秘包括其中。今中国若遵行此话，国中就有和平，倘轻视之，就必兴起骚乱纷争。”（见该报本年七月号斐以文做的《中国可享和平么》一文中。）青年们注意呵！照基督教的教义，中国若要享和平，只有遵行上帝的话，服顺所有中外掌权的人，惧怕他，恭敬他，切不可再说什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了！

原载《向导》第175期

署名：实

研究系主张社会革命!?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二日)

前几日我们看见研究系的机关报,否认国民革命可以成功,否认国民会议可以召集,否认商会、农会、工会、教育会、学生会可以代表人民,一切都否认干净了,不见他们在消极否认之外,有何积极主张。可是他们现在发表积极的主张了,他们说:“宁愿为反国民革命者”,又说:“只有民众觉悟后团集起来实行民众社会革命。”列宁党现在只主张国民革命,研究系却主张社会革命,可见列宁党并不过激,研究系才真是过激党哩!我听见研究系最近这样的主张,不觉喜欢得把牙齿都笑掉了,腰也笑得直不起来,他们(研究系)害得我们好苦呀!研究系很聪明,他们知道“反社会革命”的工作将来再做不迟,现在不妨唱唱高调,眼前要紧的工作是“反国民革命”,因为这个革命是要推翻奉直军阀之统治地位的。好聪明的研究系!

原载《向导》第175期

署名:实

“反国民革命者”的民权呼声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二日)

民权是我们应该主张的,摧残言论是我们应该反对的,可是我们却不赞成反革命者可以拿民权与言论自由做护身盾牌。研究系一班人对于民权与言论自由的观念,完全和我们相反;反动的北京《晨报》被毁时,他们大叫民权与言论自由被损害了,到了奉、直蹂躏北京报界,他们却一声不响,还仍旧附和奉军反赤;最近孙传芳封闭上海国民通信社,逮捕记者,他们是不响一声,同时对于国民政府禁售反对革命的报纸,则大呼民权与言论自由;照他们这样的态度,仿佛民权与言论自由仅仅只有给反革命运动做盾牌的单纯意义,似乎不甚妥当吧!

所以我们对于此次广州禁售报纸的态度是:不根本责备他们这是摧残民权与言论自由,而是希望他们将所禁的报纸再审查一下,那些是反对革命的(如“宁愿为反国民革命者”的《时事新报》之类),那些不是反对革命的(如《独立青年》之类),应该分别看待。象《新申报》分明是孙传芳的机关报,《新闻报》一向为陈炯明鼓吹,现在又在为吴佩孚出力,《顺天时报》更不用说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喉舌,上海的《独立报》、《正论报》和香港的《讨赤报》,都是英帝国主义出钱办的,都天天大捧其张雨帅、吴玉帅、孙馨帅,民权与言论自由若为此等报纸而设,试问民权与言论自由还有什么价值?

原载《向导》第175期

署名:实

以党治国与军事专政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二日)

现在治英国的是保守党，治意大利的是法西斯党，治美国的是共和党，凡非以君治国的国家，都是以党治国，本来一点也不稀奇；如果有人以党治国是孙中山先生的新发明，或以此非难他，都算缺乏常识。现在的中国，既非以君治国，又非以党治国，乃是以军治国；中山先生以为这样不好，所以主张也要和别国一样以党治国，换句话说，就是以政党政治来代替军事专政。我们以为凡是反对军事专政的人，便应该赞成以党治国；同时，主张以党治国的人，也不应该仍旧留恋军事专政！

原载《向导》第175期 署名：实

请看治外法权所产生之公道！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二日)

近据为陈阿堂案赴日代表郝兆先报告：“抵长崎上陆时，即被十余日警包围与税关严重检查弟之手提箱，对陈案文件强行索取，被弟拒绝，不意弟到我国领馆时，日警与税关撬开行李，将所带陈案报告书数十本完全盗去，由此可以证明日政府偏袒行为。兹已向日警严重交涉，领馆亦抗议，彼方虽承认取去，然至今未还。”日本帝国主义者拿治外法权护庇他们的杀人凶犯之效果如此，美公使马瑞慕如今不忧虑“公道被危”了吧！

原载《向导》第175期 署名：实

反赤派听者！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二日)

反赤派大首领吴佩孚所作大骂公妻公产的关圣伏魔歌，已足令人读之喷饭。反赤派二首领孙传芳，居然在正式文告中说蒋介石已经实行公产公妻，弄得其部将陈仪也有点不相信，派员赴汉口调查。最近他们的三首领褚玉璞所发讨赤勘电，益发有趣了。该电妙文，可谓字字珠玑，寻开心的朋友们，万不可不一读；其中最有趣的话是说：“其（指冯逆玉祥、蒋逆介石）宣言曰，吾无父母，与吾同志者即是父母。”又说：“其（亦指冯、蒋）处分人地亩，无论田若干顷，园若干区，仅留一夫之耕，供八口之食，余田公诸私人，彼辈攫其半数。”他们（反赤派）这班大二三首领的宣传本领，可谓一个不如一个，反赤派中诸大知识者，何不为首领效效文字之劳，免得样样出丑！

原载《向导》第175期

署名：实

对于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希望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九日)

在辛亥革命军发难之日，国民党军队第二次占领辛亥革命发难地的武昌，同时在江西方面，也有击败孙传芳之可能，不久国民政府北伐军事或者能有一小结束。刚在此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广州召集全体中央委员和各省省党部代表的联席会议，这会议是有重要意义的。

以前有许多人看广东不过是一些乱党或者是一些赤化党在那里胡闹，好在远在化外的大岭以南，无关大局；现在却不然了，不但吴佩孚的势力被他打碎了，孙传芳若从九江败退，则福建、四川、云南都绝了北向之路，如此则国民政府已占有半个中国，他的战后设施，全中国人甚至于全世界人都不得不改变以前的态度加以注意了。

据我们所得的消息，此次国民党会议的重要议程是：(一)国民政府之组织及地点；(二)召集国民会议；(三)省政府之组织，省民县民会议，省与中央(政府)之关系；(四)省政府与省党部之关系；(五)新的政纲。

此次国民党会议提出这些问题来讨论，已经可以证明国民党有异常的进步。国民党前此两次全国大会，虽然议决了一些政治原则，此次的议程更具体化了。此次会议将如何决定这些具体问题，这是希望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反对国民党、国民政府的人们，都急欲知道的。

我们一向是希望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此时期中的希望更为迫切，因为现在是全国人开始认识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时期。

此次国民党会议议程中，最重要的还是第(五)议题“新的政纲”，因为第一次全国大会所决定的政纲还抽象一点，其性质似乎是党纲，现在应该根据前定的政纲，更具体的规定出来对于各方面目前的实施政策。例如，根据民族平等及经济发展的原则，决定关税政策和对那几国的外交态度，对于国内战争及和平与夫对于其他军队之态度，对于财政应如何将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中那些急需而且可能的办法决定实施，如何完成粤汉铁路及建筑海港以发展工商业，确定教育经费及优待小学教员的具体办法，这些都是此次新的政纲中所必须注意的。关于民众利益之保障，尤其是此次新的政纲之生命，第二次全国大会所决定的工人运动决议案、农民运动决议案和商民运动决议案中之具体办法各条，都应该尽量采入此新政纲；并且关于工人最低工资之利益，应该更具体的指明由政府和工会合组一委员会于一定期限内制定，关于工人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应该更具体的指明由国民政府通令所属各省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刑律第二百二十四条；关于农民政治的两项，应改为解散压迫农民之“军队及民团”，经济的甲项，应改为严禁对于农民之高利贷超过若干以上；关于商民应增加二项：一是以海陆军保护水陆商业、交通及禁止各铁路因军事阻碍商业运输，一是修正商会法，使各业真正商人无限期的都能参加商会组织，而不为少数洋行买办所把持。此次新政纲更应该珍重声明：国民政府的基础是建筑在民众势力之上，而非建筑在军事势力之上；因为这是中国由半封建的军事专政到革命的民主政治之唯一标识。

(二)(三)两议题，算是新的政纲问题；召集国民会议之地点与时间，这是一个事实问题；最重要的是计划如何即刻在各地发展国民会议的民众运动，免得将来成一空洞会议；其次便是决定国民会议之目的，应该是民众尽量发表怎样减轻十五年来痛苦，怎样改正关税制度，怎样解除筹还外债，以解除全民族的枷锁；至于全国政治组织和宪法问题，还不是军阀未完全倾覆以前第一次国民会

议所急需讨论的议题，所可决定的只是国民会议本身代替国会制度的问题；以省民会议代替省议会，县民会议代替县议会，也应该有同样的决定。省与中央政府之关系，应该根据第一次全国大会所决定的政纲对内政策第一条，中央政府和省政府之军政财政，都应该划分权限，不可采用割据的联省自治，也不可采用无限制的中央集权制。

全国人都开始重视国民党、国民政府了，此次国民党的中央会议应该产生一个适合目前中国初步改造所需要的政纲，而且马上就能够实施这一新政纲，使全国各阶级的民众都认识国民党、国民政府究竟是什么！

原载《向导》第176期

署名：独秀

北京黑化了!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九日)

据东方社七日北京电：“北京新设之禁烟所，现决定自本月起，征收印花税，规定每一两鸦片课印花税三角，每枝烟枪月课印花税十元，一面派出多数检查委员，在市上密查无许可证者，即课以一百倍之罚款；因此，至今日止，已经登记之鸦片窟共有四百余，烟枪八百余枝，现定鸦片市价，每一钱五角，每一两四元，皆公然招徕顾客矣。”当冯军在北京时，有人说北京赤化了；此时奉军在北京一面无形停闭了各国立大学，一面大开其烟禁，岂不是北京黑化了吗？赤化与黑化，有知识有思想的人们，现在当能抉择了罢！

原载《向导》第176期 署名：实

高叫拥护国旗的是些什么人？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九日)

中华民国果然由辛亥革命而成立了么？实质上当然没有这么一回事。自孙中山辞总统职一直到现在，只有中华袁国、中华段国、中华直奉国，而没有中华民国。既然还没有中华民国，那里还有什么中华民国国旗？议决什么中华民国国旗的什么国会，自从附和袁世凯定都北京一直到贿选，只是北洋军阀的御用机关，那里是什么中华民国国会？因此盲目的拥护什么中华民国国旗，而忘记了中华民国，已经是买椟还珠；而高叫拥护国旗的人们，又是一班从前拥护龙旗的保皇党后身研究系和孙传芳国都里的几个顺民，怎不令人齿冷！

原载《向导》第176期 署名：实

避开革命的新方法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九日)

《时事新报》上张永淇先生论中国人口问题,说人口过多是“盗贼繁多内乱频仍之根本原因”。这种见解乃似是而实非。中国的经济命脉倘不操诸外国帝国主义之手,内部倘没有军阀扰乱摧残农、工、商业,以中国的土地产业养中国人,一时那里会有什么人口问题?因此,我们应该知道,中国人口问题,不是什么人口过多,乃是人口和生产力不相称;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下之中国,生产力实无由发展,所以中国盗贼繁多内乱频仍之根本原因,乃是军阀扰乱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不是人口过多。欲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道路;然而一班愚懦的人总想避开这道路,主张什么不合作主义,什么教育救国,什么重农救国,什么道德救国,什么基督教救国等等;现在又有人想出什么解决人口的法子来了,这班先生们想避开革命的方法真多哩!

原载《向导》第176期

署名:实

丁文江与爱国行动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九日)

以丁文江博士统治之理想的大上海，竟因为讨论万县惨案逮捕各团体代表、封闭学生总会，还行文来法租界拿人！丁博士的代表詹科长对学生会代表说：“此次被捕代表，实系纯粹爱国行动，惟值兹地方多事之秋，自当特别从轻办理。”然而警察厅厅长却对商人表示对被捕各代表，他本愿意轻办，只以丁总办主张严办，故一时未便释放。哈哈！好一个鼎鼎大名的丁博士，对外人则主张“友谊的磋商”，对爱国行动则主张“严办”！“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呜呼博士做官！

原载《向导》第176期

署名：实

国家主义者曾琦与万县惨案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九日)

对于万县惨案，有些军阀都表示愤恨，独有所谓国家主义者置之不闻不问。上海学生会邀请国家主义者大首领曾琦，参加各团体讨论万县惨案会议，曾琦回答道：“这是共产党的运动，我们不参加。”因此，上海四川同乡会大不满意，宣布削除曾琦的四川省籍。大概这位曾琦先生是主张国家主义而反对乡土主义吧！

原载《向导》第176期

署名：实

那里有中华民国？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九日）

张一磨说现在国民党革命北伐是革民国之命，试问现在是不是民国？本来自袁世凯以来，中华民国这块招牌，已被北洋军阀负之而趋，现在国民党起兵讨伐这班北洋军阀，所以袁世凯的幕客张一磨便大呼是革民国之命，所以北洋派的忠臣研究系也站起来大呼拥护北洋派的国旗。孙传芳复孙洪伊的信也说：“民国既已告成，已无再谈革命之理。”那里有民国？北洋军阀就是民国。孙传芳也是北洋军阀之一，他当然要反革命。我想张一磨还可以将孙传芳解释说：你们革我北洋派之命，就是革民国之命。

原载《向导》第176期

署名：实

对于国民军再起的希望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

“冯玉祥回国，国民军再起。”只要不是希望吴佩孚、张作霖长久统治中国的人，都应该表同情于这件事。因为这件事至少可以使张作霖不能够专力对付南方的北伐军。

研究系一派人，他们虽然现在还不曾公然逢迎张作霖，他们传统的思想，总以为中国应该永远归北洋派统治，由袁而段而徐而曹、吴，他们都继续拥戴，曹、吴败了，他们便来拥戴孙传芳，孙传芳若再失败，不知他们将于北洋派中拥出谁来？或者也只得去就合张作霖。冯玉祥虽然也是北洋派中分裂出来的，可是他忽然亲近了孙中山，并且亲近了苏俄，北洋派的忠臣研究系，当然要咒骂冯玉祥。

不懂得军阀定义的人们(如国家主义派)，竟把冯玉祥、蒋介石看做和张作霖、吴佩孚同样是军阀，象这样故意混乱是非，真是暗中帮助了张作霖、吴佩孚。

军阀们大喊冯玉祥倒戈是破坏道德信义；有些无聊的小新闻记者，也附和军阀，以倒戈团团团长、倒戈学校校长嘲笑冯玉祥。其实，民国倒戈之作俑者是段祺瑞等向清室倒戈和吴佩孚向段祺瑞倒戈，冯玉祥算不得是倒戈团团团长或倒戈学校校长；并且这几次倒戈只是破坏了封建社会的道德信义，在民主政治之过程上都有很大的意义。胡适之说：“冯玉祥之对曹、吴倒戈，放开眼界通观前后二十年全部历史，是很有价值的一件事。”此见实不同凡俗。

京津一带商民对冯军是怎样感想呢？有一部分接近奉、直军阀的商人说：冯军是有纪律不扰害人民，只可惜要共产公妻不好。

一般商民并未看见共产公妻的事实，他们只看见赤军不曾扰民而反赤军却是烧杀淫掳这些事实，遂不禁发生希望赤军再来的心理。本年七月四日上海《申报》所载北京归客谈，有一段话可以代表当时人民对于赤军与反赤之感想，兹照录于左：

“试从西直门至清华学校，吾人常往来之路，举目四顾，只见有兵，不见一老百姓，自校入城，在西四牌楼以西，尚无开门之店铺，其在前门一带，则十家内至少有七家停市闭门。初时瑞蚨祥等，恃与八太爷多为乡亲，开门敷衍，数日而后，亦停市矣。凡绸缎店、金银店、粮食店，以及出售贵重品日用品者，莫不首先停市。一日余往前门买夏布，店夥答称对不住，铁路不通，来货没有，请改日光顾。余初信之，余妻住京久，恃与熟识，明日往买，则慨然出售，诘之，则称实不相瞒，八太爷手持军用票，决不敢请教也。八太爷程度日高，往往另串一人入店，选货既毕，则八太爷昂然直入，非纳军用票不可；有时串得一大家装束之妇女入店，必以为与八太爷无关系矣，选货既毕，而八太爷忽入，诈为护兵，口称：太太，货选好没有，强纳军用票于柜，挟此大家妇女，携货以去。又有一次，确是一大家妇女，选货既毕，出现金，将交柜，一八太爷直入，谓此间无须现金，吾代汝纳军用票足矣，即取该妇手中现金，昂然遂去，如此行径，店铺非不欲营业，实觉少做一笔生意，少蚀一笔本钱。

军用票有数量之限制乎？曰无有也。苟有限制，商会等机关尚可为之设法，今则无底之橐，谁肯填之？初时尚有电车、电话、电灯等公共机关可以使用，今则肯收者日少，尤可恨者，崇文门税关，明为搭用，实则提高税率，使等于军用票短折之数，如军用票对折，则税率提高一倍，诘以何以与天津税单定额不同，则称吾那里管得。过天津，则租界以外商民之苦痛，一如北京，更强向屋户或铺户，加征房捐三个月，不足更加收房租两个月，其系自有之屋，则为之估价，令人痛恨上海何丰林之作俑于前，遂成军阀搜括民财之惯例也。纳房租房捐于

官，却不许还搭军用票，某商人语余，简直是要我们性命。京、津老百姓，莫不想念国民第一军之纪律，虽在退兵时，从未强索一钱，掠取一物，以为其领袖人物如何，又当别论，若其兵士，真当起爱民不扰民数字，甚至谓如此好兵，若竟不能生活，未免无天道矣。”

现在有纪律的好兵又起来了，京、津老百姓当然要欢迎；可是研究系一班人听见冯玉祥回来，并且回来还是要反抗张、吴而革命，他们便大叫冯玉祥抗张、吴，是苏俄乱华计划。到底是有纪律的好兵乱华，还是反赤的奉、直军乱华，老百姓只看事实，不会把白党（奉直军阀、研究系、国家主义者及章炳麟等）的宣传看得比事实更为可靠吧！山东的农民本来不知道中国有共产党，更还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可是张宗昌反对共产党的告示贴遍了山东全省各乡村，农民见了窃窃私议道：张宗昌这样深恨共产党，想是共产党反对张宗昌，看来这个党或许不错。现在研究系大声疾呼冯玉祥抗张、吴是苏俄乱华计划；老百姓也许因此更觉得冯玉祥和苏俄都不错，因为老百姓目前切身感觉得乱华的人正是张、吴，不是别人。

奉、直两系军阀之为害中国，无人能够否认；不用武力而可以打倒他们，非童昏当不至作此奇想。将用武力打倒奉、直军阀之国民政府及国民军，是否也和军阀一样呢？不独工人、农民、学生相信他们是革命的；即一般稍稍进步的商人，现在也知道国民政府和国民军比奉、直军阀好，暗中盼望他们得到胜利；连研究系、国家主义者及章炳麟等白党的肚子里，又何尝不晓得国民政府和国民军好过奉、直军阀，不过在他们的利害和感情上，不愿意这样说罢了。

现在不独国民政府的势力达到了长江，冯玉祥回国，国民军再起，陕、甘、绥、晋渐渐归入国民军掌握，由包头到广州新的革命势力和由满洲里到福州旧的军阀势力，已成对抗之局，人民对此对抗之局应该有个选择了，似乎很难中立。站在军阀那边的人们，称国民政府和国民军为乱党为赤化党为赤贼，只好听他们自便；若是有人满肚皮不愿意站在军阀那边，同时又满肚皮对国民政府和国民

军怀疑,试问他们有什么别的出路?不但站在军阀那边的白党若研究系、国家主义者及章炳麟等,显然是反革命,那对军阀与革命间取了中立态度的人,实际上减少了革命的力量,也算是帮助了军阀。所以现在人民单是消极的不反对国民政府和国民军还是不够,应该起来帮助他们的军队进攻。因为在事实上已证明了国民政府和国民军的确是推翻军阀的尖兵。

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人民所得自由,比在奉、直军阀统治下的人民如何,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不消说得。冯军的纪律比奉、直军如何,不但京、津老百姓知道,即张作霖也知道,并且他自己也承认过;冯玉祥此次回国,在他固有的治军谨严治己勤俭外,更鲜明了他的政治态度,确定了他的革命方针,在他的回国宣言上(宣言附录于后),都明明白白的告诉了国人。我敢说这个宣言是中国革命史上重要的文件之一,由这个宣言所产生结果,将来必非常之大。我还敢说:今日的冯玉祥,我们不能当做从前的冯玉祥看待了!

我们肯定了“冯玉祥回国,国民军再起”,在中国革命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固然应该说明这个意义,我们更应该对冯君及全体国民军表示几件具体的希望:

第一,国民一军“有纪律不扰民”的荣誉,应该极力保存勿失,并须将他荣誉普及到二三五军去,尤其是二军更需要。

第二,一二三五各军都要统一在冯总司令统率之下,对内整理,对外作战,万不可妄想各自树立单独行动,致分裂革命势力,尤其不利于作战,国民二军在河南失败便是前车。

第三,国民军并不是简单的军事势力,乃是一种政治势力,他的势力应该很深固的建设在民众势力之上,尤其是农民。应该由国民军兵士的群众中,叫出“军人和农民合作”的口号;国民军所到的地方,都应该帮助农民(佃农与自耕农)反抗地主过分的剥削,反抗土豪、劣绅、讼棍的鱼肉,剿办扰害农民的土匪,严惩贪官污吏更不待言;应该唤起农民对国民军的同情心,由农民自动的供给国民军

以食粮,不应该以赋税的形式强迫农民增加负担;应该尽力帮助农民的组织、教育与武装;应该使农民群众成为国民军的后备军,同时国民军也就是保卫农民利益的军队。

第四,国民军暂时不必急于向外发展,首在要整理内部,充实其战斗力,使奉张不敢轻于尝试。军中下层的政治训练尤其重要,不仅要使每个将领每个兵士都能够打战,更要使每个将领每个兵士都懂得为什么打战。总司令一个人决定要革命是不够的,必须在下层的政治训练工作上充分努力,使每个将领每个兵士都认识自己是一个革命党,都有为民族自由而战不得不牺牲自己的自由与生命之决心。

第五,对于蒙、回少数民族,应该尊重政治上经济上的生存权利,以引导他们参加全国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争斗,至少也要使他们不妨害此争斗。我们不可一面反抗国外的帝国主义者,一面对国内的少数民族,自己也成了帝国主义者。

第六,尽可能的(只要不损失主权,虽借用外债亦可)完成陇海路,在商业上文化上,都非常必要。

原载《向导》第177期

署名:独秀

军阀口中的赤化与苏俄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

反赤派四首领李生春(福建后方司令)发取缔赤化布告说：“所最堪痛恨者，现有一般无知青年，每易为奸人所利诱，误入赤党，借共产公妻之名义，妄思捣乱；殊不知谁无身家，谁无妻子，焉有与人公共之理，故一经发觉有赤化嫌疑者，即为国人所共弃，身死极刑，愚孰甚焉。且苏俄实行赤化，时未数年，几致国破人亡，其由饥饿而死者，竟达全国五分之二，前车可鉴，至可危惧。”军阀眼中口中的赤化与苏俄，无一不是这样。然而胡适之先生偏要十分顶礼佩服苏俄，岂不犯了嫌疑吗？适之先生的一班友白仇赤朋友，应该快快电告适之，万万不可回国，免为国人所共弃身死极刑！

原载《向导》第177期

署名：实

到底是谁没收人民财产？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

在前清末年，山东全省岁入为一千一百二十余万两，民国八年度预算，只有一千万两有奇，张宗昌初到山东时，全省岁入为一千五百余万元，和民国八年差不多；张宗昌到山东不久，便增加到五千余万元，人民负担陡然加了两倍半。现在又要就丁漕两项征收什么“讨赤特捐”，总额一千六百十四万七千元，本年十月一日开始，至十二月廿八日截数，限各县于此三个月内缴齐，并须一律现洋，不知道山东农民怎样能够活命？同时饱受兵灾的直隶，也正在摊派善后公债一千万元。然而张宗昌、褚玉璞却天天在那里大叫反赤，大叫广东赤党没收人民财产！

原载《向导》第177期

署名：实

孙中山的北伐还是段祺瑞的北伐？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

张继曾问蒋介石：此次是国民党北伐还是共产党北伐？我们现在却要问：此次是孙中山的北伐还是段祺瑞的北伐？为什么发此奇问？因为段祺瑞针对孙中山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发的“外崇国信”这一口号，现在刘文岛也公然在北伐军中叫出来了！段祺瑞一叫“外崇国信”，把活的孙中山气死过去；刘文岛又叫“外崇国信”，或者可以把死的孙中山气活转来。现在可是要请问张人杰君：是否我们“糊涂闪烁加以投机权位之恶名”？

原载《向导》第177期 署名：实

以招商九轮报效孙传芳的是谁？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

招商局江永轮船，为孙传芳由南京运子弹到九江，突然炸裂，船身完全炸毁。该局董事会因此开会讨论，他们都以为现留九江供作孙传芳军运之轮，还有八艘，每艘代价平均在三四十万元，关系重大，决再电请放还，至江永轮之被毁损失在廿万元以上，届时亦须要求赔偿云。我要问问招商局董事们：你们向谁要求赔偿？孙传芳的子民傅筱庵，私以招商九轮报效孙传芳，招商局董事会，是否应该严惩这样私卖招商局的总办？

原载《向导》第177期 署名：实

原来抗张吴就是乱华！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

研究系的《时事新报》大声疾呼“三路用兵抗张、吴”，是“苏俄之乱华计划”，原来抗张、吴就是乱华吗？三路用兵是：西北军取京畿，粤军掳中部除吴，冯、粤抗张，试问痛恶奉直军阀专政的人们是不是希望能够这样？然而研究系以为这样抗张、吴就是乱华！

原载《向导》第177期

署名：实

爱国的顾内阁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

全国商民都希望把海关收入存放国内银行，而顾维钧竟把前存道胜的关款全数改存汇丰；全国人都承认中俄协定是于中国有利的，而顾内阁一班人献策奉张，要取消这个协定，以便拿俄庚款向英国押借巨债。顾内阁和英、美这样好，这样为张作霖筹军费，或者也是算爱国，因为中国是张、吴的国家，抗张、吴既是乱华，助张、吴自然是爱国了！

原载《向导》第177期

署名：实

十月革命与东方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我们要懂得十月革命的意义，不可忘记了当时的世界情况。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大战中，欧洲的帝国主义者，两方面都只以保卫祖国相号召，独有帝国主义的美国威尔逊举起“打倒德意志军国主义”、“民族自决”这两个旗帜出来号召，颇得了许多人的同情，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自由派和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派，都对威尔逊怀了多少幻想。这时只有无产阶级的首领俄国列宁，他看破了威尔逊的虚伪与无能，他坚决的主张非发起各国国内革命不能打倒军国主义，非推翻帝国主义不能实现民族自决。其结果威尔逊的巴黎和会，打倒了一个军国主义的德意志，救出了英、法、意、比等许多军国主义的国家，民族自决更成了一句废话；列宁的十月革命，却实实在在以无产阶级的国内革命，打倒了俄皇的和克伦斯基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政府，实现了芬兰、波兰及其他国内少数民族之民族自决——独立或自治。这种历史的事实，曾经明白的告诉了我们列宁和威尔逊之不同，列宁的见解正确而伟大和十月革命之世界的意义，都已经不是还有讨论余地的理想了。

从十月革命到现在，已经有整整的九年，在这九年中，苏俄仍旧是继续列宁的十月革命工作，援助全世界的民族解放，推翻全世界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

欧美资本帝国主义者，知道十月革命之世界意义对于他们的危险，始而武力对付，继而用经济封锁政策，这两样都不曾收效，现在遂改用吊膀子政策，甜言蜜语劝苏俄“回到西方”。

“回到西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抛弃十月革命之世界的意

义,换句话说也就是停止援助东方民族革命运动,回向欧美各资本主义的国家妥协合作。苏俄内部,近来有一小部分右派分子也主张回到西方,他们以为东方民族中,如中国人并不大感觉得帝国主义宰制之痛苦,反以苏俄援助他们革命为多事,有野心,在另一方面,苏俄却以援助东方民族革命运动结怨于列强,为苏俄自身利益计,应该改变以前政策,停止援助东方民族运动,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妥协,以便从这些国家中得到苏俄经济发展之物质的援助。苏俄中大多数左派分子却不赞成右派这种意见,以为是违背了列宁的十月革命之世界意义。

当真中国人都不大感觉得帝国主义宰制之痛苦吗?苏俄中右派分子的意见是不对的。中国的革命派不用说,就是一般商人,近来也都感觉得帝国主义宰制之痛苦。并且已经起来做反抗帝国主义之行动,如反抗棉花出口,反抗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纸烟捐和商标,主张关税自主,主张修改不平等条约,主张废止领事裁判权,主张收回会审公堂与租界等,已成了全国商人普遍的运动,而却未曾有一次真正商人反对苏俄,因为在他们的经济生活发展上,天天都感觉到帝国主义者当面的压迫,而不曾感觉受苏俄压迫的事实,真正商人不同流氓政客,因此他们不能无病而呻。中国人中反对苏俄而不反对帝国主义的人,不是占全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商人、工人、农民,而是一小部分军阀和无职业的流氓政客如左表:

(一)军阀;

(二)军阀的走狗(如交通系、安福系、研究系、联治派、复辟派、国家主义派及国民党右派冯自由、章炳麟、徐绍桢、黄大伟等);

(三)帝国主义的走狗(如洋行买办、耶教徒及国民党右派马素、童理璋等)。

这三种反革命派确是不感觉帝国主义宰制之痛苦,反大叫苏俄援助中国民族革命有野心。然而他们却不能代表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见。他们以为帝国主义与军阀非中国之患,中国大患只

是苏俄所援助的国民革命；他们希望力量还弱的国民革命军得不着国内国外任何援助，好让帝国主义所援助的奉、直军快快打平。他们都立脚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利益上面，他们反对苏俄援助中国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国民革命军，这也是当然的事。

还有一班人，他们都非立脚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利益上面，也并不反对苏俄，而他们以为我们应该用自己的力量来革命，不一定要依赖苏俄的援助。革命应该用自己的力量，不一定要依赖外援，这个意见并不错，并且我们应该尽可能的这样做，这是毫无疑义的事。不过若因有苏俄援助可以增加我们革命发展之速度，似乎也没有理由应该拒绝，更无理由因此而反对苏俄。

反对苏俄的人，硬说苏俄援助中国革命是有他的野心，而非善意的援助。说这样话的人，他完全不懂十月革命之世界的意义。试问苏俄因援助中国国民革命军曾经得到些什么没有？苏俄援助中国，若是由于他的野心而不是立脚在十月革命之世界的意义上面，他尽可继续旧俄政策，援助奉天或直系以达到他的野心，又何必援助中国的国民革命呢？国民革命的势力得胜，能容忍任何国家的侵略野心吗？奉张对俄大使说：“奉、俄近邻，你们为什么不帮助我而帮助很远的广东？”吴佩孚对俄领事说：“我为中俄协定很尽力，我是中国最有权力的人，你们应该来帮助我，派些顾问到国民军那里有什么用？”奉、直军阀并不是不要苏俄帮助，正因为得不着苏俄的帮助才反赤。苏俄为什么不帮助奉、直军阀而帮助国民革命军，这便可以充分证明苏俄是立脚在十月革命之世界的意义上援助中国，而非由于侵略野心。

苏俄十月革命之世界的意义，关系东方被压迫的民族革命运动，非常重大，可是欧美的资本帝国主义者力劝苏俄回到西方，恰好中国的反革命派也拒绝他来到东方，东方的革命派应该起来怎样对付这个问题呢？

原载《向导》第178期

署名：独秀

研究系官运不亨通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研究系的前身保皇党，刚刚跪求满清做点立宪运动，却被民党的辛亥革命打翻了；刚刚拍上了袁世凯，组织了什么第一流内阁，却又被北洋派嫡系赶走了；刚刚拍上了段祺瑞，攫得财政、司法几个总长地位，又被民党的护法运动打掉了；刚刚拍上了曹、吴，又被冯玉祥反戈拆散了；最近刚刚拍上了孙传芳，又被北伐军打来，不独蒋方震的江西督办落了空，就是丁文江的淞沪总办也有点靠不住。可怜的研究系，怎么这样官运不亨通！

原载《向导》第178期 署名：实

国家主义派有了极阔的首领！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国家主义者自夸道：“国人对于国家主义的信用，也一天增加一天了。”又道：“国家主义潜伏在国人心田中的势力，已到了奔腾澎湃莫之能御的时候。”不错，国家主义的信用和势力已经了不得，而且已经有了一个极阔的首领，不是最近前国务总理大人靳云鹗大鼓吹其国家主义吗？或者张雨帅、吴玉帅也会加入国家主义派，因为他们都是反赤的同志。

原载《向导》第178期 署名：实

国家主义者对国民党党旗及北伐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国家主义派,不敢反对国民党,只好说共产党假冒国民党;可是他们所攻击的青天白日旗,总不是共产党假冒的吧?国家主义派说:“自蒋介石北伐以来,全国言论界大都为他一时的胜利所惑,莫敢为斩钉削铁的批评,独有我们国家主义者抱定信念,认清真理,尽量的揭发蒋介石亲俄的自误误国(帝国主义及军阀当多谢国家主义者!)及其所以不能成功的理由,现在事实渐渐证明国家主义者言论是真理,不是客气,是千真万确,不是神经过敏了。”不错,孙传芳又已经到了南京,国家主义者所谓北伐军不能成功,总算千真万确了!国家主义者大喊其他他们是国民党的友人,共产党是国民党的致命敌人;只可惜他们不应该攻击他们友人的青天白日党旗!

原载《向导》第178期

署名:实

又是一个为孙传芳保江山者！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孙传芳率兵讨赤之初，置人民和平的呼吁于不闻，到了赣战不利，才串出蒋尊簋、张一麐等出来奔走和平，做他的免战盾牌。现在孙传芳由九江败退到南京，不但怕北伐军东下，并且怕奉鲁军南下，更用得着和平做盾牌了。于是什么皖、苏、浙三省联合会乃应运而生。该联合会表面上是说三省人民自治，实际是重在三省军事当局停止战争，由人民代表和粤、奉、鲁接洽和平，这本是孙传芳所求之不得的。这种仍旧拥戴三省军事当局的自治运动，与其说是三省自治运动，不如说是为孙传芳保江山的运动！这班人民代表若当真去广州为孙传芳接洽和平，国民政府或者要问问他们：三省人民自治诚然很好，但是你们所拥戴的三省军事当局是谁？

原载《向导》第178期

署名：实

革命与武力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反对“革命要有武力”，这种人不是糊涂蛋便是反革命者。任何国家任何性质的革命，都非有武力不成；因为被革命的统治阶级都有强大的武力，革命的被统治阶级如果没有武力，当然不会成功。

尤其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众的势力还未充分组织起来，需要军事行动更多一点；并且很难从军阀的武力时代马上跳到民众的武力时代，中间会要经过武力与民众合作时代。这不是偶然的事，也不是那个愿意这样办，这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阶级高压政策特别严重，革命的民众不容易得着武装；在另一方面，殖民地尤其是半殖民地，民众的革命运动潮流高涨到相当程度，国中军事领袖当中，有些和当时的统治阶级利害不一致的部分，在民众革命运动的高潮中，便会走向民众方面，与民众合作。现在的中国就是这样。具体说起来，南方的北伐军和北方的国民军，都确已走上了武力与民众合作的道路。

可是在现时武力与民众合作之中途，我们还未可过于乐观，而忽视了可能的危险。危险是什么呢？就是现时所有与民众合作的武力，都能够合作到底，并且还能够进一步变成民众的武力；或者是合作不能到底，有些仍旧要站到反民众利益的阶级（军阀、买办、地主、士绅）那边去。

要免除这个危险，民众和革命旗帜下的军人，两方面都要注意。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民众运动发展之速度，远不及军事的发展；这种状况若继续下去，很容易使军事势力右倾，甚至于离

开民众，形成新的军事独裁政治，这是民众方面所应深刻注意的事！

在军人方面，单是口头上说自己是革命的，即或志愿上自己的确是要革命，这样都还是不够；真正革命的军人，必须有两个条件：（一）须懂得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中，革命的军人和反革命的军人在实质上究竟是怎样的不同？（二）须能够服从民众的和党的制裁。

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是怎样呢？一方是被剥削压迫阶级的民众——工人、农民、商人等要求民主政治；一方是剥削压迫阶级的帝国主义者、军阀、买办、地主、士绅等，要维持封建的军事独裁政治；代表后一阶级利益的军事势力当然是反革命派，革命的军人应该站在前一阶级利益上面。帝国主义者利用军阀、买办掌管中国城市政权，做他们剥削压迫中国民众的工具，复利用买办勾结乡村的士绅、地主掠夺中国的矿山，吸收中国的贱价原料，军阀利用买办（商会领袖及银行家）在城市剥削工人、商人，利用地主、士绅在乡村剥削农民，以供给他们的军饷；因此，可以说军阀、买办、地主、士绅，同样是帝国主义者剥削压迫中国民众的三个工具。革命旗帜下的军人，若只知道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在实际行动上，不能力助工人、商人反抗大商买办之剥削与垄断，不能力助农民反抗地主、士绅之剥削与乡村政权，则不但依然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而且保护了军阀势力在城市和乡村的基础，这样如何算得是革命的军人？这样如何算得是武力与民众合作？

每个有兵权在手里的人，若不能够受民众的或党的任何制裁，都有变成军阀和形成军事独裁政治之可能，此吴稚晖先生所以有“有军必阀”之叹。我们或者可以承认现时方与民众合作的军事势力，即不幸也形成军事独裁的局面，他们的军事独裁比北洋军阀的军事独裁总要开明一点。可是这种较开明的军事独裁，至多只能造成统一的中国，决不能造成民主的中国。并且在任何军事独裁的局面之下，都有培养贪官污吏之必然性；这是因为军事独裁局面之军

事首领，不受民众或党的任何制裁，拥有无上威权，因此以“反对派”三字杜绝一切闻过之路，于是左右一班宵小与夫乡党故旧得乘机以小人爱捧此军事首领，只需蒙蔽此首领一人之耳目，便不妨放胆的贪赃枉法，无所忌憚，非至激成众怒危害此首领不止。在这样贪官污吏横行无忌和民怨沸腾的局面之下，还说得上什么民主，什么革命！然而不受民众的或党的制裁之军事独裁，其结果必至如此，这是无可避免的公例！

我们还记得辛亥革命时，有“军人出头”的呼声，并且把军字写作“鞞”，许多官厅公文中都是如此，其结果怎样呢？我们又记得国民党在广东驱逐陆荣廷、莫荣新的势力后，洪兆麟在陈炯明宴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席上，乘醉伏在桌旁东倒西歪的说：“广东是老子打来的！广东是老子打来的！”其结果又是怎样呢？现在我们虽然未曾听见“湖南是老子打来的，湖北是老子打来的，江西是老子打来的”，这等怪话，却有了“军人革命论”这样的不祥之声！并且有些青年军人时常拿武力万能的观念，干涉一切社会事件，虽然是善意的。这样不祥之声，这种武力万能的观念，都足以促成军事独裁的局面之开展。

真正有觉悟的革命军人，如果想想军事独裁对于民主革命的危险，如果愿意考查已否因此使革命根据地贪官污吏化，便应该放弃军事独裁的野心，诚意的与民众合作，尊重民众的意见而受其制裁；至少也要受党的制裁，以免流为个人的军事独裁。每个革命党的军人，都不可单看自己是一个军人，必须看自己是一个有武装的党人，虽统率十万大军的总司令也应该如此。每个革命党的军人，都应该尊重党的威权在军队的威权之上。如果主张“以党治国”，便不应该主张“以军治党”；因为以军治党，则以党治国便毫无意义，不如直接老实主张“以军治国”了。我们反对以军治党，并不是说军人党员不能过问党事，也不是说军人党员不能同时主持党事，乃是说每个军人党员乃至军事首领，都应尊重党的集体意见，服从党的集体制裁，如果挟军事势力，使党的集体意见以军事首领的意见为

从速，使党的一切决定都要仰军事首领的鼻息，使党众的意见不敢和军事首领的意见不同，使军事首领即党之化身，使党内党外群众都只知有军事首领而不知有党，则这样的—一个党，便等于聋子的耳朵，瞎子的眼镜，则所谓党的威权，党的决定，党的制裁，党的命令，都由“强奸党意”而来，等于无物。这样没有党的制裁之军事势力，要想免于军事独裁的危险，那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的结论是：革命是不能没有武力的；可是革命的武力至少必须与民众合作，必须受民众的和党的制裁，才能够免除形成军事独裁走到反民众利益那边去的危险。

原载《向导》第179期

署名：独秀

到底是谁强夺他人的财产 妻女为已有？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共产党是主张生产工具(如土地、机器、铁路、矿山等)归社会公有,而不是要强夺他人财产为已有。共产党是主张婚姻自由,而不是要强夺他人妻女为已有。反赤派所指斥的共产公妻,正是强夺他人的财产妻女为已有之意;这样的共产公妻,张宗昌、张学良都已经在京、津、山东实行,如此反赤,正是反对他们自己呵!

原载《向导》第179期 署名:实

自治呢还是由军阀保境安民？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什么苏民自治协进会,通电要求苏孙本保境安民之初衷,勿以苏省卷入战事漩涡。我们对于这班号召自治的糊涂虫,有三个疑问:第一,向苏孙要求他保境安民,这是什么自治?第二,孙传芳拿苏省的钱,派苏省的兵,和北伐军打得不亦乐乎,何以到现在才想起来勿以苏省卷入战事漩涡?第三,孙传芳去了,张宗昌就要来,你们热心自治的先生们,是否再来电求苏张保境安民呢?

原载《向导》第179期 署名:实

丁文江竟比军警还要反动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前此主张严办为万县案运动的青年的，是丁文江；现在戒严司令部枪毙陶鑫元(即陶静轩)的，也是丁文江，最近向法捕房要求逮捕钮永建的，又是丁文江；甚至于严春阳示意工会，快快将关在法界捕房的海员保出，否则丁文江要求引渡去，必然枪毙。好一个博士做官的丁文江，好一个试验大上海自治的丁文江，他的反动行为竟在军警之上！

原载《向导》第179期 署名：实

国家主义者眼中的赤化！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国家主义派拿“满地红表示赤化”为反对青天白日旗的理由之一。哈哈！照他们这样见解，那么，五色旗的第一条便是红色，它不也有赤化嫌疑吗？并且马路工程上大插其小红旗，各国的国旗商旗上，很少没有红色；许多纸烟火柴盒子，都是满地红；婚姻喜事，更是大用红纸帖子，大穿其红色衣裙；难道都是表示赤化吗？若这样杜绝赤化，连药书上的红花、橘红和词典上的赤胆、赤心、红梅、红日都应在删去之例了！如此看来，所谓国家主义派，竟是一班无知识的小孩子。

原载《向导》第179期 署名：实

国家主义派眼中的爱国军队 及其五色旗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国家主义派近来在各处尤其在日本，大反对其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大拥护其五色旗，说五色旗是国旗。可是他们(武昌的国家主义派)曾派人到岳州的吴大帅的军队宣传，恭维他们是爱国的军队，并且说“凡反赤的军队都是爱国的军队。”他们的机关报说：“鄂人对于北方军阀大兴其去后之思，而对党军反有愿与汝借亡之意。”他们称三民主义为“残民主义”，他们称国民政府为“所谓国民政府”，他们公然大叫“反对擅改国旗的国民党”(以上均见最近《醒狮》周报第一一一一期)！国家主义派这样的恭维北洋军阀，这样的反对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难怪他们要拚命拥护北洋军阀的五色旗而反对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

原载《向导》第179期

署名：实

青天白日旗是共产党的吗？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国家主义者说：“主张用青天白日旗者，不问可知为共产党人。”又说：“共产党人欲实现其一党专制之目的，绝不顾民意之赞同与否，擅自用彼一党制定之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又说：“使共产党人而有理性，自当服从多数爱国青年主张，放弃其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之谬见，而同立于五色国旗之下。”我们的回答是：国家主义者若尚有丝毫理性，总不应该闭着眼睛否认青天白日旗是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前就制定的这一个事实（即曾琦自己也说：“同盟会初成立时，孙中山主用青天白日旗。”），而硬把这面旗擅自送给共产党；更不应该诬称多数爱国青年都反对青天白日旗；似乎也不应该劝我们和他们同立在北洋军阀的五色旗之下！

原载《向导》第179期

署名：实

孙传芳败后之东南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

孙传芳败后，东南三省最重要的现象使我们注意的，乃是上海市以至苏、浙、皖三省的自治运动。

此种自治运动，首先发生于上海市，远在齐卢战争以后，由上海市自治运动，扩大到环太湖区域。闸北自治运动和孙传芳争持最烈，其初发动于闸北自治公所几个董事，渐渐扩大到环上海市所有大小城镇的绅商团体；然而一时轰轰烈烈的自治运动，终于被孙传芳用租界帝国主义的援助和丁文江博士大上海的欺骗政策压服下去，上海市终于被孙传芳统治了（丁文江不过是个工具）。孙传芳在江西战争不利，上海市自治运动又重新起来，十月二十三夜的暴动，虽然被孙传芳的铁血政策镇压下去，而暴动中所喊出的“市政归诸市民”这一口号，却并未曾镇压下去，反而日渐流行高涨起来，除傅筱庵等买办分子外，工人、学生、商人都集合在此口号之下。十一月五日九江陷落，孙传芳溃退到南京，上海商总联合会发表宣言，主张拒绝奉鲁南下，划上海为特别市，市政归诸市民，永不驻兵，全市工、商、学各团体群起响应；并由上海自治运动，扩大到苏、浙、皖三省自治运动，在上海产生了一个苏、浙、皖三省联合会。

这个联合会产生之初，其中有些反动的官僚分子，企图利用这个三省联合会，以自治的名义拒绝北伐军及奉鲁军入境，实际上是为孙传芳保全三省地盘，以便他们得以参加政权。嗣因会中急进分子反对，乃改变参加政治之表示为管理政治、军事之表示；迨十七日孙传芳北遁，张宗昌实行动员南下，三省联合会乃表示其脱离孙传芳拒绝鲁军南下之主张。孙传芳、张宗昌严拿反对直鲁联军

南下的董康，江苏绅士乃表示宁欢迎赤化而不欢迎绿化（因奉张、鲁张均出身绿林）；张宗昌准备带军用票一千万元南下，苏、皖商民闻之失色相告。现在苏、浙、皖三省的自治运动，已渐渐和奉、直军阀在东南之统治权短兵相接了。

奉系军阀之内部，奉与鲁有竞争，奉之中新派（张学良、杨宇霆）与旧派（吴俊升、王永江）又有竞争，又加以日本帝国主义者力阻其向南发展，国民军之再起，晋阎之中主，更足以使奉张的军事计划，对西北更急于对南方；并且对南向河南则先与吴佩孚战，向苏、皖则先与孙传芳残部战，在军事上在政治上都于彼不利。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奉鲁军南下讨赤，乃由于英帝国主义者之怂恿与张宗昌之野心（张宗昌想做直、鲁、豫、苏、皖五省联军总司令），奉张在实际利害关系上未必如此。在这样情形之下，孙传芳也许有回到南京之可能（本报付印时，孙传芳回到南京了）。孙传芳如果回到南京，至少必让津浦南段于鲁张以结后援，固然不能完成其保全三省地盘之初梦，然他还有二万（孟昭月旅、冯绍闵旅、李宝章旅、王雅之团及卢香亭、彭德铨残部）可用之兵，以之继续对北伐军作战固不足，以之镇守江苏则有余，浙、皖二陈战斗力并未损失，孙如能占住南京，彼等势必联孙以自保，北伐军如不取浙、皖，则孙传芳尚有赫然自称苏、浙、皖三省联军总司令之余地。因此，三省自治运动，目前尚未至如何拒绝直鲁联军，而是如何对付这个僵尸的孙总司令及其走狗丁文江、陈陶遗等。去了孙传芳，还要拒绝奉鲁军，苏浙皖三省联合会若不于开会通电之外，有更大的努力更大的牺牲，此次自治运动之成败正自难言。

然而东南三省，尤其是上海市的自治运动，无论其目前能否成功，无论其急进或是缓进，必有一个长期的争斗，只要有争斗，他的性质，他的价值，在中国民主运动史上是我们不应轻轻看过的一件事。

依我们现在的经验，中国民主运动，有三种形式的可能：一是革命的军事行动，由辛亥革命到此次北伐，属于此种形式；二是资

产阶级的自治运动，此次上海及东南三省自治运动，即属此种形式，三是农民推翻乡绅政权的暴动，此种运动才开始，将来或者是中国民主运动最后的最高的形式。这三种形式不同的运动，都有一共同性质，即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或者有神经过敏的人，以为农民暴动是无产阶级的共产运动，这是一个非常的错误。现时中国还没有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制的农业，因此佃农、地主间的土地关系，和地主对于佃农剥削方法，还是半封建制度，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即工银制度；农民运动的成分主要的是佃农与自耕农等小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所以现时中国农民在乡村推翻地主乡绅政权的自治运动，和商人在城市推翻军阀官僚政权的自治运动，同样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运动，同样是资产阶级推翻半封建势力的运动，决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共产运动，虽然城市自治运动中有工人参加，乡村自治运动中有雇农参加。

此次上海及东南三省的自治运动，很明显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运动，他比湘、鄂、闽、赣的军事行动，革命性要少些，而民主性或者还要多些；因为他是由人民自己起来要求脱离军事统治而自治，比北伐军更有社会基础。东南各省尤其是上海市，是中国产业和文化最发达的地方，城市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从这些地方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事。

不过我们也不要忘记了一件事：中国的资产阶级犹甚幼稚，致军阀死命之金融权尚操在买办官僚之手而不在资产阶级之手，因此他们的民主运动，往往归于畏怯退缩。上海的运动，因有工人群众参加，比别处要急进一点。三省联合会中，夹杂着许多官僚政客，这是东南自治运动的一个内伤，因为他们很容易和军阀妥协；尤其是研究系、江苏省教育会和张君勱、张一馨、张孝若这班直系党羽，到了孙传芳当真不能在东南三省存在的时候，必然也要伸出尖头，戴上自治民主等面具，大摇大摆的走出来偷点什么去，尤其要藉此反对国民党。因此，东南自治运动要真能成为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不但须彻底力抗军阀，并且须谨防内部的扒手——反民

主的官僚政客、买办教棍等直系党羽！

原载《向导》第180期

署名：独秀

怪哉没有资本家不要资本主义的 资本制度社会！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

国家主义者说：“有许多造谣的人说，国家主义者是想和万恶的资本家妥协的。”又说：“我们无论从事实上或理论上研究起来，总觉得资本制度的社会，到底还胜过共产制度的社会。”又说：“再老实说几句话，资本主义和资本制度的社会，是不同的东西。资本主义我们固誓死反对，然而资本制度的社会，则我们实在仍主保留。”象我们这样无常识的人，真不能够懂得，什么是没有资本家不要资本主义的资本制度社会？所以说这样话的人自己也觉得“这几句话虽然不算得十分有理”。（见《醒狮》一一一期）

原载《向导》第180期

署名：实

各国承认国民政府问题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

国民政府与经纪政府

赤的政府与反赤政府

人民选择那一个？

自国民政府势力发展到长江以后，帝国主义的各国，遂不得不改变其以前武力的高压政策而为外交的和缓政策，以前是讨论如何用武力干涉中国的革命运动，现在是讨论在何时将怎样承认南方的革命政府即国民政府，他们的舆论固然有人大声疾呼的主张承认国民政府，即他们的外交当局也不能不把向来不置一顾的南方政府承认问题当做重要的问题来详加考虑了。

现在已经不是闭关时代，我们并不拒绝和任何国家通商往来，代表人民权力与利益的国民政府取得政权以后，当然还需要取得国际地位；因此，我们对于各国承认国民政府这一问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任何国家能够承认国民政府，我们都一律欢迎，当然没有拒绝帝国主义的国家之承认这种蠢思想。并且，我们是革命党，便应该爽直的说老实话：我们的敌人，虽然昨天还把刀放在我们的颈脖子上，他们如果今天放下刀来，拿笑脸或苦笑的脸同我们说和，我们仍然是欢迎的，就是报以不是致中国死命的让步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需要得到和平发展的机会。

不过我们对于各国承认国民政府这一问题，断然不可忘记了几个必要的原则：

(一)我们要决心由争斗得到各国承认，不可希望由妥协让步得到承认。

(二)我们要懂得各国承认只是获得政权的结果，万不可想靠各国承认来做获得政权的原因。

(三)我们固然希望国民政府获得国际地位，可是我们所希望的是获得独立的平等的国际地位，而不是获得和封建军阀政府同样的国际地位。

(四)我们要懂得人民承认国民政府比各国承认更为重要。

只有由争斗才能得到让步，决不会由让步得到让步，我们让步了，已经没有争斗了，敌人还为什么要让步？各国为什么要考虑承认仍旧是赤色的国民政府这一问题？是因为民众反英运动普遍了南方，国民政府的力量又到了长江。他们为什么还没有承认的决心呢？是因为北伐军还未到北京。这是“只有由争斗才能得到让步”一个注释。英国有好几个报都一致主张只有承认国民政府才能够和缓中英间的关系恶化，这是“只有由争斗才能得到让步”又一注释。若希望由妥协让步得到各国承认，不但毁坏了国民政府的政治生命，并且在事实上是一个幻想，因为帝国主义者不相信国民政府将来能够比张作霖更听话。

有些革命性薄弱的党人，还抱着谬误的传统思想，以为各国一承认南方的革命政府，北方的军阀政府便自然倒了，所以不妨停止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以取得他们的承认，以取得中国的统一政权。这种不靠自己争斗而依赖帝国主义的力量取得政权的下流思想，在事实上固然是一个幻想，即令不是幻想，能够由他们这样的下流思想而成为事实，则南方革命政府所获得的国际地位，和北方军阀政府的国际地位还有什么不同？曹錕以应允临城案要求换得他的贿选政府之承认，段祺瑞以宣言“外崇国信”（即遵守不平等条约之意）换得他的执政政府之承认，革命的国民政府又何能走这条路！因为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便不能收回税权、法权及撤退驻华海陆军，我们决不能拿这个致我们死命的让步，即出卖国家的让步，去换得国民政府之承认。幸而国民政府的领袖们并未预备走这条路。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席会议第

一次会议即决定对外方针，以不放弃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主张不损失国家独立平等地位为和蓝浦生谈判的原则（大意如此，惜议决案原文不在手边，未能具录。）；蒋总司令对外宣言及和西报记者谈话，也是继续反帝国主义的态度和坚持收回税权、法权，将继续革命的争斗，以期获得中国之独立的平等的国际地位。《申报》十二月二十二日北京电：“英方要人消息，……将关税附加二·五，所有原来本税仍交存外国银行，缴付中央，此二·五附税作为各省政费，俾南北两方无偏枯，此事闻由蓝浦生吐露于陈友仁之前；陈谓南方立脚点重在主权，不重利益，苟自定关税，即收入不到二·五，亦所欣慰。蓝氏以南方口号与维持条约权利之列国见解，无论如何似不能相容，故在汉未能得谈判结果。现在陈友仁正与佐分别（日本外务省条约局长）谈判中，预料南方决不肯抛弃关税、法权、废约等口号，故与日谈判亦必无结果等语。”

依据以上的事实，国民政府虽然被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称为赤色的政府，然而他的确是一个爱国政府，因为他不肯出卖国家换得各国承认。

我们再看反赤政府的对外态度是怎样呢？东方社十二月二十八日北京电：“张作霖拟令安国军吴外交处长向外交团表示左列各项意见：（一）组织巩固之政府；（二）外交取渐进主义；（三）遵守（不平等）条约规定之效力……；（四）承认对外债务；（五）反对赤化；（六）禁止反帝国主义运动及罢工宣传；（七）知赤化为全世界之公敌，请列国援助对赤之安国军。”张作霖这种对外露骨的表现，本是从石敬瑭、张邦昌、吴三桂一直到曹錕、段祺瑞这一系卖国贼卖国求援的传统政策，与其说他是军阀政府、安国政府或反赤政府，不如说他是“经纪政府”，他的任务是出卖国家于帝国主义者之经纪。

把两个政府比较一下，人民选择那一个？承认赤的国民政府呢，还是承认反赤的经纪政府？国民政府虽然是赤的，然而他不肯因为要取得各国承认而抛弃收回关税、法权和废约等口号而卖国；

经纪政府虽然是反赤的，然而他公然请求列国援助他的安国军，他遂不惜公然向东交民巷摇尾乞怜的包办保护不平等条约，包办禁止人民反帝国主义运动，这分明是卖国，绝对不是安国。人民选择那一个政府呢？

英日两帝国主义者此时对中国的政策，乃是日本人所谓“两刀政策”，即是一面和缓南方政府，一面援助北方军阀。他们这种两刀政策中所包含的南北分裂意义，我们当然要反对。可是他们这种和缓南方政府的政策，已因南方政府不肯抛弃关税、法权、废约等口号而无结果；同时北方经纪政府高高挂起承揽包庇不平等条约和包办禁止反帝国主义运动的老招牌，正和蓝浦生所谓“维持条约权利之列国见解”的货色相投合；如此一来，帝国主义者也许要抛弃其两刀政策，仍旧采用一刀政策，仍旧极力援助北方的经纪政府向国民政府进攻。他们这种一刀政策也许成功，也许和以前援助柯尔恰克，援助但尼金，援助乌兰格爾，援助段祺瑞、曹錕、吴佩孚、孙传芳同样的失败。

国民政府若因帝国主义者援助北方的经纪政府之进攻而失败，人民应该懂得这并不是国民政府对外政策之错误；人民应该感激国民政府是因为不肯学经纪政府出卖国家主权人民利益以换得各国之承认与援助而失败。

不平等条约不废除，关税不能自主，法权不收回，各国驻华海陆军不撤退，中国还成个什么国家，一切政治的建设和经济的发展，那里会有一点希望？！爱国的国民政府，正因为不忍拿这些足致中国死命的让步而失去各国之承认与援助，中国人民便应该起来承认国民政府，援助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如果失败，全国统一在经纪政府之下，这不仅仅是什么国民政府自身的失败或国民党的失败，乃是中国全民族的失败！在军事上，在财政上，国民政府都正在很困难的境地，爱国的国民政府既不忍负人民，人民便不应该负国民政府呵！

人民承认国民政府援助国民政府，并不是空口说白话，急须与

以军事的财政的援助。军事的援助应该：(一)青年们喊出“到革命军中去”的口号；(二)城市及乡村人民都尽可能武装起来，铲除一切反革命的势力，以绝革命军后顾之忧；(三)有组织农民、工人、商人、学生群众发起大规模的“革命兵士慰劳捐”，募集大宗的金钱与用品，分配给革命的兵士，以助军需而壮士气。财政的援助应该：(一)在克服张作霖打倒经纪政府的战争中，我们不要拿地方利益来摇动国民政府中央的财政计划，我们要尽可能的为供给军事需要而牺牲(政府方面尤其是军事当局，当然不应说这样违反民主主义的横话。)；(二)关于赋税之负担，不应该拿对待军阀政府的旧观念对待国民政府，即是只宜积极的监察用途，反对政府滥费，反对贪官污吏之中饱，而不宜消极的根本反对增加负担，尤其在克服反革命的战争中，更不能不忍痛增加负担。只广东一省人民已为北伐负担了五千万元，然而吴佩孚的兵队若到了广东，人民的负担与痛苦当然和十室十空的河南一样；张宗昌一到江苏，便要人民负担一千万元的军用票，每月由孙传芳付他的六十万元还在外；所以为革命战争而增加负担，乃是一般人民特别是资产阶级所必须忍受的痛苦。

人民如果认识国民政府和张作霖的经纪政府有所不同，即应起而承认国民政府，援助国民政府。拥兵五十余万的柯尔恰克，拥兵百万的但尼金，都曾得到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者的援助，然而苏俄政府终以获得人民的承认与援助而战胜，张作霖的力量还远不及柯尔恰克与但尼金，国民政府若能努力获得人民的承认与援助，当然可以打倒张作霖及其经纪政府，到那时，各国承认不承认，便不成什么问题。我所以说“人民承认国民政府比各国承认更为重要”。可是国民政府要想获得人民的承认与援助，也不是空口说白话可以办到的，必须尊重人民的权利，必须使人民知道不是为政府或个人挥霍而增加人民负担，然后才能够得到人民的承认与援助。

原载《向导》第182期

署名：独秀

谁杀了谁？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七日)

英国兵在中国杀人已成了家常便饭！前年在上海杀人，在广州杀人，去年在万县杀人，今年才开始又在汉口杀人，在九江杀人了！并且他们杀人，不是由于群众的暴动与误杀，乃是由他们国家的巡捕头司令官故意下令开放枪炮轰杀的！即依据他们所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平等条约，不知何约载有“即非两国开战时英国的军警长官有任意下令开放枪炮轰杀中国市民的权利”这样的条文？

汉口的英租界“一三”事变，九江英租界“一六”事变，都分明是英国兵杀了中国人，而不是中国人杀了英国兵，英国兵在九江杀中国人的时候，英国兵舰还从旁发炮示威，这是何等横暴的事变，然而伦敦的英国报纸竟称赞英国水兵能够忍耐，上海天津的英国报纸竟大叫英国人的生命财产受了危险，英国政府竟大派其炮舰来中国示威，英国驻华参赞竟到汉口拟向国民政府要求英国人生命财产的保障，反了反了，这竟和寻常刑事冤案一样：杀人凶犯无罪而尸主反来有罪了，真是反了！

事实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不需造一句谣言，上海的《时事新报》向来是不赞助国民政府与民众暴动的，现在只要看十一日该报的汉口通信和九江通信，便知道此次事变的真相了。兹照录该报通信于左：

“汉口事件之原原本本

汉口英国水兵以刺刀刺杀华人多名一案，略情已见本报，现已

成中英间之掀然大波，兹再纪其详情于下：

▲肇祸之真相 十六年一月一日二日三日，为武汉各界庆祝国民政府北迁和北伐胜利之期，党部及中央政治学校宣传员，为使各界明瞭庆祝意义，特组织演讲队到各重要地方演讲。前日（三日）下午三时，有宣传数人在一码头江汉关前面中英交界之空场演讲，听众颇多，宣传队派有专人照顾，秩序井然，不料英租界当局认此为挑衅机会，急调大批武装水兵登岸，挖掘战壕，架机关枪十余架，俨然向赤手空拳之听讲民众，取作战之形势。听讲民众，训练有素，不为所动，英兵乃蜂拥上前，实行驱逐。群众知其有意挑衅，乃向华界退却，英兵复大队冲入华界，将刺刀向人群中乱戳，当将海员工会会员某腹部洞穿，立时毙命，又有码头工会会员李大生腹被刺，大肠随刀拖出，血流遍地，命在旦夕，市民方汉山，腰部刺入甚深，亦有性命危险，其余商工各界听众被刺刀枪托杀伤打伤手足及面部者，总计在三十人以上。群众睹此惨状，异常愤激，无不愿以赤手空拳与英水兵决一死战，其时幸经国民政府代表徐谦、蒋作宾，汉口特别市党部代表李国暄、宛希俨，汉口市公安局长张笃伦等赶到，向民众宣示对付办法，力劝民众暂忍一时之气，免受更大牺牲，群众深为谅解，渐次散去，一幕惨剧，始告终局云。

▲公安局之报告 为呈报事，昨日下午二时，据职局警察第六署长戴维夏电话报称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在一码头中英交界地方演讲，民众聚集静听，秩序井然，乃英人无故调多数水兵登陆，密排武器示威，并干涉演讲，听讲民众，置之不理，詎英兵胆敢以刺刀杀伤数人，徒手民众，因无力抵抗，请派警保护等语。局长比即派督察长饶仁华率领保安队驰往救护，并由电话通知武汉卫戍司令部及前敌总指挥部，速派队前往，协同维护。旋据第六署署长戴维夏呈报，英兵以刺刀刺伤民众祝香山、方汉山、李大生等，并呈缴英兵马枪一枝，上冠刺刀，血迹甚多，随带同王庚书及受伤人祝香山到局；询据王庚书供称，适才经过该地一见英兵持枪刺伤数人，经众将枪夺下等语；复据保安队队长段海山侦缉队队长李清澄

报称，英兵又刺伤张义贵明宿生等前来，局长并亲履该地与英人交涉，撤退英兵，令勿开枪激变，并劝导民众，静候政府处理，幸双方允可，局长以事关外交，即亲赴南洋公司联席会议，报告经过情形；去后，接据督察长饶仁华报称，局长离开该地后，英兵又刺伤一人，不知姓名各等情；据此查此次英兵无故登陆，刺杀民众，幸未酿成巨变，嗣经局长交涉妥后，复以刺刀伤人，实属野蛮已极，除将枪刀存局待缴外，理合将英兵肇事情形，及已查明之受伤民众姓名，缮单呈祈鉴核，恳向英领严重交涉，以重国权，而张公道。谨呈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陈。

▲各界紧急会议 惨案发生之后，武汉各界民众，悲愤异常，当晚即各分途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对付，汉口特别市党部为集中各方意见，更于前晚发出十万火急通告，召集武汉农、工、商、学各团体代表，于昨午十一时在汉口总商会开紧急会议，讨论办法，于是各界代表到者极为踊跃，计有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全省商联合会，汉口武昌总商会，汉口商民协会，全省总工会，全省农民协会，全省学联合会，全省妇女协会，汉口学联合会，汉口妇女协会等二百余团体，代表五百余人，十一时三十分开会，由市党部代表李国暉主席，秦君侠记录。兹将其议决之重要事项，条列如下：（一）向政府之具体要求，代表大会一致议决，对于此次惨案，决要求政府向英领事提出八个条件，限英领事于七十二小时以内答复。一、立即向英领事提出严重抗议。二、英政府须负赔偿此次同胞死伤之损失。三、英政府须立将肇祸凶手交中央政府依法惩办。四、英政府须立即撤退驻汉英舰及英界之沙包电网等作战物。五、英政府须向国民政府道歉。六、英租界内华人须有集会、结社、游行、演讲之绝对自由。七、英界巡捕及义勇队须一律解除武装。八、英租界须由中政府派军警管理。以上八条件，如英领事在七十二小时内无圆满答复，则请政府正式通知英领事，以后如再有何种不幸之事发生，应由英国政府完全负责，同时代表大会为求避免以后再有此类惨案发生，更须要求政府自动办理下列各项：（一）立即收回英国租

界。(二)立即收回海关。(三)立即取消英轮在中国之内地航行权。(四)立即撤销英人在华领事裁判权。(五)如英领事对于国民政府所提之条件不能接受时，民众决自动封锁英租界，实行对英总罢工。(六)实行对英经济绝交，由总商会通告，严禁买卖英货。(七)五日下午二时在济生三马路，召集市民示威大会，追悼死难同胞，讨论对英办法。(八)通电全国全世界宣布惨案真相。(九)组织武汉市民对英委员会。当推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总工会，全省商联会，汉口总商会，武昌总商会，省农协会，省学联会，省妇女协会，汉商协会，汉阳商会各团联合会，律师公会，新闻界联合会，农工商学联合会等十五团体代表为委员，并即推此十五团体代表，立刻将联席会向政府所提出之条件，口头向政府陈述，以备采纳，旋即散会。

▲当局之办法 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自接得各方关于此次惨案之报告后，异常愤激，当于前晚发出紧急公告，宣示民众，原文如下：

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闻英水兵行凶之事，我同胞一人被杀，数人被伤，政府同人，不胜愤激，政府必当采取适当方法，保护人民，在二十四小时内，当可决定办法，防止以后再有此等惨剧发生，及为人民报仇雪耻。在政府未决定办法时，希望人民离开租界，以免危险。政府一经决定办法，立即通知人民，于一月四日下午七时在新市场正式宣布，特此公告。

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

昨日下午七时，国民政府代表徐谦、孙科、蒋作宾等复在新市场召集各人民团体代表开会，宣布政府对于此次惨案之态度和办法，大致略谓，中央临时联席会议昨晚开会时，对于农工商学各界联席会议所提出之八项条件，决定全部接收，且有先已由外交部分别进行者，故此次之对英交涉，政府与人民完全一致，同时昨晚会议中决定令卫戍司令部派精良军队入驻英界，维持秩序，保护安全，此项命令，已于昨晚实行，最后并勉励民众整齐步骤，维持秩

序，共争最后之胜利云云。

新市场大会散后，政府委员又召集各团体代表在南洋大楼开联席会，徐谦主席，由外交部秘书吴之椿，中央党部代表陈群，先后报告交涉经过及派兵驻防英界情形，大致可分二点：（一）外交部对于此案，前晚即已提出口头抗议，限其立刻撤退水兵及义勇队，英领旋于今晨答复，完全照办，并允许中国军警入驻英界。（二）昨日政府已派军队三连入英界，驻英巡捕房后堆栈内，今日决再加派一连前往，营长一人，党代表（陈群）一人，驻英捕房办公。所有在英界之中国兵士，均受党代表之指挥，党代表则受外交部之指挥云。（一月五日）”

“九江工人与英兵冲突记

枪伤工人一名

外舰发炮示威

国闻社九江通信云：记者本日由南昌赴九工，至九江已钟鸣四下，街市商店，完全关闭，行人往来，如怒潮汹涌，兵士皆荷枪实弹，巡遯森严。记者睹此情况，甚为惊讶，及过租界，见栅栏门已封锁，门外军警密布，断绝交通，心知系与租界发生交涉。在旅馆安顿行李后，特出外访询，得悉在一小时前，有一工人，为外人用手枪击伤，工人群起救护，遂与外兵冲突，外舰从旁发炮示威，共发二响，因未实弹，尚未演成若何惨剧。驻得军警，闻风一齐出队弹压，商民亦大动公愤，相与罢市，以谋应付。九江军政当局，除向外领提出抗议外，并电南昌国民军总司令部，严重交涉。（一月六日）

七日九江续信云：九江工人，被外兵击伤，兹经确实调查受伤工人，为伍宜山，已送医院医治，因当时情形混乱究竟此外有无死伤，尚无从明晰。”

又十一日上海《商报》载国闻社汉口通信云：查一三案之受伤者之姓名籍贯伤情如下：李大生，鄂城人，年三十二岁，现充吉田洋

行打包工，腹伤甚重，因肠出，已经天主堂剖诊；明宿庭，住济生堂后，肠出，入医院，苦力；祝香山，孝感人，住三新街，头伤；张义贵，黄冈人，住三新街，头伤；方汉三，黄陂人，年十岁，头伤。

此次汉口九江事变中，被英国兵杀伤的中国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明明白白的有：

海员某
李大生
方汉山(即方汉三)
张义贵
明宿生(即明宿庭)
祝香山
不知姓名一人
伍宜山

等八人，而英人被杀伤的是谁？究竟是谁杀了谁？究竟是谁人的生命受了危险？中国人因杀了两个外国教师而失去胶州湾、青岛，现在英国人因杀伤了八个中国市民而退还本应该退还的汉口、九江英租界，丝毫不足为奇。若是中国人在汉口、九江杀伤了八个英国人，试问英国是怎样的态度？或者英国人要说：你们中国人是贱种，杀伤几个不算什么。这正是我们中国人最不能忍受的一件事！

我们再看英国在此次事变前后对中国的态度是怎样。在事变前，驻北京英代办的提案，表面上似乎是采取和缓政策，其实是一面以二五附加税根本拒绝中国收回海关，一面以二五附加税的百分之八十供给张、孙两军阀对南战争。我们复不能忘记在一三惨杀案一周前的“团风事件”，即是英国亚细亚商轮“福光号”在团风地方故意撞沉华轮“神电号”，淹死四百多人；此案交涉尚无结果，又故意在武汉市民庆祝国民政府迁移的盛典中，施行屠杀，这就是英国承认国民政府之表示。

“一三”惨案以后英国的态度是：(一)运动法、美、日本各帝国主义一致对待中国；(二)大调军舰到汉口示威(见前文摘录《大

陆报》所载消息)；(三)上海英租界工部局布告，禁止一切含有政治性质之集会游行讲演。

帝国主义者一向把租界当做他们的领土，是不轻易放弃的；他们在租界内剥夺中国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戕害中国人的生命，一向任意行之；租界一天不收回，驻华海陆军一天不撤退，中国人被屠杀的事是不能免的。

上海五卅惨案，不是上海人一部分的事；广州沙基惨杀案，不是广东人一部分的事；万县惨案，不是四川人一部分的事，现在的汉口、九江惨杀案，也不是汉口人九江人一部分的事；从前年“五卅”到今年“一三”，都是英国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全民族的暴行与侮辱，全中国人都应该起来对英反抗，实行对英经济绝交，男女老幼一律不为英人服役做工，非到收回英租界，永远撤退英国驻华海陆军，收回海关不止！

原载《向导》第183期

署名：独秀

张天师破产了！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七日)

什么同善社，什么太戈尔，什么班禅活佛白喇嘛，什么张天师，这几年闹得乌烟瘴气，忽然霹雳一声来了国民革命军，在武汉查封了同善社，在江西又查抄了张天师的财产，斥为邪说惑众！可说是大快人心的两件事。然而偏偏有一个什么江西旅沪工商联合会吕静斋，致电江西省政务委员会为天师请求发还财产，可怜天师无灵，竟靠凡人搭救，不但物质破产，精神也破产了！

原载《向导》第183期

署名：实

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中之 中国革命运动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今天(一九二七年一月廿一日)是列宁逝世之第三周年,在这第三周年纪念中,令我们回想到“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这句话。这句话是列宁所作一篇短文的题目,在现在中国革命运动的高潮中看起来,非常有意义;列宁自己也曾说:“在这题目的几个字里却含有苦的真理”。

列宁在这篇短文里说:“在文明的先进的欧洲,有极发展的技术,有极丰富的各方面的文化及宪法;现在却到了一种历史的时期,使资产阶级因惧怕那渐渐增长和巩固的无产阶级,不得不拥护一切落后的死了的中世纪遗物,停滞不前进的资产阶级与一切停滞不前进的势力联合起来,以保存那动摇不定的雇佣奴隶制度。在先进的欧洲,是拥护一切落后的东西的资产阶级在那里横行。……也许还可以举一个比较显著的例来证明欧洲资产阶级之腐败,如为了财政的分割及资本家利益的关系,欧洲资产阶级居然拥护亚洲的黑暗势力。亚洲各处现在都发生了德谟克拉西运动,并且日见扩大,日见巩固,那里的资产阶级还与人民携手去反抗黑暗势力。”

列宁的意思是说欧洲本来是先进的,欧洲的资产阶级在以前反抗封建贵族做德谟克拉西运动的时候也是革命的,可是现在他们因为对内要压迫无产阶级之兴起,对外要剥削殖民地,便不惜联合国内外封建的黑暗势力而反革命,而落后了;亚洲本来是落后的,可是现在他们居然能够起来做德谟克拉西运动,而反抗封建的黑暗势力,而革命,而先进了。

列宁这篇短文，做在去今十四年，即一九一三年五月，正是民国二年三月宋教仁被刺，四月二千五百万镑英金大借款成立之后，列宁此文中所称“欧洲资产阶级居然拥护亚洲的黑暗势力”，正是指英、俄、德、法、日五个帝国主义的银行团借款给袁世凯压迫国民党这件事。

列宁若到现在还活着，眼见法西斯的组织遍于欧洲各国，而且在好几个国家取得了政权，眼见欧洲各国的人在中国收买或暗示一切反动分子做反赤运动，眼见欧洲各国政府尤其是英国力助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黑暗势力向国民政府国民军进攻，眼见英国兵在上海、在广州、在万县、在汉口、在九江继续不断的屠杀中国市民；同时也眼见中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及革命的军队均百折不回的向黑暗势力反抗，全国德谟克拉西运动的高潮，比之十四年前，更是扩大而巩固，列宁不但更要自信“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这句话是对的，而且要喊出“黑暗的欧洲与革命的中国”了。

“革命的中国！”“革命的中国！”列宁若到现在还活着，必然这样欢呼。可是这里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即是：在革命的中国，是否也会走到一种历史的时期，使革命势力中一班有落后的欧洲资产阶级意识者，一方面因惧怕工农阶级及其政党的势力渐渐增长，一方面为帝国主义和国内黑暗势力投机分子和平空气所诱惑，遂至回头和国内外黑暗、反动、右倾、一切不前进的势力联合起来，向前进的工农群众进攻，在赤的营垒内响应外面的反赤运动，以回复到不革命的中国，甚至造成反革命的中国？

这一问题，我们现在还很难回答，因为两方面都有可能。中国革命运动的前途，已经显现出两个不同的趋势：（一）武力与工农群众及革命化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结合，打倒国内外一切黑暗反动势力，建立革命的民众政权（当然说不上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或工农政府），力图国民经济生活之发展；（二）武力与反革命的大商、买办、官僚、地主、土豪劣绅及懦弱妥协的资产阶级结合，和国内外一切

黑暗反动势力调和，在政治上建立压迫工农群众法西斯式的军事独裁政权，在经济上输入道威斯式的资本主义。第一个趋势将以完成革命的中国，第二个趋势将以造成反革命的中国。依照国民政府的现状及国民党的党纲政纲前进，则可实现前者；国民政府及国民党若把右派的势力与友谊看得比党纲政纲及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还宝贵，若把工农势力看得比右派势力更可虑，若不能断然制止国民党同志俱乐部、西山会议、上海大会一贯到底的右派思想与政策在党内日渐得势，这些党内的右派势力，会和党外的一切黑暗反动派离散削弱南方革命势力联结起来，危害革命之前进，而实现后者。

冯自由、马素、彭养光等所领导的国民党同志俱乐部，自始即反对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这三个革命政策，安福政府称他们为稳健派，打算牢笼他们以消灭国民党的革命运动，幸而当时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很一致的坚决的和这班右派决裂，才保存了国民党的政治生命，虽然中山先生逝世了。从西山会议到上海大会，这些右派在组织上虽然不和同志俱乐部是一事，在思想上却接受了他们的反俄、反共、反工农运动三个政策。左派领袖们对于西山会议、上海大会的右派行动虽然不赞成，虽然说他们是反革命的，至少也说他们是不革命的，虽然尤其反对他们单另组织是叛党；然而一部分人却已渐渐接受了西山会议、上海大会的思想和政策；以为不联俄也可以革命；以为反共反赤不是反国民党；以为西山会议分子究竟比共派还是真国民党，究竟是一家人，宁可联合他们以反共；限制工农运动的呼声也渐渐到处都听见；因此我们可以说同志俱乐部、西山会议、上海大会这些右派分子在组织的运动上虽然失败了，在思想和政策的运动上却是胜利了。国民党左派或者还未曾感觉着这样，而国内外一切黑暗反动势力却已经感觉着了；帝国主义者说：“如果国民党稳健派得势，于我们并无什么危险。”奉系军阀和安福系都说：“国民党倘能排除赤的分子，孙文主义可以容纳。”又说：“与俄断绝关系，鲍罗庭以下均须放逐，蒋介石倘能

接受此警告，当与其妥协提携，商讨对内对外政策。”又说：“对党军只反对俄化，此外可商。”上海的买办阶级说：“国民党虽讨厌，然可作为反对共产党之用。”国民党领袖们将如何选择？接受国内外黑暗反动派离散削弱南方革命势力的提议呢，还是继续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

我想每个忠实的国民党党员，都不忍忘记了中山先生临终之言：“我死之后，我们政治的敌人定要设法软化你们，你们如今不受软化还要继续革命，他们一定要杀害你们。”当时段祺瑞对电通社记者说：“予与孙先生所统率之国民党，自应努力相为连络，国民党果以真正之直道而行，予无不愿提携从事，但如向共产各说之邪道而趋，则本人宿所反对也。”姚震也对东方社记者说：“孙氏既死，彼国民党者，鉴于由来之经过，即终不免于分裂，然国民党中之稳健派，此时有与吾人握手提携之充分可能矣。”当时日本的报纸也说：“以段氏为中心之和平统一，成功与否，胥视其能否与占多数于国民党之稳健派相提携为断。”现在，国民党很危险的试验时期又到了！所谓稳健派（自有中山先生革命运动以来，稳健派这个佳名，即是反对革命者之称），即是反俄、反共、反工农运动之右倾分子，是否占多数于国民党，是否不受敌人软化而与之握手提携？这不独是国民党的政治生命所关，并且中国革命前途是否会因此中遭顿挫！

或者有人说，我们虽然反俄、反共、反工农运动，我们仍然要革命；我们反俄，同时也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反共，同时也反对黑暗反动势力；我们反工农运动，同时也反对官僚、买办、地主、土豪、劣绅及万恶的资本家。这本是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者的老调，我们听惯了这一片欺人的鬼话，谁也不能相信。即令他们不是欺人的话而真是这样想，也是一个大笑话，试问有没有不分敌军友军一概用机关枪扫射这样滑稽的革命战术？并且在事实上，反俄即是帮助了帝国主义；反共即是帮助了黑暗反动势力；反工农运动即是帮助了官僚、买办、资本家、地主、土豪、劣绅。

中国社会，现在只有两种对抗的大势力：一方面是革命的工农群众及革命化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一方面是反革命的军阀、官僚、买办、地主、土豪、劣绅。资产阶级乃介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并且他们的力量和政治觉悟都还太弱，只能拉他们倾向革命，不能算在革命的势力之内（即最发展的上海资产阶级，一遇孙传芳的压迫，马上通告各界，声明“其向抱宗旨，除关于商业切身利害外，其他各个言论概不预闻”，并且大登其“不与闻政治”的广告。有人询问蒋梦麟先生：什么是中国革命的力量？中国的资产阶级为什么不挺身参加革命争取政权？梦麟先生说：“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还太弱，任何势力能够统一中国不妨害他们的发展，他们都赞成；他们自己的政治理想还是君主立宪。”梦麟先生这几句话，描写中国的资产阶级非常深刻）。在这样状况之下，国民党右派若反对工农运动，其结果势必走到官僚、买办、地主、劣绅那边去；若当真对两边一齐反对，他自己便悬在空中，有何出路？

负有中国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是中山先生所留给中国一个至可宝贵的遗产。中山先生临终致苏俄遗书说：“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我们希望每个国民党同志，都要谨守中山先生的遗训，继续中山先生未竟之业，造成革命的中国，先进的中国；切勿效落后的欧洲资产阶级，拥护一切落后的死了的中世纪遗物，结合一切黑暗反动势力，使中国仍旧是不革命的中国，落后的中国！

在今天列宁逝世第三周年纪念中，自然令我们联想到中山先生逝世第二周年也快到了；也自然令我们回想到列宁和中山先生对于中国革命之遗言。

原载《向导》第184期

署名：独秀

英国帝国主义最近对 中国进攻政策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自前年“五卅”事变以来，英国帝国主义者，他们自己屡屡单独的屠杀中国人，越屠杀越引起中国人的民族运动，他们便感觉着自己单独的屠杀中国人还不够，并且不便，于是极力鼓吹各国一致对华政策。不过屡次事变都是英国帝国主义者单独屠杀中国人这些太明白的事实，不能够引起各帝国主义对中国一致的愤怒。并且各帝国主义者不愿意专为英国效劳而引起中国民族感情对他们自己的损失，于是英国帝国主义者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地位。到了万县屠杀事起，英海军的举动过于横暴了，帝国主义的英国内部在野党也觉得有点难为情，并且想利用这个机会攻倒敌党内阁，于是陷于孤立地位的英国帝国主义内最反动的保守党内阁，复陷于孤立地位。“一三”汉口屠杀事件发生，孤立的保守党内阁异常恐慌，乃采取很巧妙的策略：一面退让，使国民政府为他们暂时看守租界；一面到处大声呼号英国人的生命财产危险，在华各国人的生命财产危险，想藉此造成第二次庚子（一九〇〇年）联军对华的局面，以挽救其孤立地位。

可是，帝国主义的英国反动的保守党政府，这种巧妙的政策，并未十分成功。因为被屠杀的只是中国人而不是英国人或其他国的人，杀人的仍旧是单独的英国，中国人的愤怒也仍旧集中在对英，美、法、日本虽然共同遣派海军防卫各帝国主义在华的最后根据地——上海，而一般举动尚是慎重观望的态度，只是各国自保其在华权利，而不肯为英国特别效劳。尤其是日本，为了二五附加税

问题，且和英国公然反目。

英国帝国主义者所极力鼓吹的各国一致对华政策仍然未能十分成功，其最近政策乃是：一面用硬的方法，大派海陆军来中国示威，又以二五附加税助张作霖、孙传芳向南进攻；一面用软的方法，诱惑国民党中的稳健派向他软化，以阻挠急进派的革命运动。

路透社十八日北京电很高兴的说：“奉队兵众械利，……奉军自称，如实行进攻，一月内可复汉口。”

上海《新闻报》十九日伦敦电：“英政府派遣海陆战兵一千名，乘舰名徐伦特，于一星期内开往中国。”

路透社十八日伦敦电：“英公司船基芳斯号与基杜南号两艘，泊于桑浦顿已有数月，现从事布置，以便早日运兵往中国，闻基杜南号定于本月二十六日开行，基芳斯号二十九日出发。”

路透社十八日玛尔太电：“第一巡洋舰队，除无畏号外，将由波益尔少将统带驶往上海。”

路透社十八日伦敦电：“英国查桑濮莱茅及朴资茅之水兵一千人，已奉训令准备开往远东，大约一星期内可出发。十九日由玛尔太出发赴华之巡舰，为佛罗比摄号、德里号、丹尼号、龙号四艘，其任务亦在保护英人在长江之权利。”

路透社十九日玛尔太电：“第一巡洋舰队，除无畏号外，今晨开往上海，港内英舰均向欢送，舰中兵士欢呼不已。”

路透社二十日玛尔太电：“医院船梅恩号，二十日左右偕炮船阿菲斯号、莱台葆特号赴华，将由驱逐舰华特勤号、华尔夫林号护送。”

路透社二十日伦敦电：“英船梅根狄克号现泊于利物浦，从事布置，以便改作装运水兵前往中国之运兵船。”

以上是英帝国主义者硬的进攻。

上海《字林报》说：“国民党内有温和派与极端派，是公开的事。极端派甚憾温和派掌握政府大权。……国民党内究将何

派占胜利，关系于外人对于国民政府之态度，实在不小。”

英国某报说：“英人在汉口采行温和政策，此事固丧失可发生恨畏之威严，但也在国民党稳健分子中增进英人之声望。”

伦敦《每日电闻报》说：“显明之真相，为南政府已放出非其力量所能制之魔鬼，但可欣幸者，英政府现似已看透此中事矣。”

《晨邮报》说：“国民党受莫斯科之操纵，……英国在列强中最无侵略中国土地之野心，俄国现驱粤人反抗英国，实欲置中国于其势力管辖之下。”

伦敦《泰晤士报》说：“英政府在汉口所取极和婉之态度，当可使粤政府表示其是否果真代表中国人士之思想，抑或别有他种势力为主动。”又说：“目下仍切望中国国家主义之代表能善用其智慧，乘机表示其政才，其选择全在彼等之手。”

路透社二十日汉口电说：“消息灵通各界既信陈友仁亦知排外风潮所酿成之局面，殊形危险，但无力与急进国民党为抗。陈虽屡图以外交手腕修正条约，而若辈则欲用激烈手段。”

以上是英帝国主义者软的进攻。

我们怎样抵御他的进攻呢？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并未打算现在即与帝国主义者直接的武装冲突，更不主张加害于任何外国的或个人私人机关（商店、工厂、教堂、医院、学校等），我们所反抗的，只帝国主义对于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制度及行为与其陆海军警察对于我们民众或个人之暴行。但今后无论何时，无论是何国陆海军或英国新派来之水兵，如果以枪炮屠杀吾人，代表人民利益的国民政府军队固不容袖手旁观，即徒手的民众亦不辞与之血肉相搏，以力争吾人之生存与自由。至于帝国主义的工具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等势力，乃是国民革命初步所必须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完全解除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

孙传芳的武装,也就是解决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雇佣的间接武装。

我们知道帝国主义者软的进攻,比硬的进攻更加厉害。可是国民党中最稳健最温和的分子如冯自由、马素、马君武等,早已被排除在国民党之外;已成为安国政府中的人物,现时国民党中即有比较稳健温和的分子,亦不出卖祖国于帝国主义者,至少亦不忍受中山先生素所愤恨的英国帝国主义者之软化,即令有少数分子如此,亦必不为党员群众所姑容。软化国民党中稳健温和分子之企图,香港政府对广东曾屡试屡败,我们希望国民党的领袖们和国民党党员群众,现时仍须十分警戒,庶几使英国帝国主义者最近软的进攻仍归失败!

原载《向导》第185期

署名:独秀

谁践踏了谁？

——斥麦克唐纳尔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自汉口“一三”屠杀以来，英国帝国主义者反而大做其中国人加害于英人及各国人的生命财产之宣传，怎奈是英国水兵杀伤中国人的事实太明显了，美、法、日本各帝国主义的政府虽然取了共同防卫的态度，尚未完全接受英国的提议，象一九〇〇年一样对中国共同宣战；至于他们的舆论：美国的波拉，英国的孟却斯特派，都仍旧相当的表同情于中国的民族运动，英国的自由党亦尚未积极的做反中国的宣传，惟有工人阶级的叛徒改良主义的第二国际首领英国工党领袖麦克唐纳尔，竟露出他的真面目，和保守党取了一致的态度。据路透社十五日伦敦电，工党机关报《前进报》载前相麦克唐纳尔论汉口案一文，略谓：

“此次外交家与水兵均能自制，得免债事，令人极深钦佩。夫租界为前中国政府许吾人管理，我民托庇于条约所予之安全，乔寓其地，当局若悄然退出，实无理可原。吾人当结一约，谈判之际，宜取保安之寻常戒备。余意往事应加清理，盖时代已不同也。惟清理若听暴众为之，既无益于中国，亦无益于吾人；果尔，则冲突必难幸免，而吾人不能任咎。国民政府任令群众聚集汉口英租界之边界，难辞厥责，显而易见。余固主张租界应归中政府管理，惟群众激昂，是否即为此故？如为此故，曷为法、日租界皆安然无事？况英人退出租界后，界内墙上所贴之标语，非表示中国国民主义，直为仇英而已。吾人其被许和平清理乎？抑此践踏独施于吾人？余用和平二字，窃余望

广州外交总长能善用之也云云。”

世界的大工贼麦克唐纳尔，他居然对屠杀中国市民的英国水兵表示极深钦佩！他居然拥护帝国主义者依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管理租界！他居然咀咒中国为民族自由而奋斗的民众为暴众！他居然斥责国民政府任命中国民众在中国地方集会之自由！他以为群众激昂只是仇英，而不是为了租界问题，不然何以日、法租界都安然无事；他装着好象不知道“一三”事件杀伤中国人的只有英国水兵而没有日、法等国人这个事实！他和全英国资产阶级的论调一样，以为租界可归中政府管理，但须用和平方法，这完全是欺骗手段。民国以来的外交那一时那一事不和平，而帝国主义的态度是怎样？在巴黎和会，在华盛顿会议，在国际联盟，北京政府代表那一次不是和平的提议与哀求，中国得到了什么？五卅运动前，各帝国主义者，对于他们自己在华盛顿会议中关于中国关税问题之(二)(三)两条决定(即是：“于华盛顿会议闭幕后四个月以内，在上海组织改订委员会，决定实行照现行进口税率实行值百抽五，征收附税百分之二·五及奢侈品百分之五。”)，忘记了没有？五卅后在北京召集的关税会议，是十分和平的，有了丝毫结果没有？前年在上海在广州屠杀中国人的凶手是英国人，去年在万县屠杀中国人的凶手也是英国人，此次“一三”汉口事变以来，也并没有一个英国人被杀伤，而中国人被英国水兵杀伤的、前几天我们知道有：

海员某

李大生

方汉山(即方汉三)

张义贵

明宿生(明宿廷)

祝香山

不知姓名者一人

伍宜山

等八人；现在我们又知道还有：

夏兴发
韩奇生
萧中有
李海山
叶泽昆
许士希
朱太平

等七人；并且十一日晚，又有英舰两只，开足马力，并驾上驶，在武穴浪沉货船数百只，溺毙商民无算。这样看来，到底是谁践踏了谁？

大工贼麦克唐纳尔，一面口头上说他也主张租界应归中政府管理，可是要和平清理，即是主张被压迫的民族不应该对压迫者起反抗；一面却坚决的拥护帝国主义者条约租界等权利，为拥护这些权利，他却很不和平的主张冲突；这分明是欺骗政策！

这班工人阶级的叛徒改良主义的第二国际首领，在欧洲一向是帮助资产阶级欺骗工人；现在他们又用同样的欺骗政策，帮助资本帝国主义者欺骗东方被压迫的民族。改良主义者在欧洲对工人说：你们不要革命，只有用和平方法和资产阶级协作，可以达到你们生活改良之目的；其结果，和缓了工人的革命运动，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权，被欺骗的工人阶级所得到的，不是生活改良，而只是加时减资饥寒与失业。同时，改良主义者对东方被压迫的民族也是说：你们不要革命，只有用和平方法，和统治者协作，他们可以帮助你们得到知识、幸福与自由；其结果，和缓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运动，巩固了资本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权，被欺骗的东方民族所得到的，不是知识、幸福与自由，而只是无产、穷困、侮辱与屠杀。

这班巧于欺骗的改良主义者，常常巧于利用各种不同的口号与理论，以达他们唯一目的——拥护反革命与反对革命。当欧战及其他资产阶级政府争夺殖民地时，改良主义者便帮着资产阶级大喊其“保卫祖国”、“为民族利益而战”等口号，把国际主义抛在九霄

云外；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发生时，例如五卅运动时，中国人要求各国人士援助，德国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却回答说：“我们是国际主义者，不能赞助你们的民族运动。”

欺骗工人阶级的麦克唐纳尔，他就是这班改良主义的第二国际领袖之一，用和平这一口号欺骗工人阶级和欺骗东方民族，这本是他们出力报效资产阶级同一作用之二方面。当一九二四年麦克唐纳尔及其党徒掌握英国政权之时，他们的殖民大臣汤姆斯（亦第二国际派首领之一）曾向各殖民地代表演说：“请各消除阶级战争，勿发阶级议论。”同时，他们拒绝埃及和印度民族解放的要求，他们任令香港政府公然帮助商团背叛广州政府，任令英公使公然训令英领事致哀的美教书于广州政府，声称如果政府攻击商团时，英军舰就要炮击广州；他们对待工人阶级和东方民族的政策，和资产阶级最反动的保守党内阁没有两样。

现在，麦克唐纳尔对于汉口“一三”屠杀事件的态度，仍旧和保守党没有两样，这本是改良主义的第二国际领袖之本色。因此，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党人，都应该懂得反对阶级斗争、主张阶级调和的改良主义是什么东西了；应该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有密切关系了；应该懂得民族革命的好友是革命的第三国际而不是改良主义的第二国际了！

原载《向导》第185期

署名：独秀

呜呼稳健分子！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英国人说：“英人在汉口采行温和政策，此事固丧失可发生恨畏之威严，但可在国民党稳健分子中增进英人之声望。”（路透社十七日伦敦电）国民党中如果真有这样下流的稳健分子，乃是国民党最大耻辱，中山有灵，得毋痛哭于地下！

原载《向导》第185期

署名：实

国民党的敌人是谁？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奉鲁军耀武扬威的要向国民政府进攻，这是国民党人所应该痛心的事；英国在国民政府迁移庆祝声中屠杀国民党的宣传员，还要大派舰队到汉口向国民政府示威，这更是国民党人所应该痛心的事；国民政府治下往往有劣绅捣毁国民党党部及农民协会的事，国民党人更应该大痛心而特痛心；然而他们不大注意这些事，偏偏大声疾呼还未充分执行整理党务案是他们所痛心的（见《现代青年》第九期）。他们大概以为他们的敌人不是帝国主义与军阀劣绅，而是中国共产党。这也许是稳健办法！

原载《向导》第185期

署名：实

张宗昌的三不知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山东直隶人都说张宗昌有三不知：一不知他自己的兵有多少；二不知他自己的钱有多少；三不知他自己的小老婆有多少。我以为张宗昌未必这样糊涂，张宗昌的三不知应该是：一不知他的兵只能威逼老百姓而不能打战；二不知他的钱多用在嫖赌而不用在军饷之危险；三不知道他的小老婆那几十个是买来的，那几十个是抢来的。

原载《向导》第185期 署名：实

放屁狗的《甲寅》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章士钊拿黄兴的钱办的《甲寅》，也只能算是放狗屁；后来拿段祺瑞的钱办的《甲寅》，便是狗放屁了；现在拿张宗昌的钱办的《甲寅》，更是放屁狗了。放屁狗的毕竟还是一个人；狗放屁固然讨厌，或者还有别的用处；放屁狗只会放屁，真是无用的废物。张宗昌在天津赌赢了二十万元，本拟照例赏给侑酒的妓女，薛大可伸手接去，说是拿去和章士钊办《甲寅》杂志。《甲寅》有这样多的经费，所以能够送人看不卖钱。拿张宗昌赏妓女的钱办《甲寅》，这《甲寅》要比放屁狗还下流！可是，薛、章二人拿这笔赏钱全部用在《甲寅》上面还算好，倘若拿若干给他们的夫人用了，那便如何对得起他们的夫人！？然而张宗昌或者很高兴这样！

原载《向导》第185期 署名：实

革命与民众

(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邓演达君说：“此时只是军事的胜利，尚未达到政治的胜利。”孙科君说：“从前的军队不能够与民众结合，不能够为民众的武力，所以会失败。……革命的势力就是民众，尤其是在中国的情形看来，须要使农工及其他各界的民众完全了解革命的意义，然后国民革命才有成功之望。”这些真是革命领袖的说话！

怎样才是政治的胜利？必须民众了解革命是于他们有利的，革命的胜利就是他们的胜利，起而拥护此胜利，帮助革命党革命军推翻一切反革命的势力，拥护此革命政权，这才是革命党之政治的胜利；并不是单靠军事的胜利，赶走敌人，占住政治机关，革命党做了官，便算政治的胜利。

怎样才能够使民众了解革命是于他们有利的呢？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决不是什么空口宣传主义可以收效的。民众所认识的是事实，所感觉的是切身问题，离开他们的切身问题，离开事实的主义，不会真能使他们相信；反之不兑现支票式的宣传，会使他们发生反感。只有由革命而给他们以切身的利益，他们才真能了解革命于他们有利益，他们才真能自动的为拥护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拥护革命，不是为革命而拥护革命，更不是为革命党而拥护革命。

革命党是革命的民众之最急进的先锋，有时自不得不指导民众，革命的民众也自然有受革命党指导的必要，也自然有为革命而牺牲自身利益的必要；可是如若我们革命党侈然自大的向民众说：尔等民众须受本党的指挥，由本党管理，尔等民众须为我们的革命牺牲你们的利益，则民众将不明白我们想干什么。拿这样的态度对

待民众，如何能够得到民众！

至于有一班人，终日坐在书斋里，永远不肯屈尊到民众中去而与民众为伍，不懂得民众的疾苦是些什么，反而大喊“工会是流氓”、“农会里有土匪”、“我们党人是坐轿的农民是抬轿的”这类怪话。这样的大人先生们如果想得到民众，更是等于想坐火车到日本去。

就是能够屈尊接近民众的人们，若是用得着时便极力拉拢民众，用不着时便说一声再会；或者是以为对民众的态度在朝时应和在野的不同；这种人虽然能欺骗民众于一时，到了他们的真面目显露于民众之前，自然要失去民众，并且永远失去民众，因为民众只能够被欺骗一次。

真正的革命主义者，对于实际所许可的固然不肯轻让一步，同时对于实际所不许可的也不愿意乱进一步，民众若有时超过实际可能的幻想，领导民众的革命党便应该努力向民众解释，领导他们从幻想的迷途与危险阵地到能够实际争斗的战场，民众所需要的是这样知己知彼、知进知退、能争善战的先锋，而不是跟着民众后面乱跑的尾巴主义者。因此，凡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党，不分在野在朝，对民众应该取这样真诚的态度，并不是在野时便可以故意向左一点，任意发出些不负责任的支票以取悦民众；一旦在朝便向右转，另摆出一副面孔，以前发出的支票一概不兑现或者大打其折扣。所以革命党应该始终以民众的真实利益为前提，万分不应该以自己在朝在野为前提，致前后易其态度，或者是一个党分在朝在野两样态度，一个党前后两样态度或同时两样态度，无非都是欺骗民众，欺骗民众者终于不能得到民众。

古代帝王欲得民心尚须行点什么仁政，况在现今民主主义时代，想得到民众，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须屈尊到民众中去（不可坐在书斋里骂工会是流氓、农民是土匪）；第二须与民众为伍利害与共（不可疑惧民众运动的高潮会危害他的政权）；第三须始终一致为民众利益奋斗（不可取在朝在野不同的态度）。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自然不得不需要现成的武力；可是现成的武力若不与民众结合，不得到民众的拥护，也不能够成功一种革命的武力，并且这种离开民众的武力，很容易走到反革命，不会成就革命，即或勉强一时获得军事的胜利，也终于不能保此胜利。所以，“武力与民众结合”真是中山先生留给我们不可磨灭的革命铁律！

许多事实告诉我们：国民军的军队实力强过北伐军，然而前者因为是单独的军事行动在北方失败了，后者因有南方广大的民众运动为声援，帝国主义者至今不敢轻于直接压迫。一九一一年（辛亥年）中国的十月革命和一九一七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在军事上都算是革命成功，然而俄国的革命给了工人农民的政权，给了工人农民的土地与自由，因此得了工农广大的民众之拥护与援助，克服了一切反革命的势力，不但得了军事的胜利，而且达到了政治的胜利，因此才能够保住了革命的胜利以至于今。反之中国的辛亥革命，固然未曾想到工人农民这群下等人在革命中会有什么作用，即当时全国上等绅商所奔走呼号的权利收回（铁路、矿山等），革命党人亦以苟安在“不侵犯外人权利以免多自树敌”的理论之下忽视了，中山先生提了一提“平均地权”，右派党人便群起堵住他的嘴，说他发疯了；因此，以袁世凯为中心的一切反革命势力，看清了孤军独战的革命党没有一点民众的后援，他们才敢于乘虚进攻，一面拿金钱官位软化了一批又一批革命党中所谓稳健分子所谓温和派，一面以“和平”、“统一”等口号束缚了革命党一切活动，以“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根本取消革命党的组织，其结果革命军队和国民党一概被袁世凯解散了，辛亥革命的军事胜利成了南柯一梦！

现在革命军和民众的关系是怎样？北伐军确是遵守中山先生“武力与民众结合”的教训而获得胜利了。可是革命胜利以后，尤其是九江、南昌的军事胜利以后，革命军和民众的关系渐渐有了一点危险倾向。

我们还未曾听到革命政府有正式压迫民众的举动，除了广东：

我们并且知道革命政府现在还做了些帮助民众运动的事，尤其是在湖南、湖北。可是同时，反工农运动之声，到处都可以听到，尤其是在一些军事当局中和财政当局中。在右派分子中更不用说，因为反工农运动本是他们的三大政纲之一。工农本是最受压迫的民众，现在虽然稍稍动了一动，并未曾翻过身来，更说不上抬起头来，便有人大喊“工农运动太过火了”。并且有人以为现在的工人、农民是强者，资本家、地主是弱者；又说什么工农是压迫阶级，资本家、地主是被压迫阶级。这好象外国人可以任意屠杀中国人，中国人动了外国人一根毫毛，便有人大喊野蛮；又好象满洲皇帝屠杀过无数汉人和革命党，革命党人杀几个满洲人或者是取消几条优待清室条件，便有人大喊暴民专制，都同样是世上不平的事！

有人说：工人这样罢工，我们的兵士也要学步了，我们也要代兵士说话了；有人说：工农运动开罪于资本家、地主，我们的财政因此陷于困难；更有人说：工人这样罢工，民众这样做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使我们外交陷于困难。这都是反革命的倾向！

在广东，民团、劣绅和县长、驻防军勾结起来摧残农会屠杀农民的事，近来更加厉害（参看一八三期本报广州通讯）；在解决工商纠纷条例中，居然有了“仲裁委员会之判决绝对有效由政府强制执行”的规定，实质上即是绝对禁止罢工；甚至于农工商学联合会也阴受阻碍，连汉案对英示威大会也被明令制止了！

在湖北，“革命军可敬，革命党可杀”“工人运动太放任了，非管理不可”这类怪话都放出来了！

同时，在帝国主义和奉天军阀方面，“可与国民党中的稳健分子温和派合作”的空气，也放出来了！

情形颇和辛亥革命胜利后相似，这是何等的危险倾向！

欲援救此断送革命之右倾的危险，欲保持革命的胜利，欲革命运动向前发展，只有继续遵守中山先生所留下的革命铁律：“武力与民众结合”。

原载《向导》第186期

署名：独秀

无耻的三省联合会

(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反对孙传芳的三省联合会，被孙传芳压迫而无形停顿，孙传芳所雇用的什么三省联合会伸出头来了！三省联合会虽然还未曾集中三省民众的势力，而他们的目的是三省自治，反对孙传芳，反对奉鲁军南下，这的确能够代表三省民众。并且主持三省联合会的人，大半是三省的正经绅商学者。现在三省联合会的目的是“促讨赤首领迅速出兵，收复被寇各省，……速电张宗昌、张学良二将军，速予出兵救国，一面仍由孙总司令由长江进兵反攻，……并向孙总司令请愿，克复衢州后，即乘胜向赣前进，一面责令叶开鑫部直进九江，……又致书张作霖，毋取杨宇霆主张，以大义为前提。”他们所谓三省代表大半是一向不见经传的人物，惟有两个是我们所知道的：一个是江苏代表韩国钧，一个是两粤代表梁绍文。韩是一个腐败老官僚，梁是孙文主义学会一青年（我们希望不是这个梁绍文）。其余各省代表虽然不甚知名，大家也须牢牢的记下他们的姓名，好防备北伐军一到上海，他们也会钻进国民党，象煞有介事的以纯粹国民党员资格，号召反共。现在右派中这种分子很多！

原载《向导》第186期

署名：实

稳健之孙文主义！

（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电通社廿七日东京电：“中国南北妥协之机运，渐呈浓厚之状，双方尝有代表往来，结局或将以稳健之孙文主义，实现大同团结。”帝国主义及奉天军阀，又要抄袭段祺瑞软化国民党稳健派的老调了！孙文主义是不是稳健的呢？大叫“真正孙文主义信徒团结起来！”的人们，现在必须在行动上答复这个问题！

原载《向导》第186期

署名：实

英国雇用的奸细国民外交协会

（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英国大调其海陆军来中国，陆续到上海的已为吾人所亲见，各人民团体都纷纷起来通电反对；独有所谓国民外交协会者，默无一言，却妙想天开，致电外交部，请抗议苏俄向我国边境增兵。苏俄向我国边境增兵这件事连影子也没有，国民外交协会致外交部电中“苏俄”二字想系“英国”二字之误，“边境”二字想亦系“上海”二字之误；否则便是英国人教他们故意这样宣传，以转移中国人的视线。

原载《向导》第186期

署名：实

“二七”纪念日敬告铁路工友

(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

“二七”运动，是中国工人阶级开始和军阀血战之第一幕。四年前的今日，中国铁路工人的赤血洒遍了沿京汉路二千余里；血战四年后的今日，在我们的战士我们的领袖施洋、林祥谦等流血地——汉口，才有了公开的盛大的纪念会。这些艰难困苦在我们工人阶级血战史上，都有重大意义，我们不可忽视了！

京汉工友同志们！我们今年的“二七”纪念会，固然是快慰的纪念，更应该是苦痛的纪念。不但纪念过去的苦痛，并且要纪念现在的苦痛。四年前的今日，沿京汉路的工友，都在流血、被捕、失业、恐怖的惨败中，并且这种惨败的空气笼罩了全国各路的工友们，这种惨败苦痛的历史，使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三年前的今日，正是惨杀工人的罪魁曹锟、吴佩孚得意之时，铁路工人更为他们所疾视，更受着严重的压迫。二年前的今日，虽当国民军胜利之后，在郑州召集了全国铁路总工会代表大会，而施林等先烈流血地——汉口，当时尚在吴、萧统治之下，京汉全路工会尚不能有统一的组织。去年今日，正当奉、直联合向国民军进攻之时，亦是吴佩孚势力复兴之时，同时也是各路工人起来再和奉、直军阀决斗之时，奉、直军战胜国民军，各路工人又回复到严重的压迫之下，京汉工人被吴佩孚第二次屠杀。今年今日，又是怎样呢？京汉南段、粤汉北段的工友固然得着一点自由，尤其是施、林等先烈流血地——汉口，已赶走吴佩孚，工会已得着组织及集会的自由，已能够开大会纪念四年前我们的死者，固然是我们很快慰的事。可是除此以外，吴佩孚仍旧在郑州屠杀工友，其余各路都全部归到奉张、鲁张、苏孙这些军阀严

重压迫之下，工友们处在以前所未有的普遍的严重压迫中，又加以交通系种种阴谋破坏，连秘密的工会都不易存在了。可以说铁路工友们现在的苦痛，比过去的苦痛更加沉重了！

铁路工友们！你们占住了全国最重要的交通机关；各派军阀军事运输的生命操在你们的手中，你们在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中有无上威力；可是，军阀们也正因为此对于你们的压迫，一刻也不能放松。你们对于军阀的战斗，是最有价值的战斗，而也是最艰苦的战斗。

你们的战斗机关——工会，是不能希望在军阀统治之下可以公开存在的。各种形式的秘密组织，目前非常必要；因为若无任何组织，便无法集中你们的战斗力，便只有任军阀践踏，你们能忍受吗？

最能够破坏你们秘密组织的，还不是军阀，而是交通系的局长员司。没有局长员司的告密与画策，军阀还不能够知道工人的内容；没有局长员司的勾引与护庇，工贼也不敢公然横行；因此，交通系的局长员司始终是你们最切近的死敌！

反革命的交通系局长员司，他们不但在反动势力之下帮助军阀压迫你们；并且在革命势力之下，即如在国民军、国民政府之下，他们也可以利用各种机会，想出各种阴谋，挑拨工人与政府间的感情冲突，无论是工人打击了政府，或是政府打击了工人，都是他们得意的事。

铁路工友们！你们对于最切近的死敌——交通系的局长员司，必须和对军阀同样的战斗，因为他们是军阀们最有力而且是最阴险狠毒的帮手。在国民政府、国民军统治之下，你们更须要求参加铁路管理权，不但要肃清交通系，并且要肃清败坏路政的一切贪官污吏，这是我们铁路工人应有的权利与义务。

全国各路的工友同志们！此时你们最切要的口号是：（一）发起秘密组织；（二）破坏军阀的战斗力；（三）肃清交通系。

原载《向导》第187期
署名：独秀

赤的运动与中国外交

(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

“民众革命潮高涨起来，便用口惠而实不至的政策来和缓一下；民众运动一低落，口惠马上变成假支票。”这本是一切帝国主义者对付殖民地半殖民地惯用的政策。

欧战后，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者发了一些不平之声，华盛顿会议遂在关税、法权上给了中国一点小小的口惠；然而华盛顿会议刚闭幕，他们便一概忘了。到了五卅运动，帝国主义者才把华盛顿会议所允许的小小口惠想起来了，才重新把这小小的口惠来和缓中国的民气；迨民气被奉、直军阀镇压下去，所谓关税会议，所谓法权调查，都丝毫没有结果。现在又来了：汉口“一三”事变以来，在全中国反英运动高潮中，英国帝国主义者又提出准备交还租界、准备交还海关、准备撤废治外法权等口惠，以和缓中国的民气了。我们敢说现在的民气，若仍旧为北方讨赤的军阀和南方取缔过激运动（东方社五日汉口电已有此消息，二月七日上海《时事新报》亦大书特书：“党政府严禁反英。”）的稳健派共同镇压下去，英国准备给我们的这些口惠，又必然终于是些口惠。英国人现在大叫中国国民党中稳健派和急进派不一致；又大叫和平的合法要求我们可以商量，若用暴力则我们不能屈服，这正是暗示稳健派出来为他们镇压反英的民气。只要反英的民气有人为他们镇压下去，和平的合法要求他们便易于对付了。

英外长张伯伦于一月二十九日在伯敏汉演说：“英国对华方针，自去岁关会开幕以前，即以改变当时英国惟一之愿望，……并已准备抛弃其特权……吾人早经感觉有修约之必要，并希望中国

统一政府早日成立，俾能开始修约交涉。……中国对于修约要求之原因有三端：（一）因外人领事裁判权；（二）关税束缚；（三）租界制度。英国对于上举三端，均愿予以变更。……但上述提议，不能使其立生效力，因中国尚在内乱之中。……吾人准备援助陈友仁及任何派之政治家，以政治家妥协之态度，解决一切悬案。”

我们现在可以回答张伯伦了：我们早已知道你们英国帝国主义者，自鸦片战争以来，即时刻准备抛弃特权，时刻准备修约，只可惜八十年来中国始终不曾有统一政府，年长日久，使你们的惟一愿望不觉忘了，只增加了好几次任意屠杀中国人的特权，更增加了辛丑条约，直到今日中国国民运动高涨起来，才将你们心中多年准备而又忘了的惟一愿望提醒了。可是此时中国尚在内乱之中，还没有统一政府，你们多年准备的好东西，仍然是不便拿出来；你们也知道仍然不便拿出来，所以要派海陆大军护送到中国。你们并且知道你们准备的这些东西会号召出来许多妥协的政治家和妥协的在野名流，一有了这些妥协的政治家与在野名流，你们准备送来的好东西，又不得不从半路上在印度洋乘原船送回伦敦，只好候梁启超所谓“片面的革命行动”高涨时再准备送来。那时候，在野名流梁启超所预备的“我们愿意用国际惯例上正当手续和双方最友谊最谅解的精神作平和的修改”这一桌欢迎酒席，只落得贵客不赏脸而大为扫兴！

梁启超所谓“聪明的英国人”，当然懂得这个；可是愚蠢的梁启超，至死也不会懂得这个，他实在不愿意懂得这个。

事实先生告诉我们：英国每次口中说：准备要送中国的一些好东西，都是因为中国有了“片面的革命行动”，都不是因为有了正当的手续和友谊的精神；采用正当手续和友谊精神的和平谈判而停止革命行动，反而只有使帝国主义者收回去他们口中所说准备要送我们的东西，去年北京的关税会议就是一例。

我们并不拒绝谈判，可是停止革命行动或减少革命行动，而希望友谊的和平谈判得点什么，便是上了帝国主义者的圈套，其结

果必一无所得！国民政府必须懂得这个！必须懂得抑制民众革命行动而以和平面孔取悦于外人，本是北京军阀官僚政府的外交秘诀，我们十分不忍看见真有“党政府严禁反英”！

上海《时事新报》公弼先生历数香港罢工封锁、党军控制长江流域、排英口号几遍域内、南方联俄、共产主义博得若干国人之同情、打倒帝国主义最鲜明之旗帜，都是英国变更外交政策之由来；这是他懂得梁启超所不曾懂得的。

在赤的运动起来给帝国主义以重大的打击以前，中国的外交是怎样？北京政府以前敢涉想废约吗？可是现在居然能够宣告废止比约了。关税会议得着了什么？可是现在居然独断的征收二五附税了。以前他们不是视收回租界运动为过激吗？可是现在也居然提议收回租界了。他们以前不是把安格联当太上老祖看待吗？可是现在也居然下令免他的职了。这不是受了赤的运动之赐是什么？不有赤，他们焉有今日，然而他们不思报德，仍然要勾结帝国主义来讨赤，他们真是“食毛践土没有天良”！

什么是赤的运动之目标，我们敢公告全中国人全世界人：以革命行动扫荡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之政治的经济的统治权力，没收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经济的侵略机关，归诸国有；具体的说，即是：撤退各国驻华海陆军，取消治外法权，收回租界及租借地，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自主权，取消庚子赔款及不正当的外债，取消外人之铁路、盐务、邮政管理权，没收外资的银行、矿山、铁路、航业、工厂及外人所购土地，归中国国有。必须这样，才算完成了民族革命。必须这样，我们才能够脱离外国之政治的经济的统治与侵略。必须这样，我们才能够建设独立的经济势力与文化。必须这样，我们才能够开始和一切平等相待的国家建立互利的经济合作。

谁不否认他是中国民族一分子，谁就应该拿出十分“赤忱”，加入这个赤的运动！

原载《向导》第187期 署名：独秀

讲容忍的国家主义者

(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

有人主张民众结合军事势力来革命，国家主义者则反对和一切军事势力结合；有人主张民众起来直接行动，国家主义者则又斥为“群众之盲动”、“与中国以莫大之危险而已”；既不要军事势力，又反对群众运动，那么，国家主义者外抗强权的办法是怎样呢？好！现在他们说出办法来了！他们在《对英问题国人应有之态度》一文里说：“暂时容忍英人对我之横暴，再一面督促政府整顿国防，……三年，五年，与英作一破斧沉舟之战。”我们对外容忍已经八十多年，今后三年、五年、十年，政府还未整顿国防，我们只好再继续容忍下去，只要我们能够容忍，什么天大的事都没有了。好极了！这就是国家主义者外抗强权的办法！

原载《向导》第187期 署名：实

曾琦与麦克唐纳尔

(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

英国对华出兵以来，欧洲各国(英国也在内)的工人及其政党——共产党，群起反对，中国的国家主义者装着没有听见；独有麦克唐纳尔的话，他们却听见了。吾人一向攻击的麦克唐纳尔，他本是世界的大工贼，他能够代表英国工人群众的意见吗？因为麦克唐纳尔的反对议论，便武断英国工人都是反动的，好比因为曾琦的反动议论，便武断中国青年都是反动的，这是何等滑稽的推论！

原载《向导》第187期 署名：实

国家主义者眼中的国家和政府之分

(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

从前有一个日本留学生,不知道从哪里拾得了“国家和朝廷有别”这句话,讥诮革命党人无知识,不懂得国家与朝廷之分,因为革命党人说明朝亡了是亡国。在这个留学生的意思,以为满洲入主中国,只是亡朝,并非亡国,大概必须把中国这块土地的人民沉到大海中才算是亡国。现在国家主义者也讥诮我们“看不出国家和政府之分”,他们以为中华民国这块招牌被北洋军阀负之而趋,“这是政治上的问题,并不是国家本身的问题。”不错,即使将来外国人完全管理了中国政府,也不过是政治上的问题,并不是国家本身的问题,因为外国人只拿住了中国政府,并未把中国沉到大海中,也未把中国搬到外国去。我们应该懂得国家和政府之分!

原载《向导》第187期 署名:实

国家主义者的国家与中华民国

(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

我们曾说:“自孙中山辞总统职一直到现在,只有中华袁国,中华段国,中华直奉国,而没有中华民国。那里有中华民国?”国家主义者因此说我们不要国家和否认中华民国。有人说这是国家主义者不懂国文之故,其实不然。国家主义者以为五色旗下的袁国、段国、直奉国,就是他们的国家,也就是他们的中华民国,现在忽然听见我们说还没有中华民国,他们自然要既惊且怒,并不是因为不懂国文之故。

原载《向导》第187期 署名:实

究竟是谁无祖国？

（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

马克斯的“工人无祖国”这句话有三个意义：一是说还没有一个国家是保护工人的祖国；二是说全世界工人阶级应该不分国界的联合起来；三是说各国工人不应该在“爱祖国”的名义之下为本国政府侵略别国，为本国资本家格外多做点牛马；并不是对强权的帝国主义者讲什么无祖国，讲什么打破国界的大同主义。我们也曾说：“以为抵抗压迫自谋生存而爱国，无论甚么思想高远的人也未必反对。”这也就是不对强权的帝国主义者讲大同讲无祖国的意思。实际上，五卅运动中，最为祖国牺牲的乃是无祖国的工人，而不是你们有祖国爱祖国的国家主义者，你们以为这是矛盾吗？以为这是自己打自己巴掌吗？如果是矛盾，恰恰和你们的矛盾相反。你们号召工人为本国资本家多做牛马时，你们赞成军阀政府侵略蒙古民族时，都大喊祖国；而在五卅奋斗中，你们便把祖国忘了；这就是你们的矛盾。究竟谁个矛盾是合理的，谁个矛盾是反动的呢？

原载《向导》第187期

署名：实

令人肉麻的国家主义者！

（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

国家主义者大骂我们妄倡无祖国，大骂我们不要国家，骂得雄纠纠的满腔热血几乎要喷将出来，像煞是个爱国的勇敢青年。不料当着英国对华出兵，祖国危急之时，这班满腔热血的勇敢青年，却不敢挺身为祖国奋斗，反而缩进龟头，主张“暂时容忍英人对我之横暴”。龟头既已缩进，一面还自夸是“用头颅和鲜血去抵抗压迫自谋生存而爱我祖国的爱国青年”！还自夸是“愿为祖国捐躯的国家主义者”！这班下作货，不但过去不曾为祖国流一滴血捐一只躯，即将来也不会有这回事。算了罢！龟头缩进去得了，天怪冷的，不用再说令人肉麻的话了！

原载《向导》第187期

署名：实

怎见得我们不要国家？

(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

绝对不要国家，这是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国家的态度，而不是共产党的态度。共产党对于国家的态度是：国家只是统治阶级用做控制被统治阶级之工具，前代封建贵族用他控制奴隶及农民，现代资产阶级他用控制无产阶级，将来无产阶级也要用他控制资产阶级，必须一切阶级消灭，国家这个制度才能够消灭。现在，我们正要建设民主的国家，更进而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国家主义骂我们不要国家，骂我们打破国界未免是无的放矢罢！我们奉劝国家主义者，于争夺教员位置及向官厅告密之余暇，略略读书，免得做文章时，笑话百出，令人齿冷；免得当教员时误人子弟，………！

原载《向导》第187期 署名：实

梁启超也佩服英人之忍耐！

(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

分明是英国水兵在汉口杀伤了十五个中国人，而英国报纸反称赞英国水兵能够忍耐，麦克唐纳尔也钦佩英国水兵能自制，最奇怪，有个中国人(?)梁启超，他也说：“我们不能不佩服英人之忍耐镇静。”大概他们都觉得被杀伤的中国人太少，英人若不自制、忍耐镇静，还应该多杀些。横暴的中国人，竟逼得忠厚可怜的英人这样忍耐！仅仅只杀伤了十五个中国人，这样忍耐镇静的英国人，真值得梁启超佩服！

原载《向导》第187期 署名：实

好高明的稳健派！

（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

有些稳健派的国民党员以为：“此时外面的对英交涉和对奉战争还不算什么迫切重大的事，内部的民众过激和共派活动，到是我们的切身之患，非压服下去不可。”我想别的急进党员可以回答他们说：“诚然！不但你们这样想，就是张作霖同志、孙传芳同志、章炳麟同志、蓝浦生同志、张伯伦同志，也是这样想，并且正要我们这样办！”好高明的稳健派

原载《向导》第187期

署名：实

谁对谁的宽大政策？

（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

外国人不远数万里来到中国通商，我们主人翁的中国人，待他们以宽大政策是可以的；然而外国帝国主义者往往扬言现以宽大政策对待中国人，仿佛已经是天恩高厚，这真是反了！

原载《向导》第187期

署名：实

北洋军阀“安”的成绩！

（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

袁世凯为要做皇帝而办筹“安”会；段祺瑞为要把握持政权而办“安”福俱乐部；现在张作霖为要做大总统除组织“安”国军外，还办了一个什么“安”国协会；说也奇怪，北洋军阀无论什么举动都不离一个“安”字！据安国协会成立通电，还要发刊“安”国日报，“以提倡士、农、工、商四‘安’主义……借宣传之力……为安国（军）之前驱。”其实奉军在北方各省所做“安”的成绩很多，似乎不必再借宣传之力了！

原载《向导》第187期 署名：实

英国不是帝国主义？

（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

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都曾不承认自己是军阀，那么中国便没有军阀了，或者老百姓是军阀！天下事无独有偶，现在英国海军大臣白里志曼也说英国不是帝国主义。他说：“英国在华帝国主义之呼声，乃一种愚妄而无意义之口号，直诬语耳。”英国以海陆军拥护在华一切不平等条约，拥护一切特权及权利；把持中国海关，以便尽量输入英国制品，廉价输出中国原料；占有中国的铁路、矿山、航路等一切经济命脉；在中国设立银行，发行纸币，操纵金融；并且利用中国廉贱劳动直接在中国设立工厂。这样还不是帝国主义，试问怎样才是帝国主义？

原载《向导》第187期 署名：实

无产阶级与民族运动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

国家主义者说：“共产党……以为……帝国主义之国家有其无产阶级同情于被压迫之中国人民，可以牵制其本国政府之行动，……此种思想又何殊于梦呓。……英工党领袖、前相麦克唐纳尔在工党机关报《前进报》论汉口案一文。……共产党人读此言论，不知能醒其迷梦否？”

毫无世界知识的中国国家主义者，他们一点也不知道现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已经到了什么状况，他们更不知道麦克唐纳尔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中居何地位，一见麦氏反动的言论，他们便大喊其各国无产阶级同情于被压迫之中国人民是共产党的梦呓。果然是梦呓么？请看下列事实。

电通社五日东京电：日本之劳动农民党发表对华声明书，将努力于国民政府之承认。

路透社六日伦敦电：英海军大臣白里志曼演说：工党在事不干己之中国内战中，择仇英之领袖而拥护之。

路透社六日伦敦电：英国全国工党联合行政会发起，在爱尔白特厅开要求对华和平之大会，到者甚众。

世界新闻社加拿大电：加拿大劳动党主席杜慕牟亚氏于一月二十六日声明：关于中国问题，加拿大劳动者愿与脱离被英国等榨取之中国为友，排斥英国之对华出兵，英国虽有劝诱加拿大出兵之形迹，而加拿大劳动党极力反对出兵云。

本社六日北京电：据伦敦报告，柯克(Cook，英国矿工会书记)提议成立“勿侵犯中国会”，并开会讨论援助中国问题。又奥斯

露消息，工人大会在该地举行，一致通过挪威工人与中国民族独立斗争休戚相关。又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生活》提议工人应为反对战争而奋斗，并在各城市成立“勿侵犯中国会”。世界新闻社墨尔本电：澳洲海员工会驻维多利亚分会已决定通告各会员，对于凡载兵或运军火至中国之船，一律罢工，不予驾驶。

国闻社七日汉口电：英工党复陈友仁电，极反对英舰来华。

电通社七日北京电：据伦敦电告，苏格兰独立工党机关报《前进》唤起群众反对英国在华政策。又德国共产党在柏林发起几次大会，决议对英国之武力干涉中国提出严重抗议。

路透社七日汉口电：陈友仁续接英国工党反对英国集兵中国之来电两通，一系伦敦全国工党联合行政会所发者，重行声明其已详于前电之态度，一系纽西伦惠灵吞工党发来者，赞同英国工党之地位。

电通社九日北京电：伦敦消息，上周内英伦工人举行百数十次大会，提出“和平对待中国”之口号，兰斯勃利（工党重要首领之一）在伦敦工人大会上宣称：“中国向英国无从让步，乃当然事；反之，中国则应向英国要求补赎其历年在华所作之罪案。”

路透社九日伦敦电：工党修正致英皇之答词，明日将由特莱夫良在下院提出，该修正文惋惜政府应付中国形势之迟缓，并指陈派兵远东之失望，谓不仅增在华各处英人之危险，且妨碍以爽直承认中国国家独立为根据与中国人民谋取平等与永久友好的谅解之进行，请下院促成立即之变计，而召回已在途开赴中国之军队。

这些事实，完全可以证明共产党所认为“帝国主义之国家有其无产阶级同情于被压迫之中国人民，可以牵制其本国政府之行动”，这件事并非梦呓；反而可以证明国家主义者认为各国工人都应爱其祖国，不能希望他们同情于中国民族运动，这才是梦呓。

国家主义者见了上述的这些事实，或者要大骂加拿大工人、澳

洲工人、纽西伦工人、苏格兰工人、英伦工人、英国工党，尤其是英国共产党不爱祖国！可是他们如果也要爱祖国，便不能同情于被压迫之中国人民了，中国国家主义者到底希望他们怎样？

英国若是一个被压迫的国家象中国这样，我们知道英国工人必不能躲在“工人无祖国”的名义之下，一任外国帝国主义宰制而不起来反抗，必不能象中国国家主义者那样提倡容忍。正因为英国也是一个侵略别人之帝国主义的国家，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是要不分国界的打破整个的帝国主义，所以英国工人遂不能站在“爱祖国”的名义之下，帮助本国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正因要打破整个的帝国主义，所以自然而然的要同情于任何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因此形成了整个的世界革命。在此世界革命运动中，一边是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一边是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因此形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及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反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可以做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当然不能和本国的及世界的无产阶级合作）之间相互的同情与援助；因此形成了每个国家的各种革命都是整个的世界革命运动之一部分。无论何国工人，如果他们不同情于被压迫的民族运动，便是不愿意参加打破帝国主义的世界；无论何国民族主义者，如果他们不同情于工人运动，如果他们反对阶级争斗，便是不愿意成就打破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

我这些话是对还在参加民族革命运动的人们说的，不是对国家主义者说的。中国的国家主义者，已经分明站在帝国主义和军阀那边，已经公然在上海法庭拿出孙传芳密令他们在小沙渡屠杀工人的公文，他们已经是反革命者，我们用不着对反革命者谈什么革命的理论！

原载《向导》第188期

署名：独秀

张作霖宣言之解剖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

张作霖最近也发表了一篇什么宣言，这个宣言中举出了他的政纲，如：

保持国家主权；
恢复秩序；
传播教育；
劳资合作；
扩张交通；
改良司法；
中央地方分权；
整理财政；
裁减冗员，限制军额；
巩固内外债。

这十件事。在这十件事以外，他还举出了两个总的政纲：一是发展民治，一是剿灭过激主义。

世界各国反革命者到了濒于破灭之时，或者他的势力不敌革命势力之时，往往发出一些空洞而好听的政治口号，藉以蒙蔽人心，挽救其颓势，和帝国主义者装出让步的态度，欺骗殖民地以和缓其民族革命运动，是同样的政策。现在张作霖的宣言就是这样。

张作霖这个宣言是谁替他做的，我们不必问。这个宣言，张作霖本人曾否躺在鸦片床上略略看过，我们也可以不问。我们只知道，张作霖究竟是个什么人和他的政治罪恶到了什么程度，这是中国人民人人都明白的，就是帝国主义者也未尝不清楚。

张作霖如何保持国家之主权，不但在过去他忠心服事日本可以证明，现在正当英国出兵威胁国民政府对汉口案谈判之时，张作霖也帮着出兵由河南向正在力争国家主权的国民政府进攻，这更显然可以证明张作霖保持国家主权之热忱。张作霖所谓恢复秩序，不用说是镇压革命运动。他的传播教育，恐怕越传播北京各国立学校越停闭的爽快。他所谓劳资合作，第一要紧是中国境内的外国各工厂各企业的中国工人不要罢工。他所谓扩张交通，想必就是指多扣火车轮船运兵。他所谓改良司法，想必就是指以军令在北京逮捕枪毙邵飘萍、林白水、刘汉臣、高三奎，在上海逮捕谢复生、王汉良这类事。他所谓中央地方分权，不用说是预备在北京失败了再回到奉天做关外王。他所谓整理财政，免不了要推行奉票与军用票。他所谓裁减冗员、限制军额，不用说是裁减奉系以外人员，限制奉系以外的军额。他所谓巩固内外债，内债不过是外债的陪衬罢了。

还亏他厚着脸说出“发展民治”这句话！不然！张作霖不但主张发展民治，他并且在此次宣言里说：“自民国肇始以后，国家主权已操诸国民之手！”袁世凯不曾大叫“主权在民”，于是代国民行使主权的元首所赏所罚都是民权民意，于是革命党乃成了侵犯国家主权违反民意之叛徒。国民到今天才知道，自民国元年到民国十六年，国家主权原来都操诸国民之手；自袁世凯到张作霖，都是这样继续发展民治！

张作霖此次宣言，人人都知道这是些废话；然而其中也有两句真心话，就是：巩固外债和剿灭过激主义。

张作霖宣言里说：“余之起兵，非仇抗任何党派，而专为剿灭过激主义，舍过激党外，皆有商量之余地。”

张作霖这句话，未免过于恭维过激党而令其他党派太难堪了！照他这句话，中国只有过激党是彻底的革命党，只有过激党和张作霖没有妥协商量之余地。事实未必如此，革命的国民党，除少数稳健分子外，那会和张作霖妥协商量；不但国民党，即其他一切

党派以至于不大与闻政治的商人，对于张作霖所最热中的最高问题，都有妥协商量之余地吗？舍过激党外，对张作霖的主人——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最热中的中国南北统治和中日互惠协定这两个问题，都有妥协商量之余地吗？

在张作霖方面，也并非舍过激党外不仇抗任何党派，就算北冯南蒋都是过激党，吴佩孚总不是过激党罢，为什么也要派重兵夺取河南，吴军已有两旅被奉军缴械，为什么吴佩孚屡次电阻奉军入豫，也竟无商量之余地呢？或者将来张作霖也会说吴佩孚、靳云鹗等有过激嫌疑，伶人刘汉臣、高三奎尚以赤化被杀，何况吴佩孚、靳云鹗！一切异己者，都不妨以过激党头衔加之！

等于废话的张作霖这篇宣言，他的宣言之目的，将丝毫不能达到。他所可恃的还是武力，若只望以政治宣传取胜，算是错打了主意，因为工人早已认识他，不必再要宣言。若只望拿宣言勾结某一部分人，增加他的声势，这也是枉然的事；因为谁和他勾结，谁就变成了反革命而失败。

原载《向导》第188期

署名：独秀

是谁愿与北方军阀妥协？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

北方军阀，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之经纪，是代表封建势力阻止中国进步之恶魔；南方革命政府的职任，是集合革命的势力，扫除军阀的势力，站在革命的民主的意义上统一全中国，而不是和军阀妥协来谋统一。和军阀妥协，便是间接和帝国主义妥协，名为一致对外，实是一致降外，军阀是永远不会和革命党合作一致对外的。佐分利说：“南北两政府……双方均不愿于军事上再将积极行动，其间或能发见妥协点，而形成统一亦未可知。”革命的民众们！留心看着！果有谁人敢经过日本帝国主义之拉拢，而与北方军阀妥协，以葬送革命！

原载《向导》第188期

署名：实

中立呢还是共管？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

上海是中国之领土，帝国主义的美国提议以上海为中立区，这是什么意思？试问谁对谁中立？各帝国主义者，一方面纷纷派遣海陆大军来上海驻扎，一致主张保持上海租界，决不放弃；一方面由美公使向中国建议：“划上海为特别区，超出南北漩涡之外。”这分明是主张“划上海归各国共管”，不是什么中立！上海市民所要的，是撤退各国海陆军及孙传芳军队的市民自治，而不是外国军警和孙传芳统治下的中立！

原载《向导》第188期 署名：实

奉天居然想勾结蒋介石！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

英日帝国主义者想勾结国民党中的稳健派和他们妥协以破坏革命运动，已非一日了！现在，更居然公开的想勾结蒋介石！杨宇霆说：“奉军决入豫，以牵制南军而图武汉，而驱逐靳云鹗及彭明通赤者；蒋介石若对于共产派加以彻底的压迫，则南北之妥协非不可能之事。”（见东方社十一日北京电）据这个说话，则奉天方面不独不仍旧指蒋介石是赤，且料 he 可以和北方军阀妥协，加入他们的讨赤运动；这是何等污辱蒋介石！我们且看蒋介石怎样在行动上回答杨宇霆这个提议！

原载《向导》第188期 署名：实

青天白日旗下反青天白日旗的分子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

有人说国民党新近改选的广东省党部，有个国家主义派的曾显浩居然当了选，如果真有这个事实，煞是希奇！反对青天白日旗的国家主义者，何以屈就青天白日旗下省党部委员？青天白日旗下的省党部，又何以容忍反对青天白日旗的国家主义者为省党部委员？不过又有人说这并不希奇，北京仕学馆式的学术院中，也有不少的国家主义者！

原载《向导》第188期

署名：实

中英人之见解不同如此！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

英国工党首领兰斯勃利说：“中国向英国无须让步，乃当然事；反之，中国则应向英国要求补贖其历年在华所作之罪案。”英国前国会议员施各德说：“予常反对英国据有香港，以为应当交还中国，华人强迫英人退出汉口租界，此乃其应有之权。今各国皆以罢工暴动等事，归咎于共产党，以英国在华势力之巩固，使华人处于极屈伏之地位，一切重要举动，皆非得英允许不可。”而中国的稳健分子，则以为汉口罢工及反英运动都是共产党破坏大局；中英人之见解不同如此！

原载《向导》第188期

署名：实

日本的如意算盘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

日本电通社曾传“中国南北妥协之机运渐呈浓厚之状，双方尝有代表往来，结局或将以稳健之孙文主义实现大同团结。”佐分利亦宣传南北两政府间或能发见妥协点。日本东方社一面电传杨宇霆谓：“蒋介石若对于共产派加以彻底的压迫，则南北之妥协非不可能之事”；一面电传“蒋介石及其他干部之取缔过激运动”。日本帝国主义者，想一手抓住北方，一手抓住南方，把整个的中国统一在他的势力之下的这种如意算盘，恐怕不容易实现罢！

原载《向导》第188期 署名：实

稳健分子悔祸投诚的机会到了！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二月十六日上海《新闻报》北京通信说：“故杨氏(杨宇霆)此来，只对全盘计划加以决定，……一俟豫省问题解决后，然后第二步提到对付武汉；不过将来南方如有悔祸之意，能对于赤化分子驱除，奉方亦不愿过为已甚。”好了！奉方杨大人开恩了！他老人家既然网开一面，恩准我们稳健分子悔祸投诚，我们赶快驱除赤化分子罢！否则他老人家动起怒来，一旦要“过为已甚”，我们岂不要和那些激烈的赤化分子玉石俱焚！

原载《向导》第189期 署名：实

共产党造谣惑众！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英国海军大臣白里志曼说英国不是帝国主义，安国政府的建国方案第二条是反对军阀……专政，照这样说起来，世界上原来没有什么帝国主义，中国原来也没有什么军阀，共产党所首倡的什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一概是造谣惑众，难怪北方的张作霖、杨宇霆都宣称要约同南方的稳健分子合起夥来驱除他们！

原载《向导》第189期

署名：实

不受抬举的唐生智！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电通社十四日北京电：“张作霖为促进南北妥协机运起见，……于适当时，对蒋介石提议妥协，其所欲提出之试验的妥协条件，北方由张作霖、孙传芳、阎锡山、张宗昌（何以没有吴大帅？），南方由蒋介石、唐生智、谭延闿、李济琛、冯玉祥等组织一举国的委员制度总揽全国政务。”恰当此时，却有一个不受抬举的唐生智，大叫什么“政权要归还革命民众”！（见上海《新闻报》十四日长沙电）

原载《向导》第189期

署名：实

宣讲呢，还是拍影戏？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上海《时事新报》有题名“宣讲队”的一段纪事，乃是形容何海鸣在上海为直鲁联军宣讲之成绩，兹照录如下：“一组的人，大约四五位，手执白竹布宣讲队小旗，警察看见了，赶忙招呼，说道：‘这里人多，可以演讲的。’宣讲员看了看，照相馆的人还没有来，又等了一刻，照相人来了，于是你咳嗽一声，我呵欠一声，你让我推，到了人都走开，队长慌了，自己拿了宣讲录（是不是《醒狮》周报？），很迟慢的跳上了讲台——借来的破板凳，曼声读了几句（无非是反赤反共产），有两个字认不得，只得丢开了不读。警察看见人太少了，不象场面，就到打铁店里、裁缝店里、木匠店、小烟纸店，施行临时拉夫主义，亦就团成薄薄的一个小圈。这时只听照相机拍的一响，队长就要往下跳，偏逢着一个铁店小开问道：‘你们拉了我们来听讲，怎么不讲呢？’队员旗子一摇，便走开了。警察道：‘他们原来是照相的。’”

原载《向导》第189期

署名：实

果然是共产党的梦呓与造谣吗？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国家主义者，不相信帝国主义国家内有些无产阶级同情于被压迫之中国人民，说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梦呓；偏偏英国工界却有“英国工人拥护中国自由协会”(The British Labour Council for Chinese Freedom)之组织。不独英日帝国主义者不承认他们自己是帝国主义，并且有些中国人也不相信世界上真有什么帝国主义，他们口里说时笔下写时，都只用“列强”这个名词，而不愿意用“帝国主义”，以为“帝国主义”这一名词，好象是中国共产党的造谣；偏偏最近各国名士竟在比京布鲁塞尔大开其“国际反帝国主义大会”(The International Anti-Imperialism Convention)。这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梦呓与造谣吗？

原载《向导》第189期

署名：实

外看强权内储国贼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主张外抗强权的国家主义者，对于英兵来上海示威不曾起来抗一抗，大概他们是主张外“看”强权罢！他们又曾说要内除国贼，可是大为孙馨帅、张雨帅所赏识，大概他们是内“储”国贼罢！

原载《向导》第189期

署名：实

三民主义信徒的双包案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戴季陶曾大喊“真正国民党”和“三民主义信徒”，现在《江南晚报》(邹鲁、张继、居正等西山会议派的机关报)也自称是“三民主义信徒”和“真正国民党”，而大骂戴季陶是鲍罗庭的走狗，是卖国卖党贼。他们究竟那个是“三民主义信徒”，那个是“真正国民党”呢？这种双包案我们实在断不清！

原载《向导》第189期

署名：实

答符琇（军事行动与民众运动）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日）

我们不是反对北伐，而是指出北伐的真正意义，即是说北伐要建设在民众的势力上面，北伐的军事行动中要兼顾到民众的利益。我们也不是反对军事行动，而是说军事行动要和民众运动结合并进，单纯的军事行动，不是唯一无二的方法。你以为军事行动是唯一无二的方法吗？如果你这样想，便是你的终身疑问，恕不能再为解答了！

独秀 三月二日

原载《向导》第191期

答王纯礼（革命军与工农群众及革命党）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日）

一个革命党要承认事实，创造事实，不可掩蔽事实，事实是不肯被人掩蔽的。你只须细细考察：现在是“以党治军”，还是“以军治党”？现在是“力助工人农民”，还是“力助商人压迫工人，力助地主、民团摧残农民”？你亲身在广东，应该看得清楚这些事实。你如果是一个革命分子，便应努力去掉这些反革命的事实，不应掩蔽这些事实。讳疾忌医，那才真是“有碍革命”哩！

独秀 三月二日

原载《向导》第191期

我们目前的奋斗

(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

我们要懂得目前的奋斗是什么，必须先懂得中国目前的状况是怎样。

一方面中国的革命运动日渐高涨起来，工人经济的政治的罢工普遍了各大城市；农民经济的政治的争斗，由珠江流域一直达到了黄河流域（河南、直隶、山东）；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军快要占住扬子江上下游全流域；全国思想界逐渐革命化了，至少也挂起了不反对革命的招牌。另一方面，英国帝国主义者增派一万人以上的兵力来向中国革命运动示威，意大利、美国都是英国的帮手；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付中国革命运动，比他国更是巧妙，他在表面不与英国合作，以和缓中国人对日之历史的恶感，而实际上则企图在经济上得到互惠协定以抵消关税自主，在政治上一手拿住奉天军阀，一手拿住国民党的右派即他们所谓稳健分子（日本帝国主义者拉拢右派的方法有二种：一是派一班浪人在上海和西山会议派的老民党，合办一个《江南晚报》，鼓吹反赤；一是派佐分利等一班官僚奔走广东、江西，勾结右倾的军事领袖，使之离开苏俄，排除急进分子的左派及共派，压迫工农运动。），使他们俩见面可结婚，实现南北妥协，以根本消灭中国的革命运动。直系军阀可算是已经完全破灭，其余残余部分不归奉即归国民政府，决不能独立存在了；剩下的奉鲁军，正在河南、江苏向革命势力作困兽之斗。奉系军阀也感觉得自己危险，于是他们在日本帝国主义指挥之下，一面出兵讨赤，一面由杨宇霆、梁士诒、赵欣伯等放出可以和南方妥协的空气，向国民党右派吊膀子，企图软化右派，使右派帮他们讨赤，

以达其对南各个击破之计。

中国目前的状况就是这样，就是中国渐次高涨的革命势力，已经到了和帝国主义军阀决死战的时期。在这决死战的时期中，不独反革命分子急得张牙舞爪的乱跳，如西山会议派及其他老民党帮着帝国主义及军阀大喊反赤；即自称革命而实际上不能始终忠于革命分子，受了反革命之诱惑，也渐渐暴露他们的真面目，想和反革命妥协。并且将来革命越向前发展，反革命势力越感觉得自身临危，越发要拿出反对急进派的口号勾结国民党右派以及资产阶级知识阶级所有的右倾分子，向革命派进攻，以自救其灭亡。

所以中国革命者目前的奋斗，不但要反抗帝国主义，不但要歼灭军阀，并且要严厉的打击想和帝国主义及军阀妥协的一切右倾势力，必须打击得他们没有力量能够扶起垂危的反革命势力。

“一三”汉口事件，正因为是在汉口革命的领袖和革命的民众能够合力坚持，帝国主义勾结妥协分子为己助之阴谋未得着实现的机会，所以得到了相当的胜利。

上海的革命运动将来又是怎样呢？孙传芳的势力，可以说是完了；鲁军自徐州到上海，战线长至一千余里，不但上海不易制胜，并且徐州、南京、苏州、常州，都有受攻的可能，这几处有一处被攻破，鲁军便全体瓦解。最后和中国革命民众作对的，还是帝国主义，尤其是英日两个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对付中国革命民众，不但用武力直接压迫，并且还要勾结国民党的右派、资产阶级、知识阶级的妥协分子及一切反动的绅士，向革命民众进攻，逼迫民众向帝国主义屈服，这是很可能的事。

上海的运动要得到胜利，也须和汉口一样，革命的领袖与革命的民众，始终合力坚持，不但不可受右派的离间与恐吓，而且还要合力打击右派，不妥协的和帝国主义决死战！数十万里夫民族尚能力抗法西斯帝国主义大军至一年之久，岂有二百余万上海市民反不能力抗英日两帝国主义之理！只有决死战能得着胜利，妥协就是失败。从今天起，反抗鲁军拉夫，拒绝鲁军军用票，停纳一切捐

税，总同盟罢工罢市，夺取武装，响应国民革命的北伐军，一直到建立民选的市政府——工商学兵等市民代表会议的政府，撤退各国海陆军，收回租界。这便是我们目前的奋斗！

奋斗胜利的保障，只有革命的领袖和革命的民众合力坚持，而不为右倾分子的妥协政策所动摇所恐吓！

原载《向导》第190期

署名：独秀

国民党党内纠纷与中国革命

(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

革命运动中不可没有革命党，这是稍有常识的人所不能否认的。因为革命党人是革命的群众中革命意志最坚决的分子，革命党就是这些坚决分子代表民众利益而奋斗的集合体；革命运动中，若没有革命意志坚决的党（一个或数个）站在领导地位，领导民众，为民众利益而奋斗，则革命运动是不容易获得最后胜利的。

中国国民党在中国革命运动的地位，是人人都能够认识的。自兴中会一直到现在，三十余年来的中国革命历史，都是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党为主要动力，虽然在党的发展过程中，发生了不少的党内纠纷，不少变节的领袖，离开了党，违背了革命，而另图结合与活动，而革命分子仍然在新陈代谢的现象之下，团结了整个的革命的国民党，领导革命，发展革命。

此次所谓国民党党内的纠纷，也是不可否认的一件事。党内的纠纷，在各国任何大的革命党中都不能避免。非革命原则上的个人感情利害之纠纷，我们固然应该反对，应该极力避免；而由革命原则上发生的意见纠纷，不但不能避免，且不应避免，有时还是万分需要。我们反对非革命原则上的党内纠纷，同时也反对不顾革命原则的党内和平；不顾革命原则的党内妥协和平之断送革命，和不顾革命原则的党外妥协和平是一样，我们都应该不妥协的加以反对。一个党没有革命行动，党内永远不会有什么纠纷，革命原则上的党内纠纷，几乎和党的发展有同等意义。罗拔斯比为什么反对罗兰夫人，多数派为什么反对少数派，孙中山派为什么反对黄兴派与联治派，俄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什么连伟大领袖杜洛斯基

和季诺维埃夫也要反对？这都是因为站在革命原则上，不能够避免党内纠纷，不能够顾及党内和平，其结果党及革命都由纠纷争斗而发展了。所以此时国民党党内纠纷，在落后分子的眼光看来，是恐怖的是悲观的；在革命分子的眼光看来，是应有的是乐观的，是进步的现象。

最近我们见到国民党的一种印刷品，题名《党务宣传要点》，颇足表现党内纠纷在革命原则上的意义，兹录原文于下：

“党的意志是大多数党员的意志。要使党尽其作用，第一，须使这意志随时自由的表现出来；第二，更要拥护党的机关，依照党的意志，能去切实的无障碍的执行。尤其在现在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决斗，党内党外危机四伏的时候，更要防止特殊势力阻碍党的意志的表现与执行。所有党员，更须严重监督，遏抑一切黑暗的党外或党内的违反全党利益的企图，须使个人的意志与活动，完全屈伏于党的意志与活动之下。如此，党的权威，才能树立起来，一切权力，才能归党掌握。所以

(一) 巩固党的权威——一切权力属于党，是目前党的第一个标语。表现党的意志与执行党的意志的最高机关，是中央执行委员会。除去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外，决不可有第二个最高指导机关。如果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外，再有第二个与中央执行委员会权力相等以至于权力冲突的机关，那便是党的莫大的危险，所以

(二) 统一党的指导机关——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是现在最迫切的要求。党的指导机关不能统一，势必造成多头的政治与派别的对峙，而一切反动势力，必将乘间而起，利用党内的矛盾，勾结操纵；同时，一部份党员的活动，必完全受封建思想的支配。封建思想在党员头脑中潜滋暗长，不即加以纠正，必定演成个人独裁，以亲戚故旧同乡同学等等的关系结党营私的弊害。所以党员离开了党的正式指导机关作个人的政治活动，便可以有反革命的倾向。惟统一党的指导机关，使党内每

个人都要绝对服从由本党全国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才是

(三)实现民主政治，扫除封建势力的保障。复次，欲使党的工作，进行顺利，更须使为全党所信任的领袖们，一齐出来领导。自从去年春天，直到现在，海内外各级党部，同声一致的要求汪精卫同志销假复职，可是汪同志仍是没有回来。我们不能不追问汪同志之不能销假复职，是否因有使其不能销假复职的障碍。如果有这种障碍存在，我们全体党员便不能不大家起来消除这种障碍，以贯彻几个月以来全体党员

(四)促汪精卫同志销假复职的要求。我们更要知道，几个月以来，军事虽然发展，党务政治，反形退步，旧有的新生的问题，千端百绪，只因党的最高机关，权威不振，所以都没有系统的根本的解决方法。所以我们必须要求

(五)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解决一切问题，这是目前不容稍缓的。我们同时要要求中央的全体委员，根据革命的利益，充分的行使代表大会所赋予的职权，不受任何特殊势力的拘束。我们更要求中央全体委员，对于党内一切昏庸老朽的反动份子，以及相与勾结的官僚市侩，彻底肃清，防止他们乘机作恶危害本党，我们要用

(六)打倒西山会议派的精神，对待一切党内的昏庸老朽的反动份子，然后才能铲除党外的危害本党的官僚市侩。”

这一宣传要点里所说：“遏抑一切黑暗的党外或党内的违反全党利益的企图。”“实现民主政治，扫除封建势力的保障。”“要用打倒西山会议派的精神，对待一切党内的昏庸老朽的反动分子，然后才能铲除党外的危害本党的官僚市侩。”据这些说话，当然已经表现党内的纠纷是有革命原则上意义的，决不是什么个人间的感情利害冲突。可是这些说话还嫌不够，至少也觉得含混了一点，未曾明显的具体的指出目前革命原则上的要点。目前革命原则上的要点：一是党内所谓稳健分子，亦即接受了西山会议理论的分

和党外的黑暗势力——奉天军阀及帝国主义尤其是帝国主义的日本妥协的倾向；二是反工农运动的事实日渐增长，而一般投机分子甚至于反革命分子却如潮涌入，在国民党内组织他们的小团体，占据地盘，并且有计划的向革命分子或明或暗的进攻。这两件事，只要有一件继续发展而不加以纠正，都足以断送国民党的政治生命，断送中国的革命运动。国民党是中国革命运动之主要动力，断送了国民党的政治生命，便是中国革命运动之重大的打击。孙中山先生若避免党内的纠纷，若以妥协的态度保全党内的和平，而不坚决的反对黄兴派，反对联治派，反对冯自由派，左派领袖们若不坚决的反对勾结段祺瑞的同志俱乐部派和西山会议派，试问国民党的政治生命今天是怎样，中国的革命运动今天又是怎样？

所以为中国革命运动向前发展计，为国民党的政治生命计，国民党内革命分子站在革命原则上和右派冲突，这是必要的；我们不应该取非革命的和事老态度，责以避免党内纠纷，在事实上帮助国民党内反革命的势力之继长增高！

原载《向导》第190期

署名：独秀

西山会议派连资产阶级还不如！

（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

从前有人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谢持气的了不得，以为这是侮辱国民党。可是现在西山会议派的张继，竟在此次上海总罢工中去访问虞和德，商量合作，而以杀工人杀共产党为合作条件，虞和德大不赞成，张继算是白撞了一头包，可见这班右派，连资产阶级还不如！

原载《向导》第190期

署名：实

党 皇 帝

（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

从前因为共产分子加入了国民党，国民党右派大呼“亡党”。现在国民党北伐胜利了，右派又大呼“党皇帝”，讥诮党皇帝满街走，斥责党政府太专制（见张继做的《江南晚报》发刊词）。试问党既然亡了，如何还有专制的党皇帝呢？

原载《向导》第190期

署名：实

西山会议派打倒了吗？

（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

国民党《党务宣传要点》上说：“我们要用打倒西山会议派的精神，对待一切党内的昏庸老朽的反动分子。”其实西山会议派何尝打倒，他们不但在国民党外伙同日本人在上海办一个《江南晚报》大骂党皇帝；在国民党内，从前号称左派分子，现在居然接受了西山会议的理论反俄、反共、反工农运动的人要有多少？

原载《向导》第190期

署名：实

反革命当然攻击革命

（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

有人以为帝国主义及军阀为害中国如此之烈，为什么国家主义派的《醒狮》周报和西山会议派的《江南晚报》，都异口同声的大喊反俄反共，而对于英兵压境和奉鲁军南下却一声不响？我以为这是当然的事。

反革命者只有攻击革命，那有攻击他们友军的道理！

原载《向导》第190期

署名：实

西山会议派连安福派还不如！

（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

顷见安福派的机关报天津《大公报》评上海总罢工说：“所堪骇愤者，孙传芳官吏，竟在华界大事杀戮，闻竟有数十人或百人之多，致群情惶骇，居民纷徙，使上海成为恐怖状态。夫运动罢工，纵认为妨害治安，拘之可已，工人手无寸铁，不犯刑事，奈何以盗匪视之，倒行逆施，于此为极！”照这样看起来，西山会议派对于此次上海总罢工态度，连安福派还不如！

原载《向导》第190期

署名：实

投机商人—— 国民党主席——蒋介石的左右

（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

二月二十六日东方社汉口电：“此间国民党要人排斥张静江之声甚高；其理由，因张为蒋介石之左近，诸事多为把持故也。”二十七日电通社汉口电：“汉口国民党干部之间，一般反对张静江之声浪，渐高唱入云；其理由，以张在蒋介石左右，多有专制行为也。”张静江以假古董和投机商人，一跃而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人们本来莫测高深；不过已经是一位堂堂的全党主席，国民党干部为何又说他是蒋介石的左右呢？

原载《向导》第190期 署名：实

蒋介石能和张作霖政见相同吗？

（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

三月一日上海《商报》十六日北京通信称奉系红人赵欣伯（著名的亲日派）关于南北妥协谈话如下：“现在南北两方并无感情之冲突，除共产主义而外，政见相同之处甚多，如欲合作，确有可能之性质，只须南方放弃共产主义，北方未尝不可与之合作。即在蒋中正方面，亦尝间接示意北方，极力辨明南方确非赤化；并谓近来对于共产运动，抑制甚力，决不令其蔓延，察其语意，似亦愿与北方合作。”中国何处有了共产运动，真是活见鬼！除共产主义而外，蒋介石能和张作霖政见相同吗？除共产主义而外，张作霖真能赞同孙中山的国民党主义吗？这又都是活见鬼！蒋介石是一个有革命历史的人，他自称是中山先生的唯一信徒，他那肯忍心忘了中山先生临终之言，为军阀所软化而不继续革命？如果蒋介石肯软化，也只是他自杀，无所谓与北方合作！

原载《向导》第190期

署名：实

苏俄何尝有什么“党化教育”！

（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

自从胡适之发表了称赞苏俄教育的几封信以后，便有徐志摩和瞿菊农一班人极力反对苏俄的党化教育，又有张象鼎一班人极力赞成党化教育。其实两方面都是闭着眼睛瞎说。苏俄共产党，只有在党内对所有党员的教育与训练，厉行布尔什维克化；对于党外一般教育，并没有什么“党化教育”这样丑陋的计划和这样丑陋的名词。至于党员在学校中，在一切民众中，为党努力宣传，和苏维埃国家教育设施乃是两件事。

原载《向导》第190期

署名：实

工友为什么只反对联军 不反对党军？

(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

有些反革命者，往往说帝国主义与军阀固然应该反对，同时也应该反对苏俄与中国共产党；可是他们的宣传内容上，只是长篇大论的反对苏俄与共产党，却从来没有一字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而且和帝国主义与军阀一样的论调反对苏俄与共产党。最近上海总罢工中，上海《新申报》(孙传芳的机关报)所登载的什么全国工人反赤同志会告上海罢工工友一文，便是一例。在这一文里，不但极口谩骂苏俄与共产党而将帝国主义与军阀轻轻放过，并且说：“工友只反对联军，不反对党军，岂不又受了共产党的利用！”又说：“联军驻兵上海就要攻击，党军进逼上海，也应当攻击呀！”试问这是替谁说话？当真有什么全国工人反赤同志会吗？不过是孙传芳同志所雇用的《新申报》主笔几只同志罢了。哈哈！

原载《向导》第190期

署名：实

孙中山先生逝世二周年 纪念中之悲愤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

中国伟大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逝世已经整整二个周年了，我们横览时局，复回忆中山先生的生平，因此我们现在的悲伤，沉痛的悲伤，比中山先生逝世时尤甚，不但是悲伤，而且是悲愤！

在今年一月二十一日列宁逝世第三周年纪念中，已经令我们联想到中山先生逝世之第二周年，联想到中山先生对于中国革命之遗言与政策和中国革命之前途。

不错，中山先生逝世后，中国革命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最重要的如“五卅”运动和国民革命军之北伐。可是现在去国民革命之完成，前途还甚辽远，革命运动正需急转直下向前发展，以完成中山先生未竟之业；而有些革命意志薄弱的稳健派，自命为不左不右的革命领袖，竟因恐惧中国革命的向前发展，而抛弃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革命政策及遗嘱遗言，而停止革命。这岂不是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中最堪悲愤的一件事？！

国民革命军事发展及胜利之最大原因，基于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这是无人能够否认的。国民革命之主力——黄埔军，是怎样产生的呢？若没苏俄之援助与共派努力扶助，焉有今日！在东江南路战争中，在北伐战争中，共派军人力战伤亡者几人，孙文主义学会军人力战伤亡者几人，军事当局应该知道；共派号召民众援助国民政府援助国民革命军之宣传与工作，当局也应该知道。国民革命军自从削平陈、林、刘、杨以至湘、鄂、赣、浙诸战争无一处不因有工农民众之援助而获得胜利，几乎每个国民

革命军将领都懂得这个，并且有些军事领袖公开的说：此次北伐全靠农民之帮助才得到胜利；即帝国主义者也懂得这个。日本《报知新闻》《论币原外相之对华方针》，谓：“以受多数民众之援助而论，武昌实优于北京，此际不应故意非难南方，以伤武昌政府之感情。”帝国主义者尤其是日本及奉、直军阀，他们都懂得这个，都懂得国民革命军之所以这样强盛，这样胜利，乃是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结果，因此他们（帝国主义及军阀）要破坏中国南方革命势力以自救其危亡，只有勾结南方的所谓稳健派，劝他们离开苏俄，劝他们驱逐共产党，劝他们抑制工农阶级，以此为南北妥协合作的条件。好聪明的帝国主义与军阀，他们知道南方的稳健派若接受他们的条件，实行抛弃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南方的革命势力便离散了，他们（帝国主义及军阀）统治中国之地位便重新巩固了。南方的稳健派已经在事实上表示接受这样的条件，那里是什么南北妥协合作，简直是向黑暗势力投降，这样还算什么革命领袖，还算什么中山先生的信徒！

现在不左不右的稳健派，所持反俄理由是：苏俄是强国决不能以平等待我；并且诬蔑中山先生当时联俄不过是暂时利用。他们所持反共理由是：共产党党员排挤压迫国民党党员。他们反工农运动理由是：工农运动太过火了，工人、农民变成压迫资本家、地主的阶级了。他们不但拿这些绝对不合事实的理由来掩饰他们违背中山先生革命政策之罪，他们当中还有人更坦白的说：中山先生的政策本来不能用。中山先生逝世才两年，便有人暗中取消他的政策或更明白的说他的政策不能用，这怎不令人悲愤？！

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实现国民会议，也是中山先生遗嘱之要点；可是自从中山先生逝世一直到现在，虽然每逢开会必读遗嘱，而遗嘱中之要点却无人记在心中，慢说是实力奉行了，这样的读遗嘱，和牧师诵经祈祷宗教仪式何异？以“绝对保护外人”代替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黄郛、龚德柏等再得势，便会进一步宣传“外崇国信”！省民会议、县民会议、市民会议、乡民会议同国民会议是一件

事，现在居然有人以为鼓吹国民会议并主张根据中山先生的国民会议组织法成立省民会议、市民会议、县民会议、乡民会议，是共产党造反，是侵犯了省党部、县党部的职权，是违背了中山先生军政时期、训政时期的方略。他们忘记了国民会议的组织法是中山先生的主张，他们又忘记了中山先生并未曾以为国民会议侵犯中央党部的职权；他们更忘记了中山先生军政、训政的主张是方法不是目的。若拘执方法为目的，则三民主义中之民权主义作何解释？

“我死之后，我们政治的敌人，定要设法软化你们。你们如今不受软化还要继续革命，他们一定要杀害你们。”这是中山先生临终最沉痛的最后遗言，应该每个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都不会忘记！可是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奉天军阀想勾引稳健派使之软化的呼声非常之高，被勾引的人不但没有一字声明，日本帝国主义的通信社且称南北两方时有信使往还，并且具体指出李石曾是被派为与奉方接洽的代表，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奉天军阀不正是此时革命北伐的对象吗？倘若这班稳健分子终于被奉天军阀软化了，中山有知，能毋痛哭！

全中国革命的民众们！全国国民党忠于革命的同志们！中国的革命是终于要循着进化的历史向前发展的，全国民众革命的高潮，也必不会因少数人妥协软化而中止而低落的，少数人妥协软化，只是他们自己随着黄兴派、政学会、联治派、西山会议派的覆辙而落伍，真正革命分子是不会跟着他们停止前进的，历史更是不会跟着他们停止前进的。凡是革命分子，都应该坚决的继续遵守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遗嘱与遗言，撇开一切妥协软化分子而勇猛前进。必须是这样，才有脸面来纪念中山先生，才真是纪念中山先生，否则中山先生也未必愿意人们假意纪念他！

原载《向导》第191期

署名：独秀

溥泉溥泉，你到底是一个什么人？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

我的老友张溥泉，当初本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活泼少年，加入革命同盟会后，改名张继。参议院议长时代的张继，也还是一个热忱的革命者。再游欧洲回来的张继，还力倡民族革命，并且同情工人运动，他亲自对我说：“我们现在不能为中产阶级革命了。”国民党改组后的张继，才开始开倒车；然而还主张联俄革命，并责备苏俄为什么不派遣红军来助中国革命。西山会议后的张继，便正式反动起来了；一直到最近，竟赞成杀工人，竟伙同邹鲁等办《江南晚报》反俄反共。三月五日上海各报载：国民党右派中坚张溥泉，因时局关系于昨日离沪。他自己也登报自称中国无他立足之地，从此出国远游，不问政治；听说是因为和邹鲁、居正又有了冲突。他半生历史变化若此，到底是一个什么人？当年的革命精神又哪里去了？

原载《向导》第191期

署名：实

军阀为什么怕纠葛？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

英兵大批开到上海租界以外之地驻扎，孙传芳的防守司令不敢哼一声，反而严令阻止兵士携械误入租界，以免纠葛。同时，孙传芳、张宗昌却在南京扣留苏俄轮船，逮捕苏俄人民，这难道不怕纠葛吗？军阀的心理，必须各国武力在中国始图避免纠葛，人民心理则正相反。

原载《向导》第191期

署名：实

津汉情形的确不同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

北京政府对英谈判天津租界应照汉口办法交还，英使谓津、汉情形不同，不能照汉案协定办理。所谓津、汉情形不同，不用说一方面是所谓以外交手腕和平的友谊的合法的谈判，不用暴力，一方面是所谓片面的革命行动，津、汉情形的确不同！

原载《向导》第191期

署名：实

个人的军事独裁之榜样！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

云南军界讨唐继尧的通电说：“生杀任免，惟凭喜怒，用人行政，漫无是非，省务会议，虚有其名，僥论忠言，无由上达，令出独裁，势同专制，主权在民，纯饰虚声，当今之世，首领顺应民众，以谋公共幸福，其道必昌，首领操纵民众，以图少数便利，其道必亡。”其实个人独裁的军人都是如此，岂止唐继尧一人！

原载《向导》第191期

署名：实

全部党军都能够接受张作霖 吴佩孚的提议吗？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

三月八日上海各报载：张作霖与人谈时局，谓南征在防赤，南方必有自觉之日，收回主权不应用暴力，党军苟驱逐左派，予将抒诚与图统一。又传吴佩孚与南方合作，以驱逐共产党及恢复陈嘉谟、刘玉春自由为条件。大家不必惊讶张作霖、吴佩孚何以看出党军之非赤，在广东在江西，都确有许多反赤的事实；然而张作霖、吴佩孚也勿轻视全部党军都能够接受他们的提议！

原载《向导》第191期

署名：实

于中国实际政治有经验者是谁？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

东方社东京九日电：“今日《报知新闻》论蒋介石与共产党之轩轧，谓于蒋氏北伐之动机及思想的倾向观之，氏与共产党不相容，殆无疑义。蒋氏最近优待黄郛、王正廷等，渐渐听从于中国实际政治有经验者之言……。”试问黄郛、王正廷与共产党，谁是革命的呢？所谓于中国实际政治有经验者又是谁呢？

原载《向导》第191期

署名：实

我即党与朕即国家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

凡是一个民主主义党的领袖或民主主义政府的领袖，对民众发表意见，照例都称我们，决不称我，这是表示非个人专政的意思。若说我主张如何如何，反对如何如何，时常“我”呀“我”的大喊，这在党便是表示“我即党”，在政府便是表示“朕即国家”，这些口气乃是个人独裁性之自然流露！

原载《向导》第191期

署名：实

日本人诬蔑中国革命 领袖一至于此！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

三月七日《顺天时报》说：“蒋介石……现已与国民党旧人及中立各派密商反赤，即以反赤名义与北方携手……蒋之联北计划，现正积极，已倩人提出条件，惟其内容现尚不能宣布。”蒋介石自称是中国革命的领袖，日本帝国主义的机关报诬蔑他倩人向北方军阀提出条件携手反赤，如此吴、张、孙、蒋成了一家，还革什么命！

原载《向导》第191期

署名：实

评蒋介石三月七日之演讲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

我们对于蒋介石总司令三月七日在南昌总部之演讲，有佩服的地方，也有怀疑的地方。

佩服的地方是：他毅然承认“现在我们国民政府同中央党部已经迁到了武汉。”从此政权统一，民众不至感觉于武汉国民政府之外还另有一国民政府而莫名其妙，军阀亦无法利用革命政权不统一而企图操纵；从此党权统一，所有国民党党员不至于感觉得有武昌、南昌两个中央党部而无所适从了。这两件事，都于国民革命之进行，非常有益。

怀疑的地方是：他此次讲演，虽然对于放弃联俄政策和南北妥协这两个流言有所声辩，可惜他声辩的内容反证明了这些流言至少一半是事实。

“凡是以平等待我的国家，我们都可以和他们联合”，这只是我们一般的外交原则；中山先生的联俄政策，却根本不是这样。中山先生联俄政策之根本精神有二：（一）是要效法俄国式的革命，这句话中山先生不但在公开的演讲中说过，给蒋介石私人的信中也说过；（二）是相信“自欧战以后，俄国人自己推翻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的国家，变成新社会主义的国家，……把从前用武力的旧政策，改成用和平的新政策；这种新政府，不但是没有侵略各国的野心，并且抑强扶弱，主持公道。……俄国革命以后，斯拉夫民族生出了甚么思想呢？他们主张抑强扶弱，压富济贫，是专为世界上伸张公道打不平的。土耳其在欧战之前，最贫最弱……各国更想把他瓜分，土耳其几乎不能自存，后来俄国出来，打不平，助他赶走希腊，

修正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到了现在,土耳其虽然不能成世界上的头等强国,但是已经成了欧洲的二三等国;这是靠甚么力量呢?是全靠俄国人的帮助。由此推论出来,将来的趋势,一定是无论那一个民族或那一个国家,只要被压迫的或委曲的,必联合一致去抵抗强权。”(见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第一讲。)中山先生毫无疑问的肯定了俄国已经不是有侵略各国野心的帝国主义者,并且肯定了俄国能够抑强扶助弱者,自强起来也全靠俄国人的帮助。实际上中国革命军得到俄国人的实力帮助,决非一般国际关系上什么平等待遇所能有之事,这件事蒋介石应该比国民党任何军事领袖都知道清楚。中山先生的联俄政策是建筑在上列两个根本精神上,是以革命同志的精神而联俄,是以革命民族联合的精神而联俄,决不单是建筑在一般国际关系上什么平等待遇上。

可是蒋介石现在说:“为什么要联合苏俄,就是苏俄能以平等待我中国,……不仅日本,无论那一国,如其放弃帝国主义政策,能以平等待我中国的时候,那末,我们对他们,如同对苏俄一个样子,未始不可以联合的。……我们联合苏俄为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完全立在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意义上头,所以就要联合苏俄;若苏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象别个帝国主义一样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象反对帝国主义一样的反对他们。”这些说话,若出诸普通商民之口,不但不算说错,而且很公道;国民党军事领袖说出这样的话,在革命政策的立场看来,分明是把中山先生的联俄精神根本放弃了!因为他这些说话之根本态度是把苏俄看做其他强大国家一样,不曾肯定的把他看做是革命同志,不曾坚决的把他看做是革命民族。

西山会议派之反对联俄,人所共知;然而他们也不是明言放弃中山先生的联俄政策,也是说:“吾人尝以‘平等待我’为民族间之量尺矣,凡言行一致,合乎此量尺者皆吾友,否则不惟非友,甚至为仇。”又说:“吾人于此绝不贸然将苏俄列诸其他帝国主义之林,一反联俄政策;亦绝非盲目的以苏俄之言动皆善,而违反联俄政策之

本义。”(均见西山会议派上海大会宣言)蒋介石的说话,与他们的见解何异?他们同样不认识苏俄是革命同志是革命民族,把他和别的强大国家一样看待,今天说:“只要联俄以平等待我,我们对总理联俄政策无论如何不能更动的。”明天便会附会一二不平等待我之口实而更动了!所以东方社十六日九江电称蒋介石最近在南昌演说,曾明言“俄国如以不平等对付吾人,则我等自有对之之道也。”报载蒋之演讲词中虽未明见此语,而奔走撮合南北妥协之日本帝国主义者自然能够察知其弦外之音。

蒋说:“我们联合苏俄,并不是联合苏俄一个代表,我们是联合苏俄全体的人民。”可是张作霖逼走加拉罕,又何尝不是说只是反对加拉罕个人而不是反对苏俄全体的人民。

所谓“全体人民”只是一个抽象名词,并不是一个具体的表现,所以人们往往欺负他不能够具体的站出来说话,可以任意利用他。国家主义派主张全民革命,便等于不革命。英帝国主义派兵到中国,也是说合乎中国全体人民的愿望。苏俄全体人民不能通同来到中国帮助中国革命,除了政府的代表或党的代表,更有何种形式可以表现实际的联合呢?

如果苏俄代表真有压迫国民党领袖或侮辱国民党的行动,不但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会起来反对(何以最近党中央全体会议并未曾提及此事,只有蒋一个人感觉着?)即中国共产党亦应该向代表严重警告,甚至于请求苏俄另换代表。若仅仅是因为苏俄代表主张汪精卫复职,若仅仅是因为苏俄代表在国民党的宴席上劝告勿抑制工农运动,便以为是压迫国民党领袖和侮辱国民党,则压迫国民党领袖侮辱国民党者还有百数十万国民党党员和广大的民众,不只是苏俄代表。

北方的张总司令方宣称因苏俄代表辅助国民党而逮捕其家属,南方的蒋总司令则宣称苏俄代表侮辱国民党而欲加以驱逐,所持理由虽不同,而反对苏俄之事实则同,此或即佐分利所谓“发见南北妥协点”,赵欣伯所谓“南北政策相同”之一!

复次，南北妥协共同反赤之说，自正月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各报一致喧传，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通信社——东方社与电通社，几乎每日都有此类消息，东京北京的日本报纸更是言之凿凿，难道蒋总司令都一向不曾知道，何以对于自身关系之事截至本月十二中山先生纪念日告黄埔学校同志书中，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通信社及报纸之宣传都无一字声辩？一则曰：“在武汉的党员还要造出这种谣言”，再则曰：“他们在武汉的却天天制造谣言”，其于告黄埔同志书中亦说是“造谣煽惑”、“后方捣乱”，并谓：“若中正坚持革命不肯放弃一日，则中伤者之作用亦将一日不止。”又谓：“彼挑拨是非之徒，意在破坏国民革命军。”其实，如果是谣言，如果是中伤，则造谣煽惑、中伤捣乱以图破坏国民革命者，不是在武汉的党员，而正是蒋介石现方表示亲近的奔走牯岭、南昌、北京鼓吹南北妥协之日本政党及东京、北京的日本通信社及报馆。最近日本人的《上海日报》非常得意的大字登载十七日九江电：“南昌派高唱亲日政策，否认全体会议之议决，决定解雇鲍罗庭。”不向日本帝国主义的通信社及报馆声辩，而只痛骂自己的同志，这是绝对无益的事。

奉鲁军不是整个的，几等于奉直军不是整个的，这是人所尽知，鲁军即尽失其地盘，亦非奉张所深惜。北伐军东下击破鲁军，自是革命势力更进一步之发展，尤为东南人民所欢迎；然而执此以为“东报”喧传对奉妥协、南北携手对赤之反证，则殊嫌未足。

有人以为李宝章、毕庶澄等时有与南军谈判之事，靳云鹗、陈调元显已归附南方，所谓南北妥协，不过如此。此言亦太滑稽了。北方将领归附国民政府，吾人自可尽量容纳；而国民政府的军事领袖提出政治上的让步条件如东报所传者，向北方军阀首恶谋妥协，这是与北方将领归附国民政府为同样的革命胜利之荣誉吗？

奉天军阀在人心上，在军纪上，在财政上，已到了旦夕溃败的命运，不但北方革命的民众，即一般商民甚至于官僚，都发出“盼望赤军速至”的呼声；而赤军领袖若忽然为日本帝国主义所诱惑，与垂危的奉天军阀谋妥协，以延其残喘，使肃清军阀的大业功败垂

成,这岂非革命史上一大错误,并且是一大污点!所以我们的责任,不是盲目的掩饰此时没有南北妥协的运动,而是诚恳的要求国民革命军的领袖蒋介石总司令,立刻在言论上在行动上,证明所谓南北妥协共同反赤,的确是日本帝国主义造谣煽惑、挑拨是非、中伤捣乱以破坏中国革命的阴谋!

原载《向导》第192期

署名:独秀

答蒋希曾（救党运动）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

手示敬悉。“救党运动”，并不是一个坏名词，不但过去需要，现在仍然需要。不过从事此运动须认清事实，要将党从不革命或反革命的状况中救出，不可将党从日渐革命化的状况中救回老家！右派先生们目睹党日渐革命化，大感“亡党”之痛，起而做救党运动，这一救却糟了！邹、谢等方在上海为日本帝国主义办《江南晚报》，先生倘见此报，当益增感慨。凡是革命分子，即偶涉迷途，终必省悟，先生即其一例。《美洲评论》尚未见过，能赐寄一读否？俾于诸君俟见面时再询及先生的意见。国内革命工作需人甚急，先生不必久留海外。

独秀 三月十五日

原载《向导》第192期

曾琦与薛大可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

国民革命军快到上海，国家主义的曾琦逃到南京去，革命军若再杀到南京，他只有跟随张宗昌逃到山东。曾琦由上海逃到南京，改名王奇，不但斩了头而且分了尸；若再由南京逃到山东或北京，便要再行分尸一下改名王大可，将来可与薛大可齐名！

原载《向导》第192期

署名：实

毕庶澄和西山会议派 就这样纪念中山！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

毕庶澄也发表宣言纪念孙中山先生，可是他的宣言中说：“庶澄是奉张孙两帅命令来的，负有保护地方责任的，手枪炸弹是军中常备之物，必消耗几许，以除此害群之马。”照他这样纪念中山先生，会将中山先生气得活转来！然而毕庶澄还只是说说威吓民众，不象西山会议派的老民党，一面在《江南晚报》及做文章纪念中山，而一面却在环龙路四十四号楼上开枪打伤游行纪念中山先生的群众！

原载《向导》第192期 署名：实

西山会议派和英帝国主义 同样的纪念中山！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

本月十二日中山先生二周年纪念，几乎全世界都有开会纪念的运动，人们对于伟大革命领袖的纪念都表示非常热烈。然而世界上对于纪念此革命领袖的群众表示热烈反对的也有二处：一是西山会议派在上海环龙路枪伤游行的群众三人，一是英国帝国主义者在新加坡对游行纪念的群众开枪两次，死六人，伤十一人。

原载《向导》第192期 署名：实

我们冤枉了西山会议派！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

上海的《江南晚报》，名义上是西山会议派的机关报，其实印刷机器是日本人的，经常费也是日本人的，经理及编辑都是日本人，报馆里出入的人，日本人多过中国人，他们毫不掩饰，连广告栏中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日本商店的广告。我们说这报是西山会议派的机关报，实在冤枉了他们！

原载《向导》第192期

署名：实

帝国主义者眼中的蒋介石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

路透社十日汉口电云：“国民党之左右派已起冲突，蒋介石为保守分子所公认之领袖。”蒋介石究竟是保守分子之领袖还是革命的领袖，这应由他的行动来证明，别人的宣传和他自己的宣传，都是无用的。

原载《向导》第192期

署名：实

中国国民革命的武器是些什么？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

有些人以为现在是国民革命不是社会革命，我虽然反俄、反共、反工农运动，而仍然是革命的。他不懂得苏俄的援助和共产党与工农群众的力量正是中国国民革命之最有力的武器，抛弃这些武器的人便是不愿意革命，他迟早总要跑到反革命那边去。谓余不信，请看过去、现在许多事实！

原载《向导》第192期

署名：实

与帝国主义军阀妥协想推翻 国民党的是谁？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

国民政府谭主席在武昌中山先生二周年纪念会演说：“目前党里暗中有少数人与某帝国主义某军阀妥协，想根本推翻本党，这种事实是多么不幸！”（见上海《时事新报》）同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上海日报》十七日九江电则大书特书：“南昌派高唱亲日政策，否认全体会议之决议。”大家想想看，谭主席所说的少数人是谁？

原载《向导》第192期

署名：实

戴天仇愿意出卖工人吗？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

电通社东京十七日电：“今晨读《日日新闻》载一消息云‘久原房之助氏（日本大实业家）与广东特使戴天仇氏会见，……对于防止上海纱厂罢工起见，愿交南方二百万元。’”戴天仇赴日的任务，我们不知道，大约总没有代表国民政府出卖中国工人于日本帝国主义之特权罢！

原载《向导》第192期

署名：实

答沈滨祈、朱近赤（国民革命之归趋）^{*}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

沈滨祈先生：
朱近赤

你两位来信所提出的问题虽然不同，而根本是一个问题，即是中国国民革命之归趋，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国民革命之性质及其前途。所以我们对于你两位的来信一并奉答。

中国国民革命之性质，是世界资本主义将近崩溃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资本帝国主义之各被压迫阶级的民族、民权、民生革命，而不是世界资本主义初兴时代之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因为革命的世界环境不同，革命的国内社会势力又不同，所以革命时革命后之政治的构造和经济的建设，便自然和前两世纪纯资产阶级的革命不同。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政治的经济的统治下之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些地方的资产阶级百分之九十九不能脱离买办性质，决不能始终忠于国民革命，决没有由他们之手实现自由独立的民族国家之可能，若由他们代替军阀统治国家，仍旧是变相的帝国主义之统治。只有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才能够真正脱离帝国主义之统治，才能够力图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建设，才能够不一定经过再度革命方式而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因此，中国国民革命之前途，只有两条路：（一）是由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之手实现国民革命而行向社会主义；（二）是由资产阶级之手联络一切反动势力，在国民革命的假招牌之下，回复到帝国主义的统治。美国式日本式的第三条路，可惜李鸿章没有走，这时代已经

* 标题为本书编者加。

过去了。

以上的说话，已经在根本上答复了你两位所提出的问题。以下再就来信所举的具体事件，略略申说几句。

国民革命成功后，我国的经济制度，自然是家庭的手工业与农业、小生产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制、国家资本主义等，四种并行。我们所谓采用何种经济制度，并不是说只采用那一种而禁绝其余一切，乃是说采用某一种为全社会中主要的生产制度。我们以为中国国民革命成功后的经济建设，在主观上在客观上，都不必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全社会主要的生产制度，而可以采用国家资本主义以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即是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不过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其在经济上的性质如何，乃依政治上的构造如何而定，即是依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之国家的构造如何而定。譬如在封建军阀的国家而采用国家资本主义，则不仅只是官僚营业，而且更便于官僚卖国，外资独占，而更易消灭本国的工业；在资产阶级的国家而采用国家资本主义，则不过是私人资本更集中高度发展之一种形式；只有在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革命的国家而采用国家资本主义，才能够由此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以上是答复沈先生的话。

朱先生的说话，有许多我们不能懂得。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当然不能解决全民的痛苦，因为全民中之军阀、官僚、买办、劣绅、土豪的痛苦，各被压迫剥削阶级似乎没有为他们来解决之必要。先生主张要解决“全民”的痛苦吗？赶快去求上帝，或者是学佛罢！你断定国民党革命成功后必压迫农工群众，我们以为不一定如此，必须国民党完全变成军阀、官僚、买办、地主、土豪、劣绅、工贼的集团才会如此。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是方法不是目的，共产党之目的是废除私人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制度；在世界资本主义将崩溃的现代，在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制犹未垄断全产业界资产阶级势力犹未强固的中国，如果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能够建立一个民主独裁的革命国家，如果能够由国

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社会，那便自然没有一定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了。如果照先生的主张：“直截了当的解散共产党停止共产主义的宣传”，这正是国民党极右派的主张，他们正是恐怕国民革命之前途，由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的势力造成非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环境；他们因此宁愿意让资产阶级结合买办、官僚、土豪、劣绅、流氓等，以造成帝国主义能够仍旧统治中国的政治环境；他们以为只有这样，才离开了共产党，才没有一点共产主义的色彩，才没有赤化的嫌疑，才是“真正”国民革命。凡是主张“直截了当的解散共产党停止共产主义的宣传而来真正做国民革命”的人，必然和他们（国民党极右派）走一条路，他将来必然背叛国民革命，因为他已经做了帝国主义和军阀所急须要做的事——解散共产党，停止共产主义的宣传！

独秀

原载《向导》第193期

谁敢再想做中国之爹亚士？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

英国史学家魏尔斯(H. G. Wells)的近作《一个新中国震动全世界》一文中说：“关于目下中国时局，其最可注目之点，即此时局显然非任何一个人物所造成者，申言之，在最近十二个月内进行甚速之中国之巩固与再造，并非在若干如爹亚士或墨索里尼式之枭雄指导之下而进行者。”又说：“欧洲列强……耗费金钱及威望，以助中国之某盗魁或某将军，冀其作中国之爹亚士，使中国安全以供欧洲资本家之投资。”现在某将军某盗魁都倒霉了，帝国主义者还只认识个人吗？他们还想雇用何人作中国之爹亚士呢？在这震动全世界的新中国中，还有何人仍敢以枭雄主居，继续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为帝国主义来作中国之爹亚士呢？

原载《向导》第193期

署名：实

英国帝国主义不怕蒋介石了吗？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

路透社廿一日伦敦电：“各报皆评论上海之陷落，每日电闻谓今一切多恃蒋介石之态度与彼所能操之势力。”以前英国帝国主义者视广东赤军首领蒋介石若洪水猛兽，现在为什么说要多恃他的态度与势力呢？

原载《向导》第193期

署名：实

稳健派原来如此！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

路透社三月二十三日伦敦电：“《孟却斯德导报》论上海之前途谓……目前时机尤为相宜，因蒋介石所统率之稳健派，或准备协定，视汉口办法更优惠于外人权利之条件也。”我们现在明白了，所谓稳健派原来就是更优惠于外人权利之意！

原载《向导》第193期

署名：实

青天白日旗下之上海新闻界！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

北伐军一到上海，《新申报》自动的停刊了，《民国日报》和《中南晚报》都自动的复刊了。最肉麻的是《新闻报》，他本是著名一家帮军阀反对革命政府、帮陈炯明反对国民党的报，而于北伐军到上海之次日，在论前大登其中山先生的遗像与遗嘱。最识时势的是《时事新报》，他远在孙传芳从九江败退以来，就渐渐改变了论调，我们希望他将来不至于很快的回到他的旧路！

原载《向导》第193期

署名：实

张作霖已说出南北妥协的条件了！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

上海《时事新报》三月二十八日北京电：“张作霖昨偕赵欣伯接见日本记者团，证明外传出京说不确，……本人始终反对共产，南军苟驱俄人，南北不难妥协。”东方社北京廿七日电亦述张作霖对日本记者说：“至南北妥协问题，倘蒋介石能驱逐南军中之俄人，表示诚意，余决不峻拒。”张作霖已说出南北妥协的条件了，且看南军怎样在行动上回答他！

原载《向导》第193期

署名：实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关于政局的公开的信

(一九二七年六月四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鉴：

亲爱的同志！

中国革命正在经过一个危急的阶段，在这阶段中，革命必定遇到许多难关，并且要克服许多困难问题。目前根本的问题是怎样实施某种限度的土地改革，以满足已醒觉的农民群众之正当要求，而达到革命根基深入之目的。国民党革命的农民政策已经促起农民群众之奋起，实施这政策的时机已经到来。因为国民党是三民主义的革命党，他的历史上的职任，就是实行他的土地政策——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中国革命的将来，中国人民的命运，全靠贵党在此时期之坚决的行动。

土地改革刚才开始，就促进了反动分子之反革命行动。代表不劳而获的大地主阶级之封建军阀，已经起来实行用武力反抗农民。他们威吓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而欲加以破坏，——如果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依然忠实于他们革命的主义，依然领导农民从事历史上的反封建势力之斗争。

军队中有些分子反对土地改革确是事实。不过整个的国民革命军并非——亦不能——反对农民的解放。兵士们大都是无地或贫苦的农民，他们不会很自觉的反对农民运动。如果兵士们对土地改革表示敌意，就是他们还没有觉悟他们仍在受军队中反动分子的剥削。以兵士论，革命军在客观上应当是一个土地革命的军队。大多数的下级军官也是从中等阶级招募来的，他们也是被剥削者，

被压迫者；国民革命并不妨害着他们的财产，他们必不以行动来保护豪绅大地主的政权和利益。现在把持一切政权和特殊权利的是豪绅和大地主。他们消灭之后，经济的关系和政治的权利一定要民权化。所以土地改革，不但不妨害城乡的中等阶级，并且可以解除他们的经济的停滞，给他们以政权。如果将这一点给他们说明白，革命军中之下级军官一定很忠实的赞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实行民权的土地改革政策。再者国民革命军的将领都是相信民主自由的革命领袖，对于土地改革定能拥护。

国民革命军的组织如此，整个的革命军决不能敌视土地改革。其绝大部分（士兵、下级军官、上级首领）定能拥护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那么，最少数的反动分子处于孤立的地位，如果他有反革命的行动，不难一鼓荡平之。

在选择道路上国民党已无丝毫犹豫的余地。土地的改革是到革命之道路。反动军阀所取者是反革命的路。革命的国民党不可站在一个分歧的路口。反动的军阀已经公开的反叛革命（夏斗寅的叛变，长沙的政变可十足的表明这一点）。他们已经向工农运动宣战了。他们的屠杀工农群众，和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蒋介石、李济琛一模一样。他们要挟国民党放弃土地改革政策，以赚得大地主和劣绅的爱戴。他们侮蔑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威权。长沙政变发生后，湖南省党部即被解散，并未得国民党中央的批准，擅自成立省党部（及所谓救党委员会），打毁党校，劫夺前方购买军米之款项，国民政府所派遣之特别委员因中途被阻不得到长沙，并且自由派军队到各县屠杀农民、工人、学生、妇女。

这是明白的反革命行动。少数反动军阀，背叛了国民党国民政府以及高级军事长官，而在湖南篡夺了政权。国民党的责任到此情形之下，非常明显，宜立即下令讨灭此少数叛徒，以维系其最高权威，还是和他们妥协？国民党如果采取第二种办法，国民党的历史，国民党的主义，国民党的政纲，都将推翻，将在国民党政治的生命发生非常严重的影响。湖南的反革命必须讨灭，迅速的行动已经十

二分必要了。犹豫不决，必遗后患！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议采用以下的行动，削平湖南的反革命：

一，国民政府明令宣布长沙叛徒许克祥等所组织之委员会系反革命，并令军队联合革命的民众共同推翻之。

二，解散叛徒的委员会另委合法的省政府。

三，火速派兵讨伐叛乱，与唐总指挥以派兵之权削平之。

四，取消叛徒窃据之省党部，另由国民党中央下令改选新省党部行使职权。

五，国民政府明令宣布工农组织及共产党在湖南得享完全的自由。

六，武装农民以防御反革命叛乱之发生。

以此行动处置反革命，不仅湖南一省工农群众对国民党发生坚强的信仰，全国各地的工农，定要遥瞻国民革命的旗帜，认识国民党的党徽，为他们自由之标志。他们必定自己起来向国民政府之敌作战！

当大资产阶级、封建反动势力和他们的军阀代表向国民革命反抗时，领导国民革命的国民党，一定要和民权主义的群众结成更密切的关系，提醒他们革命的觉悟，并领导着他们大胆的向反革命进攻。当反动分子以公开的反叛行动集合他们的力量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倘不果决的领导劳苦群众向反革命势力作殊死的革命战斗，则一切反革命势力得有更多机会放胆集合发展其势力向革命进攻，革命前途将陷于危险！ 谨致

革命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总书记：陈独秀

六月四日

原载《向导》197期

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一日)

我们现在用不着拿许多很坏的话来攻击蒋介石，因为他自己有许多行为已经足够说明他是革命或是反革命了。并且他的罪状已经国民党国民政府逐条宣布，更不需我们来重说。

我们也许可以说，蒋介石之反动，在中国革命运动上是一大损失，因为他个人性格之有决断肯负责任，和袁世凯一样是中国有为人物，可惜走到反革命而不走到革命；这也就是我们所以自去年三月二十到今年四月十二始终牵就他向他让步想拉他向革命路上走之一个原因。我们一年余的忍耐牵就让步，不但只是一场幻想，并且变成了他屠杀民众屠杀共产党的代价！

在去年三月二十之前，东征陈林胜利时，蒋介石成了著名的革命人物，帝国主义者甚至于攻击他或者恭维他是中国红军首领；然而那时就有一位同志批评蒋介石是一个危险人物，未必始终忠于革命。我曾问他何以见得。他说：蒋氏此时言论固然很革命，即行动也向着革命路上走；惟隐微中时时表露其个人英雄主义，表露其个人之权与力超于党之上，离开党的个人英雄主义，没有党的制裁，便会走到反革命，中外历史上这种英雄很多，恐怕蒋介石也是一个。现在看起来，这些话可算是对于蒋介石之终身的刻骨批评！

在讨伐陈林和讨伐刘杨战争中，蒋介石很尊信共产党人，因为他们能苦战奋斗；即去年三月二十以后一直到今年三月七日他在南昌演讲，还时常说共产党是革命的，他也是革命的，二者必须合作。他时常肯定共产党是革命的，共产党人当然很感谢他；可惜他不是说共产党是革命的，国民党也是革命的，二者必须合作。他只

说他也是革命的，共产党应和他合作，共产党听了总觉得很奇怪。蒋介石时时刻刻表示他自己的意思，而忘记了国民党，这是共产党终和他发生冲突之一一个很重要原因。共产党承认国共两党都是革命的，所以必须合作（不但国民革命中破坏工作可以合作，即国民革命中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工作也希望可以合作。）因此，共产党立在革命工作的观点上，对于国民党中任何革命领袖，无论新旧都愿竭诚与之合作，决不肯立在私人的感情上，帮助那一个领袖打倒那一个领袖；即使那一个领袖背叛了革命，例如陈炯明、杨希闵、蒋介石，共产党也只是立在革命的观点上，帮助国民党去打倒这班反革命者，而不是什么拥孙倒陈，拥蒋倒杨，拥汪倒蒋。蒋介石始终不明白这个道理，始终只知道他个人而不知道有党，始终要求共产党以助蒋拒汪为合作条件，两次派人到上海和我们谈判，以哀的美敦式的态度，要求共产党停止迎汪复职运动，我们答以在革命进展的观点上，在国民党团结的观点上，共产党只是主张汪、蒋合作，而不是拥汪倒蒋，却没有理由可以违反中国革命的需要，以及国民党党员群众的心理，而反对迎汪复职。这样合理的答复，当然使蒋介石失望，使蒋介石觉得共产党到底不能做他的工具象孙文主义学会那样，于是在他的二月二十一南昌演讲中，便喊出“纠正共产党”、“制裁共产党”等口号了。蒋介石所举要纠正及制裁共产党之理，是因为共产党党员对于国民党党员加以排挤压迫，可是他在此次演讲之前，两次派人到上海和我们谈判时，没有一字提出共产党党员排挤压迫国民党党员之事，而只说不满意我们附和迎汪复职运动，或者在他的见解，迎汪复职就是排挤压迫国民党党员。

去年三月二十事变之后，蒋介石极力声辩不是对付共产党，他对黄埔学生演说，痛陈领袖争权之事，分明是指汪精卫；最近张静江致汪精卫书，却说：“岂知弟三月二十二日在长堤登岸，先二日介兄已向共产党行断然之手段……以为共产党之阴险，或有击而不中之虞，不告谷季（精卫别号），将失败时介自负之，季仍可自收其残局，各有其分义，弟亦何言，弟到之时，介兄仍欲彻底解决，断此

亡党之毒腕，以慰总理之灵。”这样看起来，好象蒋、张之言大相矛盾，其实一点也不矛盾，因为三月二十之变，反共排汪，本是二者并行。排汪之经过事实，精卫先生自知之，近亦向我详言之，不但三月二十排汪必欲其去职离粤，并且自从三月二十，一直到汪回，蒋、张无时无刻不与主张迎汪复职者为敌，试问这可是何种分义？蒋介石之反共，导源于戴季陶的小册子，这不仅是表面上简单的戴、蒋等个人思想问题，乃是整个的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政策之反映。关于中国革命之前途，有两种理论与政策：一是无产阶级的理论与政策，一是资产阶级的理论与政策。无产阶级的理论政策是：无产阶级与农民小资产阶级结合起来，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对内推翻封建势力、军阀、地主、土豪劣绅等的统治，建立革命的民主独裁制，行向社会主义的建设，以达到全民族政治的经济的完全解放。资产阶级的理论与政策是：资产阶级与买办、官僚、地主、豪绅甚至一部分反动军阀结合起来，建立保护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军事独裁制，以压迫工农运动及反共反俄，求得帝国主义的谅解及些小让步，在资本主义的工商业的政策之下，根本停止民众的一切革命运动，发展并稳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权。中国革命之前途，只有这两条路，找不出第三条路，也许戴季陶、蒋介石自以为可以找出第三条路，不过事实上他们所走的分明还是第二条路，并未曾发明第三条路，所谓第三条路，只是不肯走第一条路，而又不愿显然自承走第二条路之名，其实第三条路不通行，还只有走第二条路。戴季陶以为可以一面反共派，一面反右派，其结果他和右派走上一条路；蒋介石、张静江以为可以一面反共派、反工农运动，一面反西山会议派，其结果他们和西山会议派走上了一条路；现在又有人以为可以一面反共、反工农运动，一面反蒋，其结果也必然和蒋介石走上一条路；这都是因为他们想找第三条路，其实本来不会有第三条路，所谓第三条路，即第二条路之别名。自从戴季陶发行他的小册子，中间经过三月二十，一直到今年四月十二，都是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意识者国民党右派首领戴季陶、蒋介石、张静江等，

在寻找第三条路的口实之下，为实行走他们的第二条路而工作。

第二条路即资产阶级的路。他们要用资产阶级的理论与政策，来解决中国问题，自然要抑制工农运动不许他们强盛起来，更不用说火，只有时有利益于资产阶级的工农运动（如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示威与庆祝、追悼等），他们或者可以恩准，否则便是受了共产党煽惑操纵，只好用四月十二的办法。他们要用资产阶级的理论与政策，来解决中国问题，自然不愿意无产阶级的政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特别是和他们的理论与政策不一致的时候（帮助他们对付他们的政敌之时，当然要暂时利用一下），所以戴季陶自始至终都主张共产党党员要退出国民党，最近《告国民党的同志并告全国国民》中又说：“我在总理死后很辛苦地坚持着非中国国民党纯粹独立，则救国的责任决负不起。”诚然，他们很辛苦地屠杀了共产党之后，很得意地向全国国民宣告中国国民党纯粹独立，这想必就是戴季陶先生发挥他们资产阶级的“仁爱性”。如果共产党也这样宣告独立，不知资产阶级的学者要怎样大声疾呼的咒骂无产阶级的布尔什维克党之残暴无仁爱性！戴季陶或者可以回答说：四月十二之事确如白崇禧、陈群所说只是“工人互轰”（六月三日陈群在所谓上海工会统一委员会还这样说），随后搜捕枪毙之共产党，或者那是许克祥所谓“暴徒分子”，而非真共产党，至于朱培德欢送共产党出境，更是仁爱之至。可是吴稚晖曾大呼“杀尽共产党”，李石曾说四月十二事变是革命，并且是最后的革命，从此再用不着革命了；诚然，共产党杀尽了，无产阶级压服下去了，资产阶级已经革了无产阶级的命，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蒋介石的纯粹国民党，从此得安然和英、日帝国主义及奉天军阀携手统治中国，还有什么革命！他们要用资产阶级的理论与政策，来解决中国问题，联俄政策自然不大适用；蒋介石、吴稚晖、戴季陶都一致采用西山会议的意见，联俄原以平等待我为条件，言外之意就是苏俄现已不以平等待我了，联俄政策当然要抛弃。吴稚晖说：“有人说俄国已铲除不平等条约，然此止平等之一端，如德如奥，皆已铲除不平等条约，依照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宣言，止能认为最惠国，联合则平等未完全，显生问题，所以德、奥可认为最惠国，尚未联合也。”戴季陶说：“俄国既然说是同情于中国的革命，援助国民政府，而两年当中，既没有和国民政府定过相互的平等条约，也没有和国民政府交换过正式的代表，……俄国既没有正式承认我们的国民政府，我们就无从承认俄国对我们的革命有正确的了解和同情的援助。”苏俄和国民党关系，至今和中山先生在世时无殊，何以现在忽然发现了没有正式承认和没有定过条约交换代表，联俄显生问题？其实这都是鬼话。吴稚晖说：“遂使帝国主义之图及国内军阀，谋倾本党者，借赤化为口实，淆乱世之众听。”这几句话才真是他们抛弃联俄政策之隐衷！

他们要用资产阶级的理论与政策，来解决中国问题，自不得不将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放弃了。他们分明走的是第二条路，还厚颜说是第三条路，自以为虽然反俄、反共、反工农运动，而仍然是革命的，不知道他们的所谓革命作何解释？

汪精卫先生曾说：“要革命的向左边来——”现在蒋党的人说：“要革命的向右边来——”这句话虽然滑稽，可是也证明了他们已认识没有中间的第三条路！

向右是他们自己承认的，但是不是革命的呢？

三月二十的行动是革命的吗？

北伐总司令一就职，国民政府便无形取消了，这是革命的吗？

派李石曾向张作霖、杨宇霆谋南北妥协，这是革命的吗？

四月十二的行动是革命的吗？

收买青红帮打毁沿江各省的党部及工会、农会，屠杀工农群众，这是革命的吗？

搜捕枪杀各军政治工作人员，这是革命的吗？

正当北伐军在河南和奉军血战之时，勾结于学忠、张联升、刘湘、杨森、夏斗寅乘虚袭击武汉国民政府，这是革命的吗？

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使田中的代表松井到武汉诱胁国民政府的领袖潜赴南京，这是革命的吗？

如果这些行为是革命的，那么，只有资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与政策是这样。如果这样也算是革命，难怪张勋复辟、段祺瑞召集善后会议，也自称是革命！

蒋介石之反动，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不是一件小小事体；因为这不只是蒋介石个人的问题，他所代表的是整个的中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及政策，这是全国革命的民众和革命的领袖都应该认识的。他假革命之名，行反革命之实，所以一切不容于革命势力的许多反动派如国家主义者、研究系、安福系等，一向反对国民党，现在都跑到蒋介石旗帜之下，帮着他摇旗呐喊，向革命势力进攻。至于一些反动的大小军阀，自然有与蒋介石结合之可能，刘湘、杨森、于学忠、张联升、夏斗寅、许克祥等，不用说了；蒋介石、阎锡山、杨宇霆的三角同盟，不久也会实现。

安徽的蒋党，竟揭出“拥护新军阀”的标语，重庆的蒋党，竟挂出“一切反革命联合起来”的标语，这是何等新奇的事！

一切反动的军阀、官僚、政客，不但要依附假革命的蒋介石之名义以保存其反革命的势力，而且还要强奸三民主义一下，这是革命运动中最可耻的危险！

蒋介石已成了全国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国民政府的领袖在郑州会议，已决定了讨蒋政策，这是中国革命进展之一个重大时机，在革命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

我们所要敬告国民政府之领袖及军事长官的是：应为革命而讨蒋，不应为讨蒋而讨蒋；换句话说，即是不但讨蒋介石个人，而是要讨伐蒋介石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及政策；若讨蒋者在革命的理论及政策上，在对民众态度上，一切仍蒋之旧，即令讨蒋胜利，亦与革命无涉，而且不足以服蒋之心！

六月十一日

原载《向导》第198期

署名：独秀

湖南政变与讨蒋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日)

湖南初期的农民运动，缺少党的指导，遂不免有些原始的幼稚行动(所谓幼稚行动在任何国家革命的初期高潮中都不能免)，如捕人、罚款、阻禁，企图均分土地，同时举行宗教革命(毁庙、毁祖宗牌位)、道德革命(妇女解放)等，以引起一般社会之惊恐，土豪劣绅复捏造许多事实在军队中宣传，反对土地改革及根本反对民众运动之右倾分子更从而张皇其词，使湖南出身的军官咸抱不安，对湖南农民运动多少都表示不满，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长沙五月二十一日事变，自然和湖南农民运动的幼稚行动不无关系；然而说他们只是为纠正农民运动的幼稚行动而发，则显非事实。在长沙事变以前，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已有纠正农民运动幼稚行动的命令，他们若真是只想纠正农民的幼稚行动，由省政府、省党部切实执行中央命令，已十分够用，为什么须用屠杀政策呢？他们说长沙二十一日事变是由于工农纠察队包围军队夺枪而起，这种笑话，和蒋介石在屠杀上海工人之前说工人纠察队将围攻龙华，是同样的把戏。过去的屠杀已遍于湖南全省，截至今天(六月十九日)的消息，新省政府的军事厅长仍在分派军队到各县大举清乡，想必也是因为各县的工农纠察队都在那里包围军队夺枪！这是欺谁？

我们再看二十一日事变以来，许克祥的所言所行，是否只是纠正农民运动的幼稚行动？

(一)二十二日下午省政府召集所谓各团体联席会议时，教育厅长董维键、建设厅长邓寿荃尚列席，次日即被逐出走，邓厅

长的家产且被查抄了。

(二)省党部人员被逐一空。

(三)市商民协会代表左学谦在所谓各团体联席会议上说：“昨晚事变，因解散工人讲习所，波及商民协会，以致职员会物损失，会所亦被毁坏。”左学谦家宅亦于二十四日被封。

(四)省农民协会曾负责派员为政府采办军米四十万石，而办米之款九万元，竟被所谓救党委员会的军队抢去。

(五)许克祥在街上贴出“拥护湖南省政府”、“拥护国民政府”的标语，但是省政府的委员赶跑了，并且抄家了，国民政府的委员走到岳州竟被拒绝而回，并且许克祥竟电令岳州驻军要逮捕枪毙国民政府的委员。

(六)五月二十四日，在长沙戒严司令部，成立中国国民党救党临时办公处，推定许克祥、王东原、李殿臣、周荣光、张敬兮等五人为主席，当即发出命令如下：以后拿办暴徒分子，非经国民党救党临时办公处命令，各部队不得擅行，此令！主席许克祥、王东原、李殿臣、周荣光、张敬兮。

(七)国民党党校被军队捣毁一空。

试问上列这些事实，和纠正农民运动的幼稚行动何涉？许克祥等不得政府或中央党部命令，而擅自在戒严司令部组织什么救党办公处，独揽军权、政权、党权，这和蒋介石的行为何异？

夏斗寅在湖北叛变，是受了蒋介石的指使，蒋介石已经亲自向外国新闻记者直言不讳，似乎不需要别人再为他辩护。许克祥等在长沙叛变，分明是和夏斗寅相呼应，分明是蒋介石袭击武汉国民政府之整个的计划之一，至少也是接受了蒋介石的政纲（反武汉中央，反俄，反共，反工农），谋袭国民政府，扰乱北伐后方之整个的计划之一，纠正农民幼稚行动，不过是一个口实。

蒋介石的外交官，对于英捕房监视上海苏俄使馆不肯向英人抗议，蒋介石且在上海大捕苏俄同志；许克祥等亦在长沙搜查苏俄使馆。

蒋介石在上海、南京、广州搜杀共产党人；许克祥等亦在长沙、常德等处搜杀所谓暴徒分子——即共产党人。蒋介石一面屠杀工人，一面说仍然要保护真正工农；许克祥等也是一面屠杀工人农民，一面在街上贴出“拥护真正农工”的标语。他们和蒋介石有什么两样？

不仅许克祥等在长沙是如此，再看常德的五月二十四日事变是怎样？在二十四日事变之前，常德的党部及民众团体，正在忙着开欢迎熊震旅长大会，开军民联欢大会，正在忙着采办军米；恰当此时，夏斗寅、许克祥叛变的消息传到常德，蒋介石委任熊震为师长的密电一到，熊军顿时翻脸，于五月二十四日上午派兵搜索工会、农会及党部徽章，下午到工会、农会、党部及其他民众团体捉人，遇见穿中山服的或有徽章的即逮捕枪毙，约在二百人以上，被捕者数百人，特别法庭所拘押之土豪劣绅一律释放，即用彼等为搜捕革命分子之侦探；并且鸣锣叫人报告谁是共产党人，一时被私仇诬陷而逮捕而枪杀的人，非常之多。二十五日又挨户检查，见有勇敢活泼青年，即指为共产党人而捕去枪杀之，如此又杀害了数十人。二十五以后，又从城里杀到乡下去，乡下土豪劣绅所把持的关防局，遂乘机帮着熊震捉人。

此外岳州、平江、浏阳、宝庆及湘南，都在铲除暴徒名义之下，解散民众团体，屠杀工农及共产党人之事，成了普遍的现象。此次屠杀之惨，我们可以举出一例，即湘潭总工会会长杨昭植被杀之事。杨于五月二十六日被捕，在学坪斩头，随将其头抛掷数十下，再用麻绳系电杆上示众，将杨尸倒悬于演说台上，以刀剖解，以铁丝作钩，取出腹内脏腑，灌火油于腹中，用火燃之，旁观有不平者，即以赤化论。至于捕获工农活人剥皮置沙上，旋转呼号而死者，也不只一次。试问湖南农民对土豪劣绅曾否有这样野蛮残酷的行动？

政府派周斓赴长沙以后，湖南的屠杀停止了没有？没有、绝对没有。现有二事为证：

（一）是六月十日长沙的《南岳日报》载：

“昨日长沙市全市党员，在教育会坪开欢迎周副军长大会……周副军长由第三分校，惜仇亦山……到会，……当众发表决议案十六条(一)公推周副军长为湖南救党委员会委员。(二)请周副军长实力参加救党运动。……(八)请周副军长奖励马日铲除暴徒的武装同志。……”

(二)是湖南省政府军事厅六月十四日有派兵清乡电如下：

“湘省暴徒啸聚各县，亟应肃清，以根本解决，分配兵力如下：

1. 许克祥酌抽二十三团军队，以一部分赴湘潭、湘乡、宁乡清乡，以一部分留省警戒。

2. 周荣光督率警卫团担任省城内外警戒，并保护省内上下厘卡，城厢各机关。

3. 李仲仁团抽调一部分前往醴陵、衡山清乡，一部留省协同各军警戒。

4. 每营派兵分赴长沙县所属各乡镇清乡。

5. 熊震师向桃源方面警戒，并酌抽军队担任常德、沅江、安乡县清乡之责。

6. 王锡筹师担任宝庆、新化、祁阳清乡，并担任向武冈方面警戒之责。

7. 周盘、周希武、张岳(团长)协同向鄂西警戒，并应酌抽军队担任岳阳、临湘、华容清乡之责。

8. 陈汉章旅对于湘、黔军方面警戒，并抽军队担任辰溪、淑浦、安化清乡之责。

9. 戴斗垣司令于向津、醴方面警戒外，并抽军队担任石川、慈利、大庸、永定清乡之责。

10. 俞团担任衡阳、常宁、耒阳、资兴、郴县清乡之责。

11. 王德光团对于全州方面警戒外，并酌抽军队担任零陵、东安、祁阳、道县、宁远清乡之责。

12. 罗定(司令)担任攸县、茶陵、安仁、酃县清乡之责。

13. 浏阳、平江、湘阴三县之事宜，另商陈嘉佑军长酌派军

队前往办理。

14. 湘南、湘西边境各县，俟由前方抽调军队回湘再行举办。

15. 此次清乡，限令到后十日内一律肃清。”

政府未有明令申斥许克祥等所组织的救党委员会是反叛行为及严令解散，他们当然可以请周斓加入；政府也未曾严令申斥二十一日事变是反革命，他们也自然可以请周副军长奖励。这都是顺逆是非不明所致。现在军事厅还嫌过去的屠杀不足，分派大批军队到各县清乡，肃清所谓暴徒，以图根本解决。什么是根本解决？不用说是“杀尽真正革命党人——国民党及共产党”和“根本消灭工农运动”，以免后患！在这种政策之下，许克祥等的首功，当然是应该奖励的。共产党是否能够杀尽？工农运动是否能够根本消灭？恐怕都是疑问吧？蒋介石并不能够办到这两件事，甚至更有力量的莫索里尼也未能办到。他人更休想！

湖南政变中所表现的事实，分明不是什么纠正工农的幼稚行动，分明不是什么救党运动（岂有离开最高党部，并且要枪决中央委员的救党运动？），而分明是和蒋介石、夏斗寅一气的反俄、反共、反工农、反武汉中央这四大政策的运动。

此时，武汉方面讨蒋运动的空气似乎很浓厚，倘若没有决心解决湖南问题，铲除这些豪绅代表的小蒋介石，那么我们恐怕南京的大蒋介石尚未铲除，武汉治下的许多小蒋介石——豪绅恶霸以及许克祥等叛徒，倒可以将国民政府推翻了！而且蒋介石可以说：你们讨我，但是你们境内也和我这里一样，你们并不能得到东南民众的拥护，你们所仗的，也不过是军队，来和我争地盘罢了。

六月二十日

原载《向导》第199期

署名：独秀

中国国民党的危险及其出路

(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

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国民党右派(从蒋介石到阎锡山,将来或至到张作霖、杨宇霆),他们现时所奔走呼号的救党清党运动,和国民党改组时冯自由、刘成禹等所号召的护党运动,是同样的把戏。他们所号召的口实是反共产,从冯自由、刘成禹到杨希闵、刘震寰,从杨刘到蒋介石、李济琛,从蒋李到阎锡山、许克祥,都是同样的口吻,即将来从阎锡山、许克祥到……,从……到……也必然是一脉相传没有两样。这并非是偶然的事,乃因为代表封建军阀及代表封建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他们势不能与革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长久合作,以致身被南赤北赤等不洁之名,而不为帝国主义者所谅解所宽宥。

张继说:“我们国民党若反对帝国主义,则失败时将无地逃避。”

吴稚晖说:“遂使帝国主义之国及国内军阀谋倾本党者,借赤化为口实,淆乱世之众听。”这就是国民党新旧右派始终反共之共同心理。他们都以为国民党之所以为帝国主义所疾视,乃因改组后加入共产分子之故,非排共无以救党,排共与救党、清党、护党,乃同实而异名。他们不懂得“为帝国主义所疾视”正是国民党之荣誉,而不是羞辱。他们所谓护党、清党、救党之目的,不是想把国民党从不革命救护到革命,而分明是要减少国民党的革命性,回复到改组以前的状况。汪精卫先生过上海时,曾面问蒋介石是否要把国民党回复到改组以前的状况,蒋竟直认不讳。

改组以前的国民党是怎样? 改组以来的国民党是怎样? 有了

进步没有？这应该是人所共知，不待多说了。改组以来的国民党，因为有了共产党分子加入捣乱阴谋破坏，又加以苏俄帮着“送半饭”（蒋介石语，即令人吃不饱之意）；然而其结果，国民党党员在全国各省都大大的增加了，党在民众中名望价值也日高一日了，军事上更有了突飞的开展，所损失的只是去掉了陈、林、杨、刘这些势力，得罪了帝国主义或者更是美中不足！

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国民党右派，他们只担心得罪帝国主义，遂把国民党改组以来的进步看做一文不值。他们反共救党之真正心理，正因为恐怕身被赤名，得罪了帝国主义无以生存，只有急急排共，把国民党回复到改组以前的状况，以表示“守身如玉”仍是“安分良党”，庶几可以稍温帝国主义之心而息其怒。试问以此救党，把党救到什么去处？

此时国民党群右（从蒋介石到阎锡山），纷起通电排共，其口实，除将民众对资产阶级及土豪、劣绅地主所谓过火的行动归罪于共产党外，不能举出共产党对于国民党阴谋破坏之一二事实。其实，国民党现时之真正危机，不是右派所谓共产党之阴谋破坏，而反是右派之自身。国民党某领袖说的好：“此时国民党有蒋记、阎记之分，将来或者还有张（作霖）记……记……记，汪、谭无兵，所以没有汪记、谭记的国民党。”谁有兵权，谁就在他的地盘之内，以清党、救党名义，造成他自己御用的国民党，使国民党变成无数小军党；国民党真正危机在此，所谓亡党之痛或即在此，而不在共产党分子留在国民党之内。蒋介石到底还是一个老国民党，有些投机混入国民党军队里的新鲜漂亮人物如阎锡山辈，他们停止站在北洋军阀那边打击国民党才有几天，有些经过共产党人设法展转长期的劝告才肯接近国民党的；有些虽然勉强加入了国民党，经过共产党人再三劝告，才有点看中了国民党的；这班新鲜漂亮人物，终不能新鲜漂亮到底，现在都回过头来加入反赤运动，都伸起大姆指头自称是纯粹国民党员，自称是真正三民主义信徒，在清党救党名义之下，大声疾呼的排除共产党分子留在国民党之内。他们的面孔转变

得这样快，他们这班大呼清党救党的“国民党忠实党员”，倘若半夜里想起来几天以前打击国民党之事，岂不要浑身流出愧汗！然而他们毫不惭愧。他们毫不惭愧之理由是：他们以前打击国民党，因为国民党是革命的党，是反对袁世凯，反对曹锟、吴佩孚的乱党；他们现在大呼清党救党，正是要清除国民党中之革命分子，不但要清除共产党分子，并且对于纯粹国民党员之稍稍左倾分子，也要以暴徒罪名清除之，以图根本消灭国民党之革命性；他们以前对国民党之态度与口号是铲除乱党，现在的态度与口号是铲除暴徒，他们对待国民党是始终一致的，面孔虽前后不同，内容实无变更，所以毫不惭愧。不但他们如此，即段祺瑞、张作霖都曾屡次表示可与国民党的妥协派温和分子携手合作，都无非是企图清除国民党中的革命分子以消灭其革命性。自袁世凯以来，他们站在国民党外边打击国民党，不但于国民党无伤，而且因于驱迫国中所有革命分子都集中到国民党，使国民党的力量一天伟大似一天；他们现在跑进国民党，清除国民党中的革命分子，以根本消灭其革命性，使革命的国民党变成他们新军阀御用的工具，这才是对国民党之真正打击，这才是国民党之致命伤，这才是国民党之真正的清党危机！

所以欲救国民党之危机，决不是清除党内革命分子，而是要清除党内反革命及不革命的投机分子，不然将名存而实亡。国民党在现时严重的危机当中，和民国二年受袁世凯打击的无路可走相等的危机当中，以汪精卫先生为中心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及左派的武装同志，应该有一大觉悟，下一大决心，首先自身团结起来，再和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拿出中山先生组织中华革命党的精神，来一个从左边的清党运动，毫不顾惜的清除党内一切反革命及不革命的投机分子，以救出真正革命分子的国民党正统之生命。只有清除党内一切投机分子，只有革命的左派团结起来巩固正统的国民党，只有消灭全国某记某记个人御用的国民党，国民党才有出路；若放弃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接受蒋介石的主张，不但失了左派的立场，且不是国民党的出路！“联蒋反共”固然是革命的左派国民党

寿终正寝，所谓“反蒋反共”及所谓“反蒋分共”（分共即国民党和共产党分离之意），亦属欺人自欺的鬼话，反共或分共，都是和蒋介石走上一条道路，尚何须反蒋？

也许有人以为联蒋固然是走到投降资产阶级的道路，反蒋则只有走到附属无产阶级的道路，国民党左派仍然是没有出路。其实不然。中国的国民革命，在社会的客观上条件上，固然不会有资产阶级的革命，同时也不是无产阶级单独的革命，而必然是工农中小资产阶级联合的革命。为什么有这样一个伟大的各阶级联合的国民党在中国存在了数十年以至于今日，这是在中国这样社会的客观条件上自然产生的，国民党左派在现在及将来的生命仍然是依照中国社会的客观条件而生存而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中国国民党左派的出路，不是投降资产阶级，也不是投降无产阶级，而只是实现工农中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

实现反帝国主义（民族）、反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民权）、反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民生）之工农中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以克服蒋介石为中心背叛革命的国民党右派，这不但是左派国民党眼前的出路，也就是中国国民革命眼前的出路。

七月一日

原载《向导》第200期

署名：独秀

请加入张作霖的党去罢！

(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

张作霖要组织一个“新国家党”，我想这个党如果组织起来，也许能够一时生意兴隆。不但曾琦，就是许多自命为革命的人物，而站在国家主义方面的反对国民革命中有阶级作用者（蒋介石不过其中之一人），都可加入此党！

原载《向导》第200期

署名：实

可怜的山西各界代表！

(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

所谓“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本是阎锡山去年冬天就向国民政府所要求的官衔，意在拒冯而独霸北方。然而六月六日阎锡山就职宣言却说：“本总司令承六月五日山西各界欢迎国民革命军大会，公推为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事实上六月四、五、六这几日，是有一些阎锡山制造的御用党部及民众团体，在那里奔走劝进，阎锡山还再三谦让，经各界代表坚请之后，始允就职。有人说：阎锡山再三谦让时，如果各代表不坚请，则将如之何？我说：阎锡山无命令谁敢坚请？现在谁敢不坚请？

原载《向导》第200期

署名：实

阎锡山的国民党……的国民党？

(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

山西的国民党部存在不只一天了，阎锡山是几时正式入党的？他一入党便下令清党，清什么？不用说，真正目的是要清去非阎锡山走狗的分子。不但山西，他省都有同样事实发生，国民党照这样办法，会真有“亡党”的事！

原载《向导》第200期 署名：实

张胡子真笨！

(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

张作霖对日本记者团说：“三民主义……自可赞成，但易帜改名，则殊防出此……然所谓三民主义者，一涉实行方面，便包含许多事实问题……即采用三民主义之形式，亦牵连其他难题，既同在三民主义旗帜之下，则行使政权之机关以及编制军队之名称，党部之权限，宣传之口号等等，自亦不能不整齐划一，只此形式上之划一，亦大使昔日之自树一帜者，有种种不能实行之苦衷……”阎锡山听了张作霖这番话，必然哈哈大笑道：“张胡子真笨！不但易帜改名军队还是你的，并且下令清党后的党也是你的，你看我！张胡子真笨！”

原载《向导》第200期 署名：实

急求南北妥协的是北张还是南蒋？

(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

阎锡山代表南桂馨对电通社记者说：“南京方面……认由晋省韩旋宁、奉间之和议，最为适当，而特向晋省表露此意。”如此看来，前者蒋介石派李石曾向张作霖求和，大概不是谣言了罢！

原载《向导》第200期

署名：实

纯正三民主义信徒的奉宁晋联盟

(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

南桂馨对电通社记者说：“百帅之心理，实深信奉、宁与晋之三角联盟，为目下收拾时局之最善方法。……现因蒋介石既已表明其为纯正三民主义之信徒，遂于主义上之见地，认定奉、宁、晋三方合作一事，决非困难。”奉、宁、晋联盟？所谓纯正三民主义之信徒原来如此。

原载《向导》第200期

署名：实

究竟什么是真正工农？

(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

蒋介石一面屠杀工人，一面说要拥护真正工人；许克祥一面屠杀工人农民，一面说要拥护真正农工；我们从前总不懂得这种深奥的道理。现在有人说：“只有军队才是真正工农群众。”对呀！我们一直到现在才知道，蒋介石、许克祥所杀在工厂做工在乡下种地的，原来都不是真正工农群众呵！

原载《向导》第200期

署名：实

不进则退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杨杏佛题《申报》双十节增刊说：“为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革命亦然。”这几句话诚然不错，但不知他们贵党的革命现在是进还是退？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期

署名：撒翁

汪精卫的出路在那里？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汪精卫题《申报》双十增刊说：“从共产党与腐化分子的夹攻中，悉力奋斗，为国民革命求一出路。”请问国民党分子现在有几个不腐化？汪精卫的出路在那里？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期

署名：撒翁

斯文扫地民众爬上来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代表绅士的《时事新报》，忽于今年国庆号上登出一篇很有趣的文章，题目叫做《双十节的民众化》，内中说：“似乎与民众没有关系的双十节，又要来一次了！……中国的人民，到现在在实际上还没有任何式样的政权，……以致一般寄生虫来包办一切，越闹越起劲，寄生虫当然是残民以逞之徒，他们自己以为是圣贤的正统嫡派，其实只是一班无业的高等游民而已。让这些许多非民众的人物来当道，民众自然要永远愚蠢，永远得不着一切政权。……汉字教育，本来不是为民众的，是残民以逞之徒的法宝，所以汉字教育的结果，可以造成圣贤之徒来对付民众。……世界上有文字的国家，差不多都是为民族的，只有我们中国人的文字是为寄生虫的，为圣贤之徒的，小百姓甚至于连极平常的官府文告都看不懂！所以要使双十节有意义，非使民众爬上来不可；要使民众爬上来，非把寄生虫所依为命的汉字打倒不可。……斯文扫地的工作实行了之后，圣贤之徒才无所凭借，民众才敢作敢为。”《时事新报》编辑先生们，大概是很疏忽的把这种议论登了出来，若是细心再读一下，恐怕他们要吓一跳！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期

署名：撒翁

马寅初又来出博士的丑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马寅初博士，在《时事新报》双十增刊上，大批评其马克思价值论，引了一大堆例证，都是物品在市场上因供求及其他关系而变动的价格问题，和马克思所指物品本身的价值是两件事。马寅初不但不曾用心读过马克思的书，并且把最浅近经济学上价格(Price)和价值(Value)之区别，也没有弄清楚，居然来批评马克思，可谓太不自量！日本河上肇博士虽不是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我见过他批评马克思的价值论，尚不至闹这样的笑话，只有中国的博士真容易出丑！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期 署名：撒翁

滑稽的禁令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广东的民政财政必属之李济琛，两湖的民政财政必属之唐生智，河南的民政财政必属之冯玉祥，浙江的民政财政必属之何应钦，江西的民政财政必属之朱培德，这种军人割据的状况，国民党和北洋军阀没有两样；然而南京的所谓国民政府，方通令各军长官，严禁干涉民政财政，可谓滑稽之至！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期 署名：撒翁

蒋介石的进步真快呀！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帝国主义眼中的赤军首领，一变而为反赤的纯粹国民党员，再变而为基督将军，蒋介石的进步真快呀！但不知他三变而成个什么东西？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期

署名：撒翁

阎锡山 冯玉祥仍然是赤！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张作霖致阎锡山电，一则曰赤祸可惧，再则曰揭赤帜为冯先驱；那么阎、冯都仍然是赤，蒋介石、汪精卫更不用说了，国民党反共反俄的宣传和行动，算是白费了气力！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期

署名：撒翁

张作霖的共和与国民党的国民革命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张作霖说国民党“拔五色帜易赤帜”是“背叛共和”，原来张作霖所谓共和就是指这一面五色旗！天下事无独有偶，国民党也大喊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军阀，拥护工农平民最大多数人的权利是破坏国民革命，不知这国民党所谓国民革命又是什么？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期

署名：撒翁

国民党也可以为帝国主义 镇压革命了！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今春汉、浔民众收回租界，上海工人大罢工，长江革命怒潮高涨时，各帝国主义者异常恐慌，以为北洋军阀已不能够镇压中国的革命，不得不亲自派遣海陆军队来华，以资镇摄，其中尤以英兵为最多，计二万余人。自蒋介石来到东南，极力为帝国主义者压服革命的民众，至八九月间，帝国主义者感觉得国民党的军队镇压革命也很得力，东南局面渐趋平静，无须他们自己多驻军队了，遂调回英军一半。现在又打算调回二千，其余留驻二年，观察此二年中，中国有无革命运动发生，再定去留。国民党如果能够继续镇压中国的革命，帝国主义者便永远不须御驾亲征了！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2期 署名：撒翁

国民党也想求得 帝国主义的信任了！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向来只做军事投机的国民党，自从改组后接受了共产党反帝国主义的口号，虽然沾染了一点赤化嫌疑，却走上了国民革命的道路。武汉派开始反动之时，一面反共还一面说是继续反帝国主义，以掩饰他们的反革命。可是他们的忠实党员何应钦，最近对英帝国主义的《字林报》记者索克斯爽爽快快的说：“共产党离间吾人与外人，外人若能不为所惑，详察国民革命军自北伐开始后之记录，则自能信任吾人，而中外旧时友谊即可恢复矣。”原来帝国主义者不信任国民党，是由于共产党离间了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旧时友谊，这正是国民党反共之唯一因由！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期

署名：撒翁

国民党也要“外崇国信”了！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自命为忠于国家民族的戴季陶，他虽然不愿意反对他们的朋友——日本帝国主义者，而却极力主张反对帝国主义的英国，说“反英”是他们总理三十年革命根本政策。然而他们总理的忠实信徒何应钦对索克斯说：“共产党则以‘反英’为政策，转使国民党与外人为仇，致丧失外人对我信用；今后吾人必须与外人重行讲信修睦，以免猜忌。”原来“反英”是共党的政策，国民党是要与帝国主义讲信修睦的，这可以说是共产党的反帝国主义政策之失败，而是段祺瑞的“外崇国信”政策之胜利！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2期 署名：撒翁

张作霖的遗嘱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自从高等华人梁启超、丁文江等，发明了和平谈判友谊磋商来代替革命暴动的理论以后，汉、得民众以暴动收回租界时，奉天军阀也说要收回主权，但只宜和平交涉，而不应用暴力，可是至今也未见他们和平交涉过。现在何应钦又对索克斯说：“至于不平等条约必须废止，但不能急切从事，如共产党之所为，当用讨论形式以达吾人之目的。”这几句话，好象是张作霖的遗嘱，而不是遵守了孙中山的遗嘱：“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2期 署名：撒翁

国民党清党的效果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申报》十日广州电：“军会迎汪通电，略谓自清党后，昏庸投机分子操持政局，滥捕党员，压迫民众。”清党的效果，各处都是这样，这是他们自己供认出来的，不能说是共产党造谣离间了罢！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2期
署名：撒翁

所谓无政府党本来就是这样！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有人曾慨叹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吴稚晖，也居然怂恿蒋介石屠杀工人；汪精卫说：“所谓无政府党，也许本来就是这样。”果然，中国的一些无政府党人，对于血手的吴稚晖，不但不声罪致讨，而且还为他编辑《吴稚晖最近之言论》和《吴稚晖丛书》，说吴稚晖是“革命之健将，人群之导师”！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2期
署名：撒翁

速成的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吴稚晖常说：无政府主义要三千年后才会实现；又说：若照师复先生那样勇往，可缩到五百年或六百年。现在又有一个李权时先生说：分配绝对平均的社会，是几千万年以后也做不到的。这样看起来，吴稚晖还算一个速成的无政府主义者！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2期

署名：撤翁

资产阶级的民生主义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说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有社会主义性，有非资本主义倾向，在革命进展的策略上，在使三民主义的革命性随时代进步上，也未始不可。然而，象李权时先生，老老实实把民生主义的理论，属于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劳力价值论那一类，倒是直捷爽快！所以，谭延闿说：“近来细读总理的书却实在是资产阶级的理论。”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2期

署名：撤翁

孙中山无常识处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戴季陶曾说：“中山先生有些天才卓杰处非常人所及，然有时发起议论来竟无常识。”诚然，他曾批评马克思的盈余价值说不对，他说：“资本家有时固然赚钱，有时也亏本，可见盈余价值说不能成立。”他在民生主义第一讲里，也说：“所有工业生产的盈余价值，不专是工厂内工人劳动的结果，凡是社会上各种有用有能力的分子，无论是直接间接，在生产方面或是在消费方面，都有多少贡献。”这些议论，就是中山先生在经济学上缺乏常识之故！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2期 署名：撤翁

不甚赞助捕房的法官之下场！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关于撤换上海租界临时法院院长问题，《时事新报》叹为“行政干涉司法，损司法之尊严”；我以为损司法之尊严，其事尚小，承帝国主义者之意旨而进退法官，损中国民族之尊严，则其事实大。两星期前，《字林报》记者索克斯对何应钦说：“公共租界之困难，在于临时法院不甚赞助捕房。”何氏即出日记簿记之，谓将立告南京政府。不久临时法院院长便撤换了！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2期 署名：撤翁

汪精卫是第五代反共者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汪精卫曾历数国民党右派反共人物：第一代是冯自由，第二代是陈廉伯，第三代是杨希闵，第四代是蒋介石，不知第五代是谁？哈哈！不料就是他自己！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2期

署名：撒翁

好一个党外无党党内无派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张继告诉江汉通讯社记者：“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是国民党人一致的主张。一国之中，各阶级各团体的利害与政见不能尽同，各就所同结党议政，这是人权之一；专制帝王之下，尚不能禁止王党之外复有民党，国民党主张“党外无党”，是谓横霸！党内有派，乃世界各国大党所不免，惟不若国民党中竟有“蒋记”、“唐记”、“冯记”、“阎记”之分（谭延闿语），则未免可笑。如此而主张“党内无派”，是谓自欺！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2期

署名：撒翁

一切反革命联合起来！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中国国民党自清党以来，不但各种各色的老党员都回到党里，而且增加了许多顶括括的革命新同志：久附北洋的阎锡山同志，做了党国的总司令；交通系大将郑洪年同志，做了党国的财政部长；吴佩孚的走狗杨森同志，做了党国的军事委员会委员；连因杀武昌老百姓的刘玉春同志，也做了党国的国民革命军江左军北路纵队指挥官。将来张作霖如果失败，奉系军阀中，必然又要产生许多三民主义的忠实党员！今春刘湘、王陵基、石青阳等，在重庆大举反共清党时，街上大贴其“一切反革命联合起来！”的标语，当时闻者颇以为怪，现在看起来，何怪之有！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2期 署名：撒翁

“杀尽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共产党破坏国民党”，这是国民党反共的唯一理由；汪精卫说：“国容共，共不容国，形成分共等等痛史！”。然而事实上，倒是张继说：国民党人一致主张“党外无党”；并且最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发出的口号，第一个就是：“杀尽中国共产党！”他们的宣言说：“清党工作不能以肃清跨党分子，做到‘党内无派’为已足；尤须将中国共产党之势力根本消灭，中国共产党之组织根本推翻，做到‘党外无党’而后已。”请问究竟是谁不容谁？谁破坏谁？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2期 署名：撒翁

黄埔失败第一个重大原因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

蒋介石告别黄埔同学书说：“我们同学应当一致反省，何以一往无前的胜利中，会造成不可挽救的失败呢？第一个重大原因，当然是全体同学意志不能统一，精神不能团结，不顾团体的重要，只逞私人的意气，同室操戈，自相残杀，这是我们最不幸的一点。但如果把违背总理主义的一小部分共产的同学，清除出去，而其余大多数都能很精诚的为主义奋斗，我们仍是不会失败的。”照这几句话，可以看出蒋介石已经认识清除共产的同学，确是黄埔军失败之第一个重大原因了。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3期 署名：撤翁

团结三民主义信徒之结果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

黄埔军初成立时是何等精悍，可是自从三月十二以后，蒋介石专门引用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清除共产分子，以团结三民主义的信徒。其结果三民主义的信徒团结起来了，而黄埔军腐化了。那些腐化的情形，用不着别人造谣离间，最近蒋介石告别黄埔同学书说得好：“骄傲，奢侈，放纵，贪污，诈伪，浪漫，不守纪律，不知责任，一切新旧军阀官僚的恶习惯，都丛集于你们的身上。……丧失了革命的志气，只计较官阶的大小，金钱的多寡。”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3期 署名：撤翁

军阀政客是那些人？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

蒋介石告别黄埔同学书说：“这次革命的方法，根本上已经是错误了，如果我不辞职，不能跳出现在这个环境，革命断无彻底成功的希望；就是我坚持到底，我可预料将来最好的结果，亦不过做几个军阀的掌柜和政客的傀儡而已。”这几句话将置欢呼“共产党肃清了！国民党统一了！国民革命就要完成了！”的沪宁衮衮诸公于何地！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3期 署名：撤翁

还是吴稚晖说老实话！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蔡元培在两路党部演讲：“及国民军到上海，……（共产党）当时主张攻入上海租界，使风潮扩大，……于是拘捕共产党徒，风潮不致扩大。”可是事实上，当时共产党并没有攻入租界的主张（有多种宣言布告可证），这是上海市民所知道的；所以，国民党军队宣布解散屠杀总工会纠察队的理由，只好说是因为工人互斗。然而吴稚晖在书汪精卫铣电后却说：“我们老实不客气，自然提出反共产口号，自然围缴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枪械。”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4期 署名：撤翁

反共清党与收回租界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白崇禧对十军官兵训话：“若不是共产党捣乱，我们就早通告向外人收回租界了。”现在并没有共产党捣乱了，他们何不通告外人收回租界呢？哈哈！事实恰正相反，共产党捣乱时收回的汉口租界，反共清党以来，却要在三民主义的信徒国民党忠实的党员手中失去了！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4期

署名：撒翁

华官委托捕房越界捕人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租界越界捕人，这是中国人素所愤恨的事。不料近来上海法租界捕房竟公然驾汽车直入南洋大学捕去学生一人，该校当局向捕房交涉，法捕房谓：“法租界巡捕入华界捕人，全系事前受中国军警当局之委托，而有此举动。”说要向外人收回租界的白崇禧，高唱民族主义的国民党，做出这种甘心断送主权的事来，他们和何丰林、孙传芳有什么两样？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4期

署名：撒翁

为新军阀造机会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孙科报告讨唐内容谓：“若不将此极大之障碍扫除，即北伐成功，亦不过为一般新军阀造机会，徒使国无宁岁，民不聊生而已！”孙科这几句话说得痛快之至！可是贵党的军事领袖们，那一个和前几天还自称纯粹三民主义的忠实党员唐生智不是一样的货色？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4期
署名：撒翁

蒋介石是向田中求婚吧！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从前替段祺瑞保镖的寺内内阁，实际上就是田中内阁。蒋介石此次赴日本，唯一目的也就是想求这位田中保镖；至于向宋母求婚，不过是掩人耳目的鬼话。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4期
署名：撒翁

国民党仍难团结吗？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戴季陶是主张分共最早而最有力之人，他以为共产分子留在民党内，则党员间共信不立，有碍党之团结。现在他的目的完全达到了，共产分子出去了，三民主义的信徒团结起来了。然而戴季陶最近致第一中大学生函，仍然是痛哭流涕的说：“谁知今日纠纷之深，已至不易条理，果全体同志，去其派别之感情，从事于实际建设之分工，则合作精神，当可日趋丰富，否则愈欲团结，而团结愈难！”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4期 署名：撒翁

反共清党后的忠实党员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白崇禧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报告：“前次孙军渡江，在龙潭激战的时候，那时本党非常危险。共产党人都说‘共去国无党’，那是何等的痛心！离城数十里作战，而党内的职员，逃走一空，招牌也快要收了；……及后孙军败走，又慢慢回来。……倘若龙潭之役败了，恐怕江苏全省更无人敢言国民党。”哈哈！国民党反共清党后的忠实党员，原来就是这样！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4期 署名：撒翁

双包案的清党运动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在上海、杭州努力清党的陈希豪，现在以反对西山会议派的中央特委而被通缉，说他是假清党；在湖南、湖北努力清党的唐生智，现在也以反对南京中央而被讨伐，说他也是假清党。真清党，假清党，国民党这种双包案的清党运动，实在闹得人们头昏脑晕，一世也弄不清楚！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4期

署名：撒翁

枪决大批共犯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某处“枪决大批共犯”，各报上差不多天天都有这样新闻。我们记着：复仇是人类的天性。异日如有“枪决大批国犯”、“枪决大批……犯”的事，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切勿到那时忽然想起大喊什么集会、结社、言论、信仰之自由！大家都记着，毋忘今日！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4期

署名：撒翁

替 代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陈德征在上海市党部报告政治说：“近日报载奉张把京学生二十四人，同时在京城天桥枪毙，这种行为何等凶狠，何等残暴！”奉张固然凶狠残暴，可是你们也应该拿镜子照照自己的面孔是怎样！所以，《申报》记者陈冷君很愤慨的说：“世人误认替代为改革，因之虽经若干次替代了后，而仍无一改革；替代者易其主持之人也，改革者变其行为之实也。……失意了军阀，闻政府军阀之或借外债或压人民，则必通电反对；及至政府之军阀倒，而失意之军阀代之为政，则仍进行其借外债，或继续其压人民，……此其主意，为以人易己，取而代之之意，无所谓改革也！”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4期

署名：撒翁

汪精卫行为不当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汪精卫既然决心反共，既然称蒋派及西山会议派为“反共先觉”，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和这班先觉们合作，而鬼鬼祟祟的跑到武汉，又跑到广东呢？所以，孙科大喊：“汪精卫行为不当！”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4期

署名：撒翁

有趣煞的总理纪念周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好一个烈烈轰轰的三民主义以党治国的党，又是最神圣庄严的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除了白崇禧恭维共产党一阵、挖苦国民党一阵外，弄得做政治军事报告的，每次只有一个说三句话就完了的覃振唱独脚戏；国民政府的纪念周，也是李烈钧一个人说几句考生对空策式的报告，弄得他叫苦连天的喊：“勿使烈钧个人长此搜索枯肠！”既然如此为难，这种“礼拜式”的纪念周就免了罢！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4期

署名：撒翁

作壁上观的北伐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近来国民党叫得最高的口号，算是“继续北伐”了；然而李烈钧愤愤地说：“津浦路南未见我们一兵一将。……现在我革命军中，少一个人；昔秦围赵于鉅鹿，诸将作壁上观，宋义亦留不进，微项羽孰能破之，我军今日即少项羽其人者。”可是后方向老百姓逼迫军饷却十分认真咧！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4期

署名：撒翁

国民党眼中的革命成功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自从国民党清党反共,遏止民众的革命高潮,以前所得的收回汉口、租界这一点小小胜利,英帝国主义者都要乘势推翻,国民革命的成功在那里?蒋介石在神户讲演说:“国民革命之大业,今已成功三分之二。”他显然是指中国三分之二的地方已经挂了青天白日旗。从前挂上五色旗便算是共和国成功,现在挂上青天白日旗便算是国民革命成功,哈哈!革命大业原来是如此吗?或者是国民党眼中的革命成功不过如此!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4期 署名:撒翁

以国民党党员为限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凡在国民党政权之下的文武官吏及全体兵士,都照例要加入国民党,这种滑稽的办法,我们自不去管他。最发松的是:财政部的会计师注册章程,竟规定充任会计师者,以国民党党员为限。当教职员的虽无明文规定,事实却非入党不可。将来当医生的,做律师的,也难免有这样横霸的限制。我以为这样扩充党势还不痛快,最好由官厅令示通衢,凡行路者以国民党党员为限,庶几全国四万人很快的都成为三民主义的忠实党员!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4期 署名:撒翁

横逆变成了神圣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去年今日，江浙商、教、新闻各界的绅士们，到处都把党化教育及青天白日旗当做两件最横逆的东西咒骂；现在国民党的武力征服了江浙，这两件横逆的东西，马上都变成了最时髦的东西，神圣的东西。这是很新奇的事么？一点也不新奇。被谁的武力征服了，便颂扬谁是太祖武皇帝，这班绅士们一向是如此。所以他们现在反某某党，反某某主义，都不成什么问题。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4期 署名：撒翁

我真是害了你们了！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三民主义的黄埔学生之腐化，蒋介石未必不早已知道，然而他因为要培植私党以反共，便不得不极力拉拢这班反共的腐化分子。黄埔学生向邓演达索钱的理由是，校长（蒋介石）说过：“黄埔学生走遍天下有钱用。”邓演达拘留了几个私刻印信诈欺取财的黄埔学生，蒋介石和邓演达大翻其脸。可是现在蒋介石告别黄埔同学书说：“如果一般同志都要靠领袖谋生活，不消说做领袖的将穷于应付；就算他真有能力满足大家的欲望，也只是增长了大家的依赖心。我觉得你们似乎太依赖我！有的不怕做坏事，以为有校长在，上级长官的惩罚是无足介意的；有的不怕放弃职务，以为无论如何，校长总有工作给我们做的；你们果真这样想，我真是害了你们了！”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4期 署名：撒翁

国民党中的端、庄、刚毅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何应钦曾说，“不能不承认我们的组织纪律宣传，有逊于共产党。……真不能不相当认为共产党之长处。……采取对方的长处。”于是胡汉民便暗暗驳道：“以为打倒CP的势力而用CP的方法，这也是不对。”现在白崇禧又说：“我还知有老顽固的脑筋，以为共产党不好，他的方法也不好，我们国民党不应该还用他的方法，这也是错了。共产党主义是坏，但是他的长处也不能抹杀。本党的组织方法，也有些地方是采取了共产党的方法。要知道不是一切都不可效法，采人之长，补己之短，这是没有妨碍的。”于是邹鲁急了，站起来学国故派的口气说：“我党组织及纪律，在同盟会时代即极严格；或谓年来我党组织效法共党者，大误。”张继更大喊道：“国民党之反共，不特其主义而已，即其组织法，亦当起而反对之，今国民党中尚有人以为共产党之组织有可采处，殊属大谬！”大约现在的国民党中，连何、白辈，还不免有李鸿章、张之洞辈二毛子的余臭，必须如邹鲁、张继等西山会议嫡派，才有端、庄、刚毅辈的正气。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5期

署名：撒翁

盛哉党化!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上海海左书局,大登其“党化新小说”的广告,其内容除《中山演义》、《蒋介石演义》等外,则为《梁红玉》、《红粉英雄》、《隔簾花影录》、《情场之变化》、《情海风波》、《风琴小曲》等。上海建新手帕厂,又有“党化手帕”的出名,盛哉党化运动!将来恐怕还有党化妓院出现!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5期

署名:撒翁

辽皇帝与党皇帝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传说张作霖将做皇帝,国号曰辽,改元曰宏宥。天下事无独有偶,南方有了党国,北方便有了辽国;辽皇帝的年号是“宏宥”,党皇帝(张继《江南晚报》发刊词语)的年号应该是“训政”。这两位皇帝谁是半斤,谁是八两,终须血战一场杀死无数老百姓,才见分晓!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5期

署名:撒翁

改组与纠正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段祺瑞、徐世昌倒了，研究系的机关报北京《晨报》，因为不受进步的青年欢迎，遂宣言改组，脱离研究系的关系。孙传芳倒了，他们的上海《时事新报》，因为不敢开罪于国民党，遂宣言改组，诡称由研究系让渡于新组织，并且装出国民党机关报的态度，比上海任何报都党化些；将来国民党失败了，他当然又要改组。汪精卫开始反共的时候，大做其“错误与纠正”的文章，说从前联共是错误，现在反共是纠正；我看他这种东倒西歪的人，将来应有第二次、第三次纠正。人们只要巧于运用改组与纠正这两样法宝，自不难头头是道。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5期 署名：撒翁

党 国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近来在报纸上时常看见一个新鲜而不可解的名词，叫做什么“党国”。所谓“党国”，不知是指“党与国”，还是说“党的国”？若横霸之徒，硬说是“党的国”，则北洋“军国”即倒，仍然没有“民国”；非国民党党员的老百姓，仍然是无国之民或是党国顺民！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5期

署名：撒翁

好大胆的胡适之、褚辅成！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

胡适之鼓吹“市政超然于政治潮流之外”，褚辅成主张“市政脱离政治而独立”，并且主张市自治及市长民选。好大胆的胡适之、褚辅成！不怕党国先生们治你们以“反对以党治国”之罪吗？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7期

署名：撒翁

资产阶级独裁的上海市参事会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

上海市政府参事十三人，清一色的资本家，他们多年梦想的商人政府，现在居然实现了；所以商界各团体致参事会成立典礼颂词说：“政商各界网罗无遗”，诚一时之盛事也！可是《时事新报》所谓：“为民有、民治、民享之全民政治，决非阶级独裁及变相之迪克推多政治。”未免有点不能自圆其谎罢！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7期

署名：撒翁

主义的流弊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

我们固然力赞民族运动(限于被压迫者),然而不相信什么民族主义。我们固然不赞成现在就要废除国家政府这种制度,然而却反对什么国家主义,更未闻有什么政府主义(Etatisme应译“国家主义”,只有李石曾译做“政府主义”)。我们十分提倡读书,然而不能赞成什么读书主义。代表物价的金钱虽然是货币商业时代不可少之物,然而却不应因此提倡什么拜金主义。譬如人们都必须吃饭,而却不应有什么饭碗主义。因为这些事成了主义便流弊无穷。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7期 署名:撒翁

反共清党后的两个印象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

国民党一致反共清党后,有两件事给人们的印象万分深刻: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上海领事团,要取消北河南路所贴“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帝国主义”等标语,和英国要推翻汉案协定;一方面是何应钦主张“与外人重行讲信修睦”,与帝国主义者恢复“旧时友谊”,和李济琛向广州中山大学学生,“非笑以武力或经济方法推翻帝国主义之说”(七日路透电)。胡汉民曾说:“因为CP是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我们已打倒CP就只好中止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运动了,这岂不是同时也打倒了国民党吗?”不知他忘记了这几句话没有?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7期 署名:撒翁

数典忘祖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

有些国民党人，大骂共产党主张“耕者有其地”是扰乱农村秩序，殊不知“耕者有其地”这句话，是国民党老祖孙中山说出来的，并不是共产党的特别发明。这种数典忘祖的国民党员，和马寅初攻击马克斯的劳力价值，是同样的糊涂；因为劳力价值说，并不始于马克斯，而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老祖斯密亚丹和李嘉图的发见。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7期 署名：撒翁

驳马克思不是容易的事呀！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

缪斌在他反驳马克思主义的大文里，发见了“马克思误于研究的材料，只偏于英国孟加斯得工业区之一隅，所以材料不免偏缺”。郭任远在他反驳马克思主义的大文里，发见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没有重大的关系。”反驳马克思学说不是容易的事，在学问贫乏的中国，无论能够赞成马克思学说的，或是能够反驳马克思学说的，都算是可贵。可是象这两位缪先生和郭先生的妙文，也居然印刷出来问世，我未免要为“徒灾梨枣”的梨枣痛哭了！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7期 署名：撒翁

郭先生和自己开玩笑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

郭任远想反对马克思主义,又恐怕人们因此说他头脑顽固,于是在非难马克思主义之前,高唱表白他自己“是极端反对资本主义和一切关于经济的妥协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是主张社会革命和经济革命的。”并且大喊“马克思学说太不革命”,又大喊“我的反共并不是因为他们太赤,倒是因为他们太不赤;人家反共是因为相信他们是过激派,我的反共却是因为他们太不过激。”我看这位郭先生,未免太和他自己开玩笑了!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7期

署名:撒翁

移步换形的骗术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

章宗祥、曹汝霖留学东京时曾说:“我们虽不主张革命,而仍要以流血达到立宪目的。”袁世凯曾说:“我铲除了国民党仍然拥护共和。”蒋介石对汪精卫说:“我清除共党后仍要做左派反对右倾。”汪精卫、孙科在汉口说:“我们反共后仍然要反帝国主义与讨蒋。”这可算是他们一脉相传移步换形的大骗术。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7期

署名:撒翁

反共而不流入资本主义？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

罗家伦在他《转变青年的思想》文章里说：“不可因攻击共产主义而流入资本主义，或变相的资本主义。我们反共则可，反共而流入资本主义则不可。”哈哈，罗先生！这是你在白纸上写下了的黑字，请你将来别忘记了！请你赶快去问问你的老师胡适之、顾孟余、马寅初（他们的头脑毕竟比你还清楚一点）；既然反对共产主义，又不要流入资本主义，则将在何种经济制度之下建设工业？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7期

署名：撒翁

“杀其人而用其法”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

张继说：“国民党之反共，不特其主义而已，即其组织法亦当起而反对之。”不错，国民党改组后党章是共党起草的，是效法共党的，是应该反对的。不但这个，改组后的宣言及政纲，也是共党起草的，更应该废掉。不但这个，连“反帝国主义”及“国民革命”这类怪话，也不是党国的国货，乃由共产党搬到国民党的，《向导》周报出版以前，国民党的文献上实在找不出这些怪话，这更是应该急于废掉的。否则不但反共不彻底，而且是胡汉民指斥的所谓“杀其人而用其法”，未免有点不体面吧！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7期 署名：撒翁

夸大狂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

戴季陶称孙中山为继承儒家道统之圣人,胡汉民则谓“中山贤于儒、墨”,而陈白虚更称中山“集古今中外诸圣之大成”。国字号的人们,称中山为“国父”不算数,近来还恭维他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救星”。“夸大狂是中国人特性之一”,这句话的确有点道理。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7期

署名:撒翁

同志之标准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

江苏财政厅电各县长说:“第一批大县十万以上,中县五万至三万,小县一万以上,……按数于十号解到……本厅长尊之敬之,引为同志。倘仍漫不经意,……立予罢斥。何去何从,惟该县长自择焉!”那末,一班县长们,不会搜刮老百姓的钱只好滚蛋!不愿滚蛋的,只好赶快搜刮几万洋钱继续做同志——三民主义的忠实同志!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7期

署名:撒翁

世界太左了！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

胡汉民说：“共产党是右派，国民党是中派，无政府党是左派。”张继说：“我不是右派，我比共产党还左。”《革命周刊》(无政府党的机关报)说：“共产党倒是右，而民生主义倒是左了。”李石曾说：“蒲派(无政府主义)必属于左，而马派(马克思主义)必属于右。”又说：“武汉之共产革命为右派，上海护党革命为左派。”(以上俱见《革命周刊》)可是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和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封建豪绅，一致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而欢迎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与无政府主义的吴稚晖、李石曾、张继等，那么现在的世界未免太左了，难怪有人叹息“人心不古”！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7期

署名：撒翁

中国人的晦气!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

可怜的中国人,智慧受束缚于孔氏一尊者二千年,至今犹未能完全解放;现在又加上什么“党国”、“党治”、“党化”、“党外无党”这类怪东西来束缚,真是中国人的晦气!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7期

署名:撒翁

汪精卫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

蒋介石说汪精卫是伪君子;上海市党部骂他“实在是千刁万诈的小人”;汪精卫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是君子还是小人?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7期

署名:撒翁

不 同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

程潜曾说：“我们反蒋，总要有点与蒋不同才好。”那时沪、宁间反奉反唐之声甚高，他们与奉与唐有什么不同呢？是的，反唐因为他通奉；然而反奉又因为什么呢？反赤，压迫工农民众，争夺地盘，苛捐苛税逼军饷，献媚于帝国主义，摧残异己者之集会、结社、出版、信仰自由，纵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他们有什么不同，他们为什么而战？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7期

署名：撒翁

“第五层序”的革命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李石曾谓苏俄革命属于“第三层序”；他们（无政府党）和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工人，是三民主义的民生革命，属于“第四层序”。不错，他们的革命，比苏俄更进步了一阶段；可是他忘记了还有一个“第五层序”的革命——张勋复辟！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8期

署名：撒翁

反共产的国民革命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胡汉民曾说：“除掉了革命的精神，就不成其为中国国民党。”这句话诚然不错，可是现在国民党革命的精神是什么？胡汉民答道：“反共产的国民革命。”原来国民党所谓国民革命就是这样解释！所以李济琛在广州中山大学演说：“本年内国民党除清赤外一无成就，殊属可耻！”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8期 署名：撒翁

下层轰动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冯玉祥总结中国共产党的罪状是“下层轰动”。可是中国共产党实在惭愧得很，还并未做到下层轰动，冯玉祥未免太替我们吹牛了！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和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演讲里，都是保育政策的理论，都充满了非下层轰动的神气！在这一点，我们不能不说冯玉祥及其他忠实党员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在这一点，他们和梁启超党主张贤人政治、反对暴民专政的理论，也没有两样，都同样以为民权自由应该是上层绅士恩赐的，即统治者的仁政，不应该由下层民众自动的争取。不过中国革命之成功及民权自由之实现，是由上层绅士的保育政策或是由下层民众轰动，将来历史先生会答复这个问题。其实各国的革命史已经答复了这个问题。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8期 署名：撒翁

少一个皇帝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李烈钧前说：革命军中少一个楚霸王；现在又说：少一个皇帝，中国非皇帝不能统一。可见这班英雄们非伏在皇帝脚下不过瘾；而且非一独尊的真皇帝不可，多头的党皇帝仍然是不过瘾。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0期

署名：撒翁

共贼汪精卫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汪精卫大喊：“杀尽共产党”（见两件大事文中），又大喊：“一个共产党徒，和一条毒蛇一只猛兽一样，决不能听他留种于人世的。”（见他们十三日宣言）邓泽如指汪（精卫）、顾（孟余）、何（香凝）、陈（公博）、甘（乃光）、王（法勤）、潘（超五）、王（乐平）等，是广州十二月十一日共产党起事的主谋正犯；国民党中人一致说顾陈二人是共产党；南京讨共大会的请愿书，也明言“共贼汪精卫”；因此，汪精卫等都应该杀尽，决不能听他留种于人世，这乃是很正确的逻辑。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0期

署名：撒翁

反共的共产国际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汪精卫在汉口反共是受了第三国际的命令”，这种妙想天开的话，真非三千年后的无政府主义者说不出。蒋介石政府现在与苏俄断绝国交，也许是受了第三国际命令，将来广西老反蒋时，也许这样说。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0期

署名：撒翁

我们发见了国奉之不同了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以前我们不明白国、奉之间因什么不同而战争，现在发见他们的不同了，乃是国民党军阀以为奉天军阀讨赤不彻底，所以他们先北京政府而与赤俄断绝国交，蒋介石比张作霖更有牺牲中俄协定的勇气。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0期

署名：撒翁

请看国民党的民族主义！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国民党改组时广州支部邓泽如等反对打倒帝国主义的政纲，函呈孙总理，一则曰“使我党丛国际之仇怨”，再则曰“使我党永无获得国际同情之一日，更使我华侨党人在海外无复立足之余地。”蒋介石开始清党时，李石曾对汪精卫说：“目前只宜反对北洋军阀，不必牵及反对帝国主义。”最近蒋介石对新闻记者说：“我们既然要对俄绝交，便必须与各国一致来反对第三国际。”这就是国民党的民族主义！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0期

署名：撒翁

李宗仁骂自己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李宗仁的删电说：“……无年不战，推原祸始，固由野心武人，不识政治，不愿服从先知先觉之指导者，而自作主张。”这位屡次通电发表主张的李宗仁，想必不是武人，抑或不是自作主张。是的，可怜斗大的字还不认识一担的李宗仁，发表煌煌大文的主张，他那里知道是骂自己！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0期

署名：撒翁

国民党死亡之正式讣告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象汪精卫这样东倒西歪的人，当然是左右站不住；然而反汪的人象邓泽如、古应芬、马超俊（南京讨共救粤大会首领，曾因在兵工厂作弊被孙中山驱逐离粤）、谢英伯（上海讨共救粤大会主动者，曾因反对改组被中山开除党籍）这类人，都群起跟着广西老向汪精卫、何香凝等打落水狗，这便是改组后的国民党寿终正寝之正式讣告。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0期

署名：撒翁

之洞主义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据戴季陶《青年之路》所说，孙中山先生的救国主义，不外是恢复忠孝仁爱民族固有的道德及提倡西洋科学；如此，我们并不需要什么孙文主义，我们原有的张之洞主义，老早就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了！至多只能说这样的“之洞主义”比孙中山早年的“鸿章主义”（吴稚晖的话）进步了一点。或者有人说之洞主义比鸿章主义还退了一步，因为他有复古的趋势。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0期

署名：撒翁

国民党投降了研究系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在表面上看来，上海《时事新报》简直是国民党的机关报，好象是研究系投降了国民党，然而在政治主张上看起来，如贤人政府、联省分治、仇俄反共，本是从进步党到研究系多年的一贯主张，现在国民党都一一采纳，无怪乎《时事新报》得意洋洋的举起双脚来欢迎，这便是国民党投降了研究系。两党二十年来的政治争论至此才告了结束。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0期

署名：撒翁

杀人的国民党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国民党大喊共产党杀人，仿佛是千真万确的事。然而到底共产党在两湖杀了多少人，近来在宜兴、无锡、广州杀了多少人，各报都含含糊糊，未曾指实；倒是最近国民党在黄安杀人一千五百，在广州即十四一夜杀了二千余人，上海各报都有确实数目可稽。这也许是各报受了共产党的金卢布故意宣传国民党之惨杀！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0期

署名：撒翁

小人党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吴稚晖说汪精卫是卑鄙小人,说胡汉民是刚愎小人,说徐谦是大胆老面皮的小人,说顾孟余是懒惰阴刁的小人,说陈公博是贪财无厌的小人,说甘乃光是善伺人意的小人,说 he 自己是酷刻小人,如此说来,国民党简直是个小人党。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0期

署名:撒翁

吃人的血腥的道德文化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国民党一面大喊恢复民族固有的道德文化,一面在广州一夜枪决二千余人(上海各报广州电及薛岳布告都如此说),路上死尸累累,非常凄惨(电通社十五日广州电);截至十六日止,殍尸千五百余具(《时事新报》十一日香港电);女共党数人在大南路被人用棉花包裹,浇以火油焚烧(《申报》十五日香港电);截至最近,枪决共党确数,五千七百人(《申报》二十一日香港电)。有人说中国民族旧有的道德文化是吃人的是血腥的,这句话或者不错。国民党正在恢复这种道德文化!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1期

署名:撒翁

究竟是谁惨杀？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东方社十九日香港电说：“每日被枪决之共党(其实不尽属共党),尚不下百人。……除抵抗之兵士、警官以外,被共产党员所杀者,并不甚多;所谓达二千人之惨杀者,殆不能不归罪于自称自卫军之李福林军、薛岳军及右派工人会之广东总工会、机器工会等之复仇与报私愤行为也。”难道日本帝国主义的通信社也赤化了吗?何以他们也说此次广州之惨杀者是国民党而非共产党呢?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1期

署名:撒翁

研究系称心了罢!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三一八”惨案发生时,研究系等绅士们,看见共产党领袖未被段祺瑞杀头,老大的不称心,大喊共产党及其领袖藏在群众背后牺牲青年。自从李大钊被绞杀以来,上海、广东、广西、汉口、湖南、河南、北京等处,成百成千的共产党被腰斩被杀头被枪决,而且有被剥皮肢解火焚者,绅士们该称心了罢!可是大家要记着:“复仇是人类的天性”。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1期

署名:撒翁

共产党是抢劫的吗？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据资产阶级的报纸宣传，除杀人以外，抢劫也是共产党罪恶之一。可是此次广州共党退走之后，据广州官商电报，都说中央银行金库安全，共产党是抢劫的吗？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1期

署名：撒翁

叶开鑫与汪精卫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墙倒众人推，这本不是什么奇事。况且汪精卫这座东倒西歪的墙，推倒了更没有什么可惜。不过叶开鑫也居然通电臭骂汪精卫，这不是汪个人倒霉，应该是国民党可耻的事。然而现在的国民党并不觉得可耻，因为他们都变成了和叶开鑫一样的货色。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1期

署名：撒翁

反共先生的下场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不独张发奎、黄琪祥、李福林因共党头衔被讨伐，不独汪精卫、何香凝、顾孟余、甘乃光等因共党嫌疑被拿办，而李汉俊、詹大悲且以共党首领名义被杀，孔庚、李书城也以共党名义被捕。今后有枪的人处置异己最简便方法，就是给他戴上红帽子。各派反共先生，将来都难免作法自弊，唐生智、汪精卫等的下场，便是很好的先例。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1期

署名：撒翁

真正国民党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日)

真正国民党，只有西山会议派，亦即环龙路四十四号的国民党。怎见得？因为只有他们自始就反共反俄，而且最彻底。其余若汪记、蒋记、冯记……记……记国民党，都曾经联共联俄，即现在反共反俄还是不彻底，还是不敢公然取消第三国际及中国共产党代他们起草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政纲及党章。只有西山会议派要完全复活改组以前的国民党，这才算是真正老牌的国民党呀！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2期

署名：撒翁

如此这般的反共清党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日)

吴老狗说汪派反共是受了第三国际命令；现在环龙路的真正国民党又说：“中央全体会议为受第三国际主使苏维埃之走狗”；大约除西山会议派诸先觉以外，其余所谓反共清党，都不过是如此这般的一套把戏。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2期

署名：撒翁

白崇禧口中的清党大功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日)

白崇禧在汉口演说：“过去的清党，有报私仇者，有受厚贿而为富家翁者，误杀冤死者不乏其人。”国民党忠实党员这样的清党大功，大概不是共产党造谣吧！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2期

署名：撒翁

分治合作与联省自治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日)

程潜在汉口演说：“最近上海有所谓分治合作说，实即变相的联省自治制度，完全违反总理学说，这种人就是作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工具。”不知道李石曾听了这几句话作何感想？陈炯明、赵恒惕及《时事新报》记者听了这几句话又作何感想？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2期

署名：撒翁

孙中山瞎了眼睛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日)

白崇禧致电何应钦等表示对蒋出处意见，谓“领袖出处方式，须极磊落，介公于汪派诸附逆委员，不免瞻徇过甚，于张、黄诸叛将，不免庇护过深，倘对汪派及张、黄不有明显态度，窃恐为盛德之累。”是的，张、黄想利用共党，汪又想利用张、黄，蒋又想利用汪，这班叛逆一串的利用，都因为要对付忠实同志广西老。孙中山在广州革命的时候，专重用这班叛逆，而未曾看中忠实同志广西老，真算是瞎了眼睛！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2期

署名：撒翁

容安与共信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六日)

于右任说：“石曾先生以为世界只有马克思、蒲鲁东两派，而忘却除马、蒲外，尚为吾党总理孙中山先生可与马、蒲鼎足而三也。”又说：“吾党固不必取法苏俄，亦何可妄自菲薄，弃固有之信守，而从蒲氏以安那其主义为出发点之分治合作说耶。”戴季陶曾谓国民党容共而伤了党的共信；照于右任的说法，国民党容安，也未免有伤共信吧！因此，反共清党之后，应该有反安清党的举动；否则国民党的主义仍然不纯粹呀！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4期 署名：撒翁

金箍棒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六日)

国民党人说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好象孙悟空在猪精腹中舞金箍棒。共产党是否承认这句话呢？承认的。共产党的金箍棒是什么？不过是反帝国主义、军阀及主张工农民众政权。可是安那其派在国民党内所舞的金箍棒，乃是实现蒲鲁东的分治论与排斥马克思派；研究系在国民党内所舞的金箍棒，乃是贤人政治、反民众运动、联省自治与仇俄反共。他们说共产党挂着羊头卖狗肉，他们自己何尝不是挂着羊头卖王八肉。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4期 署名：撒翁

蒋介石也是共产党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六日)

广西老誓必铲除的张、黄军队，而蒋介石却定要保全，密令他们开到浙江来；广西老正在进兵湖南，而蒋介石却派代表和唐军接洽，允许他们的地盘。蒋和广西老这样作对，将来广西老和他正式翻脸，也许宣布蒋介石也是共产党；因为张、黄、唐的军队，前曾有人称为武汉的共产军。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4期

署名：撒翁

武汉又多一个冤鬼！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六日)

李汉俊、詹大悲已经杀得冤枉极了，现在又有一个林可彝，也以共党重要份子而枪决了，武汉的冤鬼又多一个！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4期

署名：撒翁

国民党根本不要民众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六日)

“反共后不要民众”，汪精卫曾说这句话是共党造谣诬蔑他们的。现在怎样么？自从十二月十四日，蒋介石在招待上海新闻记者席上，发出“停止一切民众运动”的主张，方声涛、杨树庄即在福建下令停止民众运动；胡宗铎即解散了武汉一切民众团体；蒋梦麟即“函请浙江省政府并令行浙江省党部，自即日起，各级党部，一律暂停民众运动之工作，严禁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聚众开会，结队游行等举动”。这难道也是一般无智识者借党的招牌所做的吗？非也！军阀党根本不要民众。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4期 署名：撒翁

一朝天子一朝臣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六日)

西山会议派得势之时，便有人恭维他们是“反共先觉”，南京发出“反特委会即反革命”的标语。特委会取消，蒋派占住了南京，便有人提议“取消非法特委会所产生的各级党部各机关”，“永久开除西山会议派党籍，并封闭环龙路四十四号反动机关”，“立即拘捕谢持、邹鲁、覃振、居正……葛建时等”，“抄没西山会议派财产”等等。张继先生回想得意大书“当年碧云寺今日紫金山”联语时，未免有点今昔之感吧！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4期 署名：撒翁

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是 救国救民的呀！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六日)

本月十二日《申报》载爪哇华侨告全国民众书，历数福建国民党政府强迫种烟、勒索烟捐种种残害人民之事，谓为“较之军阀时代为尤烈”。我想方声涛闻之，必然勃然大怒举起烟枪（这位忠实同志烟瘾之大我所亲见）骂道：我已下令停止民众运动了，你们还敢散布什么告民众书吗？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4期 署名：撒翁

可怜的胡汉民！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六日)

胡汉民致函某委员说：“目击吾党命脉，已日就陆危，比虽昼夜彷徨，勤筹补救之方，而茫无所得。”你不是说过：“清党以后的中国国民党一定比清党以前的中国国民党要好，更要进步”吗？现在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完全清除了，并且成百成千的屠杀了，和苏俄已绝交了，民众运动也下令停止了，国民党应该大大的进步了，何以党的命脉反而日就陆危，无法补救呢？可怜的胡汉民，你昼夜彷徨些什么？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4期 署名：撒翁

忠实同志又多一个！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六日)

上海中央社(国民党的通信社)说：“北方健将李景林氏，对于革命工作，素极努力，已往之成绩，固彰彰在人耳目，……上月二十二日，在太原通电，就国民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兼北方前敌总指挥之职。”是的不错，李景林一向努力革命，谁也知道。恭喜国民党，又多了一个忠实同志！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4期

署名：撤翁

蒋介石也谈什么土地问题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六日)

蒋介石最近在南京党校纪念周说：“在训政实施时期，土地问题，至为重要，我们要丈量每县的土地，以为平均地权的步骤，土地问题如不得到解决，则不能实现我们总理的民生主义。”蒋介石也说说什么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然而他的方法是要经过丈量每县土地的步骤。他又说：“要解决土地问题，不能不有户口的调查。”可是自从顺治皇帝订立清丈编审法令，一直闹到洪宪皇帝设立经界局，二百年也未曾丈量好那一县的土地；自从顺治三年订立户籍律以调查军、民、驿、灶、医、卜、工、乐诸色人户，一直到现在不断的调查户口，也从来不曾查清那一地方的人口实数。每县各乡耕种的土地实有多少，耕种的人实有多少，只有各本乡的农民自己查得清楚，若候政府丈清了每县的土地，查清了每县的户口，再来实现平均地权的三民主义，这大约也和吴稚晖三千年后的无政府主义相差不远吧！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4期

署名：撒翁

吴稚晖识主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六日)

昔史宪诚谓唐诏使曰：“我本奚，如狗也，惟知识主。”蒋介石车驾临南都，李烈钧避之府中，独吴稚晖以党国元老而郊迎蒋于车站。君子曰，吴稚晖可谓识主矣！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4期 署名：撒翁

逼钱与打战

(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日)

逼钱与打战，固然是革命时代所不能免的事，然只是逼钱与打战，丝毫不为任何阶级兴利除弊，此所以国民党的政治和北洋派的政治没有两样，甚至于北洋派中的孙传芳，还不象国民党现在这样肆无忌惮的逼钱。至于怎样逼钱，如加盐税，抽亩捐，预征钱粮，这般专门杀穷人的办法，国民党也和北洋派一样；北洋派打北洋派，国民党打国民党，这般自相残杀的打战，国民党和北洋派也是一样；此所以国民党的势力必然和北洋派一样的不能长久存在。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5期

署名：撒翁

杀 穷 人

(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日)

财政没有办法，谁也不能久握政权。中国财政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自管海关盐税，停止赔款及内外债的本息偿还；一是推翻地主阶级，土地归农民，由国家征收农产税。前者每年在一万万元以上，后者每年至少有二万万元。可是北洋派、国民党都不敢采用这两个办法中任何一个，所以他们都只得采用苛捐杂税等杀穷人的办法，而终于自杀。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5期 署名：撒翁

两件肉麻的事

(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日)

有许多人从前非常鄙视孙中山及国民党，或者即是现在仍然对国民党貌从心违，而开起会来，都象煞有介事的恭读总理遗嘱，这岂不是一件肉麻的事！国民党一面禁止一切民众运动，屠杀异党，勒收种种色色的苛捐杂税，无微不至；而一面天天在报上大登其中国国民党政纲：“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与夫“严定田赋地税之法定额，禁止一切额外征收”，这岂不是一件肉麻的事！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5期 署名：撒翁

国民党是一种什么党？

(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日)

党有三种：倚靠军队，钳制民众，夺据地盘，是曰军党；倚靠国会议员，在现有的政治经济制度之下，用改良口号欺骗民众，以选举手段窃取政权，是曰官党；倚靠民众，破坏现制度，建设新制度，以革命手段夺取政权，是曰革命党。现在的国民党是这三种中那一种呢，党国先生们自己扪心想想看！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5期

署名：撒翁

国民党的劳动立法

(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日)

国民党人常说：共产党鼓吹工人革命，是害工人的；我们主张由劳动立法，改良工人生活，增高工人地位，是有益于工人的。是的不错，国民党政府已经有了劳动立法了。中华民国十七年一月十四日上海卫戍司令白崇禧阻止工潮布告：“嗣后如遇有劳资纠纷事件，仍须静候主管机关，持平调解，不得有轨外行动，倘敢聚众滋扰无故罢工，即按军法惩处！”这就是国民党的劳动立法！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5期

署名：撒翁

冯玉祥眼中的共产党与国民党

(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日)

一月三日冯玉祥对总部人员训话说：“共产党往往对于有些微过错的党员，即加以开除党籍的处分。……我们国民党是很宽大的，党员若非为很大的错误，轻易不肯把他开除。”是的，共产党诚然严厉，一个腐化分子也不许存在；国民党诚然宽大得很，所以对于军阀、买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无不尽量包容。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5期 署名：撒翁

险象丛生的国民党

(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日)

国民党人常说国民党不统一，是由于共产党挑拨离间。现在国民党中不但共产分子都清除出去了，连吴老狗所谓共产党的大工具(汪精卫)、小工具(陈公博)都赶跑了；可是最近的中央会议，竟因多数而且重要监察委员不出席而开不成；一月十四日上海各报宣传国府要人说：“正式会议，暂缓举行为妥，否则恐将发生军事问题。”同日白云梯通电说：“入都之后，详加视察，失望非常，险象丛生，一触即发。”这又是谁挑拨离间的呢？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5期 署名：撒翁

请看中国的阶级与争斗！

(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日)

国民党常说，国民革命中，应牺牲阶级利益，而为民族利益争斗，不应为阶级利益争斗。然而近来各省商会联合会的决议案，没有一件是关于民族利益的；一百十四件决议案中，总括起来只有两桩大事：一是拥护并扩张商人经济的政治的权利，这不是阶级利益吗？一是向工人店员进攻，这不是阶级争斗吗？然而顾孟余却一口断定，中国没有阶级，所以不应有阶级争斗。然而吴稚晖却一口咬定，顾孟余是共产党！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5期

署名：撒翁

大元帅不是好做的呀！

(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日)

照蒋介石政府所颁布的北伐军全军战斗序列令，蒋介石不但复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而且统辖指挥冯、阎、桂诸军，荣升了海陆军大元帅。可是冯玉祥一面电称遵令办理，一面电请于二五库券项下，拨给军费五百万元。哼！大元帅不是好做的呀！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5期

署名：撒翁

反革命的阶级

(一九二八年二月六日)

五卅运动时，代表大工商业家的上海总商会，始而旁观，继而反对，现在他们却和外国工厂主联防工潮。南京募捐办冬服，上海总商会借口商业凋敝，一文也不能代募；同时工部局募集什么“压制罪案特别经费”，大老板们却整千整万的拿出来，给洋官儿奖励爱活生一流人物。

英国驻上海防军司令官邓戡回国，市长张定璠忘了邓因为什么带兵来中国，特和他交换像片，以为纪念。这些事，都是表明上层阶级总是依靠外国帝国主义，而反对革命的！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6期 署名：撒翁

铲共还是铲蒋？

(一九二八年二月六日)

何健、周斓等自始就是反共健将，最近还在长沙大规模的搜杀共党，各报所载这类电报通信，几乎每日都有；然而白崇禧征湘捷电，偏偏还说是“彻底铲除共党”。象他这样铲除共党，将来非铲到南京不可。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6期 署名：撒翁

拜金主义能救中国的穷吗？

(一九二八年二月六日)

新年一见面，便开口互道“恭喜发财”；拜年客一坐下，首先要奉上“元宝茶”；“招财进宝”、“金玉满堂”、“一见生财”，这都是大多数人家所贴的经常标语；“噢！好大元宝！”是清末河南某巡抚署中的特别标语；宗教中还特别有“财神”。我们贵国人的拜金主义，可谓世界第一了。然而胡适之、吴稚晖还在那里伸长着颈子喊拜金主义！有人以为胡、吴提倡拜金主义，是羡慕美国富；然而最近美国国立工艺学校校长具理氏，批评中国学生“惟汲汲得金”。或以为胡、吴提倡拜金主义，是因为中国太穷；我以为能救中国之穷的，只有去掉阻碍中国工商业发达的帝国主义与军阀政治，而不是什么拜金主义。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6期

署名：撒翁

殖民地驯服的奴隶

(一九二八年二月六日)

李长傅先生说：“驻华的外国军警，是借口保护外侨，实在是来征服中国的。南满洲日警，可以逮捕中国人；上海的英国巡捕，可以枪杀中国人；英美的炮舰，可以轰击万县，轰击南京，轰击江阴；所以他们派遣海陆军到中国的意义，是到殖民地来的。”（见二月二日《时事新报·学灯》）这几句话说得很对。然而英军司令邓戡回国时，中国官张定璠和他交换像片，中国资本家虞洽卿、冯少山、叶惠钧等亲到码头欢送，这是何等驯服的殖民地奴隶！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6期 署名：撒翁

第三国际之野心？

(一九二八年二月六日)

世界新闻社据美报载莫斯科通讯：“第三国际决议：（一）对于凡拟派军队至中国之各国，煽动其妇女儿童在铁路车站及船坞等处为示威运动；（二）对于凡驻有军队在中国之各国，煽动其妇女儿童及残废兵士在国会及政府之前为示威运动。”《时事新报》谓此为“第三国际之新野心”。如此说来，必须第三国际煽动各国派军队驻中国，才算是他们对于中国之友谊。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6期 署名：撒翁

呵，原来你们是革心党！

（一九二八年二月六日）

钮永建、张之江提议：“自共党乱政，遂发生打倒基督教等口号，……共党宗旨在破坏道德，基督教重革心，遂为共党所仇视。今清党之举，正在进行，最近更有清去共党理论进一步之办法，似该项打倒基督教之口号，自应及早取消，以免为共党所欺惑（汪精卫、李石曾、吴稚晖听者！），并以仰慰先总理信仰之诚。”是的不错，孙中山不但是信仰上帝的基督徒，照戴季陶说，还是一位信仰礼教的圣人之徒。是的不错，唯物史观的共党，不但反对基督教，并且要打倒一切唯心的反科学的反物质文明的教派，如孔教、佛教、道教、阴阳五行家、同善社、悟善社等等；唯心史观的国民党，必须把共党这些理论彻底清去，才免得为共党所欺惑呀。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6期 署名：撒翁

太好了！

（一九二八年二月六日）

十三年国民党改组时，鲍罗庭对我们一位同志说：“你看我为国民党起草的党章好不好？”这位同志答道：“好，可惜太好了！”过了二年，鲍罗庭才懂了这句话的意思。现在国民党党务审查会所拟整饬党纪方法提案十三条，仍旧是太好了。以军阀、豪绅、官僚、政客、大小资产阶级分子所凑合的党，而抄袭共产党严肃的办法，在事实上如何行得通？事实上行不通的章程议案，终是一张废纸。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6期 署名：撒翁

三民主义者的阶级观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三日)

蒋介石等的“改组中央党部建议”，开口便说：“窃以本党为代表全体被压迫民族利益的党，而唤起各阶级被压迫民众，共同奋斗，更为本党所主张唯一无二之革命方略。”怪哉，怪哉，真怪哉，代表全民利益的国民党，仍旧学舌共产党，说出什么“各阶级被压迫的民众”来！然而一点也不怪，谁是被压迫者，李济琛早已解释过，他说：“工人是压迫阶级，资本家是被压迫阶级；农民是压迫阶级，地主是被压迫阶级。”所以国民党唯一无二之革命方略，是要唤起被压迫的资本家与地主，共同向工农奋斗。所以缪斌主张严禁罢工、减租、加薪、减时。所以浙江省政府将各级工会一律封闭，公安局长章烈主张一切民众运动及工会等一律取消。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7期

署名：撒翁

三民主义者的交友与模楷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三日)

蒋介石在四次全会致开会辞，一面说：“所有以前之共党理论，一致铲除。”一面仍旧学舌共党说：“扫除军阀及帝国主义，……如此则消灭共党，仍不忘打倒军阀及帝国主义。”到还是纯粹三民主义的缪斌老实说：“中国在国际上，……束缚的痛苦，欺侮的羞辱，都饱受了；但平心静气推想起来，……须得自怨自艾，不能一味归咎于他人身上。……不必口口声声喊打倒，……伤感情而启仇怨。……若本党目前不求与共党为泾渭的分辨，则可无望于国际上得一‘交友’。……不妨让他们来筑铁路，来兴工厂，来开马路，……他们到底不愧为我们的先进，应当奉为‘模楷’而仿效之。”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7期

署名：撒翁

乱 党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三日)

贱婢一旦做了夫人，马上张嘴骂别人贱婢；国民党不被人称为乱党才几天（此时在奉张统治之下还是乱党），胡汉民便大喊“剿灭乱党”，这都是无耻之尤。从前的国民党可贵，正因为它是乱党；现在的国民党可鄙，正因为它是治党。社会进化未到美备以前，任何时代，总有一班人因为不能满足现有制度，起而反抗谋改造，当时的统治者总称它们为乱党；因此，我们可以说，乱党正是社会进化之一种重要的动力。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7期

署名：撒翁

即 是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日)

蒋介石从前说：“反对我即是反革命”；南京特委会也说：“反对特委会即是反革命”；最近蒋介石对南京军校学生说：“反对校长即是反对国民政府，亦即是反对国民党。”反对国民党想必也即是反革命，反革命想必即是该杀头。古有“必须有”（今通讹作“莫须有”，惟《宰辅编年录》作“必须有”）三字狱，今有“即是”二字狱。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8期

署名：撒翁

忠实同志乎叛逆乎？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日)

唐生智同志,何健同志,刘玉春同志,杨森同志,叶开鑫同志,这班反共的忠实同志,亲亲密密的喊得没有好久,都一个一个的变为唐逆、何逆、杨逆、叶逆了。究竟谁是忠实同志,谁是叛逆,王麻子、汪麻子、旺麻子,永世也弄不清楚,世界上的政党,只有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有这种怪现象。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8期 署名:撒翁

是谁从中播弄呢？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日)

一月八日《申报》载长沙通信说:“蒋氏最近所派代表廖軼群……,携有蒋介石致湘省各将领手书,……并表示解决湘局办法:(一)湖南省政局主席准由湘将领推举,呈由中央任命;(二)不派军队入湘;(三)湘省内军队准扩充为四军;(四)军饷设法接济,并允即日先拨十万元,交湘代表王大楨带回。……李品仙等又接宁代表孟张来电,表示蒋介石对于湘事之善意,现又派朱一鸣、宋鹤庚、何雪竹三人为代表,即日来湘,代表一切,并携有军费五十万,接济湘军。……”可是程、白两部已打进湖南,并且致电南京说:“唐部余孽,……不意北方军阀,从中播弄,接济该逆等巨款,竟许编成六军之多,……”这件事不但表露国民党军政统一的新气象,而且还不知道从中播弄的究竟是谁!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8期 署名:撒翁

国民党的理论与方法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日)

此次国民党全会主要的精神是什么？就是所谓“肃清共产党的理论方法，重建国民党的理论方法”。国民党的理论与方法是什么？就是：以资本帝国主义的各国为模楷为交友，而反对社会主义的苏俄；同意研究系的和平建设及贤人政治的保育政策，而屠杀主张民众暴动民众政权的共产党；在民族利益国民经济的名义之下保护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财产，而向工农民众进攻，停止其运动，解散其组织。这就是正式抛弃孙中山晚年三大政策的假面具，而回到原来纯资本主义的三民主义。所谓“肃清共产党的理论方法”，就是肃清改组后的国民党之革命性；所谓“重建国民党的理论方法”，就是恢复以前不革命及反革命的政策之正式确定。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8期

署名：撤翁

谁是中国的国民革命者？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日)

中国真正的统治者，还是帝国主义；国内上层阶级有力者，还是军阀、地主、官僚买办的资本家。汪精卫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还是屈服在上层阶级势力之下；戴季陶、顾孟余、甘乃光所梦想的民族资产阶级，还在摇篮里，并且终于在摇篮里。此所以汪精卫弄得进退失据，此所以戴季陶只得烦闷颓废，此所以蒋介石、李济取得了胜利。蒋、李胜利了，中国反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的国民革命可是失败了。此所以现在愿意而且能够继续完成这个革命的，只有工农阶级。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8期

署名：撒翁

无赖与有赖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日)

现在有一位中美合璧的正人君子，骂卢骚是无赖汉，恭维耶稣是正人君子。其实卢骚、耶稣都始终是无赖汉；假使耶稣对于犹太正人君子所指斥的罪恶，能够翻然改过迁善，何至钉死在十字架？无赖汉是世界创造者，正人君子是世界创造之障碍物，或破坏者；所以无赖汉一旦为有赖而变为正人君子，其人便不足观也矣。丹敦、罗兰夫人、米勒兰，当初本是无赖汉，其后都为有赖而变为正人君子。中国的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戴季陶辈，当初在保皇党看来，何尝不是无赖汉，可惜后来都为有赖而努力要做正人君子了。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8期

署名：撒翁

“党人可杀”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日)

二十年来做国民党死敌的研究系，助袁世凯诛锄国民党，助段祺瑞压迫国民党，助陈炯明反对国民党，盛称直系的两次战功、八省地盘，北伐军出发时，犹在他们的《时事新报》上反对国民革命，反对青天白日旗，为孙联帅捏报胜战。一旦北伐军占领了上海，《时事新报》马上改变态度，装出党人的口气，也称呼先总理，也痛骂奉、直军阀。乃日久玩生，复萌故态，渐渐埋怨道：“民众（研究系）谋与党接近，乃造‘投机’之名辞以却扫之，……冒国民党招牌之共产党固可诛，而冒国民党招牌之‘党人’，其罪亦可杀矣。”然而他们还很胆怯，一露“党人可杀”的论调，马上便抬出缪委员来做护符。呜呼研究系，可耻亦可怜矣！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8期

署名：撒翁

上海工统会的饭碗快打破了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工统会化身的什么上海全市工会宣言说：“最近的事实又告诉我们，中央有停止党务的活动与民众运动的提议，这个不幸而离奇的消息到了民间，何等的失望呵！”工统会请求启封杭州各工会通电又说：“不意中央执监会议方庆开成，而离弃民众传言，即随同发布，停止运动之提案，已迭见明文，封闭工会之举动，又相证以事实，浙江省政府对于杭州工会之措置，实令民众启悲忿之怀。”其实民众对于国民党之失望与悲忿，已不自今天起；现在工统会的失望与悲忿，是为了他们自己的饭碗问题吧！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9期

署名：撒翁

国民党人腐化的亲供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化身的什么各工会也发表宣言，说工统会是：“纯为腐化分子所把持之机关”；反对第四次全会停止民众运动，说这是：“现在新旧国家主义派、政学系及研究系之余孽，与一切腐化分子，又乘机混入本党，各以其非国民党之主张，冀图变更本党之主义与政策，鱼龙混杂，怪论纷乘，瞻望前途，可为痛哭。”这些话真是他们由反共而腐化的亲口供状。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9期

署名：撒翁

谁说国民党不要民众？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国民党虽然议决停止民众运动，虽然下令解散工农团体，然而蒋介石到杭州时，公安局通令各区署：“本月二日午间，蒋总司令来杭，着该工厂全体职工，手持欢迎旗，到站欢迎！”谁说国民党不要工农不要民众？你看！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19期

署名：撒翁

致 胡 适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日)

适之先生：

此次累及许多老朋奔走焦虑，甚为歉然。梦麟先生北返，当已详达鄙状。日来贱躯比梦麟先生到此时更好一点，已能稍稍吃饭与肉了，已能照常写字读书了，特此告慰故人。

审判约在本月底，计尚有月余逍遥。判决后，以弟老病之躯，即久徒亦等于大辟，因正式监狱乃终日禁闭斗室中（牛兰^①现在即是这样的生活），不象此时在看守所中尚有随时在室外散步及与看守者谈话的自由，狱中购买药品和食物当然更不方便。所以我以为也许还是大辟爽快一点；如果是徒刑，只有终日闷坐读书，以待最后。如果能得着纸笔，或者会做点东西，现在也需要书看以销磨光阴。梦麟先生前曾送来几部小说，惟弟近来对于小说实无丝毫兴趣，先生能找几本书给我一读否？

英文《原富》，亚当斯密的

英文李嘉图的《经济学与赋税之原理》

英文马可波罗的《东方游记》

崔适先生的《〈史记〉探源》

此外，关于甲骨文的著作，也希望能找几种寄给我，先生要责我要求太多了罢！

存尊处的拼音文字稿，我想现在商务可以放心出版了，倘商务还不敢出版，能改由孟真先生在研究所出版否？弟颇欲此书能早日

^① 1931年8月，瑞士共产党人牛兰在上海为蒋介石特务逮捕。（原书注）

出版,能够引起国人批评和注意。坑人的中国字,实是教育普及的大障碍,注音字母这一工具又太不适用,新制拼音文字,实为当务之急。甚望先生能够拿出当年提倡白话文的勇气,登高一呼。拙著至浅陋,只是引龙出水的意思而已。

先生著述之才远优于从政,“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近闻有一种传言,故为先生诵之,以报故人垂念之谊。此祝健康!

梦麟、孟真、叔雅、启明、兼士及其他友好,均请代为道念。

弟仲白 十二月一日

回信望寄段书诒兄转下,他常来此探视。

叔雅兄所著《淮南集解》,望他能觅一部送我。又白。

原载《胡适来往书信选》

辩 诉 状*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

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运动，专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盖以大战后，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昭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

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落后的中国，外困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内困于军阀官僚。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决非懦弱的妥协的上层剥削阶级全躯保妻子之徒，能实行以血购自由的大业。并且彼等畏憎其素所践踏的下层民众之奋起，甚于畏憎帝国主义与军阀官僚。因此，彼等亦不欲成此大业。惟有最受压迫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与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的无产阶级势力，联合一气，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之宰制，对内扫荡军阀官僚之压迫；然后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发展经济，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工农劳苦人民解放斗争，与中国民族解放斗争，势已合流并进，而不可分离。此即予于“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也。

* 陈独秀于1932年10月15日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于1933年4月14、15、20日由江苏高等法院假江宁地方法院刑二庭进行三次公开审讯。陈独秀在第三次审讯时对所谓的犯罪证据进行了抗辩，并于4月20日书写此辩诉状。4月26日江苏高等法院刑事第二庭判决陈独秀以“危害民国”罪徒刑十三年。陈独秀不服判决，于6月15日上诉(见本书《上诉状》)。1934年6月30日江苏最高法院终审判决，处陈独秀有期徒刑八年，在江苏第一监狱执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政府于8月21日宣告将陈独秀减刑三年，予以释放。

共产党之终极目的，自然是实现无剥削无阶级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会。此即是说：一切生产工具收归社会公有，由社会公共机关，依民众之需要计生产与消费之均衡，实行有计划的生产与分配，使社会生产力较今日财产私有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有高度发展，使社会的物质力量日渐达到足以各取所需的程度。所以共产主义，在经济学上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高度发展的生产制，犹之资本主义较高于封建生产制也。此决非世俗所视为简单的各个穷人夺取各个富人财产之义。此一种生产制，决非予等之空想。经济落后之俄国，已有初步试验，而获得初步成功。全世界所有资本主义生产制的国家无不陷于经济恐慌的深渊，独苏俄日即繁荣。此一新的生产制之明效大验，众人之所周知也。

中国推翻帝制的革命，先于苏俄者七年。今日二者之荣枯，几不可比拟，其故可深长思矣。或谓共产主义不适宜于中国，是妄言也。此一终极目的，固非旦夕所能完成，亦非“和平”所能实现。为实现此目的而清除道路，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任务：

一曰：反抗帝国主义以完成中国独立。盖以中国的海关、矿山、工厂、金融、交通等经济命脉，都直接或间接宰制在帝国主义之手，非采取革命行动，击碎此等宰制吾人之镣锁，中国民族的大业将无自由发展之可能。列强的海陆军威吓着全国大都市，日本更以武力强占了我国领土五分之一，此而不加抵抗，或空言抵抗欺骗人民，均与卖国同科，尚何“民族主义”之足云。

一曰：反抗军阀官僚以实现国家统一。盖以军阀官僚自由发动他们的内部战争以破坏经济，自由增加苛捐杂税及发行公债以饱私囊，自由制定法律以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利，自由任用私人以黜抑人材、毁坏行政效率，甚至自由勒种鸦片、贩卖鸦片以毒害人民。军阀官僚政治不彻底肃清，所谓国家统一，所谓民力伸张，一切都无从谈起。国家不统一，民力不伸张，而能抵御外患者，未之有也。未能内抗苛政之顺民，而能外抗强邻者，亦未之有也。国外帝国主义之宰制不推翻，国内的军阀官僚之毒害不扫除，即所谓发展资本主

义的经济，亦属梦呓。中国将终于是半殖民地，终于落后而已。

一曰：改善工农生活。盖以近代产业工人及其所领导之农民乃反抗帝国主义之主要力量。资本家地主及其政府，在物质上精神上抑压工农，即不啻为帝国主义挫折中国民族解放斗争之锋刃。在农业的中国，农民之衰落几等于民族之危亡。倘不没收地主的土地归诸贫农，农民终岁勤劳只以供地主之剥削，则不独无以挽回农业之就衰及农村之破产，而且农民购买力日弱，直接影响到城市工商业。即令能由城市输资设立农村借贷机关，亦不过向农民增加一种剥削机关而已。

一曰：实现彻底民主的国民立宪会议。盖以贤人政治及保育政策已不适于近代国家，更不能存在于民主共和国。北洋军阀既废，代之者只应是人民的权力，若仍尚贤人与保育，则谁是贤人，堪任师保，伊何标准，北洋军阀亦得而尸之。况当外患空前之今日，人民无组织，即无力量，无政治的自由，即无责任心，亦不应课以责任。若不立即实现全国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完全自由，实现普选的全权的国民立宪会议，以制裁卖国残民的军阀官僚，一切政权归诸人民，集合全国人民的力量以解决全国危急问题，其何以立国于今日！

凡此为中国民族利益，为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劳苦人民利益而奋斗之大纲，予以前和现在都愿意公告全中国，只以政府之禁阻，未能达到全国人民之前耳。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政党，其成功也，必期诸多数人民之拥护，而不尚少数人的英雄主义，更非阴谋份子的集团。予前之所思所行，即此物此志，现在及将来之所思所行，亦此物此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息尚存，予不忍眼见全国人民辗转悲号于外国帝国主义及本国专制者两重枪尖之下，而不为之挺身奋斗也。

今者国民党政府因予始终尽瘁革命之故，而加以逮捕，并令其检察官向法院控予以“危害民国”及“叛国”之罪，予不但绝对不能承认，而且政府之所控者，恰恰与予所思所行相反。国者何？土地、

人民、主权之总和也，此近代资产阶级的国法学者之通论，非所谓“共产邪说”也，故所谓亡国者，恒指外族入据其土地、人民、主权而言，本国某一党派推翻某一党派的政权而代之，不得谓之“亡国”。“叛国”者何？平时外患罪，战时外患罪，泄漏秘密罪，此等叛国罪状，刑法上俱有具体说明，断不容以抽象名辞漫然影射者也。若认为政府与国家无分，掌握政权者即国家，则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之说，即不必为近代国法学者所摈弃矣。若认为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民权之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即属“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不曾经“叛国”，即国民党亦曾“叛国”矣。袁世凯曾称孙、黄为“国贼”，岂笃论乎？！民国者何？民主共和国之谓也，亦即别于专制君主国之称。欧洲各国推翻专制者，流血以争民主，其内容无他，即力争宪法上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之自由权利，及实行不参政者不纳税之信条已耳。此不但民主共和国如是，即在民主政治的君主国亦如是也。“危害民国”者何？共和政府剥夺人民之自由，剥夺人民之参政权，乃由共和到帝制之先声，罗马历史，十九世纪之法兰西及中华民国初年的历史均已遗同样之教训于吾人。即或不然，而人民无权利无自由，大小无冠之王，擅作威福，法律只以制裁小民，文武高官，则在议亲议贵之列，是已共和其名而专制其实矣。倘遗实而存其名，彼军阀之魁，民主之敌，亦得以“三造共和”自诩，妄人亦或以“共和勋臣”称之，其实毁坏民权，罪即邻于复辟，以其危害民主共和国之实质也。若认为力争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等自由权利，力争实现彻底民主的国民立宪会议以裁判军阀官僚是“危害民国”，则不知所谓民国者，应作何解释？

国民党竭全国人民膏脂以养兵，拥全国军队以搜括人民杀戮异己，对日本侵占国土，始终节节退让，抵抗徒托空言，且制止人民抵抗，摧毁人民之组织，箝制人民之口舌，使之“镇静”，使之“沉着应付”，即使之驯羊般在国民党统一指挥之下，向帝国主义屈服，宁至全国沦亡，亦不容人有异词，家有异说，而予则主张由人民自己

扩大其组织与武装，对帝国主义进行民族解放战争，以解决东北问题，以完成国家独立，试问谁为“叛国”！

国民党政府，以党部代替议会，以训政代理民权，以特别法（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及出版法等）代替刑法，以军法逮捕审判，枪杀普通人民，以刺刀削去了人民的自由权利，高居人民之上，视自己为诸葛亮与伊尹，斥人民为阿斗与太甲，日本帝国主义方挟“武力征服”政策对待吾国，同时国民党政府亦挟同样态度以临吾民。最近竟公然以“背叛党国”之罪枪决新闻记者闻矣。而予则力争表现民主共和国实质的人民自由权利，力争实现普选全权的国民立宪会议，力争民主制扩大至其历史的最高阶段，予现在及将来都无篡夺民国为“党国”之企图。试问谁为“危害民国”？故予曰政府之所控者恰恰与予所思所行相反也。

若认为一为共产党人即属犯罪行为，则欧美民主国家若法若英若瑞士等均无此事，各国中之共产党人莫不有集会、出版、参加选举之自由权利，与一般人民无异，若认为人民发言反对政府或政府中某一个人，即为有罪，则只远在二千年前周厉王有监谤之巫，秦始皇有巷议之禁，偶语之刑，汉武帝更有腹诽之罚，彼时固无所谓言论自由也。而廿世纪之民主共和国，似乎不应有此怪现象。若认为宣传共产主义，即“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即为“危害民国”（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此乃欧洲中世纪专横黑暗的宗教法庭迫害异教徒，迫害科学家，以阻塞思想信仰自由之故事，岂容复见于今日之民国！民国而若容有此，则不啻为日本帝国主义证明其“中国非近代国家”之说之非诬矣。

总之，予生平言论行事，无不光明磊落，无不可以公告国人，予固无罪，罪在以拥护中国民族利益，拥护大多数劳苦人民之故开罪于国民党已耳。昔之“法利赛”不仇视罗马，而仇视为犹太人自由奋斗的“热狂党”，今之国民党所仇视者非帝国主义，乃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官僚、始终戮力于民族民主革命之共产党人。日本帝国主义方夺取山海关，急攻热河，而国民党军队却向江西集

中，其对待共产党人也，杀之囚之，犹以为未足，更师袁世凯之故智，威迫利诱，使之自首告密，此并不能消灭真正共产主义者，只以破灭廉耻导国人耳。彼等此时有权在手，迫害异己之事，固优为之，予唯有为民族为民众忍受一切牺牲，以待天下后世之评判。若于强权之外，复假所谓法律以入人罪，诬予以“叛国”及“危害民国”，则予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法院若不完全听命于特殊势力，若尚思对内对外维持若干司法独立之颜面，即应毫不犹疑的宣告予之无罪，并判令政府赔偿予在拘押期间之经济上的健康上的损失！

民国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陈独秀。

原载《陈独秀自撰辩诉状》，亚东图书馆1934年版

上 诉 状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五日)

五月二十七日奉读贵院判决书，所据理由颇露布予等政治主张，使之有目共睹，其是非当否，正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无待废辞众应瞭然矣。惟是贵院亦自宣称：“该反对派尚无实行暴动之准备。”仅据予等政治主张而判谓“危害民国及叛国毫无疑义”，而判以徒刑十三年、褫夺公权十五年；似此显有疑意之判决，关系予等罪状之事小，侵害思想、言论自由，阻抑民主政治实现之事大，故不得不将不服判决之理由为贵院缕晰陈之。政府即国家，与夫行使中央统治权者即统治权、即国家之说，贵院亦知其乖谬过于显明，不便公然采用，乃苦心文饰，易以国民党国民政府为建设中华民国之领导机关之义；其词虽与前说异形，而含意所趋仍在与前说同质，其不能据此构成予等叛国之罪，亦复无殊法王路易十四自称“朕即国家”，其意亦以身致法国富强之巨任丰功自许，反之者即目为叛国。清朝以为中国开辟疆土自夸，中国士大夫亦以“我国家深仁厚泽”颂之，反之者即罪以叛逆；“保中国不保大清”，即爱新觉罗氏穷治康、梁之唯一罪状。自古帝王无论创业继统，悉如梨洲所讥“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此辈专制独夫，其家天下之谬见固已无足申论。独是国民党革命，正为颠覆帝制，标榜建立民国而起，帝政仆而仍继前轨，弃“天下为公”之说，以民国为一党一人之私产，目反之者为叛国，岂其以万世一系之天赋特权自居乎！此于建设民国之约言岂不显然背叛乎！视建设中华民国者之自身即为国家，犹之视建筑房屋之匠人即为建筑物，谓反对建设民国者之自身即为根本推翻民国，亦犹之主张更易匠人即等

于毁坏建筑。世间滑稽之论，宁有过于此者乎！再衡以建设中华民国之现状，无冠之王遍于宇内，田赋附加增逾正额十倍、以至数十倍，新税名目多至难以悉数，贪夫盈廷，饿殍载道，农夫辍耕于田亩，工贾咨嗟于市廛，鸦片官营已为公开之秘密，士流动色相戒莫谈国事，青年出言偶激辄遭骈戮，民国景象固应如是乎？此即判词所谓“中华民国建设之基础”乎？六年以来内战大小十余次，破坏铁路车辆七千有余，增加内债十余万万。最近更由政府借入美国农产品价值二万万元，既以加速农村之破产，又阴增人民对于未来内战军费之负担，此即判词所谓“于训政时期以内指导人民为革命建设之进行”乎？前年不战而断送东北三省，今年不战放弃热河及平、津以东，南渡之局已重见于今日，崖山之迫亦难免于方来。政府复纵百万虎狼于民间，所谓抗日捐，所谓救国公债，所谓防空捐、飞机捐，成为强征暴敛之最新名词，人民之爱国心渐为迫于暴政苛征之惨痛心情所排而去。瞻念前途令人不寒而栗。此即判词所谓“从事于建设中华民国之领导机关”之所应从事者乎？以予等反对如此建设中华民国之领导机关，而谓为“乘日本之侵略，妄诋政府不抵抗”而诬为“将中华民国之建设从根本上推翻”，而判以“危害民国及叛国”之罪，“莫须有”三字其何以服天下后世。“图谋变更国体”，亦为贵院判词指责予等危害民国及叛国之一要点。夫所谓国体其大要有三：曰君主，曰贵族，曰民主共和。由民主共和而改为帝制，或前王复辟，如袁世凯与张勋之所为，固为变更国体；由帝制而民主共和如国民党之所为，虽视前者顺逆不同，而变更国体则一也。民主共和已达改制之极则，过此便无国家改制之可言。世界政论已无于民主共和之外别标新制，即根本已无变更国体之要求者，只在采用若何方法或和平进化或革命斗争，以达到巩固共和发展民主为歧点耳。是以十月革命后之新俄，国体仍属社会主义苏俄联邦共和国也。苏维埃并非新奇怪物，只“工农兵会议”之翻译名词而已，其不独与民主共和无忤，且因而巩固之发展之。先于苏维埃俄国而共和之中国，恢复帝制者二次，至今仍徒有共和民主之名。后于苏

维埃俄国而共和之德国，年来帝制复活运动已公然行之国中，魏马宪法不绝如缕。独苏俄共和国日臻巩固，此非世界共见共闻之事乎。以言民主，其一即由大多数人民管理政治，亦即由大多数人民代表政制行使国家统治权，此乃君主一人统治及贵族少数人统治之对称也。是以自英人边沁著作以迄最近美国大总统罗斯福和平申请书，悉以所谓“为大多数人民谋最大幸福”一语相标榜；但以何阶级人民占全国大多数，资产阶级政论家自来避而不言，以自君主贵族衰亡以来，财产权以至统治权悉操诸极少数人资产阶级之手，彼单所标榜之民主政治，虽与君主或贵族专制有别，而仍不越统治者资产阶级之狭小范围，所谓大多数人民幸福，等诸空头支票。惟自占人民大多数之工人、贫农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始获睹真正大多数人民统治之实现；在此政权统治之下，大多数人民幸福始庶几可得可期，亦惟有经过此政权，始有达到全民福利之途径。盖以任何优良之社会制度，只能使人人生产者（工人或农民），不能使人人剥削者（资本家或地主），苏维埃政权正为消灭剥削制度之工具，人剥削人之制度消灭，始有全民福利之可言。即以欧美资产阶级所标榜之民主国家而论，所谓民主，虽实际只限于狭小范围，而其统治者亦不敢公然躬自撕毁其民主之假面，不得不以普选议会之名，掩饰其专政。是以目组织共产党，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苏维埃政制为违背民主共和，为危害国家，为叛国者，在欧美标榜民主之国家实属罕闻之事；即在君主立宪之英国，不独二百余年来无人目所谓“王之反对党”为叛逆，即今之共产党亦不被认为犯罪集团，其公布政纲、竞争选举、列席国会与法、德诸国无异。两月前独立工党集会时，党魁其高呼打倒现政府，高呼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亦不曾以图谋变更国体，危害民主政治及叛国被控于法庭。统治英国之资产阶级何以如此宽容，以不便自毁其民主之假面。故“特克诺克拉西”运动方轰行于美国，近复延及法兰西，其公然抨击资本主义及私产制度，主张根本取消之，主张组织技术家苏维埃，以实现技术家之统治，主张以“能力证券”代替金银货币，其论旨、

其方策虽为左方之共产主义者及右方之资本主义者所夹击，然不闻美、法政府曾以推翻现行制度、图谋变更国体、危害共和国及叛国罪之，美、法之统治者何以如此宽容，亦以不便自毁其民主之假面。故独至东方民国之统治者仅此民主假面亦不惜躬自毁也，即此一点，已充分说明危害民国者乃所谓建设民国之领导机关之自身而非他人也。欧人有言曰：“民主政治不适用于野蛮民族”，吾人深吟此语宁不痛心！此予等所以主张继续革命，实现苏维埃政权，以完成第一次、第二次革命所未完成之民主任务所由来也。贵院判词谓予等主张苏维埃政制为变更国体，为危害民国，实属无稽。盖以苏维埃政制并与民主共和无忤，在民国而图谋变更国体仅只恢复帝制之一途，由北京政府而国民政府，由国民政府而苏维埃政府，均民主政治发展之必然趋势，根本与国体问题不相牵涉也。北京政府由北洋各派相继行使中华民国中央统治权者十余年，吾人能谓十六年北伐战争为变更国体，为危害民国乎？复次，贵院判词又以中华民国为民主国家，其主权寄于全民，故凡属中华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而在苏维埃国家，则主权仅寄于工农阶级，除此特殊阶级以外之人，皆无参政权。两种制度“显然为两种国体”为言，予等于此则益有说焉。吾人第一须知民主之定义，即为由大多数人民管理即统治国家，无所谓全民主治之说，所谓“全民主治”或“全民统治”及“全民政治”者，皆不合逻辑之言，近代统治国家之资产阶级用以欺骗人民者也。最新之工农苏维埃政制，乃民主制之最后最高阶级，亦仅只达到以大多数人民统治国家已耳。过此以往，必待剥削制度消灭，因之阶级消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界限消灭，夫然后乃有真正全民平等之一境。谓阶级存在而全民得以平等者，非有意欺世亦自为幼稚。剥削阶级因有被剥削而存在，统治者乃对于被统治而言，既无被统治者则全民政治所统治者何人？所以剥削制度及统治、被统治阶级既已消灭，全民平等之社会既已出现，则所谓国家统治权及一切政制悉成为历史上过去名词矣。故曰“全民主治（全民统治）（全民政治）皆

不合逻辑之谎言也。吾人第二须知主张苏维埃政制之共产党人，固不屑以全民统治之妄语欺世欺人，而并世英、美、法、德等号为民主之国家，其实际无一非资产阶级专政，所谓民主更无不限于其阶级之狭小范围，占人民大多数之工农劳苦贫民，胥隶属于被统治者之地位。至于在数十万国民党员统治下之中华民国四万万人民，益复被谥为阿斗，更明明无参政之权，兹忽为之曰全民，未免过于揶揄；判词谓为“全民主治”不知置国民政府现行之“党治”及“训政”制度于何地？谓予等图谋变更“全民主治之中华民国国体”，更属无的而放矢矣。夫“主权”及“统治权”，乃英、法、德文“权威伦特”一语之异议，后一译名视前者较有实际意义。所谓“主权在民”，所谓“主权属于人民全体”，所谓“主权寄于全民”，其空洞无实权，以视清代加头品顶戴、赏穿黄马褂尤过之，以故虽袁世凯以至曹锟，亦并不惜承认“主权在民”之说，盖以主权而不行使，仅只在之、属之、寄之之虚名，实际统治者固不惜慷慨奉送也。倘责以应由大多数人民行使统治权，则必闻而大骇矣。“由中国国民党代表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大会闭会时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此非赫然载在国民政府所颁颁布之约法者乎？即宋财长最近在美国人面前之饰词，亦仅云“中国政府之后盾筑在强固之中产阶级”，奈何贵院判词竟以所谓“主权寄于全民”与“全民政治”为之遮饰耶！吾辈无欺之共产党人，固尝提出由无产阶级、贫农专政之苏维埃政制之主张，以诉诸人民公意，此一政制特为对待剥削阶级少数人，以专政以实现被剥削者大多数人民行使统治权之真正民主国家者也。持试此以与现行政制两两相较，孰为合于民主制度，孰为危害民国，尚希贵院平心静气一思之。贵院判词当有最后之一盾，即现行法律是也。兹姑退一步而在法言法，按之现行刑法，关于平时外患罪、战时外患罪、泄露秘密罪，均有具体说明；关于内乱罪，乃以“意图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僭窃土地或紊乱国宪而着手实行者”为条件，予等固未有此判词亦未援侵此条文。再退一步而言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此法第六条第二款所谓“叛国之宣传”，何谓叛国并无定义，稽之此

法全文亦无反对国民党、国民政府，即为危害民国及叛国之明文规定。贵院判词所援用者何为“按诸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二条第二款之立法精神”，贵院仅知揣摸该法之“立法精神”，而忘却民主国家所应尊重之思想、言论自由精神，而且于法律明文之外揣摸“精神”，此种神秘方法，在法言法者固应如是乎？依上所述，予等认为贵院判词于理于法两具无当，此即所以不服判决要求上诉之理由也。

陈独秀 六月十五日

原载《法治周报》1卷33期

中国的一日

(一九三六年九月)

朋友嘱我为《中国的一日》写点感想，在这天，我没有什么感想，且就本地风光，即就“中国的一日”这个题目，说几句话吧！

“中国的一日”似乎是模仿“世界的一日”而作的。在阶级的社会里，一个国际主义者的头脑中所谓世界，只有两个横断的世界，没有整个的世界；在这两个横断的世界之斗争中，若有人企图把所谓整个的世界这一抽象观念，来掩盖两个横断的世界之存在，而和缓其斗争，这是反动的观点，若有人把整个的世界纵断成不相依赖的无数世界，幻想在纵断的各别世界中，完成人类的理想，而不把国际间两个横断的世界之斗争看成各别的纵断世界中斗争胜利之锁钥，这也是反动的观点。在一个国家中，也是这样，也只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横断的社会之存在，抽象的整个国家是不存在的。这两个或两个以上横断的社会，利害不同，取舍各异，如果有人相信这利害根本不同的横断世界及横断社会，可以合作，可以一致，这不是痴子，便是骗子。痴子犹可恕也，骗子不可恕矣！

整个的国家，永远是不存在的；整个的世界，只有在阶级消灭以后才会出现。凡是读“中国的一日”以至读“世界的一日”的人们，应该很客观的想想这个问题，不要做痴子，而受骗子的骗！

原载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第2编

署名：陈独秀

致申报馆编辑部的信^{*}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鄙人辛苦狱中，于今五载。兹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前此法院科我之罪，诬以叛国。夫叛国之罪，律有明文，外患罪与内乱罪是也。通敌之嫌，至今未闻有人加诸鄙人之身者，是外患罪之当然不能构成。逐年以来，国内称兵据地或企图称兵据地之行为，每役均于鄙人无与，是内乱罪亦无由；周内无罪而科以刑，是谓冤狱。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鄙人今日固不暇要求冤狱之赔偿，亦希望社会人士，尤其是新闻界勿加我以难堪之诬蔑也。以诬蔑手段摧毁他人人格，与自身不顾人格，在客观上均足以培养汉奸。此非吾人今日正所痛心之事乎！远近人士或有以鄙人出狱感想见询者，益以日来都中有数报所载鄙人言行，皆毫无风影。特发表此书面谈话，以免与新闻界诸君面谈时口耳之间有所讹误。

陈独秀(章)

八月廿五日

原载《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2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 标题为本书编者加。据查，此信当时《申报》未发表，原件现存上海市档案馆。

孔子与中国

(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

尼采说得对：“经评定价值始有价值；不评定价值，则此生存之有壳果，将空无所有。”所有绝对的或相当的崇拜孔子的人们，倘若不愿孔子成为空无所有的东西，便不应该反对我们对孔子重新评定价值。

在现代知识的评定之下，孔子有没有价值？我敢肯定的说有。

孔子的第一价值是非宗教迷信的态度：自上古以至东周，先民宗教神话之传说，见之战国诸子及纬书者，多至不可殚述，孔子一概摒弃之，其设教惟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见《论语·先进》），又“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见《论语·述而》）其对于天道鬼神的态度，见诸论语者：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谏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久矣。”（《述而》）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先进》）

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为政》）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

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

重人事而远鬼神，此孔墨之不同也，孔子之言鬼神，又在以祭享。为治天下之本，故《祭义》说：“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祭统》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至于鬼神之果有或无，则视为不可知之事，而非所深究；孔子之言天命，乃悬拟一道德上至高无上之鹄的，以制躬行，至于天地之始万物之母，则非所容心，此孔子之异于道家也。不但孔子如此，在儒道未混合以前，孔子的嫡派大儒如孟子如荀子，亦力唱仁义礼乐而不言天鬼，至战国之末，不知何人，糅合儒道二家之说，作《中庸》，（《中庸》言华岳，又说：“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又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这明明是和李斯辈同时代人的口气，决非孟子之前东鲁子思所作。）始盛称鬼神之德与天道，于是孔子之面目一变；汉初传《周易》者，取阴阳家《系辞》归之孔子，大谈其阴阳不测之谓神，大谈其幽明之故，死生之说，大谈其精气游魂鬼神之情状，大谈其极数知来，极深研几，探颐索隐，钩深致远，（《中庸》犹说：“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犹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大谈其河出图，洛出书，（《论语》：“凤鸟不至，河不出图。”之说，大约亦此时窜入，崔述已辨此非孔子之言。《春秋纬》有“龙负河图，龟具洛书”之说，可证为阴阳家言。）于是孔子之面目乃再变；董仲舒号为西汉大儒，实是方士，成、哀以后，讖纬大兴，刘氏父子著书，皆兼采儒与阴阳二家之说，班固、许慎承其谬，于是孔子之面目乃三变；东汉诸帝，笃信讖纬，无耻儒生，靡然从之，白虎观讲议诸人，都是桓谭、王充所讥的俗儒，班固所纂集的《白虎通德论》，广引纬书，侈言三纲、六纪、五行、灾变，可说是集儒道糟粕之大成，然而桓谭还公言反讖，几以非圣无法的罪名见诛于光武，郑兴亦不善讖，乃以逊辞仅免，王充著《论衡》力辟神怪，贱儒贾逵以附和讖纬取媚民贼，亦尚言“五经家皆无证图讖明刘氏为尧后者”，到郑玄，他早年师事第五元，本是习京氏《易》、公羊《春秋》的，故晚年笃信讖纬，博采纬书神怪之言以注《毛诗》、《周礼》、《论语》、《孝经》、《礼记》、《尚书大传》等，至此孔子之面目

乃四变，而与阴阳家正式联宗矣。从此贾逵、郑玄之学日显，桓谭、王充之说日微，影响于中国之学术思想不为小也。

孔子的第二价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这一价值，在二千年后的今天固然一文不值，并且在历史上造过无穷的罪恶，然而在孔子立教的当时，也有它相当的价值。中国的社会到了春秋时代，君权、父权、夫权虽早已确定，但并不象孔子特别提倡礼教以后的后世那样尊严，特别是君权更不象后世那样神圣不可侵犯；而三权一体的礼教，虽有它的连环性，尊君却是主要目的。这是因为自周平王东迁以后，王室渐陵夷，各诸侯国中的商业都日渐发达，景王之前，已行用金属货币（见《周语》及《汉书·食货志》）。郑桓公东迁新郑，与商人立“无强贾”、“毋勺夺”的盟誓（见昭十六年《左传》）。齐擅鱼盐之利，“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见《史记·货殖传》）“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曰：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人君不理，则畜贾游于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矣。故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者，利有所并也。”（见《汉书·食货志》）“桓公曰：四郊之民贫，商贾之民富，寡人欲杀商贾之民以益四郊之民，为之奈何？”（见《管子·轻重篇》）“及周室衰，……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见《汉书·货殖传》）由此可见当时的商业，已经动摇了闭关自给的封建农业经济之基础，由经济的兼并，开始了政治的兼并，为封建制度掘下了坟墓，为统一政权开辟了道路，同时也产生了孔子的政治思想。春秋之末，商旅之势益盛，即孔门的子贡亦“废著（《汉书》作“发贮”）鬻财于曹鲁之间，……结駟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见《史记·货殖传》）是为战国白圭、计然、猗顿之先驱，这便是司马迁所谓“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素封”势力愈盛，封建制度愈动摇，遂至诸侯亦日渐陵夷，大夫陪臣挟“素封”之势力，政权乃以次下移。孔子生当此时，已预见封建颓势将无可挽救，当时的社会又无由封建走向民主之可

能，(欧洲的中世纪之末，封建陵夷以后，亦非直接走向民主，中间曾经过王政复兴君主专制的时代，Machiavelli的君主大权主义，正是这一时代的产物。)于是乃在封建的躯壳中抽出它的精髓，即所谓尊卑长幼之节，以为君臣之义，父子之恩，夫妇之别普遍而简单的礼教，来代替那“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见昭七年《左传》)的十等制，冀图在“礼”的大帽子之下，不但在朝廷有君臣之礼，并且在整个社会复父子、夫妻等尊卑之礼，拿这样的连环法宝，来束缚压倒那封建诸侯大夫以至陪臣，使他们认识到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以维持那日就离析分崩的社会。所以孔门的礼教即孔门的政治思想，其内容是：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

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

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

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可废也，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

孔子曰：安土治民，莫善于礼。……故朝覲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婚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故婚姻之礼废，则

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聘觐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诸侯之行恶，而倍畔侵陵之败起矣。（《礼记·经解》）

子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礼记·坊记》）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记·曲礼》）

是故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则君位危，君位危则大臣倍，小臣窃，刑肃而俗敝。……故唯圣人为知礼之不可以已也，故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礼记·礼运》）

哀公问于孔子曰：大礼何如，君子之言礼何其尊也？……孔子曰：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礼记·哀公问》）

公曰：敢问为政如之何？孔子对曰：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三者正则庶物从之矣。（《礼记·哀公问》，《大戴礼·哀公问》“庶物”作“庶民”）。

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则教之以尊其君长，内则教之以孝于其亲，是故明君在上则诸臣服从，崇事宗庙社稷则子孙顺孝，尽其道，端其义，而教生焉。（《礼记·祭统》）

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与！（《大戴礼·曾子本孝》）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反是乱也。（《大戴礼·曾子立孝》）

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治之也。（《大戴礼·本命》）

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长其义理者也，故谓之妇人，妇人伏于人也，是故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无所敢自遂也。（《大戴礼·本命》）

出乎大门而先，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礼记·郊特牲》）

男先于女，刚柔之义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义一也。（《礼记·郊特牲》）

仲尼曰：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得，而国治。……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礼之大者也。（《礼记·文王世子》）

不但孔子自己及他的及门弟子是这样，孔子之后，孔子的嫡派大儒孟子、荀子，他们的思想。无论对于天鬼，对于礼教，都是孔子的继承者。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已，则王乎？（《孟子·梁惠王》）

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孟子·滕文公》）

当尧之时，……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一一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

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同上）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荀子·礼论篇》，《大戴礼·礼三本》，“生之本”作“性之本”，“恶”作“焉”，“无安人”作“无安之人”，后世天地君亲师并祀，即始于此。）

君之丧所以取三年，何也？曰：君者，治辨之主也。……彼君子者（依俞樾说“君”下删“子”字），固有为民父母之说焉。父能生之，

不能养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诲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诲之者也，三年毕矣哉！（《荀子·礼论篇》）

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本。（《荀子·王制篇》）

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荀子·非相篇》）

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执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今当试去君上之执，无礼义之化，去法正之治，无刑罚之禁，倚而观天下民人之相与也；若是，则夫强者害弱而夺之，众者暴寡而譁之，天下之悖乱而相亡不待顷矣。（《荀子·性恶篇》）

天子无妻，告人无匹也。（杨注云：告，言也；妻者，齐也；天子尊无与二，故无匹也。）四海之内无客礼，告无适也。（杨注云：适读为敌。《礼记》曰：天子无客礼，莫敢为主焉。）……圣王在上，分义行乎下，则士大夫无流淫之行，百吏官人无怠慢之事，众庶百姓无奸怪之俗，无盗贼之罪，莫敢犯上之禁。（《荀子·君子篇》）

这一君尊臣卑、父尊子卑、男尊女卑三权一体的礼教，创始者是孔子，实行者是韩非、李斯。（韩非、李斯都是荀子的及门弟子，法家本是儒家的支流，法家的法即儒家的礼，名虽不同，其君尊臣卑、父尊子卑、男尊女卑之义则同，故荀子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司马迁谓韩非“归本于黄老”，真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胡说，这是由于他不懂得尊礼法与反礼法乃是儒法与黄老根本不同的中心点。）孔子是中国的Machiavelli，也就是韩非、李斯的前驱，世人尊孔子而薄韩非、李斯，真是二千年来一大冤案。历代民贼每每轻视儒者（例如汉朝的高祖和宣帝），然而仍旧要尊奉孔子，正是因为

孔子尊君的礼教是有益于他们的东西，孔子之所以称为万世师表，其原因亦正在此。近世有人见尊君尊父尊夫之弊，而欲为孔子回护者，妄谓“三纲”之说盛倡于宋儒，非孔子之教，而不知董仲舒作《春秋繁露》，班固纂《白虎通德论》，马融注《论语》，都有“三纲”之说，岂可独罪宋儒，孔子、孟子、荀子虽然未说“三纲”这一名词，而其立教的实质，不是“三纲”是什么呢？在孔子积极的教义中，若除去“三纲”的礼教，剩下来的只是些仁、恕、忠、信等美德，那末，孔子和历代一班笃行好学的君子，有什么不同呢？他积极建立起来他所独有的伦理政治学说之体系是什么呢？周末封建动摇，社会的飓风将至，故百家立说，于治世之术都有积极的独特主张，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这是黄老的主张；兼爱、非攻、明鬼、非命，这是墨家的主张；尚法、好作，这是慎到田骈的主张；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这是惠施、邓析的主张；并耕、尽地力，这是农家的主张；儒家的独特主张是什么呢？除去三纲的礼教，他没有任何主张，孔子只不过是一个笃行好学的君子而已，人们凭什么奉他为万世师表呢？我向来反对拿二千年前孔子的礼教，来支配现代人的思想行为，却从来不曾认为孔子的伦理政治学说在他的时代也没有价值；人们倘若因为孔子的学说在现代无价值，遂极力掩蔽孔子的本来面目，力将孔子的教义现代化，甚至称孔教为“共和国魂”，这种诬罔孔子的孔子之徒，较之康有为更糊涂百倍。

《周礼·天官大宰》：师以贤得民，儒以道得民，吏以治得民。郑玄注云：师，诸侯师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吏，小吏在乡邑者；《地官大司徒》：联师儒。郑玄注云：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是周之儒者，其地位与乡邑小吏同，其专职是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贤属师，治属吏，非儒者之事，儒者所教的礼，当然说不上吉、凶、宾、军、嘉全部的礼，不过士民所需凶礼中的丧吊，嘉礼中的昏冠之礼节仪文而已，更说不上治术；若有人把孔门的礼教和孔子以前儒者所教六艺的礼并为一谈，便是天大的错误？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礼之所尊，尊其义也；

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礼记·郊特牲》）孔子对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此所谓君子小人，与“小人哉樊须也”之小人同义，彼谓稼圃为小道末艺，非治国平天下的大道，此谓小人儒为习于礼、乐、射、御、书、数的小儒，非以礼教治国安民的君子儒。）这正是说礼之义不在礼节仪文之末，君子儒不以六艺多能为贵，所以孔子以后的礼和儒，都有特殊的义意，儒是以礼治国的人，礼是君权、父权、夫权三纲一体的治国之道，而不是礼节仪文之末。不懂得这个，便不懂得孔子。

科学与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主要动力，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于科学的。孔子的礼教，是反民主的，人们把不言神怪的孔子打入了冷宫，把建立礼教的孔子尊为万世师表，中国人活该倒霉！

请看近数十年的历史，每逢民主运动失败一次，反动潮流便高涨一次；同时孔子便被人高抬一次，这是何等自然的逻辑！帝制虽然两次倒台，然而袁世凯和徐世昌的走狗，却先后昌言民国的大总统就是君，忠于大总统就是忠于君；善哉，善哉！原来中国的共和，是实君共和，还没有做到虚君共和！民国初年，女权运动的人们，竟认为夫妻平等，无伤于君父二纲；美哉，美哉！原来孔子三纲一体的礼教，是可以肢解的！这些新发明，真是中国人特有的天才。

孔子的礼教，真能够支配现代人的思想行为吗？就是一班主张尊孔的人们，也未必能作肯定的答复吧！礼教明明告诉我们：君臣大伦不可废，无君便是禽兽；然而许多主张尊孔的人，居然两次推翻帝制，把皇帝赶出皇宫，律以礼教，这当然是犯上作乱；一面犯上作乱，一面又力倡祀孔，这是何等滑稽的事！礼教明明告诉我们：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然而许多主张尊孔的人，居然身为议员，在国会中大议而特议！礼教明明告诉我们：“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然而许多主张尊孔的人，居然大倡其女权，大倡其男女平等；这不是反了吗！礼教明明告诉我们：“信，妇德也，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礼记·郊特牲》）然而有些主张尊孔的人，自己竟和寡妇结婚。礼教明明告诉我们：“生，事之以礼，

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如佐餽，既食恒餽。”“非餽莫之敢饮食”。“子事父母，鸡初鸣，……妇事舅姑，如事父母，鸡初鸣，……以适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气怡声，问衣、燠、寒、疾、痛、苛、痒，而敬抑搔之，……枣栗饴蜜以甘之，菹、苴、粉、榆、兔、薤，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尝之而后退。”（《礼记·内则》）然而主张尊孔的人，都这样孝敬父母吗？非父母舅姑之餽余不敢饮食吗？有此还要离开父母舅姑组织小家庭哩！礼教明明告诉我们：“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内言不出，外言不入。”“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内则》）“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男女不杂坐。”（《曲礼》）然而尊孔的人，能够愿意千百万女工一齐离开工厂，回到家庭，使之内言不出吗？能禁止男女同学吗？他们宴会时不邀请女客同席杂坐共食吗？他们岂不常常和女朋友互换名片，社交公开吗？不但女子出门不蔽面，大家还要恭维学习美人鱼哩！礼教明明告诉我们：“男女授受不亲，”（《孟子》、《礼记》）“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其相授，则女受以篚，其无篚，则皆坐奠之而后取之。”（《礼记·内则》）然而尊孔的人，不但男女授受可亲，而且以握手为礼，搂腰跳舞，而且男子生病会请女医诊脉，女子产儿会请男医收生，孔子若活到现在，看见这些现象，岂不要气炸了肺吗？这班尊孔的人们，大约嘴里虽不说，心里却也明白二千年前的孔子礼教，已经不能支配现代人的思想行为了，所以只好通融办理；独至一件与他们权威有碍的事，还是不能通融，还得仰仗孔子的威灵，来压服一班犯上作乱的禽兽，至于他们自己曾否犯上作乱，这本糊涂账，一时也就难算了。孔子的三纲礼教所教训我们的三件事：一是“事君，可贵、可贱、可富、可贫、可生、可杀，而不可使为乱”（《礼记·表記》）；一是“父母怒，不悦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礼记·内则》）；一是“寡妇不夜哭（郑注云：嫌思人道），妇人疾，问之不问其疾”（郑注云：嫌媚，略之也，问增损而已）；“寡妇之子，不有见焉，则弗友也”（均见《礼记·坊记》）。今之尊孔者，对于第二第三教训，未必接受，对于第

一个教训，到有点正合孤意了，他们之所以尊孔，中心问题即在此；汉之高帝宣帝以及历朝民贼，并不重视儒生，而祀孔典礼，则历久而愈隆，其中心问题亦即在此；孔子立教之本身，其中心问题亦即在此。此孔子之所以被尊为万世师表也。如果孔子永久是万世师表，中国民族将不免万世倒霉，将一直倒霉到孔子之徒都公认外国统监就是君，忠于统监就是忠于君，那时万世师表的孔子，仍旧是万世师表，“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的孔子之徒，只要能过事君的瘾，盗贼夷狄都无所择，冯道、姚枢、许衡、李光地、曾国藩、郑孝胥、罗振玉等，正是他们的典型人物。

人类社会之进步，虽不幸而有一时的曲折，甚至于一时的倒退，然而只要不是过于近视的人，便不能否认历史的大流，终于是沿着人权民主运动的总方向前进的。如果我们不甘永远落后，便不应该乘着法西斯特的一时逆流，大开其倒车，使中国的进步再延迟数十年呀！不幸的很，中国经过了两次民主革命，而进步党人所号召的“贤人政治”，“东方文化”，袁世凯、徐世昌所提倡的“特别国情”，“固有道德”，还成为有力的主张；所谓“贤人政治”，所谓“东方文化”，所谓“特别国情”，所谓“固有道德”，那一样不是孔子的礼教在作祟呢？那一样不是和人权民主背道而驰呢？

人们如果定要尊孔，也应该在孔子不言神怪的方面加以发挥，不可再提倡阻害人权民主运动，助长官僚气焰的礼教了！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孔子的礼教不废，人权民主自然不能不是犯上作乱的邪说；人权民主运动不高涨，束手束足意气销沉安分守己的奴才，那会有万众一心反抗强邻的朝气。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下，只能够产生冯道、姚枢、许衡、李光地、曾国藩、郑孝胥、罗振玉，而不能产生马拉、但顿、罗伯士比尔。幸运的是万世师表的孔子，倒霉的是全中国人民！

原载《东方杂志》34卷18、19号

署名：陈独秀

从第一双十到第廿六双十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日)

我们每年双十节都不能不回想到廿六年前的双十。

廿六年前双十，是中国整个的民族革命战争时代之开幕；这一革命战争，在本质上，是对内推翻满族的统治，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宰割，在社会的动象上，后者尤重于前者，辛亥以前的收回权利运动，正是这一意义之表现。

不幸辛亥革命的结果，仅仅推翻了满族的统治，丝毫没有侵犯到帝国主义在华的权利，因此没有解决中华民国立国的根本问题之一：国家独立与统一。第二次革命——北伐战争，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也不曾解决这一问题。

一直到廿六年后双十节的今天，才动手来解决这一问题，即是直接与帝国主义者武装冲突。此次抗日战争，其对象虽然是日本帝国主义，而其涵义及历史发展的前途，乃是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宰割，完成国家独立与统一，所以此次抗日战争，不是两个帝国主义间争夺殖民地的战争，而是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即令由这一战争做了国际帝国主义战争的导火线，而在远东方面，只要中国政府始终联合苏联对日作战，仍然不会失掉革命的意义。一个革命家，难道不应该站在联合中国和苏联的人民以至朝鲜、日本的人民来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观点上，赞助这一战争吗？

此次抗日战争，是第一次革命（辛亥革命）、第二次革命（北伐战争）之继续完成，谁对于抗日战争怠工，便是不愿意中国革命事业之继续前进；谁害怕革命震动，便不配抗日，要脸的只好追踪苗大哥逃到川、云、贵的深山中去，不要脸的终于要跪在日本帝国主

义者面前！

中国抗日战争，无论是何人何党所领导，任何人任何党派都应该一致赞助；无论政府在抗战中有何错误，甚至根本的错误，都不能作为人们消极的理由。消极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消极是革命内在的敌人！

左倾的人们，以左倾的词句掩盖他们的消极，和右倾的人们害怕革命震动，害怕民众起来，同样会葬送有世界革命意义的抗日战争！

今年第廿六双十节，我们并不须有别的纪念庆祝的仪式，前线上忠勇战士对敌人所发的炮声，便是我们的纪念、庆祝。只要我们除去左倾或右倾的错误，使抗日战争得到最后胜利，则第廿六双十的价值，在历史上要超过第一双十多少倍。

双十节前八日，写于武昌。

原载《宇宙风》散文半月刊第49期

署名：陈独秀

抗日战争之意义

——在武昌华中大学讲演

（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

全国要求的抗日战争已经开始了。为什么要抗战？一般的说法，是因为日本欺压我们太厉害。这话固然不错，可是，未免过于肤浅了。一般民众，尤其是知识份子，应该明瞭更深一点的意义。抗战不是基于一时的感情，而有深长的历史意义。

十九世纪之末，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帝国主义，各资本主义的先进国家，挟着工业与科学，企图掠夺征服全世界，做他们的殖民地；在这一时期，全世界的各民族，能够自动的发展工业与科学以适应环境的便兴旺起来，否则不免日渐衰败下去，这是近代史的一般规律。

资本主义在东方发达较晚，因之产业、生活、文化遂比较落后，大部份都变成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供他们的奴役。在东方后起的资本主义，因为各国发展不平衡，强弱遂至不同。现在单就中国和日本两国说；日本在德川时代，盛行过守旧和攘夷运动，可是他们幸运得很，在守旧攘夷运动中，社会上有力份子，受了由欧美留学回国者奔走号召的影响，渐渐感觉到守旧攘夷不是办法，由此一变而为明治维新运动，全国上下疯狂的崇尚工业与科学，从那时一直到现在，六七十年，工业与科学很顺利的发展着，未曾一次遇到反动势力的阻碍，所以才有今日的强盛。中国怎样呢？中国提倡科学与工业也略与日本明治维新同时，第一次改革便是李鸿章采用西法以富国强兵的企图，不幸当时民间没有援助，留学欧美回国的学生也没有发挥一点力量，李鸿章的一切设施计划，都受了守旧

的清廷之阻碍而失败，使中国改革的头一炮便没有响，因此收得了甲午年对日本战败的后果。

因战败的刺激，产生了戊戌维新运动；康、梁所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其动力是出于民间的知识份子，其理想是输入西学以振兴工业，改革行政制度，一时震动了全国，其意义大于李鸿章时代之改革。这一运动若一直顺利的发展到现在，即令只是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而工业与科学之发达，国力之强盛，是不会在日本之下的。不幸这次改革，又被清廷守旧的太后派所摧残而失败。这第二次改革失败，遂酿成了庚子拳匪事变，八国联军占领首都的后果。

庚子战败后，中国更加陷入了帝国主义宰割的深渊中，赔款连息九万五千万，这样大的数目，在现在还是惊人，在那时的国计民生上更是不可承受的打击。这还是小事，最致中国死命的是：在以前的协定关税和领事裁判权之外，又加上全国重要的铁路矿山权，内河航行权，在中国境内开办工厂权，和北京、天津、汉口、上海驻兵权。这些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无一不是破坏中国的主权。辛丑条约可以说是不平等条约中最不平等的条约。此后中国陷入半独立国家的悲境，较庚子以前更加明显了，因此，国计民生日增困苦。清廷之无能而又横暴，很明白的摆在人民面前，排满革命论逐渐抬头，君主立宪论逐渐失势，于是乃有孙、黄领导的辛亥革命。以辛亥革命的朝气，本有收回主权，完成国家独立与统一，以发展工业与科学的希望；不幸又遇到以袁世凯为首领的北洋军阀之反动，一切都趋向复古。此次革命在推翻满清帝制是成了功，在完成国家独立以致富强的大改革又失败了，因此酿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廿一条要求，袁世凯称帝，清帝复辟，南北战争等不断灾难的后果。

中国的民族工业，在欧战中有了一点发展，又加以俄国革命之刺激，革命党之努力及工农之奋起，于是乃有轰动全国的北伐战争运动。以此次运动的朝气，本有可能完成辛亥革命所未完成的任务，不幸又以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而失败了，因此酿成了“九一八”

的后果。

在此六七十年中，日本的工业与科学，一直顺利的发展着，资本主义已达到高度，中国每一次改革，都为反动势力所破坏，资本主义至今犹停滞在最初阶段。戊戌维新时代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反动理论，经过袁世凯反动时代梁启超的渲染，至今犹支配着知识份子的头脑，至今还有人认为东方的精神文化胜过西方的物质文明，认为大刀队能够抵抗敌人的机关枪和大炮，这就是中日强弱之所由分，也就是一般恐日病者主和派（实际是投降派）之理论及事实的根据。

因“九一八”的刺激，反日空气弥漫了全中国，政府也有了二三年军事上的努力，于是乃有今日的抗日战争。

此次抗日战争，不是基于一时的感情，也不是由于民族的复仇，更不是为了正义、人道、和平，这些好听的空洞名词，而是被压迫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压迫束缚的革命战争。战争之对象，虽然只是日本帝国主义，亦仅仅是日本帝国主义者而不是日本人民，因为压迫束缚我们的，亦非日本人民，而是帝国主义的日本军阀政府；战争之历史的意义，乃是脱离帝国主义之压迫与束缚，以完成中国独立与统一，由半殖民地的工业进到民族工业，使中国的政治、经济获得不断的自由发展之机会。

每个民族之国家独立与统一，必须实现经济独立与统一，始能完成，而经济落后的国家，尤必须力争关税自主，采用保护政策，本国的幼稚工业才能够和资本主义先进国的工业品竞争。自由贸易政策，在工业有高度发展的国家，有大量的商品输出，并且农产品不足，才能适用。中国幼稚的民族工业，如纺织、人造丝、火柴、肥皂、面粉、纸烟、水泥等，正因为处于半独立国家的地位，不但不能对于上举各项工业品施行关税保护政策，（现时海关增税的，仅仅是少数的奢侈品，虽然增多一点政府财政的收入，而于保护上举各项工业无所裨益。）抵制倾销，而且各国还有在中国境内设厂，航行的特权。此种状况不改变，依资本竞争的规律，中国的民族工业，便

永远不能抬头。这是中国需要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之基本原因。

前年日本广田对王正廷大使说：“中国是农业国，日本是工业国，两国间各以所有易其所无，携手合作，共存共荣，岂不甚好，中国何必要反口呢？”我们的答复是：我们所以反日，正因为也要做工业国，不甘心做别国的农奴，专为他们生产原料。今日日军之大炮飞机向我们轰炸，也正是要屈服我们做他们的农奴。

此次对日战争，乃六七十年来改革与革命的大运动之继续：第一次，李鸿章改革；第二次，戊戌维新；第三次，辛亥革命；第四次，北伐运动；今日的抗战乃第五次，到了对帝国主义武装冲突阶段，也就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尖锐阶段。

两个帝国主义间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两方面国家中社会主义者，都应该各自反对其本国的侵略战争，使之失败，因为这种战争只有牺牲人民，而没有进步的意义；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被侵略国的人民，抬起头来打倒掠夺他们的强盗，乃是人类一种进步的战争，侵略国的社会主义者，固然应该起来反对其本国政府，而被侵略国的社会主义者，则应援助其本国政府，使之获得胜利。此种胜利，不但使本国脱离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并且使侵略国的被压迫人民也得到解放的机会。因此，此次中国抗日战争，我们不能看做南京政府和东京政府的战争，而是被侵略的中国人民对于侵略的日帝国主义战争，全中国人民都应该拿出力量来援助抗日战争，除非甘心做汉奸。

此次抗日战争有严重的意义，决不可当作儿戏。战胜了，不但解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与束缚，并且使别的工业先进国亦不能够再继续强迫中国人做他们的农奴。根据历史的经验，以前德意志、意大利、日本、土耳其都是经过对外战胜，循外交途径，收回了独立国家所必需的主权，脱离了半独立国的地位。在中国，德、俄两国的特权已经放弃，法、美、意、比等国与我关系较小，惟英国在华势力与日本不相上下，然英人素来持重，近年对外政策又日趋保守，非以前的英国可比；聪明的美国人，比较日本更懂得中国国

民要求解放运动的意义与力量，未必肯蹈日本一味蛮干而失败的前辙。如果中国抗日战争得到胜利，列强在中国的特权，或者不必经过战争，而循外交途径，以次收回。这是一种比较温和的办法，然而绝对不是幻想。

如果此次战败，只有亡国为奴。所以此次战争，乃是中国人或为自由民或为奴隶之关键，每一个中国人对于抗战怠工，不尽他所能尽的力量，事实上是帮助了敌人，即是消极的无形的汉奸！

有人以为中国如是之大，不至灭亡，殊不知日本帝国主义者灭亡中国，并非采取直接管理全中国的笨法子，乃是以分化手段，在南北制造各种名义的政治组织，利用亲日派做傀儡，间接统治中国，把不愿充当傀儡的人们赶到川、云、贵山中和苗大哥作伴。这不是亡国是什么？日本帝国主义者，即对于各种傀儡的组织，也利于他们分立，更易于由他摆布，并不容许他们统一和力量强大起来。近日谣传溥仪将迁北平，余不信会有此事。因为日本的政策不愿以一个傀儡的组织统治全中国。

假使民众不起来，政府的军事势力始终陷于孤立的地位，不得已，中途屈服，放弃华北，这种南方暂时偏安的局面，也会日趋于全中国灭亡之路。

投降派唯一的理论及事实之根据，是中国在军事的经济的力量上都非日本之敌。他们不懂得日本不能用全部力量对中国战争；他们更不懂得中国抗日战争，是民族解放的革命战争，不能仅仅拿两方政府手中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来估计最后的胜负。中国政府手中的军力和财力之弱点，是可以由全国民众之奋起及全世界革命的国家革命的民众（日本的民众也在内）之援助来补充的。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两种力量之补充，不但投降派振振有词，即主战派将来也会动摇。所以我们在抗日战争中，首先必须深刻的瞭解抗战之真实意义，才会有始终坚决不挠的意志。

原载《我对于抗战的意见》，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
署名：陈独秀

目前对日抗战的种种问题*

——答《抗战》周刊记者问

(一九三七年十月九日)

记者：现在对日战争，已经全部展开了。从海南到华北，都在炮火连天的状况之下，而东北的义勇军也活跃起来了！前线将士的英勇，不仅得到国人的爱戴，而且得到世界的赞美，可是后方的工作，陈先生以为最切要的是什么？

陈：这一次的抗战，军人确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力量，勇敢牺牲的精神，是可钦佩的；可是后方却赶不上，前方的血战是何等紧张，而后方竟是这样的松懈，尤其是武汉，简直连表面的工作都做得不够！武汉为全国后方的中心，而空气这样沉寂，太可怕了。所以党政当局，应该积极的发动民众起来，募集公债和训练壮丁，才会有最有效的办法。

记者：如何才能使民众组织起来呢？在现阶段中，我们应该给予民众以何种训练为最适宜呢？

陈：关于组织民众一事，在目前，我希望党政当局，下一个绝大的决心，完成自上而下的改革。社会的改造有两个方式，一个是由下而上，一个是由上而下。现在既还没有自下而上的方式，我们不能等待，只好取自上而下的这个方式，我们希望执政的国民党从速完成他。尤其在抗战期中，要做到全国总动员，民众的组织应看成第一重要。

记者：陈先生对于这次抗战前途的观察怎呢？将来会有什么

* 此题为本书编者加，原题为《陈独秀先生访问记》。

结果？

陈：对日抗战对内可以使中国统一，对外可以使中国富强，只要政府能领导人民抗战到底，牺牲到底，日本是断然要屈服的！日本屈服以后，他在中国的权利，当然要为中国所收回，中国的主权，可因此而得保完整。

记者：此次抗日胜利，日本在中国特权固可收回，其他各国的呢？

陈：不成问题！土希战争以后，使土耳其的主权渐次完整，但土耳其只打败希腊，没有打败英法，然英法在土耳其的权利，也渐渐被土耳其收回了。所以中国只要对日抗战到底，统一固不成问题，独立也不成问题。英美各国和中国的关系，或者可循外交途径来解决，不一定要诉诸战争；假如中国不能振作，他们就非分尝一脔不可了。

记者：陈先生既然谈到国际问题，那末，现在快要举行的远东会议，据陈先生的观察，对于中国有不有帮助。

陈：会议不过是一种形式，不必重视。

记者：那末，请陈先生把这个会议的背景来分析一下。

陈：苏俄是同情中国的，法国和苏俄有军事和政治的谅解。在会议中，中国可望得到这两个国家的援助。德国此时还离不开英国，不一定会帮助日本，他也不想牺牲中国的市场，可望他中立。意大利的态度倒很令人怀疑。美国的态度，以前不大好，自从罗斯福发表演说后，稍稍改变了，然美国终不会走到英国的前面，法俄也不会采取和英国对立的态度，在远东会议中，最大多数国家还是惟英国马首是瞻。英国太持重了，太保守了，太看重既成事实了，他固然不愿从中国的市场退出，而让日本独占，然而他的态度能够有利于中国至何种态度，中国抗战的胜负是有很大影响的。

记者：关于宣传，文化界的责任是很重大的了。现在武汉已成为全国文化的中心，平津和京沪各地的文化人，都跑到了武汉，有人还提出了“武汉时代”的口号来，陈先生觉得在这个抗战的非常

时期，以武汉为中心的文化运动，应该怎样开展呢？

陈：所谓非常时期的文化运动者，就是文化人的参加抗战运动。小说家、戏剧家、诗人、电影从业员、音乐家、画家、大学教授、新闻记者……凡是以文化为职业的人，都应该把他的精力用到抗战的行动上。我们要把抗战的基础，建筑在广大的农业里，希望各地到武汉来的文化人，不要专门在武汉办刊物，而忘记那急待唤起的农民群众。这样一来，并且可使他们的艺术民众化。

记者：听说陈先生要办一个刊物，确否？

陈：没有这个意思。现在各报纸杂志都肯登我的文字，我何必自己办刊物呢。

记者：报纸上说，陈先生今后要专做文化运动，不做政治运动了，是不是呢？

陈：不对！不对。这是《大公报》记者听错了我的说话，现在的抗日运动，就是政治运动，我能够不参加抗日运动么？那位记者问我，是不是参加实际政治（他的意思全然是指政府里面的行政）工作，我说，这于我不大相宜，十五六年时，我也没有担任政府里的实际工作，我最怕被政府里的实际工作所捆住，没有清醒的头脑观察政治局势。换言之，我的个性不大适宜于做官，但是政治运动则每个人都应该参加的。

原载《抗战》周刊第1卷第6期

署名：陈独秀

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 及怎样得到胜利

——在汉口青年会讲演

(一九三七年十月)

我今天要讲的是：“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及怎样得到胜利”这个题目。

现在有许多人都在说：“我们对日战争，要得最后的胜利”，并且说：“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们。”但是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怎样的胜利才是最后的胜利呢？同时，怎样才能得到胜利呢？这一点，我们应当具体的说明，仅仅抽象的说说胜利，那是过于空洞的。

今天有很多人都在骂“和”，以为和就是投降，其实一个国家打仗，有战必有和，说和并不是一件坏事情，只看怎样的和法。如果是屈服的和，那是投降；如果是对等的和，那是可以的。民族战争，和是可以，投降则不可。

前几天我在华中大学曾经讲过此次抗战意义，今天当然已经用不着再说这一方面的话，不过我当时有一个结论是不能不提一提的：我说这一次抗日不是感情的，复仇的，而是求中国在国际上，经济上脱离半独立的地位，得到完全独立的地位。不然，则我们是奴隶的生存。我们必须经济能自由发展，不受外国任何势力的宰制。这才是我们战争的意义，才是我们战争的目的。

我们的胜利，是不是要割取日本的土地呢？不是。我们是一个被侵略的国家，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只要他交还侵略去的土地。是不是要他赔款呢？不是。因为赔款是负担在日本人民的身上。我

们不是侵略国，我们不要使敌国人民负担加重，我们只要日本把在华侵略去的权利交还。这些权利是什么？如租界、如关税协定、如领判权、铁路矿山权、内河航行权、在中国驻兵和开办工厂……等等，我们只要这些权利交还我们。因为有上述几种特权存在，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不能称为自主的国家，中国就永远做他们的农奴，他们就永远做了我们民族工业的主人。我们这一次的战争，是要争取民族工业的主权，要自己起来做主人。所以，这一战争不是感情的、复仇的。我们并不要日本割地赔款，我们只要交还我们的主权，把在中国侵略去的交还我们，这就是我们最后的胜利。并且也只有这样才算是最后的胜利，不应该存苟且的心理，以为日本能够停战撤兵至多做到交还失地，就算我们的最后胜利；这便和以前一样，排满只限于清帝退位，讨袁只限于取消帝制，迷惑于苟且成功的心理，极力降低要求，缩短战线，自以为是稳健的战略，结果仍旧是失败。这种最后的胜利，是不容易得到的，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需能够支持长时期的抗战。现在有一班中国必胜论者，很轻率的说日本已经陷入了经济崩溃的境地，这一句话显然是毫无根据的乐观，是自己欺骗自己，在事实上，一个短时期内即一年半甚至二年，无论在经济上在军事上，我们是摧毁不了她的，我们须要能够持久的和她抗争，至少是二年，甚至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可以。这样的长期战争，在现代当然不可能，但我们要想得到最后的胜利，必需有虽三十年也不愿意做奴隶而要做主人的决心，纵然中间经过惨败甚至一时的屈服。

现在有一件事，就是远东会议。也许有很多的人希望这一个会议可以帮助中国得到胜利，如果真是这样希望，那就非常错误。就我个人的意见，远东会议能够不增加中国的困难，就已经是很好的了。虽然目前我们还不知道远东会议会有什么结果，但我们从历史上观察远东会议的来源，也就可以知道一半。自从英帝国会议以后，澳大利代表就提出了太平洋会议，日本表示相当赞成，美国不理，其目的就可以想见了。澳大利对于远东问题，有一个目的，想拿

中国问题满足日本，只要日本不干涉她，她自己得到安全就够了。这是过去的情形，现在呢？现在国联的机构以内，给日本以经济制裁的空气非常浓厚，连加拿大都赞成了，但是英国在意、阿战争中已经有了经验，经济制裁以后，倘不进一步加以武装制裁，经济制裁必然要失败的，武装制裁，又非所愿，只得赞成远东会议来和缓经济制裁的空气，来安定她自身，表面上虽说希望两者并而为一，实则只想玩玩远东会议而已。再说远东会议会有什么结果呢？只要看看到会的成分便知道了，如丹麦、比利时、葡萄牙、瑞典、挪威，一向是跟着英国走的；法与苏会同情于中国，但终局也不能走出英国的范围；美国的算盘打得很精，她和日本剧烈的冲突还在明天，今天值不得一战，不妨流点他人的血，自己向中日两方面卖卖军火，这便是美国孤立派和平主义者的真实意旨，罗斯福现在虽然走进一步，也不过为了他自己将来选举票，敷衍少数主战派一下，决不会抛弃和平派而走到英国前面；德意两国呢？意大利对日本当然很同情，德国不能公开的帮助中国，也不会帮助日本，德助日以欧洲方面为限，在经济上她不愿失去中国市场，她或者中立，或者不参加会议，如此看来，除德、意别有自己的立场，其余都要或迟或早惟英国马首是瞻。所以决定远东会议之前途的还是英国。英国呢？大概还不外是折中、调解和承认既成事实这些老办法。如此则远东会议便无疾而终了，我们对她能有什么别的希望呢？那么我们是不是对于国际的援助一点希望没有呢？这到不尽然。我们在客观情形明瞭以后，应该断然抛弃对国联对九国公约国任何集体制裁的幻想，并且应该抛弃什么和平阵线、侵略阵线这一虚构的公式，努力在外交上尽可能的向各别国家获得军火的接济，如苏联、美国、德国和捷克。所谓外国军火之接济，决不仅仅是寻常小量的补充，而是大量的接济，而是要看做我们得到胜利的因素之一。说到这里，或者会有人出来反对所谓“唯武器论”，我以为“唯武器论”，在人类社会进化史上是无可非难的，因为用弓箭刀矛的人战胜了用石头的，用来福枪的人又战胜了用弓箭刀矛的，用飞机大炮

的人将来也会战胜用来福枪的，武器并不能简单看做武器，它是每一时代每一民族一般文化发展的象征；即在实际战争上，“唯武器论”在一定限度上也是正确的，因为只有武器的数量、质量约略相等的条件之下，兵数众多和作战勇敢才有决定最后胜负的作用。如果我们盲目的反对“唯武器论”，那只好痴心妄想精神可以战胜物质，希望大刀队可以抵抗飞机大炮，仿佛标语、祈祷、歌咏，可以打退敌人，这都等于用符咒治病，病人只有倒霉！

日本比起我们来，已经是工业国家，军火尚须不断的从外国补充，战时更不用说，中国是农业商业国家，军火几乎全部依赖外国，如果打算继续抗战二年，就是说二年以内不向日本屈服，便不是宣传大话所可济事，要能够从外国获得四十八万万万元的军火才行。单是飞机一项，二年内陆续补充一千架，平均每架以三十万元计，就要三万万元，大炮及大炮的子弹的价钱那就更可观了。

如果我们有了军火，那就可以拿兵数众多和作战勇敢来决定胜负了。日本对中国作战，只能出兵四十万，我们的军队以训练上的缺点，应该用一百二十万兵来对付，一百二十万兵的给养及被服、药品之补充，官兵每人每月平均以三十元计，二年共需八万六千四百万元，此外尚需巨额的运输费，连军火，二年战费当在六十万万元以上。以半年计至少要用十五万万元，日本预计半年战费要二十五万万元，我们不能再少过十五万万元了。假定在此半年中，能够得到五万万元的军火借款，尚需筹得现款十万万元，才能够支持半年，若准备支持一年，还要加多十五万万元，合共二十五万万元，只抵得日本半年的战费，似乎不能再少了。现在政府发行的救国公债只五万万元，实在太少，第一批救国公债，最少要二十万万元，而且最好是一半现金，一半法币。现在集中在政府手中的现金虽很多，但为了维持外汇的平衡，当然不能多量动用，近代的战争，谁不能维持外汇的平衡，谁就踏上了失败的道路，日本对于中国的全面抗战，倘然不能攻取中国多少地方，从她占领的中国地方获得大批战费，恐怕不到二年，外汇的平衡便不能维持了。我们

在此二年中，将怎样维持外汇的平衡呢？外国借款当然希望很小，只有陆续从国内筹出三四十万万现金。怎样筹法呢？我们要知道现金在人民身上，政府无法没收，要靠人民用救国公债的形式拿出，如果说不能不用强迫力，大部分是要用民众的强迫力，单靠政府的强迫征收，那是不行的。如果人民能够拿出二三十万万现金充战费，这才真是财力的全国动员，这件事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也是精神上的，因为这一消息传出后，日本绝不好再说：对日抗战的是中国政府而不是中国人民。

这是财力问题，再有人力的问题。日本打中国，可以出到四十万兵，中国的军队，除了中央军、两广军、川军，其他军队战斗力是有限的。中央、两广、四川军合拢来，大概有八十万，全中国也许有二百万兵，但可打的则只有这八十万，这八十万可超过日本一倍。但现在的战争，日本不但是机械化厉害，就是军队的训练也好过我们，所以拿八十万对四十万，还没有胜利的把握，我们最少要一百二十万，三人打他一个，这样我们就要大大的补充，照现在征兵办法，似乎不会有多大效果。中国习惯怕当兵，强迫征兵，还会愤事，必须要使民众了解民族解放战争的意义，自动的起来参加战争才行。民众如果蜂涌起来，武装起来，自愿的参加战争，那么，不但正规军之补充不成问题，并且还有大量的游击队，辅助正规军作战，这才真是人力的全国动员。人力的全国动员和财力的全国动员一样，都需要民众自动，靠政府的强派，是不会有很大成绩的，譬如小孩子读书，靠父兄强迫是不行的。强迫征兵和强派公债一样，不但不会有多大成绩，倘贪官污吏、土劣、保甲长等，视为发财机会，借着征兵派债，肆行敲诈，那更要大糟而特糟。政府若赶快发动广大民众，来动员全国的财力和人力，上说的毛病，自然是不会发生的。这闻上海战争，军人的确尽了他们的力量，他们当中竟有接了撤退命令还不肯退的，这种英勇的牺牲，是值得敬佩的。但后方民众还不曾起来，所谓“全民抗战”，还是未曾实现的宣传口号。现在单看看武汉，大家还在睡觉，不仅是随便的睡觉，还是吃了鸦片烟的沉

睡！救国公债，湖北省只摊派一百三十万，数目并不算多，现在连五分之一还未收齐，而武汉商人还在斤斤较量摊派数目太多，这真不成话说！政府应该立即决心发动民众，使民众蜂涌起来，疯狂起来，热心抗战，要做到政府征兵一万，报名的有二万，公债发行五万万，人民拿出十万万，真正做到有力者出力，有钱者出钱并出力，则抗战的胜利才会有把握。所以我认为胜利的因素是：

第一，从国外得到大量军火之接济。

第二，全国民众蜂涌起来，做到全国财力人力之动员。

再加上政府军队的力量，这才能够保证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这三样好比一张桌子的三只脚，缺少了一只，甚至两只，漫说胜利，就是曲线的失败，也是很难想象的事。此次中日战争，不是两个国家军备约略相等的战争，而是军备贫弱的中国民族，反抗军备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战争，只有依赖外国大量军火及国内广大民众的力量，才不会使政府军队因孤立而失败，这两种力量，又恰好是敌人所得不着的。

我们要得到胜利，必须在具体办法上指出怎样才能得到胜利；倘空口高喊“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们”，便等于一种咒语，这种咒语，打毁不倒敌人，帮助不了自己！

原载《我对于抗战的意见》，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
署名：陈独秀

辛亥革命之回顾与前瞻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

辛亥革命,在实质上,对内推翻满清统治,对外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势力,总之是建设民族独立国家,以发展民族工业。惜乎当日的政府口号,是偏于排满,当日的工作,是偏于军事,满清一推翻,军事一停止,人民以为革命已经完结,即党人亦感觉无事可做。真正认为革命尚未完成,并且前途还甚辽远的,只孙先生一人。民国八九年间,孙先生曾对我说,“袁世凯背叛了中华民族,可是救了革命党人!”孙先生见我完全了解他这句话的深刻意义,异常高兴,如是接着大发议论道,“我的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一般党人都不感兴趣,甚至说我空想,多事,孙瑤卿在汉口公开的反对我提倡三民主义,他们以为革命就是排满,排满就是革命,现在满清已推倒,革命已成功,何必又来谈什么主义呢?他说的这些话,是代表许多党人心理的,象他们这些近视,还懂得什么是革命呢?”这一段话的声音,至今还在我脑中响亮着。我们在今日的抗日战争中,切切不可忘了孙先生的教训,我们要认识中国的革命还未完成,我们不要使政治工作落在军事后面,我们不要以为抗日就是革命,我们要深切的认识抗日战争之目的,是在必须首先排除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才能够建设民族独立的国家,以发展民族工业,以完成辛亥革命所未完成之任务!

原载1937年10月10日《武汉日报》

署名:陈独秀

实庵自传*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第一章 没有父亲的孩子

休谟的自传开口便说：“一个人写自己的生平时，如果说的太多了，总是免不了虚荣的，所以我的自传要力求简短，人们或者认为我自己之擅写自己的生平，那正是一种虚荣；不过这篇叙述文字所包含的东西，除了关于我自己著作的记载而外，很少有别的，我的一生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至于我大部分著作之初次成功，也并不足为虚荣的对象。”几年以来，许多朋友极力劝我写自传，我迟迟不写者，并不是因为避免什么虚荣；现在开始写一点，也不是因为什么虚荣；休谟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我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至于我大部分政治生涯之失败，也并不足为虚荣的对象。我现在写这本自传，关于我个人的事，打算照休谟的话“力求简短”，主要的是把我一生所见所闻的政治及社会思想之变动，尽我所记忆的描写出来，作为现代青年一种活的经验，不力求简短，也不滥钞不大有生气的政治经济材料，以夸张篇幅。

写自传的人，照例都从幼年时代说起，可是我幼年时代的事，几乎完全记忆不清了。弗兰克林的自传，一开始便说：“我向来喜欢搜集先人的一切琐碎的遗事，你们当能忆及和我同住英格兰时，遍访亲戚故旧，我之长途跋涉，目的正在此。”我现在不能够这样做，

* 陈独秀这篇自传，是在胡适等人的劝说之下，在国民党南京监狱，即江苏第一监狱里写就的。他原拟写至“五四”前后，但由于1937年8月下旬提前获释出狱，当时全面抗战已经开始，就没有赶上继续写完。

也不愿意这样做，只略略写出在幼年时代印象较深的几件事而已。

第一件事：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我在广东时，有一次宴会席上，陈炳明正正经经的问我：“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我也正正经经的回答道：“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当时在座的人们，有的听了我的话，呵呵大笑，有的睁大眼睛看着我，仿佛不明白我说些什么，或者因为言语不通，或者以为答非所问。

我出世几个月，我的父亲便死了，真的，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我记得我幼时家住在安徽省怀宁县城里，我记得家中有一个严厉的祖父，一个能干而慈爱的母亲，一个阿弥陀佛的大哥。

亲戚本家都绰号我的这位祖父为“白胡爹爹”，孩子们哭时，一说白胡爹爹来了，便停声不敢哭，这位白胡爹爹的严厉可怕便可想见了。这位白胡爹爹有两种怪脾气：一是好洁，一是好静。家中有一角地方有一件棹椅没扫抹乾淨，我的母亲，我的大姊，便要倒大霉。他不许家中人走起路来有脚步声，我的二姊年幼不知利害，为了走路有时有脚步声，也不知挨过多少次毒打，便是我们的外祖母到我们家里来，如果不是从他眼前经过，都不得不捏手捏脚的象做贼的一般走路，因为恐怕他三不知的骂起来，倒不好出头承认是她的脚步声。我那时心中老是有一个不可解的疑问：这位好洁好静的祖父，他是抽鸦片烟的，在家里开灯不算数，还时常要到街上极龌龊而嘈杂的烟馆去抽烟，才算过瘾，那时他好洁好静的脾气那里去了呢？这一疑问直到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我才有了解答。第一个解答是人有好群性，就是抽大烟，也得集体的抽起来才有趣；然而这一解答还不免浅薄，更精微奥妙的解答，是烧烟泡的艺术之相互欣赏。大家的全意识都沉浸在相互欣赏这一艺术的世界，这一艺术世界之外的一切一切都忘怀了。我这样的解答，别人或者都以为我在说笑话，恐怕只有我的朋友刘叔雅才懂得这个哲学。

我从六岁到八九岁，都是这位祖父教我读书。我从小有点小聪明，可是这点小聪明却害苦了我。我大哥的读书，他从来不大注意，独独看中了我，恨不得我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读完，他才称意，《四书》、《诗经》还罢了，我最怕的是《左传》，幸亏这位祖父或者还不知道“三礼”的重要，否则会送掉我的小性命。我背书背不出，使他生气动手打，还是小事；使他最生气，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令人可怕的，是我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他不只一次愤怒而伤感的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我的母亲为此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可是母亲对我并不象祖父那样悲观，总是用好言劝勉我，说道：“小儿，你务必好好用心读书，将来书读好了，中个举人替你父亲争口气，你的父亲读书一生，未曾考中举人，是他生前一桩恨事！”我见了母亲流泪，倒哭出来了，母亲一面替我揩眼泪，一面责备我道：“你这孩子真淘气，爹爹那样打你，你不哭，现在倒无端的哭了！”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威权，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我们知道打着不哭的孩子很多，后来虽不定有出息，也不定做强盗。祖父对我的预料，显然不符合，我后来并没有做强盗，并且最厌恶杀人。我以为现时代还不能免的战争，即令是革命战争中的杀人，也是残忍的野蛮的事，然而战争还有进步的作用；其余的杀人，如政治的暗杀，法律的宣告死刑，只有助长人们的残忍与野蛮性，没有一点好影响，别的杀人更不用说了。

父亲的性格，我不大知道。母亲之为，很能干而疏财仗义，好打抱不平，亲戚本家都称她为女丈夫；其实她本质还是一个老好人，往往优容奸恶，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据我所记忆的有两件事，可以充分表现出她这一弱点。

有一位我祖父辈的本家，是我们族里的族长，怀宁话称为“户尊”，在淶水乡地方上是一位颇有点名望的绅董，算得一位小小的

社会栋梁。我的母亲很尊敬他，我们小辈更不用说了。有一年（大约是光绪十二年前后），大水冲破了广济圩，全淶水乡（怀宁东乡）都淹没了，这位族长哭丧着脸向我母亲诉说乡民的苦痛之后，接着借钱救济他的家属，我母亲对他十分恭敬，然而借钱的事却终于不曾答应。族长去后，我对母亲说：“我们家里虽然穷，总比淹水的人家好些，何以一个钱不借给他呢？”母亲皱着眉头一言不发。我知道母亲的脾气，她不愿说的话，你再问也是枉然，我只在心中纳闷道：母亲时常当衣借钱济人之急，又时常教训我们，不要看不起穷人，不许骂叫化子，为什么今天不肯借钱给淹水的本家而且她一向尊敬的族长呢？事隔五六年，我才从许多人口中渐渐知道了这位族长的为人：族中及乡邻有争执的事，总得请他判断是非曲直，他于是非曲直的判断，很公平的不分亲疏，一概以所得鸡、米、烟土或老本洋多少为标准，因此有时他的亲戚本家会败诉，外人反而胜利，乡间人都称赞这位绅董公正无私！他还有一件事值得舆论称赞，就是每逢修圩放赈，他比任何人都热心，无论严寒酷暑，都忙着为大众奔波尽义务，凡他所督修的圩工，比别人所担任一段都更不坚固，大概他认为如果认真按照原定的工料做好，于他已是一种损失，失了将来放赈的机会，又是一种损失，这未免自己太对不住自己了！至此我才明白母亲皱眉不语的缘故，是因为她已经深知这位族长之为人，然而她仍旧恭敬他，这岂不是她的弱点吗？

还有这族长手下用的一位户差（户差的职务，是奉行族长命令，逮捕族中不法子孙到祠堂处罚），同时又是一位阴差（阎王的差人），他常常到我们家里来，说他在阴间会见了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没有钱用，托他来要钱买钱纸银锭烧给他们，我的母亲很恭敬的款待他，并且给钱托他代买钱纸银锭，不用说那钱纸银锭是烧给这位当阴差的先生了，这位阴差去后，母亲对我们总是表示不信任他的鬼话。有一天他又来到我们家里过阴，大张开嘴打了一个呵欠，直挺挺的倒在床上，口中喃喃说胡话，谁也听不清楚他说些什么，大概是鄂都城的土话罢！是我气他不过，跑去约了同屋及近邻

十多个孩子，从前后门奔进来，同声大喊某处失了火，这位阴差先生顿时停止了声响，急忙打了一个小小呵欠便回到阳间来了，闭着眼睛问道：“这边有了火烛了罢？”我的母亲站在床边微笑的答道：“是的！”他接着说：“这可不错罢，我在那边就知道了。”我在旁边弯着腰，缩着颈脖子，用小手捂着嘴，几乎要大笑出来，母亲拿起鸡毛帚子将我赶走的很远，强忍着笑，骂道：“你这班小鬼！”但她还是恭恭敬敬用酒肉款待这位阴差爹爹，并且送钱托他买钱纸银锭，这便是我母亲优容奸恶之又一事实。

有人称赞我疾恶如仇，有人批评我性情暴躁，其实我性情暴躁则有之，疾恶如仇则不尽然，在这方面，我和我的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然深知之，还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政治上之不严肃，不坚决，而母亲的性格之遗传，也有影响罢。

幸而我母亲崇重科举的思想，我始终没有受到影响。这件事我们当然不应该苛责前一辈的人，尤其是不曾受过新旧任何教育的妇人。

因为在那一时代的社会，科举不仅仅是一个虚荣，实已支配了全社会一般人的实际生活，有了功名才能做大官（那时捐班出身的官，人们还不大瞧得起，而且官也做不大，大官必须正途出身，洋博士那时还未发明），做大官才能发大财，发了财才能买田置地，做地主（那时存银行和做交易所生意，也还未发明），盖大屋（并非洋房），欺压乡农，荣宗耀祖；那时人家生了儿子，恭维他将来做刚白度（即买办）的，还只有上海十里洋场这一块小地方，其余普遍的吉利话，一概是进学，中举，会进士，点状元；婆婆看待媳妇之厚薄，全以儿子有无功名和功名大小为标准，丈夫有功名的，公婆便捧在头上，没有功名的连用人的气都得受；贫苦农民的儿子，举人、进士、状元不用说，连秀才的好梦都不敢做，用尽九牛二虎之力，供给儿子读几年书，好歹能写出百而八十字，已经算是才子，如果能够跟着先生进城过一次考，胡乱写几百字交了卷，那怕第一场就榜上无

名，回家去也算得出人头地。穷凶极恶的地主们，对这一家佃户，便另眼看待，所以当时乡间有这样两句流行的谚语：“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农民的儿子如果考取了秀才，便是一步登天，也就是立了将来做土豪劣绅的基础，一生吃著不尽。所以无论城乡，屡考不中的人们，往往埋怨祖坟的风水不好，掘出死骨来改葬，这便是那班圣人之徒扬名显亲的孝道。在这样的社会空气中，在人们尤其是妇女的头脑里面，科举当然是一件神圣事业了。

我的母亲虽然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当时传统的“忠孝节义”之通俗教育标语，她是知道的，我很感谢她从来不曾拿这些标语教育我们，她对于我们之教育，是考科举，起码也要中个举人，替父亲争气。当大哥考取了秀才时，母亲很高兴，而我却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母亲高兴，惧的是学八股文章和应考的灾难，要临到我身上来了！

自从祖父死后，经过好几个塾师，我都大不满意。到了十二、三岁时，由大哥教我读书，大哥知道我不喜欢八股文章，除温习经书外，新教我读《昭明文选》。初读时，我也有点头痛，后来渐渐读出味道来了，从此更加看不起八股文；这件事使我阿弥陀佛的大哥夹在中间很为难，一面受了母亲的严命，教我习八股，预备应考，一面他知道我不喜欢这一套。一直到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我已经十七岁了，在县考前一两个月，大哥实在再换不过去了，才硬着头皮对我说：“考期已近了，你也得看看八股文章罢！”我当时一声不响。他知道我的脾气，不做声并非反对，而是承认。他高高兴兴的拿出合于小考格式的路德的文章为我讲解，我表面上是在听他的讲解，心里还是想着我的《昭明文选》，不久大哥也看出路德的文章太不合我的口味，于是再拿出金黄和袁枚的制艺给我看，我对于这几个人的文章虽然有点兴趣，而终于格格不入，他对于这位难说话的弟弟，实在无法可想，只好听其自然了。大哥虽然十分忠厚老实，我猜想他此时急则智生，必然向母亲做了一个虚伪的报告，说我如何如何用心学八股文，那是在这期间母亲喜悦的面容中可以

看出的。象我那样的八股文程度，县考、府考自然名次都考得很低，到了院试，宗师（安徽语称学院为宗师）出的题目是什么“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搭题，我对于这样不通的题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把“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正在收拾考具要交卷，那位山东大个儿的李宗师亲自走过来收取我的卷子（那时我和别的几个人，因为是幼童和县、府试录取第一名，或是经古考取了提堂，在宗师案前面试，所以他很便当的亲自收取卷子，我并不是考幼童，县、府试也非第一名，一入场看见卷面上印了提堂字样，知道经古已经考取了，不用说这也是昭明太子帮的忙），他翻开我的卷子大约看了两三行，便说：“站住，别慌走！”我听了着实一吓，不知闯下了什么大祸。他略略看完了通篇，睁开大眼睛对我从头到脚看了一遍，问我十几岁，为啥不考幼童？我说童生今年十七岁了。他点点头说道：“年纪还轻，回家好好用功，好好用功。”我回家把文章稿子交给大哥看，大哥看完文稿，皱着眉头足足有个把钟头一声不响，在我，应考本来是敷衍母亲，算不得什么正经事，这时看见大哥那种失望的情形，却有点令我难受。谁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把我取了第一名，这件事使我更加一层鄙薄科举。捷报传来，母亲乐得几乎掉下眼泪。“眼皮子浅”这句批评，怀宁人自己也承认，人家倒了霉，亲友邻舍们，照例总是编排得比实际倒霉要超过几十倍；人家有点兴旺，他们也要附会得比实际超过几十倍。我们这一门姓陈的，在怀宁本是一个小户人家，绅士们向来是瞧不起的，全族中到我的父亲时才有一个秀才，叔父还中了举，现在看见我们弟兄又都是青年秀才，不但另眼相看，而且造出许多神话，说我们家的祖坟是如何如何好风水，说城外迎江寺的宝塔是陈家祖坟前一管笔，说我出世的前夜，我母亲做过什么什么梦，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他们真想不到我后来接二连三做了使他们吓破了胆的康党、乱党、共产党，而不是他们所想象的举人、进士、状元郎。最有趣的是

几家富户，竟看中了我这没有父亲的穷孩子，争先恐后的托人向我母亲问我可曾定亲。这就是我母亲大乐而特乐的社会原因。母亲快乐，我自然很高兴，所害怕的，来年江南乡试的灾难，又要临到我身上了！

第二章 江南乡试

江南乡试是当时社会上的一件大事，虽然经过了甲午战败，大家仍旧在梦中。我那时所想象的灾难，还远不及后来在考场中所经验的那样厉害；并且我觉得这场灾难是免不了的，不如积极的用点功，考个举人以了母亲的心愿，以后好让我专心做点正经学问。所以在那一年中，虽然多病，也还着实准备了考试的工夫，好在经义和策问，我是觉得有点兴趣的，就是八股文也勉强研究了一番。至于写字，我喜欢临碑帖，大哥总劝我学馆阁体，我心里实在好笑，我已打定主意，只想考个举人了事，决不愿意再上进，习那讨厌的馆阁字做什么！我们弟兄感情极好，虽然意见上没有一件事不冲突，没有一件事依他的话做，而始终总保持着温和态度，不肯在口头上反驳他，免得伤了手足的感情。

大概是光绪二十三年七月罢，我不得不初次离开母亲，初次出门到南京乡试了。同行的人们是大哥，大哥的先生，大哥的同学和先生的几位弟兄，大家都决计坐轮船去，因为轮船比民船快得多。那时到南京乡试的人，很多愿意坐民船，这并非保存国粹，而是因为坐民船可以发一笔财，船头上扯起一条写着“奉旨江南乡试”几个大字的黄布旗，一路上的关卡，虽然明明知道船上装满着私货，也不敢前来查问，比现在日本人走私或者还威风凛凛。我们一批人，居然不想发这笔横财，可算得是正人君子了！

我们这一批正人君子，除我以外，都到过南京乡试的，只有我初次出门，一到南京，看见仪凤门那样高大的城门，真是乡下佬上街，大开眼界，往日以为可以骄傲的省城，——周围九里十三步的

安庆城，此时在我的脑中陡然变成一个山城小市了。我坐在驴子背上，一路幻想着，南京城内的房屋街市不知如何繁华美丽，又幻想着上海的城门更不知如何的高大，因为曾听人说上海比南京还要热闹多少倍。进城一看，使我失望了，城北几条大街道之平阔，诚然比起安庆来在天上，然而房屋却和安庆一样的矮小破烂，城北一带的荒凉，也和安庆是弟兄，南京所有的特色，只是一个“大”。可是房屋虽然破烂，好象人血堆起来的洋房还没有；城厢内外唯一的交通工具，只有小驴子，跑起路来，驴子头间一串铃铛的丁令当郎声，和四个小蹄子的德德声相应和着，坐在驴背上的人，似乎都有点诗意。那时南京用人拖的东洋车、马车还没有，现在广州人所讥讽的“市虎”，南京人所诅咒的“棺材”和公共汽车，更不用说；城南的街道和安庆一样窄小，在万人哭声中开辟的马路也还没有；因为甲午战后付了巨额的赔款，物价已日见高涨，多试时南京的人口，临时又增加了一万多，米卖到七八十钱一升，猪肉卖到一百钱一斤，人们已经叫苦，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南京人的面容，还算是自由的，快活的，至少，人见着人，还不会相互疑心对方是扒手，或是暗探，这难道是物质文明和革命的罪恶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别有原因的。

我们这一批正人君子，到南京的头一夜，是睡在一家熟人屋里的楼板上，第二天一早起来，留下三个人看守行李，其余都出去分途找寓处。留下的三个人，第一个是大哥先生，是我们这一批正人君子的最高领袖，当然不便御驾亲征，失了尊严；第二个是我大哥，因为他不善言辞；我这小小人自然更不胜任；就是留下看守行李的第三个。午后寓处找着了，立刻搬过去，一进屋，找房子的几个正人君子，全大睁着眼睛，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异口同声的说：“这屋子又贵又坏，真上当！”我听了真莫明其妙，他们刚才亲自看好的房子，怎么忽然觉得上了当呢？过了三四天，在他们和同寓中别的考生谈话中间，才发见了上当的缘故。原来在我们之先搬来的几位正人君子，来找房子的时候，大家也明明看见房东家里有一

位花枝招展的大姐儿，坐在窗口做针线，等到一搬进来，那位仙女便化做一阵清风不知何处去了。后来听说这种美人计，乃是南京房东招揽考先生的惯技，上当的并不止我们这几位正人君子，那些临时请来的仙女，有的是亲眷，有的是土娼。考先生上当的固然很多，房东上当也不是没有，如果他们家中真有年轻的妇女；如果他们不小心把咸鱼、腊肉挂在厨房里或屋檐下，此时也会不翼而飞。好在考先生都有“读书人”这张体面的护符，奸淫窃盗的罪名，房东那敢加在他们身上！他们到商店里买东西，有机会也要顺带一点藏在袖子里，店家就是看见了也不敢声张，因为他们开口便说：“我们是奉着皇帝圣旨来乡试的，你们诬辱我们做贼，便是诬辱了皇帝！”天高皇帝远，他们这几句大话，未必真能吓倒商人，商人所最怕的还是他们人多，一句话得罪了他们，他们便要动野蛮，他们一和人打架，路过的考先生，无论认识不认识，都会上前动手帮助，商人知道他们上前帮着打架还不是真正目的，在人多手多的混乱中，商人的损失可就更大了，就是闹到官，对于人多势大的考先生，官也没有办法。南京每逢乡试，临时增加一万多人，平均一人用五十元，市面上有五十万元的进帐，临时商店遍城南到处都有，特别是状元境一带，商人们只要能够赚钱，受点气也就算不了什么。这班文武双全的考先生，惟有到钓鱼巷嫖妓时，却不动野蛮，只口口声声自称寒士，商请妓家减价而已，他们此时或者以为必须这样，才不失读书人的斯文气派！

我们寓处的房子，诚然又坏又贵，我跟着他们上当，这还是小事，使我最难受的要算是解大手的问题，现在回想起来还有点头痛。屋里没有茅厕，男人们又没有用惯马桶，大门外路旁空地，便是解大小手的处所，我记得那时南京稍微偏僻一点的地方，差不多每个人家大门外两旁空地上，都有一堆一堆的小小金字塔，不仅我们的寓处是如此。不但我的大哥，就是我们那位老夫子，本来是个道学先生，开口孔、孟，闭口程、朱，这位博学的老夫子，不但读过几本宋儒的语录，并且还知道什么“男女有别”、“男女授受不亲”的礼

教，他也是天天那样在路旁空地上解大手，有时妇女在路上走过，只好当做没看见。同寓的有几个荒唐鬼，在高声朗诵那礼义、廉耻、正心、修身的八股文章之余暇，时到门前探望，远远发现有年轻的妇女姗姗而来，他便扯下裤子登下去解大手，好象急于献宝似的，虽然他并无大手可解。我总是挨到天黑才敢出去解大手，因此有时踏了一脚屎回来，已经气闷，还要受别人的笑骂，骂我假正经，为什么白天不去解手，如今踏了一脚屎回来，弄得一屋子的臭气！“假正经”这句话，骂得我也许对，也许不对，我那时不但已解人事，而且自己戕贼得很厉害，如果有机会和女人睡觉，大约不会推辞，可是象那样冒冒失失的对一个陌生的女子当街献宝，我总认为是太无聊了。

到了八月初七日，我们要进场考试了。我背了考篮、书籍、文具、食粮、烧饭的锅炉和油布，已竭尽了生平的气力，若不是大哥代我领试卷，我便会在人丛中挤死。一进考棚，三魂吓掉了二魂半，每条十多丈长的号筒，都有几十或上百个号舍，号舍的大小仿佛现时警察的岗棚，然而要低得多，长个子站在里面是要低头弯腰的，这就是那时科举出身的大老以尝过“矮屋”滋味自豪的“矮屋”。矮屋的三面七齐八不齐的砖墙，当然里外都不曾用石灰泥过，里面蜘蛛网和灰尘是满满的，好容易打扫干净，坐进去拿一块板安放在面前，就算是写字台，睡起觉来，不用说就得坐在那里睡。一条号筒内，总有一两间空号，便是这一号筒的公共厕所，考场的特别名词叫做“屎号”；考过头场，如果没有冤鬼缠身，不曾在考卷上写出自己缺德的事，或用墨盒泼污了试卷，被贴出来，二场进去，如果不幸坐位编在“屎号”，三天饱尝异味，还要被人家议论是干了亏心事的果报。那一年南京的天气，到了八月中旬还是奇热，大家都把带来的油布挂起遮住太阳光，号门都紧对着高墙，中间是只能容一个半人来往的一条长巷，上面露着一线天，大家挂上油布之后，连这一线天也一线不露了，空气简直不通，每人都在对面墙上挂起烧饭的锅炉，大家烧起饭来，再加上赤日当空，那条长巷便成了火巷，煮饭

做菜，我一窍不通，三场九天，总是吃那半生不熟或者烂熟或煨成的挂面。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考头场时，看见一位徐州的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脑袋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

这位“今科必中”的先生，使我看呆了一两个钟头。在这一两个钟头当中，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我此次乡试，本来很勉强，不料其结果却对于我意外有益！

原载《宇宙风》散文十日刊第51、52、53期

署名：陈独秀

我对于鲁迅之认识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那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这是我个人的私见。

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最后，有几个诚实的人，告诉我一点关于鲁迅先生大约可信的消息：鲁迅对于他所接近的政党之联合战线政策，并不根本反对，他所反对的乃是对于土豪劣绅、政客、奸商都一概联合，以此怀恨而终。在现时全国军人血战中，竟有了上海的商人接济敌人以食粮和秘密推销大批日货来认购救国公债的怪现象，由此看来，鲁迅先生的意见，未必全无理由吧！在这一点，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于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原载《宇宙风》散文十日刊第49期

署名：独秀

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我们的军事力量,我们的一切物质力量,是打不过敌人的,我们可以打败敌人的,是我们的民族精神,全民族一致起来,不做奴隶的伟大精神。

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不是空口说大话,而要有具体的事实表现,这种具体的事实表现,就是除了汉奸以外的全中国人民“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在坚决抗战到底的政府领导之下,对敌人作战,这是我们胜利之最大的保障。

假如我们有钱者能拿出十万万现金,有力者能拿出千万壮丁,不待战事结束,已足够使敌人气馁,无法继续对我们作战了。

大家万万不要笑我说大话,十万万现金,一千万壮丁,实实在在能够拿得出的。

或者有人说:自抗战开始以来,“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这两句话,在街头巷尾都看见了,听见了,可是谁出过多少钱,谁出过多少力,何以至今还不大看见听见呢?我以为这是因为大家还没有指出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之实行条件。

要使有钱者出钱,首先要问:谁是有钱者?顶有钱的是在外国银行有大批存款的人们,我归纳起好几个银行界朋友的谈话,中国阔人存在汇丰、麦加利等等银行的款项,至少有一百万万元,如果政府下一个决心,最客气最少也可以请他们拿出十分之一即十万万元来,购买救国公债,万一不及此数,再加以农村富户的窖藏,妇女首饰,及一般国民的献金,十万万元是可以办得到的,这个数目已经比政府现在发行的救国公债额加了一倍,而且都是现金,政府

有十万万现金做准备金，便可以加印二十万万法币，决没有通货膨胀后物价高涨和外汇跌落的危险。政府拿这二十万万元，一半加购军火，一半助后方的纱厂、大小规模的织布业和运输业，这样一来，抗战的胜利可以说有了一半把握。如果把“有钱者出钱”变成“无钱者出钱”，把救国公债的负担，加在仅能养家活口的小职员小商人身上，甚至加在身负各种捐税已经困苦不堪的农民身上，此不独政府所得有限，且会因此造成后方可怕的危机，若再加以不肖的官吏土劣借此从中敲诈渔利，前天《武汉日报》《扩大献金救国运动》一文中所说：“尤望显宦巨富，……出其所有，以身作则，为国民倡。”“勉力济助政府者，多为生计困难，节衣缩食之平民，而拥资巨万之人，反不数数觐。”这几句话真是切中时弊之名言。

谁是有力者？当然是农村和城市的壮丁，要使壮丁出力，必注意两个条件：第一，必须使他们有自动参加抗战的情绪，不可依靠拉夫形式，拿绳子牵着来强迫服役，这种强拉来的壮丁，数目必不能多，不够用，而且无论在前方或后方，均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送往前方补充兵额，比募兵更要坏得多，在后方强迫征兵和强派公债合起来，更会造成农村中可怕的危机。前天有一位黄埔出身的青年军人，和我谈到这一问题，他也承认强拉壮丁的危险，他也承认经过广大的群众宣传而招募的兵，比有名无实的征兵要好得多。第二，壮丁必须使之成为有政治教育有自动活力的群众组织，有了这种组织，补充前方，保卫后方，都根本不成问题，尤其重要的是以游击队的形式，扰乱敌人后方，即令敌人利用近代武器占领了我们的都市，而不能够统治我们的全部领土，这种效果，当然不是简单的强拉少数壮丁所可得到的。据好几个从河北来的朋友说：“政府这几年在河北各县的壮丁训练，是有了成绩的，可是缺少政治教育，未能成为有自动活力的群众组织，我们的军队从平汉津浦一撤退，各县县知事和警察一挟款逃跑，壮丁们便无人统率召集，一时群龙无首。又没有自行集合工作的习惯，敌人委派的县知事和维持会一到来，已训练好的壮丁，大多数都变成了敌人的力量。”他们

说到这里，都几乎声泪俱下！象这样有力者为敌人出力的可悲现象，是绝对不应该再使之出现的了。现在南方十几省，每省以百万壮丁计，能够有一千多万人，再多多少少的武装起来，政府手中若有一千多万武装的有政治教育的有自动活力的壮丁，前方后方的问题，那一样不能解决呢？

如果在现在的民族危急中，有钱者不出钱，有力者不出力，将来亡了国，大家都一样要做奴隶，要受敌人的残酷蹂躏和东北四省及冀、察、绥人民所受的一样！

如果政府得到人民二十万万和一千万壮丁的援助，不但能够打退站在眼面前的敌人，即全世界各大强国，也永远不敢小视我们中国人了！

原载《宇宙风》散文十日刊第52期

署名：独秀

怎样才能发动民众

——在武汉大学讲演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

动员全国的财力人力需要民众，军队前进作战固需要民众之援助，即军队后退亦需要民众之援助，救济伤兵，肃清汉奸，巩固后方，无一不需要民众的力量，如果我们还不曾忘记阿比西利亚皇帝曾因单靠军队不发动民众而失败的教训，我们在抗日战争中，急需发动广大的真正民众——主要的是参加生产的工农民众——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即在敌人也懂得这个。在芦沟桥事变发生时，上海的日本报纸曾警告他们的政府说：“日本军队战胜中国军队，是不成问题的，但如果全中国的民众真的起来作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这便不是武力可以解决的了，政府应于此点深加注意”云云。

开战以来，无论政府党或在野党，都异口同声的说要发动民众，公开说不需要民众的人，只是极少数。并且“全民抗战”这句话，成了一切刊物上的套语，实际上如果允许我说句老实话，完全没有这回事。所以空喊发动民众，喊破了喉咙，民众也不会有多大的回声，要民众起来，必须考虑到怎样才能够发动民众。

我们须知：民众是有高度意识和意志的人类，不象牛马可以随着鞭子的声影，叫他们行就行，叫他们止就止的，更不是无意识的木石或粉团，人们要把他们做成什么东西就成为什么东西；所以无论政府的命令或政党的空口宣传，都同样没有发动民众的万能。要发动民众，参加抗战，第一必须解除民众自身的痛苦。学生因为每日上课七八小时，尚且无法参加抗日工作，工人每日做工十二小

时或十三小时，连星期日都不得休息，无论做日工或夜工，下了工疲乏得成了半死人，更没有担任抗日工作的可能了。农民耕地不足，衣食已很艰难，又加之以高租高利、苛捐杂税以及种种征发、敲诈、压迫得他们不能活命，他们眼前的敌人是贪官污吏、地主、土劣、保甲长，而不是日本军队，终年过这样痛苦生活的农民，怎样会有抗日的情绪。参加生产的工人、农民，是最可靠最有力的民众，绝非无业游民可比，而且他们占全国人民之最大多数，他们不能起来抗日，还能发动什么广大的民众呢？此外苛捐杂税，向下层人民强派公债和裁员减薪，也足以减杀小商人、小职员抗日情绪；学生功课太繁忙，也没有做抗日工作的时间。所以坐在沙发椅上，责备民众不爱国，不起来抗日的人们，简直和说“百姓无饭吃何不食肉糜”的昏皇帝是一样的货色！

第二 必须让人民有经常的组织。组织是一种力量，一切生物皆由无数细胞组织而成，细胞无力量，由无数细胞组织成各种器官，组织成各种生物，才发生各种力量；一盘散沙的民众也自然没有力量，民众有了组织，而且是经常的组织，不是乌合之众，便会发生伟大的力量。民众自身的痛苦解除了，然后才谈得上组织，也只有为解决自身的痛苦，民众才会迫切需要组织，并且解决痛苦之真的实现，还是要靠民众自己的组织力量。所以要发动民众参加抗战，必须立即恢复并充实由各业民众自己选举的自己的工会、学生会、商民协会、农民协会等。官办的招牌的没有民众的民众团体，在抗战中，除了禀承上官命令发几个通电以外，是不会有any力量的。

第三 必须让人民有政治的自由。如果人民有了组织而没有政治的自由，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他们的组织力量，只会用于解决他们自身的痛苦上面，而不能用于政治。抗日乃是一种政治斗争，人类是政治动物，人民必须有政治的自由才算得是自由民，是国民，而不是被征服的奴隶，奴隶是不会爱国的，奴隶是不会自动的为国家民族利益而舍命斗争的。在数千年专制政治之下，

过着没有组织没有政治自由的痛苦生活，对于统治者，老是抱定“抚我者后，虐我者仇”的见解，国家与民族观念，在我们的头脑中，仿佛是一种奢侈品。所以现在要叫人民爱国，要叫人民起来为国家民族利益积极的对日抗战，不但要解决人民自身的痛苦，不但要让人民有自己的组织，尤其要让人民有政治的自由，使人民自己真能感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自身的利益与国家休戚相关，这件事决不是政府的命令和宣传教育所能够代替的。

如果我们切切实实做到上述这三件事，发动民众当然不成问题。或者有人认为这样未免太发动了，我则以为没有这样的“太发动”，是不能够抵抗站在我们眼前凶恶而有力的敌人，挽救国家民族之危亡的！

此外还有一件事，也和发动民众有关，就是政党领导的问题。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在发动民众运动中政党领导的作用，一国中有几个政党存在着，便必然发生政党间争取领导民众的问题。这一问题，在欧美各国及日本，从来并不感觉有什么严重，无论在平时或战时，因为他们的政府党及在野党，都用发表政纲和公开的讲演，争取民众到自己党的方面来，各党在民众团体中亦各有分野，各自争取群众，争取在团体中的领导权，无论党争如何剧烈，从未想象到根本不容许他党争取群众，争取领导权。至于近年以来，有几个国家发生了一党专政的怪现状，根本不容许他党存在，这便根本没有什么政党间争取民众争取领导权的问题。在中国，谁都不能说现行的政制是法西斯主义专政或共产主义专政，当然应该容许有党派间争取民众的问题，并且可用先进的民治国家的所通行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并不特别严重。尤其是在民族危急存亡的今天，各党各派合作救亡的呼声，遍于全国，只要能够发动民众起来抗战，谁愈多尽点力愈好，在野党固义不容辞，政府党亦无所用其疑忌，在野党仅仅有了若干民众拥护，并不就能够夺取政权。并且政府党如果毅然决然采用上述三种办法发动民众，别的党派能够采用更激进的纲领，争取得更多的民众，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

即令抗日的纲领不同，政党间遵循各国通行的办法，各据自己的纲领及政策，努力宣传，一任民众之从违，以争取民众，这正能够推动政治进步和提高民众之政治水平；倘然以为这样太过民主了，而采取不正当的甚至极卑劣的手段抢夺民众，如用武装打手和金钱来威迫利诱民众，复拿民众做自己的打手；造谣诬蔑对方，企图一党垄断；利用政治势力，利用民众落后意识，甚至以党员冒充民众压迫对方；政党间，甚至一党中各小派别间，如此这般非政治的无原则的强拉硬夺，不仅不能发动民众，还会使已起来的民众失望灰心而消极。大家如果不赶快觉悟，如果一直采用这样的手段争取民众，我包管各党各派将得不着一个民众；其结果不是各政党领导民众抵抗敌人，而是敌人领导着汉奸灭亡中国！

原载《我对于抗战的意见》，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

署名：陈独秀

打倒消极先生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

各方面的消极态度不改变,会形成抗战的致命伤。

在民族解放的抗战中,人人都应该积极的参加抗战工作,不应该消极的避难,尤其是青年男女。

政府及党部应该积极的发动民众,增加抗战的力量,不应该消极的防止民众运动越轨。官僚派心目中不越轨的民众运动,乃是一种仪仗,在抗战中不能够发挥群众的自动的真实力量。

政府在财政上,应该积极的强迫富裕的官商拿出钱来;不应该消极的采取紧缩政策,裁人减薪,造成社会恐慌,甚至制造一部分汉奸。

政府在处置汉奸的问题上,应该积极的从政治上、经济上杜绝汉奸所以普遍发展的根源;消极的惩罚是不够的。

在商业上,应该积极的谋货币百物之流通;不应该消极的限制人民向银行提取存款和阻碍内地米谷买卖,致商业停滞,造成经济恐慌。为了防止资本逃走和米粮资敌,只有在最后出口地方,由政府严行统制和检查。

在军事上,应该积极的向敌人弱点进攻;不应该消极的防守应战,使敌人得以自由移动集合其优势军力,将我们的防地陆续各个击破。

商人应该积极的要求政府筹款发展生产;不应该消极的力图减少救国公债之负担。

工厂主应该积极的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以培养工人的工作技术与劳动力;不应该消极的减资加时,以削弱工人的劳动力,

削弱生产。

农民应该积极的抵抗土劣之压迫；不应该因为愤恨土劣据区保甲长之地位鱼肉农民，而对于参加抗战取消极态度。

学校应该积极的改变课程，以适合战时的需要；不应该消极的迁移到边远地方，简单的避免敌机轰炸。

对于伤兵，应该积极的改良其生活和教育，并帮助其组织与活动；不应该消极的防止他们捣乱。

对于伤兵之救济与慰劳，应该积极的号召社会团体群起参加工作；不应该因为顾虑汉奸从中活动，而消极的加以阻止或限制。

对于地方各级政府，应该积极的改造加强；不应该消极的维持现状。

一切不反对抗日战争的人们，不应该因为怀疑政府抗战的决心而取消消极的旁观态度；应该积极的参加抗战工作，以加强政府抗战之决心。

消极态度是抗日战争之致命伤，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必须战胜我们自己的消极态度。

选自《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亚东图书馆印行

署名：陈独秀

“言和即为汉奸！”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

战胜而言和，乃停止军事行动而收得战胜之果实；不胜而言和，这不是和，而是妥协、屈服、投降！敌军一天在我国领土之内，一天都不能言和；如此而言和，不能不说是汉奸卖国行为！

前几天外报盛传中日言和停战，全国人心大为不安；幸而外部发出辟谣的消息，并且中国负责当局告合众社记者，谓“于今日而与日本言和，即为汉奸”，从此以后，我们应该相信政府确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是不会中途妥协的了。政府曾昭告全中国人及全世界的人，“中途妥协，即是千古罪人”，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人民不应该再怀疑政府了。

此时不但全部言和是妥协、屈服、投降；就是上海局部停战言和，也是一样，其理由有七：

一、全面抗战，是既定的国策，一旦局部言和，是明明破坏了国策，政府的威信失坠，在内政上会发生极大危机。

二、在军事上使敌人得缩短战线，专力于其真正目的地之华北，以减少其军力和物力之消耗。

三、上海附近一天在战争状态中，不啻一天为中国关税之天然壁垒，国内工业一天有发展的机会；一旦停战，上海所有的工厂都毁尽了，外国工业品（连日本的工业品也在内）便如潮涌入，无法阻拦。

四、战争是工业国出超国致命的威胁，农业手工业入超国的中国在这方面便反而有益无损，在三个月的战争中，中国的入超显然是停止了；一旦停战，外货涌入，入超必然较战前更为可怕，因为入

超增加，法币的准备金必然减少，法币一旦动摇，全国经济大恐慌便随之到来。

五、民族抗战，正是提高国民精神向上之最有力的兴奋剂，一旦妥协屈服言和，由失望而悲观，国民道德之向下坠落，必一日千丈，强项者自杀，卑怯者沉溺于烟、赌、娼，也是一种自杀，如此可悲的现象，必然普遍于全社会，而无可救药，这是我们可以预见的。

六、妥协、屈服、投降之后，在落后分子中，愈益加强他们认为日本必然兴盛，中国必然倒霉的信念，一班趋炎附势无耻投机分子，现在犹未正式加入汉奸团体者，必然潮水似的奔赴汉奸这条道路。他们如果有顺利的政治环境，还会公然形成政治集团，如朝鲜的“一进会”。

七、南宋偏安的局面，现代已经做不到了，日本兵占据华北后，不久军事工作一完成，华北伪国或所谓华北自治一出现，中国的工商业的国内市场丧失了一半，南方将如何存在呢？况且日本军至多停一二年必然还要南下，以达到她原来以华北为“自治区”，以华南为“亲善区”的计划，那时人心已去，政府即欲抗战，更加无人愿意出钱出力了！

政府要抗战到底，人民要援助政府使政府能够抗战到底，现在还是时候，“巧妇不能为无米之炊”，人民要政府抗战到底，必须赶快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使政府能够抗战到底。

全国文武大员，必须首先认购巨额救国公债，以为人民之倡，富商大贾们，也应该激发天良，掏掏荷包。象汉口这样一个最大的国内市场，纱业商人担认区区百五十万元公债，还要丑表功，并且实际还未缴纳；全武昌商界只认购七万元，已经不成话说，而且至今尚未缴齐！此等“贻误戎机”之徒，此种犹太商人，应该由政府及民众加以严厉的惩罚！不然，还谈什么“有钱者出钱”的废话！当真只应该令无钱者出钱吗？

农村中城市中有力的壮丁，都应该不待政府之征召，而自动的依职业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保卫地方，并且杀到前敌。或者有人

怀疑政府不许民众自动的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我以为这是过虑，难道政府不许人民抗敌救国吗？并且民众自动的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也可免去政府下级人员及保甲长办理强迫兵役的许多流弊。

人民如果真能做到“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这两句话，我相信政府更能够抗战到底，不会中途妥协而言和，因为政府自己已经公告天下：“言和即为汉奸！”

言和固然是汉奸，即这几天言和谣言所传播的空气，已经足以灰前方将士及后方人民之心，助长汉奸的气焰；倘此种空气不澄清一下，还会令北方本来动摇之将领更加动摇，发生保存实力的企图，甚至会有象阿比西利亚酋长的那种怪物出现！

要澄清这种恶空气，政府最高当局，应该下一决心，将政府阁员中妥协调摇分子立时除去，而代以坚决主战的人物，则谣言不辟而息矣。一次行动，胜过千百次宣言。

选自《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亚东图书馆印行

署名：陈独秀

多谢敌人的飞机大炮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

对于醉生梦死昏昏沉沉的我们中国人，令人郁闷欲死的中国社会，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固然有毁灭我们之可能，如果我们能够善于利用它，正是及时的无限大警钟，一针强心针和一剂最猛烈的兴奋剂。尤其是敌人的飞机轰炸遍了全中国的大都市，使我们没有逃避的余地，谁勇敢，谁怯懦，谁正直，谁奸诈，谁是有心肝的人，谁是冷血动物，谁有才干，谁是蠢才，都一一显露在众人的面前，不是拍马吹牛可以代替的了。人们只要不准备现在当汉奸，或静候将来做亡国奴，就是一班最写意的男女们，迟早都会脱下睡衣和拖鞋，拿起武器来自卫以卫国。我们不要把敌人的飞机轰炸简单看做灾难，应该看做是我们起死回生的圣药，希望它轰炸遍中国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村，使每一个中国人都由悠游自在变成疯狂。疯狂！疯狂！再来一百个疯狂！永远疯狂，永远不再悠游自在。我们吃了悠游自在的亏太厉害了，太长久了，多谢敌人的飞机大炮，或者会医好我们这一个祖传老病。

选自《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亚东图书馆印行

署名：陈独秀

抗战中应有的纲领

(一九三七年冬)

政治纲领是国内革命战争决定胜负一因素。此次中国民族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抗战,也是一种革命战争,在抗战中,要唤起全国广大民众拥护这一战争,动员全国的财力人力以求得最后的胜利,必须有鲜明的抗战纲领,具体的昭告全国人民为谁的利益而战;抽象的笼统的民族利益,不一定能够动员全国人民,尤其是比较落后的人民。如果我们不赞成拿主观的愿望来代替客观的实际效果,左列的十条纲领,在抗战中断然是不可缺少的东西:

- (一)以推翻帝国主义者所加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障碍为此次抗日战争之最终目的。
- (二)在野各党派及一般人民都应有政治的自由,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不自由的奴隶,很少有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的自动性。
- (三)联合苏联及全世界的工农民众(日本的工农民众也在内),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 (四)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财产,没收汉奸及贪官污吏的财产,充作救济伤兵及难民之费用。
- (五)强迫富人购认救国公债,征收财产累进税和加重因战事营业所得税,不把战费加在工人、贫农及小商人、小职员身上。
- (六)解除人民痛苦,如:减少工人工作时间,解决贫农耕地问题,限制高租高利,废除苛捐杂税和保甲制度,停止征工、拉夫等,以提高民众抗战的热情和力量。

- (七)恢复由各业群众选举自己的工会、学生会、商民协会、农民协会。
- (八)改组全国军队,直隶中央政府,加强军队中的政治教育;改良兵士待遇,实行军队和驻在地民众之亲密合作。
- (九)武装人民,尤其要武装工农民众,以肃清汉奸,巩固后方。组织训练前线失业工人的特殊军队,加入作战。
- (十)迅速召集国民大会,集中全国抗战力量,主持和战大局。

原载《我对于抗战的意见》,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
署名:陈独秀

《我对于抗战的意见》一书的自序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八日)

去年九月从南京到汉口舟中，我就拟定五个题目，打算写一本抗日意见的小册子。一在武昌住下，便开始动手写，并且在华中大学讲演时已经告诉了听众，在华中、汉口青年会及武汉大学的讲演，便用了这个小册子头三篇的内容，其中第一篇在华中的讲演稿曾在汉口《扫荡报》上发表过；后来在各处的讲演稿，都在“暂缓登载”的禁令之下，未曾发表。其后上海的朋友屡次来信教我把这些稿子寄到上海发表，因为当时那里出版还稍稍自由一点，然我总以为有点过时了，未曾寄去。现在有几位朋友认为无论过时不过时，仍然应该发表；他们的意见是想拿这一本卑之无甚高论的小册子做试验自前政治空气的寒暑表，在高呼继续抗战期中，看它究竟有无成为禁书的资格，我报之曰可，并自序此书之原委如此。民国二十七年二月十八日，我英勇的空军击落敌机十一架于汉口上空时，急书此以为纪念！

原载《我对于抗战的意见》，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

署名：陈独秀

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

(一九三八年三月)

我们不但现在要援助政府对日战争获得胜利，即令将来政府军一败涂地，我们还是要继续抗战，不应该因战败而灰心丧气。

我半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然而我并不承认失败，只有自己承认失败而屈服，这才是真正的最后失败，我对于此次抗日战争，也作如是观。

在芦沟桥事件发生之时，有一位朋友对我说：这回政府真要对日抗战了。我说：这是应该的。他说：开战后胜败如何呢？我说：军事上会一败涂地。他说：你既然明知会败，又何以主张抗战呢？我说：明知必败而战，才能够战胜，若认为必胜而战，结果只有战败。

单靠政府手中所有的一点飞机、大炮、坦克车，不但非日本帝国主义全部力量之敌，即比它在整个国防计划上所能够加于中国作战的一部分即其三分之一，也还相差很远；以此抗战，不啻以卵投石，不待开火，胜败已可逆睹。我们必须预先见到这一胜败之必然性，然后才不至妄自夸大，才会诚心诚意的结合与国（特别是苏联），获得必要的军器，才会坚决的发动民众运动，形成全国民众的抗日洪流；以补足我们致败的缺点，以达到持久战消耗战之目的，使敌人知难而退。

我们必须从与国获得大批的军器（特别是飞机与大炮），才能够作三个月以上的正式战争；我们必须从全国广大的民众获得大批的游击抗日的力量，与正式军队合作，才能够持久战，否则敌人还只消耗一小部分，我们早已消耗得精光了，还谈得上什么持久战消耗战呢？

即令我们的正式军队节节失败，即令敌人能够占领中国的几个大城市，只要全国广大民众无束缚的自由组织起来，活跃起来，武装起来，敌人便无法摧毁这到处蜂起的几千万武装民众，这几千万武装民众之游击战的洪流，不但能够使政府的正式军队有反攻之可能，并且使敌人已经占领的地方，一夕数惊，不能统治，如此，敌人越深入，占领的地方越扩大，它们危险便越厉害，德国国社党机关报驻远东记者说得对：

中国境内战事演进情形，颇不利于日军，苏联若自外蒙援助华军，既足以妨碍日军之推进，且可在“满洲国”边境有所举动，而予日以极大牵掣。苏联此项计划若果见诸事实，则外蒙即当由苏联予以援助，而成为对日作战区域，似此，日军之成败利钝端在该国能否迅速结束军事，俾克防止战事范围勿任扩大也明矣。

依日本人口十分之一计，可得六七百万壮丁，然而曾经入伍能够正式作战者，不过一百廿万人，其余的壮丁都不能作用，因为它为了侵略别人出国战争，当然不必要也不可能武装民众来作游击战。在它整个的国防计划，至多只能动员三分之一即四十万兵，来中国作战，其余八十万兵要留着防俄。它现在调来中国的兵，虽然还不及四十万，倘若它的胜利要超过华北及上海以外，调到中国的兵额必要达到四十万甚至五十万，这已经使它的参谋本部头痛；（假令它占领的地方，没有中国民众的游击队在它的后方扰乱，而且有大批的汉奸帮着它巩固后方，它是可以节省兵力十万二十万的。）如果再加上外蒙参加战争，至少又要增兵十万，这更要使它的参谋本部束手无策。况且在中国民众蜂起持久抗战中，日本工业品在中国的市场莫由恢复，它在经济上所受到很大的打击，便影响到军费。

所以日本对中国作战，利在用飞机大炮，速战速决，尽可能的不使战争范围扩大；中国对日战争，利在发动全国民众蜂起参加，持久抗战，尽可能的使战争范围扩大，以消耗敌人的军力和财力。

怎样才能发动民众呢？香港英文《晨邮报》说得对：

中国目前最危险的现象，就是在被占领地方的人民，处之安然，任敌人把他们的手给束缚起来。日本人现在是尽其可能的以博得他所占有的人民的欢心，如日本人在这方面能成功的话，那的确是中国抗战前途的一个隐忧。

如果我们不愿意将来任敌人把我们人民的手束缚起来，我们现在便应该赶快开放民众运动，使人民的手不容易为敌人所束缚，更不应该由我们自己把人民的手束缚起来，免得将来敌人费事。我们如果不愿意让敌人博得他所征服的中国人民之欢心，使他们甘愿做亡国奴，我们便应该解除人民的痛苦，博得人民之欢心，使人民能够自愿的与政府合作抗战到底。

如果我们不愿意让全国民众蜂涌起来，对日持久抗战，一旦政府军失败，精锐丧失，武器耗竭，国际调解论压迫于外，妥协动摇分子簧鼓于内，不妥协、屈服、投降，还有别的什么出路呢？即上海局部停战言和，便不能继续抗战，无论在形式上实质上放弃华北，更是公开的屈服投降。至于接受日本限制军备，聘请军事顾问，加入反共协定，取缔抗日运动等条件，那更不用说了。

此次抗战只有两个前途：中途妥协，对日投降；或者发动民众，抗战到底。每一个自命为拥护民族利益的人，都必须采取后一前途。如果真心主张抗战到底，就必须真心主张发动民众，对于发动民众，不加以任何怀疑与阻碍。

如果民众蜂涌的起来了，不但能够援助政府对日抗战获得胜利，即令政府军一败涂地，日本军占领了全中国的大城市，即亡了国，也还能够继续抗战，使敌人不能够顺顺当当，安安稳稳的统治全中国。

每一个真心拥护民族利益的人，总不至感觉到民众蜂起抗日比日本兵打进中国来更为可怕吧！

原载《我对于抗战的意见》，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
署名：陈独秀

从国际形势观察中国抗战前途

(一九三八年四月)

一切幻想碰到实际，便如霜雪见了太阳，战争，尤其是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件最实际最严肃的事，如果把它寄托在幻想上面，这是多么危险呀！

自对日抗战以来，我们全国上下，拿各种各样幻想的宣传，特别是对于国际的幻想，代替了实际的努力。这不独减少了实际战斗力，而且撒下了幻想落空时使一般人失望销沉的种子。所谓苏俄出兵，英、日战争，英、美舰队联合，国联制裁，《九国公约》制裁等等幻想，事实上已经随着第一期战争失败，而杳无踪影的过去了。倘吾人若不平心静气毫无成见的洞察国际形势，难免不从旧幻想的根蒂上，再生长出新的幻想来，以造成第二期作战之不幸，这是我们万万不容忽视的事。

在避免战争的条件下，维护大英帝国在全世界各地的利益，这是英国的国策；在避免战争的条件下，尽可能的联合任何国家尤其是英国，以防御德国复仇，这是法国的国策；自己极力避免陷入战争的漩涡，而利用他人的战争销售军火，这是美国的国策；不恤牺牲各国的革命，不恤忍受不名誉的和平，以谋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之安全，这是苏联的国策；统一日耳曼民族，对法复仇，以收复德、奥在上次大战中的失地，这是德国的国策；向北非、中欧、近东发展，以成为地中海的主人，这是意大利的国策；吞灭中国及南洋，独霸远东，这是日本的国策。

以上便是目前国际形势之骨干。

在这样各国各自利害不同的现状之下，简单化的两个对立的

战争的集团，自然不易形成，虽然他们都在各自寻找与国；这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时决不会到来的最大原因，各国预想的军备尚未完成，还是其次又其次的原因。他们之间都相互知道彼此的军备同样不充分，只要两个对立的集团形成，是不妨一战的。在此环境中，中国对日抗战，除了向各别国家购得军火外，不能有别的幻想，不能幻想国际有某一集团，或某一国家和我们共同对日作战。

人们所谓德、意、日侵略阵线，或法西斯特阵线，乃是似是而非的说法。因为德、意、日侵略阵线这一个名词，在外延上不合逻辑。德、意、日固然是侵略的国家，如果说英、法、美不是侵略的国家，便等于说他们不是帝国主义者；德、意、日三国有了《反共协定》，虽然是一个国际政治集团，而还未成为决定对于另一集团的军事同盟，特别是意大利之眼光四射，动摇不定，最近她因为奥国问题和德国暗斗，开始了和英国的谈判。德国虽然承认了“满洲国”，这并非等于宣布今后对于中日战争取消中立。军阀政治的日本还不是法西斯特国家，这乃铁一般的事实。前年法西斯特派政变失败后，受到广田内阁严重的打击，眼前以政友会和民政党为主力的议会，正在金融托拉斯资助之下，进行反法西斯的斗争。右派各团体，还在向政府要求释放二月十七日防共护国团包围政、民两党总部之法西斯特派领袖；世界上有这样的法西斯特国家吗？那一个法西斯特掌握政权的国家能容许别的政党盘据议会，公开的进行反法西斯特斗争呢？那一个法西斯特掌握政权的国家，法西斯党会因侵犯别党总部而被捕，而向他们自己的政府要求释放他们自己的领袖呢？如果以为凡是有了法西斯特运动的国家，便是法西斯特国家，那么全世界能找得几个非法西斯特国家呢？在法国法西斯特的运动和力量都强大过日本，难道法国也是法西斯特国家吗！所以德、意、日法西斯特阵线这一说法，也不能成立。

至英、法、美、苏民主阵线，或和平阵线，更是子虚乌有之谈。苏联的政制，是独裁而非民主，她和英国始终是貌合神离，英国始终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表示对苏俄与德、意的斗争两面都不参

加；英、法、美虽然同是民主国家，而美国固守着孤立政策以免陷入欧洲的纷纭漩涡，更谈不上和欧洲任何国家的联合阵线。和平吗？在帝国主义制度未倾覆以前，和平是不可想象的事，尤其是克里姆宫的人们，应该懂得这个，因为他们现在还自称为列宁的门徒。不错，英、法、美、苏是一致避免战争希望和平的；然而她们所希望的和平，是跟在侵略者的后面承认侵略者侵略弱小民族的既成事实，以避免战争，这是对于侵略者的和平，她们对于国内人民的反对派（如苏联）或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如英、法）却是不很和平的。自九一八以来，我们已经饱受她们这种和平政策的苦教训了；现在中日关系，我们若企图避免战争，而希望和平，我们能得到什么呢？所能得到的只有屈膝后暂时的和平而已！希特勒说：“如果某些强国不援助日本的对方，远东的和平当已成立了。”如此则和平便是侵略者胜利，被侵略者屈服之另一说法。在呼吁和平避免战争的各国，或者将来也会认为这是合理的解决，她们或者更会进一步压迫中国，牺牲中国，跟在日本后面承认既成的事实，以维持她们之间的和平。如此则中国便在全世界一片和平声中断送了！呜呼！和平！和平！天下许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国联派所号召的集体安全制度，在伦敦政府心目中的飞鸿，与其说是英、法、美、苏的什么阵线，不如说是英、法、德、意四强协定。这样模糊不定的集体安全制度，经过阿比西尼亚和西班牙事变，又以“不决战不妥协”的态度处之，所谓集体安全制度遂至搁浅。于是包尔温不得不继霍尔而下台，继霍尔的艾登仍旧继续“不决战不妥协”的政策，张伯伦内阁依然走头无路，直到最近中日战争出乎意料之外的发展，日见英国在远东的特权与利益朝不保夕，迫得张伯伦不得不于决战或妥协二途选择一个；依避免战争的国策，张伯伦只有选择后者，于是艾登不得不辞职，集体安全制度遂由张伯伦宣告破产。所谓民主阵线，和平阵线，更是由海市蜃楼而幻灭了。照现时国际紧张的局面，“不决战不妥协”的政策，本来是最无出路的如意算盘，依英国帝国主义的立场，霍尔及张伯伦的政策，比包

尔温及艾登自较为合理，所以张伯伦一宣称“国联不能为任何国家保持集体安全，吾人不应再作国联仍能保护弱小国家抵抗侵略之想”，和平梦想家所召集的国际反侵略大会，昨日还轰动伦敦，今日便如泥牛入海，踪影全无了！这班梦想家，受过一九一四年的大教训还不够，现在又受到一个小教训，如果还不觉悟，将终于是一个教不醒的蠢材！艾登辞职的消息初传到中国时，我们的梦想家，还认为张伯伦的外交转变政策不会为内阁及国会所通过，会因此引起政潮；不料事实上，反对派工党在国会提出的谴责政府案，已为张伯伦的长篇激昂演说所驳倒，结果下院卒以三三〇票对一六八票而否决了。这是因为张伯伦在演说中所提出的“汝究欲汝祖国卷入战争漩涡内乎”一问题，不独阿特里、格林伍德、艾登等只能回答一个“否”字，即在我们的梦想家所谓“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热烈反侵略运动的英国劳苦人民”，也只能回答一个“否”字；因为他们要求和平反对战争，是与张伯伦同调的；剩下的所谓“热烈反侵略运动”只是一句空话而已。除了战争，空话是不能损伤侵略者毫发的。英国的劳工运动，本来是在和平空气中生长起来的，又加以第三国际近几年来和平主义的强调宣传，更是为张伯伦现行的政策铺平了道路。

张伯伦的现行政策，不但要拿和德、意妥协来避免欧洲战争，并且还会和日本妥协来停止远东战争。张伯伦这一政策是应该受人谴责的，然而克里姆宫的人们却不配谴责他。张伯伦虽然是一个没有理想的人物，但却是一个实际政治家，至少不象克里姆宫的蠢材，会幻想呼吁和平反对战争能够制止战争，会幻想喊喊反侵略口号，开开反侵略大会，宣传宣传，就能够不动干戈吓退德、意、日本。希特勒说，“日本的胜利是比布尔什维克胜利的危险要少些。”希特勒可以这样说，英、法、美也还可以这样说，苏联也可以拿这一理由来呼吁和平避免对日战争吗？照英、法、美、苏所力行的维持和平避免战争的政策，只有让德、意、日本日益壮大，会造成全世界一个更黑暗的时期！在这一点，中国放弃和平，对日抗战，不但有

民族的意义，而且有世界的意义；如果世界上还有一个革命的国家，如果她专门计较自国的利害，在要求和平反对战争口号掩护之下，眼见中国失败而袖手旁观，这便是革命之背叛者！

英、意、英、德的谈判，如果在牺牲弱小的条件之下顺利的成功，英、法、德、意联合干涉远东停战局面，便会到来。我们万万不可因这一局面又引起新的幻想，认为他们会武装制裁日本，这不独非德、意所愿，亦非英、法所愿；她们干涉的压力，三分用在日本，七分还用在中国，使中国向日本屈服，日本向欧洲让步，以阻止日本势力一直南下，完全独占了中国，完全扫荡了英国在中国南方的特权与利益。

如果我们不愿被迫而接受屈服甚至亡国的条件，只有努力支持长期抗战之一途，也只有我们有力量能够支持抗战，不再败退，才能够多少转变张伯伦的政策。此时中日两方面都发出长期战争的呼声，其实日本财政虽然比我们优裕，也支持不了二年以上的战争。她的赤字公债，战前已超过一百万万元，二年战争又需用一百万万，如果不能从中国攫取大量金钱，到了明年夏秋间，甚至明年春天，日元一先令二便士的汇兑率便难以维持了。财政一露破绽，无论日本军阀如何横蛮，也不能不认真考虑战争应否继续的问题。所以她们已经事先准备拿集会、出版之自由向国民让步，来建立国民总动员的计划，以应付杉山所谓“较目前形势更劣之局面”。我们中国怎样呢？

我们的财政，我们的国民经济，自然更脆弱于日本。我们不能寄托幻想于国际，我们只有依靠自己，我们更应该拿改良政治向国民让步，来动员全国的财力和人力，再困苦撑持一年以上的战争，以期待敌人的财政先我而崩溃。尤其要建立对各级政府的人民监督制度，才真能够肃清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苛捐苛税，以扫荡这些破坏国民经济基础（农业、手工业、商业）的最大因素。国民经济之崩溃，对于战争的影响，比吃败战更加是致命伤。并且改良政治的实惠，如果真能广及于人民，风声所播，还能以挽回敌人占领地已

失将失之人心，使之内向，使之自动的拒绝日货日钞，以加速敌人财政之崩溃。这不都是目前迫不容缓的事吗？

在怀疑民主政治的人们，或者会反驳我这一提议也是幻想；那么，外来的力量既不可靠，求之于自己的政治改良又是幻想，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如果不能拿改良政治来动员财力人力，和安定国民经济，不独战无可战，即忍痛言和，而战后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百孔千疮，又用什么方法来补救呢？乐观夸大白慰的宣传，经不得事实的打击；“人民愈穷苦愈革命”更是道地的胡说！

选自《从国际形势观察中国抗战前途》

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

署名：陈独秀

抗战中的党派问题

(一九三八年四月)

在民族危急存亡的今日，全国中不分在朝在野的各党各派，如果认为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无可犹疑的应该避免无关于抗战胜负之根本政策的争论，而以全力用在民族解放战争上面。

国共两党为了民族危机，停止多年的内战，在军事上合力抗日，这是无可非难的事。这一联合，在数月抗战中也收了相当的效果。可是同时两党摩擦的暗潮，日渐浮出于表面，这是众人皆知，无可讳言的事。因此国人颇为惴惴，深恐此种摩擦如果发展下去，或至影响于抗战前途，并且这一问题日渐成为私人谈论时局的中心，这一忧虑，不是毫无理由的。

其实这种摩擦，除了根本原则不计外，其种子已含藏于联合之最初时期，即两党对于联合之方式，都未免鲁莽：一方面国民党未能抛弃招降的态度；一方面共产党在政治上事事牵就允诺，未能坦白的坚持自己抗日的政治主张，因此事后在政治态度及宣传上引起了国民党对共产党有言行不符的疑虑。一切摩擦便自然的日渐发生了。

此种摩擦如果双方都感觉有停止的必要，下列办法，或者可以收相当的效果：

(一)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及其他在野的党派，都公开的合法存在，要求他们合力抗日，而不取招降的态度；并且不妨碍在野党对政府党政治的批评。

(二)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以在野党的资格绝对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于抗日战争之军事

最高统率权这一事实，不要把开放党权和开放政权混作一谈。

在原则上，政治上的争论，有可能推动政治进步，直接间接有利于抗战。非政府党党员在政府附属机关担任工作，这本与政权无关。政府对于所属机关之用人，应取人才主义，不必一党包办，在野党亦应避免政府附属机关中地位之竞争；非政治的斗争即地位斗争，有百害而无一利。各党各派如果把民族利益放在党派利益之上，这种斗争是应该停止的。党派间以至一党中小派别之非政治的无原则的地位斗争，只有为敌人开辟道路！

选自《从国际形势观察中国抗战前途》

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

署名：陈独秀

各党派应如何巩固团结？

——答《抗战行动旬报》征集抗战集体意见问题之一

(一九三八年四月)

一國中为什么有党同伐异的各党派存在，这不是根据人们愿意不愿意，而是根据社会各阶层客观利害不同形成思想不同所结合的共同意志，不能够由人们在主观上任意令它发生，令它消灭。

为什么利害不同、思想不同、意志不同的各党派能够合力抗日，这是由于有为民族生存而奋斗的共同意志；也只是因为有形成这一共同意志之可能性，我们才有理由提出各党派合作抗日的问题，过此以上的合作、团结，只是人们的幻想而已，没有共同的利害，便没有共同意志，便谈不上合作、团结。

不幸得很，竟有人在各党派合作抗战中，提出思想信仰之统一为各党派合作抗日的条件问题，这未免太过幻想了，而且对于各党派合作抗日是一种有毒害的幻想！思想信仰统一了，则只有一党存在，根本无所谓各党派，便根本无所谓合作、团结了。诚然，人们提出思想信仰统一的问题，正因为企图实现一国一党消灭其余别的党派之理想。其实党派是相对的名词，如果别党消灭了，科学的说来，任何一党也就不能存在，因为那时各党派所代表的各部分人民不同的利害都消灭了，一切党派也自然消灭。这样的社会还很遥远，现时俄、德、意所谓一国一党的办法，即令政权的阶级性不同，都不过是一种人为的外表形式，正因为这种人为的外表形式，招来国内不断的纷争，将来还会成为崩溃之一因素。

现在的中国，无论政府党或在野党，都更不应该利用抗战的机会，效法这种人为的外表形式来消灭异己！能够使各党派合作团

结的口号,只有一个,即“抗日救亡”,这就是说,无论各党各派在思想信仰上如何不同,而对于抗日救亡的行动,必须一致,这便是所谓“对立的统一”;“对立的统一”,本是全宇宙普遍的规律,政治也不能例外。若企图统一思想信仰来抗日救亡,那便不知道要等待到何年何月了。譬如宗教上有儒、释、道、耶、回之分,哲学上有唯物唯心之别,政治上有集权分权之争,如此等等,何时才能够统一呢?我们能够要求他们为抗日救亡而放弃他们的思想信仰吗?如果定要拿思想信仰之统一为各党派合作抗日的条件,那只有先从事内战,肃清了异己,然后才来抗日;这对于党派的问题,只是分散而不是团结,对于抗日救亡的力量,不是增加而是削弱,都在客观上帮助了敌人!如果顾虑到战后之经济的政治的制度纷争问题,这乃最后决定于国际和国内经济政治之发展,而非决定于思想信仰。

统一思想信仰,根本是一个荒唐无稽的幻想。在欧洲中世纪,全欧洲的文化几乎都在公教会手中,宗教法庭用过无数次烧杀酷刑,也消灭不了异教徒,也没有把思想信仰统一起来,反而公教会本身到分了无数的派别;凡是一个集团,对外走向统一,同时对内即走向分裂,倒是对外竞争,往往加紧了内部的团结,这是一个公例。在中国古时,汉武帝和董仲舒,他们君臣曾热心拿尊孔来统一思想信仰,然而汉朝的宫廷中,始终完不了儒、法、黄、老的斗争,即董仲舒本人的思想信仰,就是一个儒、道两宗的混血儿;后汉诸帝也曾严厉的拿讜纬来统一思想信仰,然而终于降服不了桓谭、王充的党徒。

历史的教训是很严酷的,我奉劝主张统一思想信仰的人们,多做点抗日救亡工作,少发点幻想罢!幻想一旦碰到实际,便如霜雪见了太阳!

选自《从国际形势观察中国抗战前途》

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

署名:陈独秀

抗战与建国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近来新发现“抗战建国”这一名词，可以说是深思远虑的了。惟解释各有不同，有人说抗战胜利后再来建国；有人说一面抗战，一面建国；我认为这两说都是完全对。抗战就是建国事业之一，并且中国已建国数千年，即以民国而论，二十七年前的辛亥革命，就已经是建立一个近代国家之开端。倘以建国作建设工业解，那便诚然非抗战胜利后谈不到，无论是内战或对外战争，都是破坏经济的，尤其是对外战争，海口被封锁，交通被破坏，机器原料之输入都很困难。原有的工业基础都很难维持，民族工业之大规模的发展，更是梦话了。

为了要明白建国即建立近代国家之整个概念，以及战后会出现在一个什么形态的国家，我们首先必须明白我们现今处在全世界历史发展的什么时代。自从十五六世纪一直到今天，本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时代，法西斯特运动，乃是这一整时代的大流将转变为另一时代之暂时的逆流。这一逆流象征着前一时代行将完结，另一新时代快要到来，在前此五六百年整个民主革命时代，各国所完成之主要的民主任务是：

民族的国家独立与统一，
立宪政治之确立，
民族工业之发展，
农民解放。

在这一时代的各民族，必须完成这些民主任务，才能够摧毁旧的封建经济与政治，开展新的较高的生产力和新的政治制度，以成

功所谓近代国家，即多多少少民主制的国家。

为什么要国家独立与统一？因为非脱离国外非民主的压迫和国内的分裂，一切经济政治都不能自由发展。为什么要确立宪法政治？因为非如此不能确定政府的权限，保障人民的权利，使全国人民的智力和道德能够普遍的发展，以增加整个国家的力量。为什么要发展工业？因为非如此不能增高国家物质的力量和提高人民生活与文化，以减杀整个民族文化方面的落后性。为什么要解放农民？因为非如此不能根本摧毁封建的社会势力，繁荣本国工业的国内市场，这便是我们建国的整个概念。

在历史上各民族完成这些民主任务的动力，并非先天的限定是那一阶级，英国是资产阶级完成的，法国是小资产阶级联合工人完成的，德国和意大利是资产阶级联合地主、贵族完成的，俄国是无产阶级联合农民完成的。各国所完成的民主任务虽有程度上的不同，而无根本上的差别，即在落后的东方如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也完成了某些民主任务，所以她也勉强算是一个近代国家。

中国辛亥革命，也是企图步武欧美，建立一个近代国家；虽然成立了民国，产生了宪法与国会，民族工业也开始萌芽，然以国外及国内巨大的阻力，所谓民主革命任务，并未真实的完成，因此乃有一九二五——一九二七的第二次革命和此次抗日战争；辛亥革命，北伐战争，都是建国运动，并且是建立近代国家之主要的基本的运动，即民族的国家独立与统一。

处在全世界历史发展之民主革命时代行将完结而东方犹未完结的中国，民主任务不完成，即建立近代国家的根本问题不曾解决，在国内外任何事变中，这些国家根本问题都会很自然的提到全国人民的面前，成为革命的酵母。

目前的抗日战争，是建国事业中之主要的基本的事业，除开国际因素外，单就国内社会势力而言，谁能够有实力有决心来领导这一战争，完成国家独立（即收回以前所有丧失的主权）与统一，并且能够解决农民问题，谁便能够安然掌握政权，建设他素所主张的政

治形态和工业制度：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生产制度及财产关系，都截然不能混合并行，社会政策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因此在这一建设时期，政权党只能自行其是，除非在野党断然言行一致的放弃其阶级立场，是不能象在对外战争中和阶级性不同的党派合作的，这时阶级性不同的政党，只有站在在野的反对派地位。

如果国内各种社会势力都不能够完成民主任务，来建立一个近代国家，那末中国受外力牵制和国内纷乱的局面，只有延长至国际巨大变动法西斯特崩溃新时代到来之时。

原载《政论》(旬刊)第1卷第9期

署名：陈独秀

“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五日)

有人以为“五四”运动时代已经过去了，时代已经走到前面，人们的思想如果还停留在“五四”运动时代，那就未免太落后了。

这种意见是正确的吗？要研究“五四”运动时代已否过去，必须要明白“五四”运动时代是什么一个时代，并且必须具体的指出“五四”运动时代要求的是什么，现在是否还有这些要求，如此则“五四”运动所代表的时代性，和这一时代现在是否已经过去，便不致闭眼胡说的了。

“五四”运动时代所要求的是：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卖国贼；

反对旧礼教的束缚，提倡思想解放、妇女解放，以扫荡封建的残余；

提倡科学，破除迷信，建设工业；

反对古典文，提倡语体文，以为普及教育和文化的工具；

提倡民权，反对官僚政治。

这些要求现在已经过去了，或完全过去了吗？“五四”运动时代不是孤立的，由辛亥革命而“五四”运动，而北伐战争，而抗日战争，是整个的民主革命运动时代之各个事变。在各个事变中，虽有参加社会势力广度之不同，运动要求的深度之不同，而民主革命的时代性，并没有根本的差别。所以“五四”运动的缺点，乃参加运动的主力仅仅是些青年的知识分子，而没有生产大众，并不能够说这一运动的时代性已经过去。这一时代性不但现在不会过去，即在近的将来，离开了民主革命的要求（民族独立也是民主革命要求之

一),不会推动什么革命,并且连规模较大的运动也不会有。政治经济之发展,会因革命的动力不同而异其形态;而推动革命的历史任务,必然是民主民族的要求,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条件所决定的,人们头脑中的幻想不能够改变它。

正因为有些人们虽然口中也曾说说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实际上并没有认真的了解和正确的把握住这一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时代性,所以才会有“五四”运动时代已经过去这样的见解,所以才有拿农村苏维埃抵制国民会议运动的荒谬政策,所以才有超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幻想,所以才闹出“山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笑话,所以才有依靠农村攻取城市的错误路线,以及由打倒富农到“请土豪劣绅帮忙”,由苏维埃政府到国防政府,由普罗文学到国防文学,由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到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大串头脚颠倒乱杂无章的政策,都由于未能了解并把握这一时代性,遂至忽左忽右的乱跳,而进退失据。

现在或者已经过去的是这班头脑昏乱的人们,而不是“五四”运动时代,现在一代的青年,不可再重复这样的错误了。所以我在大家回忆“五四”运动的今天,不得不指出“五四”运动之具体要求所代表的时代性,这不仅仅为了说明“五四”运动的意义,重要的还是为了指出青年们参加政治运动的据点,即是,无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参加一切民主民族的斗争。要坚守住这一据点,必须把所谓“山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昏乱思想从根铲除,因为近代的一切大运动都必然是城市领导农村。

选自《我们断然有救》,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
署名:陈独秀

我们断然有救

(一九三八年六月五日)

去年九月，我在南京出狱未久，在中英协会和适之、孟真晤谈时，孟真向适之说：“我真佩服仲甫先生，我们比他年纪青，还没他精神旺，他现在还是乐观。”他这样说的缘故，是因为那几天以前，我们谈论世界大势时，孟真很颓丧的说：“我对于人类前途很悲观，十月革命本是人类命运一大转机，可是现在法西斯的黑暗势力，将要布满全世界，而所谓红色势力变成了比黑色势力还要黑，造谣，中伤，倾陷，惨杀，阴贼险狠，专横武断，一切不择手段的阴谋暴行，都肆无忌惮的做了出来，我们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命运！”我说：“不然，从历史上看，人类究竟是有理性的高等动物，到了绝望时，每每自己会找到自救的道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时各式黑暗的现象，只是人类进化大流中一个短时间的逆流，光明就在我们的前面，丝毫用不着悲观。”他很严肃地向我说：“全人类已临到了窒息的时候，还能自救吗？”我说：“不然，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譬如日本的黑暗势力，横行中国，压迫蹂躏我们几乎窒息了，只要我们几个人有自信力，不但可救中国人，日本人将来也要靠我们得救，不要震惊于他们那种有强权无公理的武装力量！”当时孟真也颇以我的见解为然。

我现在还是想着。

请看！鹿地亘先生夫妇的言行，堀田少尉的觉悟，他们不是贪生怕死，而是一种信公理不信强权的表示，而是黑暗中放出一线曙光，这小小的一线曙光，在我们人类还能够自救的保证上，比中

国军队打败日本军队，还要有价值。有些中国报上，很错误的竟有“堀田少尉向我军投诚”这样说法，简直是把曙光变成了黑暗，恕我不能附和！

我们不要害怕各色黑暗势力笼罩着全世界，在黑暗营垒中，迟早都会放出一线曙光，终于照耀大地，只要我们几个人有自信力，不肯附和、屈服、投降于黑暗，不把光明当做黑暗，不把黑暗对付黑暗，全世界各色黑暗营垒中，都会有曙光放出来，我根据这些观点，所以敢说“我们断然有救！”

原载《政论》(旬刊)第1卷第13期

署名：陈独秀

国民党究竟决心采用那一种 政治经济制度？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日)

领导全国抗战建国的中国国民党，究竟决心采用那一种政治经济制度，在国民党的本质及其最近临大宣言和纲领中，政治水平较高的人们，自然早已懂得，其余或因政治的头脑不甚清晰，或系别有用心的人们，无论在党内或党外，似乎或还是意见纷歧，因此国民党的领袖及其中坚干部，应该清楚明白的昭告国人，以免曲解和误会，这是为要的，尤其是在高呼一面抗战一面建国的今天。《大公报》曾经主张国民党的总裁应当对三民主义加以确定的解释，或者也是这个意思。

最近读到《政论》旬刊第十三期罗敦伟先生《党派统一问题》一文，其主旨是反对多党论，其主要理由是如下一段所说：

“在资本主义的统治形态之下，经济机构上的力量是寡头的。有的是比较复杂的寡头，例如法国他们是多党制，英美是比较简单的寡头，他们是两党制，最近也有多党的倾向。代表多数集团的资本政党，当然并不在想象党外无党，也不在禁止党内无派。一旦资本的统制高度发挥，经济机构单一化，独占化，即立刻复为统一的政党。德国的纳粹党，意大利的法西斯党，都有他们历史发展的必然轨迹，只有最庸俗的政党论者，才以为是人为的。苏联共产党的统一，也有他的必然性，完全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独占主义基础上，应有的上层筑物。

罗先生这篇文章，不用说是对我的《各党派合作问题》那篇文章而发（曾载《时事新报》），在这一段中及全文他处我所不能同意

之点，本文中均不能详及，我认为现在应该急于提出讨论的是：罗先生当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论者，而罗先生是否认为中国的经济已达到“资本的统制高度发挥，经济机构单一化，独占化”，而需要采用“德国的纳粹党，意大利的法西斯党”的政制呢？如果两者（无产阶级专政和德、意法西斯制）都不好，英、美、法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也不好，那末中国国民党打算采用什么一种政治经济制度呢？虽然各国建国都有他的特点，国民党将领导国民向那一大方向走去呢？如果领导国民抗战建国的党，自己还没有决定大的方向，自己还没有统一的政治意识和意志，则国民的努力真无所适从了，党内党外的纷歧意见更莫由统一了，罗先生所高唱的：“现阶段的中国，固然需要统一的领导，要强化国民全体一致的团结，尤其需要统一的政治组织，统一的命令与行动”，更是无从说起了。

因罗先生这一段话，使我们更感觉得国民党自己明确决定采用那一种政治经济制度，有十分迫切的需要，万不能再含糊下去了！

六月十日

原载《政论》（旬刊）第1卷第14期

署名：陈独秀

抗战一年

(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

此次对日全面抗战,虽然开始于去年八一三上海之战,而历史上的意义,当以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始,至今恰好一周年了。

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荣最有价值的一年,一年战争中所给予我们的经验与教训,胜过一百年。过去对外战争,对方都是些文化较低的民族,此次对日战争,对方乃是文化较高的民族,可以说虽败犹荣。

此时战争还未停止,最后胜利究竟属谁,姑且不论,根据这一年的事实,我们算得是胜利了。敌人的军器、军事技术、人才和经济力都强过我们,这是全世界周知的事实。他们军事上的胜利,本有科学的必然性,这是不必讳言的;然而经过一年的战争,以一个大力士竟然不能够击倒一个病夫,使他不敢还手,全世界人士都眼见这位大力士的本领不过如此,这位病夫也不是人们以前所想象那样容易驯服的民族,这是敌人失败之第一点。敌人虽然占领了我们许多重要的工商业城市,而政治上仍然毫无办法,不但未得着一个张弘范、洪承畴,在民族意识压迫之下,并没有一个稍负时望的人肯认真为他效劳,因此敌人对于一般汉奸,很少敢于信任,一年以来,未曾出现一个有力的汉奸,这是敌人失败之第二点。敌人对我民族污蔑的宣传,曾经普遍了深入了全世界,然而在此次战争中,我民族抵抗强者的人格提高了不少,同时敌人野蛮无赖的面目,在全世界文明人士面前无隐藏的暴露出来,这是敌人失败之第三点。敌人对我之侵略战争,尤其是长期战争,并非真是全国一致的。最热衷战争的,只有少壮派军人和军事工业家;工农劳苦大众

甚至小商人，根本反对战争，轻工业家和元老重臣甚至老成持重的军人，对于长期战争，也都有各种程度的怀疑，尤其是有头脑的政治家和经济学者，都眼见对华长期战争减弱了对英、美、俄国防的力量，觉得是他们国家致命的危机。这各种程度的反战情绪，将随对华战争延长而加强，如果进攻武汉战争旷日持久，得不着效果，受军事压迫的各种反战分子，会日渐抬头，这是敌人失败之第四点。

敌人的失败就是我们的胜利。

我们自己怎样呢？我们的政治、军事、工业、经济、文化，事事不如人，吃败战是当然的，所幸在这一年抗战中，我们的一切缺点都暴露出来了，只要不是痴子和骗子，都应该勇敢的承认，不应该自欺欺人。勇敢的承认缺点，认真的改去缺点，比轻浮的高喊“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要有益万倍。最后胜利并非必然的，要努力改去缺点，才能接近胜利之路；倘若轻浮的狂妄的高喊“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把我们的眼睛蒙住了，看不见自己的缺点，此乃失败的道路。

说到改去缺点，真是千头万绪，现在已经有点缓不济急。在战争第一的今天，只好从治标方面，择其有利战争而不妨碍战争的几点着手，因为战败亡了国，一切改革都无从谈起。

第一，外交上坚决的择用以本国现实利益为本位的政策，不但要从各与国获得大量的物资援助，特别是军器，即令是魔鬼的国家，只要它有利于我国或者不利于敌人，我们都应该尽量的利用；假如意大利能有助于我，我们便不惜承认它兼并阿比西尼亚。什么阵线，什么军事同盟，什么某国出兵，诸如此类的幻想，都应该断然抛弃。打吗啡针虽然能够暂时兴奋，结果是有害的。在野党倚外援以自重及利用外交来压迫政府，更是万分卑劣！

第二，民族垂危的今日，在野的党派应该口心如一援助政府抗战，获得胜利。不应该有保存实力趁火打劫的企图。我们不能相信在新式兵器的现代，在今天的中国，现政府如果失败，别的党

能够支持一省或数省政权继续抗战；即使有某一国家军器的援助，也不能成为西班牙的局面，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出兵作战，和德、意援助弗兰哥的形势不同，并且那时的国际形势会有利于日本。

第三，政府应该迅速决心解除人民的痛苦，扶助各业人民的群众组织，改去过去一盘散沙的状态，使之有力量援助政府继续抗战；人民有了庞大的组织，募债和征兵的问题，便易于解决了。

第四，政府应该下大决心，严惩从高级官吏一直到保甲长的贪污分子，代之以奋发有为的青年，以利抗战而挽人心；任何达官贵人，凡生活豪华，狂嫖滥赌，人民侧目者，此等毫无心肝的亡国大夫，应一律发往前线，参加开挖战壕工作，或编入运输队，以示薄惩。

以上四事，虽然卑之无甚高论，都是目前迫切应该力行的事。

如果力行此四事，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则今年七七纪念，比双十节还有价值，如此方不负抗战中军民的痛苦与牺牲！

原载《民族野心》，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

署名：陈独秀

抗战中川军之责任

——在中央广播电台讲演

(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四日)

在对外战争中，地大人多，自然是一大优点。俄国第一次被拿破仑之侵入，第二次十月革命后被欧、美、日本各国联合进攻，都仍能保全者，正因地大之故。此次中国对日本抗战，若非中国地大人多，已被日本灭掉了。中国单是四川一省，土地、人口都与日本相等，论理只四川一省，都有对日本抗战的资格；不幸中国的工业与教育都不及日本发达，所以在抗战一年中虽有各国的援助，仍然丧失了不小的土地、不小的城市，人民的生命财产更是蹂躏不堪。我们自从开战以至今日，并不是想在军事上战胜日本，只是因为日本逼迫我们到了民族不能生存的最后关头，不得不出于孤注一掷，为保存国家民族的人格而出于一战。敌人利在速战速决，我们利在延长战争；战争愈延长，我们固然愈加破产，敌人也愈加困难；我们的破产是愈加贫弱，敌人的困难是不能维持富强，这是由于他对华长期战争减弱了对英、美、俄国防的力量，尤其是对英、美造舰的竞争，形成了她将来的破产；这一点在敌人明白的政治家已看得透明，所以他们当中或者希望速战速决，或者希望停止战争，骨子里同样是认为战争不应该延长下去。所以只要我们再困苦支持半年以上，守住武汉不失，敌人便会知难而退，即是撤回使我们不能忍受的媾和条件，我们便能够在战败破产的废墟上，加倍努力，复兴我们的国家民族。我们现在不要气馁，也不要大言自豪，只要看清敌我两方的真实状况，脚踏实地的再困苦支持半年以上，我们便有希望了。

我们将怎样支持呢？最重要的自然是军事力量。过去参加战争的军队，都有各种程度的疲劳与残破，最后的长城，乃是我们四川的大批生力军。因为大水灾的缘故，敌人用主力军由河南南下的战略，改变为由长江西进。此时在长江南北两岸和敌人血战和防守的，川军颇居重要地位；我们希望四川第三次出兵，并且迅速派出大批的精锐部队，保住武汉，即是保住中国，所以我们敢说：川军是我们国家民族的最后长城。这便是抗战中川军的责任，也就是川军在历史上不朽的荣誉。

即万一不幸，武汉失守，在经济上、文化上，也只有四川能够领导云、贵做复兴中国的安哥拉。

四川的同胞们为了要加强劳动力和战斗力，以尽目前和将来的责任，禁绝鸦片烟，乃是第一件大事！

原载《民族野心》，广州亚东图书馆出版
署名：陈独秀

民族野心

(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六日)

通常说到野心二字,人们便有点厌恶,其实无论个人或民族,野心用在占有欲固然不免令人厌恶,倘用在创造欲上,便是伟大、向上、有志气等同意义的名词。

我们民族现在种种不长进,受人侮辱,正因为缺少野心。为什么缺少野心?有人说,因为民族衰老了,罗马之后今有意大利,为什么我们却衰老了?有人说,因为孔、孟、老、庄、佛教、宋儒等礼让退婴的学说,衰老了中国民族精神上的血液。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会产生和培养这些败坏民族精神上血液的学说?剥肤以求,便不得不归根于社会经济的原因了。

封建社会有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武力、道德、文化;资本主义社会有它的而且是更高的生产力、武力、道德、文化;这两个社会过渡时期,即前资本主义时期,这一时期的农业造成社会的蒙昧无知和散漫,商业造成社会的好诈和苟偷,于是它的生产力、武力、道德、文化,都一般的衰落。

欧洲罗马衰亡后数百年,便踏进了资本主义社会。日本德川幕府一倾覆,紧接着便是明治维新,两个社会的过渡时期为时不久或几等于无。中国自晚周封建崩溃以至清代鸦片战争,前资本主义社会,差不多延长了二千年,第一是因为四邻都是些生产力和文化较低的民族,没有外来的刺激;第二因为海岸线实际的短,不容易形成沿海岸对外贸易的都市;第三因为缺少纵线的河道,形成大陆内部交通之困难,不容易发展国内市场,迅速的集累原始资本;第四因为最大的四次蛮族侵入(五胡、金、元、满清)破坏了中国经

济之继续进展，以此种种，遂至延长了中国前资本主义时期，未能进入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这就是中国和欧洲、日本强弱盛衰之历史的原因。

在前资本主义的社会，既然没有资本主义的工业，自然也没有集中的前进的产业工人。这时代的原始农业，各家族占有或使用一块土地。“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是他们的最高理想。只要风调雨顺，便可靠天吃饭；只要家畜和子孙繁殖，使家道兴隆，便是无上幸运；薄税轻刑，是最好的政治，此外用不着人民的组织，用不着国家的保护，用不着政治革命，用不着对外战争。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是商业支配工业，而不是工业支配商业，国内市场已足供其回旋，商人将本求利，固无择于本国制品或外国制品，即令是仇货走私，也一样发财，用不着民族斗争，便谈不上爱国，更厌恶革命战争；他们也和农民一样，根本不会有民族野心。农民的特性是守旧、散漫和无知；（手工业工人不占重要地位，其特性亦近于农民，乡村的手工业，有许多就是农民的副业。）商人的特性是好诈和无耻；这两种落后的特性合并起来，便形成了双料落后的士大夫群，无知而又无耻，中国二千年来长期停滞在前资本主义的社会，虽然多次治乱循环，多次更换王朝，而统治权终于建立在落后的农业和商业上面，在朝在野扮演重要角色的，也终于是一般代表农民和商人的无知而又无耻的士大夫群，能产生孔、孟、老、庄、宋儒，发挥佛教等礼让退婴学说的，还算是其中优秀分子，这正是前资本主义社会落后的农业与商业之反映；在这样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基础上，也只能产生我们固有的武器，固有的道德与文化，即所谓东方文化与精神文明。

一到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那便万象一新了。它使社会生产力有了惊人的发展，它需要从全世界取得原料，它需要从全世界取得市场，它需要国家保护，它需要扫荡封建旧势力的国内战争，它需要对外竞争的民族战争，于是它的民族野心自然日渐高昂。资本主义的工业虽然要造成滔天罪恶，同时却创造了较高的生产力，

较高的武力,较高的道德与文化,扫荡了整个旧社会各方面的落后性,奠定了将来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之物质的基础,是人类进化途中一次大飞跃。

经济长久停滞的中国,也因为鸦片战争之后,又经过欧洲大战,资本主义的工业有了初步的生长,民族野心已开始萌芽,于是才有了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和此次抗日战争发生。然而正因为经济长久停滞在前资本主义的缘故,旧社会的抵抗力过于强大,资本主义的工业与文化不易侵入,民族资产阶级昏懦的可怜,双料落后的士大夫群仍然充塞了朝野,这便是历次革新运动中途夭折和此次抗日不易成功的根本原因。

抗战一年了,农民仍旧是在隔岸观火,商人大做其经济的汉奸,买办和银行家(中国现在的银行,仍旧是商业的,而非工业的)出身的官僚,利用国家机关,来投机外汇,或垄断国产,阻碍出口贸易,以大饱私囊;士大夫、土豪劣绅纷纷充当汉奸;为抗战而尽力而牺牲的,只是一部分有民族意识的工业家、工人、军人或受过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洗礼的青年;所谓“全民抗战”,不过是一句宣传口号。因工业不发展而民族野心不高昂,影响到抗战如此之大,至于军器、军事技术和交通工具之贫乏,更是铁一般的事实摆在我们的眼前。这都是吃了我们崇拜东方文化、精神文明而轻视西方物质文明的大亏!

如果经过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庚子战争,以至今日敌人的飞机、大炮、坦克车,还不能唤醒我们的痴人迷梦,还死守着前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生产制、武器、道德和文化,跟着以最前进政党自命的蠢材,大反其“唯武器论”,和大唱其“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大吹其“大刀旋舞起来,‘皇军’便要发抖”的法螺;或者承袭着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半吊子的见解,反对全部欧化,一方面主张采用现代生产制与军器,一方面主张保存固有的道德与文化,高唱东方的精神文化胜过西欧的物质文明;如此则中国永远不会欧化,即是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制、武器、道德和文化,永

永远不会走进中国来；永远死守着固有的生产制、武器、道德和文化，中国永远还是农民无知、商人无耻、士大夫无知而又无耻的中国，永远没有什么民族野心。如果这样永远糊涂下去，我们对得起子孙吗？！

（七月十六日）

原载《民族野心》，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
署名：陈独秀

论游击队

(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时论对于游击队或者都有点毁誉过分罢。我所得的材料，却是可以毁的多过可以誉的，然而现在还不能下一个最终的结论。可是我们对于游击队有两点必须充分认识，方不至为时论所迷。

第一，正当的游击队有两种：一是属于正规军队指挥供给的别动队，一是民众自携武器、粮食的武装队。这两种游击队，也都必与正规军配合起来，才能起较大的作用。第三种便是在民众之外在民众之上向民众征发军器、粮食的游击队，辛亥革命以来有所谓“民军”，即属此类，在战争中，在战后，往往为社会国家之累；在此次抗战中，被人骂为“游而不击”，“抗日不足，扰民有余”，“亡国的游击队”的，正指此辈。

第二，即正当的游击队，虽有它的特殊作用，即战争中扰乱和牵制敌人，战争失败后使敌人不容易安全统治，然一离开正规军，而幻想专靠游击队来保国家，便是天大的错误。就是正规军的游击战术即运动战，亦不可滥用。近代国家已经是工业支配了农业，城市支配了乡村，大城市支配了小城市。敌人首先要占据的是我们的沿海沿江沿铁路的大城市，他们占据这些城市便可支配全中国，别的比较不重要的地方，即令我们的军队或游击队闹得天翻地覆，他们都可以暂时不管；因为他们懂得大城市在近代国家之重要。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妄想拿农村来支配城市，妄想拿农村来做抗日根据地，这正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事。过去的所谓“红军”及山上的“苏维埃政府”为什么到处失败，也正因为军在军器上，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农村和小城市都不能够独立存在。在此次抗日战

争中,如果我们执迷不悟,过分的估计游击队和游击战术,无意识的帮助敌人更容易的占据了我国全国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游击队布满了全国的农村和小城市,甚至避开敌人的势力在偏僻地方建立一些可怜的边区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国!没有大城市,便没有国家。阿比西利亚的农村中,至少尚有不少的游击队,不断的袭击意大利军队,我们能说阿比西利亚还不会亡国吗?印度西北至今还有一些所谓“王国”,我们能说印度不是英国的殖民地吗?

我们必须充分在原则上认识这两点,游击队运动在抗战中始有利而无害!

一九三八年七月廿一日

原载《民族野心》,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

署名:陈独秀

说老实话

(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负责任，说老实话”，汪精卫先生这两句话，特别对于现在的中国人（精卫先生自己和我当然都在内），真是逆耳的良言！

我以为这两句话实在是一句话，不说老实话的人，决不会负责任，话既然不老实，根本便无责任可负。说老实话，可以说是负责任的基本条件。

说老实话的意义，在表面上好象就是不说谎；然而更进一步解释起来，似乎前者比后者还有积极的意义。不说谎，只是消极的不说谎话欺骗人；说老实话，更是积极的举世非之而不顾的把真理说出来。在欧洲许多国的语言中，“老实话”和“真理”可以同用一个字，例如英语之Truth，俄语之Pravda。

说谎话说出最高的价值，也不过是宗教；宗教是要靠说谎才能存在的，说老实话乃是科学的。科学家有时也有错误，然错误不过若干假定之不成立，真正科学家都不曾有心说谎。科学正是严肃的制止人们说谎，欢喜说谎的人们所以也厌恶科学。

欧美学术界，自从科学战胜了宗教，能够说老实话的人，日多一日。政治界便逊色多了；然而比起我们的士大夫群，还老实得多。譬如：他们的右派便自称是右派，资本主义者便自认是资本主义者；我们的右派和资本主义者，如果被人称为右派和资本主义者，心中便感觉得不愉快，甚至勃然大怒。

在抗战八股大流行的今天，把宗教般的感情代替了科学，说老实话更是不合时宜了。后方的英勇战士实在太多了，尤其在开会宣言和通电的时候。全民抗战，各党合作，全国精诚团结，民众奋

起，歼灭敌人，最后胜利，如此等等，似乎都已经不成问题，事事结果圆满，处处印象极佳，即有一二忧时之士，心所谓危，亦不敢出诸口。此种状况究竟能够支持几久呢？个人不说老实话，其事还小；政府使人不敢说老实话，事情已经够严重了；社会不容许人说老实话，则更糟。至于纯洁的有志青年，也不愿听老实话，而乐于接受浮夸欺骗的宣传，尤其是盲目信从在野党不负责任的胡吹乱道，那便是无药可救了！

现在的环境并不容许我说我所应说的老实话，即偶然吐出万分之一不忍附和时论的话，已经使有些人大大的不快了。我不敢自吹我是敢于说老实话，我只自誓：宁可让人们此时不相信我的说话，而不愿利用社会的弱点和迎合青年的心理，使他们到了醒觉之时，怨我说谎话欺骗了他们！

说老实话的人一天多似一天，说老实话的风气一天盛似一天，科学才会发达，政治才会清明，社会才会有生气，如此国家，自然不易灭亡，即一时因战败而亡，其复兴也可坐而待；否则只会有相反的结果！

七月二十七日

原载《告日本社会主义者》，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
署名：陈独秀

资本主义在中国

——在重庆民生公司讲演

(一九三八年七月)

人类进化有两种形式：一是循序的进化，一是跳跃的进化。循序的进化是依一般进化的阶段，循序渐进；跳跃的进化是跳过中间阶段，突然进化到较高的阶段。循序的进化之真实性，除了进化论的反对者，已为众人所周知，现在无庸多讲了；至于跳跃的进化，则往往为人们所忽视。

每个民族客观上和主观上的力量，固然能够使循序的进化比较的加速，而跳跃的进化则大半由于外界之影响；例如：在古代社会史上，北朝鲜及日本有些地方，跳过绳纹陶器时代，由无绳纹陶器直接走到铜器时代，甚至走到铁器时代，这是因为受了中国输入铜铁器之影响。又如近代史上，俄国因为西欧的影响，由封建的农业国，很快的经过了甚至于可以说跳过了西欧手工工厂时代，一跃而为近代工业并且踏进了产业托拉斯边沿的国家；在中国，一面继续前资本主义的生产状况，一面采用了本世纪三十年代最新的纺织机器，跳过了英国数世纪的循序进化，所以在上海马路上往往可以看见独轮车和无轨电车及最新式的汽车并行，马拖的公共街车时代则未曾经过。一部分资本主义的工业之所以在中国有些跳跃的进化，也和俄国及其他落后国家一样，是受了资本主义先进国的外来影响，而不是由于内部力量以循序进化的。

说到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问题，又会引起过去许多不必要的争论。过去的争论，有人认为中国还是封建或半封建的社会，有人则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其实呢？一个社会的经济，

各种不同的新旧成分，都往往继续并存着，尤其是在落后国家；因此，我们观察各国的经济，要估计是那一种经济成分居领导地位，来确认它是那一种社会，没有什么一半一半，更不能因为它有各种经济成分，遂认为它是各种社会。中国的中外银行直接支配了大城市经济，间接支配了小城市经济，中外的工业商品和中央货币普及了穷乡僻壤，农村生产品如棉花、丝、茶、烟草、桐油等，其扩张或缩小，不但听命于本国市场，且听命于国际市场；这当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居领导地位，而不是划地自足的封建经济居领导地位；因此，我们便可以说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只是资本主义在中国，一方面由先进国的资本主义之影响而发生而跳跃，一方面也由它(资本帝国主义)的阻碍而未有高度的发展，因此庞大的商业资本，还未完全工业化，农业之工业化则更加谈不上，统一的国内市场还未形成，产生工业生产工具的工业，几乎还没有，比起资本主义先进国来，中国此时还是一个“初期资本主义的国家”，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有大有发展之余地。

由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缺点，其发展也，可怕的罪恶，亦随之而来；然而它毕竟是一种进步的制度，能够增加社会的生产力，带来它所需要的民主政制，以清除旧的封建生产制的缺点与罪恶；在目前过渡时期，我们宁可忍受资本主义的罪恶，来代替封建军阀的罪恶。

人们或者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既然含有缺点与罪恶，我们何不取法乎上，再大的跳跃一下，采用生产力更高的社会主义呢？诚然，社会主义生产制，比资本主义生产制有更高度的发展，也能以清除资本主义的罪恶，已经是初期资本主义的中国，便不能说没有跳跃进化之可能；可是，我们所相信的社会主义，乃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它的特质是废除私有及生产集中，和固执私有及均产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大不相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若走循序进化的路，必须以内部经济的政治的成熟为条件，若走跳跃进化的路，则必须以外部的影响(刺激与援助)及内部政治的成熟为条件，

不象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是革命的而却是幻想的，在经济上则是反动的，资本主义比起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还是革命的，因为前者使生产力增高，后者使生产力停滞甚至萎缩。社会主义在中国之经济的成熟，自然是无稽之谈；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够生长起来，没有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自然谈不上政治的成熟，外部的影响，目前还在等待时期，而我们的经济建设却不能等待。

列宁说过：“俄国工人吃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而不是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在中国更是如此！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本国的资本主义，或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

原载《民族野心》，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

署名：陈独秀

敬告侨胞

——为暹罗《华侨日报》作

(一九三八年八月一日)

此次抗日战争，是中国民族需要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不愿受日本帝国主义工业的统治，所以这一战争，除了少数汉奸外，凡是中国人，无论国内国外，都应该尽他所能尽的力量，援助这一战争。国民对战争愈尽力，胜利愈有希望，即使不能胜利，甚至因战败而亡了国，全世界也不至把我们看成永远亡国而不能复兴的民族。我们须自信：我们在全世界历史上，是伟大民族之一，只要多数国民能为国家尽力，是不会日久被人战败或征服的。

在此次战争中，海外各地侨胞，对于祖国之热望与援助，使我们住在国内的人，不但兴奋，而且惭愧。

关于侨胞的状况，我不大知道，本来不能有所贡献，只感觉有两件事要和诸位谈谈。

第一，我们的民族运动，是站在各民族平等的原则上面，和帝国主义者以夸大自己的民族为口实来侵略兼并别人的民族主义（如以前俄国沙皇的大斯拉夫主义及现在希特勒的大日耳曼主义，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等等。）根本不同；因此我们侨胞所在的地方，如果是一个民族的独立国家，如果她不公开的直接加害于我们，我我便不应该站在自己民族利益的立场，或站在什么“阵线外交”的立场，来妨碍别人以民族利益为本位的外交政策。这样的妨碍，不但违反了民族自决的精神，而且只有迫着他们对我们益加疏远，甚至仇恨。至于对于所在地的人民（无论是独立国或外国的殖民地），更应该公公正正的平等看待，断不可有伤害本地人民经济生活的

侵略行为；我们自己正在为反抗日本的侵略而战争，便没有理由侵略别人。

第二，我们国里的贪官污吏对于人民欺压敲诈，是世界各国中最可怕的地方，回国侨胞吃过他们苦的事实，大概十本书也写不尽；然而侨胞断不应该因此对于祖国失望灰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吏是国家的公仆，公仆不良，主人有权利起来赶走他们！不起来赶走他们，是人民自暴自弃；失望灰心，更是自杀！他们虽然是些公仆，而有了累代传袭的权威，“奴欺主”的局面已非一日了，赶走一批，又来一批，根本解决，只有主人渐渐起来亲理家政；主人能分神亲理家政一分，公仆的权威便自然减少一分。我奔走社会运动，奔走革命运动，三十余年，竟未能给贪官污吏的政治以致命的打击，说起来实在惭愧而又忿怒；然而我过去不曾自暴自弃和自杀，将来也不会自暴自弃和自杀，但愿与海内外志同道合的人们携着手共同奋斗到底！

我所欲言者，暂止于此。

民国廿七年八月一日于重庆

原载《告日本社会主义者》，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
署名：陈独秀

你们当真反对资本主义吗？

（一九三八年八月二日）

现代的经济制度只有两个：一是资本主义制度，一是社会主义制度，没有第三个。私人资本制度是资本主义的范畴；国家资本制度也是资本主义的范畴；节制私人资本，只有使资本主义之发展停滞缩小，仍然属于资本主义范畴；希特勒和莫索里尼所号称的统制经济，更是大规模的大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经济；只要不废除财产私有，都不能走出资本主义的范畴。因为私有财产制是资本主义之骨干，它之存在与否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分水岭。

如果有人新发明一种制度，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那么我便要请问他：在这一种新的经济制度，财产私有制是否存在？这一种新经济制度的生产和分配方法，究竟和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此外还有许多根本的理论，我另有专篇论列，兹不赘及，现在只提出两个无关宏旨的枝叶问题，唤起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注意一下：

第一，小资产阶级的中国共产党，既不懂得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又厌恶害怕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于是乃提出“力争非资本主义前途”的说法，这正合你们的口胃；并且你们所谓中国社会生产力是封建的，这一怪论也从中共抄来；你们为什么要反对共产党呢？

第二，欧美的知识分子，毕竟比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点知识，不会象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许多新发明；他们如果认为你们反对资本主义是不诚实的，他们便知道你们将和希特勒一样，以反对资本主

义始，以充当大资产阶级的豪奴终；如果认为你们反对资本主义是认真的，他们便知道你们必然要走共产的道路，（德意的法西斯道路，仍然是资本主义；如果他们不是资本主义，不是为商品交换而生产，便不需要殖民地和市场了。）无论你们愿意或不愿意。并且象你们“一反近代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为交换而生产”的主张，这正是全世界至少是几个最主要的国家社会革命成功后，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方法；所谓“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苏俄，还不敢也不能如此主张，你们居然想把它运用到国民党及政府的抗战建国纲领；几个党员这样随便谈谈，还不关紧要，倘若抗战建国纲领真采用了这样幻想的主张，则敌人将如何宣传，国际形势将发生如何变化，这是可以预见的。

这虽然是两个小小的枝叶问题，也值得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认真考虑一下罢！ -

八月二日

原载《告日本社会主义者》，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
署名：陈独秀

我们为什么而战？

(一九三八年八月八日)

要问日本兵士为什么而战，他们多数的答复是为执行上官的命令而战，稍稍进一步的答复是为国威而战，此外便没有了，只有他们的政府知道真正是为什么而战。

我们为什么而战呢？我们多数的兵士知道为了日本鬼子欺压我们，我们是为民族生存而战，在这一点，我们的兵士比他们要进步得多。可是我们的政府和知识分子，对于此次抗战，应当更有进一步的了解。“为民族生存而战”，这句话当然没有说错，并且比“为正义”、“为世界和平”等空话大话，要高明得多，但还未免抽象一点，笼统一点，并未表明为怎样的生存而战。

各个人以至全民族是不能靠空气生存的，要靠衣、食、住、行上物质的条件，而且要有很好的丰富条件，才是光荣的生存，而不是贫苦的屈辱的生存。日本广田曾对王正廷大使说：“中国是农业国，日本是工业国，两国间各以所有易其所无，携手合作，共存共荣，岂不甚好？中国何必要反日呢？”他这几句话，正是不要中国有民族工业，要中国民族永远为日本民族生产工业原料，做他们的农奴；日本民族永远过工业的光荣生活，中国民族永远过农业的屈辱生活。如此，中国民族并不是不能生存，而乃是屈辱的生存，不是光荣的生存。如果真照梁漱溟先生的办法，以乡村建设为主要事业，而无视城市工业，则正合日本的口胃，日本固不必加兵于我，而我之抗战也是多余的事。可是事实上，日本不惜消耗大量的飞机大炮，炸毁我们的大城市，炸毁我们的工厂，正是因为要消灭我们的城市工业；我们不惜牺牲一切与之抗战，也正是不甘心做他们的农

奴，而力争民族工业的发展不受她的束缚。所以，此次我们对日战争，固然可以说为民族生存而战，然而明了正确的说，应该是“为民族工业而战”。

“战争与革命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后果”，这句话可以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例如此次战争，不但中日两国都因为发展工业而战争，而且两方面都因为工业有了发展才至于推动战争。先就日本说，轻工业的日本，在经济上本非什么了不得的强国；欧战以后，工业突飞的发展起来，原料和市场都不能与之相应，于是不得不急于在中国取得煤、铁、羊毛、棉花与市场，在库页岛及南洋取得煤油，非此则日本帝国主义只有停止发展；因此，她对英、荷对苏俄尤其是对中国之冲突，遂日益加剧。在中国呢？中国有广大的市场，有丰富的煤、铁、羊毛与棉花，我们如果以乡村建设自足，无意发展民族工业，广大的市场听日货倾销，工业的原料让日本尽量取用，这正是日本政府心目中的中日亲善的真实意义，她便没有对中国作战之必要了；如果中国的社会真如共产党所说，还是封建或半封建，则对于日本资本主义之发展，还没有势不两立的致命冲突，对日抗战匪独不必要，而且不可能。以封建半封建的农业国之生产力与武力，绝对没有能力对工业国战争，尤其不堪比较的长期战争。可是自欧战以来，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毕竟缓慢的一直发展着，国民政府对于工商业，对于币制，对于交通，对于军事，都沿着资本主义发展的路线，着手建设，虽然因政府政策的错误，建设得很缓慢；这便是告诉日本以及全世界：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封建残余的旧国家，而企图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新兴国。这一新兴国的企图，使大部分靠着中国的资源和市场才能够继续发展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不得不大吃一惊，于是在全世界人士心目中，发生了究竟将来谁是中国主人的问题；解决此问题，最后只有战争。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以工业的日本统治农业的中国，只有用战争来打破中国建立资本主义新国家之野心；中国不甘心受日本的统治，要发展民族工业，自做主人，也只有努力抗战以打破敌人的企图。

中日战争在客观上是无可避免的。有些人以为中国对日抗战太晚了，又有些人以为开战太早，这是战争的时期是否于我有利的问题，而不是战争本身的中心问题。

无论战争的时期是否有利于我们，而既已战争，我们只有把握住此次战争本身的中心意义，即是为发展民族工业，自做主人而战，而不为一切空话大话所眩惑，大多数人才能够脚踏实地的始终为抗战而奋斗。大众只能为切身利益的问题而奋斗，不能为虚无飘渺的空话大话而奋斗。

只要大家靠定为发展民族工业自做主人而战这一具体要求，即令此次战争完全失败，我们的民族运动决不会瓦解冰消；可是我们的民族运动，决不会在空洞的“民族利益”口号或什么“为正义”“为世界和平”等空话大话之下再起的。

至于中国共产党一听到有人主张发展民族工业，便认为是做了资产阶级的俘虏；这种狂吠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乐闻的，我们不应该起来严肃的加以纠正吗？

八月八日

原载《告日本社会主义者》，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

署名：陈独秀

“八 一 三”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五日)

此次抗日战争，自历史上的意义言之，自当溯之“七七”芦沟桥事变，然由地方事件发展到中央出兵，形成两国正式战争之开始，则为“八一三”上海之战。

自“八一三”上海开战之前夕以至今日，对于在南方开战之当否，始终有两种意见之不同。一种认为战争宜限于北方，在南方开战，则于金融工商业牺牲太大；一种认为北方地形不利于我，而且惟有战地扩大，才能够达到消耗敌人之目的。我以为后一种意见是对的。

既然开战，只有采用全面战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敌人不但在军事上强过我们，在经济上亦富过我们，我们本消耗不过他们，我们之所以敢于采用消耗战的战略者，一是因为我们有可能得到外国的援助远过于敌人所能够得到的；二是因为我们是全力作战，敌人须分力以备别的国家，如陆空之对俄，海军之对英、美；三是因为敌人能战而不能拚，我不能战而能拚。第三点尤为重要。

自开战以至今日，我们始终不曾幻想在军事上能够得到若何显赫的胜利，我们所有的把握，只是一个“拚”。我们地大人众，我们是农业国而非工商业国，我们拚着失地，拚着丧师，拚着牺牲工厂，拚着伤亡满地，甚至拚着一片焦土；敌人是暴发户，我们是破落世家；破落户本一无所有，性命更不值钱；暴发户的绅士，慢说大门前的旗杆被人打毁，就是绸长衫被人撕破，也够大失体面。我们并不奢望能够打死这暴发户，只要拚得他无可奈何，不得不对我们稍微客气的说和，我们便算是胜利了。

我们若始终忍受暴发户横霸无己的欺凌，而不与之较，今天丢一屋角，明天丢一块田地，后天又丢一处祖坟，现在变成脓包，将来更要讨饭无路走，只有死里求生的与之一挤。这一挤的损失，虽然不如敌人所说非五十年不能恢复，而牺牲与痛苦却是太大了，尤其是南方各省。

我们的出路，只有忍受这不堪忍受的牺牲与痛苦，给敌人一点小小教训，使他知道我们也不甚容易欺负，或者会知难而退，尤其是到了国际形势稍稍于我有利之时。我们只要恢复一个象样的国家，只要我们在痛苦牺牲中，真正得到教训，真正懂得科学与工业之重要，真正懂得建立民主政治使人民与国家融合之重要，真正懂得绝对停止内战与军队统一、国家统一之重要，真正懂得教育制度根本改革之重要，经过两三个五年计划，我们便可以由破落世家变成复兴世家。

始终不抵抗，始终做脓包，固然毫无出路，即抗战限于北方，也正中敌人逐步南侵，节省兵力财力之毒计；所以为扩大战地，消耗敌人兵力财力计，由“八一三”上海之战开始全面战争，在战略上，我认为没有错的。

原载《告日本社会主义者》，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
署名：陈独秀

告日本社会主义者

(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日本如果还有社会主义者，我这篇文章便是献给他们的。

把压迫国的资产阶级和被压迫国的资产阶级分别看待，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和帝国主义间的战争分别开来，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即令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及社会主义者（战时两方的工人及社会主义者，自然都包含在内），也应该援助这一反抗战争；这本是我们科学的社会主义者前辈自己所曾经实践的遗教，而为今天我们的日本同志所背弃了。

据我所知，首先背弃的便是山川均先生，我很奇怪巴金先生还会和他说道理，他还有什么希望呢？第二个背弃者便是我们的老友忠厚的佐野学，我们曾称他是日本的大钊，他现在变得太不忠厚了！第三个乃是最近铃木茂三郎先生的所谓转向。他们都由社会主义转向爱国主义了。

我们责备他们转向爱国主义，他们会愤愤不平的责问我们：在中日战争中，只许中国的社会主义者赞助爱国运动，而我们日本的社会主义者转向爱国主义，就应该被斥责吗？我以为这是站在形式逻辑的观点上，玩弄名辞，而不曾考察其实际内容。被压迫民族的爱国运动是进步的，因为这一运动是加帝国主义者以打击；压迫国的民族主义和爱国运动是反动的，因为它是帮助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压迫侵略被压迫被侵略的民族；这是对于爱国运动之辩证的见解。山川、佐野、铃木诸人，不至于不懂得这个；如果他们真来责问我们，这只是证明他们是自觉的背弃了前辈社会主义大师的

遗教！

还有班厚颜的先生们，居然狡猾的藉口无产阶级利益来说谎话，以欺骗大众；他们认为资源贫乏的日本，从中国夺取得资源，于日本无产阶级现在的生活和将来社会主义的建设，都是有益的，所以日本的无产阶级应该赞助对华战争。这种发源于背叛国际主义者“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观点，应用到帝国主义的日本，更是错上加错。不把建设社会主义立足在革命的国家间分工互助上，而立足在预先占取资源以争胜，这是中国旧时大家庭各房媳妇抢着“积私”的丑态，还配谈什么社会主义的建设！现在已经不能实现一个幻想自给自足的法西斯国家，将来还会有一个幻想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国家吗？再就现在的生活说，日本除了供给财阀军阀填不满的欲壑而疯狂的扩张军备疯狂的侵略战争所需要外，究竟影响到平民生活的资源贫乏到什么程度呢？日本帝国主义来到世界上太晚了，要想学资本主义先进国，把从殖民地半殖民地掠夺来的一小小部分，喂养劳工贵族，已属不可能，无产大众更不待言。她的商品和别国竞争，贱价劳动力始终是她的特长；他们骗人的改良运动，是如何可怜！所以日本对外侵略战胜一次，即紧跟着军备扩张一次，工农平民生活亦即紧跟着降低一次。如果说获得了丰富的资源，日本的资产阶级才有施行改良政策的物质条件；那末夺取了中国东北四省丰富的资源以后数年中，何以日本工人的实际工资还是下降，而不是上升，农村更加破产而不是恢复呢？“九一八”前，日本输入满洲的商品价值七千万元，芦沟桥事变前已达到三万万，同时物价总指数却比“九一八”前高涨到百分之百，这是表示工农平民的生活改善了吗？况且拿分润掠夺品的余沥来鼓动工人阶级赞助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战争，这本是欧洲资产阶级御用的所谓“社会主义者”的背叛行为，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也学会了！

又有人（自称社会主义者的高畠素之）责难胡适之为什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亲近英、美帝国主义。这一责难，表面上好象很公平，可惜他是日本人，就天然不免有点为日本帝国主义做说客的嫌

疑！我现在没有必要代胡适之先生答辨，我只得正告他们：中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从来不曾企图在帝国主义者当中选择主人。我们认为中国的解放，必须脱离一切帝国主义的宰制，并不只是日本；可是事实上，近十年来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公开的压迫之尖锐化，超过任何帝国主义者加于中国的横暴，因此只好集中我们可怜的力量，来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殊死战；在抗日战争中，如果有人教导我们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者，我们只有认为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间谍。中国国民党从前的政策，本来是不反日而反英的，后来为什么走到相反的方面？日本帝国主义的政府何以不自反省，反而责难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呢？

我还要告诉一切日本的平民：我们的所谓“抗日”，只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财阀和军阀，而不是反对日本的平民；我们知道，侵略中国，本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要求，而不是日本平民的要求。任何派社会主义者，都不能附和极少数人所谓“纵断的民族运动”的说法。这一说法，不但理论上说不通，而且实际上也没有这回事；中国人中有大批汉奸，日本人中有不少同情于中国抗战的人，鹿地巨夫妇就是代表，请问这将如何纵断法？我们的纲领是，结合中国、朝鲜、日本三国的平民，共同打倒日本的帝国主义者；不独中、韩人民，即日本人民，也只有到这时才能够得到解放。日本军队如果在中国得到胜利，同时便是日本政府对日本人民得到胜利。

如果许我做一个荒唐的假定，中国战胜日本后，成为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侵略日本时，则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便应该首先反对本国政府，赞助日本政府及人民对华抗战！

我这些话决不是对山川、佐野、铃木这等人说的，我希望日本的工人和倾向社会主义的青年，能够听到我的说话，而且得到合理的回声！

最后，我还要说到我们的周作人先生。敬爱日本人民的诚实和勇敢，洁静和富于同情心，甚至承认日本政治也比中国清明，并且痛恨中国社会之堕落和政治之不良，我都和周作人先生没有两

样；然而这一切决不能减少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心情。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枪尖指挥之下，在日本帝国主义走狗中国的汉奸卖国贼领导之下高谈中国文化再生，这不能不是人类文化之奇耻大辱！因此我不能不为周作人先生惋惜，严格的说，应该是斥责而不是惋惜，虽然他是我多年尊敬的老朋友！

原载《告日本社会主义者》，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

署名：陈独秀

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

(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不但是亡了国，只要丧失了煤、铁、棉花等重要原料的区域而不能恢复，工业也很难发展。在抗战中，工厂被破坏，海口被封锁，更谈不上工业，因此也谈不上什么主义。如果我们一面高唱抗战建国，一面却因为回避意见纠纷，主张不谈主义，即不谈究竟采用何种主义的经济制来建设工业，那便有点莫名其妙了！

因为铁的事实之教训，即便向来迷信东方精神文化的人们，现在也很少公然反对发展工业，这是中国的幸事。然而采用何种经济制度来发展工业呢？资本主义制还是社会主义制，都成了问题；尤其是在进步的青年心中，成了火热的希望着解答的问题。对于一般本来头脑不清又怀着成见的半老人，我们值不得跟着他们缠夹，而对于纯洁的青年，却不能放弃指导的责任，不抹杀他们前进的心理，也不因为顾忌他们的幻想，而造出莫名其妙的理论，来迎合他们，欺骗他们，以图拉拢。

直到今天，除了古代社会，我们所知道的逐渐进步的经济制度主要的只有三个：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封建经济制的特质是土地附著于封主，农民附著于土地，工人附著于行会；世界各国所行过的封建制度，虽不尽同，而这三个根本特质是相同的。有些人把中国一切前资本主义的落后现象，都称为封建，这不是科学的说法。聪明的人类，能够修改自己的缺点，为适应生活的需要，不得不打破封建制对于生产力之束缚，使土地有买卖自由，农民有迁移自由，工人有劳动自由。经过长期奋斗，由前资本主义时代以至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制代替了封建经济制，

人类社会生产力乃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制的特质是“财产私有，自由竞争和生产集中”，这本是打破束缚和补救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落后性，自然发展的结果。在资本主义制之下，生产力是大大地发展了，生产也集中了，惟以财产私有之故，财产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为制造贩卖的商品增加少数私人资本而生产，不是直接为大众消费而生产。生产物之分配，以财产大小有无为标准，不以大众需要为标准。因此发生了生产力与购买力不平衡即伪生产过剩的问题。于是限制生产，毁坏生产物，为争夺市场与原料争夺殖民地的战争，都缘此而生。为战争而不得不扩张军备，于是人类一大部分力量，不用在生产养人的生活品而用在杀人的工具上面。这便是资本主义制自身的缺点。聪明的人类，乃企图设法再修改自己的缺点，即是废除束缚生产力的财产私有制，以国家计划的生产代替私人自由竞争，使社会的生产力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这便是社会主义制的根本意义，至于生产集中和技术增高，社会主义的这些要求，和资本主义相同的。

如此说来，社会主义对于生产力之增高和人类幸福，都好过资本主义制，为取法乎上计，我们为什么不应该采用社会主义制来发展工业？

诚然，社会主义制好过资本主义制；并且社会主义运动几乎和资本主义制同时发生。世界各国只要那里有资本主义发生，也几乎紧接着都有社会主义运动。它们的成败，都由于社会发展的条件使然，并非人类主观上故意要先采用较坏的资本主义制，后采用较好的社会主义制。远在十六世纪尼德兰革命中，南方各省的大层居民，要求在革命期间没收的土地及财产无报酬的分给贫民，而为三级会议所拒绝。在十七世纪英国革命中，由国会多数党（独立派）分出了约翰李尔波恩所领导的“平均派”，他们的理论家乌伊可吞利主张共同耕种土地，共同消费，废止买卖，废止货币，废止雇佣，政府指他们为共产主义者。在十八、十九世纪间法国革命中，有巴黎公社代表者苏美时派、许伯派及被人称为“疯人”的甲格龙。

华来等,要求向富人征收所得税及财产税,组织公共作场,把国家一部分财产出租给无产人民,严惩高利贷者,由城市政府廉价售粮食给人民,并且企图掀起反抗富人的新革命。有巴比夫、达尔脱等组织的“平等社”准备以暴动的手段,来实现平等者的共和国以代替资产阶级的共和国,那是建立劳动者革命专政的政权,主张共和国国民财富之分配,必须用在保证共产主义公社每个社员(即六十岁以下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在里昂工人暴动中,有布南克巴尔比士领导于一八三六年成立的“四季社”反对人剥削人,反对社会上的一切不平等,主张用革命建立独裁政府,实现平等的原则。这些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暴动,都相继失败了,只是为资产阶级政权和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路。这并非证明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好过社会主义,而是在社会之历史发展上,资产者、小有产者以及工农平民为生活的需要,一致急迫的要求生产力增高。同时在旧社会的母胎内,已经由高利资本、商业资本和手工业资本,造成了资产阶级的优势,当时还没有集中的大产业,因此也没有能够领导一般平民执行社会主义任务的产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激进分子,沉醉在阻碍生产集中和生产力增高的“均产”、“平等”之幻梦。他们的失败命运,本是历史的必然。而且他们的失败,正是社会之进步,虽然他们的英勇斗争,至今还值得令人钦佩,十九世纪上半期,欧洲各国资产阶级的统治日渐巩固,资本主义的罪恶日渐暴露出来。小资产阶级空想的社会主义各派别,乃如雨后春笋普遍的发达起来,特别在法国,主要的,如圣西门派、傅利耶派、路昌伯朗派、浦鲁东派、卡白派、勃兰克派,一时风靡了欧洲。这些派别,痛恨资本主义是一致的,他们当中,除了勃兰克派和以前的巴比夫一样主张由少数革命家的秘密组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外,其余都是和平宣传者,希望统治者或慈善的资本家,接受他们的主义主张,和平的走到社会主义,反对革命斗争,甚至反对工人运动。他们除了做了十九世纪后半期科学的社会主义先驱外,自然不能有所成就。

现在的中国,也有许多青年人模模糊糊的反对资本主义,爱好社会主义,这可以说是一种进步。但我们必须向他们指出不根据经济发展,不根据政治斗争,只满怀着厌恶资本主义感情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区别。在科学的社会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无论为功为罪,而毕竟是人类社会进化所必经的过程。没有它,小有产者的社会便没有发展生产力和生产集中之可能。因此只有无产者,而不会有工业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决不能因为人们厌恶它而不来,社会主义也不能因为人们爱好它而来。这是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条件而决定的,人们的努力,只能使可来者快点来而已。在十九世纪的末期,俄国小资产阶级的民粹派,根据俄国的特别国情,来否认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认为俄国可以由农村公社制,直接走到社会主义,跳到资本主义阶段免得受它的毒害。其时俄国科学的社会主义者,认为这是一种反动思想,加以严厉的抨击,因为这种思想没有一点现实性,只有阻碍俄国社会跳跃的进化。列宁曾劝俄国的民粹派学习中国的孙中山先生,他认为孙中山先生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工业计划是革命的。我希望历史不至重演,希望中山先生的信徒,不至于倒过来学习俄国的民粹派!

此时有些反对资本主义的缠夹意见,我们不需要加以讨论。因为他们并非真心反对资本主义,更非因为爱好社会主义而反对资本主义。他们口中所说和手中所做的是两件东西。我只提出老经济学者马寅初先生的意见讨论一下就够了。马先生的大意是:中国不能走俄国的路,走美国的路,又流弊很大,很危险;于是马先生感觉得没有出路,仍旧只有提出发展国家工业,同时容私人经营工业而加以节制的主张,这正是罗斯福经济复兴计划的骨干;然而却没有人认为罗斯福的计划已经走出了资本主义的范畴,马先生也不曾否认资本主义。不过马先生要注意,今日的中国,并非美国可比,且以世界大势而论,来得太晚的中国资本主义,即将来也不会有他的十九世纪的末期一个饥寒交迫的人,而日夕彷徨为预防

将来发财时子孙滥用是谋，这和马先生同样是杞人忧天。并且这一杞忧，便会和张之洞“中学为体”的意见一样，又要阻碍中国工业发展数十年，岂非中国民族活该倒霉！由国家来发展工业中国过去是如此，将来也必须局部的采用。可是由中国过去的经验，由日本明治初年，国营工业的经验，由中国眼前招商局和民生公司成绩对比的经验，都同样警告我们不要对国家经营工业的办法渲染得乐观过分。即使国营普遍的成功，也不一定就是走出了资本主义范畴，就人们所歆羡的苏俄国家工业说罢，十月革命本是政治的成熟，而非经济的成熟。如果列宁有理由说苏俄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也可以说，苏俄的国家工业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苏俄虽然经过了社会革命，变更了财产关系，变更了国家的阶级性，剩余劳动在名义上归了工人自己的国家，而实际上远远优裕过一般工人工资和生活的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还存在着，如此便不能够说已经走出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在别的国家，如果有人一提到国家工业便以为这是国家资本主义，已经又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那更是轻浮之见。

我们不要学唯名主义者，一听到社会主义便肃然起敬，一听资本主义便畏之如蛇蝎，厌之如粪蛆，如果人们不敢断言中国此时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制发展工业，这必须毅然决然采用资本主义制来发展工业，只有工业发展，才能够清除旧社会的落后性，才能开辟新社会的道路。

我们不象一班迂腐的先生们，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仍要走欧美循序进化的旧路，发展到尽头，我们只认为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经的过程，要来的东西让它快点来，不要害怕它，老成谋国者，要“负责任，说老实话”，不好有丝毫虚矫之气！

八月二十四日

原载《政论》(旬刊)第1卷第23期

署名：陈独秀

我们为什么反对法西斯特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

张伯伦说：“任何国家欲以武力统治全世界，余则认为非抵抗不可，因在此种之统治下，酷爱自由之人民统不能一日生存也”。罗斯福也屡次显明的以摧毁民主与自由斥责希特勒之统治。东西两半球这两大民主国的政治领袖，对于法西斯制之批判，可谓切中要害。

全世界近几百年国内战争和对外战争，大部分是为了自由。

自由为什么是如此重要呢？

人类之所以能够战胜群兽，而为之灵长，正因为主思想之大脑特别发达，生物学家、人体生理学家，同样告诉我们：人体及一切生物器官，愈用愈发达，愈不用则愈退化以至消灭。法西斯的统治，是要停止人们思想之自由，全德国人非希特勒之言不能言，全意大利人非墨索里尼之言不敢言，企图把全国人变成无知的牛马，随着希特勒、墨索里尼的鞭子转动。人们失了思想自由，大脑自然废而不用，日久不用的器官，自然只有退化消灭。人类因为能够自由思想，才由猴子变成人类；法西斯统治停止自由思想，会把人类变成猴子，这是法西斯统治发展的自然逻辑。即短时期不至变为猴子，而失去公法上自由的人民，除了绝对服从奴隶道德外，不能课以任何道德的及政治的责任。

希特勒为德国自由而撕破凡尔赛和约，我们是应该举起双手赞成的，然而事实上得着自由的，只是希特勒及其党徒。其余的德国人成了希特勒的牛马奴隶，这又何能够得到全世界酷爱自由的人士之同情！

号称民主共和国的捷克，直到国家垂亡的今天，最近改组的薛拉维内阁，以与捷克民族合作著称的斯拉伐克民族尚无一人参加；斯拉伐克自治政府和立法机关，斯拉伐克省以斯拉伐克语文为正式文字，今天才被允许；（斯拉伐克民族或者会感谢希特勒！）其对待他民族可知。任锡曼说：“捷克苏台区内之人民，素在毫无生趣之情状中度其时日，直至三、四年以前，德国始予彼等一线希望。”捷克民族所独霸之政权，其对待异民族之专横，我们也不必为之讳，希特勒高呼为捷克境内的日尔曼民族自由而奋斗，也未尝不动人听闻；然而我们要问：日尔曼人在捷克无自由，归并到法西斯特统治下的德国，自由又在那里？如果希特勒、任锡曼认为捷克境内的日尔曼人处在十八层地狱，我们则认为德国境内的日尔曼人是处在十九层地狱！

希特勒大声攻击别的国家，“自称为独裁制之政府，其存在全赖屠杀冤狱者，反被誉之为民主政权。”我们固然没有一点理由为这一独裁政府辩护，我们却可以劝希特勒拿镜子照照自己，免得只看见别人，看不见自己，也不能以别人吃海洛英作为自己抽鸦片烟的理由。希特勒夸耀自己并夸耀墨索里尼都为“举国人百分之九十九所维护之政府，其实一切独裁政府，都会要这套把戏，独有民主政府办不到，这正是他的优点，因为他不敢象独裁政府那样无法无天的干。”

本年三月七日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有一段攻击法西斯特的文章道：

“全世界优秀的艺术家、科学家、思想家都很清楚的认识了法西斯主义在展开进攻正义和真理的暴行。在这些法西斯主义横行的国家中，所有优秀的国民都被钳制了行动，封锁了耳目。日本的进步作家鹿地亘先生说：在日本文化已经失掉了，民众的呼声已经听不到了。‘文化’在牢狱里面。法西斯的流氓们，要把世界拖回黑暗中古时代，要把历史向后转，他们疯狂的杀人放火，‘焚书坑儒’，颠倒是非，淆乱黑白。他们明目张胆的进行破坏人类幸福的

浩劫，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这一段话真说的痛快淋漓！可是我们也要劝他们拿镜子照照自己！凡是攻击法西斯特的人们，便应该自己反省一下，有没有和法西斯特同样的行为，不要在别人是“暴行”、“横行”、“钳制”、“封锁”、“颠倒是非”、“淆乱黑白”，在自己便是政治斗争的正当手段，说什么“只问目的，不择手段”！

我们之反对法西斯特，不唯其名唯其实，无论他挂的是何等金字招牌，无论他为了何种目的，只要他在事实上采用和法西斯特同样的手段，我们都一律反对。

全世界有良心的人们，拿出毅力来救救人类的大脑吧！不要跟着法西斯特“把历史向后转”，不要领导人类退后到猴子的道路上去！

十月十二日

原载《政论》(旬刊)第1卷第29期

署名：陈独秀

蔡子民先生逝世后感言

——作于四川江津

(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四日)

“人生自古谁无死”，原来算不了什么，然而我对于蔡子民先生之死，于公义，于私情，都禁不住有很深的感触！四十年来社会政治之感触！

我初次和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绪末年。那时杨度生、何海权、章行严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招我，我自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从杨度生、钟宪宅试验炸药，这时子民先生也常常来试验室练习，素谈。我第二次和蔡先生共事，乃是民国五、六、七年间在北京大学。在北大和蔡先生共事较久，我知道他为人也较深了。

一般的说来，蔡先生乃是一位无可无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时有关大节的事或是他已下决心的事，都很倔强的坚持着，不肯通融，虽然态度还很温和；这是他老先生可令人佩服的第一点。自戊戌政变以来，蔡先生自己常常倾向于新的进步的运动；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长时，对于守旧的陈汉章、黄侃，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参与洪宪运动的刘师培，都因为他们学问可为人师而和胡适、钱玄同、陈独秀容纳在一校；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这是他老先生更可令人佩服的第二点。

蔡先生没有了，他的朋友，先生的学生，凡是追悼蔡先生的人，都应该服膺他这两点美德呀！

蔡先生逝世后，有一位北大旧同学写信嘱我撰一文，备登公祭

时特刊之类,并且说:“自五四起,时人间有废弃国粹与道德之议,先生能否于此文开正之。”关于此问题,我的意见是这样:

凡是一个象样的民族,都有他的文化,或者说他的国粹;在全世界文化的洪炉中,各民族有价值的文化,即是可称为国“粹”而不是国“渣”的,都不容易被熔毁,甚至那一民族灭亡了,他的文化生命比民族生命还要长。问题是在一民族的文化,是否保存在自己民族手中,若一民族灭亡了,甚至还未灭亡,他的文化即国粹乃由别的民族来保存,那便糟透了,“保存国粹”之说,在这点是有意义的。如果有人把民族文化离开全世界文化孤独的来看待,把国粹离开全世界学术孤独的来看待,在抱残守缺的旗帜之下,闭着眼睛自大排外,拒绝域外学术之输入,甚至拒绝用外国科学方法来做整理本国学问的工具,一切学术失了比较研究的机会,便不会择精语详,只有抱着国“粹”甚至于高喊读经的人,自己于经书的训诂义理毫无所知,这样的国粹家实在太糟了!

人与人相处的社会,法律之外,道德也是一种不可少的维系物。根本否认道德的人,无论他属那一阶级,那一党派,都必然是一个邪僻无耻的小人;但道德与真理不同,他是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他有空间性和时间性,此方所视为道德的,别方则未必然;古时所视为不道德的,现代则未必然。譬如:活焚寡妇,在古代印度视为道德,即重视守节的中国人也未必以为然;寡妇再嫁,在中国视为不道德的事,在西洋即现时的中国,也不算得什么大不好的事;杀人是最不道德的事,然而在战场上能多杀伤人才算是勇士,殉葬和割股更是古代的忠孝美谈;男女平权之说,由西洋传到中国,当然和中国固有的道德即礼教,太不相容了,然而现代的中国绅士们,在这方面已不公然死守固有的道德了。其实男子如果实行男女平权,是需要强毅的自制力之道德的。总之,道德是应该随时代及社会制度变迁,而不是一成不变的;道德是用以自律,而不是拿来责人的;道德是要躬身实践,而不是放在口里乱喊的,道德喊声愈高的社会,那社会必然落后,愈堕落;反之,西洋诸大科学

家的行为，不比道貌尊严的神父牧师坏，清代的朴学大师们，比同时汤斌、李光地等一班道学家的心术要善良的多，就以蔡先生而论，他是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的，他是反对祀孔的，他从来不拿道德向人说教，可是他的品行要好过许多高唱道德的人。

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我敢说蔡先生和适之先生在这两个问题上和我的意见大致是相同的；适之还活着，人们不相信可以去问他。凡是熟知蔡先生言行的人，也不至于认为我这话是死无对证信口开河。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关于重大问题，时论既有疑义，适之不在国内，后死的我，不得不在此短文中顺便申说一下，以告天下后世，以为蔡先生纪念！

原载1940年3月24日《中央日报》

署名：陈独秀

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日)

历史决不会重演，此次大战已使世界各方面发生巨大变化，或已发生巨大变化之萌芽，拿过去理论公式的表格来填写将来的事变之发展，简直不中用了。

此次大战不外三种结果：一是英、美和德、日不分胜负而议和；二是胜利属于英、美；三是胜利属于德、日。第一种结果之可能最少，我们似不必加以推测，第二种和第三种可能以何者最大呢？以现状观之，自然以德、日占优胜，开战已两年多了，又因得到苏联出来撑持，英国全然休息了半年，此时以全力仍不能敌住德国在北非洲之少数部队，若说它能够于最近的将来战胜德国的大军，这是很难想象的事。若认为英国在各战场之失败，都由于陆空军之寡不敌众，再过一年或至一年半，英、美军器生产大扩充之后，战局便会转变；惟现时虽有人发出“全面改厂”的呼声，而鉴于过去直至现在，政府官吏之因循误国以及工厂主只顾私人的利益，将来军器生产之竞赛，英、美能否胜过德国本土及其可能利用之邻邦，确实太成问题。即假定将来可以胜过，又有何神秘能够使希特勒及其伙伴，在此一年甚至一年半以内，按兵不动，静候着英、美扩充军备呢？德国的内部危机，诚然大过英、美，然在对外战疲或溃败前未必爆发。德国唯一的弱点是缺乏煤油，这也只是她在始终无力夺取高加索或伊朗的条件之下不能够支持长期战争的因素。基于各种情势，德国利于速战速决，英、美则利于持久战，双方都以争取时间为第一要着；所以迫在目前之德国的春季攻势，无论发生在地中海或欧俄大陆、马尔他、

直布罗陀、苏伊士以至新加坡，这一战线之胜败，或莫斯科、高加索、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以至新加坡，这一战线之胜败，都可说是决定此次大战全局胜败之最大关键，这一战线之胜利若属于德、意、日，英、美是不能够长久支持下去的，自古至今，单是地大人众物博，并不是决定胜利的重要条件。

倘胜利属于英、美，德、意、日都完了，英、美在和会中，或国际善后会议中，便开始形成对立的局面，战后英国收拾欧洲、北非洲、近东以至中东，已非易事，一时决无力量及于远东，远东以至南洋、澳洲，自然会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那时苏俄将是两方面拉拢的奇货，英、美的命运乃决定于下次大战。

胜利倘属于希特勒，英国便完了，美国也只得暂时划两洋以自保。希特勒虽胜利，他的枪口仍然要向着西方，自乌拉山、伊朗、印度以东，则非他的军事力量直接所能及，那时无论美、日是否成立和议，日本将是美、德两方面拉拢的奇货。美国固未必继续对日战争，希特勒在未征服美国以前，他也不会为了远东问题开罪日本，逼迫他所倚重的同盟者转向美国，自断其两洋夹攻美国之右肋，希特勒知道英国在远东的势力消灭后，他若威胁日本，日本有获得美国退出远东的条件而和美国协助之可能。美、德的命运乃决定于下次大战。

世界还会有几次大战，我们还不能知道，所能知道的只是在战争的因未除去以前，战争的果是不能免的，并且胜利若属于德国，下次战争必然来得更快。美、德间固然虽无所谓和议，而实际战斗并必告一段落，德国固然需要一停战时期，建立他的新秩序以收胜利之果，更需要补充足够渡美的战舰及运输舰之时间，然一过此时期，德国对美战争便会从南美洲开始。本来每次国际大战都不过是前次大战之继续延长，我们切不可为“永保和平”、“民族自决”、“民族平等”、“资本制度消灭”，如此等等好听的宣传所眩惑，梦想战后这些都会实现。

欧美人想就资本制度加以改良的企图，不自今日始；然而其

结果乃是在股份公司、合作社的旁边，巍然起来了脱拉斯；在劳动立法普遍了半个世界之后，所谓“社会主义国家”还得恢复计件工资。改良制度既非易事，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更不能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轻松。此次大战后，不但英、美，就是在德、意、日的世界里，也必然企图改良资本制度，以适应他们的统治，希特勒一向非难资本主义，这并不能够欺骗任何人，只是他和他自己开玩笑。他们改良的企图，不外拿关税协定甚至经济同盟，来减轻各集团圈内的关税壁垒；拿物物交易来减轻各集团圈内的货币作用；拿产业国有化，来代替某些私人的企业。各集团圈内关税壁垒即能减轻，对于另一集团圈的关税壁垒势必还要加强；物物交易的办法，不但不能全部施行，即其所能够交易的，仍旧以货币计算，仍旧以商品交易，而非分工互助，某种产业国有，已经是前世纪所有的事，全部国有化，即实行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上好似说得通，而事实上必不可能。占有生产工具的大集团，不经过革命的没收，而自愿的把私有财产贡献给国家，这是不可想象的事。如果有人幻想能有一个超然政府来和平的没收，这一所谓“超然政府”，上午企图没收别人的企业，他的政府下午即被别人没收了。所以以上三种改良企图，决不能动摇资本制度的基础。资本制度这种东西，一旦开始发生，利与弊都势必顺着她自身发展的逻辑逐日增长，一切改良方法既不能动摇其基础，节制之，更只有使整国的社会经济趋于衰落，欲只得其利而免其弊的如意算盘，是不会成功的。私有财产制和商品生产制，是资本制度之基础，亦即其弊害之根源。这一生产制，其目的是为拥有生产工具者出卖商品，增加其私有财富而生产，不是为直接供给一切人民食品而生产；其生产力愈益发展，依供求律愈益失去生产力与购买力之均衡，因之，而生产过剩，而物价低落，而工厂倒闭，而工人失业，而形成经济恐慌；经过一时期，因生产力削弱而恢复原状，后又因生产力比以前更加强而走向更大的恐慌，如此循环而构成恐慌之周期律。自来救济生产过剩之策有二：一

是自动的减少生产量甚至毁坏生产品这一愚蠢可笑的办法；一是争夺殖民地及国外市场走向战争这一疯狂可怖的办法。为了必须把国内生产过剩的商品向国外市场推销，还必须阻止国外商品侵入国内市场，就不得不加高关税壁垒，扩张军备，准备战争，以至实行战争。这一串因果相联的现象，都是现在国家当局所必须采用的步骤。因为他们既不能消灭资本制度，便只得让资本制度牵着鼻子走，否则只有失败，这本是事实之必然，决不是什么思想，什么良心所能使之改变的。在全世界几个强大国家必须争夺市场，必须准备战争，必须实行战争的时代，大家尽力扩大其势力范围；他们彼此挤得水泄不通，怎样谈得上民族自决、民族解放呢？上次大战之终了，威尔逊的十四条，未尝不轰动全球，而随即销声匿迹者，并非路易乔治和克利蒙梭欺骗了威尔逊，乃是威尔逊欺骗了他自己，并且这一欺骗，亡了法国，害了英国和美国，对日本丧失了强国的体面。此次大战后，谁还要在资本制度世界标榜和平主义的幻想，在下次大战中，谁就是失败者。

此次大战后，无论胜利属于何方，帝国主义的统治都仍旧不变吗？资本制度存在一天，由它所自然产生的帝国主义，当然不能自动的根本放弃，但统治的形式必然有所改变，即是：由民族化到国际集团化这一形式的改变；这一改变并非帝国主义制度之终结，而它反走向扩大与加强。今后不但十九世纪以前的民族国家运动已随着帝国主义发生而没落，即二十世纪初期的七八个帝国主义列强之对立也要完结。德、意、日都是由民族国家进而为帝国主义国家之较幼者，日本是最后一个，全世界殖民地及落后国的市场都已为他人捷足先得，这就是他们不得不冒着危险，疯狂的以战争来改变帝国主义世界旧秩序之唯一的原因。战争的结果，真正完全独立不受他人支配者，只能有两个领导国之对立，美、德之对立，或英、美之对立，其他国家民族，都不得不在同盟或全面合作等名义之下，分别隶属于这两个领导国所领导的集团圈之内。日本和苏俄，当然都有各自领导其集团圈之野心，然

而生产力终于要决定他们的命运。其他殖民地及落后国，若企图由民族斗争而产生新的独立国家，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各集团圈内，依国力之强弱，其地位略分四等，第一等是较有面子的所谓“同盟国”，例如日本之于德国，苏俄之于英、美；第二等是半殖民地，例如意大利之于德国，荷兰、法、比之于英、美，虽然有一个自己的政府，政治尤其是经济，都多少要受领导国支配；第三等国是被保护国，例如法、比之于德国，丹麦、意大利之于英国，菲律宾之于美国，虽然有一个自己的政府，而不能有独立之外交；第四等是殖民地，连自治政府也没有，统治权操诸领导国总督之手。比殖民地更次一等，自来是没有的，有之便是种族日渐消灭之美洲、澳洲的土人。各集团圈内的国家民族地位虽高低不同，而有一共同点，即是他们的政治及经济制度都必得或多或少的按着领导国的模样改造，根本相反的制度是不能够存在的。德国所领导的集团圈内，多少都要按着纳粹制度改造；英、美所领导的集团圈内，多少也要按着民主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制度呢？这要靠着领导国的革命成功才能实现，才能够影响整个集团圈，依俄国革命的经验，帝国主义世界中最弱的一环之破碎，终于不能够使它全部瓦解。至于现在的苏俄，不但她的生产力不能胜任领导国，她自身早已离开社会主义了。

有些欢喜做梦的人，当此次大战一开始，便梦想弱小民族独立的机会到了；其实亚洲的殖民地，一脱离英、美便入了日本的掌握；非洲的殖民地一脱离英国便入了德、意的掌握。有人甚至梦想战争会引起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快到来，不幸事实幻灭了他们的美梦，已经不胜悲哀，如果再觉着今后连民族斗争都会受到限制，并且纳粹党会支配半个地球，他们将感觉着由欢喜的天国坠落到悲哀的深渊，将感觉着命定的要走下坡路了，其实人类进化史，它始终很冷静的走着它前进的道路，此时它并未意图走向天国，也不是走向毁灭坠落深渊，对于人们自己由虚幻的希望欢喜而来之失望悲哀，它不负任何责任。此次大战，即使不幸得很，胜

利果然属于纳粹，它竟至支配了半个地球，这占人类半数的人民，在政治上将受到整个时期窒息的大灾难，而在这经济和英、美胜利一样，固然不能动摇资本制度对于生产力之束缚，而资本制度的范畴以内会有一大进步，例如由币制统一、减轻关税壁垒、物资集中等等，渐次减少世界上许多小的经济单位，除去一部份经济发展之障碍，将比战前的社会生产力要突飞猛进，这是在客观上为将来的社会主义世界开辟宽广的道路，加强物资的基础，这本是资本主义在血的罪恶中产生进步的惯例，只有眼光狭隘的教派之人，才见不出这一远景。人类历史也和地球一样，无论在光明的白昼或黑暗的深夜都是进行不息的。

正经的说来，认真的民族解放，只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实现，在资本帝国主义世界里，落后国家及弱小民族之“民族自决”、“民族解放”，本是一种幻想，何况在两派帝国主义的主脑，争着以战争状况裹胁全世界落后国家及弱小民族的今天，民族斗争会受到限制。这句话，只有欢喜幻想的人听着才感觉得惊异，如果从全世界经济由统一而进步的观点看来，民族斗争受到限制，不一定完全是很坏的事。无论是全世界或一个国家以内，没有革命的统一，反革命的统一也有进步的意义。例如吴佩孚的统一比军阀割据好，刘湘的统一比防区时代好。并且民族斗争会受到限制这句话，并不是说被人领导的民族将驯羊似的一无所作为，只是今后的民族斗争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并且有此警觉才能够开始实行有效的步骤：（一）努力于自己的政治民主化和民族工业之进展，以增高在集团圈内之地位，现在已经不是李鸿章时代，不应仍做富国强兵一跃而为十八、十九世纪式民族独立国家及二十世纪式世界头等国的好梦；（二）创造自己的实力（工业及民族的组织），以准备与领导国国内革命相应和的斗争，以达到自己的民族的真正解放与进步，不应幻想关起门来，在一个国家内以一个民族的力量，能够排除帝国主义的势力，以实现民族资本主义的国家之独立；（三）对于国外斗争，无论是对于轴心国

或非轴心国之斗争均应从民主主义出发，不应从民族主义出发，因为专制的德、意、日三国之携手横行，已冲破了各国民族之最后铁丝网，这已经不是某一民族的问题，而是全人类的民主自由存亡问题，若仍旧由民族立场出发而斗争，印度眼前的敌人便是英国，中国将来也要再来一次抗美战争；（四）我们应该尽力反抗帝国主义危及我们民族生存的侵略，而不应该拒绝它的文化。拒绝外来文化的保守倾向，每每使自己民族的文化由停滞而走向衰落。中国文化诚然有它的优点，惟如果渲染过当，便会使之高踞在形式上的地位，俯视一切，形成偏畸的发展，竟把民生国防所依赖而应该特别重视的物质文明，排除在文化以外，还有人竟把中国历史上民族的光荣，印刷与火药之发明，也排除在文化以外，把文化缩小在文艺圈子里，这样误解文化的结果，遂在此次抗日战争中，发生了万分不应该发生的两件事：一是把口里哼哼诗词、手里耍耍笔杆，应该称为“文人”的，无端改称为“文化人”，这和日本称中国为“文字国”同样是对中国文化之讽刺；一是继续义和拳符咒能够抵挡枪炮的思想，企图用标语、口号、歌咏来抵挡飞机、大炮、坦克车，这便是中国文化畸形发展之末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已经害了我们半个世纪没有长进，我们不要高唱“本位文化”、“东方文化”再来害后人吧！

或者有人认为此次大战是轴心和非轴心两派帝国主义各自扩大其势力圈之斗争，非民族解放之斗争，弱小民族之参加毫无意义。这一见解是由于他们不明白民族解放自然不能够依赖帝国主义帮助而成功，也不是弱小民族自己力量可以解决的问题；而且“中立”这一名词，现在战争史上将不会再见了。缅甸人如果说：宁可和认识的魔鬼结交，而不能和不认识的天使来往；我们应该告诉他们，我们并不知道现世界有甚么天使，只知道你们所谓认识的魔鬼，比你们不认识的魔鬼，还要凶恶十倍！中国如果有人问：帮美国打日本，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我们应该告诉他：美国胜利了，我们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贪污，有可能恢复以前

半殖民地的地位，倘若胜利属于德、意、日，我们必然沦陷为殖民地，连南京的傀儡政府不久都会滚蛋！

以上的说话，或者有人认为是低调，那只好让将来的事实教训他。

（一九四二）三十一年二月十日

原载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一日重庆《大公报》

署名：陈独秀

附录：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

(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

国民党、共产党同志们！此时我们的国民革命，虽然得到了胜利，我们的敌人，不但仍然大部分存在，并且还正在那里伺察我们的弱点，想乘机进攻，推翻我们的胜利，所以我们的团结，此时更非常必要。中国共产党坚决的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重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也不至于主张打倒自己的友党，主张打倒我们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素所反对之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使敌人称快。无产阶级独裁制，本是各国共产党最大限度的政纲之一，在俄国虽然实现了，照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经济的环境，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程，是否是一定死板的经过同样形式的同样阶级（段？），还是一个问题，何况依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之趋势，现在固然不发生这样问题，即将来也不至发生。中国所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来对付反革命，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独裁。两党合作，本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重要之点，是在两党大多数党员，双方以善意的态度，解决此问题，方不违背合作之根本精神。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凡是了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其对于中国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现在国民革命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最后根据地上海，警醒了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谣中伤离间，无所不用其极！甲则曰：共产党组织工人政府，将冲入租界，贻害北伐军，将打倒国民党。乙则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

最高党部全体会议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释解。在共产党方面，爱护地方安宁秩序，未必敢后于他人；对于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示赞同，总工会亦已发表不单独入租界之宣言；对于市政府，亦赞同各阶级合作政策；事实俱在，更无造谣之余地。国共两党同志们，我们强大的敌人，不但想以武力对待我们，并且想以流言离间我们，以达其以赤制赤之计。我们应该站在革命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商协，开诚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两党同志果能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反间之言，自不获乘机而入也。披沥陈词，万希各省自察！勿致为亲者所悲，仇者所快，则中国革命幸甚！两党幸甚！

汪精卫 陈独秀

原载1927年4月5日《时事新报》